

目 录

- 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記……………熊秉坤 (1)
- 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紀实……………王纘承遺稿 沈畴春整理 (17)
- 記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軍政分府……………卢智泉 温楚珩 (47)
-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学生軍始末記……………
……………周克之原著 陈瑞冀整理 (55)
- 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經過……………王振民 (62)
- 南京陆軍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經過……………沈鑄东 (69)
- 日知会在黄冈的活跃……………程起陆 (75)
- 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則……………李健侯 (79)
- 鄂革命軍被迫退伍經過与陈佐黄、王耀东、彭紀麟烈士事略
……………魯祖軫 (90)
- 記鄂軍杀端方与回援武昌……………丁振华 (97)
- 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結……………万鴻喈 (106)
- 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閻幼甫 (112)
- 黃兴与明德学堂……………黃一欧 (132)
- 与黃克強相交始末……………章士釗 (138)
- 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周震麟 (150)

湖南光复及四十九标援鄂·····	余 韶 (159)
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	
·····	仇 鳌 (176)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穆如 (185)
长沙响应起义见闻·····	陶菊隐 (192)
辛亥回忆三则·····	文 斌 (201)
辛亥革命在湖南所见·····	邓介松 (204)
关于焦达峰二三事·····	閻幼甫 (211)
回忆禹之謨·····	彭重威 (214)
記楊任常德遇难·····	凌汉秋 (236)
我所知道的馬福益·····	张平子 (239)
策动馬福益起义的经过·····	万 武 (245)
岳阳十日記·····	宋式麟 (249)
譚心休“招撫”宝靖始末·····	李晴云遺稿 (255)
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訪問录·····	张友仁 (263)
庚戌新軍起义前后的回忆·····	张藤村 (281)
追忆庚戌新軍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姚雨平 (287)
庚戌之役倪映典遇害真相·····	陈景吕 (299)
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	
·····	赵連城 (302)
黄花崗起义前后杂忆·····	应德明 (323)
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門见闻录·····	王迈常 (327)
温生才刺李琦案与广州起义见闻紀实·····	刘乃勛 (331)
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	邓警亚 (334)

香山起义回忆·····	郑彼岸 (338)
惠州光复见闻·····	苗致信 (343)
惠州府中学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	王映楼 (348)
紫金光复前后·····	甘善斋 (352)
潮汕光复回忆·····	张藤村 (358)
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	梁若尘 (363)
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革命军在长汀的失败·····	萧文遗稿 (368)
梅州光复回忆·····	温狮远 (385)
欽县三那反抗糖捐斗争与欽防之役·····	罗綬章 (392)
化州光复前后十年见闻录·····	彭中英 (396)
辛亥革命前后琼崖革命党人的活动·····	梁秉枢 (405)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民军概况·····	李明如 陆满 (410)
记广东瀛字敢死军·····	胡汉贤 (417)
王和顺惠军与陈炯明循军冲突内幕·····	李衡皋 (420)
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	朱秩如 (422)
鎮南关起义见闻·····	郑惠琪等口述 (430)
我参加同盟会和回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	刘 嘏 (440)
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	李任仁 (448)
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和广西独立前后·····	雷沛鸿 (467)
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	黄绍竑 (478)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报刊·····	蒙起鹏 (491)
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	梁烈亚 (494)

- 辛亥革命在柳州.....關善安等口述 (503)
 平南起义和会攻潯州.....潘乃德 (512)
 广西独立时融县的斗争.....胡佩生 (518)
 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記.....覃子权 (522)
 李立廷在玉林五属的反清斗争.....李繼源 (527)
 覃老发、陆亚发在四十八寨的反清斗争.....
黃孟念 卓 通 陶志方 (535)

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記*

熊 秉 坤

(一) 工程第八营发难經過

当三烈士^①就义之先一日,即十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下午五时,邓玉麟偕楊洪胜匆卒到工程营前队第三棚徐少斌处,密召熊秉坤曰:“今日汉口炸弹失慎,孙武受伤入院医治。清吏恐慌,大事搜捕。我等决定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軍械所系汝营駐守,今夜無論如何困难,一听炮声,必須即行占領。发难后各营需要子弹,此点甚为重要。旗帜、符号,今日已被搜去。少数子弹、炸药,由楊洪胜随后送来,作为响应之用。”熊与邓、楊、徐等,当拟定简单办法如下:(一)肩章反扣,白綳带纏右臂以代符号,俾易識別;(二)軍队出动时,全付武装,去其背囊減輕累贅;(三)工程营进据楚望台后,立派兵一部出城迎接南湖炮队进城,占領陣地;(四)今夜口号:“同心协力”。邓、楊旋即辞去,即将此办法分別通知各标、营同志。

一面又由熊秉坤令支队长郑挺軍速通知駐楚望台軍械所同

* 本文原题为《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輯(一九五七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文共分七节。本集节选該文的末三节,并改題为《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記》。——編者

① 三烈士为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楊洪胜,他們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在武昌被捕,翌晨就义。

志，妥为准备，届时内应勿誤。嗣楊洪胜复到工程营，密交枪弹两盒于熊秉坤曰：“少頃再送炸药来。”同志见了子弹，极为兴奋，几有搶夺之势。熊秉坤棚与排长哨棚毗連，恐生事端，急示意于楊，楊会意而去，复曰：“汝营門卫兵須換一同志，免生阻碍。”时营門卫舍长系右队代表楊金龙，当由熊介紹見面，如言照办。楊洪胜去后，熊将子弹自留六粒，各队代表各三粒，平时胆大与长官有恶感者各发两粒。发动时向操場发三响，以为信号，其余留作必要之用。又囑諸同志，如长官不加反对，决不故意殘杀。分布已毕，静候炮队动静。

以后楊洪胜又送炸弹到营，适与本营右队队官黃坤荣（系卫兵司令官）遇，虽有楊金龙在場，仍无法掩护，炸弹因以落空。楊金龙事后談及，楊洪胜携酒瓶式之炸弹一束到营，当时黃坤荣監視甚严，守卫兵不敢启門。楊扣之急，卫兵佯問：“是誰？”楊答以“我”。卫兵不得已再問：“汝姓什么？此时戒严，不能会客。”黃知有异，即呼：“捉歹徒。”楊聞不妙，即返身遁。迨門启，楊已远逸，黃与卫兵亦未追。

楊返寓喘息未定，而捕楊之軍警至（楊洪胜住第十五协西营門左側第一家，房主系李襄麟之差弁，平时見楊形迹可疑，料楊是革命重要分子，遂白李捕楊）。楊見捕者多人，即投以炸弹，未发，返身而逃。軍警尾追，楊再以第二弹投之，爆力极弱，未能伤人。追者不舍，楊又投第三弹，亦未伤人。楊力促气敗，匿于工程营前伏龙寺后之菜園內，軍警搜捕得之，送与督署，此十月九日夜十一时也。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寢，竟夕以待，不聞炮声，实深詭异。炮队本为軍中骨干，行动須得步兵掩护，始能发生作用，各方戒备森严，其不果行，亦意中事也。

是日夜間工程營戒嚴，官長均領彈携槍守各排出口，并武裝巡查各棚，囑各安心睡覺，且曰：“革命不能成事。某時某處殺多少革命黨徒。何必拖累家庭。”云云。士兵大小便者，即令以痰盂盛之，防范之嚴，可想而知。左隊支隊長任振綱平時勤慎奉公，頗得排長信任，此次戒嚴令下，即喚任携槍領子彈。但任早受總代表熊指示，右臂已纏有白布，排長一見，即奪任手中槍，槍內且裝有子彈兩粒，因是被其看管。熊秉坤聞訊，愈加不安，輾轉床褥，一夜未曾合眼。翌日，熊派李澤乾出營探聽消息，李回告機關均閉門，彭、劉、楊已遇害，城門未開，右路巡防營放哨已自第十五協至我營左右各街。早操畢，熊令李澤乾通知各隊代表，飯後不要分散，有話相商。會餐時，官長到者極少，熊諭于眾曰：“今日奉總機關令，責工程營首先發難。因軍械所為我營所守，如各營響應，亦必先到軍械所領取子彈，如我營不先動，別營必不敢有所舉動。”當約定下午三時晚操發動，眾以無子彈對。熊問昨日所發子彈，則以昨夜未用，置之身邊恐有危險，已棄置矣。熊亦無可如何，其餘均照昨議，并派人送信至軍械所。此時安排雖定，其實毫無把握，正忐忑間，工程營後隊傳達兵送信來云，今日由熊秉坤棚接守衛班，囑預備一切。熊聞之喜極，蓋工程營守衛向由前、后、左、右四隊輪值，一天一換；今日輪班，應歸後隊第三排，因昨夜附屬右隊去軍械所挖掘戰溝（專以供守衛兵抗御革命力量者），辛苦一夜，不能接班，故輪到第一排。守衛班長名曰衛舍長，雖在衛兵司令指揮之下，而換班接哨，均由班長指揮，无形之中增加許多便利。所慮者厥惟子彈。忽本排第二棚同志呂功超向熊言其家有子彈，問其故，則答：“余兄昔充吳元愷營馬弁，愷字營由北通州回鄂解散，余兄携回子彈交余嫂存放樓上箱內，并囑好好保存，將來有大用。余兄現去川……”，話猶

未已，該排排长亲信于郁文、章盛愷两同志接言曰：“排长有子弹，如熊总代表要用，我俩負責盜取。”熊即令吕、于、章三人分途去取，各得两盒。当令金兆龙分发给各同志，时已十二点矣。熊囑副班长陶启元在营督率造飯，監視官长，严防匪徒乘机搶劫；又令于郁文盜取腰牌两面，一交李泽乾，一自佩，相偕外出。入第十五协南营門，先至第三十标第三营前队；同志方維、謝涌泉正言今日在操場捕去张廷輔事，見熊至，急問曰：“怎么样？”熊答曰：“干！特來請你标响应。”方等要熊上楼与王文錦商議。王为該队司书，居队官室，熊告以发难事，王曰：“你如何办就如何好，这边不成問題。”旋至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二排，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蓋因彭、刘、楊慘死故也。熊謂不应作儿女态，并詢以炮队发难計劃。蔡曰：“哪里有計劃？他們都跑了，搖清（即孙武）面部炸伤，只有叫炳三（即邓玉麟）再去炮队試他一試。”熊曰：“我营决定今日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能响应？”蔡曰：“現只有望老哥干一千，我决带队响应。”并約定，发难后带队过第十五协西营門，以放枪三响为信号，直趋軍械所会合。蔡允諾，熊辞返营。

下午三时許，謝涌泉來工程营問晚操动静，并謂該标已布置响应。熊以晚操未下，必是汉奸走漏消息，乃另約晚間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鐘时发难，其余仍如前約；并請轉知第二十九标。謝去，熊复通知各队及守卫同志，小操場发枪三响，一齐动手，先杀与我等对抗之官长，即鳴警笛集合，并再次通知軍械所。至此，营中排长方定国、队官罗子清均向熊表示不加干涉；熊亦說明革命旨在反清，只要不妨害革命行动，絕不杀害汉人。方、罗均先行离去。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順前、后、左、右四队巡視，以驗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試，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見熊曰：“我

響應如何？”熊令照樣武裝，聽從指揮。熊行至本隊第一排第三棚，聞第二排有吶吼聲。熊知有變，即取槍在手，且裝且行，遙見第二排排長陶啟勝對面跑來，熊開槍對其射擊，陶下樓逸去。熊上樓至穿堂間，同行之章盛愷、程鳳林兩同志為對方击中，金兆龍、程定國、林振邦、饒春堂、陳連魁諸同志均下樓不得。樓梯門為代理營長阮榮發，樓下為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諸逆所堵塞，若輩一面放槍，一面大呼曰：“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滅九族的。趕快覺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鬧！”云云。熊等見此情景，即將痰盂、花盆、瓦鉢、板凳諸物，充作兵器，向下拋擊，諸逆仍不退陣。同志呂中秋向阮擊一槍，阮帶傷返身向前隊穿堂人丛中開槍數响，斃同志馮某。同志徐少斌還擊，斃阮于水溝內。熊與諸同志見阮返身向前隊奔去，即一拥下樓，程定國一槍打死黃、張兩逆，其餘官佐有越牆者，有匿于廁所者，均未究。熊即鳴警笛集合，惟以人聲嘈雜，應者甚少。擄開軍械庫，得開口軍刀二十四柄，當分發各代表佩用。熊與楊金龍領隊頭，金兆龍等押隊後，率隊出營。向左轉灣，遇前隊隊官李占魁，李向隊頭連發三槍，未傷人，楊還擊，李即逸去。過第十五協西營門，熊向內放三槍，以踐前約。此時隨行者，不過四十人，其餘仍在營內吶嗎。少聞羅炳順、馬榮等亦舉兵響應，派人送信與熊代表。同志們聞軍械所得手，一個呼哨，即抵軍械所目的地矣^①。

① 作者云：“陶啟勝小腹中彈，奔回家中，翌日斃命。其弟啟發却為革命同志。程鳳林受傷後以治療失時，三日後身死。又武昌子蔣庫原在三佛閣，遷楚望台後，改稱軍械庫或軍械所，稱局者非是。”——原編者注

(二) 革命軍占領楚望台与各标营之响应

楚望台为湖北新軍軍械庫所在地，革命党人固以此为目标，清方官吏亦勢在必守。自十月二日(八月十一日)之后，李克果等即会同阮荣发派兵在軍械庫附近建筑防御工事，防止党人进攻。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晚七时，工程营熊秉坤等在营内发动后，枪声与入声即传至軍械庫，守庫之左队同志罗炳順、馬榮等，知本营业已发难，正拟响应，監視官李克果集守卫兵士謂之曰：“余与汝等前在工程营共事五年之久，今有一言相告，不知愿听否？”众云：“可。”李曰：“外間喧嚷，汝等聞否？”曰：“聞。”李曰：“余为汝等計，如系徒手不法匪人来此，汝等責任重大，須要抵抗；如系軍隊到来，汝等人少，可即避开。”罗等曰：“我等未見一粒子彈，何能抵抗？”李于是令軍械所主任紀某，轉飭管庫工人將庫門打开，搬出子彈兩箱，分发各兵士。同志等得子彈后，即向空中放一排槍，李等見此情况，即与工程营左队官佐等穿牆逾垣而逃，楚望台軍械庫唾手而得。

时熊秉坤所率工程第八营同志約四十余人已到楚望台，左队代表罗炳順、馬榮等出而欢迎之。軍械庫既为党人所有，械彈可以自由取用。正議論間，周定原同志亦率队到达。熊集合队伍講話后，即在楚望台布置防务，又派偵探兩班：一由汪长林帶領，巡視楚望台至通湘門窺探宪兵营动静；一由湯启发带队巡視中和門正街、西街地段。熊以总代表身份下命令如下：

一、本軍应冠以“革命軍”三字，称“湖北革命軍”，其兵种队号，暫袭用旧制。

二、本軍今夜作战，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三、本軍作战以清督署为最大目标。敌方张彪、铁忠、李襄麟等,在大小都司巷、恤孤巷、吳家巷、望山門正街、水陆街、豹头堤等处布防。

四、敌人兵力为教練队二营、輜重第八营一营、机关枪一連、水机关四挺、第八鎮警卫一連、宪兵一連、消防救火队一百名,約共一千五百名左右。

五、本軍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陣地,自閱馬厂、大朝街向南至保安門正街,为步兵防守綫。暫以楚望台为本軍大本营駐地。

六、金兆龙带后队第二排及右队第一、二排出中和門,經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队第八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七、林振邦带左队第三排占領千家街,向第十五协鉄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八、徐少斌帶領前队第三排占領楚望台、中和門高地,向津水關方面布防。

九、其余部队均作总預备队,在本軍械所待命。

十、今夜口号为“同心协力”。

总代表兼大队长熊乘坤发于軍械所,午后八时二十分。

命令发出后,熊精神上极不自在,良以責任重大,稍有差池,即功亏一篑。盖軍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縱,秩序漸見凌乱,較之发难时之指揮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議論,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无何,汪长林带左队队官吳兆麟来,众兵无不喜形于色,欲戴为总指揮。熊即召各队

代表集合会商，多数不以为然，但为发挥全军攻击精神起见，不能不随兵士之愿，即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视地位。

先是汪长林等巡哨至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边沿，见人影憧憧，汪发言曰：“汝等是人是鬼？”吴答曰：“我。”汪固识吴之声音，即谓：“汝为何不出？”吴曰：“恐遭杀害。”汪曰：“均属同胞，何得如此，我带汝等去见熊代表。”吴意未决，适排长曹飞龙、黄楚楠在傍，谓吴曰：“我们去见熊，有汪老总保护（“老总”二字系兵士之尊称）。”吴亦赞成其说，即随汪去。吴既出，又为众兵士所戴，故愿受临时总指挥之职^①。吴随至各防地巡视一周，每到一地，即大声詢于众曰：“汝等代表推余为总指挥，汝等愿否？”众曰：“愿。”吴曰：“愿，须听指挥。”众曰：“听。”吴又曰：“违令者斩。”众曰：“诺。”吴乃就原地复下令如下：

- 一、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第一、二两排，经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攻督署前。
- 二、右队排长鄺名功带右队第一、二两排，经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攻督署后。
- 三、马荣带兵一排，向宪兵队东南端进攻，黄楚楠带兵一排，向宪兵队西南端进攻，互取連絡，即时将宪兵队扑灭之。
- 四、周占奎率兵两排，固守楚望台北端阵地。
- 五、徐少斌、郑廷鈞、汪长林、杨金龙带兵两排，由徐少斌指挥，先夺取中和门，策应金兆龙迎接炮队。

^① 作者云：“吴在刘福武家暂避。”编者訪工程营士兵向炳昆，据说吴十九日夜匿津水闸八号，向劝他出来抓权。其他記載大同小异。——原编者注

六、张伟、任正亮、饒春堂等带兵一小队，由张伟(靖川)指揮，出中和門掩护炮队进城。

七、陈有輝带兵一班，往通湘門附近偵查。唐榮斌带兵一班往中和門附近偵查。

八、楚望台附近交通，着罗炳順、程定国、楊云开、刘定基、孙元胜等，分途彻底破坏。

九、其余为总預备队，由副指揮(按：一云无副指揮)熊秉坤率領，在楚望台北端待命。

十、今夜口号改为“兴汉”。

临时总指揮吳兆麟发于楚望台軍械庫，八月十九日(农历)午后十时半。

此时各标、营、队尙无动静。吳即令总預备队一部分进入散兵壕內(此壕系清吏于八月十二日所筑，全为我用)，向第十五协猛烈射击，促其响应。未几，第三十标同志方維、謝涌泉，排长馬明熙带兵百余名来会；第二十九标蔡济民、胡效騫等带百余人亦到；方兴、李翊东諸同志带陸軍測繪学堂学生百余名亦至楚望台。此时两路进攻队伍方始出发，蔡济民自愿随右路隊进攻。吳又派馬明熙、方維等，带兵出城助金兆龙接炮队。吳令測繪学生作总預备队，旋派往中和門至通湘門一带城牆放哨，以防敌人来袭。逾时炮队进城，即在楚望台布置炮位。

先是金兆龙带兵經中和門，欲出城往南湖迎接炮队。金至城門，門已下鍵，守門者逃无踪影，鎖无匙不得开。金兆龙用双手扣鎖两端，用力向怀中一拔，长尺許、重三斤之鉄鎖，碎为数段，得以出城。张彪知我軍必迫炮队响应，电话令第三十二标标統孙国安轉派队官楚英(旗人)带兵两队，布置要道。在长虹桥与金遇，激战

数分钟，楚以兵无斗志而退；金續前进，至南湖閱兵亭，又与馬队哨兵接触，数分钟，馬队兵士自动退走。金兆龙突破两道障碍，始达到炮队第八标后营門，时炮队内部已响应，金遂与炮标同志蔡汉卿、程国楨、孟发承、徐万年等談城内同志盼炮队进城如大旱之望云霓。惟夜間不便駕駛，由双方同志与士兵拖炮三门，向城内进发。同去者有李作栋、邓玉麟两同志，系昨夜送信炮队未走者。馬明熙、方維亦带队会同进城。

(三) 攻占督署及黎元洪之出处

清吏瑞澂、张彪、铁忠諸逆，惊聞工程营兵变，急飭各协、标、营长官，一面制止内部响应，一面囑派可靠兵队会剿。惟各标、营自管带以上各官，均以身家性命是惜，不但无会剿之勇气，且紛紛离营，惟恐祸及其身。只第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将营門堵塞，使外不能入，内不能出；第三十二标标統孙国安，仅派楚英带两队兵士，反抗我軍；其他如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統黎元洪及第十一营炮队管带张正基亦曾反抗于一时，結果均遭失敗。足見人心思汉，乃革命成功之基础也。我革命軍自炮队进城之后，不独士气为之一振，即武昌完全独立亦由此隆隆之炮声有以促成之也。炮声初起，第二十九标第三营杜武庫、楊选青各同志，第三十标第二、三营徐达明、吳醒汉各同志，均举兵来合；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之炮、工、辮各营队同志，如陈天寅、李鵬升、管心源、章斌等亦各率队前来。吳总指揮令炮、工、辮十一营各队占領蛇山陣地；又令第八标炮队总代表徐万年回标，将所有大小各炮扫数运到楚望台。此时兵力增大，士气甚旺，吾人最大而最重要之工作，即攻督署而占領之也。

右路鄭名功、蔡濟民攻督署后院，至王府口小菜場時即行停止。此處距都司巷僅一箭之隔，敵人有兵駐守，鄭、蔡派戰鬥偵探搜索前進，大隊隨之。方左轉，而敵之機關槍發矣，兼之街市黑暗，殊難進展。蔡將所部分布于官錢局、造幣廠、善後局諸財政機關任守護，而鄭則帶所部回工程營大操場休息。吳總指揮聞此消息，欲置鄭于法，經同人緩頰得免，隊伍復返軍械所。左路進至恤孤巷口，因失察為敵巷內伏兵截斷，亦不利，退回津水關布防待令。

兩路進攻均失利，炮隊射擊目的亦欠準確，吳總指揮及諸同志均主火攻，即令周定原、黃楚楠、楊金龍等各帶士兵三五不等，分三路前往放火。一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綫，一由水陸街進大龍巷至小菜場一帶，一由保安門正街至望山門正街到東轅門。約半小時後，三處烈焰照空，我炮兵乃得乘勢猛擊。吳并派呂中秋、張靖川帶兵十餘名，割斷電信、電話綫，使敵人失却聯絡。

督署附近火起，炮又猛烈，瑞澂即率衛兵一排，携家小、細軟，洞穿督署後垣，由文昌門逃上楚豫兵觀；鉄忠、果青阿諸人隨行；張彪、李襄麟則作最後頑抗。此時炮火雖烈，而步兵仍無長足進展，吳總指揮乃將工程營隊伍集中，再擬攻擊命令如下：

一、熊秉坤帶後隊全隊，經津水關、保安門正街攻督署前，伍正林帶前隊全隊協助熊秉坤沿保安門城牆向望山門前進，惟須派兵一棚為兩綫中間聯絡。

二、黃楚楠帶左隊全隊，經王府口小都司巷攻督署後，以姚金鏞帶第二十九標第三營右隊在後跟進為黃楚楠之預備隊。

三、陳國楨撥過山炮兩門，在保安門城上布置放列，向督署開炮射擊。

四、曹飛龍帶右隊士兵一排，掩護保安門炮隊。

五、方兴以測繪学生百余名为总預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軍械所防务。

总指揮吳兆麟发于軍械所，二十日(农历)午前二点鐘。

此令一下，各自分途进行。惟所有軍隊攻督署热心从事者固多，而徘徊逡巡者亦不少。吳兆麟指揮权力虽仅限于工程第八营，幸各单位同志均能和衷共济。吳总指揮以第四十一标与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軍隊尙待解决，即令炮队用全力轰击，并曰：“今夜如不将敌击潰，一待天明，吾輩必为所虏也。”适黎元洪派馬弁柳国祥至，柳曰：“黎統領命令，决早五时到楚望台。”言毕即走。熊秉坤与邓玉麟呼之返而詰之曰：“黎来系降吾党乎，抑带兵作战耶？”柳不知所对，当囑問明黎氏再来报告。柳去后，熊即与伍正林带队出发，第三十标馬明熙、徐达明、彭紀麟各带士兵若干附熊部前进；第四十一标岳少武、闕龙、李宗义，第二十九标杜武庫、楊逸青、夏一青，亦各領兵若干附伍正林由城上前进。此时敌将张彪带机关枪暨輜重营約两队，并武装消防队数十名，占据望山門城牆。熊由保安門正街直进，与馬、徐諸同志約，将队伍分作三小部，更番跃进；每到一橫巷，将敌人驅逐后，即派兵把守，此乃市街战之战术原則也。

先头部队进至望山門街陈宏发醬园門口，距督署东轅門不过百米突，一經冲鋒，即可得手。忽后方队伍紛紛退挫，据云望山門城上之敌已下城断我后路，謠风偶播，人如潮落，我徐、馬諸同志均无法遏止，退回津水關。伍正林由城上进攻之部队，遇敌将张彪亲自督队反击，并树大白旗，上书：“本統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閭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

既往；若仍冥頑不靈，則水陸大兵一到，定即誅滅九族，玉石俱焚，莫謂本統制言之不預也！”等語。伍等與附屬之炮隊因奏效甚微，而敵又抵抗甚力，其武裝消防隊曾兩次衝鋒我軍障地，我軍死傷頗大。因督隊關龍之負傷，以致紛紛退下，不特失炮兩門，保安門城上障地亦幾為敵所奪去。伍正林揮兵反攻，眾莫之應；伍欲自刎，為左右救免。際此緊急階段，熊乃挑選敢死之士約四十名，附帶引火諸物，專由保安門正街一綫前進。伍正林、馬明熙、彭紀麟、徐少孺、陳振武、饒春堂、林振邦、陳連魁、胡效騫、徐少斌、楊正全、張得發、孫松軒在前，熊秉坤殿後，杜武庫、楊逸青、夏一青等扼守保安門城上。此時敵人專注城上，對於城下略形疏漏，故敢死隊得以順利進展。迨衝至東轅門時，敵守兵不敢擾其鋒，退至西轅門以誘我前進。我軍志在火焚督署，不與戀戰，乃直入頭門，敵則反兵包圍，前進諸同志均被截斷在前。此時我軍之危險程度，確屬千鈞一髮，當面大堂有敵機槍放射，後面又被包圍。熊秉坤見狀情急，即將所有士兵散開，將圍我前鋒之敵，予以包圍，敵遂凌亂；而督署門房又復着火，敵乃分途潰竄，棄槍投械者亦夥。

查門房之火，乃工程營同志紀鴻鈞所發。紀君勇敢非常，左、右手各挾煤油一桶，附徐、馬之衝鋒隊前進，躍到督署門房，即破桶舉火。火發而紀君亦飲彈矣，功成身殞，聞者傷之。至此同人復引火將大堂付之一炬。張彪見大勢已去，逆胆更寒，遂率輜重營殘卒，沿城牆由文昌門渡江，布防于劉家廟車站。三次進攻之督署，此時始完全占領（此役傷十七名，死趙道興、紀鴻鈞、宗厚德、張斗照、李自新五名）。

黎元洪初聞工程營兵變，不甚措意，繼接張正基電話報告，知自領之第二十一混成協直屬工、輜各隊及炮隊之一部亦變，遂集合

第四十一标留营全体官佐于会议厅。黎不发一言，亦无命令，盖借此有秩序之集合而防范之也。工程营发难后，即派周荣棠同志^①通信该协。周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黎讯明来历，即用杀一儆百之计，手刃周于会议厅。果也众心慑伏，暂时收效。迨后遭我軍蛇山与楚望台双方炮击，士兵亦有哄动之象，黎始令官佐各自回营，并云：“带兵出外避炮，如能维持，不負皇恩，是所至盼，更能维持到底，将来定予重赏；否则听其自便，余不能为汝等负责。”言毕，即带执事官王安澜往黄土坡某号该协参谋刘文吉家避匿；文吉亦愿任保护之责。黎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伙回家搬运^②。该伙伙肩挑皮箱三只，恰与前派之巡查湯启发、程定国、馬荣等相值，湯等疑为乘机劫夺之匪类，喝令止步，并欲加以惩治。伙伙答：“余乃此公館伙伙，原非匪人。”湯詰其奉何人所派，担往何处，伙伙不得已，始吐真情。湯等乃偕伙伙同往刘宅，黎見众至，知难再匿，出叱湯等曰：“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众曰：“我等来此，特請公出主大計，非惡意也。”黎曰：“革命党人才济济，要余何为？”众曰：“公平昔御众极得士心，今之革命党员，均屬同袍。众望所孚，无如公者，請即出领导一切。”黎曰：“到何处？与何人商談？”众曰：“到楚望台与吳兆麟商。”黎复曰：“吳畏三(兆麟字)乃余之学生，富有軍事学識，有伊一人足矣。”众知黎无誠意，程定国厉声曰：“从則生，不从則死，統領自擇之！”黎知不可抗，遂由众拥至楚望台。有馬荣送信在先，故吳总指揮派兵一排，站队鳴号以欢迎之。黎服青呢馬褂，

① 黎手刃之党人，〈武昌革命真史〉和〈湖北革命知之录〉作周荣发。又邹玉溪亦为协統所手刃，或作张立成。所隶单位，亦各执一詞。本文作者謂周荣棠，安徽宣城人，工程营飼养兵。——原編者注

② 按黎元洪住宅在中和門內，平时居营中日多，改避往黄土坡刘宅时，派伙伙往千家街协司令部取行李也。——原編者注

灰色呢长夹袍，瓜皮小帽，王安澜随其后。吳总指揮出为招待，黎笑語众曰：“各位辛苦。”吳当与同志諸人引黎至中和門城樓观战。黎首与吳小語，責吳不应为此，吳以为众所挾持对。

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內隱匿之軍官皆来，如杜錫鈞、何錫蕃等。黎聞督署攻下，即召党人代表及前清有官职者会議。黎首发問曰：“督署虽克而瑞澂、张彪未获，汝等将有何法以善其后？”众曰：“請統領主持。”黎复問：“汝等革命党所恃奥援者何处？錢粮多少？”邓玉麟曰：“京山刘英已聚众十万，三日可到。”熊秉坤則以官錢局、銀币、銅币两局及藩庫所存銀币不下三十万对。黎又問：“瑞澂、张彪清兵水陆并进，何以抵御？海軍軍械尤犀利，吾服役海軍多年，故悉知，不需十弹，此城将粉碎矣，汝等将退往何处？”邓玉麟以退湖南答之。黎曰：“有何把握？”邓曰：“焦达峯已約下月初間举事。”黎曰：“以吾觀測，殊无把握。依吾之見，汝等不若暫且回营，待吾往說瑞、张，使不追究，何如？”何竹山抗議曰：“吾人革命，原不計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飴也。統領意見，絕對不可行。”黎窃叹不已，遂下令各标、营、队暫回营舍，架枪休息，然听者少数。

适湯化龙派人来楚望台云：“湯議長請革命軍代表、黎統領及各官于正午十二时到諮議局开会，組織政府。”当由方維同志往第三十标备来駿馬一头，供黎乘坐。黎即乘之起行，吳总指揮派兵百余名扈送，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馬驥云諸同志随行。队前有旗帜两面，黎欲去之不可得，意殊不悅。道經第十五协西营門，第二十九标第一营管帶何錫蕃延黎入會議厅。献茗后，黎問曰：“汝标回营乎？”何答：“已架枪休息。”复曰：“吾标可用，专待吾公后命。”言毕，以目送意，黎亦領悟。熊躡邓踵曰：“此地不可久停，恐

生异变。”邓大声曰：“吾等开会重要，此間非談話所。”即挾黎起行。行次熊語邓、李曰：“軍械所乃吾人命脉所在，非可等閑視之。兄等偕黎往，弟当返軍械所，分工合作，庶无遺漏。”邓、李极以为是，黎、邓等乃至諮議局。革命軍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計及有后患也。

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

王纘承遗稿 沈疇春整理

(一) 阳夏新军与革命运动

先是张之洞督两湖时，履行新政，兴学堂，练新兵，两湖风气为之大开，有志青年汇集鄂垣，或以此为进身之阶，或以此为革命之所。张氏之创设特别学堂，分仁、义、礼、智、信五斋，考选新军中优秀士兵与正副目充学兵，三年毕业，复回原营，选充下级干部。新军各标营中潜伏之革命党人实以此，十月十日武昌举义于各标营者亦以此，阳夏光复亦以此。

阳夏原驻防之新军为四十二标之一、二营。清廷改革军制时，于湖北训练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二标是二十一混成协之直属步兵。

清光绪三十二年，四十二标始告组成，其组成之程序，是将原工防营两营合为一营，复将汉防营之一部与护军铁路两营，改编为二、三两营。第一营驻汉阳，防护龟山下兵工厂、黑山下钢铁厂，营部则驻两厂间之龙灯堤，并于两厂间设轻便铁轨，以资运输，兼便指挥。第二营营部驻汉口居仁门，其部队则分驻于大智门车站及华景街，维护京汉铁路交通终点与汉口商场之治安，而标本部在焉。第三营营部驻信阳，队伍分驻于车站各要地，北自芒山，南迄

刘家庙，以保护京汉铁路南段之交通。原属工防护军各营之年老病弱之士兵任其退役；各营于每年招募新兵一队，以身体健康、学行均佳为录取标准，作为补充。此清湖北新军四十二标组成之经过及分驻地点之概略也。

当武昌日知会被清政府破坏后，革命党人及爱国志士遭囚杀者不知凡几。但革命党人益愤恨清廷，对革命事业图之弥力。太湖秋操熊成基谋于安庆举事，湖北新军中应秋操之革命党人曾密图响应。旋熊成基失败，秋操亦罢，事遂寝。但革命思潮益澎湃于吾鄂新军中矣。

原四十二标内早有胡玉珍、张步云、邱文彬、张大鹏、郑兆兰、戈承元、陈建章诸人暗组益智社，外以砥礪学行作号召，实则潜谋革命也。复鉴于以前失败，对革命事业之进行益加机密。适本营派往特别学堂学习之学生黄振中归营，以武昌有军队同盟会相告，于是吾阳夏之革命党人方得与武昌新军之革命党人王守愚、杨王鹏、曹振武、江国光往还，并组振武学社，以光复汉疆为职志。旋因杨王鹏劝四十一标队官潘康时商组社事，闻于黎元洪，黎以潘废弛军纪去职。曹振武所匿藏之革命宣传品被检获，幸曹振武系本标管带曹进之弟，未构成大狱，然受乃兄严厉申斥，已不安于营矣。未几，曹进奉调江苏新军标统，革命党人遂密商以鍾琦、曹振武随往，而播革命种子于江苏新军中。本营之李培基同志亦往东北军队中从事联络，以备日后吾鄂起义时之呼应。同时，为充实革命之力量，与混淆清吏之耳目，遂改振武社为文学社，外以研究文学、进修德业为名，内则广事结纳同志而谋革命之实践，此实为辛亥武昌举义之准备工作也。

(二) 文学社之組織及阳夏第四支队之成立

四十二标自益智社合为羣治学社、振武学社，复为文学社，其重要負責人之姓名及职务列表于下：

标代表：胡玉珍 副标代表：邱文彬
书记：王纘承 会计：楊洪涛
一营营代表：陈建章
 前队代表：戈承元 左队代表：邱文彬(兼)
 右队代表：胡玉珍(兼) 后队代表：袁金声
二营营代表：赵承武 副营代表：石占奎
 书记：朱澄寰
 前队代表：楊震华 左队代表：石占奎(兼)
 右队代表：黄裔僧 后队代表：鄢树藩
三营营代表：刘化歌 副营代表：罗羣英
 书记：周道长
 前队代表：鍾建衡 左队代表：胡卓超
 右队代表：徐 銳 后队代表：彭數俊

此外，又为便于内外連絡，設交通与会議处于营外社員家中，如第一营設于汉阳陈得元同志家，标与第二营交通处設于汉口之礄口郑兆兰家，标与文学社交通处設于汉口范明山同志家。二、三两营之交通会議处，由各营自行择定之。

清光緒三十四年张之洞調京入關，湖北特別学堂停办。迨宣統时，鉄忠任湖北督練公所总办，創辦武堂于武昌，考选各标营队正副目受訓，六月卒业。辦武堂无學員宿舍，四十二标受訓學員則寄宿于四十一标营房。凡受訓之正副目，概不負营内事务責任，故

正副目中之革命党人，得以日事联络，不受羈束。此时革命势力日渐强大，工作亦日益繁重，文学社乃于辛亥正月集議于黄鹤楼，社长蒋翊武提議增設副社长一人以襄理社务，适王宪章受劄于聃武堂，遂公推王宪章为副社长。

胡玉珍同志以阳夏一江梗阻，各营复距离遥远，营規甚严，联络时感困难，非扩大四十二标之組織不足以控制全标革命力量，提議于阳夏成立支部組織，以利革命工作之进行。并謂：“夏口尚有汉防营、警察队，非亟事联络不可，若仅以四十二标一个单位，則狹隘难通。”当經决議，先由刘尧激參議調查实际情况后再行复議。后經刘參議調查研究，认为胡标代表之提議，极具見地，于是文学社阳夏第四支部遂告产生焉。

文学社阳夏第四支部成立后，仍以胡玉珍为支部长兼标代表，邱文彬副之，支部組織与总社大致相同，惟人数較少，除書記、會計外，增設參議、交通、懲罰三組。遂以张步瀛、张大鵬、郑兆兰、梁炎昌、黄家麟、朱承堃（后改名澄宇，号旭东）、邱坤鏞等为參議；黄振中、祝制六、陈得元等为交通；宋自新为懲罰。其中負參議責任之同志有考核初入社同志之言行并在无形中負訓練之責任。又因支部长不能时时請假外出，恐引起上級官长注意，全仗各參議輪流請假外出，接洽社务，且行勁极端保密，即营連各同志亦不知其为社中同志，恐失敗时受到牽連也。

辛亥广州起义失敗后，革命重心移諸湖北。同时，四川铁路风潮汹涌澎湃，革命工作日益紧张。每遇野操休息时即聚集會議，練習測繪时亦聚集會議，曠野墟墓之間全成为进行革命會議之会场，标营机构几成为革命党人之附屬組織。革命起义时机，已趋成熟。

一日，營管帶汪炳山約胡玉珍至公館，突語曰：“外面革命志士甚多，聞我們營中亦有加入者，你我同事數年，不知有无办法介紹參加？”胡佯為不知，因汪突發此問，未知是何用心也。回棚後，召集同志密商，經仔細商討，僉謂仍宜嚴加保密。果然，不兩三日，胡被調營部，充貼寫之楊洪濤、賀捷三兩同志則被飭下連。事後追思，汪前日之間，殆欲試探胡之口風，險矣哉。胡從此益加謹慎，并以此事勗勉同人。

七月二十六日，信陽三營代表周道長、羅羣英來漢陽第四支部開會，決定一接到胡玉珍蓋有暗章信件即發動舉義，并負責占領武勝關，以阻截清廷援軍南下。

(三) 八月十八的起義布置与文学总社的被破坏

自蔣翊武社長所屬之四十一標被調往岳陽以後，文學社在各標營革命活動發展非常神速，同志們以發動起義日趨迫切，于是僉議促蔣返鄂。蔣于八月十八日晨抵武昌。先是黃克強由香港來電謂：“鄂省勿徒輕舉，候九月初旬，計劃中之十一省布置妥善後，互相呼應，一舉而光復漢疆。”劉堯激即以告蔣，征其意見，并以居正、楊玉如兩同志至上海購槍未妥相告。蔣沉思良久，卒以黃電為是。遂急召各標營代表會商于小朝街機關部，作起義時日最後之決定。俄各代表至，僉謂：“現在外面謠言很大，若不及早起事，必將發生意外，那時後悔莫及了，況且軍中同志已占十之八九，若一旦舉事，何慮武漢三鎮不唾手而得，何必以他人為轉移？”蔣乃反復陳詞，痛論全面與局部舉義之利弊，各代表始折服其言而散會。蔣并囑各代表飭同志以備萬一，此九月十八日午前事也。

是日孫武同志于漢口寶善里共進會機關部裝炸彈不慎爆炸，

汉口机关破坏，俄領事电告江汉道齐耀珊。齐遣偵騎四出，大索党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武昌尙未之聞也。迨下午邢伯謙至，始知其事。蔣翊武聞狀不胜嗟嘆，涕泗縱橫。刘尧激則慷慨曰：“事已至此，哭也无益，怕也无益，一不做，二不休，到不如今夜起义吧！”适邓玉麟由汉口来，亦贊助之，并謂蔣乃前所奉总司令，仍促蔣頒发命令（命令全文从略）。

此項命令发出时已黄昏矣，許多处均未送到，而文学社总部被破坏，彭楚藩、刘尧激、楊洪胜三烈士因而殉难，蔣翊武被逮。文学社既被破坏，清吏偵索党人益严，阳夏仅一江之隔，消息无聞。迨十九日晨，营管帶汪炳山忽传令曰：“凡屬各队充采办員之正副目，須于十二时前归营，否則以逃兵論。無論官兵一律停止会客，卫戍司令官須常在卫舍守卫，士兵严守崗位。”胡玉珍聞后，度武昌必有异，然禁卫森严，消息隔闕，焦灼万状，徒呼奈何而已。适是日采办归到胡玉珍充当，胡即偕伙伙至桥口，以购菜錢給之，囑自购先归，已則往范明山同志处探問究竟。至則副社长王宪章在焉，王当語以总社被破坏詳情，及彭、刘、楊三烈士就义經過，并云仍有同志尙在审讯中。王素薙发短装，不服清制，至此乃請胡制长衣，具假辮，以备出亡时掩清吏耳目。胡恐风声洩露偵事，乃亲自购备予王，王复囑之曰：“請君令各同志准备一切，予渡江之先，曾送炸药与蔡济民、王文錦，囑其相机行事。滿奴对剪发之人特別注意，予出营已两日未归，恐遭繩責。万一武昌有事，汉阳兵工、鋼药两厂与革命軍命脉攸关，万不可使落滿奴之手，斯實在君，望相机应之。”胡归营已午后七时许。

先是营值日官宋錫全数詢胡玉珍归营否？营內同志見营規甚严，胡整日未归，且营下士学习亦停課，因之龟、黑两队同志亦断联

絡，普滋疑慮。七時，胡玉珍歸營，心境始為一慰。續承適過其棚，叩以遲歸之故，胡漫應曰：“家鄉來人，首家慈命買物帶歸，所以耽擱。”願其神智沮喪，非若平常，乃辭出。八時半二道名畢，宋隊官命左右兩隊正副目集合訓話，首問胡玉珍遲歸之故，擬照軍令辦理。胡述：“家鄉來人，奉母命購物，因近日不能請假，鄉人又不克久滯，在漢口就便購買帶歸，請鑒情原宥！”兩隊正副目亦多方邀息，始從寬罰禁閉一月。

十二時許，胡玉珍偵值日官已就寢，趨續承棚，邀往操場一談，始轉述王先章所告武昌總社被破壞經過，并云：“武昌同志若不即日舉事，起義命令定有珍名。如清吏到漢陽提人，必以予為首，予決不承認其他。不過珍十五歲离家，投身巡防營，后以新軍營較好，又投入新軍營，在外十餘年，未報養育之恩，耿耿于懷。茲將平日積蓄之七十元及衣料一套、女鞋一雙，本擬在舉事前寄回家中，刻并交君代辦，并以老母託。”續承諾之，并曰：“倘你我二人同時被捕，再請黃家麟照辦，請勿以此自傷！”且解慰之曰：“名冊雖然被抄，多數是假名，武昌被捕同志，必不一一相告。至起義時計劃姓名，均系軍隊中人，清吏不能不躊躇而審慎處理。”胡曰：“不能已于懷者，父殘未視殮，母老不能養，革命事業又遭破壞，將來再造此基礎，殊非易事，他非所慮也。”復曰：“我乃禁閉之身，武昌消息，本支部事務，望相機處理之。”余于是收其錢物而假寐焉。縈思終宵，莫之所策，明日對右、后兩隊同志秘此乎？宣此乎？或者武昌同志從死里求生以達成革命之目的乎？斯時予之思潮若波濤之起伏，遑遑莫能定也。

(四) 四十二标举义经过

一 营占领兵工、綢药两厂经过

二十日甫且，营管带汪炳山电令罢操，并云：“凡充正副目之采办事务，概责成各队司务长办理。”其情事益紧张矣。然纘承于胡玉珍所述王宪章語，益密而不敢宣，盖恐同志聆后更张皇失措也。惟有暂时鎮定而待消息之至，以应变焉。适黄家麟接大营卫舍班，于是商定以本支部同志任营門卫兵，以冀或有消息至也，庸知时过向午而仍寂然。

午后一时，袁金声以奉令送公文至标署相告，纘承即囑其急足至标署，候公文投递盖印后，速驅車龙王庙渡江至武昌偵探消息，并限四时半归营。袁果如时返，并告予曰：“汉阳門紧閉，城樓上守哨士兵，左膀纏白布，軍帽上无帽花，城牆上有署都督黎元洪告示一方，文字内容未暇詳視。”由此始知武昌已为我革命軍占领矣。盖所述标记，皆前会议时所預定者也。至黎元洪为都督，則不审其故，于是以袁語告胡玉珍，請迅赴汉口通知二营代表赵承武等，言汉阳八时半举义，請二营于九时响应之；并送信至三营代表刘化敬，囑占领武胜关，防阻清兵南下；同时又恐瑞澂、张彪率河南新到之部队来占汉阳，有稍纵即逝之虞，請王宪章来汉阳襄助起义。并由纘承告卫舍长黄家麟，启后水营門出之。胡临行又囑纘承曰：“二、三营暨汉防营，由予至汉口布置，汉阳各队計劃，由兄处理之；前、左两队須用命令，責令戈、邱两代表照計劃实行，右、后两队亦由兄囑其各自努力。”語毕，乃服便衣而去。当时纘承促胡赴汉口，竟忘其为受处分之人，胡聞言而起，亦自忘其为禁閉之身，黄家麟

启后門出胡，亦忘有管帶之命令与卫舍长之职责，盖亦鉴于历次革命之失敗，又憤所激，不計其他也。

先是袁金声往武昌后，忽第八輜重营管帶蕭安国率兵約三百人至汉阳，拟据兵工厂，并声称奉瑞制台、张統制命令前来保护兵工厂。时守卫者左队也，視蕭部士兵中有徒手无枪者，有无軍帽者，武装零乱，神色仓皇，力却之。蕭遂改駐水师营教場。繼而汪炳山令各队遣士兵送帳篷至其处，邱文彬囑此命令来营部取帳篷，冀与同人一商究竟，适胡玉珍在禁閉不便詳議，邱曰：“特負此差事来，冀能得些消息，詎仍摸不着头脑。”續承告之曰：“外間无消息来，真要把人悶死，此时到水师营或可偵悉一二，我业已通知两队派差者，不要輪派，选各队机敏同志，由君指揮，倘得武昌消息，总要設法通知，以为内应。”本棚遂派王子卿同志随邱細探究竟，接收者为何队号，若有熟人，須詢来处，并囑以邱文彬同志命令行之。王归，始悉武昌有变焉。然本社同人竟无只字与片語相告，过急恐其僨事，株守又恐失机，焦虑俱集，莫衷一是。至袁金声归，始实之，遂决定如前述，并頒发前、左两队命令如下：

甲、頃袁金声同志至武昌回营报告：“汉阳門城門紧閉，守城士兵左膀纏白布，軍帽上无帽花，城牆貼有布告一紙，署都督黎元洪五字。”是武昌同志已占領武昌，本支部“四十二标”有即時占領阳夏与武胜关任务。

乙、本标一营前、左两队今晚九时即將兵工、鋼筋两厂占領，先取各队部子弹分发各同志，以为进厂之需。

(1) 所有守厂之警察枪枝，一律收繳，如有抵抗，即枪杀之。

(2) 所有厂附近渡河点，須派哨監守，非有各队命令，不准

船只往来。

(3) 两厂工人与职员，一律禁止外出，但不得加害。

(4) 各队中之旗籍军人枪枝均行拆下，如有反抗，即断然以军力处之。

(5) 左队占领兵工厂后，即运大炮三尊至龟山，向刘家庙方向设防。

(6) 驻营部之右、后两队于八时半举义，即率队至兵工厂，协助左队驱逐驻水师营教场第八营重营。

(7) 前、左两队，注意龙灯堤之枪声三响，即是营部起义。

(8) 起义时，各同志左膀均缠白布，所有军帽帽花，均行拆下，以为识别。龟、黑两山队旗，换以白布，由各队自备。

丙、胡支部长玉珍已赴汉口居仁门，令二营代表赵承武、汉防营范明山等于九时占领汉口，另派人送信至信阳，令三营代表刘化欧，见信即将信阳队伍占领武胜关，特附告。

右通知

前队代表戈承元同志

兼左队代表邱文彬同志

王纘承发于龙灯堤营部

二十日下午五时半

命令拟就后，即交卫舍长黄家麟请守卫同志分送前、左两队戈、邱两同志。连日阴雾霾尘不适之情绪，至此少为之舒矣。右、后两队同志则冀胡支部长玉珍返营取其仅有之三粒子弹，以资发难，故吾辈尔时之心情率以时钟迟迟而郁闷也。或憧憬举义后之情形，或议论起义时之策略，如祝制六同志曾云：“我们取得营部子弹后，

即將營房燒燬，以表堅決。”而續承則曰：“兵、鋼兩廠已在掌握，徒驚百姓無益。”黃振中、祝制六亦然其言。此時即非吾輩社中袍澤，亦願隨吾輩共進退而受指揮，由此可以概見人心之向往矣。

七時許，王憲章來漢陽，至營門，適黃家麟在焉。續承即邀至樓上黃振中棚，待胡玉珍歸營，共商舉義，竟被排長王大洪瞥見。當王憲章甫言彭、劉、楊死難事，王大洪即潛至九排門首窺伺，續承恐事敗，乃出與之周旋。大洪曰：“此何人？”續承曰：“此予之同學，甫自日本歸國，約往見面，因不能出營，渠又定明日返家，故特來相會。”大洪曰：“管帶命令知之否？”答曰：“管帶之命令當遵，兵士之人情不能不顧。”憲章睹狀恐至決裂，曰：“我去！我們在舉義之先，仍須遵守軍令，以應萬一，我出營待之。”於是送之出，并曰：“胡玉珍未見兄，又加疑慮矣！”后王大洪以此語宋錫全，宋乃徑至營門端坐，借與黃家麟語，以伺動靜。續承則密語黃家麟備白布，待舉義時即向宋之左膀一擡，蓋宋原系日知會黨人，革命事乃其素願也。

八時許，胡玉珍將二、三營及漢防營布置就緒歸營。問續承曰：“前、左兩隊命令下否？”曰：“久已下矣，惟右、后兩隊待君取子彈舉事。”胡聞言即于夾箱底檢出子彈三粒，鳴槍站隊，兩隊士兵擁至操場。胡復令取營部子彈分發之。并宣言曰：“武昌已為我革命軍占領，我們今天光復陽夏為祖宗報仇，為民族爭光，自今而后，我們始為大漢河山之主人翁。”（胡于民元曾將起義宣言錄于筆記中印發。）后隊代表袁金聲得子彈后，即將該隊排長翟煥明槍殺之。先是午間袁金聲對翟曰：“我們要搞革命。”翟曰：“昔日某某邀我革命我未許可，今天我同你們革命么？”袁忌其語意輕蔑，故槍殺之。

宋錫全于營門口見狀，意欲制止起義。黃家麟突然將白布擡

其左勝，且曰：“不要糊塗。”宋始兀立不語。胡玉珍宣布畢，即着曾漢臣、劉星垣兩同志率同志三十人往礮口向居仁門二營放排槍，促其在營舉事，此胡與二營代表所約定也。續承大聲曰：“請宋隊官指揮！”宋乃與胡支部長商，留一排于龍燈堤，由續承指揮之，以協助黑山鋼藥廠之前隊，其餘則隨胡、宋至兵工廠。

宋在途次，意尙躊躇，商于胡曰：“武昌已為我革命軍占領，漢陽明日全營伙食如何維持。且漢口于前日已由瑞激調來河南部隊駐紮劉家廟，我二營在漢口如何舉動尙不得而知，我不得不以為君告。”胡曰：“伙食事藩庫銀子任我們支取，河南調來隊伍聞系巡防營一團，我們一營可以解決之。至我駐漢口之二營，予適與該營代表趙承武分手，約定由我派兵至礮口放排槍，彼即舉事。此外湘、贛黨人已聯絡成熟，我們起義後，彼即響應而聯軍北伐。三營亦已有信去，即時占領武勝關。”宋曰：“請君先率隊至兵工廠，我往劉家廟一探究竟何如？”胡頷之，宋即分途而去。

此時，前隊代表戈承元、左隊代表邱文彬均先後派兵報告占領鋼藥、兵工兩廠情形。并復派李金山同志促遣部隊夾擊水師營教場之第八輜重營殘部（邱等上山，輜重營曾派人來問過他），胡得報後，即率隊至兵工廠，見邱正指揮運炮至龜山布防，即共商定驅逐輜重八營計劃。胡囑邱曰：“此間事由君指揮，我星夜渡江報告武昌同志與黎元洪，借觀武昌情形，并囑通知二營代表趙承武及漢防營代表范明山，于明晨八時來兵工廠會議，共商今後進行事宜。”邱乃按胡語布置之，俄頃宋錫全亦由漢口返。

胡玉珍謁黎元洪于武昌，陳述陽夏光復經過，黎囑其善維秩序，并手書交胡轉原總統張永漢、一、二營管帶汪炳山、陳鍾麟等，仍維原狀，詎知彼輩早已逸去矣。同時胡再訪武昌同志，亦多為

軍务忙,且有不在諮議局者,复忆阳夏伙食待筹,遂持黎信至硚口大生典当鋪假錢千串,以为二十一日伙食之需。

其时关乎阳夏全局安危者,莫若萧安国之来汉阳也。先是瑞激、张彪于武昌出走后,即匿兵艦中布置軍事,飭守卫督署之輜重八营萧安国殘部,先至汉阳占領兵、鋼两厂,以断吾軍弹药之接济,并凭借龟山之險以威胁武昌,詎知为守卫兵工厂之左队以无层峯命令而拒絕,只由汪管带允給帳篷为彼营于水师营教場,并給二百元为伙食之需。故二十一日侵晨即有兵艦一艘至黃鶴樓轉舵向龟山直駛,为我軍发现,邱副支部长即令我炮手王子卿、左福齐、雷声燮三炮齐发,命中船尾逸去。此为武汉人士有目共睹者也。故終阳夏之光复兵不血刃者,当推之于文学社第四支部四十二标一、二两营之党人。而阳夏之有四支部者,胡玉珍、刘尧激二氏之力也,苟是日阳夏直承命于武昌,又无袁金声送公文之便,至瑞、张兵占汉阳,則勝負之數未可卜也。

营中有旗籍兵七名,管天修者系纘承同棚弟兄,当举义时禁之监所,午間过此,管等訴之曰:“何以拆我等枪支,我們又未犯軍令,反置之监所。”纘承告之曰:“我們今日为种族爭生存,为国家爭独立,故不得不先革尔滿人之命,念尔等尙属好人,尔等回荆州可也。”于是各予之七元遣回原籍,后聞彼等在途中为百姓所創。

胡派戈承元同志至汉阳府監,出李亚东于獄,派张步瀛至汉口監,释放詹大悲,而詹已先出獄矣。胡即覓詹轉黎致张永汉等之信,而张等已早北逃矣。胡更謂詹曰:“汉口必先受兵,軍財事务,非統一机构,不能就近应付裕如,請君預筹之。”胡又派朱璧珍装行脚僧往襄樊告馬队同志章裕昆等占領襄樊,防刘韞玉之巡防营东下,章等遂逐喜原而光复襄樊。惟胡支部长遺送駐信阳三营之信

尙在途中，而清廷已派大軍沿鐵路南下矣，道路梗塞，送信三營者不能完成任务，致三營同志未展所圖。然各同志拆橋，毀路，炸敵糧彈庫，殉職者不知凡几，是堪痛惜者也。先是劉堯激同志論上策取北京，中策阻敵武勝關外，后均未遂，而彭、劉、楊三烈士復殉難，漢口又罹馮國璋焚燒之慘禍，此皆辛亥武昌首義莫大之遺恨也。

二營占領漢口經過

四十二標二營駐漢口居仁門，標本部亦設于此，因便于指揮漢陽一營、信陽三營也。漢口自十八日寶善里炸彈爆炸案發生，已有密探報知情形，十九日起，營禁出入更嚴，外間動靜一概不知，凡本社同志均互相耳語，莫可如何，只有耐心等待外來消息。至二十日晚六時本社四支部長胡玉珍潛來漢口，告以袁金聲同志所探獲之情形，約二營于是晚九時舉義光復漢口，因一營已下令八時半在龍燈堤舉義，前、左二隊于九時將兵工、鋼藥兩廠占領完竣也。趙承武營代表曰：“本營有標署在內，前隊出紫陽里，右隊一部駐循禮門，恐一時難以布置周密，請一營在龍燈堤舉義后，即派人槍一排，在礮口外放一排槍，使營內各連便于舉事。”胡即允趙營代表之商而別去。趙即通知在營部內之各隊同志準備一切，一面通知駐紫陽里之前隊代表楊震華、駐華景街慶安里之右隊代表梁耀斌，均于九時在各駐紮地舉義，將清軍制之帽花、肩章拆下，左膀各纏白布，以昭讖別，但所有分防任務，概不變動。

九時，礮口外之排槍聲果然准時打響，趙營代表即吹哨令駐營各隊齊集操場，宣布起義，將標署與營部之軍裝庫子彈取出，分發各隊，每人配以子彈百粒，并派胡光瑞率一排人至四官殿之湖北官

錢局駐守保護。鄒樹藩、余鴻鈞兩同志各帶槍兵十名巡視街道。又派汪慶祥同志率兵八名到漢陽龍燈堤第一營取得聯絡，並報四支部長胡玉珍漢口光復之經過和措施。斯時，胡玉珍已赴兵工廠，即向留守營部之王纘承報告一切，王亦告以漢陽兵工、鋼藥兩廠全部占領，並云：“漢口商場治安請趙營代表盡力維持。待漢陽兵工廠設防布置完竣，即將通知二營營代表及負責各同志來兵工廠會議，商籌善後大計。”

三營在漢陽之動態

三營之有革命組織，其源由於日知會所發動。先是劉化歐同志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在信陽高等小學校肄業時，經李亞東介紹加入日知會。化歐在校即暗組學生自治會以謀革命事業之推進，一時加入者有劉鎮、周雷伯、李繩武、朱孔陽、歐陽祖年、胡金門、胡子明、胡卓越、黃子和、李普三、何東藩、劉次芳、周宗彝、尹宗益、孫亞武、李濟武、易世棻、吳連祥、楊少堂、曾履垣、孫家訖、余鳳翥等二十二人。時化歐雖年僅十五而對革命工作之進行極烈，外面漸有風聲透漏。未幾，地方官紳以逆黨大本營責備學校，几興大獄，而李繩武終以言論過激被捕，瘐死開封獄中。化歐抱痛奔上海入中國公學，因之得交結各省志士，旋經王文賢（即亮章）、蔣伯夔（即翊武）介紹入同盟會。適徐錫麟、熊成基先後於安徽起義失敗，同志僉議側重武漢，並擬遣同志加入軍隊中以策動之。

宣統元年秋，由上海各學校學生至湖北投入第八鎮及混成協充新兵者頗多，而化歐獨注意從京漢鐵路沿綫入手。是時李亞東因日知會被破壞，受監禁在漢陽府獄中，化歐往謁，並道來意，爾時四十二標一營駐漢陽，同志時與李亞東相見，間助其獄中零用。並

东曰：“武、阳、夏各营同志甚多，独驻信阳三营尚未入手，北至郑州，南抵刘家庙，延长千里，横跨隴海，尤以黄河铁桥及豫、鄂毗连之武胜关为军事必争之地，关系极重，急应进行。”化欧乃信阳人，遂遣返信阳，谋入四十二标驻信阳京汉铁路之第三营充士兵。宣统二年春第三营在花园、广水、孝感三处招募新兵，遂邀约同志分途前往应募入队。计有刘化欧、何国祿（即何瑛）、周道长、江汉涛、孙亚武、易世葵、彭敦俊、郑洪升、樊绍华、李济武、朱文斌、宋济武、楊春三、朱绍武、吳連祥、徐銳、夏茂林、刘鹏程、陈锦堂、康少芳、胡卓超、钟建衡、严正奎、黄云亭、秦秉璋、罗羣英等二十六人。未半载，同志多升正副目，而刘化欧与郑洪升、彭敦俊更考入湖北陆军讲武堂，得与武汉各标营同志会晤，每利用星期例假与刘尧激、蒋翊武、王宪章、楊王鵬等研讨策进，旋祝制六改投四十二标一营，约三营同志一律加入文学社，当推刘化欧为营代表，周道长副之，钟建衡为前队代表，胡卓超为左队代表，徐銳为右队代表，罗羣英为后队代表，加紧工作。适信阳两湖小学之刘克仁、刘延荣、胡云路、危恩元、孙思锦、陈国助、吳邦英、陈廷龙、段良奇、陈西福等十人，保送到三营充学兵，经刘化欧、罗羣英介绍，先后加入文学社。罗羣英之魄力虽不及刘化欧，其号召力颇强，故又推罗羣英为三营副营代表，改周道长为书记，此第三营同志加入文学社之始末也。

刘化欧自讲武堂毕业返防后，不及两周，应营长樊毓英调至信阳车站营部担任下士教习，于是更利用机会，召集同志在城内鲍氏街住宅开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吸收官佐与文人，联络帮会暨铁路工人，并贮备炸弹、炸药等重要问题，诸同志分途并进，均有收获。不一日，营军需宋荣夫、书记长孙子谷、左队队官陈尧鉴、右队队官熊連三、排长殷兆涛、邱充之、胡人俊、宋辅平、司务长邱世成、张绍

芝、李炳志均加入焉。陸續介紹入會者，有陳得金、夏應求、李文龍、張德元、王銀漢、羅玉勝、胡建勛、汪東海、冷樹勛、張鴻鈞、沈廷宏等十九人。相繼推舉信陽易小康、劉克仁為學界代表，應山王春華為幫會代表，孝感余大猷為鐵路工人代表。聯絡羣眾，勸募捐款，以備購買手槍子彈，結果由同志捐洋一百一十元，王春華募得洋六十八元，易小康、余大猷共募得五十九元。經信陽車站外科醫院之日本人井上一雄，偕同劉化歐至漢口日租界栖鶴旅館購買日式六輪手槍三十枝，子彈二千發。并派秦秉璋、夏茂林、陳錦堂陸續運至廣水王春華處保存。更與栖鶴旅館經理宮崎富多訂立合同，以三百二十元訂購炸藥十二包、小型炸彈十二枚。十五日內，由宮崎富多負責送至信陽西鄉易家灣易小康家交貨付款。但社中并無余資，同志多嘆化歐不自量力，化歐返家，假其伯母之名賣地七石六斗，得價三百六十元，屆時將款如數付訖，此炸彈即存易小康處。化歐因納月捐，每月必至武漢一次，故六、七兩月同志會議于小朝街胭脂巷，化歐必得參與焉。

洎文學社第四支部召集會議時，化歐以布置防務事未及前往，乃派羅羣英、周道長兩同志參加，結果責成三營守武勝關。化歐乃于八月十三日就鮑氏街本宅召集緊急會議，決議將貯存之手槍、炸藥等物，分發各代表，并着易小康募集農民千人，王春華集合幫會弟兄千人，余大猷通知各車站工友听候調度，劉克仁、陳錦堂、夏茂林、秦秉璋任全段鐵路聯絡諜報及破壞等工作。分配既定，端听四支部之信息到來。而彼時來自武漢之商人，有謂革命黨人連日被捕獲者絡繹不絕，有謂黨人制造炸彈失慎，抄出黨人名冊、旗號等物者，謠言繁興，人心動搖，各同志來詢消息者日必數起。化歐以未得實信，只好含混其詞曰：“此謠言，虽有此傳說，未便遽信也。”

八月二十三日河南陸軍二十九混成協應龍翔率所部進駐信陽，消息更是不通。化歐判定武漢必已發難，否則，豫軍何以均集中至此？四支部之信件豈中途遇險歟？於是決定通知各代表積極準備，集合農民四百人，攜帶抬槍、戈矛到武勝關與幫會弟兄五百餘人會合。並傳令各代表定二十五日夜半舉義，左膀纏白布為識，化歐率之，向豫軍進攻，與應龍翔之步兵一營遭遇於李家寨。戰至拂曉，豫軍敗退，我軍以武器過少，士兵未經訓練，未敢直追。

越一日，關四十二標標統張永漢北逃矣，又越一日，廩昌率大軍到達信陽矣。多數同志集議，以為形勢日趨惡劣，與其以卵投石，不如嚴密組織，相機襲擊，借收擾亂敵後之效，以待武漢大軍之到來。遂將農民遣散，僅留幫會弟兄及鐵路工人六百餘人潛伏於黃土關、平靖關內外相機而動。

九月初二日，化歐至駐馬店、漯河等處探察敵軍糧秣、彈藥儲藏地點，同時王春華派隊長游長樂、郭浩兒、分隊長郝安邦、汪大咀，率領士兵兄弟與工友二百四十人埋伏於武勝關左右側。翌日清晨，與段芝貴某標騎兵混合隊遇於周家凹，激戰三小時，卒以眾寡懸殊，被其擊潰，我部死傷二十餘人，郭浩兒、汪大咀、文老五、陳老公均陣亡（因王春華已故，此四人本名，至今無法查考）。

化歐聞部隊失利，更審北軍源源而來，敵我兵力懸殊，正面阻擊，無有是處。當令王春華將黃土、平靖兩關弟兄妥為遣散，並通令各代表嗣後專從事於破壞交通焚炸糧彈工作。即同樊紹華、李濟武間道來武漢一觀究竟，如有可乘之機，再行反攻，布置既定，始離信陽三營地而赴武漢，到時適漢口失守，徑往洪山總司令部。

十一日，鍾建衡謀炸漯河大橋不成，就義於偃城車站。

十七日，余大猷在東篁店北首扳反棧，將敵軍車翻倒三輛，余

大獸死于敌人皮鞭之下。

同日，李炳志炸明港东方轉运公司之糧食倉庫；刘克仁焚花园源成轉运公司之彈藥庫；彭毅俊破坏郝家灣鐵路，使敌兵車出軌，敌人死伤不少；何奇（即国祿）燃炸萧家港之子弹車，均予敌以莫大打击，皆刘营代表化敏所預定之計劃也。

吳連祥、吳邦英均战死于汉口之役，尸体丛葬于六大堆中，成为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过程中之一段痛史。緣于武昌文学社总部被破坏，四支部得信过迟，至二十日晚間之专信因鐵路北段已为敌军所占，无法送达，至不能达到刘化敏代表預期之目的，而遺馮国璋焚烧汉口之慘劇也。

（五）汉阳軍事布置与武昌都督府

二十一日晨，一营諸同志在会前私議曰：“此后軍事責任甚重，須早为計議。”僉以胡玉珍劳苦功高，阳夏軍事負責人以胡为适宜，或謂以王宪章任之。胡玉珍曰：“革命非为个人权位也，此后战争責任誠重，本支部同志与武昌方面接洽等事除玉珍及邱副支部长、祝制六同志外，少有联系，珍愿为战事联络參謀，或以王宪章亦可，最好武昌拥黎，我輩即拥宋何如？”續承曰：“待會議时大家决定可也。”八时，一、二两营同志集議于兵工厂，一致举宋錫全为統制，协、标統以下各官职及关于軍事各項措施均經討論決議，记录在卷。十二时始由胡玉珍支部长續列呈报于都督黎元洪、其文曰：

（一）本日上午二时，玉珍业将阳夏光复經過面陈在案。当奉鈞座手示囑四十二标标統张永汉、管帶汪炳山、陈鍾麟維持阳夏秩序，玉珍遍寻张、汪、陈三君，不获踪迹。

（二）七时许有兵艦一艘向上直駛，行至黃鶴樓前轉舵，向龟山

冲来，我守炮士兵王子卿、左福齐、雷声燮三同志，由副支部长邱文彬指挥，对该船齐射，弹中船尾，始转舵向下游逸去。

(三)八时，两营同志会议，均称瑞激、张彪尚在舰中布置军事，待清兵南下，与我争夺武汉，今日舰上满载兵士，不料第八营重营昨夜为我一营驱逐也。且汉阳兵、钢两厂为军事命脉，汉口又为华洋通商要地，亦军资策源之所，非扩军不足以资保护而策进取，决议阳夏扩为一镇，公举玉珍与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负其责。珍即申明革命非为权位者，乃荐宋锡全队官任之，并言宋为日知会同志，其学行素为同志所推重，此次举义，亦多襄助，此职界之宋君，必能裨益战守。副社长王宪章首赞成之。乃以宋锡全为统制，王宪章为第一协协统（战事关系，各协组四标，因马、炮、工、辎筹备不及也），二营代表赵承武同志等推举该营排长林翼支为第二协协统，并举邱副支部长为参谋长，梁炎昌为副参谋长，王纘承、张步瀛、祝制六、黄家麟、宋自新诸同志为参谋，胡玉珍任参谋及交通，郑兆兰任军械兼摄兵工、钢药两厂厂长，兵工厂须即日开工。杨洪涛为军需，黄振中为第一标标统，王殿一、万逢霖、王柱国为第一协二、三、四标标统，此三人皆为一营队官、排长也。陈建章、戈承元、张大鹏、普于斌诸同志为营长，朱承堃、邱坤鏞、张仲斌、袁金声、陈得元、黄家麟诸同志为营副队官等职。出日知会党人李亚东于汉阳府监，即由宋暂派为汉阳府知府兼本部执法官。并酌留老同志百人不任官职，组织特别队以为临时差遣及战时敢死队之用，由参谋处指挥之。

(四)第二协组织由赵承武、石占奎同志等会同林翼支在汉口

組成，迅速具報，并責妥為保護漢口商場及租界安全。

(五)各部須迅速派人就地招兵訓練，各機關務須即日成立，以專責成等情，謹呈

都督黎鑒核

文學社四支部長兼原四十二標代表胡玉珍于漢陽兵工廠公務廳同時令各機構即行成立，并請宋錫全以統制名義頒發防守命令，宋即擬就頒發如左：

命令二十一日下午二時發于司令部漢陽兵工廠公務廳

甲、第一協協統王憲章將原一營擴充一協，防守兵、鋼兩廠，兼保鸚鵡洲及漢陽各地安全，并速招練新兵以資進取。一協未組成前，先派防守任務于左：

1. 陳建章同志營：防守兵工廠，對於泉隆巷與集家咀渡河點，須派獨立弁哨防守，左與鋼藥廠戈營切取聯絡。
2. 戈承元同志營：防守鋼藥廠，所有黑山渡口、鋼藥廠碼頭、鳳栖寺、通十里鋪大道，須派隊常川駐守。
3. 張大鵬同志營：防守馬家湖通漢陽城、泉隆巷大道，但馬家湖岸常川駐一隊，西北與鳳栖寺戈營、北與兵工廠陳營均切取聯絡。
4. 普于斌同志營：防守河泊所及漢陽東門外河岸，擇要防守，并派隊駐鸚鵡洲，西與張營、北與兵工廠陳營，均切取聯絡。
5. 各營于哨地配備完竣後，繪圖呈報，以凭巡查。
6. 待第二協組成呈報後，再令各標分擔防務，各營均須招練新兵，不得以哨務而疏訓練。
7. 依會議決定，特別隊長派王敷武同志充任，由參謀處指揮

調遣。

乙、第二協協統林翼支同營代表趙承武諸同志，速往漢口將原二營及漢防營擴充一協，擇要布置防務，保護商場及租界外僑，並迅速招練新兵，至設防地點繪圖呈報備查。

此外兵工、鋼藥兩廠鄭兼廠長，迅速檢查彈藥、槍支、大炮、炮彈數目，列表呈報，以憑計籌，並即日夜開工，以裕軍需。

二十二日晨，據報漢口硤口發生搶劫，當派張步瀛參謀率本部特別隊鎮攝，捕得搶劫匪二名就地正法，並梟首示眾。漢口商民得以安堵。是時，張步瀛見有炮隊軍官二人，以為逃逸者，乃帶至司令部。王纘承出見，系同學沈毓藻（又名平均）、張聲貴，於是商諸宋，委沈為龜山炮兵司令，張為團長。後沈于荊州獨立之役陣亡，張以政治日益腐敗，于民國二十年剃度學佛，現已圓寂矣。

二十三日奉黎都督批曰：

據文學社四支部長胡玉珍呈報會議錄及陽夏軍事布置情形一件悉，茲核示如下：

- (一) 陽夏四十二標一、二營，兵不血刃，陽夏而獲光復。
- (二) 龜山炮隊擊退清兵覬欲占兵工廠之企圖，足征各同志努力興漢，深堪嘉尚。
- (三) 各同志所議各節均有見地，惟軍府初組，經濟困難，擴充一鎮，似嫌過大，着以宋錫全為第一混成協協統，王憲章同志暨林翼支均為標統，余照議施行。仰各同志共體艱鉅，此令。

附發宋、王、林委令各一紙，余俟宋呈報後加委。

胡玉珍遂以此令交宋轉飭參謀處存案，余諷鎮協本無輕重，惟軍府所計者經濟，吾輩所計者戰爭耳。

同日,三营有右队排长胡英初(本社同志)以铁路均为清军据守,乃间道来汉阳,由王纘承借见宋,即委为参谋。

二十四日,马队同志陈孝芬由襄阳率马队十余骑到汉阳,大家议举为江汉水师协统,以维水上交通。

是日,军械处长兼摄兵工、钢药厂厂长郑兆兰同志报告两厂处理概略,其文曰:

(一)奉钧令,兵工、钢药两厂厂长郑于即日开工以裕军需,并核查所有枪炮弹药数目,续列具报等因,兹据副官胡得胜、委员宋自新督率点验各库所存:步、马枪各七千五百枝,枪弹二百二十万八千发,五生七过山炮五十六尊,钢炮一百另八尊,其余钢、铝及各种材料甚多,五生七炮弹已成者三千余发,完全装成者三万发,惟碰火、底火有十万发尚存省库,且急需。派王纘承同周拓疆赴都督府领取存储南湖之火药库器材内之碰火、底火。因需用至急,管库人他出,多方设法始得取出,以供药厂之需要。

(二)钢药厂经张大鹏同志检查,存棉花一库、黄烟百余罐,无烟药及白药(即炸药)陆续运至兵工厂,烟、焦二煤,均三百吨。

(三)并派石仲文督率召集监工王金山、枪厂自余庆鳌、炮厂自沈二领漏夜开工,以符钧令。右三项谨核。

二十五日,奉都督令,四川同志熊克武回川,拨兵工厂枪枝五百枝,并装配弹药及发运费五百元。又枪枝五百枝,子弹二十万发(王原稿作:“枪三百枝,子弹配百发”,今从梁钟汉先生回忆录更正。——畴春志)交日知会党人梁钟汉同志光复汉川及刘英同志光复永隆河,以充军实。

是日，又奉令派員会同都督府所派点名官来阳夏各部队点名发餉，当由王纘承、黄家麟同往办理。

(六) 阳夏之役

八月二十六日，来犯者有张彪所部之輜重第八营殘部，瑞澂調来河南崇欽巡防营、陸軍混成协五十七标、五十八标之各一部，及由湖南調来之巡防营王鼎华、夏占魁两营斥堠队，均将其击退。

二十七日，复奉指揮何錫藩令，驅逐刘家庙之敌，派第二标标統林翼支为左翼指揮。林派第三营营长赵承武同志为前卫，由大智門循铁路前进，刘仲升、吳元胜两同志各率两队为左右側卫。赵营长奋不顾身，往夺五十八标标旗，与掌旗官李兴旺、排长刘国璋、雷世凱及士兵三十余人陣亡，萧志忠、王师、黄寅龙等均負伤。

午后四时，复派黄振中同志营渡河接战，战斗彻夜不息。

二十八日，林标統由姑嫂树側击，黄振中营当右翼正面。敌軍由火車运兵增援，被我炮队集中火力轰击，将敌車击翻。我黄营张文彬鳴号冲锋，民众助声喊杀，敌向灃口潰退，遂将刘家庙占领。敌遺弃粮秣、子弹、帳棚甚多，居民与铁路工人爭相搬运，老幼男妇送茶送飯者絡繹于途，商会亦购面包等至前綫餉軍。

我軍携胜利品回部，途人咸脫帽称賀，商民临时购买紅綢布贈送各帶兵官，商家自动燃放爆竹，可見人心之思汉也。商民見革命軍保商保民，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将借故搶劫商民之匪徒就地正法(灃口二名，华景街一名)，商民得安謐，軍民买卖一如平时，大为感激。战时百姓送茶水至前綫者，我官兵劝其小心謹慎，恐誤中敌弹，僉曰：“我等亦汉人也。”軍人曰：“但我等負責較尔等为重耳。”因之商会于二十三日由呂超伯等筹措阳夏軍餉五百万元，交胡光

瑞辦理糧台之用。可見當時軍民合作之心，即革命成功之左証也。領事團之承賦革命軍為交戰團體非無因也。

是役雖將劉家廟之敵驅逐至三道橋，我林標之三營長趙承武陣亡，是莫大之損失也。趙隨縣人（或謂為棗陽人），乃四十二標秘密時代二營營代表，漢口之光復趙為首功。此後漢口之陷，林標之潰散，皆與趙之云亡，部隊中無核心作用之維系有關係。趙之犧牲，是文學社四支部第一個損失也。

二十九日，我軍又將二道橋之敵擊退，進攻至三道橋。敵乘我軍進至半途，用機槍掃射，我軍死傷甚重。林標雖繞至姑嫂樹側擊，而三道橋之障礙終難突過，乃守造紙廠之棧，與敵相持。

九月初一日，我軍進至三道橋。

初三日，我軍攻至三道橋，敵仍持機槍掃射，我不能前進。敵并由戴家山用大炮轟擊，同時在軍艦炮擊我預備隊，我軍退至劉家廟北端。是役我黃振中營之隊官黃家麟與排長胡有道及士兵四、五十名陣亡，都不記其姓名。

初六日，敵分兩路進攻：一由造紙廠挺進；一由姑嫂樹側進，以戴家山炮擊為掩護，又用兵艦大炮向我本隊發射。我軍不支，退出跑馬場。

初七日，我軍奪回跑馬場，黃振中營、王殿一營均加入戰鬥，并派參謀王纘承、張步瀛率王敷武之敢死隊參加攻擊。敵火力猛烈，我軍憑鐵路棧與敵相持。是役，王殿一受重傷，各部死傷亦甚重。

初八日，敵占跑馬場，沿鐵路棧通行無阻，向前猛進，我軍退守大智門、循禮門一帶。

是日午間，黃興由滬來漢，見戰事失利，至都督府會議，宋派參謀長邱文彬與焉。決議舉黃興為戰時全軍總司令，武昌加派隊伍，

限下午十二时渡江完毕，抽調汉阳七成队伍渡河，于次晨二时至蕪口居仁門待命，參謀长邱文彬于十二日至龙王庙，随总司令部前进。并派熟悉街道之參副十名，为渡江部队袭击敌人之向导。

初九日，宋以林标死亡逃窜者众，派第一标标統王宪章率队渡河担任左翼作战，囑遵黃总司令指揮。但武昌渡江之部队，以渡江工具缺乏，未能准时到达，我左翼在战线上彻夜作战之队伍合王标新加之部队，与敌随进随退。复将敢死队百人由參謀张步瀛、王纘承率领前往。是时，不但不能进攻，且在火线上发生动摇，只得将敢死队加入火线以支持之，而循礼門車站亦告不守矣。黃兴过江与黎商战守事宜。午后二时，黎令宋錫全为汉口指揮，宋奉命，即电告黎加兵来汉，一面令參謀黃家麟渡河至前线勘查战况，火线上已无兵可移，汉阳兵、鋼两厂守兵又不能抽調。宋視此困难形势，叹曰：“指揮徒加，于战何益？”

由汉口渡河之外交部长胡瑛至厂，晤宋曰：“汉口无船只渡江，于上午已見有紅边軍帽之清兵，因我穿便衣，敌不甚注意也。”宋即請电告黎，請求派机枪一連来保守汉阳，宋并曰：“汉口不守，不但汉阳可危，而武昌亦可危。湘、贛援軍又不至，新募兵未經訓練，不知战斗之技术，当前急务，非从速訓練新兵不能为力。”胡曰：“聞岳州尚有守兵，如能抽岳州之老兵来武汉，以新兵在岳州訓練，支持现状以待应援，事尚可为，否則此次又不堪設想矣！”并云：“今晨有掛外旗之兵觀上駛，清廷詭計多端，未知有无清兵在內。若加生力軍至荆州，将来两下夹攻，武昌更属可危。”时黃家麟參謀返部，带回敢死队十余人，曰：“前方战况惨烈，循礼門失守，我軍死亡甚众。”

刘家庙方面，敌人架設大炮向我龟山炮兵陣地发射，兵工厂时

有敌弹落下，工人因之停工。

胡玉珍由汉口归，亦述战况不利，林标星散，且不悉林之踪迹。宋曰：“速派人往十里铺招收溃兵，暂交戈、张、陈三营补充实力，以为汉阳之守。兵工厂司令部非移至河泊所不可。司令部之粮弹武器，均当迁移。”胡照所商飭人进行，渡江至武昌。宋即请其面商黎都督，派机枪一连来汉阳，以助防守。

王纘承往厂内覓工人，架火车头于兵、钢两厂铁道上，以便夜间梭巡，表示我方之镇静。

七时，宋与王等均未晚餐，伙伙送饭至前线未归，贩食品者亦闭门。纘承与黄家麟往西门收买饼食不得，拟进西门城内收集，李亚东竟将城门紧闭，守城人坚不肯开，转至山头黄桂国团内造饭果腹。至兵工厂见宋，宋尚未晚餐，兵工厂监工王金山，江苏人，令其伙伙代宋煮饭。王金山原为兵工厂监工，郑兆兰兼厂长后，委王为总办以资熟手，此人同情革命，至危急时尙不避也。

宋令防守汉阳之戈、张、陈三营仍照前月二十一日防守命令遵行，不得疏忽，司令部即暂移河泊所办公。

初十日上午四时，宋带收容的士兵二、三百人，乘船驶往岳州，为岳州守军所阻，未能登陆，乃径至长沙。适湖南有杀焦拙谭之变，黎元洪电谭，以宋临阵脱逃之罪戮宋于长沙。宋锡全，湖南人，投军湖北，除操课外，读书写字以自遣，待人和藹而严毅，对于训练操学毫不宽假，为全营军官之冠。曾加入日知会革命团体，为党精心力学，治事不紊，尤多独特之见。忆辛亥六月载洵来鄂阅操，渡江乘小划，舵工为一未成年之孩提，舟至中流，宋曰：“我们全船人生命，付此小孩之手，岂不可危？”宋于操课之余，亦时发此种言论。阳夏未举义时，彼尙不知本标有文学社之组织，全标人推举为汉阳

軍事首長者，皆由于平日對他有信仰，亦我四支部之四十二標革命黨人只知推翻清朝，毫無權利之私介乎其間也。宋被殺乃革命黨人之損失，亦湖北文學社四支部之四十二標第二個最大損失也。

初十日晨，黎得宋赴岳州之報告，即派蔣肇鑒繼宋職。蔣至漢陽兵工、鋼藥廠見陳、戈兩營防守極嚴，當即召陳、戈、張三營長會商，充實部伍，將戈、張兩營歸并陳營，令戈、張另行招編，陳則充第一營營長。

漢口之我軍有未盡退者，各同志據街自守，造成一時混亂狀態。

敵人占據集稼咀時，借怡心茶樓上架設機槍，向我兵工廠掃射，守廠士兵受其威脅，陳建章營長令同志仇鳳山、陳華建、劉國材、江正清、黃子松等設法將茶樓燒毀。後黃興來漢陽任總指揮時得以成隔河對峙之局，與此有關。

胡玉珍招收之陽夏散兵，乃原四十二標一、二營同志，又組一營隨劉公北伐。先是曾派朱璧珍同志往襄陽聯絡馬隊同志，阻截劉蘊玉巡防營尚未返，意隨劉北伐，朱同志在襄陽必得健兒，故先隨季雨霖招討使至仙桃鎮。胡玉珍充營長，王纘承為營副。詎行至鍾祥，有張楚材、錢明漢阻命，胡聯絡錢明漢，張楚材見勢孤逸去，而錢亦為季招討正法。即至襄陽，適南北議和，乃商諸王纘承，由王先返武昌，如和議成，即不來襄，戰則率四十二標老同志北伐。迨王至武昌，陳建章已在武昌平湖三巷設招待所招納前本營同志。

當陳建章隨蔣肇鑒在漢陽防守兵、鋼兩廠，而黃興總司令亦到漢陽，另布置防務，派陳隨蔣守鍋底山、扁担山、美娘山等地。至十月二十六日，敵由金龍面粉廠渡河取琴斷口之戰，恰陳建章營守之，日人古前川隨陳營御敵陣亡，營副袁金聲、隊長劉子清、陳占奎負重傷，薛占勝、趙良佐、劉國材、呂家楨、黃春山、張欽福諸同志見

此情形，以极猛烈之火力支撑，始得将袁金声等抢救拍下火线。此役阵亡者有林福生、孙正仁及姓名不能记忆之军官甚多。

全营退至汉阳城内整顿时，仅剩三、四百人。我革命军能如此为国牺牲者，实由我革命党人平素有以养成也。陈建章同志以两月来连日战斗，精神颓疲不堪，遂将营长职务交陈得元代理，渡江至武昌平湖三巷休息，袁金声亦因伤重送医院诊治。未几，汉阳即告失守，时我龟山之炮兵团长张声贵（后改名复初，号养吾）为殿后渡江之一人，在万分紧迫之时，将所有炮弹各件全数搬出，退至武昌。后黎元洪复委陈建章为第十八师重营营长，陈辞不就，而与王纘承在平湖三巷设扩大四十二标招待所。

胡玉珍于和议告成后，将其营长职务交与马队同志章裕昆，只身返武昌，将所收容之老同志安置于警察学校（后改湖北军官学校）。此文学社第四支部之四十二标于阳夏光复战争中所经历之概略也。

（七）和议告成与文学社合并于同盟会

和议既成，南北复归一统，言政治者或倡责任内阁制，或倡各政党联合组阁者，以是组党之风若雨后春笋，而革命运动初期之秘密组织某社某会，以毋庸秘密，相继扩张组织，重树名义，以事标榜，而广结纳。文学社同志鉴于党会林立，乃会商于民心报社三日，检讨文学社从事革命运动之得失及其存废问题。僉主另立党名，而宗旨要在为国家民族谋幸福。或以既欲组党，应广纳党员，于文学社之已往规章，是否有妨？意见纷紜，莫衷一是，故集议数日，终不得一结论。适同盟会于鄂省组织支部，以石瑛为支部长，石瑛颇愿与文学社合并，由文学社举一副支部长及交际与干事数人，襄办合并

手續。众以同盟会于海内外素著声誉，遂决議与同盟会合并，公推王宪章为鄂同盟会副支部长，楊王鵬为交际主任，王玄奕、曹振武、黃家麟、陈善策諸同志为干事，办理文学社同志名册归并手續，而辛亥首义前后文学社之革命組織名义，遂寿終正寢矣。

原文学社四支部之四十二标地属阳夏，与京汉鉄路綫上駐地均陷敌。所有光复时之称协統、标統者，因战事变迁，几易其人。秘密負責者只知排滿达目的，又未負軍事、政治重要責任，至此名既假人，器当別屬。故时有論者曰：“革命成功，革命党消。”岂非确論也哉？和議成后，胡玉珍与王纘承于三道街組織春秋报社；郑兆兰于汉阳開設皮革厂，复与邱文彬等組織普利公司开矿，避不与爭。但造归并名册时，胡玉珍召同志集議于春秋报社，欲以效力于阳夏战事之同志加于秘密时之名册內以昭大公，乃有人密报黎元洪曰：“胡玉珍秘密开会，組党加盟，恐有异图。”黎即暗令驅胡。此时，黎已杀三十一标秘密时代表江国光、滕亚綱与四十二标秘密負責者祝制六于汉阳門，未經审讯即行枪决。胡鉴此，惟有出走以避之。顧黎氏之在湖北兴党獄时，昔日携手革命之同志，則分为座上客与阶下囚矣，甚有借故誣枉者。如春秋报社甫出刊，八月即有馬队之变，黎竟以春秋报社为同盟会之机关，或与之有关。幸充主笔者之王宗藩、总編輯范希仁、編輯何道存暨，皆非同盟会会员，故未遭封禁。至其他同志往各地遭惨杀者亦多，如原文学社社长蔣翊武死于桂林陆榮廷之手，副社长王宪章死于南京馮国璋之手，胡玉珍于洪宪时死于沪西监所，其他死于各省者不胜屈指也。

記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軍政分府

盧智泉 温楚珩

(一) 詹大悲与《大江报》

清光緒三十三年，同盟会鄂省負責人余誠(字簡齋，麻城縣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樓街，同来的有同盟會員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會員黃侃(字季剛，蕪春縣人)。温、黃均借居在留日同学刘伯英、刘昆孫弟兄的家中(武昌涵三宮街)。其时武昌軍学兩界抱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已日有增加，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学生詹瀚(字質存，筆名大悲，蕪春縣人)，与这些同志多有联系。詹原在黃州府中学讀書，才气縱橫，下笔千言，校长吳兆泰^①譽之为黃州府所轄八屬之冠。詹大悲在該校时因閱讀新书及海外各种杂志，思想进步，指斥朝政，又因与同学宛恩演等暗組团体，被开除学籍，因至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該校为湯化龙主办，在蕪道街西口內)肄业。詹来省后，見聞日广，革命思想益加发展；聞知余、黃、温等均自日本归来，即以自我介紹函約晤談。此后詹并邀約軍学兩界同志多人，不时到余誠处聚会，由余誠等告知同盟会

^① 吳兆泰系清翰林，任御史，因与薛宝辰、梁鼎芬、宋伯魯等合摺共參西太后那拉氏，以彈劾至尊罪革職，被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后任黃州府中學校長。

組織之緣起及其情况，并言此次回国任务就是宣传同盟会綱領，启发人們的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結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听者甚为鼓舞。自此以后，詹陸續介紹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較优秀的，在学界有黃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璣，黃岡县人熊繼貞(字子貞，又名十力)，蕪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軍界中有黃陂县人蔡济民(字幼襄)、吳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县人王守愚(字玄奕)，湖南人龔霞初、唐牺支、楊王鵬(字子鬯)、刘尧激、蔣翊武、鍾琦，貴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軍学两界的重要領導人物。其时詹之寓所(糧道街兴隆巷內)及查光佛所居之蕪春学舍(蛇山頂上)成为同志日常聚会之所。正在革命进行中发生了一段誤会，因有人言及詹在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时曾拜于湯化龙之門下，黃侃面詰之。詹承認实有其事，并言因聆以前行为之幼稚，早已向湯索回門生帖子，与之断絕关系。詹出帖示之，黃乃无語。

是年冬，汉口《商务报》將停刊招頂。詹以報紙为宣传利器，拟返县筹资頂办。适黃侃亦因早在本县及鄂东一带組織有孝义帮会，拥众达三、四千人，及見武昌革命形勢日趨成熟，亦急須返县主持，以备武昌一旦起义，即以其众阻截北軍后路。两人遂偕返原籍。詹筹款因時間仓促，仅得三、四百元，回武昌后託温楚珩向刘伯英弟兄商借千元，并以其家中田产契約为抵押。刘为紅安县巨富，拥田千亩，其祖曾做天津海关道，此区区之数本不足道；但刘氏弟兄素性慳吝，对于革命亦持依违两可之态度，經温多次磋商，均支吾搪塞，后竟託言返乡度岁，置之不理。(其后刘伯英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司法院任秘书，死于重庆，反动政府居然下令褒揚，謂其毀家革命，真是非顛倒也。)詹因借款不成，仅以所筹之款作为頂

报之用，日常經費則暫由軍學兩界同志等合力籌措，未及兩月終以困窘停刊。辛亥前一年冬，宛思演之同鄉胡雨村，薄有財產，對於革命亦頗贊成，願出資三千元辦報，以自任經理為條件。詹乃商之何海鳴，將何所辦《大江》、《白話》兩日刊改為《大江日報》，胡任經理，詹為總編輯，何海鳴副之。發刊後大膽敢言，凡有武漢官廳各種黑幕無不盡情揭露。社論亦措辭激烈，痛斥一般貪官污吏為奴才為走狗。尤以對新軍內部一切不法和貪污舞弊以及減發服裝等事，一經士兵到社申訴，即予以詳細登載，痛加抨擊。又征得黃花崗諸烈士遺文遺信，印成單行本，附報分送。辛亥春，同盟會員幫會領袖譚人鳳來漢，與詹暢談武漢革命形勢。譚撫詹背曰：“以前所晤湖北諸同志無如君者，望君珍重。”其為譚推重如是。後因登載黃侃所寫《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深遭大吏之忌，下令逮捕，交漢口地方審判廳審訊。詹大悲、何海鳴均爭訟時評為其所作，不洩露黃侃之名，足見當時一般革命者的風格和勇氣。廳長羅某（廣東人）為人比較開明，不願興大獄，結果判一年徒刑，如繳罰金八百元可緩期執行。詹、何俱系寒士，無款可繳，遂被押于漢口孔智司巡檢衙門監獄中。武昌起義時，始出獄。

（二）漢口軍政分府的始末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夜，武昌新軍舉義成功，占領了武昌，滿城的清朝文武大小官吏都逃走一空。從漢口隔江相望，只見黃鶴樓上飄着一面旗幟，用望遠鏡也看不十分清楚。武昌沿江堤上路無行人，江面的划子也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漢口方面，一般人只覺得武昌昨晚必然發生了變故，但還弄不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漢口沿鐵路至蕪口一帶，原駐有新軍一營，事前早有布置，其任務是響應武昌

起义占领汉口，但未见有任何动作，也没有出来维持社会秩序。其时街面上已渐呈混乱状态，有二、三家当铺和金店正遭抢劫。我（温楚珩）到汉口礼智司巡检署中把詹大悲从监狱内带出。我和詹走出时，巡检官（从九品官）尚未逃走，衙门口依然有站岗的卫兵，看见我们出来，并未加以拦阻，只是面露仓皇之色而已。我们走出监狱后，即到江边准备过江去武昌，因无船可渡，只得过汉阳沿江西行，直到鹦鹉洲才找着一只小船。过江后，在武昌文昌门登岸，只见城门紧闭，费了许多唇舌，守门卫士才让我们进城。街面上因战事烧毁的断墙颓壁阻塞道路，不能通过，只好再出城绕至忠孝门入城。听守门同志说，都督府设在諮議局，于是我们即由蛇山缘山而下至諮議局，只见大门口竖着两面十八星大旗，卫兵不准任何人入内。旁有一市民探头向里面观望，当被卫兵刺伤左耳，血流于地。我二人幸经站在楼前的相识同志大声呼唤，才得放进。走到里面，见每个房间内都拥挤有数十人之多，声音嘈杂，闹成一片，听不清所谈何事，我们不觉只是摇头。詹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对我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找蔡幼襄商量。”詹走后，我在人群中突然遇见了陈冕亚同志，我连忙问他这里是哪个在当家作主。他笑了一下说：“据我看人人都能作主，人人都不能作主。”他又说：“平时所认识的军队同志，这时还在队伍中部署一切。他们从昨晚起到现在还不能休息。其他稍有关系的同志都寻找不着。”我又问他，听说黎元洪当了都督，他说黎就在楼上。于是二人同去楼上。我想会见黎后可能摸出点头绪，谁知黎在一张铺有老虎皮子的紫玉炕几上盘膝闭目而坐，好象老僧入定的模样，同他谈话，一句也不应。过了许久，才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我们看见黎的这种神气，又好气又好笑，连忙走

开。下楼时，又碰見一个頗有官派的鬍子，我很奇怪，向他請問貴姓。他把胸前掛的白布条子举給我看，才知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湯化龙議長先生。那时好象已經举他当了政务部长，但也在人羣中跑来跑去，显出一筹莫展的样子。我心中想道，怎么革命成功，軍政大权却落在这班人的身上呢？正站在那里发呆，詹、蔡二人气喘吁吁地跑來說道：“已經找到两連軍队愿随我們过江占領汉口。”于是陈冕亚、胡經武、龔远候、查光佛、何海鳴等都同我們一齐过江，船开到王家巷登岸，这时已是二十日傍晚了。

汉口的市民听說武昌开来了軍队，不約而同地大放鞭炮，夹道欢迎，无数羣众高呼“杀尽胡儿”、“兴汉灭滿”的口号。因已入夜，于是我們暫以四官殿作为临时駐紮地点。当即派人邀請商会正付会长立刻前来会商一切。又集合同志等討論布告安民問題，大家互相謙让，最后推举温楚珩主稿。温执笔向大家問道：“我們的布告应该用个什么名义？”那时同志們都怀着不滿武昌軍政府的思想，更不满意黎、湯二人掌握了軍政大权，但仓卒間尙未及答。温即云，用汉口軍政分府名义如何，大家均拍手贊成，就这样成立了軍政分府。在当时同志們思想中，认为武昌軍政府的領導权已經胡里胡涂地落到反对革命的黎、湯手中，值此戎馬倥傯之际，未便提議反对，如果軍政府分府将来基础稳固，再以革命派将武昌軍政府另行政組，那是最符合革命的要求了。这就是那时定名的本意。以后在行使职权中，也是自行其是，不受武昌軍政府的指揮。汉阳宋錫全同志是热烈支持我們的，如分拨軍械，分府要多少就給多少，对于武昌軍府則不完全供应。以后宋回湖南被杀，这是一个真正的主要原因。

是夜商会正付会长蔡輔卿、李紫云都被請到，首先商談的是維

持汉口治安問題。据两会长报告，汉口从清晨起到夜間已发生搶案数十起，商民均惴惴不安，要求立刻設法予以有效的制止。我們知道商会早有商团的組織，但只具形式，这时正好加以整頓利用，以維持秩序。当即議定由商会通知各商店，每戶出壯丁一名，无壯丁者出錢。将汉口划为十区，每区为一組，負巡查本区之責，由分府酌派士兵参加各組。又通知汉阳宋錫全同志轉令兵工厂撥枪五百支交商团使用。限于是夜迅即組成，执行任务。次早即捕搶匪三名，送四官殿梟首示众，搶风立被平息，市面恢复常态。又由商团查获潛伏小客栈內的张彪的參謀长刘錫祺(天津人，由外县視察防地返汉)，經审讯多次，他表示不贊同革命宗旨，遂下令处死，以除后患。自此以后，迭破奸細案多起，汉口市內秩序得到安宁和保障。商会付会长李紫云为人精明干练，热心贊助革命，如发动全市蒸饅店每日送蒸饅数百担至前綫，士兵均得果腹，又代筹巨款数十万元，使分府費用无缺；凡分府交办之事，都能尽力办到，在商界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自二十一日起，我們分訪各国領事，各国領事承認我軍政府为交战团体。又派同志分返各省及电致各省諮議局，推动响应武汉革命。直到二十六、七日，前綫又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武昌軍政府到那时才略有头緒，与我們取得了联系。同时孙武也伤愈出院，到武昌任事。其时即有立宪派和与立宪派一鼻孔出气的投机分子，献計要取消汉口軍政分府，以免所謂“尾大不掉”。但那时文学社的同志在軍隊中的人数既多，力量尚大，反对我們的人，尚不敢輕举妄动。此后馮国璋率北洋劲旅进攻汉口，我們連战連敗，到九月初七、八日，汉口遂告陷落，于是我們也就不能不撤守了。照軍事情况来講，黃兴那时已到汉阳督战，我們也就大可退守汉阳。但黃兴在那时已是为他人所利用的一块

招牌。退回武昌吧，又恐孙武和立宪派不能相容。原来我們和孙武在起义之前早就积不相能，认为他是个流氓，革命的动机也不純洁，对他极端鄙視，不屑同他共事。何海鳴在大江报社时，曾在报上登有“請孙尧卿先生今后不要再至本社”的告白。因此孙武对于我們也自然特別仇恨。况且孙武已在軍府呼朋引类，握有权勢，假如他加我們一个失陷汉口的罪名，是于我們极端不利的。其次，安徽方面我們早派有同志吳陽谷回去发动响应。听说安徽巡撫朱家宝已經宣布独立。我們想从安徽得到支援，再会合黄侃所领导的鄂东一带的孝义会，重整旗鼓，反攻汉口。这就是不愿与武昌协作，毅然东下的简单原因。我們到九江下船是想就近先了解一下安庆的情勢，不料朱家宝忽又取消独立，吳陽谷同志死于乱軍中，于是这个計劃遂成泡影。

我們从汉口东下，一行有十余人。那时九江軍政分府都督是馬毓宝，參謀长是李烈鈞。我們到九江时，馬、李均去南昌开会未返。分府的人对于我們很不客气，非常冷淡，当夜我們睡覺就在客厅的桌台子上，还有睡在地板上的。第二天一清早，我們就自动迁到旅館去了。到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我們正在进午餐，九江分府差遣員丁景良同志(湖北均县人)忽然而至，告訴說：李烈鈞由南昌回来，正在布置派手枪队前来刺杀你們。我們立即放下飯碗走出旅館，分途至江边的日清公司暫避(日清公司的买办黃某，是詹的好友，向来贊助革命)。大家都很詫异，认为我們与馬、李素不相識，更无任何仇怨，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因此就疑到这一定是武昌方面发动的了，但始終沒有得到佐証，到今天还是一个疑案。这时又听到大通已由同志刘某成立軍政分府，于是詹等一行人由日本人护送乘下水輪赴大通，黃侃、温楚珩、陈冕亚、李渭滨等渡江过小

池口經孔壠到黃侃的家中。蕪春縣孝義會的重要分子方伯芸、張伯竣、汪翔雲，陳楚香等多人聞知黃侃回來，都要求黃集中會員，先取縣城，繳取縣城的槍械，一面聯合田家鎮軍隊內的孝義會同志，占領田家鎮。次晨即在邊街灣黃氏宗祠召開會員大會，到會的會員不下千人之多。當議定分為東、西、南、北四路，集合各處會員，以縣城為總匯合點。但是這個計劃驚動了蕪春縣的土豪劣紳，他們邀約了多人，坐轎百餘乘到黃侃家中，要求中止這一行動，以免蹂躪地方云云，被黃侃大罵，狼狽而去。這些土豪劣紳並不甘心罷休，當夜即由劣紳頭子陳勉吾派人持函請求田家鎮總兵官，立即派兵捉拿我們（其時田家鎮尚未反正）。敵兵一營已進抵距離我們不足二十華里之大王廟附近，那時我們的會員既未完全集中，準備也未就緒，因此無法抵抗，只得連夜繞道黃石港搭輪去滬。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学生軍始末記

周克之原著 陈瑞萸整理

武昌首义时，作者为湖北陸軍小学堂第二期学生，关于湖北学生軍参加革命的經過，我是亲身經歷的；但因年代久远，記憶恐不周全，茲将大概情形，簡述如下：

在談到湖北学生軍之前，先要交代一下辛亥革命前武昌的几个陸軍学堂：

湖北陸軍小学堂(校址在武昌閩馬厂，紫阳湖边)：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廕昌为陸軍部尙书，通令各省开办陸軍小学堂，每期一百二十人(正取一百人，附取二十人)，規定三年毕业后升陸軍中学堂。但这时湖北还未开办，因为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已在駐湖北的陸軍第八鎮(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中，挑选优秀士兵入学，即名为湖北陸軍小学堂，內分仁、义、礼、智、信五斋，并附設軍医、測繪等班。原拟从这批学兵中挑选其优秀者升送陸軍中学，为廕昌批駁不准，令由湖北另办陸軍小学堂。于是將該校改名为湖北特別陸軍小学堂(其时有人戏語云：“学堂特別小，学生特別老”，即指此)，不久停办。另于第二年(一九〇八年)暑期招生一百二十人，成立湖北陸軍小学堂，如晏助甫、蓝翰林、鍾秀实等，都是該校第一期学生。第二期学生一百二十人(內有滿人二十余人)，于一九一〇年元月入学。

陸軍第三中学堂(校址在武昌南湖)：廕昌在通令各省設立陸

軍小学堂的同时,并规定在全国开办四个陆军中学堂,分别设于北京(清河)、西安、武昌、南京。两年毕业后,入伍半年再升陆军军官学校(设保定,一般称为保定军校)。武昌的陆军第三中学堂,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开办,招收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学生,其中有湖北陆小第一期学生八十人(内有满人若干名),系于一九〇九年六月提前毕业升入该校的,为第一批;第二批陆小学生四十人,于一九一〇年元月毕业升学。武昌首义时,第一批学生八十人已经在陆中毕业,升学保定军校(入伍生队);留校的为第二批,除外省人和满人外,湖北学生只有二十余人,如耿丹、刘邦禧、余式谷、晏助甫等皆是。

湖北陆军测绘学堂(校址在武昌右旗背后,即现在的首义路路侧):一九一一年元月开办,招取第一期学生。武昌首义时,该校学生参加革命的有八十人,如李西屏等均在其内。

武昌首义以后,湖北学生军的组成,即以上述三个军事学校的学生为基干。此外,当时在武汉的军事学校,还有湖北讲武堂和陆军将校讲习所。前者轮训陆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的中下级军官,不住校,系走读;后者轮训这两部分的中上级军官,每星期只上几次课,如黎元洪即常去听讲。

湖北陆军小学堂第二期学生一百二十人,入学后由于甄别、淘汰,只有一百十余人,其中有满人二十余人,所以汉人只有九十余人。当时掌握学校实权的都是满人,如名誉总办(即校长)铁忠(前兵备处总办,督练公所总参议)、总办宝瑛(前三十标统带)、队长松海、代数教员培潭、理化教员琨璟、德文教员松俊、历史教员迎喜。汉人在校任职的,有提调宝秉钧、东文(日文)教员刘绳武(均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国文、英文、地理等科教员和排长等。

滿籍學生雖僅少數，但布滿各號舍(宿舍)，在滿籍官員的指使下，對漢人重重監視，因此漢籍學生平時對於革命排滿之說，不敢提及只字。一九一一年十月初，正值農曆八月中秋節前，外間風聲很緊，有“八月中秋殺鞑子”的傳說，學校當局防范更嚴，雖例假也禁止外出。十月十日晚八時，學生都在自習，突然聽到中和門(現為起義門)外槍聲大作，大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黎明之後，滿籍隊長和學生以及漢籍排長等，知道事情不妙，概行逃走；這時恰好城外的陸軍第三中學代表劉邦禱、耿丹等來到，於是陸小代表孫繩、孫紹基等大大地活躍起來，集合同學們聽中學代表講話，大意是：“推翻滿清，打倒專制，是我們四万万同胞第一要務。現在中學全體同學都已整隊進城，向黃鶴樓集中；並有陸軍測繪學堂的全體同學一同前進。城外馬、炮八標聯合城內左、右旗的同胞們圍攻督署，已經占領蛇山；工程第八營已經占領楚望台。瑞澂、張彪等都已潛逃，由黎元洪出來主持大計。同學們，我們應急起直追，奮勇前進！”

於是陸小同學歡聲雷動，由代表率領，攜帶槍支，臂纏白布袖章，向目的地進發。行至大朝街，見街道兩旁有被打死的滿籍軍官屍體數具，更增加了同仇敵愾的情緒。接着在長街(現為解放路)遇到傳騎數人，聲稱黎統領元洪被舉為鄂軍都督，已到諮議局視事。所有革命同胞，齊到閱馬廠集合候命。我們到閱馬廠的時候，各標、營武裝部隊已經來了不少，熟識的官長只有劉繩武和賈秉鈞兩人。休息時，同學中有好奇的，跑到諮議局議事廳，看到黎元洪危坐廳上，一言不發，有如泥塑木雕的菩薩，此後遂有人稱他為“黎菩薩”。不久，陸軍第三中學和陸軍測繪學堂兩校學生先後來到，由李春萱傳達都督命令說：各陸軍學堂的学生統編為學生隊，暫

由代表們負責率領，立即分向官錢局、藩庫、銀光局、造幣廠出發。我們陸小同學由孫繩等帶到藩庫，看見庫藏堆積如山，零星散碎，遍地都是，當時大家革命情緒高漲，沒有一個人敢於擅自竊取的。

十月十二日，城內各處搜查滿人很嚴，三十標的同志們搜到總統寶璣的公館，他已逃走，搜出了他的妹妹（她特有幾分姿色，平日招搖過市），當時羣情激憤，一定要把她處死。劉繩武在場，替她求情，說她是女流之輩，何必殺她。結果還是把她殺了，大家還把劉繩武扭到諮議局，說他袒護寶璣的妹妹，定與寶璣通氣，要以漢奸論罪。幸虧陸中和陸小學生聞訊趕到，以師生關係，加以力保，劉繩武不但得免一死，而且因禍得福，黎元洪認為他和學生感情不錯，當將學生隊改為學生軍時，即以他為統帶。

學生軍自劉繩武任統帶後，成立了標本部，當時戎馬倉皇，軍事形勢日見緊張，都督府各部（參謀部、軍務部、政務部、外交部等）和革命軍各師（第一師，師長高長智，繼任黎本唐；第二師，師長張廷甫，繼任王發貴、杜錫鈞；第三師，師長竇秉鈞；第四師，師長鄧玉麟，繼任蔡漢卿；第五師，師長吳兆麟；第六師，師長王安瀾；第七師，師長唐曦之；第八師，師長季雨霖）及敢死隊等同時成立，幹部需要量大大增加，都到學生軍調用派遣，也有同學們自行奔赴上述各單位的。與此同時，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同學都被派遣各回原籍，號召響應起義，也有自行回籍的。據我所知，如陸中的湖北學生大多參加各部；陸小學生高鴻絨、陳宏詔參加軍務部；雷進之參加兵站部；劉灝州、周克之參加第三師；鄭德到參加第七師；鄂北同學都參加第八師；鄭瑞卿、孫繩、熊開文、饒樹藩、張甲科、林薰南、李可仁等十餘人都參加敢死隊；孫紹基參加漢陽黑山鋼藥廠。因此學生軍減員情況極為嚴重。但自首義之後，武昌

各文学校，除“文普通”第一、二中学堂、“南北两路”高等小学堂外，其余都是初等小学，不到十所，都已停办，于是这批学生紛紛申請參軍，都編入学生軍，成为学生軍的基干。首先成立第一营，以田化龙为营长；接着成立第二营，以赵士龙为营长。营长以下干部，除少数連排长系行伍出身外，都是以陆中学生为連长，陆小学生为排长。十月下旬，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凱，任为內閣总理大臣，派馮国璋率領北洋軍南下，进攻武汉，革命軍各部开到前綫作战，后方勤务完全由学生軍一、二两营担任。如汉阳失守后，守卫都督府的学生軍一个連，虽在龟山敵軍炮火的轰击下，巍然屹立，毫不动摇。不久，湖北各县高等小学堂也都停办，大批学生前来武汉參軍，于是成立第三营，以余式谷为营长。連长是清一色的陆中学生（該校第一期已毕业升保定軍官学校入伍生队，这时都回到武汉），排长是清一色的陆小学生。第三营成立后，注重訓練，沒有担任勤务；仅孙武在任軍务部长时，遇到駐武昌部队的反对，引起风潮，第三营奉命担任了一两天的警戒任务。

现将学生軍的各級編制，表列如下：

标 本 部	营 本 部	連 部
統 带—①	营 长—④	連 长—⑥
教 練 官—②	督 队 官—⑤	排 长三⑦
执 事 官—③	軍 械 长—	司 务 长—
軍 械 官—	书 記 长—	司 书—
軍 需 官—	軍 需 长—	
书 記 官二	司 号 长—	
司 号 官—	录 事二	
录 事二		

①統帶劉繩武。 ②教練官徐某。 ③執事官肖漢杰。 ④營長：第一營田化龍，第二營趙士龍，第三營余式谷。 ⑤三營督隊官姚璣。 ⑥連長：第一營為馮尚翼、王良佐、王家鈺、鄭策助；第二營為祝宏道、高德沛、韋華林、陳修；第三營為肖子清、余占先、張宏材、王仁典。 ⑦排長：李炳煥、梅肅、祝宏連、張仲祥、袁凱、周克之、張萬慶、王殿佐、劉作民、劉本元、盧邦燮、石先芬、費化龍、魏繼徵等。

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當選為第一任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依附袁氏，並假其手殘害首義有功將領張振武等人；又撤銷鄂都督府各部，將原來的八個師縮編為三個師（第一師，師長唐克明，即黎本唐；第二師，師長蔡漢卿；第三師，師長王安瀾）。對於學生軍，則按其年齡和學力，通過考試，分別編入各級軍事學校，並成立軍學處，專司其事（以吳元澤為處長，陸中、陸小學生王大禔、施修和、王學材等為科員）。因此，學生軍於一九一三年暑假前考試完畢，暑假後分別參加以下各軍事學校學習：

湖北軍官學校（校長馬祖基）：招收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的學生軍，計一百二十人，兩年畢業後即分發湖北各部隊見習候差。

湖北陸軍中學（校長劉繩武）：招收年齡在二十歲以上的學生軍，計四百餘人。該校旋即歸併於陸軍第二豫備學校^①，歸北京政府陸軍部領導。由南京留守黃興將他從湖北帶去的敢死隊（如孫繩、鄭瑞卿、熊開文、饒樹藩、張甲科、林薰南、李可仁等）、在南京招收的敢死隊及上海學生軍共一千餘人送陸軍第二豫備學校為第一期學生，他們畢業升學後，即為保定軍官學校三期（如張治中、黃紹竑等都在其內）。上述湖北學生軍四百餘人，為第二期，畢業升學

① 民國成立後，陸軍部將原有的四個陸軍中學改為三個陸軍豫備學校，分別設於清河、武昌和南京。當李烈鈞在湖口起義討袁時，南京第三豫備學校被焚停辦。

后即為保定軍官學校四期。

湖北陸軍小學(校長先後為田化龍、朱兆熊、吳元澤): 招收年齡在二十歲以下的湖北學生軍, 計四百餘人。這批學生於一九一四年畢業, 升學陸軍第二豫備學校, 以後即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湖北學生軍自一九一三年暑期編為上述各級軍事學校之後, 即告結束。由於中途退學和因病死亡, 在上述各級學校畢業的不到六百人。五十多年來, 凋零殆盡, 存者不及十一。逝者之中, 有參加抗戰、壯烈犧牲的, 如劉家麒、彭毓斌等; 有參加中國共產黨、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殘害的, 如耿丹、劉邦禱等。這些先烈, 都是湖北學生軍的光榮!

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

王 振 民

辛亥那一年，我在上海，正由商务印书馆所设的商业中学毕业后在该馆当练习生。我幼年深受我表兄敖嘉熊烈士的影响，痛恨清朝的反动统治，这时又读了许多革命的报纸和刊物，因此反清排满的思想愈益高涨。及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殉难，当时的热血青年莫不撫髀长叹，我因自己非同盟会会员，没人介绍，得不到参加的机会，但是心里早已怦然而动，跃跃欲试了。到了那年农历的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全国震动。我就和慈谿秦乐钧、崑山徐祖正（此人健在）两个同学秘密集议，认为光复河山，在此一举，机会不可再失，决计脱离商务印书馆，从军参加革命。但公然脱离，决不为师长及家庭所允许，只有潜行逃走，始能达到目的。但我三人都是穷学生，要到千里外的武昌去，哪来这笔旅费呢？因此焦急万分。正在这时，我的敖家姑母忽然给我寄来银洋三十元，因为我商校已经毕业，为鼓励我好好工作，特寄此款，教我添置衣服的。我得了此款，欣喜欲狂，因那时的三十元，已经不是个小数，足够我们三人的旅费而有余了。当即告知秦、徐二人，经过一次筹商之后，我除买了一套卫生衣裤之外，把钱都交给秦乐钧，由他负责购买三人的船票，并推他为三人的领袖，主持一切。因为他那时是老大哥，二十岁，我只有十八岁，徐祖正更小，仅十六岁，一切社会经验

均不及秦的老練。又因我等一旦突然失蹤，恐怕商務印書館和家庭雙方不免引起糾紛，遂聯名寫了一封留別書給該館總經理，于當天夜間偷偷地上了太古輪船。半夜船開，不久出吳淞口，溯江西上，我們才把緊張的情緒慢慢平復下來。我們三個青年就這樣走上了革命的征途。陰曆九月初八日船過九江，九江已懸掛白旗，聽說新軍已響應武昌，起義獨立了。及船過黃石港（即今黃石市），因離漢口已近，我們到甲板上去散步，只見滿船乘客，羣集甲板，倒有百分之八十是去武昌參軍的，青年學生占了一大半，里边也有壯年和中年人。眾口紛囀，都已公開地在暢談革命，不再隱諱，也可見當時人心的振奮了！

船到漢口，在太古碼頭上岸。那時約為下午四時左右，這一大羣參軍的人都紛紛雇划子過江。在划子上認識一個名叫殷仲札的，他本是南京新軍軍官，他邀我們隨他一起到軍務部去。我們三人因此來目的是要上前線殺敵，應該參加到部隊中去，就謝絕了他，還和其他許多同船來的青年，一起到獨立將校決死團去參軍。該團在武昌望山門內兩湖總督署西面的督練公所內。團長金鴻鈞，湖南人，他還兼為十個沖鋒營的統領。參軍官（即參謀長）首斌，也是湘人。我們入伍之後，都成了團員。到編隊時，我們三人被編入第一營右隊（連）第一哨（排），秦樂鈞被派作正團領（班長），我作副團領，徐祖正仍作團員。因為全團都是青年學生，同抱獻身革命的目的，所以莫不慷慨激昂，彼此意氣相投，親如手足。隊官、哨長（連、排長）也不以禮法相拘，無甚上下級的差別。那時的月餉，自都督以至士兵，每月都是二十元，發的是大清銀行的鈔票。據說那種紙幣本已收回不用，起義後因軍需浩繁，重又發出，流通市面。和鈔票同樣在市上流通的，還有一種湖北省官錢局發行的台票，票面

注明每票兌制錢一千文。鈔票一元則兌換制錢一千二百文。其他貨幣有銅元和一二角的小銀幣，交互使用。那時物價低廉，並不因發生革命而波動，商民安居樂業，也不因戰爭而恐慌。亦可見民心的向背了。

那時的鄂軍政府軍務部，是革命軍事的重心，部長為孫武，副部長為蔣翊武及張振武，時號湖北三武，為一時風雲人物。這時各省援鄂義軍，雲集武漢附近，湖南增援的部隊尤多。因湖南繼武昌首義之後，於陰曆九月初即響應起義，推焦達峯、陳作新為正副都督，遂即廣募軍隊，支援湖北。所以湘軍今天來四千，明天來六千，源源而至，幾乎無日無之。湘軍的裝備，都是穿對襟的中式軍褂，頭上打黃布或藍布的包頭，赤腳穿草鞋打裹腿，其形象頗似舊劇“鐵公雞”戲內人物的打扮。但每個戰士都是精神奮發，雄赳赳，氣昂昂，沒有三十歲以上的人。我認識一個岳州義軍總代表（類似旅團長）謝流芳，他所統率的兩千多人駐在兩湖書院，個個都生龍活虎。人民看見來了这么多的隊伍，而七粵不驚，因此大受感動。

九月初七日清軍攻占漢口，殺人搶掠，縱火焚燒，商民大受荼毒。龍王廟四官殿一帶，黃煙沖霄直上，火光燭天，數日不熄。敵炮兵在劉家廟及龍王廟江岸與我蛇山、黃鶴樓、龜山等處的炮兵隔着長江、襄河互以野炮、山炮對射，日夜不停。炮彈射不及岸，落在江中的，激起浪花如水柱，但岸上行人，江中舟楫，均熟視無睹，行駛自若，只不過不在其射界以內來往罷了。此時本省的義軍和各省援鄂的部隊，人數雖眾，却沒個總司指揮的人。適黃興由上海來，遂共推舉為總指揮，并特在都督府前閱馬場的土崗子上，用杉木搭起一座正方形的將台，四面徧插十八星的軍旗，中間懸掛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舉行登台拜將的儀式。黃興就職後，即親往前敵

視察指揮。

阴历九月中旬的某天下午三时左右，都督的令箭来到决死团，传达命令，要我团开到汉阳去防守兵工厂，令冲锋营开到蔡甸一带去增援。金鴻鈞奉令后，即令我第一营于四时晚饭后先行出发。大家急忙吃完饭，整理好全副武装，在大操场集合，听候点名。点名后，黄管带（营长）把防守兵工厂的任务作了指示，立即出发，在文昌門渡江。那时已近薄暮，江面上流弹乱飞，在头顶噓噓直叫。我初次参加战斗，见此情景，心情未免紧张，但过了一会也就渐渐安定了。江中白浪滔天，暮靄渐浓，船队直向汉阳进发。不久登岸，队伍开到兵工厂，我們的駐所是在一个德国技师所住的小洋房内，时外国人和其家屬早已离去。我們安頓了队鋪，即分別进入襄河岸的前沿陣地，把原有的战壕、交通壕等工事加強加固，即在陣地警戒，監視对岸敌人的行动。敌人老想偷渡，或拂晓，或傍晚和半夜，以山炮、机枪掩护满载敌兵的船只，向我方河岸冲击。我方也集中火力，奋勇阻击。时秋雨連綿，战壕积水沒膝，衣褲尽湿。敌人在大雨中，亦时来偷袭。我軍冒雨浴血苦战，半月之間，不知击退了进犯的敌軍多少次。但敌人是久練的北洋劲旅，我們都是青年的学生，論訓練和战斗經驗，都是远远不及的。仅凭一股血气之勇，和敌人頑強抵抗，因此伤亡惨重，既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又沒有补充。

到了阴历十月初六那天，我右队殘存的战士，只有十三人了，其他各队伤亡的情形也差不多，这才把我們撤回武昌。回到武昌后，才知道十里鋪、三道桥、聚鉄山等战綫，都有我决死团和冲锋营的部队，配合友軍作战；我們这两部分的战友撤回来的，也是所余无几了，尤以湘軍的牺牲为重。战斗的激烈于此可見。到十月初

七日,汉阳亦告失守。敌人占领龟山后,由山上发炮向武昌轰击,我方在蛇山发炮还击,双方炮战极为激烈。那天倒没下雨,但是硝烟弥空,黄云满天,景象十分凄惨,好象也在凭吊革命烈士壮烈牺牲似的。我团及冲锋营残余部队又于当晚八时,奉令调赴青山沿江一带增防,以备敌人乘机渡江。我队因只有十余人了,还有带伤的,所以未予调动。但是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彻夜都未入睡。总之,此次双方会战,论人数,我方较众,装备虽不及敌兵的精良完整,而士气旺盛,人人奋勇。但终于战败,其原因,第一是全局指挥方面对兵力的配置、调动和增援,都不甚适当,甚至失时,运用的太不灵活,也不爱惜兵力;第二是兵太多,都没有战斗经验,但知恃勇拼杀,不知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遂致战败。总指挥黄兴和各级指挥都是应该分别负责的。尤其黄兴身为总指挥,登坛拜将,为全军所瞩目,在汉阳失守之后,不但不作严密的部署,为再战恢复之计,竟不顾武昌的安危,以赴沪纠集援军为名,一走了事,和历次革命起事后,一到失败,他就脱身而去,如出一辙。处士虚声,殊失我们这班在下位者的仰望。他一走,黎元洪也退驻洪山宝通寺,并欲退往湖南。军务部长孙武也要离城。幸而副部长张振武力主死守,愿与武昌城共存亡,并表示有再敢倡议弃城退走的,一律以军法从事,这才把动摇的人心给安定下来,坚决固守武昌。又幸而这时苏浙联军攻下南京,各省响应起义的越来越多,袁世凯也另有阴谋,没有继续进攻,武昌局势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南北议和亦在上海举行。我们在决死团无事可作,因为战事已经暂时停止,成了休战状态,心中异常烦闷。正好兵站总监刘公任北伐左军总司令,成立总司令部,

我和徐祖正二人見此机会，就通过軍务部，要求参加北伐。軍务部就写信把我二人介紹給刘公。刘見我两个都是青年学生，年紀又小，能够矢志从戎，頗为嘉許，当即委为中軍監視官，随营听候差遣。我等奉委后，兴高采烈，以为此次北伐，必可复我汉室河山，解除人民痛苦，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去搬取行李。不料在我們初到武汉时于划子上認識的那个軍官殷仲礼，又来看望。他已来过多次，每次都要我二人搬到他家去住，这次来就是要来搬取我們的行李的。他听說我二人要参加北伐，即索閱委状，看过以后即将委状收入怀內，并說：“在这里工作，一样是革命，好好的跟我去帮忙。你們年紀太小，北伐是不能去的。”我們向他索取委状，他說：“这个我会替你們交还刘仲文的。”就这样強迫着我們二人搬到他家里。他和第四鎮統制邓玉麟合住在一所小洋樓內。这所洋樓据說原为审判厅厅丞黄庆瀾的住宅。他和許多高級軍官都很熟識，但我們始終不知他是什么身份，也不知他在那时究竟搞些什么工作，連张振武也常和他来往。我們两个青年見他手段通天，心虽不願，竟无可如何，更不明白他強留我二人是有何作用，就糊里糊涂地在殷家作了食客。不久听說北伐左軍到了襄陽，忽然兵变，竟至炮轰总司令部，北伐一事竟告頓挫。而武昌方面也发生政爭。蔡济民所組織的毕血会，大队會員全部武装开入武昌城內，推倒了孙武。象这样，革命尚未成功，而內訌忽起，亦可見当时領導者的意見紛歧，各怀私慾，为个人权利，不惜以兵戎相見，可为浩叹。

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下詔退位，而东北的张作霖在关外尙悬掛龙旗。张振武时以筹边使兼边防軍司令的名义，准备討伐张作霖，光复东三省；先遣支队司令黃禎祥业已率队到达烟台。我和徐祖正二人，在殷仲礼家正煩悶无聊，聞此消

息，又跃跃欲动。正值张振武到殷家来，才知道决死团的一帮同志和我们的同学秦乐钧等十余人，都已被张收容到他的司令部去了。我二人要求参加北伐，他同意我们去，并令次日即将行李搬去。第二日，我们搬到水陆后街的宿舍，果见各同志都在那里。我们这次参加，因张振武的关系，殷仲礼未加拦阻。我们在边防使署的名义，暂时都是随员，后又分别派为使署及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和书记官等职务。我被派为司令部的参谋。我们的办公和住宿的处所，也由水陆后街搬到斗级营的一个客栈里。不久又由都督府以副总统陆海军大元帅兼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给我们每个参加战役的同志首功执照一纸，银质起义纪念奖章一个。给每个人的执照上，都有不同的考语，我的执照上写的是“杀敌致果，奋不顾身”八个字。我们当时得到了，都视为无上的荣誉。但不久孙中山先生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袁世凯竟统一了南北的政权。因此，张振武出兵东北一事也就停顿下来。到了阴历五月间，我们的机构撤销，人员也被遣散。不久，张振武又被袁世凯诱往北京，竟予以杀害了。

我们这一群想献身革命事业的年轻小伙子，自张振武一死，竟没有人管，就风流云散了。我们同伴来的三人，秦乐钧回到上海，筹了些资金，到爪哇的巴达维亚经商去了；徐祖正到日本半工半读去了；我回到原籍嘉兴。我想升学读书，没有钱，想找职业，没有路，家里没有力量负担我的生活。我拿了一张首功执照，向稽勋局请求，向浙江都督府申请，要求安插，可是到处碰壁，找不到吃饭的地方。辛亥革命的结果，使得我走投无路。我参加革命事业至此也就宣告结束。

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學生 赴武漢參加革命經過

沈 鑄 東

在辛亥革命武昌炮响的那一天，南京城內街頭巷尾，到处听到叫卖号外的声音。报童手里拿着号外，一面跑，一面叫：“号外！号外！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了，瑞澂、张彪都逃走了！”一瞬的工夫，号外即搶购一空。人民听到清朝要垮台的消息，莫不兴高采烈，兴奋异常。当时陸軍第四中學的學生們，受到武昌首义的鼓舞，革命情緒更加高涨，激进分子紛紛酝酿着支援武汉。陸軍第四中學吸收了五个省（粵、閩、贛、浙、苏）的陸軍小学毕业生，全校千余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他們目击清政腐败，国势衰頹，仇滿爱国的心理异常浓厚。很多学生，平常喜爱閱讀《新民丛报》一类的书刊，但也反对康、梁的君主立宪；对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等人在日本所創办的《民报》更为喜爱，因該报內容多系反駁康、梁君主立宪的主张，鼓吹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的論文。这些出版物，在当时系禁书，与《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类书籍一样，不准許学生閱讀。但同學們仍然偷偷地把这类书籍伪装起来，装上“論理学”的封面，放在书架上，課余之暇，取来閱讀，津津有味。大家平时感染了革命思想，因此武昌一声炮响，革命思潮迅速化为行动。下課后，三个一堆、五个一羣地議論如何参加革命的問題。学生中

也有少数駐防旗人子弟，他們自是忠于清政府。滿、漢之間仇視益烈，各自暗中戒備，如臨大敵。我記得那幾天的晚上，每個漢族同學都頭枕刺刀睡覺，以防不測。校方見此，終夜巡查，以防發生事變。總辦（即校長）萬廷獻曾集合學生在大操場講話，他首先強調武昌革命決不會成功，勸同學們“鎮靜”，不要“盲從”，免得自招禍害，又說黎元洪是個放鴨子出身的，不會有多大的作為。萬廷獻這一套恐嚇的話，在於企圖阻止學生們前去武昌參加革命活動。但學生中的激進分子，不特不為所動，反而更加積極進行組織。

去武昌的同學分兩批出發，我列在第二批之內，比前一批遲走兩天。我們第二批，系由區隊長邢繩祖率領，邢也是我們這一批的組織者。我在臨行的前兩天，才將去武昌的意圖告知先父。先父當時在南京教書，聽說我要參加革命，由於愛子情切，初則勸止，但思及救國大義，終亦同意；並且在登輪西上時，親自送我到船上，再三叮囑一路小心，早日勝利歸來等語。我們第二批赴漢學生系於陰曆八月二十六日搭乘外輪西上，同行者約數十人。記得有廣東的謝瑋翰（後改名嬰白）、蔣光鼐、李章達、陳銘樞，江蘇的陸珪、王懷宣、任援道，江西的張國權、彭武揚，浙江的詹蒙、王卓等人。船經過九江時，見江面上的軍艦已升起白旗宣布起義。又有我們陸軍第四中學江西籍的同學上船來表示歡迎，並勸我們留在九江工作。他們說，九江設有招賢館，專事接納有志參加革命之士。當時我們到招賢館，進了午餐，大家研究之後，認為還是到武昌去為合理。因武昌正與北洋軍作戰，需人較九江更為迫切。我們遂仍登輪向武漢行駛。

到達漢口碼頭之際，漢口已為北軍占領，但因租界的關係，北軍無法控制，漢口與武昌的輪渡仍照常對開兩岸。漢口失陷，起義

部队正向武昌轉移。我們由汉口乘渡船到武昌时，正遇着南京来的第一批同学。他們也是参加防守汉口的，战斗后与武昌起义部队一同退到武昌。据他們談，北洋軍机枪火力异常猛烈，革命軍伤亡过大，故暂时退出汉口。这时武昌已宣布戒严，四門关闭，仅留单身出入的过道，城門口都架有重机枪两挺，出入盘查甚严。我們因遇到第一批同学，經向守卫說明，始获放行。我們入城后住城内都督府隔壁方言学校內。此时武昌城内，空气异常紧张，虽然武汉三鎮还能維持交通，但北洋軍隊已逼近武昌，情势危殆，不过革命情緒仍然很高。當我們到达方言学校时，見有住在校內的童子軍百余人正在开会，有一童子(不过十三、四岁)到台上演說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并說后生可畏，鼓舞大家立功。我們都受感动，准备随时亲临战場，以馬革裹尸为快。我們这許多青年学生軍及少年童子軍，大家都意气昂揚，情緒奋发，大有灭此朝食之概。

我們到武昌的第二日，都督府門前到有湘軍数千，听說系由长沙开来的援軍。一时欢声雷动，围观的羣众挤得水泄不通，把几天来的紧张空气一扫而空。湘軍士兵都不过三十岁左右，軍容甚壮。每人都有一枝长枪，装有刺刀，身上还背上一把大刀，大刀都用紅布裹纏。每个人都以黑布纏头，足登草鞋；这种草鞋系由布条和草繩編織而成，經久耐穿，听說都是士兵們自己編織的。兵強馬壮的援軍一到，全城軍民兴高采烈，意气洋洋。革命領袖黃兴的到达武昌，是一件更值得人們兴奋的事。当时孙文、黃兴之名，妇孺皆知。又传说孙文也要回来，羣情更为振奋，革命气氛并不因汉口的失陷而降低。

黃兴到达武昌的第三天晚上，有軍政府的負責同志介紹他与我們見面。当时在場的有原湖北陸軍第三中学的学生，以及我們

由南京来的陆军第四中学的学生，共约三百余人。我们齐集都督府门前广场上，聆听黄兴讲话。当黄兴走近行列时，同学们都以惊奇和敬佩的目光向他注视。黄兴讲话对我们参加革命表示赞许。他说：“你们都是将来国家干城之选，现在革命要人用，但我可保证绝不把你们当一兵一卒之用。”黄兴之所以对我们说这番话，是一段插曲引起的。黄在讲话中间我们：“诸君来武汉想干些什么？”同学中有人答曰：“要做官。”黄问：“要做什么官？”答：“副官。”他针对这种思想情况，于是就说明我们都是将来国家干城之选等语。这一段插曲，可以反映当时学生参加革命在思想上的复杂。两小时以后，我们的领导人邢繩祖传来命令，叫我们去领枪领子弹，并听说已把我们编为学生军。晚上，忙了大半夜擦枪，因为枪是汉阳兵工厂造的新枪，内外都涂满机油，擦洗颇不容易。第二天晚上，奉命向汉阳出发。黑夜渡越长江，经汉阳城、伯牙台、归元寺到达昭忠祠革命军总指挥部。这时黄兴已被军政府任命为战时总指挥。我们这一班学生军即驻扎在总指挥部内，有时也担任作战任务，似卫队而又非卫队。

到汉阳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奉命到龟山顶上担任防守。汉阳兵工厂即在龟山脚下，紧临襄河。对岸的破瓦残垣内外，都暗藏有馮国璋的部队。当我们到达兵工厂，已深夜十二时，厂内空无一人，西式家具与钢丝床仍然凌乱地放在各个室内。电灯也照常照耀全厂。我们在室内休息两个多小时，由老同盟会员黄伯度指挥我们上龟山执行防守任务。正当黄伯度向我们作防守部署时，龟山上忽然轰隆轰隆地打来几炮，炮弹飞过头顶，一阵急风，头发好像根根拔起似的。黄伯度虽然本能地缩着头，但喊“不要怕，不要怕。”同学们都是初临战场，自然也有些心惊胆战，但仍能沉住气，

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龟山上筑有散兵壕沟，我們即分布在壕内与敌军对垒，稍一露头，对岸馮軍即射来步枪子弹，掠耳而过。

我們在龟山上防守了一夜，次日白天則仅留少数值班的人在山上了望，其余都退到山脚下休息。如此防守约十余日。因白天异常清闲，我們都到城内玩耍。汉阳城内的紅苕，价廉物美，适合口味。当我们問價錢时，他們都很客气地答說“您家，一个子儿一堆。”就是說一枚銅元可以买到一斤煮熟的紅苕。我們往往吃过早飯后到汉阳城内觀光，晚上才回到营地，中午这一餐，化一枚銅元就可以解决問題了。汉阳城内外虽在兵荒馬乱之时，而秩序还算正常，只是与武昌一样，不免有杀滿之举。被杀的也有北洋軍的間諜，这些人身上都有两个鑄有“康熙元宝”字样的銅錢，据供称是北軍叫他們到汉阳来探听起义部队的情况，每天晚回去密报，銅錢即作为暗記，領活动費也凭此两个銅錢。当时在汉阳捕获此类間諜，不少都是經汉阳軍政分府申明當場正法的。我們学生軍的給养在当时是异常丰富的。駐地是在昭忠祠，隔壁就是兵站部。每天晚上居民絡繹不絕地送猪肉到兵站上来。罐头和面包經常发到每一个士兵手里。学生軍比普通士兵的待遇还要稍好一点，因此大家是比較滿意的。在兵站内庫存枪枝子弹都不少，我們每人所領子弹多到五百发。都認为打击敌人，子弹越多越好，一路来累得滿头大汗，故后来再領子弹时，最多不超过一百五十发。因当时庫存子弹极多，发給子弹沒有限制，任凭携取，作战又无經驗，乱放子弹的現象，也是有的。

我們在龟山守了許多天，敌人无法从正面渡过汉水，革命軍也无向汉口进攻企图。因此，双方形成对峙局面。記不确切是哪一天，忽传敌人已从汉水上游偷渡，正向汉阳城方面来了。学生軍旋

奉黃興命令，到十里鋪堵擊。我們到達十里鋪時，友軍正與北軍激戰，炮聲機槍聲，震耳欲聾。我們當即從正面填壘加入戰鬥。激戰兩晝夜，因兵力薄弱，漸覺不支，只得後退。當報請黃興派兵增援，黃囑堅守，並說明早一定有援軍到達。惟守到了次日中午，尚無援軍到來的消息，遂向漢陽城轉進。等到我們退到漢陽城內時，漢陽府署空無一人，黃興亦不知去向。府署大堂上，滿地散放大清銀行的票子，無人過問。城內景象蕭條，家家關門閉戶，賣紅苕的攤子也不多見了。有人說，黃興是四條腿，黃字下是兩條腿，興字下也是兩條腿，所以他跑得比旁人特別快。學生只得奔赴江邊，設法向武昌橫渡，我們到江邊時，已經有很多人在爭搶輪渡。學生軍本來是有組織的，但到此時，也就各不相顧，紛紛搶上輪渡，也有人因此落水。但這時江邊小船還很多，江面上還未呈十分慌亂的現象，只是江面上已無外輪踪跡。我們到達武昌，聽說都督府已撤退至城外，軍務府院內已落下敵人從對江射來的炮彈。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在武昌既不能立足，又不明了都督府向何處撤，又聽說外輪均停靠青山附近，還是照常搭客，因此我們徒步跋涉，沿江邊奔赴青山，搭上外輪，回轉江蘇。到江蘇時，南京已經光復。滬軍先鋒隊正擴編成師，師長洪承點原系三十三標的士兵。三十三標在陸軍小學的隔壁，與我們同學頗多相識。因此當我一到南京之後，即加入第七師第二十五團任排長，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肄業。

回憶辛亥，不覺五十年，事過境遷，往事多已不復記憶。撫今追昔，深感革命事業之維艱，勝利得來不易。今天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蓬勃發展，益感到時代推移之迅速，令人更加精神奮發，雖老而不衰，為人民革命事業積極貢獻力量。

日知会在黄冈的活动

程 起 陸

时代的巨輪，飞跃般地轉动，辛亥革命忽忽已屆五十年了。武昌为辛亥革命策源地，許多可歌可泣的事，真是难以尽述，就以武昌日知会而論，大家都知道它本是辛亥革命前湖北省的一个革命机关，曾对辛亥革命起过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现就个人记忆所及，記述日知会在黄冈的活动如下：

日知会原是圣公会內一个閱覽室，是牧师黃吉亭所主办的，一九〇五年夏始由原科学补习所革命党人刘靜庵管理，从此就成为革命党人利用教堂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革命机关。为了进一步鼓吹革命，喚醒民众，于一九〇六年三月重訂章程，才正式开会成立日知会。一九〇七年一月(丙午年十一月)間，刘靜庵等被捕(即丙午之獄)，自此日知会也无形解散了。

当武昌日知会活动期間，吳貢三、殷子衡等人会同留日学生夏占奎、馮維周、邹翼之、吳昆等在团风創辦坪江閱报館，从上海、汉口訂购各种报纸杂志，如《新民丛报》等以及其他新书，供人閱讀，以开民智。同时殷子衡还办了一个半日学堂，对失学的民众宣传时事以及提倡和劝导妇女放足，編写禁止纏足歌，张贴传唱。那时武昌与黄冈、团风取得联系的是何季达，黄冈、团风与武昌取得联系的是吳昆和殷子衡。丙午年春，吳貢三、梁耀汉、殷子衡等在黄

州創辦了“鳩譯書舍”，專門印刷鼓吹革命的書籍。最初印的是由吳貢三、梁耀漢等反復討論在石介所作《孔夫子心肝》一書的基礎上擴充了的《孔孟心肝》一書，闡述春秋大義，辨論種族關係，凡談到滿洲二字的為了避免糾紛，皆以黑點代之。《孔孟心肝》印了一萬多冊，由黃楚玉、張佩紳、吳安吉等人，用竹箱裝好，先後挑運到省城，秘密分發軍學兩界，大力宣傳。以後又有李在良在英山翻印了萬餘冊，運往兩廣散發。當時又有武昌南路、西路高小學生周海珊、黃桐生、熊禮方等常常購買《孔孟心肝》，每次三、五十冊不等，分贈同學。由此革命宣傳工作，達到了空前的高漲。當年暑假梁鍾漢自日本回國後，又到黃州與吳貢三、吳昆、劉昊等翻印《猛回頭》、《做新民》、《警世鐘》、《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德占遼東》、《黑龍江》、《訓兵談》、《革命軍》、《太平天國史》等，由殷子衡密送武昌日知會交劉靜庵再散發軍學兩界。這些宣傳品對鼓動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殷子衡曾以三年苦功，刻了《六洲輿圖》，並預見巴拿馬必有開通運河的可能。當時殷子衡積極宣傳革命，想謀刺鐵良的王怒濤就趁殷到黃岡縣城活動的機會到孝介祠會殷，他們便積極籌劃。湖北巨富劉石清，得知梁耀漢到了黃州，即在揚鷹嶺開歡迎會，到會的有百多人，並設盛宴招待。當梁耀漢臨行時又贈厚禮五百元幫助進行革命。從此黃岡革命更加活躍了。

吳貢三、殷子衡等還經常攜帶鼓吹革命的書籍和傳單到黃岡鄉間，有時也到大冶、鄂城去宣傳散發。他們隨時演說清朝如何專制殘暴，腐化無能，對漢人實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漢族必須起來革命，把清朝統治者推翻，才能把四萬萬同胞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為了激發羣眾的愛國熱情，積極參加革命，殷子衡有生有色地向羣眾們宣講“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故事。在坪江閱報館

里，殷子衡与何季达共同拟了一付对联：“满地烟弥痴虎豹，汉江春暖跃鱼龙”，贴在阅报馆的大门上。在阅报馆的墙上还贴着殷子衡用楷书写的宣传革命的詩：“大地沉淪几百秋，烽烟滾滾血橫流，伤心細数当年事，同种何人雪此仇。”吳貢三当时在黄冈城內教书，殷子衡在团风公立小学教书。他們在課堂上随时向学生灌輸革命思想。殷子衡尤其注意身教，平日言行一絲不苟，对学生态度温柔和藹，从无疾言厉色。他經常对学生讲：“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启发学生的新思想，还作了詩歌要学生背誦。事已隔五十年，我仅能記得以下两首：“新少年別怀抱，新世界賴尔造。伤哉帝国老老老，妙哉学生小小小，勸哉前途好好好。自治乃文明之母，獨立乃国民之宝，新少年姑且去探討。”还有一首是：“黑奴紅种相繼尽，唯我黃人睡未醒。亚洲大陆将沉沒，一曲歌詞君且听。人生为学須及时，艳李浓桃面目姿。蹉跎莫遣韶光老，老大年华徒自悲。近追日本远欧美，世界文明次第开。少年努力宜自愛，时乎时乎不再来。”为了启发学生对清朝的仇恨，殷子衡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編成算术題要学生演算，如清軍在揚州屠杀，一次杀若干人，一天三次共杀若干人？一年杀多少人？二百年的時間該有多少人遭到杀害？使学生腦海中更具体地刻印了对清朝的仇恨。殷在地理課程教学中，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如此可爱的祖国被清朝統治，受列强的压迫，能不痛心嗎？以此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当时吳貢三、殷子衡的革命言行，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他們的学生如詹振華、王鴻麟、秦鏡青、方凤鳴、程起陆等都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实际行动。

一九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丙午年腊月十八日)晚間，殷子衡在

团风公立小学被捕，吳賈三也在黃州城里被捕。在殷子衡被捕的夜晚，殷的学生程起陆即将殷的住处未发散完的两箱子《孔孟心肝》等各种革命宣传品，尽一夜的时间焚燬尽淨。吳賈三、殷子衡二人自一九〇七年一月被捕，一直到辛亥武昌首义时才出獄。被捕后吳在武昌候审所，每隔三五天必提到武昌巡警道的衙門里审讯一次，經常是由巡警道馮启鈞亲自审讯。那时受刑最重的是同时被捕的刘靜庵，死去活来好几次，最后終被杀害。其次受刑重的即是殷子衡了，他坚决不承认刘靜庵就是刘家运，不暴露自己是革命党，也不肯招出誰是和他一起搞革命的同志。虽然正当严冬时期，刑訊时竟将殷上身的衣服脫光，仅留一条单褲，双腿跪在鉄鍊子上，两手上在棚子上，两个衙役用一把細竹条輪流抽打殷的背後和腰部。有时因殷子衡在供詞中諷刺了官府，触动了馮的怒气，馮即亲自对殷毒打，打得他血肉橫飞，鮮血濺到同时被审的梁鍾汉等的脸上（这是梁老亲自对程起陆讲的）。当时有人咒罵馮启鈞：“矮子矮，一肚子拐。矮子矮，剝八块”。也有人說：馮矮子这样殘酷的刑訊，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戴紅頂子（当时清廷官制，巡警道是藍頂子）。

当时被捕的革命党人在獄中虽然受尽了各种折磨，但都表现了堅貞不屈的英雄气概。他們虽在獄中，但与人民羣众是息息相关的。这年冬天，留学日本的同志如夏占奎、馮維周、陈凤池、孙少泉、吳昆、邹翼之等竭力捐款，寄回国内交夏占奎夫人偕同程起陆送到獄中，接济吳賈三、殷子衡等人。殷的学生程起陆經常到獄中去探望。一九〇八年夏，新軍三十一标第一营学兵万禱阶念他們在獄中的痛苦和困难，也曾积极捐款，接济在獄中的李亚东、胡瑛、季雨霖、梁鍾汉等人。这样，使得在獄中的同志得到很大的鼓舞，加強了他們的斗志和信心，同时也无形中联络了革命同志間的感情。

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

李 健 侯

人心倾向革命

一九〇六年我十五岁的时候，由黄安来武昌就学。当时正是唐才常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处决之后，一般知识分子情绪十分激动，根源已久的排满暗潮，经过这件事，更高涨起来了。当时一些禁书和进步刊物，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革命军》、《民报》等等，同学们争先阅读，重视之过于正课。即使是与《民报》对立的《新民丛报》，当时人们也抢着阅读。经过一段时间，推翻清朝的思想在多数同学中滋长起来了。

一九〇六——一九一〇年，我住省立中路小学，同学二百四十多人，其中李祖璈、张寿康和万成桂三个人，都受到同学们、教员、监学和当时以讲理学著称的堂长李熙的特别看待，优礼有加。他们三人的功课并不好，但是喜欢阅读禁书和进步的刊物，有志参加革命活动，不屑于呆在自修室作蛀书虫，因此，大家认为他们是未来的民族英雄人物，所以都尊重他们。张寿康、万成桂和我在一个教室，我常和张、万攀谈或借书，也感到他们具有推翻清朝统治的思想，不同于别的同学专门计较个人的前途。相处之间，无形中我的思想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中路小学肄业的中途，李、张二人退

学，据說是投奔到蔡鐸那里去了（蔡当时在广西）。下学期万成桂也去了。大家都很贊揚他們。首义前夕，詹大悲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題，在《大江报》发表社論（編者按：此文为黄侃所作），获得我們同学和社会上許多人的欢迎和贊揚。这一切說明了人心之傾向革命。

反对借外資筑路运动

一九一〇年冬季，我在湖北省立中路小学毕业，尙未离校，讀到张伯烈、夏道南两人署名由上海寄返母校为反对借外資修筑川粵汉鉄路的宣传文章。张、夏是留日学生，湖北鉄路会代表。文章磅礴而犀利，罵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讀之大快。数日后有素昧平生的錢选青來訪，他自称是騎兵第八标的队官。他对我說：“現在进步青年都参加爭路运动，某日要在貢院开会，你們学校可推派二人参加，务須到会。”我很兴奋地接受了，屆时前往貢院（私立法政学校）开会，会场門首貼的是“湖北鉄路商办协会”几个大字。会上除张伯烈、夏道南講話外，湯化龙、刘成禺等都发了言，語意激昂，羣众大为激动，有流泪的。他們在发言中曾算了一笔賬，湖北全省以三千万人口計，如果每人認股半元，就超过預借外債的数字。在这以前，老百姓曾反对借款筑路，清政府的答复是：“路是要修的，你們有錢，政府就不借外款。”經過这次會議的鼓励和倡議，許多紳商都自愿負責劝認路股，湊足需要的路款。当时并推定了劝認路股的发起人。

不久，我又参加了汉口四官殿的一次会，这个会比前次的会更是有声有色。四官殿高敞的房子，挤得满满的，除少数老年人有坐位，大多数人都是站着。穿制服的軍人几占半数，其余多是学生、

商人等。这次会，除一般的宣传鼓动、討論認股等外，主要的事是推选代表进京請愿。有推张伯烈、湯化龙的，也有推黎元洪、夏寿康、宓昌燁、夏道南等人的，意見紛紜。被推者有的不敢承担請愿任务。一时会场秩序，相当混乱。在人声嘈杂当中，忽見一兵士趋至讲席，拔出佩剑，“咔”地一声，砍落左手二指，大声說：“再有推辞不就，扰乱秩序者，有如此指。”全场为之感动，顿时秩序大定。大家以黎元洪虽为“人望所归”，但現任統領，不宜任代表。最后，推选宓昌燁、湯化龙、张伯烈等四个人(另一人姓名忘了)为代表。

湯化龙任湖北諮議局議長时，对反对清政府向四国銀行团借款筑路的事是支持的。在湖北铁路协会的大会上，湯化龙的讲话，曾历数时政的腐敗，特別严厉抨击当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邮传部把张之洞費了很大力气收回来的川粵汉铁路建筑权，重又送給外人，无非是想在借款时攫取巨額回扣，是媚外肥私，丧权卖国。他号召湖北全体同胞踊跃筹集筑路款項，抵制外債，爭回路权，以救亡图存。会后，大家都說湯議長的主张对得很。

反动統治階級失去了控制能力

辛亥前的几年間，在我們学校里，很多禁书都流行着，学校当局視而不見。他們认为禁閱的书刊，不过是宣传排滿革命，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所以懶得过問。比較开明的老师則认为排滿革命是有道理的，如我們的国文教員包袖斧就是这样說的。总之，在学校內禁閱完全成了具文。在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里面，除旗人外，士兵的絕大多数都参加了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組織，初級軍官也有参加的。这个情况，旗人当上級的当然无从知道；汉人任上級的，明明知道，也不过問。我在一九一〇年，常到二十九

标第三营吳百川(名学斌)处,他当时是一个副目,他和全棚弟兄及正目,都加入了組織。我每次到他那里,总听到他們高談革命的道理。有一次我在百川处,适值出操時間,百川約我随队伍到野外去玩。全队不过三、四十人,由百川率領,荷枪出通湘門,行不远,就停止行进,架枪休息,各人毫无顧忌地大談将来如何举义的事。我是队伍以外的一个学生,他們对我毫不避忌,我觉得他們坦率有余,謹慎不足,曾告百川,不宜这样随便。他告訴我,現在队伍里都是我們的同志,过于顧慮是不必要的。可見軍隊的高級长官对部队內的革命組織,是茫无所知的。

一九〇八年,清王朝西太后和光緒帝相繼死去,依照成例,各學校負責人率領学生穿礼服到紫阳湖皇庙哭灵,但大家不仅不哭,反而裏鬧甚欢。居民一般也是婚嫁如常,反动官厅也未責其违制。

我們学校把历代清帝的名字編印成表,教同學們作文时必须避諱。同学王嘯虎痛恨避諱破坏了字体,不但不諱,而且时常大呼玄暉、胤禛、載湉等不置,以泄其忿,学校当局也无可如何。

以上这些事,說明了封建統治階級到了这时候,已經不能用旧的封建框框来束縛人民了,他們对广大的被統治的老百姓,已失去了控制能力。

武昌起义后的軍隊情况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一举而推倒了当时压在湖北人民头上的总督瑞澂,这主要是湖北新軍的功績。革命的胜利使老百姓欢天喜地,对革命軍怀着感激拥戴和崇拜的心情,他們与軍人接触,有說有笑,絲毫沒有顧慮。軍隊的官兵当时也满怀革命热情,都把老百姓看作一家人,看作同志。老百姓和軍人的关系,变

得极为亲热。三道桥刘家庙附近的战争，前方枪炮声不绝，老百姓都毫不畏惧地自愿帮助运送给养和弹药。起义后的武汉一时显示出革命深得人民赞助和军民一致的新气象。但这种情况的存在为时并不久。

湖北新军原共有约一万三、四千人，这就是以张彪为统制的第八镇和以黎元洪为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当革命形势及川、鄂、湘、粤争路风潮一天高涨一天的时候，瑞澂为防备革命和维持统治秩序，分调新军一部驻鄂北和鄂中各重要地点。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又率领新军一部赴四川，企图镇压四川的“民变”。这样，在首义前夕，驻武汉附近的军队就所剩无几了。武汉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即时派廕昌带大兵来鄂“剿办”（后改派馮国璋）。鄂军政府成立后的重要措施，就是扩大武装力量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这时募兵旗帜和各级司令部的牌匾，满街都可以看到。不到两月的时间，军队已扩充到八九个镇（师）。这些新扩充的部队，除步兵外，特种兵很少，而且人数也多半没有满员。骤然增加这样多的部队，所需要的四、五千名各级干部，主要是下级干部，都由新军留驻武汉部队的士兵充任。这些干部中有不少人自认为这种提升是革命胜利后应得的报酬，认为黎元洪、汤化龙甚至各镇协长官的地位，都是他们赐给的。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因看到几个钟头就把瑞澂打跑了，几天，全省各县都光复了，再几天，各省都响应了，更认为枪杆就是一切，什么组织，什么纪律，都不需要。他们对上级时常不尊重，轻则语言齟齬，重则按枪相向。上级逐渐感到不安，急想恢复纪律和威信。黎元洪则由于害怕革命，也极力想恢复和维护旧秩序，遂委蔡汉卿为戒严司令，实行“大力整飭”，乘机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当时社会上给蔡以屠户的称号，这反映了黎、蔡等

摧殘革命力量的严重程度。

湯化龙参加鄂軍政府的首鼠两端

武昌首义后，湯化龙为形势所迫，虽然参加了鄂軍政府，实际上是持两端的。湯化龙的六弟湯震龙曾亲口告訴我：当汉口战事不利时，武昌城門紧闭，禁止一般人出入，对外通信都隔絕了。他哥哥（指化龙）自备函电稿，使他繞城送至长沙，亲交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这些函电，有的是致譚本人，有的是請譚代发。他見譚后，被閉居密室，飲食供应甚丰，但不准出室外一步。約两星期后，譚始命亲信秘密地导引他离长沙，回武昌。这桩事，充分說明了湯化龙与譚延闓的互相勾結，对革命的两面态度。

羣英会事件

孙武任鄂軍政府軍务部长，恃自己有功，驕下慢上，大家多对他不滿。某月某日，羣英会发动当时湖北人所称的“第二次革命”，来推翻他。这时我在学生軍二营二队充下士，駐长街官錢局。上午約九时許，我值班守卫，忽然枪声大作，正惊异探詢間，本队下士李英向羣众說明是羣英会起义，反对孙武，并称自己就是羣英会的一員，請大家不要惊慌云云。紧张之际，只有加強警卫，以完成保卫官錢局的重大責任。我們的队长高德沛平日对待同学，管教很严格，这时去报告他，找不到人。三个排长都是行伍出身，队长既找不到，他們就挺身与同学共安危，大大地鼓舞了同学們的勇气，頓时好象大敌当前一样，特別显得团结。約十二时左右，我們正在官錢局南北两端放哨，实弹警戒，远見一队人直向我們步哨綫走来，稍为安定的情緒，又复紧张起来了。口号对答无誤，耻他們

接近，曹大把和张排长趋出哨位，視察究竟。等来的队伍逼近了，才知道他們是都督派来帮助我們保卫官錢局的教导团的一队。他們全部穿官长制服、呢大衣，背枪进入官錢局，經排长們說明情况，架枪休息。这些老大哥真有他們的特殊风度，在远处时断时續的枪声中，滿不在乎地毫无拘束地有說有笑。茶点后，向我們道过辛苦，又背着枪稳步而去了。这次事件沒有鬧大，我們队里的李英以后也看不見了。

反洪宪运动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背叛民国，要做皇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当时我們保定軍校的同学都憤慨万端，誓起反对。楊效歐、徐祖貽、何培基和我，約定借假日离校，逕去天津，暫寓张輝瓚在天津日租界設置的招待所，待輪南下。因到医院診病，医院院长日人伊藤在談話中知道我們候船到青島，自动为我們介紹輪船，并借錢給我們买船票，又自称和黄兴是好友，素有金錢往来。我們急于南下，不察究竟，接受了这个素不相識的外国人的“帮助”。临行时，伊藤复备函介紹住在青島的日本人某“照顾”我們。到山东后，我們四人都投入駐坊子的吳天民部，任該部队的教練。这时青島为日本軍占領，反袁部队都駐胶济路沿綫如坊子、周村、濰县等处，实际上都受到日人的監視，甚为不安。后袁世凱病故，黎元洪繼任总统，反袁軍队受黎改編。吳天民部被編为中央宪兵师，原說到平度州进行改編。吳部由日人各車运送到青島时，到車站就被日本宪兵繳械。同学湖南刘君拒不交出手枪，被日人打伤。羣情憤激，多数散去。我也忿然离开了吳部。

这时，譚人凤先生在青島，他虽鬚发皓然，而革命意志甚坚。

他留我住在他青島寓所，并對我說：“黎元洪是個無用的人，不久必被北洋軍閥推倒，還是要革命的。”一直到八月底，看看北京方面沒有發生混亂，他才許我回保定。

回憶此行，有值得研究的一事，就是素不相識的日本人伊藤似乎是很熱忱地幫助我們反對袁世凱的；及袁世凱死，又是日本憲兵誘繳了我們部队的械，真是“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完全是以對殖民地的手段對待我們，既用欺騙手段，又用強力手段，這是深足引為教訓的。

無名英雄吳百川

一九〇五年我到武昌投考中、北路小學，和吳百川同寓，我們年歲相同，性情也合得來。後來他未考取，回黃安住縣立小學。一次他因和同學爭吵，被開除學籍。他認為學校如此處理，是非不明，憤怒之下，準備把學校燒掉。當天深夜，他潛入校內，把煤油潑到教室的木壁上，正在擦火柴，被校工發現了，把他扭到堂長室。堂長陳遠九先生，是丁艱回籍的小京官，縣長為討好他，安置他當堂長。堂長一怒之下，寫了一個條子把吳百川送到二衙里關了起來。第二天，全城震動，都說學校里有人放火，已捉住送到衙里去了，可能是革命黨。縣長親到陳堂長這裡來問訊。大家見事態擴大，恐于學校聲譽和前途有礙，勸說陳堂長不宜將事擴大。堂長考慮到學校的聲譽與個人的前途，寫信給二衙要回了被寄押的學生，索性留個見面余地，安慰幾句話以後，送兩串錢的盤川，叫他回家讀書，明年再來投考。百川接了兩串錢，謝也不謝一句，回到寓處，背起行李，逕到省城（現在武昌）來了。百川是桃花鎮人，由黃安縣城到武漢，桃花鎮是必經之地，他怕被家里人看見，繞小路越過，並未入門。

百川到省后，請人介紹投入右旗二十九標三營充當備補兵，這是一九〇七年的事。他身體壯實，發奮鍛煉，在不到三年的時間，由副兵、正兵，升到副目。

一九〇九年秋季，百川到學校來找我，才知道他從軍的事。這次會見以後，他時常到我寓所來（雄楚樓黃安學社），一談就幾個鐘頭。他見到我讀《明夷待訪錄》一類的小冊子和徐錫麟、秋瑾、章太炎、鄒容等的詩文，就把他的革命活動向我介紹，並說不久就要舉義。因此，我知道他已參加了當時的革命團體文學社，他在軍隊里是一個營的代表，他們隊里的兄弟們，絕大多數是參加了革命組織的。他曾引我到過小朝街某號文學社去和麻城金某見過面，約我常去。我當時無意加入，去過二三次，以後就沒有去了。我也常到他營里去，他介紹我給同營的兄弟們，說我是他的好朋友，不要存心，所以，他們談話對我毫無避諱。

一九一一年夏季，我參加升學考試，仍住學社，除準備幾門應考功課外，時間更有多餘，百川來的次數更多，有時晚間也不歸營。他還注意學社內所住的青年學生如倪季端、汪煥奎等人的思想和愛好。越到後來，他對社內人的談話也越無避忌，無所不談。

起義的前幾天，百川沒有來，大家都很耽心他，懷疑他出了事。八月十九晚間約十二時前後，山前的槍聲響得很緊密，我們知道這是起義了。大家都坐了一夜沒睡。二十日清晨，百川同另一個兄弟騎着馬，來到了學社，全學社的人都聚攏來歡迎他們。百川向我們作了簡短的談話，鼓勵我們要即時勇敢地參加到革命隊伍中去。談畢，他就急促地走了。

百川不久當了營長，來和我商量，要我到他營里任督隊官。我因為不懂軍隊的事，不敢應允，我就在這時參加了學生軍。百川旋

被調到汉口和馮國璋部作戰，戰事失利，退守漢陽，堅守漢陽整整一月的艱苦戰鬥，他是始終參加的，從漢陽撤退到武昌時，他的一營已所剩無幾了。這時，我已轉到學生軍二營二隊，駐官錢局。漢陽失守時，武昌大為震動，黎元洪逃跑了，各機關也星散，居民逃避一空，我曾背槍由司門口步行至保安門，未碰見一個人，可以想見當時情況之緊張。這時百川一營駐大朝街，從某輸送隊補充部分兵員，迅速編整。他來官錢局邀我去幫忙，我勢不能再推，就答應去。剛到營部，奉令開簾洲布防。時嚴冬氣候，連日大雨雪，道路泥濘，難於行走。他帶我到前綫查哨，精神充沛，毫不以為苦。布防就緒，就停戰了。和議告成後，百川的營被編入七協十三標。該標統帶祁國鈞，學生出身，年紀很輕，百川不重視他，情感彼此很不融洽。百川對士兵的教育管理，還是用舊方法，對做錯事的都打軍棍。停戰後，士兵無所事事，犯紀失錯的更多，百川日在醉中脾氣更大，打軍棍日必數起，有請他從寬處理的，他必說：“這都是七娘八老子的人，不這樣就管不了他們。”這也是當時一般軍官對士兵的態度。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了，我得百川同意，去南京考入了陸軍部舉办的“入伍生隊”；後來政府北遷，袁世凱不承認這個組織，改為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我即回武昌南湖就學。這時又與百川見了面，他已以退伍的美名被編遣了。之後，他被任為軍務部科長，他很不痛快，不久自動離職。湖北的局勢變了，黎元洪被段祺瑞親來武昌逼，只身到北京去了。王占元為湖北督軍，凡是有革命嫌疑的人，都被逮捕屠殺。百川在武漢站不住腳，回黃安鄉間，在五雲山桃花大寺聚集同志百餘人，殺豬宰羊，誓師起義，準備攻取縣城以為根據，因人少城堅，未能攻下。他是桃花鎮的地主，毀家以供給養，不

足时，就向邻近有錢的人捐枪捐谷捐款。时间久了，供应不繼，百川率众到李集搜集物資，引起黃岡地主的仇視，勾結黃安县政府向桃花鎮实行所謂“围剿”。百川率众抗击，一以当十，予敌人以很大損伤。最后，敌人采取围困的方法。数日后，同志仅存十余人，粮尽弹絕，百川与余众突围，易服逃到汉口，散处六甲街和大智門車站附近的旅館，仍繼續从事活动。桃花鎮之役，百川的八弟和家屬数人被捕后牺牲，房屋被匪兵付之一炬。百川的五哥在粵汉路南湖段任土工队长，收容同志作土工，以掩护革命活动。狗腿子伪装革命，百川警惕性不高，于一九一六年冬天不幸被誘捕，数日后，就被劊子手王占元枪决了。

鄂革命軍被迫退伍經過与 陈佐黃、王耀东、彭紀麟烈士事略

魯 祖 軫

(一) 段祺瑞陰謀解散湖北革命軍經過

我在一八九四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县城里一个半耕半讀的家庭。我兄弟四人，先兄祖昶、祖轍均在湖北新軍第八鎮当兵。我在家中讀書时接先兄家信，得悉新軍中人材济济，尚有出路，乃于宣統元年四月投笔赴鄂，投効第八鎮十五协步队三十标三营后队二棚当副兵。宣統二年二月間升为本队五棚正兵。嗣于宣統三年二月由本队三棚正目王宪章、二棚正目彭紀麟介紹加入文学社。武昌起义的当夜，参与进攻督署的战斗。武昌光复后，暫編入第四标三营任随員，进行招募新兵的工作，旋又被任为十标掌旗官。黄兴来鄂后，十标任总指揮部的总預备队。汉口战事失利后，队伍轉至武昌下游的两望地方布防。我标旋編为北伐第一軍第三师第五旅第十团，开赴祁家湾附近两路口地方暫駐。南北和議告成后一月，又开赴云梦县城，就地整訓。

我軍正在云梦县訓練之际，忽于民国二年六月被迫令全軍退伍。我起义后，輾轉充任鄂軍第三师步兵第五旅第十团第三营軍需长，营长是彭紀麟。奉令退伍时，彭营长向我們同志讲述此次退

伍原因云：“黎都督与袁賊世凱暗中勾結，往来密電商議好了，黎去北京供职，都督一席派段祺瑞接充。外部軍政人員都不知道此事，一个叫唐仲寅者，跟黎都督多年，亲密接近，知道内幕。老段（指段祺瑞）到鄂省后，即密与黎都督洽談，黎都督随把鄂省大都督印信移交老段手中，秘密乘車上北京去了。我鄂新軍革命党人拼头顱，洒热血，夺取政权，历尽艰难困苦，始有今日曙光，不料黎元洪随意移交官僚执掌，这无异‘开門揖盜’。老段是一个十足的老官僚，口蜜腹劍，很快的我鄂革命軍人一定要吃大亏，今后只有另想法革命，或者不干，躲避风险。”言下不胜嗟叹。

湖北軍政大权一落入段祺瑞的手中，他首先設法解除革命部队的武装。他借口鄂省軍隊有十万之众，軍餉庞大，人民負担过重，且这些軍隊都是临时招募而来的，良莠不齐，又經過阳夏战役，自以为有功，驕气横生，象这样的队伍，不惟不好帶領，他日对地方也沒有多大好处，声言必須把这部分队伍退伍，回家耕田，另按征兵法規，在各县市征集有家有室的良民入伍，服常备兵役，再施以严格訓練，可成为担任国防軍的劲旅，这是一举两得。至于对革命有功績的各級官长，一律保留原职原薪，預备充任征兵的正式各級軍官，不訖一人失业。但各級官长自愿退伍者听之。并訂有各級官长退伍条例，如司务长退伍，只領一次退伍金三百元，排长四百元，連长六百元，营长一千二百元等等，并发給都督退伍執照一张，銀質圓形奖章一枚，还照其原有階級册报陸軍部按职补授实官，在实官証书令未下达以前，可由各該师长先給予領薪官証明文件一份，以俟陸軍部实官令頒发到鄂，各該員可持师长发給的証明文件，径往都督府領取实官委状，每月还有几成固定薪水可以終身領取。段用这样的欺騙宣传，談得天花乱墜，而我鄂的天真的革

命軍官不惟信以为真，并說这个办法很合人心，于是馬上服从命令，先将士兵退伍。兵士一旦退伍完了，官长成了光杆，赤手空拳，說話也不灵了，甚至于不敢說話了。段乘势施以吓唬威胁。各級官长見大势已去，又无人作主支援，只有忍痛退伍。我在退伍时担任营軍需长，因是軍佐职务，只拿退伍金三百元，領有黎都督退伍執照一张，师长寶乘鈞补授实官委状一件（这两件迄今仍保存，惟圓形銀質奖章一枚早年失落了）。我营官兵在云梦县退伍分別时，多失声痛哭，不忍离去，处此境地，可叹亦复可恨。段仰承袁賊鼻息，出此退伍詭計，不費一兵一卒，使我鄂革命軍正式队伍八个整师和其它特种部队共計十余万人，很快就解除了武装。

（二）討袁曲折和陈佐黄、王耀东、 彭紀麟三烈士事略

民国二年六月退伍后，即返武汉，在汉口玩了半个多月。当时与亲密同志彭紀麟、陈佐黄、王耀东，相約王翰飞及震旦报館職員王某共計六人，假武昌斗級营迎宾馆十九号房間，共同商議，预备一道前往江西省参加李协和同志领导的討袁之役。經商討数次，大家决定同路出发。不意出发那一天，我和彭紀麟同志两人因为他事耽擱，未曾赶上。他們四人則一同到汉口搭火輪起程了。嗣聞悉輪抵九江时，被李純的爪牙登輪检查，盘查出是革命党人，一律被捕。經审讯后，陈佐黄、王耀东、王翰飞三人遇害，王某被释放。彭紀麟聞訊后，即返随县老家去了。我同本队副目徐雄楚（陕西省人）一路到九江，意欲了解陈佐黄同志等遇害情形，并欲由此前去参加討袁战役。及抵九江，見风声很紧，不能前进，暫住吳上达办事处。此时吳上达在九江粮台轉运处做事。吳房县人，原是我队

一棚正目，是本營老管帶杜錫鈞（此時任漢口鎮守使）介紹給李純的。我們兩人打聽到陳佐黃等當時就義的情形，知屍體掩埋官牌甲地方，就密往查視。見掩埋草率，感念舊雨，情同手足，不覺暗中悲泣一場。我們探悉江西方面戰事緊張，不好通過，住了六七天，辭別吳上達，仍返武漢。

此時武漢風聲亦緊，段祺瑞不時派出軍警隊伍，到處捕拿我鄂退伍軍人，凡在湖北新軍當過兵的都很难幸免。視此情形，實難逗留武漢。徐雄楚同志洒淚而別，由漢口回陝西省去了。我這時候非常狼狽，既無川資返家，亦無地方可以栖身。後遇友人介紹，在花堤街江蘇會館內一個雕刻古書木版的工場住了兩個多月。課事不成，不時有地方警察來查詢人口，就離開武漢，只身到沔陽、監利、應城等縣混迹了一個時期。及聞武漢已經解嚴，始返還武漢，由友人介紹，補了一名站街警士，借作掩護，聊以餬口。以上是赴贛未成前後遭遇流亡的情況。下面再談革命烈士陳佐黃、王耀東、彭紀麟遇害的情況：

陳佐黃，號蘭田，湖北黃岡人，前清湖北陸軍特別學堂畢業，湖北陸軍第八鎮十五協步隊三十標三營後隊五棚正目。他是新軍中文學社的骨幹，常對我輩進行革命宣傳。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宣布起義後，蘭田同志即率全棚兄弟全副武裝集合待命。拂曉前率隊進攻總督署，奮勇領先，幾遭敵兵擊中，幸在身傍之彭紀麟同志拉過牆邊，方免于難。起義後任八標第二營管帶，迭次率隊進攻陽夏，戰功優異。民二年退伍之際，旅長劉佐龍曾派蘭田為征兵正式營長以資籠絡。蘭田立時拒絕云：“官僚頭目段祺瑞用陰謀詭計誘餌黨人，暗殺黨人。我絕對不為此小惠違背革命初旨，受其收買。”堅決不就營長職位。退伍後赴贛參加討袁之役，過九江時被

捕。审讯时，兰田昂然不屈，大声疾呼，我就是革命党人，并大骂袁贼世凯祸国殃民，你们这一班从属爪牙，寡廉鲜耻，非法捕人，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临刑时，骂不绝口，慷慨就义。就义前有人叫他说出自己是汉口镇守使杜锡钧的旧部下，可以图救。他答复说：革命党人不怕流血，摇尾乞怜，非我革命党人所为，宁可就义，不苟幸生。观其就义结语，真是大义凛然，虽死犹生。

王耀东，号旭初，湖北竹山县人，前清湖北陆军特别学堂毕业，性情爽直，潇洒活泼，善谈谐，学术优长。与陈佐黄同志同队，充当本队六棚正目，是文学社中坚份子。首义后任民军第五协十标教练官，执掌全标官兵教育事宜，计划周详，训练有方。迭次率队参加阳夏战役，立功不少。退伍返武汉，在武昌斗级营迎宾旅馆十九号房间与同志密商赴赣参加讨袁。时施洋同志（号伯官，系旭初同乡）曾来旅馆数次，大家思想一致，畅谈甚洽。施同志并祝我们远行革命成功。孰料旭初中途即被捕遇难，壮志未酬身先死，殊深痛惜。同时被难者王翰飞同志经历不详，未能专述传略，实为憾事。

彭纪麟，号雪青，湖北随县人，前清湖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其人胆大心细，沉着坚毅，学识优异，作事不苟。与陈佐黄、王耀东同志是同队，当二棚正目。为文学社骨干，担任本队代表，兼任本营代表。平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和本队王宪章、王文锦、陈佐黄、王耀东、李锡成、吴上达、罗良骏等共同努力，竭力把我队革命力量秘密组织健全，按本队一、二、三排九个棚的次序，每排布置排代表一人，每棚布置棚代表一人，再按一、二、三排成立一个学术研究小组，选热心革命的同志掌握。由各同志乐捐经费，有每月交银子三、五钱者，或有交五百文者不等，作订购书报及活动费用。常利

用学术研究小组組織寻觅适当时机,如夜自习时间,或逢下雨术科改学科时间,或星期日下午在体操場自由作体操的时间,集合一起,由担任学术教員王宪章、王文錦、罗良駿等随时分別出席,先讲軍事学,如初級战术或野外勤务、射击教范、步兵操典等,择要讲述一遍,作为掩护。乘时灌輸革命大义,先从远处說起,例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再把《猛回头》等小册子选其要点讲述一番,然后介紹閱讀这些书籍。繼而談到目前时局,举出清朝官吏贪污腐化,欺压人民,如惨杀长沙一带飢民,掠夺四川铁路属于百姓私有的股金等事实。又讲到清廷与外国人訂立不平等条約,允許外国人在汉口各大城市設立租界,把持关税,割地賠款等一切丧权辱国的罪行。又举出新軍中許多不平等的事情,如旗兵双粮双餉,坐享权利,旗籍官长往往借小故侮辱毒打士兵,不讲道理。就是这样举出真凭实据,鼓吹要革命的大义。辛亥首义以前,本队剪去发辮者已有十八名之多。統計本队战斗員兵共計一百二十六名,已有六十余人即占二分之一的人参加了文学社。其余一半,除少数旗兵外,对革命多表同情。这些可以說是彭代表等組織宣传革命的成果。辛亥年八月十五日,起义事宜布置就緒,原拟当日发难,不意被清吏偵悉,四处派队捕人,新軍中同志有被捕者,有暂时离开队伍者。正处此一发千鈞之际,彭代表不顧一切危难,設法派出方維(彭之同乡)、謝涌泉(沙市人)、刘光楷(荆門人)等,送信联络十五协各标营代表和工程八营代表,于十九日上午到我队飯堂集合开会。会上大家一致主张馬上干起来,但对誰先发难則爭論至再。彭代表立时主张由工程八营发难,其理由是尔时工程营派有部分队伍守护楚望台軍械庫,又不容辭。当晚八时左右,工程营同志首先发难。一聞枪声,彭代表首先大喊站队,即率領赶到楚望台,配

备弹药，欢迎南湖炮队同志拖炮入城，拂晓时带队奋勇进攻督署，大获全胜。光复武昌后，彭任民军第五协十标执事官，作战功绩优异，奉黎都督令调为本标三营管带官，迭次参加阳夏战役。嗣后参加北伐第一军。民二年六月退伍，即同祖軫等来武汉，赴赣未成，接着闻知陈佐黄等三同志在九江遇难，随即回家乡随县去了。回家后依然进行倒袁工作，不意被当时统治湖北的王贼占元的爪牙偵悉，于民国六年元月被刺杀于乡间。此事系乃兄彭廷燮（号理初，系存古学堂学生，大书家，因雪青兄关系，与我交好有年）来武昌任教职时告诉我的，并悉事后曾上訴屢屢，均遭否决。方明白彭代表被人刺杀，乃王贼占元的詭計使然。雪青参加革命，奋不顾身，在武昌起义中立下卓越功绩。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远值得人民之纪念。

記鄂軍杀端方与回援武昌

丁 振 華

路潮扩大与端方入川

清宣統元年，廷議修筑川粵汉鐵路，向四國銀行團訂約借款，以國家歲入稅厘為抵押品。川鄂各界人士聞之，羣情洶洶，奔走呼號。鄂人公議，先設協會於漢口四官殿，署名會員者多至千人。几經曲折，公推劉心源（字幼丹，嘉魚人，清翰林）、張伯烈（字亞農，襄陽人，留日法學士）、宓昌燾（字丹陔，漢陽人，清進士）三人為代表，入京請願。三人入京後，除聯銜折請都察院代奏外，并偕至郵傳部辯論百端，相持不決。張伯烈憤極，身懷利刃，徑赴郵傳部長官之室，席地而坐，露宿七日。宓丹陔見張亞農效七日秦庭之哭無效，乃寫一信致徐世昌，有“逆賊袁世凱，權臣徐世昌，賣路兼賣國，予及汝偕亡”等語。

川汉鐵路經爭回民有商辦。當協會開會布告民有之際，突有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步隊第四十一標兵士陶勛臣者，躍上講台，拔出所佩刺刀，切斷手指，寫血書勸眾集股，可見人心之奮發矣。宣統二年，清廷又將四大干綫收歸國有，遂激起爭路風潮，以至武裝起義。

川汉爭路風潮擴大，清廷起用端方為欽差大臣，督辦川汉鉄

路，带兵入川弹压。宣統三年夏，端方到湖北。秋七月，指調湖北陸軍步队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全标暨第三十二标之一营（缺两队）随行入川。带队官为陸軍步队第十六协統領邓承拔、陸軍步队第三十一标統帶曾广大、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管帶李錦标、第二营管帶陈荣鍾、第三营管帶萧国斌、第三十二标之一营管帶董卓泉。并派第三十一标学兵楊毓林为欽差行轅护卫官，与第三十二标之董卓泉一营互相連絡，以通声气。

合計入川弹压官佐目兵共二千人，其中多系参加秘密組織，受同盟、共进各会孙武、李作栋（即李春萱）、季雨霖、胡祖舜、邓玉麟等之运动聯絡者。如陈鎮藩、王志祥、李紹白、王寿勛、王龙标、任永森、魯伯超、赵士龙、馬名揚、邹世忠、馬慕良、谷玉亭等皆是。人数众多，不能一一备載，姑从略。孙武在軍隊中号召力大，附和者众。陈鎮藩（字育武，湖北安陆人，日本警官学校毕业，与孙中山先生过从甚密，从事革命运动有年）即为受孙武运动之首要人物。其他魯伯超、李紹白等次之。赵士龙、馬名揚、任永森、谷玉亭等又次之。

第三十一标在出发前，軍中革命党人开秘密會議。會議議定：“我等尙在滿人統制之下，革命工作務必严守秘密，审机觀变。一切压迫，暫为忍耐。为行动慎重計，只好接受曾統帶命令，随队开拔为是。”时留营同志王訓民、黃元吉等，約定以密碼暗号通電訊。如事敗，就电“母病愈”。事有成功希望，就电“母病危”。要是完全占領武昌，就电“母病故”。代表留营同志秘密餞行者，有邓玉麟、楊玉如、胡祖舜、黃元吉諸人。宴会毕即囑云：“各入川同志要好好注意端方行动”等語。此时我軍尙无杀端方之計劃。

七月二十日，各部队在武昌开始乘輪西上，到宜昌齐集待命。

七月底，將齊集宜昌之各部隊，區分為四個縱隊，西向成都進發。第三十一標本部及第一、二、三營，編為三個縱隊，均由宜昌乘木船至重慶待命。第三十二標之一營（缺兩隊），為一縱隊，擔任欽差行轅衛隊，直接受欽差行轅指揮。步隊第十六協司令部殿後，未列入行軍序列。

端 方 在 四 川

原來端方奉命是“勦辦”四川保路同志會，而一入川境，聞湖北革命聲勢浩大，川省保路同志會又遍地皆是，故見風轉舵，變“勦”為“撫”。每過一州縣，即搭台講話，遍貼大字布告，以圖收拾人心。并說：“逮捕下獄之川紳蒲殿俊、羅綸等，已電請釋放矣。”

端方由宜西上之前，清廷曾密諭岑春煊督川。岑見武昌革命風聲吃緊，知難而退。端方由宜西進後，清廷又密諭授端方為四川總督。端方始終未奉到督川密諭，趙爾丰已先知之，乃對端暗布天羅地網。

八月二十六日，路過奉節縣，第三十一標第一營士兵聽得武昌起義傳聞，抗命不進。端方被迫，乃於防范之中施以籠絡。當即集合隨行隊伍，閱兵講話，許以每士兵獎給功牌及銀質獎章，并電請嘉獎，以鼓士氣。九月二十三日，各部隊齊集重慶。端方令各部隊散駐於郊外無人區，嚴禁士兵進入城市，以防洩露武昌革命消息。

入川各部隊自由宜昌西上以來，無論水路旱路，均是隨到隨走，不許逗留。尤其在奉節以上，防范更為嚴密。先到重慶之各部隊，在沿途風聞湖北革命消息，將信將疑。至後愈傳愈真，眾料武昌定有來電，必為端方扣留。各部隊代表暗開會議，僉以不敢妄動

为戒。我軍是跟随端方入川部队，誠恐川省同志会同志与我軍发生誤会，致起冲突。我軍亟应先杀端方以表明态度和立場，一面再去电报响应武昌。准备杀端方之动机即从此时始，然无整个計劃及进行方針。不但在未入川前无此計劃，即既入川后亦无堅定决心。陈鎮藩为人忠厚有余，能力不足，加以旧官长如普民康、查瑜等代陈鎮藩參謀一切，所以弄得軍紀廢弛，誰也不能統御。

九月二十八日，部队进驻資州，欽差行轅及卫队驻扎城內天后宮。第三十一标第三营由管带萧国斌率領，先向成都进发。第二营(缺两队)由管带陈荣鍾率領，經泸州、叙府向自流井、富順分进。第三十一标統带曾广大奉端方轉来川督赵尔丰命令，率領全标开往資阳，进勦瓦子坳变兵(約一队)。斯时資州附近之資阳、安岳、威远一带，同志軍蠢起，各县紛紛告急。曾統带当率本标第一营进驻威远之高石場，并指揮川省派来之巡防两营，合力先攻威远。据报資、威一带，山势險阻，隱有伏兵，所带土式火器甚多，部队无炮兵配合作战，恐难达成任务，暫取守势。并捕获对方兵探多名，訊后方知全系民兵，当不加杀害而俘虏之。一面电請成都飞派炮兵前来增援。

部队到达資州时，武昌首义消息軍中尙疑信參半。惟端方早已稔知，秘而不宣，日与統带曾广大相接納，并令参与軍事之胞弟端錦(即外传之端祿)与曾統带訂为兰譜交。会梁耀汉由成都密函曾統带，告以武昌首义情形。端方即于曾統带口气中，探得真实消息，已无可再密，故日夜筹划应付策略。突有一夏翰林(湖北人，忘其名)，系与端方至交，由成都赶来資州見端方，即告曰：“尊駕万不可輕进成都，赵尔丰已安排牢籠，准备尊駕进成都时即加危害。”

鄂軍杀端方

九月二十九日黎明，曾統帶率隊正在与威远民兵相持不下之际，忽奉統領鄧承拔鸡毛急信云：“端欽差有意勤王，請貴統帶迅將所屬各部隊，尅日調回資州集合。”同日下午，第三十一標之一、三兩營及標本部，均奉令趕到資州集合。至夜間，端方號令官長集合，即与下級軍官拈香拜盟，以联情感。未开言以前，先痛哭一場，即出武昌來電相告。電文是“城陷督斃”。念畢泪如雨下。接云：“我們大家今日无家可归，只有率帶全軍，取道川北廣元，由陝西过河南，連合袁世凱以壯声威。且我与袁世凱有儿女姻婭关系。”并云：“我本漢人，姓陶，原籍浙江，先輩人于清初投旗”等語。当向各部隊遍送陶方名刺，以資慰問，用此籠絡詭計，迷惑軍心，实际是欲帶走鄂軍，繞道陝、豫，联合北洋軍隊，夾攻武昌義軍。端方在資州已下行軍命令，发表行軍站口里程表，准备輕裝向川北出发。此事关系入川鄂軍生死存亡問題，急如星火，各部隊代表甚为焦急。

十月初一日，入川鄂軍中各同志知道武昌首义确实消息。因为鄂軍跟随端方入川彈压，同志軍恨之刺骨。武昌首义后形勢轉变，南北异勢，夏之时、張培爵独立于重慶，踞关自守，我軍回援武汉，勢不可能。进取成都，又为赵尔丰所拒。同志軍布滿川境，我鄂軍孤軍深入，进退維谷。若以端方勤王計劃，率我鄂軍夾击武昌義軍，入川鄂軍虽愚，絕不会俯首听命。我軍各部隊代表于深夜召开了緊急會議，誓不承認端方在資州所召开的軍官独立會議。即在資州公举步隊第三十一標第一營督隊官陳鎮藩为大汉国民革命軍統領。陳鎮藩就职后，树立大汉国民革命軍旗帜，乃誓師曰：“恪遵孙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达到排滿目

的。”并約法三章：一、誓杀滿奴端方；二、剪除发辫；三、回援武汉。事前已密令欽差行轅护卫官楊毓林与卫队董卓泉所部紧密連系，以便屆时响应。斯时曾統帶知事已突变，密送端方路費銀五百兩，示意逃走。而各部队代表以时不可失，先下手为強，一致决心先杀端方以响应武昌。此为临时措施，事前并无此計劃。

十月初二日，陈鎮藩命令王占林、田长炳、李紹白、王志祥、卢保汉、孙世栋、任永森、邹世忠、陈宜亭、王龙标、馬名揚、谷玉亭、张鴻基、馬慕良、刘承儒、姚鴻圣等三十余人为护令員，全副武装，执令旗，整队到天后宮行轅請出端方，当解至天上宮（第十六协司令部）。端方坐在丹墀中間，端錦侍其旁。端方見形势不好，哀告曰：“我們都是同胞，素极亲愛，若要关餉，自流井的四十万兩銀子，馬上可到。今天饒兄弟一命，将来国家定有相当办法。”各武装同志当答曰：“您今天之所以有此遭遇者，是您先輩人种下祸根，投入旗籍，殘杀汉人。你可知道对汉人之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薙发令、文字獄，摧殘我汉族无所不至。这些血債，你是偿还的負責人。”端方俯首无言，連喊兩声“福田救我（福田是曾統帶的字）”。这时，經事前公推之正法执行人卢保汉、任永森、孙世栋、陈宜亭、谷玉亭等六同志即用指揮刀将端方斬首。賈智刚同志复杀端錦。

杀端方后，陈鎮藩即通电响应武昌，張貼大汉国民革命軍布告，改年号为黄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川省軍民，夹道欢呼，人心大快。我軍旧官长中之統領、統帶、管帶、队官、排长以及軍佐多縋城而逃。端方弟兄之尸身当即厚予装殮，并将端方弟兄之首級兩顆，函于木匣內，以备押回武昌献繳鄂軍都督府。

十月初三日，由成都开来炮兵一队，携带管退炮兩尊，系端方前因进攻資阳、威远电請成都赵尔丰派来配合作战者。陈鎮藩急

派喻洪胜接管炮及弹药、装具，并将该炮队原来官兵就地遣散，迫令离开资州。同时大汉国民革命军实行剪除发辫令，并派兵把守资州各城门，严行检查出入行人。

鄂军回援武昌

十月初四日黎明，鄂军为回援武昌，由资州整队东下，夜宿内江县。时有新编炮队兵士管其仲者，被土匪利用，窃去炮表，并将该队餉款卷逃。当下破获，讯明正法。同日晚，内江军政府面请我军暂留以支持该县军政府成立，盖因当地红帮哥老会恃众阻扰。陈統領以我军援鄂甚急，未便迟延，即允出为调解。当束请哥老会两匪首（清武举）。以调解无效，即将两匪首逮捕，拟押送重庆军政府解决。该匪党羽甚众，一时内江城内各店房楼上，均隐藏火器土炮，执火以待，图候我军集成路上纵队，即行袭击。我军即商请县商会，对城内匪众，每人发给制钱一串，勒令出城。其事遂寝。

十月初五日黎明，我军由内江东下。至大足县属邮亭铺打尖。前我军西上时，路过此地，有押运军需之军士两名失踪，今始偵知已被杀害。又据偵查报告，邮亭铺上土匪聚集，火器土炮均布置于各店房待发，其情形与内江同。陈統領以该土匪两次图歼我军，决不能再事容忍，即下令先将随解之两匪首斩首，并捕杀悍匪三十名，以儆其余。

我军由隆昌、荣昌、永川东下，沿途商民输金助餉，挂灯结彩，欢迎欢送。十月十二日，军次白市驛（距重庆六十里），派代表向重庆军政府交涉临时驻地。并由重庆军政府约定，先送白綢二千幅，以备十五日入重庆城时鄂军官兵佩之，以資識別。届时，重庆都督夏之时、副都督张培爵，派代表郊迎十余里，浮图关上渝军三千人，

列队相迎，并送我軍紋銀三十万两，犒賞酒肉，供应軍糧，公誼私情，至浓且厚，我軍感謝之不暇。乃夏、张兩都督居心叵測，始以金錢酒肉相利誘，繼以強硬語言相压迫。一則曰截留我士兵，再則曰截留我枪炮。陈統領及諸代表在宴会上，答以武汉战事正烈，援鄂在即，所囑万难应命，諸希鉴原。夏之时曰：“貴軍如果一定要走，我渝軍即以炮来相送。”陈統領即答以：“只要貴都督不願重庆生灵涂炭，我軍即退避三舍，然后严陣以待。請貴都督再考虑之。”不欢而散。陈統領恐有不測之变，当召集我鄂軍各部队开了一个緊急會議，决定安全回援武昌之策。僉議組織敢死队，以資应付。于是在士兵中挑选勇敢者一百六十人，尅日成立敢死队一队。命令王志祥为敢死队大队长，李紹白、田长圻、汪启貴、邱錦文、姚鴻圣、李国梁、孙世栋、郭长富、唐金城为支队长。

十一月初三日，我軍由重庆朝天門乘木船三十余艘下駛，敢死队前后掩护，揚旗鳴号，順流而下。初五日，我軍抵万县。万县刘都督（忘其名）系湖北黄冈人，早已派代表远道来迎，鳴礼炮二十四响，列队致敬，优予犒賞，筹送盐款銀三十万两，以助湖北軍餉，并随同陈統領鎮藩到武昌。

自十月初四日从資州旋师东下，經過之东川各县鎮軍政府及民团商会，俱要求我軍將押解之端方弟兄兩顆首級，开匣参观，有时并为照相。沿途押解兩顆首級，白天有軍队負責，夜間則指定司令部丁振华、周寿世二人看守。

十一月十三日，我軍抵宜昌，越数日，轉駐沙市候命。陈統領即令敢死队前往援助安襄郢荆四郡招討使季雨霖，会师沙洋，克服四郡。

十二月初十日，我軍由沙市乘快利輪回抵武昌。斯时也，上海

和議成，漢陽、漢口尚有清軍未撤，為避免衝突計，我全部官兵由鮎魚套登岸，駐紮前武備學堂。嗣奉令將我軍改編為鄂軍教導團，任命陳鎮藩為少將團長，查瑜為副團長，普民康為參謀長，其餘官佐銜名從略。

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結

万 鴻 喈

民社的成立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卿，夏口柏泉人，远在庚子年即参加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軍之役，以后經過日知会的失败，始由东北而至日本，同张伯群、邓文耀、刘公、焦达峰諸人于同盟会之外，組織共进会。复同焦达峰先行回国，分別在两湖地区联络同志，成立共进会分会，中經一度敗露，后又恢复，在武昌首义时，也起了一定作用。鄂軍政府成立，孙任軍务部长，这是軍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一部。孙武沒有为革命奠立基础，相反却侮慢同志，接近旧日官僚，拉攏孙发緒等人。黄兴任战时总司令，孙不仅沒有全力支持，且嫉妒黄的声誉在他之上。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自以为武昌首义有功，特地赶往上海活动，希望得一总、次长的地位，不料南京政府无从位置，因之引起孙对南京政府的恶感。这样一来，孙便一意孤行，在上海拉攏大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培植自己的势力。老同盟会员刘成禺新自美洲回国，黄兴問刘在美国学什么东西等，刘亦深为不满。于是孙、刘合作，在上海成立民社，与同盟会公开对立。据说章太炎、湯化龙等虽未加入民社，但他們都是贊助孙武的。接着，孙武就与在上海

所結納的一批人偕同回鄂，又在漢口成立民社分社；事實上，民社是以湖北為重心的。民社理事長是黎元洪，孫武、劉成禺、饒漢祥、張伯烈、孫發緒等任常務理事，丁笏堂任總幹事。和孫武有密切關係的李作棟時任鄂理財部長，李曾一次撥給民社活動經費五萬元。謝彬所著《民國政党史》說：“民社者，擁黎元洪為中心之政團也，以盧梭《民約論》為根本主義。其目的在圖共和政體健全之發展。其地盤為黎元洪直屬之湖北派。其幹部為藍天蔚、孫武、張振武、張伯烈、劉成禺、寧調元、饒漢祥諸人。”關於主義是說不上的，更說不上共和目的。如果說也有所謂政治綱領的話，那就是反孫倒黃，捧黎擁袁，借以達到個人升官發財的目的，實際內容就是如此。謝著所舉幹部人物，似無藍天蔚、張振武、寧調元諸人。因為藍與孫武並不接近；張振武曾在民社查帳，大說黎的壞話，謂不應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用，且黎、張之間，素不協調；寧調元與黃興關係極深，而以後寧又是被黎殺了的。其重要社員據韓大載同志回憶，尚有馬鞍田、李組紳、覃達方、丁笏堂諸人。建都地點問題發生時，民社首先反對建都南京，這是露骨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是袁世凱所求之不得的。可以說，民社就是袁世凱在湖北的代辦人。就我所知，湖北籍的國會議員，湖北的師旅長，以及各部首腦人物，多系民社主要分子。這些議員入京時，送川資，買車票，均由民社代辦，民社也就成了袁世凱在武漢的辦事處。忠實於革命的同志，要反對孫武，自然要反對民社；首義之區所以鬧得互相傾軋，革命力量日漸削弱，民社應該首負其責。

民社對袁世凱幫忙，袁當然“實獲我心”，進一步又示意黎之左右，說副總統是全國的副總統，當理事長也應做全國性政黨的理事長。於是民社為基礎，在一九一二年五月成立了共和黨。共和

党的理事长，不消說仍由黎元洪担任。

黎袁的勾結

黎袁勾結，为之牽綫的有三个湖北籍的反动家伙，这就是浠水的湯化龙、广济的饒汉祥、安陆的陈宦。可以說，湖北的革命事业是在他們手上断送了的。当然，幼稚的革命党人也不能辞其咎。現就我所知所聞，概述如下：

湯化龙字济武，以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又留学日本，清末湖北諮議局成立时，調充議員，后又为副議長而議長。所有議員虽然都是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但他們既以議員身份代表所謂民意，也就迷惑了一般人，連革命党人也不例外。湯化龙曾經公开发出呼吁各省諮議局响应武昌的通电，但他接着在柯逢时宅中又用密电向清廷表示：“化龙不甘心附逆。”事为党人偵悉，沉不住气的张振武，就对人說非杀他不可。湯知道在武汉对自己不利，又幸而为黃兴所賞識，即在汉阳失守前夕，同李书城、黃中愷、陈登山等一道赴沪（黃后一日才走）。南京政府成立，湯任陸軍部秘书长。湖北党人恐黃兴随其术中，适我因事赴沪，蔡济民即叫我过南京时向黃密揭他的为人行事。那时陸軍部办公处在南京鉄湯祠丁公館，我到陸軍部时，先延見我的恰是湯化龙和万声揚。我心里想，我正为湯而来，却先就遇着了，我只好說，必須面报总长。于是黃便亲自接見了我。我見湯不在跟前，就向黃說，湯如何玩弄两面手法，黃当即說：“有这种事？我晓得了。”言下显得惊异。湯旋即到了上海，是否因此离开，我不得而知。但此后湯即完全倒向袁的一面，为袁策划一切。

这时陈宦已先取得袁的信任，即由陈向袁先容。湯对袁說：湖

北党人正在分化,孙武組織民社,其目的即在与同盟会对抗,加以运用,裨益非浅。袁当然高兴万分,并囑湯設法扩大組織,成为政府与党。袁犹恐黎、湯号召力不够,又叫湯化龙赴日本,迎梁启超回国;与国民党势均力敌,成为袁御用的进步党,即由此而来。袁得到这些人的捧場,便为所欲为了。湯先被选为众議院副議長,后又被选为参議院議長,其活动費即由袁付出一百万元之多,湯蕓銘亦由他的哥哥化龙的关系,被派充湖南督軍,一內一外,成为袁手下的紅人。化龙知恩报恩,特囑乃弟注意防止国民党的活动,以便更加取得袁的信任。以后湯蕓銘在湖南大杀党人,对文学社的同志楊王鵬、李岳嵩等加以非刑处死,即其一例。袁世凱并不以此为滿足,他还示意湯化龙、饒汉祥、陈宦三人,彻底摧毁湖北党人势力和湖北的八师軍隊。在袁,不如此不能安睡;在湯等,不如此不能步步高升。湯由副議長而議長,又由教育总长而內务总长,总算甚为显赫了,但据接近湯的人說,湯还想組成湯內閣哩。其所以极尽捧閩之能事,就在于从中取利,湯氏兄弟的同年随县李愚菴先生(曾任过湯蕓銘的秘书)对他兄弟們的事經常道及,他之所以离开湖南,也是因湯蕓銘的暴行而促成的。

饒汉祥字苾僧,原在福建以佐贰候补,武昌起义回来,住在集賢館中。时党人蔣秉中任館长,謝应欽任考驗科长,如何录用,照例要通过考驗。他自以为是举人而謝是未第秀才,常以“童生考举人”为奇恥大辱,其討厌革命党人,不难想見。其同乡彭汉遣以其会做文章,就介紹給馮亚佛同志說,都督府如需要文牍人員,饒一定可以胜任,就这样,饒就脫穎而出。原任秘书主任楊玉如訂有办事規則:秘书起稿,書記繕正。当然有的書記也是能拟稿的。饒乘机挑拨其間,楊被迫离职,饒便取而代之。据馮亚佛同志說,饒入

府时,衣被不全,与馮同榻。不久之后,饒便接近都督,因为善于揣摩,每先拟好文电,再向黎建議,經黎同意,稿即呈上,因而大得黎之贊賞,常对別人說:饒某真是才子,文章又快又好。黎于是特給資添置衣物,且升为秘书长。饒为試探黎之信任程度,假意辞职返里,黎不知是計,生怕饒离开了,特派小兵輪載之返回。饒知黎可供运用,即着着进行其反动勾当。民社成立,饒为理事之一,饒劝馮亚佛加入,馮沒有答应,饒也就对馮疏远了。这时黎已把党人抛在一边,所与共机密的不过饒汉祥、胡朝宗等三数人;有时汉川人卢本权得悉一二,又以轉告亚佛。某次袁电黎,略謂党人中如有囂张之徒,能对付則对付之,否則可开列名单,由他邀其来京处理。卢以告馮,馮即向同志們說,最好不要入京,免遭不測。結果凡屬調京党人,不为袁所收买,即为袁所杀害,孙武即是被收买了的,张振武即是被杀害了的。

袁、黎之間,关系日趨密切,有些問題需要有人轉达,黎認为饒可以作为他的代表,袁又要饒到北京去。饒到京代黎向袁报告湖北情形之后,袁向饒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尽量裁減湖北軍隊;第二,对首义諸人严加防范;第三,黎副总统应早日入京供职。并說:先給你二百万元,就这样办。饒因此又成了袁布置在黎左右的一个私人,黎之一言一行,袁无不洞悉。饒回湖北,当然遵命而行,于是向黎說:“湖北年青的党人都不可靠,你在湖北住着很危險,不如到北京去比較安全。”最后連黎元洪也不得不入京,而饒本人則在牺牲別人的基础之上,作了湖北民政长。刘成禺曾为此事对馮亚佛、万鴻喈說:“饒汉祥、陈二菴把黎元洪卖了二百万元。”

陈宦字二菴,日本士官生,原随錫良在四川、东北任軍事要职。袁世凱为总统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兼參謀总长,陈以次长代理总长

事务，成为袁、黎之間的牽綫人。袁虽老奸巨猾，对陈則言听計从，所有湯化龙、饒汉祥之接近袁氏，均由陈为之先容，为之引見。袁对湯、饒，总說你們可和二菴商量。袁对革命党人之排除，对黎元洪之入京，对黄兴之自請撤銷留守府等等，悉由陈設計促成。袁、黎間之文电往返，經常由陈会同饒汉祥在京或在武昌拟好，然后分別由袁、黎具名发出。章太炎一見陈宦即說：“此第一人才，然亡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虽不免有所夸大，亦頗有几分道理。

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

閻幼甫

革命党人的各种組織及其活动

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人組織了許多团体，各自为战，汇合成流。除了华兴会这个众所周知的組織以外，单就笔者个人参加或联系过的，就有下列十几个单位：

体育社：是易宗羲、閻鴻轟、閻鴻飞（即作者——編者註）、文經緯、王猷、焦达峯、楊世杰、蔣名蓀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太平街賈太傅祠。招收学生四十多人，以培养体育人才为名，实际是革命党訓練軍事干部的一个組織。

南薰社：是譚人凤、曾杰、李洽、閻鴻飞、文斐、何陶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浏阳門东門捷径。革命党人曾在此制造炸彈。

卷施社：是吳孔鐸、謝介僧、刘崧衡、洪荣圻、王伯存、文經緯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水风井胡家花园，悬有富訓商业学堂筹备处木牌以为掩护。

图強社：是文斐、洪荣圻、黃桐陔、李德純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府围后。

观海学会：是龙璋、文斐、周震麟、黃昌濬、吳作霖等所組織的，成員多数为留日学生，設在长沙北門西园。

积健社：是陈作新、易堂龄、李郭儒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培元桥。

嚶鳴社：是成邦杰、閻鴻燾、楊守箴、袁天錫、袁世鐸、罗杰、洪兰生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路边井定中栈。

南社分社：是傅熊湘、阳兆鯤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西园。

日新社：是安定超、王鑫涛、李金山、朱先杰、楊玉生、刘芝德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小吳門外軍路側，悬挂日新成衣社招牌，备有縫紉机两架，集結了多位成衣工人，并且联絡了部分軍属妇女，力量充实，业务发达。湖南光复时所用十八星軍旗和号召旗^①都是由日新社日夜秘密赶制的。

四正社：是焦达峯、焦达人、彭友生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太平街孚嘉巷。

兰芷书局：是楊任、王炎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玉泉街，为西路革命党人通訊的总机关。

义記灯鋪：是李繼芳、湯昆伯、黄昌濬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藩城堤。制造炸彈所需的弹壳，就是由义記承办，分配到四城各灯鋪加工制作的。

集成矿务公司：是謝介僧、刘崧衡、刘观海、罗毅等所組織的，設在长沙織机巷。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盟員散布各地，长江流域各省并没有同盟会的支部組織。当时在湖南的同盟会盟員，多由三数个同志組織

① 号召旗，亦称“标旗”，就是标語旗。是紅地黄字，沿以黑边。旗上所标为：“兴汉灭滿”、“建立共和”、“自由平等”。这些标語都是由同盟会的战时統籌部制訂发到各地會員手中，由會員在发难时交給各革命团体应用。

一个团体。如前述体育社、南薰社、卷施社、观海学会等組織中都有几个盟員在內。同盟会在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确曾起了核心作用。当然，其他革命組織也都起过大小不同的作用，只因他們“退藏于密”，不为外人所知；革命告成，民国建立时，那些志士仁人，不談往事，既不居功，也不要名，更不做官；以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勛局局长馮自由在稽勛工作中，查得一些确有功勛事迹的人名而找不着受勛的人。

革命党人因准备发难，开过几次重要會議。會議的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也沒有固定的召集人，很少用书面的开会通知；間有书面通知，都是用的隱語。如：“請于某时到某地赶道場”。那时的隱語，称开会为“赶道場”，称宣传为“上賭場”。个中人一看自然明白。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起，开过会的地方有：北門外开福寺、岳麓山云麓宮、楊家山启新小学、沙湖桥楊氏宗祠、紫荆街福寿楼等处。各次开会都因警戒严密，大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在福寿楼开会，因地点在城市中心，外面风声又大，被当局偵得，比較危险。但当軍警开到之时，會議已經結束，只有几个未散去的人在喝茶，軍警側目而視，不敢动手逮捕。

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工作

自萍、浏、醴起事失敗以后，革命党人的情緒更加激昂，宣传鼓动工作，也更积极。各地报纸杂志，由于官厅监督甚严，不能登載激烈言論。革命的宣传工作，就不能不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时值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反对铁路收归国有的羣众运动汹涌澎湃，革命党人便紧密结合这一运动进行宣传。开演說会、发传单是当时极普通的做法，但頗有一些动人的場面。記得有一张用

“湖南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发布的传单(“保路同志会”是四川的一个组织,这份传单是卷施社的同志假借名义发的),内容只有几句话:“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无良心?你愿当亡国奴么?请加入救国运动。”寥寥二十几个字的白话文,是清末少见的新文体,简明扼要,很能打动人心。散发传单的人,有时遇到警察也发给他们几张。警察读了传单,也有受感动的。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每天发传单的络绎不绝。有人说:看传单比看报好,因为传单的内容很多是报道武昌革命的消息,是报纸上所看不到的。湖南军警当局非常恐慌,他们出了许多维持治安的告示,对革命党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倘有乱党敢于聚众煽惑,不服制止,准其格杀勿论。”可是革命党人并不怕这些恐吓,还是满街散发传单,随地讲演。每次讲演的时候,只要讲演的人一开口,不到一分钟就聚集了一大群听众。可怜那些岗警,忙着做驱散工作,东头的人驱散了,西头又聚集了許多人;赶走了北面的讲演者,南面又出现了散发传单的人,累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宣传者听任警察指着“格杀勿论”的告示,向他们恫吓,也不理睬。我曾看见有一个警察对一位宣传者央求道:“老爷们!请你们走远一些,不要使我们为难。”当日警察的尴尬处境,于此可见。

较大规模的讲演,常常是在庙宇中的戏台坪举行。当演戏么锣的时候,忽然走出一个人来对观众大声地说:“请慢走一步!现在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一下。”接着就看形势、看对象,趁机宣传一阵。记得辛亥年阴历二月十七日的晚上,长沙自治公所举办一次讲演会,地点在玉泉山戏台坪。事前曾由自治公所发出通知,所以那晚到了好几百听众,加上到庙里看热闹的人,把整个戏台坪挤满

了。在台上講演的人有何雨农、閻鴻飞、文經緯、曹政典諸位。講的內容是揭露清政府將筑路權收歸國有、實際是準備出賣給外國人的陰謀和罪狀。說到激昂沉痛處，台下掌聲雷動，聽眾中有許多人淚如雨下。忽然羣眾中有一个人帶着嗚咽的聲音跳起來高呼：“我們不當亡國奴，我們愿同你們去和賣國賊拼命。”接着又有許多羣眾自發地喊着：“我們決不當亡國奴！”當講演正在進行的時候，巡警道和長沙縣、長沙府的軍警已經手持燈籠擠在玉泉山東西兩門，準備拿人。曹政典看到情況嚴重，便大聲對正在講演的閻鴻飞說：“伯外公病危，一舅派人來找我們說話。”老閻向東西門一望，心中也已有數，急忙說幾句收束的話，退到休息座上。曹政典向閻、文兩位說：“東西門不好走，我們往台下中門走試試看。”三人一個接一個地走向中門。中門雖合門，却沒有上鎖，也無人把守。大家喜出望外，出門往息息相關（即現在的息相街）急奔，回頭不見追兵，不禁相視而笑，庆幸脫險。後來何雨农對姜詠洪說：“玉泉山向由東西兩門出入，每年只有二月十八、九日，六月十八、九日，九月十八、九日才開中門。那天曾開中門打掃中門內外，不曾上鎖，所以閻、曹諸人竟得因此脫險。”

革命黨人的兵器來源和策反工作

革命黨準備用于發難的兵器，只有手槍、炸彈、馬刀、槳鏢、短劍（即匕首，俗稱“小寶”）和鳥槍，為數很少的步槍是向逃兵購得，埋藏在僻處，以待大舉時，再起出應用。一九〇六年萍、瀏、醴起事時，華興會託日本人運過三批步槍，只有一批六十枝的平安到達，其餘兩批都在中途被軍警查出沒收，所以決定不再運進步槍。但是步槍為作戰的主要兵器，是少不得的。戰時統籌部指示：惟有運

劲军队反正，就连人带枪都有了。以后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扩充革命的武装力量的。

手枪是日本造“六子连”，由宋教仁在上海购买，交日商轮船公司代运来长。辛亥五月运到的二百枝，是由谭人凤随船运到长沙，起存在南门外碧湘街日本人所设货栈内，直等到发难的前一夜，才由各同志持条起出。

炸弹是自造的。由李洽、黄昌濬、閻鴻飞、曾杰四人制造。所用药品，由谭人凤在上海购回一些，其余是閻鴻飞在长沙南門正街商务印书馆购得的。弹壳是黄昌濬在藩城堤义记灯铺定制，由义记分配到各灯铺在两天两夜内赶制出来的。制造的场所就在东門捷径李洽所住的房子里。制造炸弹是件很危险的事，在制造过程中，李洽伤了左掌，閻鴻飞伤了左眼，没有象湖北的孙武那样炸成血人，几乎送命，已算是幸事。

马刀、梨鏢、短剑是革命党在黄花市、焦溪岭、嵩山寺等处设立铁铺，招收铁匠制作的。这些开铁铺的老闆和伙计，都是四正社社员，所以没有走漏风声。

为了瓦解敌军，扩大革命武装，争取更多的同盟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和巡防营中，进行了许多工作。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只有二十五混成协一协（那时的协相当于现今的旅），混成协辖步兵两标（四十九标和五十标）、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缺一队）、辎重兵一营（缺一队）。这些新军都是革命党联络的对象。新军中的上级和中级军官几乎都是些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他们脑海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象蔡鳄、朱瑞、吴祿贞、张绍曾、赵声、蓝天蔚等富有革命思想、又敢于斗争的人，在湖南新军的中上级将领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前进分子很

多。他們很想看一些革命書刊，可是無法獲得。革命黨人只好向上海訂購《民呼報》和《天鐸報》，轉送到各營隊去，充作他們的精神食糧。負有聯絡新軍任務的同志，想盡方法和新軍聯絡。有幾次得到教會里一位黃牧師的支援，由上海和漢口請來善於講演的名人朱少屏、曹亞伯諸人，在史家巷講演。所講的多是外國新聞，影射中國的黑暗。許多言論是帶有強烈刺激性的。講演後有時放映幻燈片。在講演會舉行以前，由聯絡人員到新軍中去進行聯絡，秘密贈給入場券。每次到會的十之七八為下級軍官和弁目。在幾次講演會中，負有聯絡責任的同志，展開了交朋友的活動，結識的人，逐漸增多。從此，革命的引綫和軍隊結上了頭。在楊家山小學開聯合會時，新軍的下級軍官僅到幾個人，而正副目則到了三四十人。這些到會的弁目，後來都成了革命軍中的標統或管帶（就是團營長）。

巡防營是當時的一種舊式軍隊。可是他們的兵器多數已換得漢陽兵工廠製造的七九新式步槍，雜牌洋槍也有；雖然子彈口徑不同，但每杆槍都是能夠用於作戰的。巡防營里的中、下級軍官，多數是加入幫會的。焦達峯所領導的四正社，早在巡防營中扎下了根子。巡防營軍官趙春霆、劉玉堂、袁國瑞、甘興典都和焦達峯有關係。文斐也是愛和軍人拉交情的，曾經幾次請客為焦達峯介紹，更使革命黨與巡防營中級軍官之間獲得一種默契。湖南光復那一天，革命黨組織了聯絡隊和慰勞隊向巡防營送臂章。先由聯絡隊（自己右臂帶有白布臂章）拿着白布臂章，見巡防營的官兵，立即笑臉上前說一聲：“總爺！辛苦了！”隨將臂章替他們帶上。這些舊軍人都喜笑顏開地接受了臂章的贈與。此時，聯絡隊和軍人互相鼓掌志慶，羣眾也鼓掌祝賀，有些店鋪自發地燃放鞭炮，熱烈慶祝。

这样,长沙的巡防营就迅速轉到革命方面来了。

湘鄂义軍的进军和岳州的光复

辛亥年三月武昌會議,两湖革命党人原約定在是年八月,两湖同时发难;一旦确定了起事日期,則在三天以前,用密电互相联系。当时商定了一套隱語和密碼:以“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淪于夷狄;揮戈举义,快团結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三十个字为初一至三十的代替字;以“祖父故”三字代“发难”;以“祖母故”代替“机关被破获”。如电报上說“祖父故,促义弟归”,同志們一看,就知道是“十九日发难”;若說“祖母故,促举弟归”,就是說“革命机关于十八被破获”。此外还有一些隱語和密碼,暫不多說。辛亥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武昌发难,是因为彭楚藩、楊宏胜、刘尧激三位同志被杀而激成的,这个日期并不是两湖事前商定的发难日期。焦达峯、閻鴻飞、楊任都是参加武昌會議的人,曾和孙武、蔣翊武約好,不管誰先发难,发难的省得到成功,則未及发难的省必須于十天之内发难,作为支援。湖南发难比湖北迟了十二天,并不是湖南的革命党人失約,而是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当时革命党人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八月二十七夜,长沙的革命党人临时在西园吳作霖家中开会,决定由閻鴻飞去武昌和湖北方面联系,报告湖南发难准备的情况,并向湖北要求派兵支援。閻鴻飞乘日本商輪去武昌。湖北軍政府即决定調派李树芝一协革命軍为援湘义軍,由湘鄂义軍总司令閻鴻飞指揮(在武昌商談时,对閻鴻飞的名义,初拟称“援湘义軍总司令”,蔣翊武主张改为“湘鄂义軍”,因为部队进入湖南作战,便成了两省的事,所以出发时改为湘鄂义軍总司令)。并派高級參謀向海潛、王自民随軍參贊。另調吉星、立中、翔鷗等四

条小火輪为軍运之用。九月初一，湘鄂义軍在嘉魚收編了两营湖北巡防营。初三光复岳州。岳州的光复，是传檄而定的。記得当日湘鄂义軍总司令对岳州的檄文，是用一幅一丈二尺长的白竹布写的，叠成摺式；上面有隶书“露布”二字，很象西藏的哈达。揭开“露布”，里面写的是：“中华民国軍政府湘鄂义軍总司令圖为传檄事：痛昔朱明暨緒，衣冠淪于犬羊；清寇入关，岭嶠遭其蜂虿。浊乱华夏，箝制軍民。滿賊为災，普天同病。凡所侵攻之地，必恣荼毒之威。須知天道好还，况复人心思汉。本总司令率师伐罪，除暴弔民；岂覓尔公尔侯，只期保种保国。尔駐岳文武官員同是汉人，自应同申敌愾；只要易帜易心，卽是同袍同泽。共襄此时之义举，以待他日之策助。檄到如律令！”末署黄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二檄。檄文是墨笔楷书，字如碗大。在“露布”上盖有四寸見方的朱印。由李树芝統領随带执事官、馬弁共十人向吳鎮台、卓道台传檄。因为李統領曾在岳州駐防，对于岳州的軍政各方人員都很熟悉，所以派他担負这个任务。先是，岳州在九月初一已經得到长沙光复的消息，官吏都很恐慌。忽接到圖总司令的檄文，卓道台和吳鎮台、岳州府知府和巴陵县知县开会商量，决定欢迎革命軍入城。九月初三日，岳州城头已高悬十八星革命軍旗帜。岳州就这样和平光复了。

岳州光复后，地方新旧勢力的代表人物都請求圖总司令以岳州軍政分府名义就任岳州都督。圖說：“岳州无設立軍政分府的規定，都督名义更不可隨便使用。我可派陈标統暫駐岳州，和地方当局共同維持治安，靜待焦都督的命令。”圖鴻飞布署完毕，隨即乘吉星輪直駛长沙。

长 沙 光 复

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峯、闾鸿飞两人。那天,焦不在长沙,即由闾鸿飞陪同去会南薰社、卷施社、图强社和积健社的同志;又介绍他们会见諮議局的左学谦和常治。左学谦请了一些諮議局的同事作陪,在他家为蓝、庞接风。席间谈了很多武昌起义的情况,这对諮議局的人们转向革命,起了促进作用。蓝、庞到长沙的第二天,由安定超、李金山、刘芝德诸同志约了些军队中的日新社的积极分子在楊家山小学开会,听湖北代表的报告。蓝、庞两位是青年,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同志们听了,极其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九月初一长沙发难,是经过缜密的筹划和扎实的准备的。革命党人在发难的前一夜,都紧张兴奋得终夜不能合眼。初一天刚黎明,就有各部革命同志汇集在预先指定的地点,齐向总目标——撫台衙門前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占领了撫台衙門。

惟有占领軍械局的任务,比较艰巨。这个任务是由闾鸿鑫、成邦杰、吴作霖、曾杰、常治、王猷、楊世杰、蔣名蓀等五十多位同志承担的。当革命党人由两路并进,达到軍械局附近时,就有事先派好的手缠臂章的联络队队员,徒手走入局門,要会卫队官长,并将腋下所夹的白臂章赠送卫队,请他们反正。卫队长还在犹豫,忽听得局左局右有很多人在喊:“快些缴械!”接着就发出了轰隆的炸弹声和达达的手枪声。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接连喊着:“缴枪!缴枪!”卫队长慌了,不敢抵抗,又无法逃生,只喊:“莫再进攻,免得起火,我们投降。”联络员很镇静地说:“你们把枪架好,退入卫兵室休

息待命，我替你們保險。”隨即將袖子一抖，扯出紅白兩鑲的聯絡旗一揮，大喊一聲“得！”，只見進攻的手槍隊應一聲“勝！”（“得勝”是當日的口令），就拥入軍械局，先收下搭架的步槍，由手纏白臂章的革命黨人換用步槍，接替守衛。這時，革命黨已請出原來的衛兵隊先在局前整隊，隨由聯絡員請他們到附近的館子吃點心。這是出發先一夜就商議好了的做法，這時像演電影一樣地一幕一幕順次序演完了。占領軍械局成功了。除負有警衛軍械局責任的同志而外，闕鴻燾、成邦杰等又率隊伍向撫台衙門去會師。

此時，由小吳門、瀾陽門進城的隊伍，已達到撫署的東轅門，由北門進城的隊伍也同時達到西轅門，足見聯系工作做得很好。預先擬定的常治等四位代表進入衙門，要見撫台余誠格。相見後，代表對余說：“請撫台贊助革命。”余誠格說：“我從不同你們為難，至於如何贊助革命，還得等我想一想。”隨呼他的武巡捕拿出早已預備好的白布，親筆書一“汶”字，命手下人懸掛在撫署前坪的桅杆上。吩咐快預備點心，請四位代表用茶。他自己便先告退，進內宅去了。四代表隨即出衙，走到“護國佑民”牌樓前面，和各革命同志相見。大家見撫署掛了順風旗，知道已不必動武，可免流血，歡聲雷動。老百姓原來就心癢爛地方，此時看到撫台衙門掛了降旗，就紛紛燃放鞭炮志慶。不多時，全市一片鞭炮聲，大家都說：“革命成功了。”

余誠格退入內室，即匆忙帶着家眷在後牆打開一個竇口，逃往小西門外某洋行。革命黨明知余已逃走，也未追趕。革命黨原有命令：對於撫台衙門的人，只許出，不許進。余誠格的眷屬還沒走盡的當兒，革命黨已有一隊把守竇口，執行許出不許入的命令。起初，任其携走行李，後來有些差人亂搬東西外出，才禁止隨帶物件。

撫署衛兵多人都換便衣，陸續走出。撫署漸漸寂靜得像座古廟一樣。這就是清朝在湖南的最高統治者所演出的最終一幕。

巡防營統領黃忠浩，是起義時敵方高級人員中唯一被殺的一個人。湖南首義前夕，憲政派的人原想推舉黃忠浩為總司令，曾經龍璋同文斐、吳作霖等人去會黃忠浩。文斐向黃進言，只要他反正，革命黨願推他為總司令。黃忠浩不但不接受文斐的好意，反而一本正經地教訓了文斐一頓。吳作霖看到話不投機，就對黃忠浩說：“人各有志，不必相強，你不參加革命，是你的自由，還望莫和我們為難。我們告辭了。”第二天湖南革命爆發了，革命軍由小吳門進城，正遇黃忠浩親自出外視察變動，調遣隊伍。革命軍並不認識黃忠浩，忽然黃的馬弁胡某大呼：“黃統領在這裡！”隨即一刀梟了黃忠浩的頭。原來殺黃忠浩的人，早已加入革命黨的四正社。事後，譚延闓曾說過，黃忠浩的馬弁殺他，是為哥哥報仇，因為胡某的哥哥是被黃忠浩殺掉的。某日，龍璋向友人追述往事，他說：黃忠浩和他來往甚密，黃曾表示可以在湖南自由行動，他才同文斐和吳作霖去找黃談話。結果却變了卦，弄得不歡而散。黃當晚會親到龍璋家對龍說：“我是會看相的，相人的有作為和沒有作為，甚准；今天同你一路來找我的文、吳諸人，品貌平常，氣色灰暗，我看出他們是決不能成大事的。”黃並對龍璋進忠告說：“您也要謹慎一點。”

推舉都督的經過

起義前，大家討論都督的人選。闕鴻飛說：“在武昌聯席會議時，已經推定焦達峯為都督。”但焦自認年紀太輕，要推譚人鳳擔任。湖南各革命組織，對於譚人鳳多不認識，仍主張推焦達峯。九月初一在全城鞭炮大作，慶祝革命成功的時候，大家齊集在諮議局

开会，討論推举軍政府的負責人。陳作新向焦達峯說：“你當都督，我來當副都督。”焦達峯說：“原議沒有副都督的設置，我託你當都督就是。”這是在會場公開的言論。焦達峯的人緣比陳作新好，當場就有人大喊：“不能託，不能託。”黃鎮和陳作新素來相好，就說：“還是設正副兩都督的好。”便向常治說：“請你宣布一下。”常治的嗓音極高，就唱道：“公推焦達峯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大家一陣掌聲，就算決定了。焦都督提議：推譚延闓為民政部長，閻鴻飛為軍務部長。有人說：“閻鴻飛現在不在湖南。”焦說：“他很快就會回來，可先由閻鴻燾代理。”革命黨人中認識閻氏兄弟的人多，又是一陣掌聲，作為決定。當推參謀部長時，譚延闓推薦原湖南軍事參議官劉邦驥擔任，陳作新隨說：“很好，很好。”大家沒有表示異議。會議至此告一段落。在歡聲中，大家齊向撫台衙門集合，再商各司的組織。

撫台衙門變成了都督府。隨後都督宣布李洽為秘書監。并設顧問廳、督勸處、主計處。有功人員一律安置在顧問廳和督勸處等候調派。又決定成立陸軍四鎮，以余欽翼為第一鎮統制，趙春霖為第二鎮統制，易堂齡為第三鎮統制，閻鴻燾為第四鎮統制。新政權的組織機構和人事安排大致如此。

中華民國軍政府和都督府等名稱，都是同盟會事先規定的，各省光復後，一律採用。湖南光復時，却鬧過一個笑話。譚延闓當了民政部長，民政部所出的頭一張布告，署銜為“中華國民軍政府湖南民政部”。那時革命剛剛勝利，“中華民國”四個字在人們的腦子裡，還是相當生疏的。一般老百姓搞不清楚，並不奇怪；而身任民政部長的譚延闓竟不懂得，幾乎使人無法相信。民政部秘書擬稿時，原來寫的是“中華民國”，譚延闓在圓行時，用筆一勾，成了“中

华国民”，交到总务司刻印，张贴全城。成邦杰发现后，对譚延闓說：“中华民国錯成‘中华国民’，太笑話！”譚延闓說：“你才是笑話！”成邦杰气憤极了，便去告知文斐。文斐上街看了布告后，再向譚延闓說明：“民国”是对“帝国”而言，就是說把帝国反正过来，成立民国。譚延闓听了老文的說明，說道：“我总以为我不錯，竟錯了！謝謝你的指教，并請轉謝成先生。”隨即借另一件事，印出一份加大的布告，加貼在那张布告上面，用以遮羞掩丑。

革命党和宪政派的一場尖銳斗争

湖南光复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参議院。这个机构的設立，是以湖南諮議局譚延闓为首的宪政派向焦达峯都督提出的。九月初一夜里，革命党人齐集在都督府开会，到会的人因为筹备发难，好几夜不曾合眼，一两天沒有好好吃飯；眼見軍政府的組織有了头緒，不免松了一口气，只想回家去休息一下。譚延闓不是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才被邀到諮議局去开会。一些崇拜旧社会名人的先生們，抬出他来当民政領袖，而譚延闓野心未足，想把諮議局变成临时参議院，便利用大家精神疲乏的时候（他自己是向来吃得飽、睡得好的人），施展他的陰謀。譚延闓說：“革命告成，我們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設議會，一則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則可以聚集各方賢达，集思广益。”焦都督当即問大家意見怎样？曾杰和吳孔鐸都說：“可以設一临时参議院。”只有文經緯認為：“議會是應該設立，但現在就設，未免为时过早；我們的一切設施，都处在草創时期，此刻設置議會，可能对于革命政府的工作，发生牵制。”大家在精神十分疲乏中，对于文經緯的发言，沒有注意，就匆匆忙忙，随随便便地决定設立了。

第二天一早，譚延闓將參議員名單提交焦都督，請秘書監即發聘書。當天下午，譚延闓就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議長。諮議局改名臨時參議院。議員中多數是舊諮議局的議員，還有一些和譚延闓有勾結的士紳，其中也容納了極少數的革命黨人。選舉結果，譚延闓當選為議長。文經緯（他也被聘為參議員）當時站起來說：“已就民政部長的譚部長，以行政領袖不能當議長。”譚延闓說：“我辭去部長就是。”這時，外面有人對陳作新說：“美國的參議院議長是由副總統兼任。你可向參議會提議。”陳作新隨即向參議院交涉。參議院的答复是：“軍人不能當議員。”譚延闓果然向都督辭部長職，經焦都督慰留。譚辭部長不脫，又不肯辭議長，就用混水摸魚的辦法，來一個兩全其美。

參議院要奪都督的權力，就提議制訂一個《都督發令條例》，規定參議院有權規畫軍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送參議院審議同意，加蓋院戳送還，才可發交各屬執行；未經參議院蓋印的，各機關得拒絕執行；又參議院認為應興應革事宜，可先行議決送請都督發交各屬執行；參議院的決議，都督不同意時，可以送還請求復議，經復議後，已蓋院印文件，都督不能再持異議，應即執行。這個條例草案傳到都督府，譚人夙就說：“參議院要奪都督的權，不行，不行！他們胡作亂為，應即先行取消參議院。”於是一場尖銳的鬥爭展開了。參議院那些陰謀家就到處散布謠言，誣毀革命；并挑撥陳副都督和焦都督的關係，搞得滿城風雨。九月初四，閻鴻飛由岳州趕回長沙，初五，就湖南軍務部長職。憲政派的人對閻說：“參議院因為都督專權，正想法將都督的權力移到軍務部。你可從中消除都督對《都督發令條例》的阻力。”閻鴻飛知道說話的人用意所在，只好回答：“我剛回省，還沒有聽到都督提及此事。”初

六日，參議院開會討論《都督發令條例》，他們請都督到參議院發表意見。焦都督要閻鴻飛代表出席。當時會場氣氛很緊張。譚延闓首先簡略說明本議案提議的經過和理由，宣布應對“條例”作詳細的討論。有一個姓彭的議員說：“這個條例，為的是保障民主，防止獨裁。議會越有權，國民就越幸福。大家應該贊成通過這個條例。”接着又有一個議員作應聲蟲，說了一些議會的尊嚴，議會為國民謀幸福的廢話。譚延闓說：“請都督的代表閻部長發表意見。”閻鴻飛說：“我是軍政府的代表。軍政府對於這件議案，覺得非常嚴重。現在是革命的開創時期，東、西、南三面都是敵人，我們要对敵作戰，一切都應置於軍政府之下。議會是明智的，不應干涉都督執行軍政軍令的大權。照文明各國的慣例，議會在戰時對軍事从不牽制。軍政府一定尊重議會。將來有媾和訂約等事，當先請議會通過，然後執行。至於將都督的軍令先送參議院審議，實際上窒礙難行，應該撤銷提議。”忽有一位議員說：“我們是‘臨時參議院’。‘臨時’就是表明革命性。革命的議會自有其革命作風。防止獨裁，就是革命。”閻鴻飛說：“把獨裁的头銜，加于軍政府，只能說是笑話。”譚延闓只好說：“軍政府既另有主張，本案暫且擱置。”

這件陰謀奪取都督權力的議案，鬧了一陣子，結果雖然“擱置”了事，然而鬥爭接踵而來。革命黨人都是胸懷磊落的，提到權利，便覺可恥，一言不合，即行引退，對於世路的險惡和敵人的陰謀，并無警惕。不久，便發生了焦、陳兩都督被害的事。真是慘痛的教訓！

焦陳殉國

都督府的衛隊是九月初二日組成的。由軍械局撥來新步槍一

百二十支，又在被服厂領到全新的服装。初三，就被陈作新副都督将人枪分去一半，另組織卫队第二队，駐又一村訓練，作为副都督的卫队。

都督府的門禁，因新成立的卫队肯負責任，盘查較严。那时一些对革命有功的人，居功自大，觉得太受拘束，好些人对都督說：“現今清朝已被推翻，再无人敢于反抗革命。府門門禁太严，有点类似独夫的作风，而对宾客出入太不方便。最好訓示卫队，凡佩有符号或由佩有符号的人陪同出入的，免于盘詰。”焦都督也认为民国时代，不应有旧衙署的官气，即时命令卫队长，以后只注意符号的有无，不要盘查过严，态度更应客气，以发揚自由平等的新作风。卫队奉令后，自然对警卫放松了。不过十天，就酿成匪入府門不曾阻止以至都督被戕的慘剧。

九月初十，都督府忽接报告，北門外和丰火柴公司有許多人挤兌（和丰火柴公司发有鈔票，流通甚广，素著信用；这次发生挤兌，显系有人故意制造事端），陈副都督亲率卫队二十人前往弹压，行至文昌閣附近，被預伏在那里的反革命匪徒所戕。

其时，另有反革命武装匪徒百余人，进至都督府，先繳去卫队的枪。其中有一个軍官模样的匪徒指揮十多个武装士兵直入都督办公室，将焦都督拥出府門。焦都督問：“你們要怎么办？”匪徒說：“要杀你。”焦都督說：“要杀就在这里！”說完，就在都督府前坪立着不动，昂头用两眼直望着高悬的自由幸福旗，任匪徒一陣乱刀砍死。这位实年二十五岁的少年革命英雄，就这样为国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段經過事实，是当日焦都督的一位差遣彭福生亲見亲聞，对我說的。曾見有某种記載說焦达峯临难前說了許多年願話，那是

不真实的。

彭福生还亲眼看见匪徒用马刀在焦都督尸体上去掏他的口袋，并割下衣襟一块，蘸着血向照壁上写下：“焦达峯系匪首姜守且冒充，应予处决。”这个匪徒手中还拿有一张纸条，看一个字，往墙上写一个字。写完，又向尸体看一看，踢几脚，才结队往东而去。老百姓从九月初一起，就对焦都督怀有好感，忽见被杀，又说是土匪冒充，一时弄糊涂了，不晓得革命究竟是搞些什么。

焦、陈被杀的事情传出后，立刻就有新闻记者到处采访新闻，打电报到汉口、上海。所以当时的报上都说：“焦达峯系匪首姜守且冒充被杀。”听说长沙本地的报纸在九月十一也登载了“焦达峯系姜守且冒充”。还有些记载说：“杀焦、陈的人是黄忠浩的旧部，为黄忠浩报仇”，也是不确实的。

有个传说，军务部长阎鸿飞也是匪徒要杀的对象之一，被他见机逃脱了。实际上阎鸿飞当时由又一村一扇朝东的大门走出，经过巡道巷（又一村东面一条东西小巷，是旧日贡院和撫署相通的巡查队的交通道）的时候，还从后面飞来一弹，击中裤裆，裆上打成两个小洞，皮肉毫未着伤。好险，好险！另一说，梅馨等原拟将阎鸿飞一起杀掉，因为阎鸿飞兼湘鄂义军总司令，知道他和湖北的关系密切，有所顾忌，不敢下手。这似乎颇近情理。但是飞弹何来？则是疑案。

焦、陈被戕害后，不几天，街上就盛传都督被杀是梅馨干的事。梅馨原是混成协一个管带，军政府已任他为标统。梅不满意，向焦都督表示要当协统。焦都督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说：“可以升协统，编入第三镇。”梅馨因第三镇镇统易堂龄从前地位比他低，不愿受易指挥。焦都督说：“那么，就编入第四镇。”梅又说他与阎

鴻蓋素昧生平，不愿共事。梅的希望是当独立协的协統。焦都督說：“独立协的名目，原議是沒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再說。”梅馨很不高兴而退。第三天就搞出戕杀长官的乱子。

譚延闓做都督以后，梅馨一帆风顺，由旅长、师长，一直升到长宝鎮守使，显然是譚延闓提拔的。据說，譚延闓曾将庫銀一万两贈梅馨作为游历欧美的旅費，湖南財政司有案可稽。后来梅馨并未出国，就在京沪一带将这笔杀人的酬劳費揮霍掉了。另有传说，梅馨杀焦、陈是事先得到某鉅公贈送的五千两，由梅包办的；梅部执行杀人命令的官兵，官长每人得到犒賞三十元，目兵每人得到十元。雪里不能埋尸，得到犒賞的有一百多人，那有瞞得住的事。又有一种传说，反动派起先只要杀焦都督一人，某有力者說：“連陈作新一起‘切了’，免得老陈不安分，又要搞‘扶正’（即做正都督）。”

某历史家有名句：“龙虎风云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曾看見有人所写的辛亥紀事的材料中說，焦达峯总不脫江湖綠林习气，革命时头上扎的是“包头”。其实扎包头的何止焦达峯一人，九月初一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都是扎的包头。陈作新在初二日才用二龙戏珠的旧帽徽，中間嵌一紅珠。协統王隆中是新軍編制，出发援鄂时，也是扎的包头。这位作者还抬出焦达峯有一个“四正”两字的图章，据說，“四正”就是把天罡星的“罡”拆开来的，焦达峯是自命为梁山泊的天罡。关于这点，笔者倒想找点历史証据，替焦达峯辨白一下。焦达峯在萍、浏、醴起事时，曾任铁血軍总司令李金奇的參謀。起事失敗，和宁調元一路亡命日本，化名为“岡头樵”（这是因为孙文曾化名“中山樵”而仿效的）。从此，焦达峯署名只写一个“岡”字，草书的花押作“𠂇”，这是在《草字彙》一书中摩仿的。懂草书的人只能認为“岡”，却不能認作“罡”。同时，焦达峯是四正社

的领导人。据焦达峯說，最初他曾和宁調元、何弼虞(何陶)、文公舒等在东京組織了“四正学会”，也是搞革命的。四正的用意是心正、身正、名正、旗正。后来在湖南也組織了“四正社”。由此看来，焦达峯用这个签章也可能是有意造作的。他何曾知道在他死后会有人拿着这个签章作材料来誹謗他。

黄兴与明德学堂

黄 一 欧

談到先君与明德学堂的关系，先要把胡元倬创办明德学堂的经过，简单叙述一下。

胡元倬，号子靖，晚署乐誠老人，湖南湘潭县人，生于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比先君大两岁。他少承家学，由附生选光緒丁酉科拔貢。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湖南巡撫俞廉三选送留日官費学生，胡子靖与陈潤霖、仇毅、刘佐楫、顏习菴、李致楨、俞誥庆、俞蕃同等同时被选赴日留学。到日本后，进了东京弘文学院(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納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設)速成师范班。

胡子靖在日本留学时，慕福泽諭吉之創立庆应义塾(后改庆应大学，以財政經濟著名)，造就大批人才，便立志回国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救国。同年冬，胡子靖学成归国，首先在江苏泰兴县会见了龙璋(研仙)，与談兴学之計，龙即极力贊同。回到长沙后，又得到龙璋之弟龙絨瑞的支持，由龙氏兄弟各出洋一千元作开办費，命名为明德学堂，賃湘春街左文襄祠为校舍，自任监督，招中学两班，于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初一)正式开学。湖南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学堂始。其时科举尙未废除，胡子靖以一个穷拔貢办起洋学堂，一般劣紳迂儒，公开反对甚烈。于是，他找到龙璋的父亲、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出面担任学堂总理，

借龙的官紳地位以避謗。这年夏天，譚延闓来校参观，捐了一千元，另年助英文教員薪金一千元。胡子靖有了这笔办学資本，特地赴杭州聘华紫翔来教英文，并加招中学一班，又成立了师范班。随后，賃西园龙宅西側房屋为校舍，別立經正学堂。經正与明德，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馬。

胡子靖是在弘文学院和先君認識的。当他初入弘文时，先君已先在該院师范班肄业，以同乡关系，彼此过从密切。一九〇三年夏天，他往杭州聘英文教員，經過上海时，碰見先君方从日本回国，因此，堅約先君来明德共事。先君当面应允了，不久就回到了湖南，主持新成立的明德学堂师范班（后来又担任学监，即教务主任）。师范班第一期有学生陈嘉佑、彭国鈞、任紹选等一百一十八人，分为两班上課，于一九〇四年五月卒業。当时明德学堂聘請的教員中，許多人是富有革命思想的，如张繼（溥泉）教历史，周震麟（道腴）教地理，苏玄瑛（曼殊）教国文。先君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員；在其他教員缺課时，文科方面的課程，一般都是由他代課的。湖南省文史館張平子館員是經正学堂第一班学生，据他回忆，先君在上历史課时，向他們解释民权二字，不引卢梭、孟德斯鳩之言，而問他們讀过《孟子》沒有？孟子說的“民为貴，社稷次之，君为輕”，就是民权思想。由此可見，民权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从外国搬进来的东西。

明德創辦后的第二年春天，胡子靖向当时的上海道湘潭袁树勛，屈膝募得一万元，即以此款在上海购置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聘日本人掘井觉太郎为理化教員，永江正直为博物教員。仪器和标本都买来了，教員也請到了，只須找一位懂日語的助教即可開課。恰好陈介（蕉青）在弘文学院普通科毕业，請假回国省亲，道出

长沙，先君与胡子靖就留他在明德学堂担任助教。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秋，明德学堂賃西园周氏花园为校舍，开办高等小学，教員都由中学分任，而以陈介兼主任。明德办了小学，先君就叫我入校讀書，編在乙班，这时我是十二岁。关于先君在日本求学时的活动情况，我未亲見亲聞，全然不知道。待到他在明德任教，我跟在身边，許多事实对我說来是记忆犹新的。先君当时已經剪辮，在学堂里多穿操衣(一种对襟短装的体操服，夏白，秋蓝，冬黑色)，天气酷热时，常光着赤膊坐在塘边树蔭下看书，出門时衣着也很随便。他在回国不久，就团结同志酝酿成立一个革命的团体，并大量翻印邹容所著的《革命軍》、陈天华所著的《猛回头》、《警世鐘》等书籍，散布到軍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六)，先君三十初度，朋友們在保甲局巷彭希明(湘恂)家备了两桌酒菜，到周震麟、陈天华、张繼、宋教仁、譚人凤、苏玄瑛、柳聘农、秦效魯、陆鴻遠等二十多人。在这次借祝寿名义举行的秘密會議上，决定成立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运动；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票。

华兴会与明德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成員中，有的是明德的教員，如先君与周震麟、张繼、苏玄瑛、秦效魯、陆鴻遠、易宗夔等；有的是明德和經正的学生，如柳繼忠、陈嘉佑、萧翼鯤、胡瑛(后来墮落为国民党的叛徒，与楊度等人組織籌安会，拥袁世凱称帝)等。也有本人不在明德，而与明德有密切关系的，如仇亮(湘阴人，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参加山西起义有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先君长陸軍部，任以軍衡司长)系明德教員仇道南的儿子；或者当时不在明德，而后来与明德发生关系的，如章士釗曾任明德大学校长。此外，在明德的教員中，有些虽未参加华兴

会,而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实际投入革命活动的,如陈风光、李步青、陈介、王正廷(辛亥革命后任参议院副议长)、辜天佑、楊德邻(一九一三年任湖南财政司司长时,被湯薤銘杀害)、陆鴻第、陆鴻宾等。胡子靖本人也没有加入华兴会,他对这个革命团体却出了不少气力。

华兴会成立后,运动新軍、会党,組織起义活动,在在需款,先君为此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近三百石(最初卖与张姓地主,后由张家轉卖与王先謙)。张斗枢在南阳街經營图书仪器印刷业务,先后捐助达万余元。彭渊恂、柳聘农、陆鴻逵等也提供了一部分經費。陆鴻逵当时是明德学堂的国文教員,因批改学生文卷,語意激烈,刘佐楫唆使教員单某持向巡撫告密,謂明德学生昌言革命。旧紳又落井下石,从而謀害之,学堂陷于危境。因得赵尔巽的维护,事未扩大。这次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是革命党人与封建劣紳之間的斗争。刘佐楫当时投拜于王先謙門下,与胡子靖意見不合,同周震麟交恶更深,周、陆同属华兴会員,胡是同情华兴会活动的,刘就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唆使人向官方告密。

从这里看出,当时的明德学堂,是湖南新旧势力互相交鋒的場所。一方面,有一批革命党人在这里鼓吹革命思想,隱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又是立宪派分子的活动地方。胡子靖延攬人才是兼容并蓄的。他既邀了先君与张继、周震麟、苏玄瑛、秦效鲁、陆鴻逵等来校共事,并尽其力之所及,多方掩护他們的活动;又聘請譚延闓繼龙湛霖为总理,黃忠浩也挂了校董名义,并有所捐助;湖南立宪派的重要分子如栗戡时、廖名縉、刘佐楫、曹典球等都先后担任过明德的教職員。他晚年常說:“我于死友中,最不忘者二人,一曰黃克強,二曰譚組安。”

此外，胡子靖通过龙氏父子的斡旋，和清廷官方也保持了一定的关系。如請当时的湖南巡撫赵尔巽来校參觀，和兵备处总办俞明頤、学务处总办张鶴齡等也有交往。这样，胡子靖利用官紳权势以維持明德学堂，利用学堂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基本的态度是倾向于革命的。

先君在明德学堂教課，給他从事革命活动以很多的便利。如一九〇四年先君与刘揆一、馬福益等商議，謀于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六十生辰，全省文武官員在皇殿行礼时，預置炸弹于拜垫下以炸毙之，乘机占領长沙，作为革命根据地。这次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掘井觉太郎的指导下，在明德学堂理化实验室秘密制造的。先君当时任明德学堂的学监，和掘井觉太郎很接近(癸丑討袁失敗后，先君亡命日本，掘井关怀旧友，特意騰出他在东京市郊巢鴨目白的房子給先君住)，时常出入实验室。人以其特感兴趣，且主管教务，故不疑有他。后来这次起义事洩失敗，当差役来拘捕先君时，他由明德学堂内西側一小門溜出，躲到西園龙宅，得龙氏父子的掩护，匿居吉祥巷圣公会黄吉亭会长处，然后脱險往上海。临走前缺少旅費，胡子靖向张鶴齡处借到三百元送与先君，才趁日清公司輪船离开长沙。

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之役以后，我由香港到东京。这年夏天，我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輝、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罗应坤(广东人)、陈模、石磊(均湖北人)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我們一面和在长沙活动的同盟會員譚心休、曾伯兴、唐麟等人取得联系；对外則宣传成立野球会(野球一名棒球，起源于美国，当时在日本风行一时)，招收青年学生学习野球，以增强体质，实则借此机会团结同志，并因学擲野球而練会擲炸弹，以为他日举事之准

备。当时正值暑假期中，学生多已返乡，但参加的仍然不少，其中以明德学生居多数。记得练习不到一个月，有人向官方告密，端方由湖北来电通緝（唐麟列第一名，我列第二名），幸得陈树藩（陈嘉任之父，时任諮議局副議長）暗通消息，我們才匆忙离开长沙，仍回日本去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胡子靖由日本回国（任留日学生监督），謀扩充明德学校。他到上海时，曾与先君会面。据我所知，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时，先君原准备推荐胡子靖出任教育总长，后以胡不愿做官，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遂作罢論。

胡子靖办明德学校几十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是。除了因范源濂的再三敦促，做过几个月的留日学生监督外，从未担任过其他官职。他每对明德学生演說，常說：“克強先生在日，我对他說，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在晚年刻过一顆图章，曰“磨血人”，即取教育磨血之意。）

一九一二年夏天，胡子靖去北京，行前有信給先君，商議扩充明德学校，筹办大学。当由先君領銜，呈准北京教育部設立明德大学于汉口，并領得補助費八万元。后以武汉地区兵燹之后，元气未复，而北京人才薈萃，容易聘請教授，就于第二年春改設明德大学于北京，賃于面胡同房屋为校舍，設商科及政治經濟科，聘章士釗为校长，是为明德有大学之始。

先君以一九〇四年十月由明德出走，一九一二年十月自上海回湘省亲，曾往西园龙宅叩訪，并到明德学校訪問，当时全体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次訪問，是先君出走八年后的第一次回到明德，也是最后的一次。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章士钊

吾与克强初相识，在武昌两湖书院斋房中，时千九百零一，即前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秋也。吾生于光绪七年辛巳，是年虚岁二十一。先是吾读书于长沙东乡和佳冲老屋，用功甚苦，患咯血症，吾姊忧之，稍为撰挡，劝吾远游，至游何地，将何为，吾与姊皆未尝计及也。迨抵鄂，赴自强学堂，謁监督程頌万子大，辞以非考期，不收新生。则有旧同学善化王闳宪，隶两湖为寄宿生，愿分斋舍与吾共读。吾因以未尝注册全不合格之僮来新生，鳩居鵲巢，蒙混一时，以是识克强。克强以同治十三年甲戌生，虚岁二十八。

吾初识克强，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翌年壬寅，余赴宁，入江南陆师学堂。又明年癸卯，余率陆师退学生趋上海，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而克强以日本弘文师范生，毕所业返国，稍滞于沪。吾二人握手道故，而形势大变。

吾于是年五月一日，正式入苏报馆任笔政，距是以前，亦为《苏报》撰文。吾忆访克强于洋涇滨客栈。是日，《苏报》论文为詆譏江南陆师学堂退学事，克强询退学情形甚悉，可见克强由东抵沪，时在初夏。自五月以至閏五月，吾迫于报务，与克强见面不多。迨《苏报》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秦兴，访龙硯仙；又同赴南京，访魏肇文（江督

魏光燾第三子，新由东京返国)。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

华兴会开第一次会议于长沙，地点在彭渊恂宅，到会者共十二人。十人湘籍，余二人为侯官翁玖、无锡秦毓璠。湘籍十人，除克强与吾及彭渊恂外，刘揆一、胡瑛、柳大任叔姪咸在。时癸卯七、八月间。

会后，吾返沪，长沙经始一切，克强独任之。已在明德学校充教员，别设华兴会机关，联络会党，乘隙起事。事后，据龙莫溪笔记，得其崖略如下：

华兴公司，赁屋于南门外为之，表面标榜兴办实业，里面直是革命组织。无何，外间指目克强为革命党，谣言稍起。九月二十五日，余(按此龙莫溪自称)在家中饗客，克强与焉，扬扬如平时。唯笑谓余：“有相士谓我，将有縲紲之灾。”余曰：“此无稽谰言，公何信之？”时克强寓紫东园，忽报寓所有士兵搜检，里街遮阻，人不得出入。寻知会党首领马福益之部下失风，于醴陵车站被逮，词连黄董午老师，即克强也。余亟引克强入西园密室暂避，而外察形势。时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兵备处总办俞明颐，皆素交，且通达时务，无意兴大狱，事稍缓。是夜，克强以布置革命实况见告，党众约二万余人，教员学生居多，惟无一语及新军。此或克强不欲激动俞寿丞，俾便相助，亦未可料。总计克强所语要点，归宿于十月十日那拉后万寿节，百官赴皇殿庆祝时，一举裹之，从而四方响应，庶几成事。今事已破坏，无取覆叙，现同志被获者不知几何人，如事态扩大，为首者宜当到官，何忍独生云云。胡子靖、谭组安均在座，闻此言，则共劝慰毋躁，以图善后。克强又言，有一藏置秘件之小箱，存西长街长沙中学室内，不可放佚。翌日，余假託饗客，衣冠出门，逕往该中

学携归，就中册籍名纸，悉数焚燬，不留痕迹。克强因取自用水晶小印章赠余，已则读书自遣，饮噉如故，如是者三日。寻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及湖北曹亚伯掩护出乡赴沪。久之，湘撫端方谓余：“足下胡乃放走黄兴？”张小浦从旁答曰：“龙莫溪不能卖友。”亦遂释然。

事非亲历，唯同人口语是信。莫溪遂以信友著闻，号八先生。岁甲申，即一九四四年，莫溪年七十，吾违难重庆，曾草一文，展扬龙氏昆仲风义为寿，辞多不录。大先生视仙事，前见，兹仅留一语作质的，曰：辛亥以前，湖南新起形势，不论激随缓急，大小轻重，都不能违离龙氏，惟克强革命亦然。

克强返沪，与吾辈复合，时吾为革命后方略有筹画，重心尤在宣传。吾既创立《国民日报》，复别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除邹容《革命军》先期印发外，他如《黄帝魂》、《孙逸仙》、《沈蕙》、《搜书》等小册子，以及《保国歌》等单张，充类布达。吾又租賃招待所四处：一在余庆里；一在梅福里；两所在昌寿里，此一为日日报编辑所，一为克强与吾徒秘密计事处。一夕，议程刚了，客散，克强出新置手镜，相与摩挲，偶一失慎，子弹剧迫吾额，扬声飞去，突入窗樞寸许。吾二人大訖不已，幸其地僻，未令邻屋闻知。尔时内地各处，东连日本东京，同人风闻克强在湘谋大举，渐次到沪会合。各招待所随分安置，而余庆里尤有人满之患。克强仍自展续湘局，为逾年浏醴起事张本。华兴会者，以振兴实业为名，人众而机事难密，则湘中增设同仇会，联络红帮弟兄；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如蔡子民、陈独秀、蔡松坡辈，咸在上述秘密计事处，由杨篤生监督加盟。盖克强志切实行，恐其名重易漏，坚不肯任会长，于是众推篤生主持，而吾副焉也。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克强不甚赞成，而篤生认为必要。篤生勤攻

化学，制置鍋炉道具，在余庆里宅，著手試驗。居无何，以万福华刺王之春聞。斯案也，异軍突起，与华兴会原不相涉，吾別撰甲辰年暗杀案一文詳其事，茲不親續。案发之明日，緣吾偵察不謹，牽率余庆里同人十余輩入獄，克強与道員郭人漳亦在逮。卒之人漳得南昌撫署电保，先释出；克強以随員名义，連同被放，馳赴东京。后四十日，吾亦出獄东迈，上海之局，暫告結束。时千九百零四，即光緒三十年冬初也。惟篤生幸脫系累，独行踽踽，不告于众，潛踪北京。寻知栖身譯館，(謂充譯学館教員)，旅进旅退，假友閑房，託言制皂，从而阴合炸器，手授吳樾。越两年，东車站炸五大臣案，震燿一时云(制皂事聞之朱启鈴)。

吾抵东京，寓牛込区若宮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強移来同居。适中山孙先生由橫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議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楊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見町，門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楊，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汉中外，靡不备論；革保利病，暢言无隱。卒乃楊曰：“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宪政久，难驟改，囊鞬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黃兴，当今奇男子也，輔公无疑，請得介見。”(刘禹生世載堂杂忆称：楊度与中山初見于橫滨永乐园。愚按：孙、楊橫滨之会或有之，然决非初見。禹生又謂：“同行有梁煥燾。”吾知煥燾留英，未到过东京。禹生記事疏闊，往往类此)。中山喜。翌日，吾若宮町宅，有先生足迹見临。克強与吾，皆初見先生。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臥，按地图，議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俄而集留学生、为大会盟之議起。先生辯才无碍，指揮若定，吾徒傾心折服，难以形容。克強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戶牖冥濛。时則汪兆銘、胡衍鴻之流，头頂辮髻，手摩研章，出

入梅謙次郎之門，洋洋與同舍爭一日之短長，願仍木然無動于衷也。

上海之新敗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敵，潛懷我殺伯仁之懼，兼蓄願為周處之思；加以未達壯年，了無學殖，人眾茫然無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願假數年之力，隱消大過之媒，際茲大黨初建，應以分工為務，量其才力，資其性分，緩急文武，各任所宜。吾于焉發議，本黨大隊趨重實行，小隊容其攻苦，審時度勢，或庶几焉。孫、黃二公，不允所請。吾堅持本議，久而不決。吾憶太炎與孫少侯，同寓新宿，受二公之託，要吾蒞盟，吾不署諾，則見誘禁閉一室，兩日不放。卒之克強明吾本懷，敢証忠純不二，听吾自擇，眾亦釋然。當同盟會旗鼓大張之時，正鄙人閉戶自精之候。時吾年已二十五矣，洋文不識 ABCD，算學不解乘除加減，老泉廿七，初習篇章，才謝秦嘉，見笑聘室（聘妻吳弱男，行畢業青山女學院）。千九百零七年，吾發東京，經滬赴英。在蘇格蘭大學，修碩士學位，距結業不足一學期，而武昌事發。吾廢卷東馳，涉冬抵寧，在鐵湯池參謀部會客室，重與克強相晤，則千九百十一年冬矣。

吾留英五年，所學幾何，伊誰知之！願吾赴游府西街，謁宋遜初，寒暄乍已，主人捧剪報巨冊見示。則數年間，吾所寄京滬諸報論政文字咸在，質不可曉，而量殊可觀。吾笑謂遜初：“江左夷吾偌大本領，原來孕育于故紙堆中，亦自可喜。”遜初以一笑見報，兩俱莫逆。吾思之，吾重思之，遜初後來見燬，終為此类斷爛朝報所誤。五十年舊夢，默演一過，為之憬然。

中山先生之在倫敦也，原要吾掌記。吾率一妻二子，料量不易，遲遲其行。迨吾抵南府，則胡漢民獨擁記室皋比，似無余事可辦。

克強謂吾：“各部长官，多久曠未到，君一試何如？”吾曰：“否否，吾有鉄飯碗在，公何忘却？”克強一笑喻意。時《民立報》為同盟會唯一刊物，言龐待理，于右任聞吾愿任斯職，大喜過望。雖然，此中有鉄門限，踰越不得，蓋吾非同盟會員也。初建黨時，吾未加盟，倘趨踏于政成之后，非鄙夫誰勝此？克強知吾性復，因不欲相強。願建政之初，黨人勢張，不洽輿論之事非一，他報不敢置辭，嘗嗾訛《民立報》為之。就中建都問題，及漢冶萍借款一案，《民立報》社論之悍然不顧，去與政府為敵，其間不能以寸，而借款亦適以此不就。黨人因大鬧，謂黨報也，奈何使非黨人持之？實則此類反动文字，非出余手，撰文者例自署名，一目了然。願余總主筆也，虎兕龜玉，究不得不負其責。克強、右任大窘，左右不知所為。余曰：“黨人責難是也，吾辭職便。”黃、于皆不允。吳忠信時充報社協理，尤涕泣相留。余曰：“否否，凡事以理勝者，不可以情克。”吾卒擺脫此職而去。其時天下有視，視《民立報》；有听，听《民立報》；某也“焉從而來，焉往而止”（二語本柳集），世多疑焉。

吾脫離《民立報》后，與揚州王无生別刊《獨立周報》布于世。報社設小花园。吾懃懃執筆，仍舊貫，然光氣一落千丈矣。繼知无生暗受袁世凱津貼，余尤意興索然，不數期即擱筆。克強適以世凱邀遮，擬赴宛平，央吾同行。吾曰：“君且不免為曳尾龜也，獨不畏尾大不掉乎？”相與一笑而罷。時元年冬也。實則吾困羣疑罪謗之中，不欲久留滬，亦愿北首燕路，一看形勢。因先趨天津，略有所事。一夕，訪梁启超于庸言報館，值熊希齡、楊度在座。启超懃曰：“國民黨銳意起內閣制扼袁世凱，而手控宪法起草权，弛張惟意，世凱恨焉。吾黨誠不知何道之从，君其无意解斯厄乎？”吾視启超几上，有漢譯蒲徠士民主政治兩巨冊在，因檢費城會議一節，笑謂启

超：“公試讀此，應有所得。”三人者俱大詫。越數日，〈庸言報〉出，梁先生主張憲法草案，脫國會獨立，北美開國，供吾先例，中國有華聖頓，宜施設是。此常人所不敢言，憲政黨人聽之，而余適于是時入京。楊度者，號稱“曠代逸才”，出入袁幕，屢謂吾曰：“袁遣沈兆祉先道地，子不入謁，非禮。”余不獲已，偕楊往。

無何，吾與袁迹日親，稍稍預袁祕事。吾內心滋疚，苦不得脫。袁已前知吾婿廬江吳氏，則謂吾曰：“君自家人，有所見，恣言毋隱。”余聞言大震。吾妻吳弱男，在滬得袁書道地，函電交盾吾，革命黨不得自污為裙帶官。其實余固無求官意，北京大學校長，牒雖出，已辭去矣。不久，宋案發，遞初遣電到府，吾方與袁會食，袁太息曰：“遞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余警視電文，僅寥寥“開誠心，布公道，尊重憲法”十大字。余隱笑遞初受袁誑，至死不悟。食竟，起赴鄰室，就當日事泛論之，慣例往往如是。袁着黑絨緞袍，長不過膝。案置精器，貯鹿茸片，且談且檢食。額多汗，時以毛巾揩拭。兩目有光如電，時奔射人。語次，竟以宋案凶手歸克強，執先一日同學路黃寓議事、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証。余大忿，不對而出。明日，余潛赴東站，獨馳返滬。

吾到滬，先謁克強，問軍事部署狀，克強氣不振。余曰：“即敗亦須為之，以袁且稱帝，後世見責，將不任也。”克強意不謂然，謂袁專橫誠有之，稱帝却不敢。往見中山，語如前。中山喜吾主用兵，而同以吾詆袁為過當。余嘆國民黨軍力燼矣，高論何益，即亦不辯。中山曰：“自蘇慎初、張我叔兩師長被袁買收，粵如無人之境，非利用龍、陸，不足舉事，君能往說岑春煊乎？”克強在旁，慫恿尤力。吾曰：“姑試為之。”明日，王芝祥來，吾與計此事。芝祥喜躍，急赴杉板廠，為吾先容。又明日，吾與西林縱談天下大計，語無不合。西

林极意诘袁，用力无所顾虑；且愤然曰：“吾且如汉文帝，单骑逕赴梧州龙济光营，视济光不作周亚夫，将胡为者？”此虽儼不于伦，而語甚壯。孙、黄二公大喜。吾因自居曹邱生，在滄洲別墅設宴，宴两公及西林，視士相見礼；約汪、胡与陈英士、于右任等，共襄是事，吾夫妇各由席之尽头起立，举瓊为寿。由今思之，夥頤沈沈，此殆不得謂非革命豪帅之东南高会也。

西林时充粵汉铁路督办，越数日，約吾馳赴汉上，說黎元洪举事。西林勇銳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迨吾儕过江，抵都督府，适章太炎李仲仙咸在。吾徐以袁世凱帝制自为状語元洪，元洪憤激，立而誓曰：“項城称帝，元洪敢以百口保之。”一座鷲然，主人送客。屏后袁探不乏，即日北京洞悉其事。是夜，元洪密遣人，齎台票五百版，致太炎与吾，央即刻返沪，免为人算。說者謂：元洪虽闇，願不失为忠厚长者，茲为显証。西林稍迟数日，亦并东下。武昌約从之行，其效如此。

上海計事，孙急而黄緩。然黄先生之緩，盖深悉其軍力及錯綜之情状而为之，非得如孙先生逕情而直行也。計其时可用之兵力，湘、粵均摧毀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生遽欲歆动其营連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遣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牆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謂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領大事者，真披肝瀝血，万分情迫之言，可为知己道，而难求諒于后人者也。是时吾在两先生左右，孙先生急，而吾似較孙先生尤急。何以故？以吾挟一袁氏称帝之固定观念，而两先生俱无有也故。（按此段所引两先生之言，皆出两先生遺札。）

卒之議定：孙先生留上海，督陈其美各豫响应；李根源充討袁

軍參謀長，輔西林赴粵；吾充討袁軍秘書長，隨黃先生入吳。吾憶黃先生午車出發，吾夜車繼之。翌日早旦，趨第八師司令部取齊，吾立伴黃先生，往謁都督程雪樓。未入督院小花園門，已觀嚴裝勁旅，擊鎗密集于議政廳前，無慮數百人，鎗托頓地，吼聲遠聞，其為威揚勢禁狀，絕非恆人之所願見。于是克強歷階而升，吾緊貼于旁，雁行徐進。雪樓自迎于門，口語不絕；克強大聲為兵劫未戰告罪，雪樓張口荷荷，仍不辨何語。羅倬子時為督署秘書長，亦前席，則相將入客室，四人嘿爾對坐。雪樓先發言：“袁世凱不法，天下之公憤，江蘇何敢獨異？吾意如蘇州人盤辨子，先佯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已耳。公驟起任事，得大解脫，幸甚幸甚。”克強向不善詞令，稱：“興暫治軍，余惟都督之命是聽。”此外交換彼此情報，吐辭無多，飲茶一巡而退。癸丑討袁之役，南京一幕之開場白，如此而已。

近唐生智記孫、黃兩先生瑣聞，錄克強討袁通電一則如下：

興一无能力，尙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賴祖宗之靈，民賊一去，即當解甲歸田；國中政事，悉託賢者。如有權利之想，神明殛之。

此赫然吾之手筆也。五十年後，猶能動人心弦，懃懃紀錄，則當時言非外鑠，黃先生有其本來，可想而知。

此役士氣消沉，匪夷所思。師長陳之驥，為馮國璋女夫，原不能為主動。黃凱元、王孝縝兩旅長，雖為克強心膂，而以屢受煎熬，上下交迫，口稱徇友，悒郁不堪。師部矛盾既多，兵額不足，守城而外，几于難移一步。冷適第九師，屯第一綫，由韓庄敗退，強敵迫近眉睫。洪承點以師長兼兵站總監，徘徊徐、蚌之間，罔知所措。外無援兵，內困孤圍，兩三日間，形勢了然，傾敗已觀，唯爭頃刻。一

夜夜深，兩人相對愁苦。克強謂吾：“程雪樓逃出圍城，妄自通電，利害雖異，交誼何存？君何不到滬責之，加以禁制？”噫嘻！此克強不願為張巡，而故放許遠之託詞，吾豈不知。翌日，禁淚告別，反奔滬濱。不數日，克強求自殺不獲，亦以得日人遮護，逕航東京聞。南京討袁總司令部，倏爾灰飛煙滅。

吾徒革命黨也，共和曇花一現，重履亡命之途，渾沌窮奇，亦何所謂！願克強精神抖擻，仍復計劃多端，期于振刷。頃檢得遺札一通云：

昨晚劬襄兄來云：“雜誌之事，漢民兄等，仍要求兄主其事，未經承諾，殊為愚愚。”弟思袁氏作惡已極，必不能久于其位，兄能此刻出為收拾人心之舉，亦不為早。至組織後，如最激烈分子，當可設法使其不憤事，劬襄亦言及此。如何之處，乞示知，不勝盼禱

由此緘可得窺見數義：

一、克強敗後赴東，仍與孫派合作，至欲強拉一非同盟會之舊友，共創機關刊物。外傳克強反孫，顯系造謠。

二、強吾主持雜誌，倡議者為胡漢民，可見孫派自審勢孤，謀黨內外大團結，克強實為當時作合柱石。

三、孫派中却有如夏重民者一類激烈分子。吾另辦《甲寅》後，夏重民曾搗毀吾林町社址一次。倘真共營一報，後患寧復可言？

四、劬襄者，劉承烈也。現外國語學院院長仲容之父，為熱烈而有學識者之一人，解放後在北京化去，友朋中弱此一個，至堪痛惜。

時則中山認為二次革命失敗，由於黨員不聽命令，意指克強，

刻責无已。而克強温温自克，不一校也。中山別創中華革命黨，以服从为第一义，声明必作真党魁，黨員須捺手印，明信誓。旧同盟会會員皆不欲，克強不作表示。其时袁力寢盛，党軍根株剷尽，内地无措手間隙；假其有之，吾意克強終俯首盡盟耳。旧士官派，方起歐事研究会，异軍花头，职志特异。克強暫难为左右袒，乃担簦赴美，冀避其事。此行首尾三年，丙辰护国一役，克強未嘗与聞；中山亦困頓异国，难于遄返。后虽在袁死边緣，聞关到沪，終于一筹难展。

一日吾謁孙公于灵南坂，周孝怀不約而至。語次，公废然太息，指吾称：“吾革命无成，因君不肯相助。”孝怀問其故。公曰：“行严左擊岑西林，右携黃克強，二力見輔，吾何功不成？”吾喟曰：“公何言之易也！西林吾新相識，孝怀則旧主宾，性习蓋深知之。此公豈容易听人指揮者？夫彼为逊清遺老，原与吾党无瓜葛誼，一旦強之濡迹，相牽亡命，吾党不仅无一語相慰，且罵之为官僚，排之不令預事，吾有何面目，更为耳語，使趨事公？至克強与公共事尔久，忠心耿耿，人无間言，今虽稍有痕迹，然吾敢保公有命令，彼无不从，何待有人从中牽曳为？”吾如此說，公亦无語。二客同时辞出，途間犹聞孝怀頻頻叹声。

袁世凱之自毙于帝制也，国民党殆全无起事力能，中山先生之命令，无可发处。独賴蔡松坡虽注籍梁門，而革命抱負甚大，犹降心与吾輩合。西林則依倚旧部陆荣廷，开府端州，強支門廩。迨吾由粵返沪，以病店僵臥医院，而克強始返自北美。吾忆对語病床，克強欲在西林之久原借款中，稍分一滴，以資因应。吾意款經用罄，商必无成，徒使桂系軍人，蔑視吾党，所損太大，終乃未輕开口。未久，克強謝世，致成吾愧对良友之一大事，疚恨无已。

論曰：吾弱冠涉世，交友徧天下，認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終，从无詬評。吾答或問：吾恃以論交之唯一武器，在“无爭”二字，然持此以禦克強，則頓失凭依，手无寸鉄。何以言之？我以无爭往，而彼之无爭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爭之外，尤一切任劳怨而不辭，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強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蓋孕育之中，渾然不觉。因而我敢論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黃克強。又克強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視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視天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領？于是吾又敢論定：人若以克強不服中山相齟齬者，克強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語，使言者在克強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

又曰：克強平居自勵之語，为“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复举董江都之訓誡，“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类語詞，吾于昔年宴坐談言之頃，頻頻聞之。凡此皆先生砥礪自得，深信不疑之辭，与泛泛以口头禪欺人者异趣。先生辞南京留守日，吾在《民立报》撰文^①送之，訟言美德，昭示后昆，即臚举上列二訓，以为金玉之式。今忽忽五十年矣，鉅人长德，历久弥昭；后死者誰，詬尤与积。噫嘻先生，爰而不見，搔首踟躕，求其友声，还曷故我。

① 民国元年六月十八日上海《民立报》社論《論黃留守》一文。

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

周震麟

(一)

湖南自咸同以後，許多文官武將，出力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被稱為“中興功臣”。他們退職回籍後，地方官吏自巡撫以次，都特別尊重他們，不敢得罪。因此，紳權之大，經常左右一切。當湘籍留學生紛紛回湖南辦學的時候，紳士中有一羣特別頑固的人，其中以王先謙、葉德輝和孔憲教為首，拼命反對開辦學堂；而一般青年志士，則認為中國要救亡圖存，必須首先多辦學堂。於是湖南新舊兩派的鬥爭，突出地表現在教育界。一九〇三年春，胡元燊等開辦了私立明德學堂，成了新派的中心。這是因為其中的教員如黃克強先生、吳祿貞、張繼、蘇曼殊和我，都是革命派，頑固派王先謙等，指責明德是革命學堂，兩派相鬥，曾引起多次風波。

明德學堂開學三個月後，譚延闓應龍紱瑞邀請來校參觀，當即捐助了經費一千元，並答應年助英文教員薪金一千元。可是這時他的父親譚鍾麟還在世，也是一個頑固派，儘管搜括的民財很富，但不可能向他要一文錢辦學堂，而譚延闓的妻子方夫人，出身官僚家庭，陪嫁的金器首飾不少，譚就取出兌換，支援了明德的經費。我們看到他這樣熱心教育，就把創辦其他私立學堂的立案、請款和撥給校

舍等事情，請他出面和官府及紳士們打交道，以便減少阻力，順利地解決問題。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兩年之間湖南學堂之多，學生之眾，為各省冠。國內外革命同志來到湖南參觀的，莫不驚異，而且借參觀機會，進行革命聯繫，互通聲氣。當時的譚延闓，不過是一個熱心教育的紳士而已，關於這些革命活動，我們對他是嚴守秘密的。

湖南光復前夕，官紳們已經看到了革命迅速發展的形勢。在湖北首義後，湖南已呈山雨欲來之勢，關於新的主政人物，官紳們自然要為他們自身的利益作打算了。他們原來屬意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出來維持局面，當時龍璋和譚延闓，也都曾向黃勸說過。直到焦、陳起義，殺掉了黃忠浩以後，官紳們才企圖推譚延闓出督省政。

(二)

一九一一年夏曆九月初一日，焦達峯、陳作新兩同志在長沙領導了起義。我在兩個月以前奉黃克強先生命，由北京經上海秘密回到湖南，在長沙約集各方面同志秘密開了多次會議，布置軍事，約定夏曆十月起義，並嚴誡毋蹈過去事機不密、因而失敗的覆轍。為了避免暴露，大家要我避居寧鄉原籍，到期派人掩護入省。由於湖北提前起義，湖南勢必提前響應，所以到了長沙光復的第五天，我才由洪春台、洪蘭生兩同志派人持焦、陳兩督的安民布告催促督省。我到省後，看到督署新舊軍人爭功論賞，紀律很差，焦、陳兩督軍書旁午，劣于应付。兩督見我到來，也沒有和我商談革命的具體問題。有一次我因事到督署會晤焦達峯同志，他正在案頭擺着一堆禮服樣本，和裁縫工人一道，挑選研究趕制都督制服的式樣，我當時感到他已經有點陶醉於革命的初步勝利了。

湖南光復后，黃克強先生由上海到武漢主持軍事，派譚人鳳到長沙，督促出兵援鄂。焦、陳兩督正在一心調遣軍隊援鄂之際，不料新由湘西防地調省的第五十標營長梅馨縱兵叛變，兩督以湖南起義首功，竟同遭殺害。梅馨利欲薰心，加以出身留日士官，自恃才高，不肯下人，竟充當了戕害革命領袖的劊子手，其結果終身為社會所不齒。他後來在上海窮困潦倒，就是譚延闓也不予接濟。

發縱指使這次叛變的主謀者，一般公認是譚延闓原來所主持的諮議局。特別是副議長陳樹藩（炳煥），為譚出力不小。譚延闓是正議長，當湖南光復，一般諮議局議員叫嚷推舉他作都督的時候，他的表面態度是既不首肯，也不拒絕。事實上自從焦、陳以起義首功被推舉為正副都督的一天起，諮議局議員就四出進行誹謗，特別是挑撥新舊兩軍之間的關係。他們攻擊焦都督是會黨，陳副都督在起義前不過是一個新軍中的排長，並強調“維持秩序”，揚言焦、陳兩督“年少望淺，不能服眾”，不達到擁譚篡奪革命果實的陰謀目的不止。譚延闓就職伊始，即用都督印信給陳樹藩家戚屬子弟下委札，不下五十餘件，旋又用公費為他們派送了好幾個西洋留學生，而陳樹藩本人一直做着湖南省財政廳長。種種跡象，當時是人言嘖嘖的。

焦、陳兩督被害後的頭一兩天內，市民惶駭，謠譏繁興，傳革命派要為焦、陳報仇，反動派還想繼續殘害焦、陳所屬。譚延闓初任都督，一方面感到革命局勢還未穩定；另一方面感到湖南的革命黨人對他的壓力很大，終日胆戰心驚，惶惑不知所措。當時湖南局勢，動蕩不安，確屬異常危險。

恰好這時克強先生來了一封長函給我和譚人鳳，對湖南事變作了詳盡的指示。內容大致是：為了統籌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

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 恐生观望,我們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譚延闓已經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維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信中一再強調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譚延闓壮胆,調譚人凤返鄂参贊戎机。

我遵照克強先生的指示,表明了个人不做官、不爭权、专做事的态度。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盘岭广场召集新旧两軍开会演說,人民羣众也围聚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強先生,旌卹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們說:現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們面前的战斗任务非常紧迫。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軍决不容許互相歧視,互相排斥;而是应该严守紀律,听候黃总司令編調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局面,譚延闓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們就得維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須目光远大,顧全大局,才能够取得全国各省的响应。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庫空虛的实际情况都告訴了他們。他們都深受感劬,热烈鼓掌。我本来带着几万元准备犒劳他們,他們听說省庫空虛,援鄂餉需重要,一致表示不受。从此人心日趋安定。

我还同譚延闓一道挽請了刘人熙出任民政司长,龙璋巡按湘西。如前所述,譚延闓第一次督湘,革命党人迫于形势,是支持了他的。

譚延闓的統治地位既定,就逐步在各方面布置了旧势力。他的政治活动骨干始終是原来的諮議局議員,亦即宪友会會員。他从中选派了唐乾一(字昆臣)坐駐北京,专门和湯化龙勾結,进而和黎元洪、袁世凱勾結,也还有一些在京的湘籍官僚为他奔走。唐乾

一从北京向譚延闓密报消息的函电极勤，我在督署经常目击这种情况。他们内部的阴谋活动，譚延闓对我是保密的。

(三)

中山先生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以后，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又改总理制为理事制，中山先生为理事长，设国民党本部于北京，派宋教仁(教仁)代理主持党务。教仁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办党数月，袁世凯所支持利用的共和党不能相与匹敌。临时参议院宣布召集国会，教仁南北奔走活动，党势益振，在国会选举中国国民党已操胜算。当时流言，如国会产生政府，仍将选举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为正、副总统，教仁为国务总理。于是袁党和共和党都集矢于宋教仁了。

我于一九一二年春，被推为组织政府的湖南省代表到了北京，曾和袁世凯面谈几次。他对于湖南地方关于财政、盐务方面的要求，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官位拉拢个人。我看出他妒忌国民党，绝无拥护共和的诚意，不辞而别地回到湖南。当时宋教仁任农商总长，住在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动物园)办理党务，我在京时曾和他在畅观楼同住了一个多月，协助工作，并提醒他对袁世凯严密注意。国会选举完毕，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案发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急电湖南，要我和譚延闓迅速准备长江上游军事。我先到江西、安徽，和李烈鈞、柏文蔚商议共同准备，然后到上海参加了布置讨袁的会议。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仍派我回到湖南，积极行动。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益暴露。我催促譚延闓加紧布置军事，他却故意延挨，没有具体行动。后来虽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听说他在

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話：“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闓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闓不居其功。”这就表明了他当时的两面态度。在取消独立的前夕，他害怕革命党人据湘討袁，便纵容一批袁世凱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了我們艰苦經營的軍装局，企图用消灭革命武器的办法，迫使革命党人离开湖南。取消独立之后，譚延闓还想恋栈投降，他采取了杀人以媚人的罪恶手段，杀害了坚决反对取消独立的革命党人刘崧衡等，并加以“煽乱”的罪名。但是，袁世凱却认为他不可靠，并且要把北洋势力伸展到西南門戶的湖南，就改派了湯蕪銘督湘。譚对湯表示欢迎，湯到长沙后譚即办理移交。首先是假湯手杀害了自己任內的財政司长楊德邻和省河厘金局长伍任鈞，这是因为譚有贪污証据在他們手里。更恶毒的是把辛亥革命后湖南稽勛局的名册交給了湯蕪銘，并对湯說，这是“乱党”的名册。因此湯蕪銘下車伊始，便能够“按图索驥”，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殘酷地鎮压革命（据当年在湘人士調查統計，被湯屠杀的革命党人和反对袁世凱称帝的人士在全省范围内共有七、八千人）。譚延闓办理移交后，由湯派艦护送到汉口和黎元洪晤面，然后轉車北上，无耻地入京請罪，其实他早已取得袁世凱的諒解了。

(四)

一九一六年討袁軍事結束，中山先生和克強先生回到上海，筹商对付北洋軍閥的策略。我主张克強先生亲自督湘，以便领导西南各省，应付非常。这时譚延闓也在上海，阳相应和，背地里却从北京通过黎元洪由段祺瑞发表了他自己二次督湘。接着黃克強、

蔡松坡兩先生相繼逝世，革命黨人失去了軍事長城，直、皖兩派軍閥更加輕視西南了。曹錕率兵橫斷湘、鄂之間，從此北洋軍閥勢力日張。而黃、蔡兩先生的相繼逝世，又使得譚延闓減輕了對湖南革命黨人的顧慮，專心致志地巩固個人在湖南的統治地位了。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承襲袁世凱的故技，撤換了譚延闓，改派傅良佐督湘。傅良佐在湘沒有實力，因而不久就被劉建藩、林修梅兩同志在零陵起義，驅逐下台。段祺瑞又派了擁有兵力的北洋軍閥張敬堯督湘。這時直系軍閥吳佩孚進據湖南衡陽、寶慶一帶，譚延闓率部據守湘南郴、永，適值直、皖關係日益惡化，譚延闓聯合直系，吳佩孚社出衡、寶，回師鄂、豫，譚則乘機驅逐了張敬堯，實現了三次督湘。

湖南自譚延闓取消獨立以後，經過湯壽潛、傅良佐和張敬堯等北洋軍閥的殘酷統治，人民受盡了痛苦，革命黨人或慘遭屠殺，或被迫流亡。其他各省情況也相類似。但是，中山先生始終沒有因革命實力遭受挫折而氣餒，仍然百折不回、再接再厲地領導着革命繼續前進。

(五)

一九一九年，中山先生在上海決定北伐大計，先使陳炯明、許崇智率援閩粵軍回粵，驅逐舊桂系莫榮新、沈鴻英等，隨即號召國會議員南下，足成法定人數，正式開會於廣州，選舉總統，成立革命政府，然後大舉北伐。我代表中山先生到福建漳州會晤陳炯明和許崇智，商定回粵計劃。陳、許主張我回湖南說譚延闓分兵入北江聲援，並議定由中山先生籌措開拔費用，湘軍進入粵境，即可由粵方

供給餉糈。我回上海报告，中山先生完全同意，命我积极进行。我先用个人名义，写信给谭延闿，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和对湖南的要求，谭延闿回信唯唯从命，随即我持中山先生手函回湖南面交谭延闿。我到长沙不久，中山先生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和张继先后来长协助工作。我就放手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以及对于湖南军人发揚革命传统的期望，这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当时驻省军官鲁滌平、陈嘉佑，驻醴陵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部，集結省城待命。而谭延闿则态度冷淡，故意延挨，不肯发布出兵明令。直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援閩粵軍如期发动了，谭延闿还是表示閑逸，邀請蔡元培、吳敬恆、章太炎等名流来湘演說，游山玩水，酒食征逐，无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我催促他早日出兵，舌敝唇焦，他还是推諉不决。于是我决計和湘軍將領倒譚。議定推赵恆惕为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在此同时，张振武杀了不服调遣的萧昌熾，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各軍逼近省城。我认为倒譚条件已经具备，就委託护法国會議員陈嘉会劝谭延闿自动离开湖南。谭打电话向我泣請安葬了他的夫人再走，因为他的夫人死在上海，正在运柩回湘的途中。我回答他說：“为了維持省城秩序，为了保証你的安全，务必馬上离开。至于使你不能够为夫人亲营葬事，我不久回上海当面道歉。”他只得忍痛登舟，回到上海去了。

倒譚以后，陈嘉佑等率兵到了韶关，声援閩粵軍回粵，驅逐了旧桂系莫荣新、沈鴻英等，于是中山先生重返广州，組織大元帥府。不料赵恆惕在我赴粵复命的时候，竟背信弃义地在长沙惨杀了李仲麟等，又成了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以后，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

志多集中在上海。不久，許崇智奉命率粵軍和新桂軍討逆，叛將洪兆麟、賴世璜等，向我和李烈鈞表示悔改，愿意立功贖罪，欢迎我和李烈鈞去粵。譚延闓这时也在上海，向我表示悔悟。我正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认为譚延闓如果真能悔悟，忠誠地参加革命，还可以号召湘軍旧部魯滌平、陈嘉佑等提兵相助，以壮革命声势。因此，重新介紹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晉謁中山先生。譚延闓在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和中山先生的会見，这还是第一次。接談之下，中山先生大加激賞，就在一九二二年夏曆除夕，李烈鈞、楊樹堪、譚延闓和我四人，随同中山先生由上海搭乘海輪駛向广州。

譚延闓到了广东以后，还是不忘情湖南地盘。他的徒党曾包围中山先生，还想由中山先生恢复他在湖南的統治地位，但是，这时事实上已經成为不可能了。

关于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仅就个人接触所及，回忆如上。湖南的老年人士，知道詳尽的还有不少，尚望补其缺漏，正其疏失。

湖南光复及四十九标援鄂

余 韶

(一)

湖南辛亥九月初一(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响应武昌首义,主要力量是陆军第二十五混成协(又称新军或常备军,以后简称新军)。但是巡防营、水师营也曾及时响应,一致行动。当时我(原名余斐生)是四十九标二营左队四棚的一个副目,对于军事情形是耳闻目见的。现就记忆所及,东鳞西爪地写出来,以供参考。

新军受革命宣传的影响有年,素质较优。协统姚广舜,是一九〇四年由湖北陆军中挑选来的。以后逐渐由将弁、武备、兵目、陆军速成这些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接替了行伍出身的军官。而士兵是不能升官的。当时有这样的话:“副目出了头,正目封了侯;若要刺刀长一节(长一节就等于官长的指挥刀),除非四镇成八协。”

一九〇九年,又有日本士官生余欽翼、曾繼梧、王隆中等十余人分任教练官、管带。而士兵中有文化的也很多(有秀才、中学生),喜欢偷偷地阅读《新民丛报》、《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刊物。因此,革命风气比较开得早些。陈天华那首“大地沉沦几百秋,黄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年事,同种何人雪寇仇”的诗,也感动了一些人,加深了对清朝的仇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九〇六年,

禹之謨入獄被杀后，有些人看了他的披发遺象和传略，深觉可悲，可惨，可敬，引起了对清廷官吏的无比愤恚。

新軍中有些人与同盟会有联系，如陈作新在炮兵右队当排长时，曾将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印成小册子散給士兵看。管带刘玉堂知道了，本拟将陈作新逮捕送协部法办。队官陈嘉猷說：“此事一經正式揭露，牵涉必多，鬧大了不好收拾。不如設法将陈作新調开，消患于无形。”刘玉堂深以为然。不久，就以陈作新不宜于炮兵为詞，将他調到四十九标二营前队当排长。

一九一〇年，湖南大鬧米荒，飢民搶碓坊、米店，燒撫台衙門。全城鼎沸，情勢汹汹，軍警全部出動戒严。陈作新認为这是农民起来了，想乘机大举，連忙去找管带陈強說：“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們拥护管带。”陈強問：“陈排长，你讲什么啊！”陈作新說：“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排长多嘴。”陈強怕惹祸，故裝不懂，喊声：“护兵，陈排长吃醉了酒，送他回去。”以后又借故将他撤了差。

焦达峯是一九一〇年七月回长沙的，住在玉皇坪陈作新家。閻鴻飞、李洽都同焦达峯很接近，帮助他与軍隊及各方面接头。

湖南的清廷官吏，对革命风声早有所聞，想极力預防与压制，派出許多密探刺探党人行動。中路巡防营統領黃忠浩（眇一目，多机詐，人稱“小諸葛”）向撫台余誠格獻策：新軍要造反，只有巡防营靠得住，可将新軍分散开往各县，削弱革命势力；調巡防营集結长沙，巩固城防，以資鎮压。一九一〇年八九月間，先后将四十九标第一营开往通城，第三营开往蒲圻、羊樓司；五十标第一营（欠后队）开往醴陵、攸县，第二营开往宁乡、益阳，第三营开往常德。留在长沙的仅有四十九标第二营、五十标第一营后队、炮兵营、工程

营、輜重队、騎兵队。十月十日前后，調到长沙的巡防队有十多营，他們都发足了子弹，駐在四面城牆上。其实，巡防营的革命情緒虽不如新軍，但其中有很多人同情革命的，尤其是由新軍过去的积极分子(如徐鴻宾、楊振基)与党人早有联络，互通声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一声炮响，湖南新軍士兵人人兴奋，个个激昂。原有代表及新进积极分子在外面的活动更加頻繁，或与党人接头参加开会，或与各部联络互通消息，并先后在紫荆街、賈太傅祠、水陆洲、清水塘、朱家花園等处开会。但在清吏严防、密探四布之下，有时人未到齐，有时会只开一半就散了。少数人的会谈反能避开密探耳目，議出点結果。当时作出的措施有：派袁天錫往宁乡雇来刻字匠至落星田定忠客栈密刻都督印信；派袁劍輝赴宁乡购来小錘子(小刀)九十九把，准备发給有武术的人出外活动；在义昌祥衣店定做号衣(店主刘芝德是同志)；派周岐、李洽、唐容在实业学堂造炸弹；推定洪复生、洪兰生、余鯤、李午云、余化龙等分别与水师营联络等等。总之，压力愈大，抗力愈强。后来，新軍的人竟暗藏刺刀，准备与密探格斗。

武昌首义消息传来后，在营士兵不論白天晚上，操場讲堂，三、五个人一碰头就議論紛紛。有的說，湖北反正了，湖南应赶快响应；又說，湖南接应慢了，只怕湖北站不住。有人說，怕巡防营反对。也有人說，巡防营不会反对，硬要反对也不怕。性子急的人还想跑到湖北去投效，参加打仗。多数人主张要在湖南搞起来，反对个别地跑到湖北去。每逢代表出外回来，就忙着打听消息，詢問如何行动。羣情激动，有一触即发之势。新軍紀律素来是严格的，此时为形势所迫，官长們对于各代表外出不敢过問，对于在营士兵的談論也不管了，偶然碰到，也裝做不見不聞，悄悄地走开。他們既

不敢参加，也不敢阻挠。

十月十七、八日，焦达峯、陈作新与安定超、丁炳尧（四十九标二营左队一棚、九棚正目）、楊玉生、徐鴻宾等密議决定：十九日晚上起事，由炮兵营的吳舜臣（編者按：《湖南省志》第一卷作余舜臣）在馬房草堆放火为号。但部队沒有都通知到，且事泄，吳被捕（他到九月初一反正才出来），未成功。

十月二十一日，忽听到炮兵营要开差，此时羣情憤激到了极点。因为当时一般人認为大炮有无上威力，以为炮兵营一开差，起义就搞不成了。焦、陈及积极分子連夜开会，准备不顧一切，于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起事。当时拟定：以四十九标二营（欠后队）联合炮兵营由小吳門入城，打撫台衙門；四十九标二营后队邀五十标进北門到荷花池軍装庫搶子弹；工兵营到葯院子（現在的湖南医学院）邀輻重营、馬队，由北門进城，占領草潮門、大西門一带，并担任西城巡邏。但計劃虽定，一时无法通知部队，預定第二日清早要各积极分子向部队传达。怕传达不到，又派人到軍隊必經的路上与部队联络，指示行动。

十月二十二日本是星期日，照例放假。左队官长們有的头晚夜假未回，有的吃完早飯就出去了。只有士兵得了要劲的消息，沒有一个出外，都扎紧板带，靜坐等候。前、右、后各队的情形也一样，彼此对着窗口，以目示意。

左队的安定超、刘光荣、駱兆荣（四棚正目）一清早就出外联络去了。八点左右，丁炳尧跑得滿头是汗地回来，取出两个哨子交給李希能、傅勋华（傅現尚健在）二人，喊一声：“吹！”哨音剛起，大营門的集合号也响了，大家取枪下樓，嘩啦嘩啦一陣响，都跑到营部搶子弹（新軍平时不发子弹）。有的搶到一两顆，有的搶到一两排

又分給沒有搶到的。大家跑到營集合場，習慣地按着前、左、右、后的次序站成連縱隊、營橫隊。這時沒有一個官長，只有前隊隊官胡兆鵬默默地走來，大家也默不作聲地看着他。相持了一會，胡以溫和的語氣問：“弟兄們，你們今天要做什么呀？”我見沒有人答話，就站出來說：“我們要排滿興漢，請隊官指揮。”胡慨然說：“好！”抽出指揮刀走在前，隊伍成四路縱隊跟着出了大營門。這時，工兵營的隊伍也趕來了。走到惜字爐，路邊有人喊：“快去邀炮隊進城呀！”前面的隊伍加快了步子向炮隊走去。又有人喊：“后面的隊伍快去邀輜重營，馬隊走北門進城啦！”工程隊就跑過去了。

炮隊的士兵也是作好了準備坐在棚內等候。我們的先頭才進側門，他們就嘩啦一聲擁下樓，到炮房把大炮拖出來，接着步、炮秩序向小吳門急進。

這時，城門关了，城牆上站滿了巡防營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裝的。大家一怔，趕快把隊伍沿城牆下擺開，一片聲喊：“開城！”巡防營的人帶笑地說：“城門鎖了，鑰匙撫台衙門拿去了。”城下的人喊：“不開城就打！”城上的人都俯身擺手：“不要打呀！已派人拿鑰匙去了。”我喊：“這時還要什麼鑰匙，把鎖砸爛！”正在這時，由新河開來一列火車，我們喊停車，打了几十槍，火車開過去了。又回來喊開城，有的要爬城上去，有的喊“開炮轟城！”炮兵營就拖兩門炮對城門口一擺，啪啦兩聲拉開炮門，將空炮彈裝進炮膛（因為當時沒有炮彈，只有操練用的彈壳），我們自己只好出來做好做歹地喊：“莫打，打不得啦！這一炮開了，小吳門正街的人都會死光。”當時怕有變化，炮兵營有一連到校場坪占領障地去了。

正在相持不下，忽然城門開了。原來新軍中清早進城負責采買的人得到消息，都擠到城門邊來了。工兵營的賴福春（大個子，

力大，外号賴草包)等將城門鎖打開，眉飛色舞地跑出來喊：“城內曉得了，快進去！”步營就進城向撫台衙門走去，炮兵把炮拉上城，向城中放列。

城內的人民都興奮地站在路邊看，還有些鋪子當時就攜些白布旗子掛起來了，表示歡迎。

我們的隊伍走到樂古道巷口，街邊有人喊：“快去打撫台衙門！”胡兆鵬帶着前隊跑步去了。又有人喊：“快到荷花池劫子彈！”我就帶左隊拐灣經茅亭子到荷花池子彈庫去。

子彈庫的大門是開的，沒有衛兵，有一個人似是庫員，站在屋簷下笑着向一旁嘍嘴。我們順着這個方向走去，進到彈藥房間。這時，二營右隊也跟着來了。大家把子彈取足，連忙經稻谷倉向撫台衙門奔去（二營右隊好象是到藩台衙門去了）。走到又一村，本隊隊官楊萬貴來了，老遠就揚着手高興地喊：“好了！好了！撫台衙門打開啦！黃忠浩捉到了！我們到諮議局去。”

胡兆鵬帶着打撫台衙門的隊伍，一到轅門外，那裡的衛兵是善意地對待我們的，我們的士兵也喊：“弟兄們不要多心，我們都是漢人，我們只反滿人。”當時衙門內的衛兵營立刻表示和我們一致行動。進入大堂，余誠格正和他的衛隊營的一部分人講話，一見我們到了，裝作很鎮靜地說：“弟兄們，我們都是漢人……湖南都是好百姓，你們不要殺人。”隨即用白布親書“大漢”二字，叫人掛在桅杆上，他就進內堂去了。大家見他表示還好，就沒去管他。

炮兵營頭目吳連賓、李金山同前隊一路進去的，想抓黃忠浩，但不認得，只是喊莫訛黃忠浩跑了。其實黃忠浩就站在余誠格的旁邊。他後面的一個差官向前嘍嘴暗示，大家擁上去，把他抓出來，往外拖，當時就有人打了他幾個嘴巴，有的还用刺刀在他的背

上戮，拖到小吳門，把他的頭割了下來，掛在城牆上示眾。

焦達峯、陳作新隨即進了撫台衙門，把撫台衙門改為都督府。余誠格當晚在撫台衙門圍牆上打一個洞潛逃了。聽說有一個大士紳幫助他逃走的，余還在他家裏歇了一夜。

四十九標進入撫台衙門不久，五十標易堂齡帶的隊伍也由又一村側門進入撫台衙門。

我們到諮議局後，楊萬貴說：“紳商各界要到这里開會，我們擔任保護。”當時派出幾個衛兵，其餘都架槍休息。

下午一點鐘左右，開會的人陸續進來，焦達峯、陳作新也穿着軍服來了。陳作新一見我們，就走攏來說：“弟兄們，你們都有大功，個個要升官。”四十九標教練官王隆中也來開會（標統黃鸞鳴奉命到北洋閱操未回），協統蕭良臣躲在協部未動，下午就潛逃了。

過了一會，會議廳已到了六、七十人，長褂子最多，有的交談，有的私語。隨即開會，焦達峯發言：“我是奉孫文的命令來的。孫將湖南的事交給了我。”接着又有幾個穿長褂的人發言。我站得很遠，聽不清。最後，看見一個人拿着一張大紅紙鋪在桌上，另一個人執筆寫，有些人就圍着看。墨迹未干貼在牆上：“公舉焦達峯為正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後來有個自治會的人（聽說他叫常治）發言。他說，現在舉的正副都督是臨時的，將來還要正式改選。焦達峯聽了，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有人說，焦曾拔刀示威，但我當時未看見）。當時有個巡警道申茂錫和長沙縣知縣沈瀛因不贊成反正，當場決議，將他們兩個處死。還有一個在外面趁火打劫的，也在諮議局門外殺了。

五點鐘前後，我隊奉命到藩正街保護官錢局（現在湖南省人民銀行處），局中人員非常歡迎我們，弄了很好的飯菜招待。

这时，全城已基本安定下来，大家以为没事了。象平日一样开铺睡觉，我还钻到大門内一个柜箱中睡了，門口只派了两个卫兵。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响，子弹由前門打到里面来了。大家慌慌张张地起来，抓好枪，见两个卫兵已倒在血泊中（一个叫夏纪佑，另一个忘了他的名字）。队伍挤在中进門口，楊万貴也怔住了。我喊发冲锋号冲出去。随着号声，大家喊着：“杀！……”冲出門，枪声立即停止了。我們向两边街上追了一阵，沒追到人。后来打听是巡防营一部分人想到官錢局来打起发的。

次日下午，我队又奉命开到金盆岭担任警戒。忽然传来风声，“有几个巡防营要替黄忠浩报仇。”一时满城风雨。有的說，由常德开几个营来了；有的說，有一个营已到了天心關；有的商店还关上鋪門，人人紧张起来。新軍預备对付，陸軍小学約二百人也到了校場坪警戒。过了一阵，还是无事，大家虛惊一場。

十月二十四日，我到城内去，走到都督府，看見陈作新、焦达峯在大堂上摆两张大桌子办公（陈在外些，焦在内些）。他們身上都斜挂白布帶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还盖着大印。其余职员也是如此，写着自己的职銜。我还看見一个高大个子，穿着軍服，挂着指揮刀，头戴一頂軍帽，上有四道金边，两边各有一个金衬，紅宝石帽徽。旁人告訴我說，这就是赵春霖，原任巡防营管带，新委第二师师长。我看着他那神气，心内发笑。因为师长的軍帽只有两道金边，两边各有三个金衬，而軍长的軍帽也只有三道金边，他竟搞出四道金边、一个金衬来了。

当时前来要官求职的很多，焦、陈应接不暇。我看到一个青年人站在大堂上，焦达峯問他做什么，他說：“我会写字”，焦往里面一指，說：“你去当書記吧！”这人去到里面，看到几个人背着白帶子，

上面写着“一等書記官”、“二等書記官”，人家指着旁边桌上一捆空白帶子，要他自己取一条写上职銜，他就拿了一条，写了“三等書記官”五个大字。后来看到人家要官不怕大，他又后悔沒有写成一等。又有吳連宾(湘乡人)向焦、陈說：“我这回是有大功呀！我要招一标人”。焦、陈也不敢还价，就写了一个“某标标統”的白帶子給他，他領了两万块钱去了。后来听說，吳第二天又去要錢，軍需說：“标統，你昨天剛領了几万块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細眼才行。”吳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嘛个細眼！”另外还有几个在那里表功要官的。这些人大有拔劍击柱之势。我觉得太乱，不以为然。陈作新由焦达峯桌边走來，看見我就招手喊：“你來了，到这里來坐。”我走到他的办公桌边坐下，他很亲切地問：“你想搞什么？”我被他問住了，因为我根本沒想到这一层，来这里只是看看熱鬧，没什么目的。只好答道：“我不曉得搞什么！”这时焦达峯那边有人找，他又起身，对我說：“你坐坐，不要走，我就來的。”我坐了一会，不耐煩，走了。

十月二十五日，标部传来命令：扩充軍隊，准备派人去招新兵，正副目通通升連排长。有些人就赶到藩城提荒貨店去买指揮刀，一下就买光了。我也买了一把。

(二)

湖南起义成功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援鄂。十月二十六日，四十九标二营左队代表丁炳尧、右队代表王奋武和二三党人在都督府(又称軍政府)，听見出兵援鄂及巡防营管带甘兴典請愿前去援鄂的消息，兴奋地跑回营來邀各代表到标部开会，說：“現在就要出兵援鄂啦，巡防营甘兴典想去，我們该怎么办？”左队正目駱兆荣首先

发言說：“援鄂應該新軍(当时称陆軍为新軍)去，新軍又只有我标容易集中(是时五十标分駐益阳、常德、醴陵、攸县，四十九标一、三营在湘鄂边境)，应该我标去。”有人說：“我們四十九标不可落人之后，請标統快去都督府表示！我們一定要去援鄂(当时四十九标有点名气，官兵都很自負)。”又有人問：“昨天升了官的人怎么办呢？”大家酝酿之后，說：“队伍莫扩充了，官莫升了，打完仗回来再講。”于是全体通过，立刻分往各队传达。我是左队四棚副目，虽为代表之一，当日在队值日，沒有参加标部會議。这些情况是駱兆荣講給我听的。

原来四十九标在头一天(十月二十五日)，已經奉命招募新兵扩充队伍，正副目升了連排长。听了到会代表来队传达标部會議經過后，全体目兵随即一致表示愿意援鄂。左队是刘光荣同一个党人(我不認識)来传达的，他們激动地說：“标統已經向都督府告了奋勇，大家升了官的愿不愿意自动放弃呢？”正副目們不約而同地說：“官不要了，仍旧当头目，到湖北打仗去！”这时，大家已經意識到不打垮清軍，推翻专制，革命果实是不牢靠的，所以大家都愿援鄂，并不看重那新升的官职。

各代表得到各队表示后，馬上去报告标統王隆中(前标統黃鸞鳴被派到北洋閱操去了，王隆中是首义这天以教練官升任标統的)。王隆中得报，忙去都督府請纓，焦达峯、陈作新极其讚許，立刻决定四十九标首批援鄂，即日用船舶輸送。命令还没有下来，全营都晓得了，赶忙准备出发。有多余的衣物和新买了指揮刀的人忙将衣服和指揮刀送回家去，沒有家的人将衣物存放队部儲藏室。六棚刘靜安由外面回来說：“别的队上要取消軍帽，改打包巾”，三棚正目刘光荣搶先贊成說：“扎包巾打仗便当些。”多數人一附和，就有

些人上街买青布或縐紗做包巾。我是不甚同意的，但也只好勉从众議，上街买了一条縐紗包巾。

二十七日下午，全营在大西門上了民船(大盐船)，一陣子将辮子剪了。王隆中升了第一协統領，三营管带卿衡升任标統，魯滌平升管带。但是并未扩充部队，仍然只有四十九标一千七百多人，王隆中仍住标部。次日早晨开船，紳商学各界和各机关都派代表到江干放炮竹欢送，都督府的代表是軍务部长危道丰。各队的船在炮竹声中渐渐离岸而下。目兵們以舒暢的心情坐在船艙里，有的练习扎包巾，有的用通条、油布擦枪膛枪机，也有取出自己的子弹用油布擦拭的。

十月三十日，我排的船行至一望无际的洞庭湖中，船攔了沙礁，大家紛紛脫衣下水，一齐使劲，几个背弓，船就流动了，大家赶快爬上船，还有十几个人来不及爬上船，离船一二丈了，赶快用脚划子接他們上来，一个个冻得发抖。傍晚到了岳州。这天是重九，許多人忙着上岸找东西吃。在岳州休息三天，本标一、三营(三营欠前队)的同志都来了，看見二营的同志都剪了辮子，改扎包巾，他們就照样办，很快地全标的装束都成了一致。一营管带梅卓敏逃跑了(一說王隆中准了他的假)，由督带官梁錫球升任管带。十一月二日，有湖北背叛了革命的一个标逃来岳州，經我一、三营将其繳械遣散。他們沒有抵抗。后来听說守卫汉阳兵工厂的鄂軍宋錫全协見汉口战事吃紧，率部逃入了湖南，我們解决的叛軍，不知是否就是宋部。

湖北派了一艘快利輪船到岳州接运队伍，我一、三营坐上去了，二营的民船則改用小火輪拖带。十一月三日，續向武昌进发。我第二营是于五日到武昌上游某地上岸的，全标駐在两湖书院。第

二天，我們移駐江邊甲乙丙棧，軍政府犒賞每隊豬肉一百斤。

十一月八日，全標开到兩湖書院听黎元洪都督訓話，隊伍歸卿衡指揮。八時左右，王隆中陪着黎元洪、黃興和幾個高級幕僚來了。黎騎一匹醬色大馬，穿着黃呢軍服，黃皮馬靴。吹過敬禮號后，閱隊開始。黎元洪按轡徐行，在各隊前面檢視一周，接着講話。他的聲音洪亮，講話內容記不全了，大意是：自從滿韃子竊據中原，我們漢族做了兩百多年的奴隸。現在是我們復興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推翻清室，還我山河。你們四十九標是訓練有素的軍隊，在湖南起義立了大功，現在又來這裡打清軍是很好的。我看了你們大家身體壯健，精神飽滿，一定能打勝仗……。

當時有人告訴我，站在王隆中上手那個穿青呢衣服，相貌魁偉的人，就是黃興。這天他沒有講話。

湖南四十九標是訓練了七、八年的軍隊，步伐當然較整齊一點，軍容較壯一點，兩次進出武昌城，兩傍看的人很多。有的嘖嘖稱贊地說：“好隊伍！好隊伍！”也有說：“這才是來打仗的隊伍！”其實慚愧得很，後來兩次的仗都沒有打好。原先湖北方面以為王隆中有四、五千人，想是被那個“第一協”的空頭銜所誤。前面說過，我們只有一千七百多人，武器也只有步槍。標部本有幾挺重機關槍，卻留在長沙沒有帶來。

十一月九日，全標渡江至漢陽，駐黑山十里鋪一帶，標部駐許家灣。因為祠廟空屋不夠住，又不願占民房，只得把一部分露營。軍政府發來餅乾、蜜橘很多，我們吃了好幾天才吃完。第二營擔任漢水西岸向漢口警戒，我為獨立軍士哨長，在河邊小叢樹里向對岸觀察很久，毫無動靜，連老百姓也沒有看見一個，不知北兵在哪裡。右隊副目胡秋廷也在我左翼放哨，我邀他設法同過河去看看，他說：

“莫急，让我的盒子炮(十响驳壳)试射一下看。”他向对岸打了一排子弹，对面一草堆中钻出两个北兵退上岸去了，胡秋廷说：“这不比过河去好嘛。”

駱兆榮只想去搶北兵的机关枪。他和何得清等几个力气大的“猛子”(湖南話称勇猛的人为“猛子”)商量，用鋼板打成盾牌，一人持盾，一人持枪去接近敌人。画了一张图样交队部派人去打盾牌。队部打了三面来一試，重了拿不动，輕了挡不住子弹，而且只能掩护一人，結果沒有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兵們对作战是有决心的。

二營管帶王振宇，身体笨重、行动迟緩，又很有点道学气，对行軍作战本怕有点吃不消，他和督帶官李宗彭騎馬同去标部。王前李后，李嫌王的馬走得慢在后抽一鞭子，王馬受惊一蹶，将王顛在地下。王振宇落馬之后，非常懊丧。他想：这不就是馬失前蹄，出軍不利么？他借口跌伤了，向王隆中請假，并怪李宗彭有意謀害，想取他而代之。王隆中的处理很簡單：王振宇請假照准，李宗彭撤差，由左队队官楊万貴升管帶。

十一月十二日，湖南二批援鄂軍第四协甘兴典部到达汉阳。他們是临时編湊的，新兵极多，軍容欠整。約在同时，徐鴻宾带来的敢死队二百余人到了汉阳江边，本标第三營前队也来归还了建制。

駐軍汉阳以后，連日听說有奸細来此刺探軍情，他們用三个銅錢一条紅布縫在衣襟底下为記。王隆中生性好酒，好杀人，据說被他杀掉的好細有七、八十人。有一次他判定几个奸細的死罪，正要上綁插标时，其中有億賴的要吃包子酒，王隆中摇了将人丹胡子說：“你是就要死的人，还吃什么包子酒啦！”那人瞪起眼睛道：“这是上路食，从来杀人沒有不吃包子酒的。”王隆中把桌子一拍說：

“我就杀起人没有见那个吃过我三个钱东西，绑出去！”甘兴典部有个叫李关基的(原在本标三营当过副目)，不知怎么误会被抓进标部。王隆中就喊杀，幸三营靠得近，有些目兵去讨保，才免一死。我想王隆中杀人是不通过军法审判的，难免不杀错些人。

我们在汉阳警戒了几天，汉口北兵的番号没有搞清，只听说有两三营是馮国璋带来的。十一月十五日，黄兴总司令下令进攻汉口，甘兴典协为左纵队，四十九标为右纵队。十六日下午出发，黄昏时在三眼过浮桥，乘夜向汉口前进。因为连日下了雨，道路泥濘，行动困难，十多里的路竟摸了一夜。拂晓时到达一道大堤(不知名)的北面，全标沿堤展开。七时后，各队伙伙送饭来吃。八时，黄兴、王隆中到堤上计议说：正面靠近敌方的一个村庄，妨碍我军展望，也怕北兵利用作支撑点，想派人去烧掉它。当有我队副兵李玉自告奋勇，携了引火具带跑带爬地去了。一会儿，村庄燃烧起来了。

这道长堤以南，是一大片平坦开阔地，毫无遮蔽物，靠近汉口市郊才有些小房屋短墙篱笆等等，北兵障地的前沿和翼端都没有侦察得出。王隆中一不区分各营队任务，二不指定攻击目标，就喊冲过去！各营队越过堤跑步前进，不到二百公尺，敌人机枪齐发，纵横扫射，弹如雨下。我全标目兵都伏倒地下，敌机枪一停，又都立起跃进。如此数次，冲到小屋短墙篱笆之线，距敌约一、二百公尺。我第三营冲到灰面公司附近，正该继续攻击，突破敌阵时，反而都停止了。官长们没有指挥，由目兵们各自为战。与敌相持至下午三时许，左翼甘兴典部开始动摇，纷纷溃退，本标第一营被其牵动，四时后，全标撤退了。我退到大堤上，以好奇心停下来，想看北兵怎样前进，等了一会未见北兵追击。迨我退到三眼时，浮桥拆了，

还有几个别队的兵在那里，我們找一只小船过河，听说东岸上游一里许山地里尚有我一营两个队占领阵地，掩护我軍撤退。

这一战役失败原因：1、无计划轻进；2、甘部新兵多，首先溃退；3、各队失去指挥，王隆中不指挥官，官不指挥兵。此役我标伤亡约二百余人，三营管带鲁滌平、三营前队排长王云山、司务长李炎光负伤，我队阵亡目兵骆兆荣、李希能、唐福生、李春生、邓炳耀、魏鸿亨等十多人。听说王隆中退回许家湾标部，莫知所措，惟有哭泣。

十一月二十日，北兵一个混成协由蔡甸琴断口来犯，我标第一营在琴断口警戒的两个队，抵抗约二小时撤退了。敌乘势向美娘山、锅顶山、扁担山前进。本标奉命防御该敌，占领汉水以南的金龙山等次高地与敌对战。杨万贵挑选敢死队数十人，协同鄂軍某管带向敌反攻，不愿北兵机枪扫射奋勇前进，由两侧攀登美娘山顶将敌击溃，斩获颇多。我队阵亡正兵李广田、李能平二人。敌复增加优势兵力来攻，我敢死队以众寡悬殊，只得撤退，美娘山得而复失。

二十二日，敌步兵数百在机炮掩护之下向我第三营猛攻，似欲向我中央突破，被我三营击退，打死打伤北兵很多。这次以三营前队战斗为最激烈。排长岳超、正目彭海泉壮烈牺牲，伤亡目兵四十余人。当该营正与敌人激战时，我龟山鄂軍炮兵的炮弹多落在我阵地上，造成一些死亡。三营派人上山交涉，该炮兵不认账。我第二营后面较高地也有枪弹落在我阵地上，队官李济安叫我上去察看，我从侧面爬上坡时，有些鄂軍在此散开，他们将头埋在地下，两手举枪瞎放。一位官长走来向我道歉说：“这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不会射击，请你们原谅。”他随即率其所部百余人移往左翼去了。入夜我排长方大福负伤，正兵李友胜阵亡。有两个日本人来我营阵

地看过两次，据说是黄兴的朋友来助战的，其中一个是谁野长知。

十一月二十四日，黄兴以四十九标伤亡重大（阵亡九十六人，伤的人数记不清，大约没有超过四百人。当时有人传说伤亡千余人非事实），调武昌休息。我一、三营阵地由湖南第三批援鄂军第二协刘玉堂所率的第三标卢明亮接替，二营阵地因刘协毛树骏标未及赶到，由鄂军一部接替。

十一月二十六日，刘玉堂率部反攻美娘山，中炮阵亡。官兵伤亡三百余人。是日下午，盛传黎元洪将令本标再赴汉阳作战。其实黎来慰劳王隆中时，虽有此意，并未作出决定。入夜后不知为什么部队骚乱起来，士兵们纷纷荷枪沿着江边大道向金口方向疾走，队伍很零乱。我刚由城内出来碰见，很诧异，问他们什么事？都不答白。复问一句，始有人头也不回地说：“到金口过江包抄北兵去！”我将信将疑地站住了，一会儿又见后队十多人走过来，问他们往哪里去？一个姓罗的（熟人，忘其名）边走边说：“到岳州挡北兵去。”我看情形不对，转身去看王隆中怎么搞？一进标部，只见王坐在桌子旁边哭，显然易见，队伍是自由行动的。我回到本队，同棚的胡子德背着他的包袱、枪，又提着我的枪在等我，一见面他发急地说：“都走了，你儘不来，走啊。”我二人急行十余里才赶上本队一部分人。次日在金口，大家还有点顾虑，就地停留一天。后见无人拦阻，始迤迤回湖南。一路零零落落，有十余人一起的，有几十人一起的，也有碰见船就搭船的，但未发生抢劫事件。各营虽在岳州收容一下，有些人还是一径自由回到长沙的。甘兴典协不知由何处渡江回湘的，他们沿途抢劫，队伍到岳州被解散，甘本人回到长沙被梟首正法。

四十九标回到长沙不久就编为第四师，协、标改称旅、团，王隆

中任师长，卿衡、陈强任七、八旅旅长，鲁滌平、朱光斗、楊万貴、胡兆鵬任十三、四、五、六团团长。此时紀律坏了。沒有升得官的老兵还有七、八百人，他們驕恣野蛮，橫冲直撞，鬧娼，鬧戏院，动辄和人打架生事。譚延闓无可奈何，将四十九标老标統、威望素高的黃鸞鳴請出来当軍务司长，囂风才漸漸地制住。次年九月即被解散。

一九一二年回湘籌組國民黨 支部和辦理選舉經過

仇 鰲

辛亥革命以後，同盟會內部起了分化，組織趨于渙散，成員中有一些人實際上離開了組織；有一些人則另樹旗幟，組織了中華民國聯合會和民社等團體。原來代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憲友會和辛亥俱樂部取銷了，其成員分別組織了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統一黨和國民協進會等團體。不久，這些原非同盟會的團體和由同盟會分化出來的團體，合併組成統一黨，以後又進一步擴大組織，並改名為共和黨。與此同時，還產生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民國公會、共和實進會、共和促進會和國民新政社等較小的團體。

當時在參議院中，還是以同盟會為第一大黨；與同盟會相抗衡的共和黨為第二大黨；介乎二者之間的統一共和黨為第三大黨；此外就是以上列舉的那一些小黨派。同盟會雖然是第一大黨，卻沒有能夠占到壓倒的多數。同盟會面臨着同袁世凱及與其相援結的共和黨在參議院內、外的鬥爭，同時又處於小黨林立的形勢，這對同盟會顯然是不利的。為了改變這種形勢，同盟會的主要骨幹分子宋教仁，主張聯合政治主張相接近的一些小黨組成為一個壓倒

一切的大党。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便和参议院内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小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的斗争任务，就是争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好好地组织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马上做出详细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组党，成立各省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同盟会还在未改组以前，就已注意物色各省组党和掌握选举的负责人。当时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复杂和混乱，象湖南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情况复杂和混乱的省份，人选更宜郑重考虑。

湖南在辛亥起义以后不久，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被反动分子杀害；原属改良派的谭延闿，因利乘便，继任都督。当时湖南政局极不安定。同盟会对焦、陈被害，深为愤慨。反动势力虽然阴谋杀害了焦、陈，但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不能不使他們反侧不安。湖南响应首义比较仓卒，同盟会对政治

工作的准备不足,干練一些的人又都不在湖南。比較有办法的,只有一个原任司法司长的洪春台,隱隱成为湖南同盟会的重心,不幸在这时候死了。湖南方面向北京請示,要求派人回湘主持。

同盟会在北京的負責人,要派我回湖南負責党务和选举工作。那时国民党改組正在进行,成立大会还没有开,总部还没有成立。作为一个老同盟会會員,对于同盟会改組为国民党和进一步經過竞选而成为議會中的多数派以實現政党的責任內閣的計劃,我是始終与聞,而且是完全贊同的。但是我当时在北京办报(《亚东新聞》),无意办党和从政。实在說,我办报也是勉強的,本意只想看到正式政府成立后,就去专心研究学問。所以对于回湘的使命,再三推辞,不肯担任。北京負責方面,认为这个任务以我去最为相宜,再三敦促。我考虑到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問題,最后还是同意去一趟。但我提出以下的条件:在圓滿地改組成立党的湖南支部,并办一次胜利的选举后,就要让我引退。在以上条件得到負責方面的同意后,我于一九一二年六、七月間回到湖南,筹备党的改組工作,并負責掌握湖南的选举。

当时湖南政治上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会党在湖南首义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影响。同盟会和以前的华兴会,一貫以联络、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策略之一。一九〇六年湖南哥老会的焦达峰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調查部长,专負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任务。他联络各省会党首領,共同发起組織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运动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会党,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一九〇九年,焦达峰往来湘、鄂之間,在汉口設立共进会的总机关,在长沙設机关部。在共进会的策动下,两湖的革命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九一〇年，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策劃長江流域各省的起義；並以共進會和其他的會黨團體為基礎，成立湖南、湖北兩省分會，委派焦達峰主持湖南的革命活動。

這種聯繫和利用會黨的策略，在當時是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的。一九〇六年的瀏、醴、萍大起義，就是在華興會領導之下，由當地的哥老會、洪福會、武教師會等會黨團體搞起來的。武昌起義和湖南響應時，都曾得助於會黨的力量。所以湖南起義後，焦達峰被推為湖南都督，是順理成章的。

會黨在排滿革命時，雖然有很大的積極性，並且表現了它的力量；但在起義以後，要搞政治鬥爭和政治建設時，它就一籌莫展了。不但如此，在湖南起義後的初期，政治上出現了一種江湖作風，頗為一般人所不滿，以致被反動分子所利用，進行煽風點火，造成殺害焦、陳的事變。

事變以後，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還是在同盟會方面。而同盟會却拿不出一套辦法，江湖作風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改變。我回湖南後的第一樁事，就是要把這種江湖作風改變為政治作風。當時我把北京方面所決定的一套辦法拿出來，同時針對湖南的具體情況，提出我的主張和辦法，得到各方面的一致歡迎。

我的辦法是首先把湖南各方面的力量聯合起來，團結在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之下，形成一個聯合戰綫，以便和袁世凱所代表的極端反動的軍閥官僚勢力作鬥爭，而取得選舉的勝利。

原屬同盟會會員和不屬同盟會的革命派人士，是國民黨的基本隊伍，當然是我首先應該團結的力量。他們對於原來的江湖作風不滿，但又苦於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在和我接洽之後，馬上消除過去的徬徨苦悶的情緒，满怀信心地團結到國民黨的領導之下，發

揮各个人的力量。

同盟会内的会党分子，对于焦达烽的被害，一直气不能平。我过去参加革命工作时，既搞政治，也搞江湖，略为懂得江湖的一套。我回湖南后，特别团结他们，但同时把现在不能搞江湖一套的道理，向他们反复说明。经过一番努力，一方面调匀了他们的气，一方面使他们接受我的一套政治办法，而积极加入到组党和选举的工作中来。

原属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人们，过去虽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但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中间许多人抛弃了君主立宪的思想，对于议会民主制，也都表示赞同。正当他们徬徨无计的时候，只要稍加拉扯，大多数都转到我们旗帜下来了。

当时湖南都督是谭延闿。他过去是宪友会在湖南的主干；革命成功以后，他的思想情况当然与上述的宪友会分子基本相同。在焦、陈被害以后，湖南政治上没有重心，他就应运而生。我当时认为谭这个人要完全站在反动的一边他是不干的，因为他也认识孙中山、黄克强和同盟会的力量，不敢过于立异；但是要他死心塌地地站在革命方面来，当然也不可能。在焦、陈被害以后，同盟会与谭延闿有矛盾，不过比起同盟会和袁世凯的矛盾来，就是次要的了。

我回湖南是代替洪春台在党内负责。我把国民党的一套办法对谭延闿谈了，他很表赞同，以后凡是我們提出的办法，他都欣然乐从。后来黄克强、宋教仁先后回湘，他表示非常钦佩。他说宋教仁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因此他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也决定拉他进来。谭在湖南不但代表原属改良派而新近转向革命的一些人，同时还代表一些旧人，把他拉过来以

后,这些人也跟着过来了。

我以前没有在湖南工作过,这次回湘对于湖南的政界、军界、社会人士和江湖朋友都是初次见面。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于是一面着手改组国民党,一面布置选举。

因为我是在北京国民党总部成立以前两个月就回到了湖南从事湖南党的改组工作的,所以在总部成立的通知到湘后,不到一个月,即在九月下旬,国民党湖南支部就正式改组成立了。

为了扩大国民党的基础,并便利党的政策的推行起见,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谭延闿为支部长,我为副长。实际上,党务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以下还有总务主任周声骏、政事主任刘武、交际主任周震麟、会计主任陈炳煥、文事主任吴景鸿。支部内还设有評議會,評議長龙璋,評議員刘人熙、陈强等五十七人。又設有政务研究会,会长楊德邻,副长罗杰;法制主任彭兆璜、政务主任陶思曾、经济主任周砥、外交主任陈安良、军务主任陈嘉祐、教育主任萧翼鯤。从以上机构的設置和人事的安排,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所联合的方面之广。

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湖南的军事、政治都已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谭延闿任都督,我任民政司长。当时政府的組織,还保留有前清制度的遗迹,都督相当于前清的撫台,民政司长相当于藩台。各县县长都是由民政司直接委派的。我当时和谭延闿分工,军事方面由他去对付,政治和社会方面都由我负责。这样一来,党的一切决定都可以在軍、政、社会各方面得到贯彻。

国民党湖南支部改组成立以后,接着就布置选举。这是一个重大工作,为当日民主事业成败之所关;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是

只可成功，不可失敗的。成功的關鍵在哪里？首先在于民政司。民政司是主办全省选举的机关，民政司长是法定的选举总监督；各区的分监督也是由民政司选派的。其次，在于各县县长。县长主办一县的选举，并兼县选举监督；可是县长又是由民政司委派的。再就是由湖南支部派往各省组党的人，直接代表党来竞选。因此可以说，这次的选举是完全抓在我手里的。

在这里应该补说一点。我在回湘以前，北京方面曾有一个误解，以为选举是由司法司主管的，所以他们布置，要我接任洪春台的司法司。回湘以后，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北京的布置错了。那时湖南民政司是刘人熙，乃是湖南的老辈。为了完成选举的任务，由刘人熙让出了民政司，改由我来担任。这样，在选举工作上才能收到指臂之效。

我到民政司以后，把各县县长作了一番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于是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了。同时，由党支部分派了各县的组党人员，成立县的党组织，并立刻展开竞选工作。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每县都派了选举大员，党也派了视察员下去。我就这样布置了全省的选举网。

从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全省选举完成。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的选举工作，是以压倒的优势胜利完成了。同时，全国各省，国民党在选举中都得到了胜利。根据统计，众议院五百九十六个议席中，国民党得了三百六十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二百六十七席；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议席中，国民党（除去跨党的）得了

一百二十三席。如果在宪政正軌中活动，不遭到袁世凱的阴谋和武力破坏，国民党既然得到参、众两院的压倒多数，则正式政府的责任內閣，当然非国民党莫属了。

当湖南及其他各省的选举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宋教仁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回到湖南，参加竞选。因为临时約法規定，担任組閣的，應該是国會議員。宋教仁回湘后，湖南省議會选他做参議員。由于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抬出来了。

宋教仁当时到各处演說，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忌。他明白地提出：正式总统可举袁世凱，但內閣必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議席的政党組織，以符立宪政治的正軌。同时分析当时选举形势，說明国民党已經肯定要在国会中占到多数議席，因此他决定准备組閣，毫不含糊。这本是当时所謂先进立宪国政治家应取的正常态度，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又和湖南党政負責人商談組織計劃，同时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盘搞好。他邀譚延闓担任內閣中的內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因为譚的父亲譚鍾麟和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系拜把兄弟，他想利用譚和袁的世誼关系，在府、院之間起調協的作用。他还提出把湖南民政司长升格为民政长，統轄各司。他說在譚延闓进京担任內政部长后，由我以民政长护理都督，以便把湖南的政治搞得更好。

当时譚延闓及其他参加討論的人都同意了这个計劃，但我沒有表示同意。我說：我在去年奉派回湘以前，曾經提出条件，在組党及选举两事胜利完成以后，我不做官，也不办党，以便安心研究學問。这个条件，北京方面的負責人同意了，宋也同意了。我現在不能改变初衷，因此不能同意以上的布置。

宋、譚当时再三劝我同意这个布置，我坚决不肯，并說，等选举结束后，一定要离开湖南。爭論了一晚，他們最后叫我不要反对这一整个的布置。我說，对于計劃本身，我不反对，但对个人有关部分，必須郑重考虑。誰知他們认为不反对就是贊成，宋教仁根据那晚所談，即時把他的全部計劃电告国民党北京总部去了。

原来袁世凱派有偵探駐在长沙，探得了宋教仁准备組閣的全部計劃，报告了袁世凱，因而促使了袁世凱急于刺杀宋教仁，不能等他回到北京。因为宋一到北京，根据約法組織內閣，是无法加以阻止的。

不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袁世凱大肆搜捕党人，公然毀弃約法，停止国会，实行独裁。国民党的实现議會民主制的想法就这样終于破灭了。

至于我个人，原来打算在湖南选举结束后，即行离湘；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更促成了我的去志。袁世凱对于湖南国民党人士，必欲得而甘心者，有当时被叫作“麟（指周震麟）、凤（指譚人凤）、龟（指我，因为“鰲”字的本意为“海中大龟”）、龙（指龙璋）”四人，也使我在湖南留不下去。因此之故，不久我就离开湖南了。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 穆 如

清朝对湘西苗族的残酷统治

湘西有屯七厅县(凤凰、乾城、永綏、保靖、古丈、泸溪、麻阳等七厅县),多为苗族聚居区域。自乾隆、嘉庆时期,苗族英雄吴八月抗清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采用傅鼎“均田、屯兵、防苗、安边”计划,调镇台、道台各一员,坐镇凤凰。镇台以下设置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军职,共八十一员;马兵、战兵、守兵,共四千六百四十名,称为“镇标”。每年俸饷七万六千余两,由长沙藩库按季发给。官兵口粮则由屯谷开支。道台以下,设置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军职五十六员;练勇一千零六名,屯丁四千名,称为“道标”。俸饷口粮均由屯谷开支。在行政方面,道台独揽三府(辰州府、沅州府、永顺府)、一州(靖州)、五厅(凤凰直隶厅、乾州直隶厅、永綏直隶厅、古丈坪厅、晃州厅)、十五县(沅陵、泸溪、辰谿、溆浦、綏宁、通道、会同、麻江、黔阳、麻阳、保靖、永顺、龙山、桑植、永宁等县)之政治大权,兼握七县屯政,是当时有权、有势、有钱的官儿。道台的全銜是:“湖南省辰沅永靖兵备道”。当时人称它为半边抚台。凤凰更成为湖南、贵州、广西三省的军事重地。如贵州咸同年间的苗民反清,多调凤凰兵

协助西路統領周宏印前往鎮压。光緒中期，广西游勇肇事，又調凤凰兵随同湖南巡防軍統領黃忠浩前往鎮压。

当时清朝反动統治者对苗族人民非常歧視。如凤、乾、綏三厅，初設官时，多用旗員，旗官、旗兵可以随意毆辱苗族人民。县城五里以内，禁止苗族人民居住、經商、騎馬、坐轎。又置苗官以治苗民，所謂“以苗治苗”。并禁止苗汉通婚，限制苗汉两族人民往来。生杀予夺之权操諸官吏之手，苗族人民生命毫无保障，儼如奴隶主对待奴隶。

在土地方面，自实行傅鼎“均田制”后，苗族土地，寸土归公；接近苗区之汉民田土亦受影响。如凤凰厅之上五崗汉民田土“均三留七”；下五崗之汉民田土則“均七留三”。乾州、永綏两厅情况，大致相同，不过略有輕重而已。

凤凰厅的革命醞釀

武昌起义，长沙不稳的消息传到湘西各县后，道台朱益藩采取对抗态度，一面与省垣巡防軍統領黃忠浩秘密联系，一面分电乾州协台徐先发、永綏鎮台梁国治，密查党人和会帮，并严禁宣传，违則拿办；又密商黃忠浩，将凤凰鎮台周瑞龙所轄之鎮标精兵抽調一千六百余名，由鎮标中营遊击楊訖梨(黔阳人)率带赴省，一則增加省城防务，一則減削鎮标实力。朱則厚集兵力，扼守厅城，并監視鎮台周瑞龙及其任女婿田应全(同盟会會員，留日学生)、邑封张胜林、沈宗嗣等之行动。复派兵占据軍装、火药两局，使周更不敢有所举动。

田应全等因朱道監視甚严，周鎮台精兵又被抽調下省，軍装、火药两局复为朱道占据，鎮标所留之士兵，概未武装，不能战斗，未

敢猝发。处在这种形势下,田、张、沈密商,联络会党,发动员汉人民,从外进攻。暗与道标守西門之哨弁楊再春、守南門之哨弁向总如、守东門之領旗陈学斌、守北門之額外江斐全和駐中軍衙門之代理遊击馬子林等联络,由内接应。

田应全等联络道标官兵后,立即派人前往凤属之长宁哨,与哥弟会首脑唐世鈞接头,組織“光复軍”,并約定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袭击厅城。

朱益濬的城防布置

朱益濬亦非常机警,城防布置,随时調換,使人不易捉摸,难与官兵接头。这样,也就打乱了革命党人的接头計劃。如在十月二十七日以前,即将由南門至东門、北門的防务,改由道标左营一、二、三、四队替換防守。由北門至七步卡、笔架城的防务,由道标右营一、二、三、四队替換防守。笔架城以下,从山神庙到小西門防务,由道标哨弁楊再春防守。小西門到南門一带防务,由鎮标前营都司邹潤波防守。并从龙山县調回哨弁滕景龙,令駐守东門外大校場。另調枪兵一班駐守擂草坡碉堡内。东門外之小校場,則調长卡百总田应松駐守,与滕景龙取联系。刚由洪江解运枪弹回凤之哨弁方振鵬,副哨滕文显、郑能文,則令駐守南門外龙王庙,分兵向白羊岭、祠堂坪警戒。又慮楊再春兵力单薄或不穩,調郑能文助守,并兼管城防鎖钥。令警員袁星德率枪警十余名,日夜梭巡。共計城防兵力之布置約近千人,其所持枪械,均屬当时銳利武器。

凤凰光复經過及其影响

凤凰哥弟会首脑唐世鈞,既与同盟会會員田应全等商組光复

軍，确定举义日期后，立即派其亲信弟兄田平臣、周三林、田华堂、楊尊卿、田燕平、胡世古、龙冬狗、唐世华多人，分赴新寨、龙角洞、鴨堡寨、牛岩、得架、烏头、滿家坨等苗寨，与苗族会帮首脑接头。并指派其亲信彭順臣、唐偵元往来城乡传递消息。唐世鈞本人則亲下貴州松桃厅属之樟萬渙，与該地哥弟会首脑张尙軒接洽。张极力贊成，并立即約集会党及乡村羣众开会，到者一千五百余人，张說明“驅滿复仇”大义，待时出劲。至于新寨之龙凤山、龙角洞之龙廷貴、鴨堡寨之龙义臣、牛岩之吳正明、得架之唐世国、烏头之楊春元、滿家坨之龙光福等，一經接洽，无不乐从。尤其是各寨人民，听到要推翻清朝，共报世仇，更为热烈响应。他們統統于十月二十七日以前齐集长宁哨。先至四千余人，繼至五千余人，还有聞风赴义羣众跋涉在途者，絡繹不絕。当时距約定起义日期尙隔一月，唐世鈞恐聚众日多，风声泄露，乃不暇通知田应全等，竟于十月二十七日半夜出发，进袭厅城。

光复軍兵力之分布，以张尙軒之众約一千六百余人为一路，取道老官咀、祠堂坪，直袭西門。以龙凤山、龙廷貴、龙义臣、吳正明之众約千余人为一路，取道青坪湾、金家园直袭北門。以唐世国、楊春元、龙光福之众，約一千七、八百人为一路，取道擺草坡、老营哨，直袭东門。其余羣众，或劝其暂时回各寨，或留在后方接应。

城防的清軍官兵因朱益濬随时調換防地，田应全一时难与接头；加之唐世鈞等提前发劲，事前沒有通知，内外失掉联系，故张尙軒一路到达祠堂坪时，田栋臣前往叫門，郑能文不应。张众又被白羊岭守軍发觉，开枪射击，幸得左营守备田炳南，右营千总朱瑜林，事前密囑士兵，不准伤人，枪皆朝天发射，张众得以安全退却。

唐世国、楊春元、龙光福一路，到达擺草坡时，驻碉堡内之一班

清軍兵士都到河边碾房烧火取暖，毫无戒备，一經包围，全部繳枪。又軍进至小校場，又夺得屯丁枪械五十余枝，士气更壮。迨进至大桥头时，与滕景龙桥头伏兵接触，展开激烈爭夺战。双方战斗正酣时，楊趾梨由沅陵县派來請餉之一班士兵，正宿桥头客栈，聞警助战，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鎖桥头。又軍提刀持矛反复冲鋒，前仆后继，牺牲甚众，城内毫无接应。唐世国、楊春元、龙光福等为避免过多伤亡，有挫銳气，暫令向后撤退，再图大举。

龙凤山、龙廷貴、龙义臣、吳正明一路，进至金家园公安殿时，不見城上接应，又聞各方面枪声甚密，恐受包围，亦不得不向后撤退，待时再进。

当张尙軒等各路率众出发时，各营苗土备（苗乡中最大的土官，清朝多选用苗族中的坏分子充当，在苗乡擅作威福，压榨同族，較清官吏尤甚。）竟存观望。及至各路义軍撤退时，他們等在中途，拦路截拿，解城报功邀賞。如张尙軒及其部下二十余人，退至新寨途中，即被新寨苗土备吳国春截拿解城，壮烈牺牲。共計这次攻城之役，牺牲一百七十余入（包括城内外被捕杀之二十二人在內）。事后仅收获遺骸七十二具，分葬于播草坡、金家园、豹子湾三处。光复后，刻石立碑表揚先烈。

唐世鈞等攻城虽遭受損失，暂时撤退，但仇警未复，羣情更憤。唐等传书四方再大集松桃、凤凰、乾州、永綏四厅苗汉人民，誓攻凤凰厅城，擒斬朱益瀆。凤凰城内流言四起，一夕数惊。田应全、张胜林、沈宗嗣和新赶到凤凰城之同盟會員罗紹武、賀成达等乃乘人心惶惑，草木皆兵之际，由田应全用火砖密刊湖南軍政府印信，繕写布告，黑夜派人张贴于道台衙前之照壁墙上，分散兵心，更使朱益瀆惶惑疑惧，不敢妄动，只有困守孤城，坐以待毙。这样，凤凰、乾州、永

綏、松桃四厅苗汉乡村,就更便于号召聚众,图謀再举。时值凤凰鎮标請餉官滕代春、举人聶仁德由省回厅,尽量披露大局情况,并說:“省城要俟凤凰光复后才能发餉。我們回至途中,看到楊註梨已被鎮台长子周瓚,以奉同盟会会员之命,捆送湖南省湘西巡按使龙璋处法办”。传言之下,人心大悅,向义討賊,跃跃欲动。

田应全、聶仁德、张胜林、沈宗嗣、田学經、韓善培、梁叔銘,和同盟会会员罗經武、賀成达、青年学生向阴生、张伯琨,由省奉命回厅,策动光复之凤籍軍官楊新国等人,于冬月十二日,假借天王庙,召集地方父老和人民羣众开大会。由戴新門执笔写信送道台朱益濬,促其表示态度。朱見人心反清,大势已去,复函:“愿洁身引退,要求保全身家,护送出境”。十三日全城悬旗鳴炮志庆,电省报告光复。并經众决議,建立新政权,設“湘西軍政分府”,公推周瑞龙(湘潭人)为軍政长兼管屯政,张胜林管財政,田应全管交际,韓善培管教育,聶仁德为行政厅长,唐世鈞为鎮标前营都司,田栋臣提升哨弁。对朱益濬和凤凰厅同知张紹焮不予留难,註其出境。

清朝在凤凰厅、乾州厅、永綏厅皆設置重兵,号为“三厅兵”。軍政虽各不相屬,而行政則直隶凤凰道管轄。因此,三厅皆称为直隶厅。乾州、永綏两厅,一切行动措施,向唯凤凰馬首是瞻。凤凰光复消息传到乾州厅后,协台徐光发、厅同知李謙六,約請地方士紳及兵民羣众开会,申明愿交出軍政权,离厅回籍。經决議:“协台軍职由鎮溪遊击刘銳(凤凰人)接充;厅同知則电省派員接替。先护送协台徐光发(益阳人)回家。于冬月十五日宣告光复。永綏厅情况大致相同。靖州光复,原在长沙之后,凤凰之先,是由該州駐防軍隊領哨兼教練姚忠誠(乾州厅人)率众起义,直电省城宣告光复的,事为凤凰道朱益濬所聞,立即派兵前往鎮压,并悬重賞緝拿归案,姚因

众寡不敌，离职逃省。其他各县，虽闻风向义，因无兵力，不敢发劲。自凤凰光复后，乾州、永綏两厅相继光复；其他兵力薄弱和毫无兵力各县，一經传檄，都告光复。事后，聞旅省人士說：“凤凰光复电报到省，大街小巷鳴鑼宣传，人心大定。”足証凤凰辛亥革命之胜利，关系湖南整个大局实屬不小。

长沙响应起义見聞

陶菊隱

辛亥革命那年，我只有十四岁，接触面不够广闊，認識也很肤浅，但是我看到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早在革命前的几年，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已經日益澎湃汹涌，青年学生大多为民族主义思想所陶醉，都不安心讀書。大家認為，我們处在清政府的暴力統治下已有二百余年，今后还要受到洋人的更凶恶的統治，这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大家知道，革皇帝的命有杀头充軍的危險，但是不革命更有亡国灭种的危險，而前者还可死中求活，后者只有死路一条。这种看法和心理，在中年人和老年人中間也是相当普遍的。

我是革命前一年回到湖南的。在此以前，我在南京三条巷文昌宮高等小学讀書。那里姜、楊两位老师經常向学生講太平天国的故事，講得声淚俱下，而我們也听得涕泗交流。一天，老师帶我們游鍾山，这一星期就用“游明孝陵記”作为課文題，不少同学写了反映民族意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得到姜老师的鼓励和好評。我下了一个結論：明朝的勃兴和灭亡，都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的問題，而是与整个民族的盛衰成敗有关。姜老师一面給我鼓励，一面囑我不要写得太露骨。这件事至今記憶犹新。

回到长沙，我去考明德学堂，由于招收新生的日期已过，特許

我单独补考。堂长刘师陶老师只看了作文卷子，认为满意，就录取我为高年級的插班生。明德在长沙頗有名，主办人胡九先生（元僕）、龙大鬚子（璋），在当时是号称进步的教育家和开明紳士，諮議局議長譚延闓也是校董之一，大名鼎鼎的革命家黄兴在这个学堂里担任过体操教习（这是为了掩护革命活动）。龙璋的住宅“西园”在学堂的左侧，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就是在西园秘密成立的。我們在这个革命气氛浓厚的学堂里，經常听到唐才常被杀、陈天华投海、萍浏醴起义失败这类革命血淚史。唐才常的一子一姪都和我同班。我們經常到老照壁（地名）集益书店，偷偷买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彼此交換閱讀。我們这一羣青年小伙子，誰也不愿意做亡国奴，誰也不甘心做一人一姓的臣僕。我們的血沸騰了。

我回来的一年，恰好赶上长沙飢民搶米和火烧撫台衙門的大暴动。就在上一年，湖南遇到自然災害，粮食产量減少，但是昏庸媚外的政府官吏允許帝国主义商人运米出口，加以唯利是图的地主豪紳乘机囤积，以致米价一日数漲，人民活不下去。这次暴动反映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強烈意識，城内外洋行、教堂也被放火焚烧，一时火光烛天，全城鼎沸。我們虽被禁止外出，但都爬到高处瞭望全城烟火，都不禁低声叫道：“烧得好！”我們非常欽佩那位亲手鋸断撫台衙門轅門内帅字旗大桅杆的木匠，同时还加油加醬地传递着一些飞簷走壁的英雄們到处放火的故事。这次暴动虽被鎮压下去，但是人心思乱，皇帝的江山显然是坐不稳了。

同年十月，日本政府宣布“日韓合併”，这是又一次刺激人心的大事。国文教員用“哀韓國論”作为課文題，我們同学都写了痛哭流涕的文章。我套了杜牧的《阿房宮賦》写道：“韓國人不暇自哀，而我国人哀之，我国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他国人而复哀我国人

也！”这些文章都得到老师的鼓励和好評。

由于学生們的革命情緒日益高涨，終于有一天，学堂墻壁上出現了“革命排滿”的标語。老师害怕闖出祸来，才郑重其事地作了一次訓話，誥誡学生不得意气用事。但是这类标語仍然不时发现。

以上回忆，說明革命思想的传播，学生的日益傾向革命，已經不是清政府所能鎮压下去的了。

果然，第二年武昌革命爆发。只隔了十二天，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首先响应起义。我們所盼望的日子終于到来了。

湖南起义的前后情况，各方記錄很多，我只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动态写下来。

一、新軍占領撫台衙門，逐走巡撫余誠格后，只杀了几个抗拒革命的官吏，省城秩序沒有受到影响。人民羣众热烈欢迎革命，彼此互道“恭喜”，就象过新年和办喜事一样。沒有人害怕杀头充軍，只有极少数反革命的地主豪紳，既怕革命党杀他們的头，又怕“王师一到，玉石俱焚”，他們的心情倒是十分沉重的。例如王先謙就逃往岳州友人家中，叶德輝也逃往乡下避难。此外打轿子下乡的也还不乏其人。但是革命政府沒有清算他們，过了一些时候，这些反革命分子又安然无恙地回到城里来了。

二、剪辮子是革命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辮子就是甘心做滿奴和亡国奴的显明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辮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辮子，施者引为笑乐，受者啼笑皆非。有些遺老和頑固派，害怕沒有辮子見不得皇帝，就把辮子盘在头頂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額髮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逃过这一关。

三、女子沒有剪髮的风气(剪髮风气是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

时期才盛行的),但是女子放足盛行一时。个别女子剪髮,受到当局制止。例如剪髮最早的衡粹女校学生周永祺,組織了“妇女剪髮会”,呈請官厅立案推行,民政长刘人熙斥为“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之怪現象”,不但不准立案,而且勒令她本人蓄髮,恢复本来面目。女子放足后,由于过去纏足時間过久,不能恢复旧观,于是形成了不大不小的“黃瓜脚”,只有幼齡女子未受纏足之害,才能保存天足。

四、革命后,男女交际自由、結婚自由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湖南有不少女子活动家被称为“英雄”或“女伟人”,名聞全国。但是她們多在省外活动,例如唐羣英、王昌国等在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欧阳雅文在南京組織“女子北伐队”等。湖南沒有一个女公務員,女权运动也不十分活跃,只有一家《女权日报》^①,寿命也不长久。直到第二年,“唐羣英大鬧长沙报”^②,湖南女子的声势才开始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总的說来,辛亥革命后,妇女并未获得解放,社会人士还是用开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女权运动。但是湖南女子开始冲破了旧礼教的封鎖綫,紛紛要求入学,要求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因此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而自由結婚也不是家长所能阻止的了。

① 《女权日报》設在南門城墙湾天后宮,社长似为丁佩兰。学生軍解散后,我曾在該报担任編輯。

② “沈佩貞怒打宋漁父,唐羣英大鬧长沙报”,是当时报纸上戏拟的章回題。《长沙日报》前身为《湖南官报》,主笔傅君剑(鈍根)曾任明德小学国文教員,并为“南社”詩人。一九一三年二月,該报广告栏刊有郑师道、唐羣英結婚启事,唐羣英率領多人到报館追究广告来源,未得要領,于是大打出手,該报因字盘被打乱而无法出版。事件发生后,《长沙日报》提出訴訟,經譚延闓調停并代出二千元賠償报館損失了事。事后查明,郑是一个精神状态失常的人,由于求爱不遂,登此广告,企图弄假成真。

五、关于服装问题，虽经有人建议加以改革，但是革命政府认为这是不急之务，而且事关全国，并未作出决定。湖南人很少有穿洋装的，街头所见，仍以短打朋友（劳动人民）和长褂子（非劳动人民）为最多。公务员佩带白布臂章，上面标明职别，加盖机关印信，不久改用铜牌徽章。所谓“纱马褂与委任状”满天飞，是后来发生的现象^①。我曾经看见过青布（或湖縐）包头，前面打一个英雄结，身穿黄呢制服的军人。根据年长于我的回忆，大街小巷经常有模仿戏台上武生打扮的青少年出现，但我没有碰见过。他们还说，当时结婚所用礼服，女的仍是凤冠霞帔，男的换了纱帽红袍，如当时有名的社会人士宁协万就留有这种结婚照片，但我也没有看到过。

六、湖南响应起义后，出兵援鄂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湖南原有新军一个混成协（旅），共约四千人，起义后每个营几乎都扩充成为一个师，共计成立五个师，约五万人。因此到处招兵买马，到处可以看到新兵演习，祠堂庙宇都驻满了兵。革命后招募新兵的特点，首先是这样大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而完成任务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以以前应募入伍的几乎全部都是城市贫民和农村贫雇农，而这次却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这可以说明，人们踊跃参军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参加革命。

由于学生参军的人数很多，都督府决定先成立学生军一营，驻紮又一村讲武堂内。我的年龄虽不及格，但因身长合乎尺度，前往测验时居然也被吸收了。学生军的管带是明德学堂的体操教习李

^① 国民党“二次独立”时期，湖南省政府滥发委任状以应付来自各方的军人、政客，被委者均将白布出入证衬在纱马褂内，招摇过市，引人注目。

雨初，他会說笑話，学生考試体操这門功課时，他給每人一百分，这件事情曾經引起学校当局的批評，但是学生对他都有好感。我們明德的參軍学生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位管帶。但是过了几天，管帶忽然換了蔣宝山(也是体操教习出身)。我們調查原因，据說講武堂大厅原有一輪紅日图，李雨初就职时又在上面貼了一张“指日高升”的紅条，被認為名位观念太重，与革命宗旨不合，因而受到撤职的处分。我們在这个特殊的軍营里受过几个月的訓練，但是沒有領到枪支，沒有来得及开拔援鄂，就因和局告成而被解散了。

革命初期，招兵买馬是湖南最突出的一个現象。如有人口称能在外府州县收編若干軍隊，湘軍都督往往不加調查研究，就給以司令名义和部分經費，因此各县有不少赤手空拳的司令出現。他們的实力只有門前守卫的两支枪，而这两支枪也还是从別处借来的。也有人騙錢到手而一去不回的。这种乱糟糟的現象，在以后政局变动时期都曾发生过。

七、湖南起义后的第十天，就发生了一次大政变，正副都督焦达峯、陈作新都 被乱兵杀害，參議院院长譚延闓被推为湖南都督。长沙社会对这一血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人認為，反正^①只有十天，就杀了两位都督，这究竟是革命呢还是爭权夺利？另外一种人則說，焦达峯出身“会匪”^②，陈作新不过是一个被革了职的新軍排长，他們做了都督，压不住众人，譚三先生門第声望都好，从此湖南政局可以走上正軌了。我們还听到关于譚延闓被迫上轎的消息，据說他躲在荷花池私宅不肯出来，湖南各界人士首先說服了他的母亲，他才奉母命出山云云。我們沒有想到这种传说是譚延闓自

① 当时称脫离清政府为“反正”。

② 焦达峯为联络会党分子起义，曾加入哥老会。

己編造出來的，目的在於萬一革命失敗，可以取得清政府的寬恕。我們更沒有想到這次政變就是譚延闓和君主立憲派篡奪革命政權的陰謀所釀成的，因而就誤認譚延闓是個頗得人心的“好都督”了。

八、湖南響應起義後，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破壞，但是財政經濟上所受影響很大。由於兵額驟然增加，稅收尚未統一，革命政府所負擔的龐大軍費沒有來源，只得設立一個“籌餉局”，按房地產、田產的多寡來攤派捐款。這一措施立刻遭到地主、紳士的激烈反對，把它說成是“暗無天日”，“雞犬不寧”；甚至同情革命的上層社會人士也都不以為然。例如前清軍機大臣瞿鴻禨在上海作寓公，他在草潮門正街置有巨宅一所，經常有人前往收捐，大紳士熊希齡、譚延闓的同科張其鏗都在省外打電報來加以阻止。他們認為，推翻皇帝是另一回事，至於侵犯私人財產，損害地主、紳士的利益，則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於是革命政府只得用增發貨幣的手段來填補財政上的赤字。當時由湖南官錢局改名成立的湖南銀行，其資財僅數十萬兩，而前後發行鈔票竟達二千二百餘萬元。此外，大地主朱雲谷堂、民族企業和豐火柴公司也都發行代價券流通市面。因此，貨幣不斷貶值，物價不斷上漲，直接受害的都是勞動人民。

一九一二年二月，南北和議成功後，湖南因財政困難而大舉裁兵，對於退伍軍人，特別是殘廢軍人，並未給以妥善的安排。因此，由湖北退回來斷臂缺肢的殘廢軍人組織了“傷兵乞丐團”，成羣結隊地到處請願，到處強討惡索，使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影響。

九、革命初期，都督府在龍璋所住的西園設有“招賢館”，廣招天下英雄豪傑和奇才異能之士。但是沒有“八書行”（荐信）是不得其門而入的；而有了“八行書”，也要看“來頭”大不大。“來頭”不大的只能住在“招賢館”里候差，吃飯不要錢，所以“招賢館”成了候差

人員的招待所，不久也就宣告結束了。

隨着政局的轉變，湖南政界搶飯碗、爭位置的丑劇不斷發生。首先是同盟會與立憲派之爭。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譚延闓以立憲派首領而兼國民黨湖南支部長，他在立憲派與國民黨之間，南北勢力之間，新舊派別之間，政客與軍人之間，老年與青年人之間，採取了面面敷衍的態度，因此有“八面玲瓏”之稱。其次是路界之爭。湖南劃分為中、西、南三路是從前清科舉時期開始的，目的在於按地區分配科舉名額。科舉制度廢止後，改為按地區分配留學生的名額。革命後，各路人士又力爭按地區分配政治用人的名額。例如省議會有正副議長三人，必須中西南三路各居其一，民政長以下各司司長人選，也必須三路平均分配。黨派之爭再加上區域之爭，把湖南政界鬧得烏煙瘴氣，因此湖南人民對革命產生了悲觀失望的心理，後來“二次革命”時期，湖南人民認為又是國民黨與袁世凱的權利之爭，而不再支持國民黨了。

十、革命後，湖南的政界風氣起了深刻的變化。前清時期，官吏可以納妾蓄婢，但是不許宿娼叫局；可以把酒席叫到家里來吃，但是不能公開地上館子。那個時候，長沙著名菜館有清溪閣、徐長興、玉樓東、天然台^①幾家，“堂吃”所占的地位都不大。樊西巷、福源巷一帶“花街柳巷”，官吏不敢問津。官吏宿娼被認為“有玷官箴”，可以被參奏革職，甚至老百姓可以把他拉下轎來揍他一頓。革命後，這種假道學的風氣不存在了，官吏、議員不但可以在飯館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擺花酒，大宴賓客。因此，

^① 天然台有人誤作“天然居”。長沙飢民暴動時，巡警道頓承裕乘轎前往彈壓，他痛罵湖南人喝得起一百文一碗的茶，却買不起七、八十文一升的米，就是指天然台的茶寮。

原有的飯館子都擴大了門面，並且陸續增加了曲園、挹爽樓、一枝香、天樂居等家。娼妓的人數和營業也大大發展了。

辛亥回忆三則

文 斌

辛亥年九月初一湖南光复，巡撫余誠格当新軍进城时，知大勢已去，为保全个人生命計，于撫署后垣(現六堆子地方)挖穴，化装潛逃。那天市面安堵，羣众欢欣，仅戮助桀为虐的巡防統領黃忠浩、营务处总办王毓江、总文案申錫綬、长沙县知事沈瀛等四人。不料布政使(即藩台)黃以霖負隅不服，竟命旧巡防軍数百人荷枪实弹，頑守藩署，抗不投降。我于初一日下午因事道經藩正街时，尙目睹藩署前后断絕交通，戒备森严，如臨大敌。焦督派同盟会老同志王猷往致劝降书。王中弹几死。焦憤极，原拟以武力解决，嗣念署前后民屋鳞次櫛比，恐遭波及，乃請当时在省巨紳陈文璋、龙璋前往反复劝說，黃方将庫存現款和全省財賦档册全部交出，黃亦被保护出省。

二

辛亥年，我在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讀書。那时，我是矿科学生，多数教員是英、美人。我記得是年农历九月初一日午后，学堂传达某忽然带了一个青年警士来会我，他手中持有一条形似从前

軍隊中值星員所帶的五尺長，五、六寸寬的白竹布帶子，正中鈐有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木質關防印文，並書有交涉員三個大字。那警士告我說，都督派我當交涉員，將白布交我配帶，並說備有馬匹，要我隨他即往都督府（現在本市中山东路青少年宮，從前的湖南巡撫衙門）。我喜出望外，立即往府，首先會見文斐先生（他那時任都督府參議院參議員），方知這個任務是他介紹的。他立即帶我見焦督。焦着黃色呢質軍服，蓄有八字鬚鬚，態度端莊和藹，笑容滿面，指示我快往英、日各領事署和長沙關稅務司以及美孚、亞細亞等大洋油公司，告知他們：我們湖南反正，是推翻滿清王朝，對於外國人的生命財產一律保護，要他們轉知所屬僑商照常安居營業，不要聽信謠言，無故驚擾等語。他並叮囑我照此傳達，不要多言。我遵示前往上述各處，以交涉員身份傳達都督意旨。我記得當時我配帶上述白竹布帶子，隨帶警士一人前往英、日領事署，他們也有譯員在座。我除對日領事以中語傳達外，其餘各處都是用英語傳達。每處只坐談片刻。他們答復情形大致都是答稱照辦，無驕傲抗拒表現，且都對我很有禮貌，款待周到。不到數小時，我就回府復命，蒙焦督慰勉備至。此後九天，我全在府內交涉員室辦公，事體簡單，有時外僑請領旅行護照，照章填發而已。直至九月初十，焦督慘遭殺害，我才離府。譚延闓任湘督後，隨即設立外交司，司署設在現鹽道街前鹽法長寶道衙署。粟戡時任司長，陳休泉任次長，我擔任該司的翻譯科科員，干了數月，我調往實業司任一等技士。

三

辛亥陰曆九月初十日午後，我正在都督府景桓樓下交涉員室

內辦公(都督辦公室在樓上),忽听到外面有排枪声,我初未置意,頃刻間見有一个配带斜带的軍官率带枪的兵士十余人,杀气騰騰地冲入府內大声叫喊說:“我們要杀焦达峯”。我知有变,仓皇躲在景桓樓樓梯下放洋油灯的斗室內,以致焦督遇害时的慘状我没有目覩。事后我問及总收发阳燧,才知道焦督是被杀在都督府轅門內的大坪里。彼时警戒森严,不敢外出,直至黄昏时,才看見譚延闓披着夹衣立在都督府中門临时放置的方棹上,向大約八、九百名带枪的兵演說約一小时,大致劝告士兵維持秩序,保全治安,否則他不敢上台負責,士兵都应声遵命才散会,我也在这时才离府外出。街上已遍貼“公举大都督譚即延闓”字样的紅紙条(因恐羣众誤会都督譚为譚人凤,故有此注脚)。事后我向族兄文斐先生詢問这次事变原由,他淒然告我,这事完全是梅馨干的,梅事先几天在外間散布恶言攻击焦督,說焦的部下帮会會員有近万人进入长沙,紛紛向焦謀官索款,焦已頒发委状数百份,濫用公款甚鉅等等。梅并嫉妒陈作新以新軍排长一跃而为副都督,故先杀陈后立即杀焦。又說梅曾向焦督要索武器并要求升师长(梅是当时新軍一个管带),焦未允許,故杀之以洩私憤。按文斐先生是同盟会會員,焦达峯的亲密朋友,当湖南光复时,焦以各机关職員品类不一,以內政屬曾杰,外政屬文斐,事无鉅細,畀以全权。他所告我的話当系事实。至譚延闓有无主使情事,尙难臆揣,不过听說在祸变的前夕(即九月重阳日),譚在他的茅亭子私宅曾設宴邀請王先謙、叶德輝、黃鑾鳴、粟戡时、陈炳煥等密談湘事,不能說他同焦、陈被害全无关系。

辛亥革命在湖南所見

鄧 介 松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消息傳到湖南，人心大振。青年學生更加激動，學校自動停課，學生們終日鵠立長沙關碼頭上，守候從漢口開來的輪船，打听消息，搶購報紙。碰巧我遇見一個相識的乘客，他的網籃中有包裹用的報紙很多，而且新的居多，我們用好紙換取了做包裹用的報紙，跑步回校，集體傳閱，並摘要抄下張貼。

當時大家極關心湖南幾時反正，我們已無心讀書，終日在外奔走，到處打听。我非同盟會會員，又非軍人，而熟識的黨人和軍人却不少。從同盟會會員陳荊、曾杰，我弟紹溫（民國元年夏病歿于漢口，時年十九歲，因其在聯絡新軍，策動起義及出師援鄂中，工作積極，作戰勇敢，得入烈士祠）及炮兵林毓泉等人口中，終於得知將於九月初一日起義的消息。

九月初一日黎明，我們跑到小吳門城牆上去看動靜，守城門的是巡防隊，湊巧哨官姓易的是熟人。他對我們說：“今天這裡不是好玩的地方，你們快些回去吧！”我們不聽，他也就不管。等了很久還不見動靜，正在流連躑躅之際，忽聞四十九標和五十標隊伍出發了。凝神遠矚，果然有大隊人馬荷槍而來。城門關閉了，攻城的喊話：“漢人不打漢人，快開門！”守城的不答話，也不反問，彼此相視

而笑，毫无敌意。城門虚掩着，人多一拥，一下子就挤开了。起义部队入城，逕向撫台衙門冲去，守卫的巡防队也毫无抵抗。起义軍进入轅門，撫台余誠格急急忙忙从衙門后面围墙挖洞溜走了，其幕僚亲兵人等亦各自逃命。只有姓沈的长沙知县不識时务，不降不走，終被杀死。至于黄忠浩之死则是出人意外的。

黄忠浩(号泽生，黔阳人)本是书生，偏好談兵，由文职轉作武官，帶兵多年，官至提鎮。他在旧官僚中是比較开明的，曾掩护过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陈荆亡命江湖时，黄忠浩暗相結納。那时陈荆与黄兴同案，同时被通緝，陈荆状貌不揚，又不修边幅，尤不善于詞令，与黄忠浩見面后，黄对左右亲信說：“这个陈荆恐怕是冒名招搖的。”乃将陈放走。

辛亥革命前不久，黄因母丧休官回籍守制，閑居长沙。巡撫余誠格任黄忠浩为全省巡防营統帶。武昌起义，长沙震动，余誠格束手无策，一切依靠黄忠浩，黄也以保卫湖南为己任，每日必到撫台衙門坐几小时，故示鎮靜。起义軍冲进撫台衙門，撫台溜走了，乃将黄拖出轅門外，声称送到浏阳門(旧刑場)去。行过貢院西街时，我与禹之讓烈士諸弟正在湘利乾公司門前，警見此景，禹弟与黄有旧，大惊失色，飞奔营救不及，拖到小吳門，就被一陣乱刀砍死了。黄忠浩之死，焦达峯、陈作新亦深致惋惜。就任次日即发出布告，表揚黄忠浩为吾湘忠义之士，言明遇害是出于誤会。事后并重用黄之胞弟堂斋。巡防营很受感动。

当日，我随起义队伍行至撫台衙門，未敢进去。义軍进入后的一切情况，是后来听林毓泉(林在譚延闓繼任都督后赴日留学，民国二年冬病故于东京)、刘庆藩等人告訴我的。

初一日下午，見撫台衙門挂出了“中华民国軍政府湖南都督

府”的牌子，張貼了都督焦達峯、副都督陳作新就職的告示。焦、陳兩人都是同盟會會員，焦為瀏陽人，早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並曾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參加瀏陽的武裝起義。清吏誣他為“土匪”，說他劣凶極惡，面目猙獰。我在曾杰家遇見，印象完全不同。他面目端正，舉止安詳，說話細聲細氣，有條有理。陳作新為焦達峯密友，曾在四十九標二營當過排長。辛亥之前一年庚戌三月，長沙大鬧米荒時，陳作新就要發難，為管帶（營長）陳強制止。不久陳作新被開除了排長職務。陳在四十九標被開除後，潛居長沙，繼續運動軍隊。

新軍起義，陳作新聯絡策動之力最多。在革命隊伍中，焦、陳兩人是骨幹，但在封建勢力之下他們被認為資望不夠，因此舊紳士和新軍閥互相勾結，陰謀篡奪政權。

焦達峯、陳作新的政治經驗不足，同盟會組織又很鬆懈，綱領很簡單，分子很複雜，一旦負起擁有三千萬人的大省的全部責任，自不能盡如人意。但其坦白無私、孳孳為善的精神，還是有目共見，有耳共聞的。

清軍南下，武漢告急，遣使求援於湖南。湖南新軍只有一協（旅），轄四十九和五十兩標（團）。反正之初，辰沅永靖道朱益濬負隅頑抗；各縣亦間有跳梁小丑，地方秩序需要軍隊維持，勢不能全部調出。而武漢情形緊急，湘軍赴援心切，四十九標全部由王隆中（原系教練官，反正後升標統，後改編為第四師任師長）率領立即開赴湖北，並由甘興典統帶巡防營，隨同出發。四十九標開赴武漢後，五十標留駐長沙，標統梅馨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他原在五十標任教練官，在新軍醞釀起義期間，他並未參加，反正後坐升標統。他在同輩中年齡較長，性極陰險，詭計多端，爭權奪利的野

心很大，焦达峯、陈作新任正副都督，梅馨心里不服。

都督府成立之初，一切草創，没有什么規章制度，人事临时凑合，大羣青年学生自动帮忙办事(我也去参加了几天工作)，大家吃自己的飯，办大众的事。旧人員却借此冷嘲热諷，野心家更利用机会制造輿論，对都督府施加压力。当时《长沙日报》落在旧派手里，公然发表評論，反对“尽义务”，认为“尽义务”是玩把戏、打花鼓，要求“唱大戏”，“名角”出台，“內行”跑龙套。这种議論一占优势，蛰伏已久的紳士集团就重新抬头了。旧官吏弹冠相庆，青年则退出政府工作。都督高高在上，指揮不灵，形同孤家寡人了。

焦达峯原为帮会首領，結納羣众，联络面广。在浏阳武装起义时，得帮会之力最多，帮会中人牺牲的亦复不少。焦一旦做了都督，弟兄們聞风而来，廬集长沙，自由出入都督府，喧嚷叫囂，在所不免。都督府堂皇壮丽，气魄不小，但焦本人一点架子也沒有，起居行勁都很随便，这样一个平民都督，上下之間关系搞得很好，但在紳士們看起来却认为太不象样，于是散布流言，把都督府說成“梁山泊”和“瓦崗寨”，把焦达峯、陈作新說成“陈涉”、“吳广”，煽惑人心，策划政变。梅馨暗令所部坏分子糾合一些地痞流氓至北門外和丰火柴公司滋事，趁势纵火打劫，一面指使党徒危言聳听，謂非都督亲自出馬弹压不住。副都督陈作新勇于任事，立即馳往弹压，行至和丰公司門口被冷枪打死。为首的挟持羣众，蜂拥冲入都督府。焦达峯不知陈作新已經遇害，还从容出来向乱兵耕話，冷不防飲弹斃命。

正副都督同时遇害，省会驟呈紧张混乱的局面，紳士們趁机出來說話，倡言非譚三爷不能收拾殘局。軍界学界都随声附和拥戴譚延闓为都督，紛紛至馮子桥譚宅劝駕，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之概。譚延闓却耻再耻三，終于演了一幕崔子弑齐君晏嬰枕股哭尸的把戏。譚跪倒在焦达峯灵前大哭一陣，哀痛动人，然后走馬上任。第一任諮議局議長，搖身一变而为第二任都督了。

譚延闓少年科第，官僚世家，一生纵口腹之慾，食不厌精，膾不厌細，长沙好些名廚如宋廚、柳廚等都是在他家培养出来的。他繼焦达峯为都督之后，忽然改变生活习惯，“食不兼味”，終日感感，愁眉苦臉，“食旨不甘，聞乐不乐”。有人說他居“文勤公”（其父譚鍾麟諡号）之丧还没有这样哀毀过。譚延闓这样做，果然博得称贊。

党人在政变之后，憤激之极，要同梅馨算这笔賬，如曾杰在病中几乎发狂。我在曾的病榻之側听他說：“起义之前，原先要我做都督。我自願年輕又不懂軍事，所以极力推举达峯担任，他被人暗杀了，是我害了他。这是譚延闓、梅馨的阴謀。”

梅馨为拥譚健将，譚延闓三次督湘，拥譚的梅馨竟不得志。在軍人跋扈、政局动摇、风声紧急之时，譚宁可求助于力量不大而名譽頗好的曾繼梧（譚給曾信內有：“入而不出，公之志也，急而相求，弟之罪也”几句话，哄得曾繼梧甘为馮妇）；对于梅馨則始終采取敬而远之的办法，不予重用。一則力避譚、梅合謀之嫌，以免党人报复；更重要的是怕梅馨挟拥戴之功，行废立之事，再演一次政变。譚的老謀深算，表現于用人行政方面都不外一个“我”字。反正后的几个高級軍官都跳不出譚的手心。其后裁抑陈复初，培养赵恆惕，想不到赵恆惕羽毛丰满，立即取譚而代之。“謹厚者亦复如是”，这是譚的遺憾。唐生智反赵，何鍵反唐，譚說：“屋簷水，点点滴”（周驚山亲聞譚言如此），第一滴是什么时候掉下的，他比別人当然更清楚了。

譚延闓对付軍人的手段甚高明，对付党人的手段尤为巧妙，分

化拉攏，妙用入神。表面上他對黨人卑躬折節，逢迎敷衍；骨子裏鄙夷玩弄，舟中敵國。黃興初次回湘，譚延闓多方討好，改德潤門為黃興門，坡子街為黃興街（二次革命失敗後，改回舊名），凡與黃有關係的人，譚悉捧為偉人。社會上形成一種風氣，凡是西裝革履高談闊論的，都在偉人之列。譚延闓對於這班“偉人”，目笑腹誹，而又極盡敷衍之能事。當時最受出風頭的“偉人”莫過於陳家鼎。他赴北京途中自發專電說：“船過岳州，觀者如堵”。有人偷看過譚的日記，曾記有“看殺癩子”（陳癩痢頭，禿髮），又記某日與陳談話，未有“此子必以吹死”一語。陳在長沙時，譚待之為上賓，禮貌周到，語言尤為親暱，陳則認為譚為知己，對人稱道不置，遇有批評譚延闓的，陳必為之辯護。

革命黨人在譚延闓的權術中軟化了的不少，但硬骨頭也大有人在。陳荆被聘為都督府顧問，月俸一百元（按當時生活程度，這是很高的待遇），陳荆雖窮困，而竟堅拒不受。後來陳荆討了一個收花捐（妓女分等納捐）的小差事，人問他何以不做顧問而收花捐，他說：“你以為都督比妓女高貴些嗎？”

譚延闓的故舊中深知他的品行，不直其所為，或與割席絕交，或以語言文字諷之者，我所熟知的有胡熙壽、王運長、張冥飛三人。

胡熙壽，別號謬丞，寧鄉人，十七歲中舉，與譚為鄉試同年，詩詞造詣在譚上。胡出身大地主家庭，生活充裕，本性又極懶散，不慕浮名。譚刻意拉攏，胡避之若浼。胡做《國民日報》社長時，我為編輯員之一，日與周鯨山、陳翼郎、王運長諸人沉飲縱談，他對譚的批評最為深刻。上述譚對黨人手法及日記中語，都是他所談的。

王運長是書法家，譚聘他為顧問，他撕毀聘書，投痰盂中，當眾

解衣溺之。

张冥飞为张有熙族子，譚任行政院长时，张流寓上海，一日袖出所作《茶陵譚先生五十寿序》駢文一篇示我，讀之忍俊不禁。他把譚生平假仁假义，自私自利，一切阴柔虚伪的言行写得繪影繪声，淋漓尽致。最后几句是：“堂亦鈴山，写几笔严嵩之字；老宜长乐，做一世馮道之官。”这是譚延闓历史的总结，譚見此文，不仅不生气，反而写信給孙科为张求一差事，张以此得任铁道部专员，飽食暖衣了几年以終。为此，譚党称頌“畏公风度”，說是：“宰相肚里好撐船”。多少鱉鱉巨鯢，沉沒在那无浪无底的深渊中！刚愎狹隘的胡汉民，对譚从无好感，晚年却說：“太傅謙冲是我师。”譚借謙冲以行其权术，一时确曾迷惑了不少人。

关于焦达峯二三事

閻幼甫

辛亥革命湖南光复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峯，是革命党人中的一位青年英雄（焦被害时刚二十六岁），其兴也勃，其死也速，所以知道他的事迹的人不很多。现在就我所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简介如后：

焦达峯，字大鵬，笔名达峯樵子，一八八六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为半自耕农焦閻生的长子。一九〇六年因萍浏醴起事失败，亡命赴日本。旅日本东京时改名“岡头樵”。他是华兴会会员，又是同盟会盟员。他是四正学会的领袖之一，又是湖南四正社的领袖。

一九〇六年华兴会会员李金奇和姜守且等在萍浏醴起事时，他在李金奇所组织的铁血军总司令部充联络参谋。一九〇六年李金奇总司令在作战中墜水而死，铁血军因而星散。焦达峯同宁调元逃往日本，投入私立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其时留学界小组之风盛行，焦达峯在东京与宁调元、何弼虞、文公舒组织了一个四正学会。所谓“四正”，就是心正、身正、名正和旗正。焦达峯从此将“岡头樵”的岡字自书花押作“𠄎”，并将花押刻成一顆图章。岡字草书和“四正”二字相似，也可说是焦达峯故意为之。焦死后，湖南宪政

派一些反焦的人，在报上诬焦自命为梁山泊的天罡，就是用焦的“焦”字图章作材料的。

二

一九一〇年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五省籍贯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开会，焦达峯参加了。因为蒋翊武、孙武、张振武（时称三武）都和他谈得来，焦便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运动中这两个组织原来合作得很好，后来因争领导权，起些磨擦，焦达峯在两组织中曾起了不少调解作用。

焦达峯在湖南搞革命，为了要创建一种基本力量，就组织了一个“四正社”。四正社和四正学会并没有组织关系，但在革命事业上，四正社可称为四正学会的支流。四正社是洪江会（即哥弟会）的一种组织。焦达峯因为参加萍浏醴起事时，认识了一些洪江会中的“龙头大哥”，一九〇九年秋间在浏阳县的普集市开了一次“山堂”。当时参加开堂的，就有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龙头大哥”三十多人。焦达峯在这天，经许多“龙头”抬举之后，便成了一个“穿靴子上山”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原来洪江会入会应从老五做起，一步一步地升到老二、老大，名之曰穿草鞋上山）。据说，焦达峯开堂时，所到的各位“大哥”的手下都有“拜弟”两、三千人或四、五千人。经过这次开堂以后，只要焦达峯对各位“龙头”去一个通知，便能得到十多万人的声援。

辛亥革命时，四正社的人是全部参加了革命的。新军中的易堂龄、杨玉生、朱先杰、刘玉堂等人，巡防营中甘兴典、袁国瑞、赵春霆等人都是列名四正社的。

当革命在秘密运动中，革命党人觉得非依靠四种力量不可：

(一)新軍,(二)巡防營,(三)學生,(四)農民(此處所指的農民,是指已加入四正社或共進會組織的農民)。長沙光復時,新軍積極參加,巡防營已有最大默契,四正社社員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湖南軍政府成立,擬擴充陸軍為四個鎮(相當於後來的師),不到一星期,附近各縣開到馬刀隊、梭鏢隊、來復槍隊一萬八千多人編入陸軍各鎮之中,這都是響應焦達峯號召而來的四正社社員。

三

湖南都督府成立後,焦都督的身旁有兩個顧問,一是曾杰,一是李洽。一切大小事情,焦都督都和他們商量處理。焦都督的特點是肯接受別人的意見,善於聯繫羣眾,為人直爽,對於名利二字非常淡泊。起義時他原想推譚人鳳為湖南省都督,因為譚人鳳當時不在湖南,很多人對他不熟悉,大家一致要焦達峯負責;他要託給陳作新,大家也不同意,經過大家的敦促,他才出任湖南省都督。

焦達峯做了十天都督,他並未用過都督府一文錢。只有陳作新曾寫條子向軍需司支家用銀二百兩,軍需司簽呈請示都督,焦批了“照付”二字。焦、陳被害後,譚延闓繼任湖南省都督,傳出焦、陳二都督私自提走公家幾萬兩銀子,用棺材運到瀏陽家鄉。這些謠言來自何人雖未得知,但其目的在毀壞革命黨人名譽則是很显然的。譚延闓為了追查所謂焦、陳貪污案,曾成立一個委員會,細查焦都督任內的開支,結果查明了焦都督沒有支過一文錢。

回忆禹之謨

彭重威

禹之謨，別号稽亭，生长在湖南省湘乡县中里（現改建为双峯县）的青树坪，与我家相距約四十多里。我同他相識在一九〇三年冬季，是我考进湖南高等学堂的时候。那时，我才十九岁，比他要小十多岁。由于他的性情忠誠热烈，态度亲切和藹，意志堅強勇敢，言論激昂簡要，举动穩重慷慨，生活儉約朴素……等等可敬可爱的风格品質，使我在不过一个来月內，就对他滿怀着充分的欽慕，認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加以我和他有同县同里关系，他也表示特別亲热和格外照顧。从此，我和他就結成了至好的忘年交。現在根据他同我所談到的，并就我目前所能記憶的，先叙述他的一些家庭情况和他在未和我見面以前的一些經歷：

禹之謨的祖先是从小地迁移到青树坪来的，传到他自己不过三、四代。青树坪的禹姓人口很少。他的祖先以經營小生意为业。他父亲叫禹春軒，略識文墨，仍靠經商为生。家有胞弟一人，助父营商。子一人，年尚幼，由其母撫养在家。他不帶家眷出外，怕影响他的工作。他本人从小就为父母所宠爱，六岁入乡塾讀書，直到十七岁为止。他不好研究四书五經和学作八股文，只喜欢看史鑑及各种小說。特別爱看《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滸》及《七俠五义》等演义小說。他专心練習各种应酬文章，临摹各

种行草正楷的碑帖，并且爱作古风、竹枝词一类的诗歌。他没有应过科举时代的县、府、道考试。

从永丰到青树坪一带地方，有很多土豪劣绅和大地主。乡间的贫苦劳动人民，经常受到他们的迫害。禹之谟最受打抱不平，暗中为受害的农民出主意，写揭帖或状纸，对土豪劣绅和地主作斗争。因此，他渐渐地为豪劣们所嫉视。其父深为忧虑，劝他出外谋事。

禹之谟在二十岁时，就投奔到南京，得同乡的介绍，先就某军营的文书职务。因他的头脑灵敏，文笔通畅，又写得一手好字，加以办事勤谨，待人谦逊，极为全营官长士兵所爱重，他的地位声望也就逐步提高。不久，就由文书职务转升军需部分的运输粮秣职务。他为经理运输事务，常往来于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省境内，不仅同这些地方的军队官兵多所接触，而且与各地的帮会首脑也有了联系，社交因之日广。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接受了向关外运送弹药粮秣的任务，曾迭次冒险通过敌人警戒线，出入山海关，伪装运货商人，在黑夜或不良天气，乘敌不备，进行潜运，使任务能够顺利完成。他在每次军事保案中都获得优奖，准其以知县遇缺尽先补用。他既未尝以获得这种头衔而感到志得意满，以后也没有用这个头衔在任何场合中显露过，所以同他交往的人，很少有知之者。而且，他当时目击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无厌，清朝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中华民族所遭受水深火热的惨痛，经常感到无比的悲愤。他认为，与其混入行政界不能有所作为，无宁仍在军队里，与士卒同甘苦，多结交一些帮会首脑，一旦机会成熟，或可趁机大举，较有成就。

戊戌政变前，禹之谟以请假省亲为名，回到长沙，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有所接洽，并同湖南哥老会首脑毕永年等人在醴陵、浏阳

等处作了几次会晤。戊戌政变失败，他引为憾事。庚子年，唐才常在上海筹设正气会、自立会以及开办富有山堂、召开中国国会等举动，禹之谟都参与其事。是年秋，他借唐才常到汉口，规划组织自立军起义。事机不密，被武汉当局侦知围緝。他毫未觉察，方从外面走到唐的寓所门前，已是军队巡捕挤满一室了。他见形势不妙，情急智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混在看热闹的人丛中，站立一会，随即逃之夭夭了。原来他的面容削瘦黧黑，须发经久不剃，留得很长，头上拖着一条又细又短、摆发易散的辮子，身上穿着一套蓝布衣裤，完全象一个十足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佬。所以他能不为緝捕者所識破而得以幸免于难。他对唐才常的受到牺牲，每一谈及，不觉泪如雨下，无限悲伤！

禹之谟逃出汉口以后，即到南京，整理行装，筹措川资，经上海东渡日本。其时，我国留日学生中，湖南人极多。当然，他在那里会到了不少旧識。但是，他对于旧識和新知，都同样表示他的誠摯的热忱。他特别热心于联络广大同志的工作。几乎我国留日学生在那时所发起的每一个爱国革命的组织和活动，他都要想尽办法去争取参加。这是他到日本去的主要目的。他的次要目的，是想在日本学习一些工业艺术和应用化学，以为回国兴办实业的准备。他在东京某补习班学过簡易的应用化学，又到大坂千代田等工厂学习过几項工艺。一九〇二年春，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立即赶回湘乡省視。未几父死，他料理喪事完毕，便到湘潭，创办毛巾厂。織毛巾的机件都是由他一人設計制成的。由于他对艺徒的挑选极端审慎，招收艺徒的人数不足十人，只能作小規模的經營。織成的毛巾，经过漂白印花、熨燙包装，同进口的貨色沒有大差別，而价格比較便宜，受人欢迎，但因产量有限，往往供不应求。他觉

得湘潭只是一个純粹的商业地区，不能有政治上的发展。正在計劃向长沙推移，尙未作出决定的时候，他的好友曹亚伯到了湘潭，对他的这一計劃极表贊成。于是，他就在一九〇三年的夏天，把这个毛巾厂从湘潭迁移到了长沙城内的貢院东街附近。

禹之謨把毛巾厂的規模略加扩大，即多制了几部織毛巾机和多招了一些艺徒。他又附設了一个工艺传习所，招收青少年学生，教以簡易的应用化学及制造藤、竹、木新式家俱的手工艺。他在招考学生和艺徒方面，对他們的資格和性行，仍采取从严审查的制度，差不多都經過他的至亲好友的介紹和担保，坚持宁缺毋滥的宗旨。厂內所內的教課和管理等事权，归他一人掌握。有很少几个帮同处理杂务、經營出納會計和担任挑水做飯的职工，全是他的最相信最可靠的亲友。全体职工生徒最多时未超过四十人。他和他們同寢食、同起坐、同工作、同商量、同談笑，恍若一家父子兄弟之亲密，毫无劳資长属的区别，生产的毛巾、桔酒、肥皂以及藤、竹、木家具，都受到市場的欢迎，爭相定购，从无积货。每月收支公开，量入为出。他和职工支給同样的薪資，絕不私自多取。生徒除供給衣食外，酌予津貼；家貧者較多給，由大家共同商定。他的这种自奉俭約、待人忠厚的品行，为全体职工生徒所翕然心服，莫不把爱护厂內财产和发展厂的业务，当作每个人应有的責任。当湖南高等学堂最初設在长沙城里落星田的一年半的时期內，我在每个星期六下午沒有功課和每个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必定到他厂里去，同他談話或在旁看他們工作，而我的主要目的还是去閱讀他那里所置备的各种有关宣传反滿革命的书报。那时最新出版的革命刊物，可以在他那里先看到，并且每种备有很多份。禹之謨有时让我帶回去借給要好的同學們看，还要我邀同他們到他厂里去玩。其他

学堂与他有联系的学生們，每逢星期日，我可以在那里遇到，也就漸漸地成了我的朋友。

从以上这些情况，我了解到，禹之謨开办毛巾厂和工艺传习所（以后好象改为工艺学堂）的目的，是要借此作为他进行革命的掩护；一方面，是要培植这批职工生徒，以为他目前酝酿革命的助手和将来实行革命的骨干；第二方面，是利用那时分布在长沙各公立和私立学堂的湘乡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同學們，来与他取得經常的联络和团结；而第三方面，则是借毛巾厂和工艺传习所，得以置身于长沙的工商业界，来联络和团结工商业界中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不久，长沙商会和教育会先后成立，他受到全体工商界与学界的一致拥护，当选为长沙商会会长和长沙教育会会长。

清朝統治集团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各级学堂后，各府州县原来在省城建置为供給应试生員居住食宿之用的試館，已无再保留必要。在长沙的湘乡試館是各試館中規模比較大者，极合改办学堂之用。禹之謨发动湘乡旅省学生一百多人，在湘乡試館开会，决定就試館原址，筹設湘乡旅省中学堂，并选举禹之謨及湘乡在省城各公私立学堂担任教职員者若干人为筹备員，指定禹之謨为筹备主任。实际上，一切为此而奔走部署的責任，皆由他一人負之。每逢星期日，他必約我去帮他。湘乡旅省学生同去帮忙者当然不止我一个。特别是他厂內的生徒，在休假日几乎全部出劲，到試館去做打扫修整的工作。学堂的开办費，會議决定：首先提用試館历年节余的經費，其次向旅省的湘乡殷实紳商劝募。但前者已被历届經管試館事務的人員侵蝕殆尽，所余极为有限，后者因捐助之人不甚踊跃，所得亦屬无几。于是决定：不足之數由各筹备員共同担負。禹之謨負担独多，他毫无难色。試館的房間只合于学生自修、住宿。

和教職員辦事之用，不适宜于做講堂（即今之教室）。禹之謨想利用與該館相通連的所謂“昭忠祠”（即供奉大劊子手曾國藩以下的湘軍陣亡將士的祠堂）。其中有三間陳列無數神主牌子的大廳兩廡可用來作為講堂。但是“昭忠祠”不屬於試館範圍，而且那個大廳正為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所占住。他知道我認識曾廣鈞，就邀我一同去找曾商量。曾的頭腦是那時所謂開明的。他早知試館改建學堂的事情，聽了我們提出上述情由，立即表示贊助。他不敢直接了當地答應把那些牌位和神龕一概廢棄，只替我們出主意，認為可以用竹帘或布帳把它們遮掩起來。從此，“昭忠祠”的房屋，也一并歸學堂使用。湘鄉旅省中學堂招收的學生不以湘鄉籍為限，這是禹之謨所極力主張的。學堂正式開課，似在一九〇五年的秋季。其他在省城建置有試館的各县，經禹之謨的幫助而改設學堂的也很多。禹自己又出資創辦了唯一學堂（即廣益學堂的前身），專招收一般失學和無力求學的青少年，只取較少的學費，或減免學費，教以國文、算術、体操及切合學生實用的學科，教員多為志願，純盡義務，或在其他學堂擔任教職者。

一九〇四年，清朝統治集團在日俄議和之初，企圖以福建省換回遼東半島，為列強實行瓜分中國時它可以退處關外預留地步。禹之謨聽到這種消息，極為憤怒，立即發動全省紳商學界聯名通電力爭，得到全國響應，才使清室這一陰謀，不敢公開提出。

一九〇五年，為反對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并逼迫清政府訂立限禁華工條約一事，全國人民進入反美愛國運動的高潮。禹之謨在這個運動中，始終抱着積極的態度，首先把有關反對美帝的報紙和刊物，關照商會各董事隨時向各業廣為宣傳；其次，策動各學堂的教職員率領其學生，分赴城內外集會演說，進行抵制美貨的宣

传。八月間，曾由商会发起，在浙江会馆召开了一次有四千多人参加的大会——湖南全省紳商抵制美貨禁約会，會議决定設立一个湖南办理抵制美貨事务公所，作为这项运动的领导和执行机构。其时，用“湘省同人”的名义发布的宣传刊物很多。有些宣传文字，表现了錯誤的意識。例如，有一本用白話写成的字数达八千以上的小册子，标题为“奉劝中国的众同胞勿买美国的貨物”。它竟歪曲事实，說“禁止华工的主意原是那些美国工人想出来的”，与美国国家“不相干”，从而把反对美帝的矛头，轉向美国工人阶级。它甚至說：“我們这个办法是专同美国本地的工人作对。在中国的那些美国人……不拘那一行，我們都不可得罪他……他們的教堂还得要好好的保护，他們到的地方还得要好好的看待……，須要小心，不可胡鬧……。”这种力图为美帝作辯护的反面宣传刊物，思想既然悖謬，文字又极拙劣，我当时見到，就怀疑是美国传教者所玩弄的把戏。我曾向禹之讓提出以下三个問題，大意是：一，为什么商会对所有的宣传刊物，不作一次事先的审查工作？二，为什么他們領導这个运动的人員，在发现这样的反宣传刊物时，不立即予以严格的取締散发和收回銷毀？三，是否由于美国传教者故意唆使中国不良的教徒作出这种反宣传，从中捣乱？

禹之讓对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大意是：长沙商会内部向分本帮外帮两派，而外帮中又有江浙帮、江西帮和广东帮的派別。长沙經營洋貨业的行号，以江浙帮为最多。抵制美貨，对江浙帮的影响比較大。他們在这一运动的开始，就怀着鬼胎，希望在这个运动中爭取領導权，便于暗地操縱，利其私图。一九〇五年八月間在浙江会馆召开的湖南全省紳商抵制美貨禁約会，和議決成立的湖南办理抵制美貨事务公所，内幕情形极复杂，其中不仅夹混着一些商业

界的敗类，而且还混进了一些与禹之謨作对的学界敗类以及官僚紳士。他正在为此焦虑，深恐这个运动会变成虎头蛇尾。至于宣传文字，他当初总认为要激发每个人爱国的天良，应尽量发挥每个人自由的思想言論，只极力鼓动人們多写多印发，毫沒有考虑到要经过事先审查的問題，所以出了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岔子，给了他一个永不能忘的經驗教訓。对于我說的这本最荒謬的小册子，他准备向圣公会的黃吉亭牧师和与美国其他各教会有关系的曹亚伯等人，探詢这本小册子的真实来源。

后来我也沒有再向他追問过。

由于美帝对清政府实施的威胁利誘活动以及清政府秉承美帝意旨对各省督撫頒布的严禁抵制美貨的諭令，弥漫湖南全省的抵制美貨运动，同全国一样，果然不出禹之謨的逆料，不久就以虎头蛇尾而逐渐告終。但是这一运动严重地打击了美帝，終于阻止了中美限禁华工續約的簽訂。

現在，我要順便地把禹之謨同圣公会的关系，略述于下：

湖南人民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二年，先后在衡州和辰州发动过反对外国教会压迫的斗争，虽然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宣告結束，但他們对教会的仇恨更深了。反之，清廷官吏对教士的畏懼却更加厉害。美帝国主义就趁此机会，把它的宗教侵略魔爪拼命向湖南境内扩张，在极短的两、三年間，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等地，各种派别的美国教会以及附設的医院和学校，几乎到处皆是。圣公会就是美帝在长沙所設各教会之一，其牧师黃吉亭，在曹亚伯的协助下，专以联络湖南教育界傾向革命而又具有声望的人物，如黃兴、周震麟、禹之謨、宁調元等人，想借他們的声望，吸引青年学生信仰基督教。这是他传教的唯一目标。虽然这些被

聯絡的人們并不信仰宗教，甚至是極厭惡宗教，但能因此作為他們進行革命的掩護，也未嘗不樂意與黃吉亭和曹亞伯經常交接。於是，他們就這樣互相利用起來了。黃吉亭在每逢星期日做禮拜的時候，于宣傳教義中，往往引用一些帶有革命性的史料或時事。有時，曹亞伯也被邀約一同登台講道。每次參加禮拜的人，除教徒外，學生常占大多數。禹之謨曾邀我去聽過黃、曹二人好幾次的講道，所以我才知道和注意這些情況。

一九〇五年，清朝統治集團為要防止本國留日學生在國外集會結黨，策動反對清朝的革命運動，乃向日本政府提出代為嚴厲取締的請求。是年冬，日本文部省正式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對我留學生的一切愛國活動，一律加以禁止，引起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包括國內國外學生）無比的憤怒。湖南留學生中思想極激進的陳天華，在這種情形之下，憤慨尤烈，欲犧牲一己的生命來喚醒舉國人民的覺悟，遂於是年十二月八日在日本大森灣投海自殺。禹之謨一向稱贊陳天華性情豪爽，思想前進，尤其愛看陳天華所寫的《警世鐘》、《猛回頭》、《國民必讀》、《最近之方針》、《獅子吼》、《警告湖南人》等等作品。凡陳氏作品已刊印出版的，他那里都具備，經常勸我多閱讀。一九〇四年冬，陳天華偕黃興、劉揆一、楊毓麟等人，回長沙籌組華興會，禹之謨首表贊成。一九〇五年秋，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陳天華以發起人資格，被推為會章起草員。禹之謨聞知，即寫信給陳要求加入。因此，禹之謨得到陳天華投海自殺的消息，他的悲憤情緒，更倍于常人。他每次同我們談及陳天華時，必潸然淚下不止。

湖南留日學生繼陳天華而死者，又有姚宏業。他也是為反抗

日本政府實施的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而在一九〇六年春回到上海的。他當一九〇五年全國為粵漢鐵路廢約自辦運動掀起高潮的時候，曾在日本神田之青年會組織路礦學校，回到上海以後，他與寧調元等人計劃設立中國公學。但是，由於上海官紳買办的多方阻撓，公學經費十分困窘，使他一籌莫展，忧憤填膺，乃於是年五月六日投黃浦江而死。

陳天華和姚宏業的先後為國捐軀，引起了湖南教育界特別是青年學生極大的反響。禹之謨在當時就首先倡議應對陳天華和姚宏業舉行公葬，以彰義烈，得到全體學堂師生的熱烈擁護。當然，公葬地址是以岳麓山為最適宜，但他在倡議時故意不先說明，恐受到頑固官紳的阻撓。追陳、姚兩志士的靈柩運到長沙時，禹之謨和寧調元在不過半天的時間內，發動全城各學堂的学生（擔任通知、約集、傳達、布置等工作的人員，大都是禹之謨毛巾廠的職工生徒），約于翌晨（即七月十一日）由各學堂的教職員率領，從城內分兩大隊出發。一隊出南門在朱張渡過河，禹之謨同十幾個教職員抬着陳天華的靈柩領隊先行；另一隊在小西門渡河，寧調元同十幾個教職員抬着姚宏業的靈柩領隊先行。送葬的學生皆着白色制服，如同縞素，隊容整齊嚴肅，秩序井然，軍警呆立旁觀，不敢干涉，且受感動。我們湖南高等學堂三百多學生，也分為兩大隊，由兩個體育教員率領，排立在學堂大門以外的路旁，對陳、姚兩位志士的靈柩和護送的隊伍，表示肅穆的敬意。墓穴擇定在我們學堂的右側山坡上，由我們公推十幾個同學擔任挖掘墓穴的工作，又指定二十幾個同學擔任分送茶水等工作。靈柩抵山後，即舉行公葬儀式。禹之謨和寧調元二人，先後向全體會葬的學生們演說陳、姚兩志士的生平事跡和這次公葬的重要意義。所有會葬人眾一體在靈柩前三鞠

弱，然后将灵柩抬进墓穴，下土埋葬，才宣告礼毕散会。城内学生仍分两大队，循原路安然回到了各自的学堂。只有极少数参加埋葬墓碑等工作的学生，从朱张渡过河进城时，为时较晚，被湖南教育界败类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督俞诒庆嗾使军警将他们捕去十余人，引起了学生群众的更大愤怒。

那时，署理湖南巡抚庞鸿书看到民气这样伸张，一面心怀畏惧，害怕自己的地位难保，一面大骂俞诒庆没有整顿学风的能力，责成他必须设法镇压。所以，俞即指使军警对学生实施压迫，企图以此来保全他的饭碗。禹之谟曾在当晚以教育会会长的名义，分别向学务处和军警当局要求保释，未获许可。而被捕者的家长和学堂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同学，深恐被捕学生将遭到肉体甚至生命的损害，纷纷聚集禹处，请其再作有效的营救。禹对这些人表示，他一定要负全责把这事办好，并宽慰他们不必过分惊慌。禹回到毛巾厂，指示他的学生和艺徒，迅即联合唯一学堂的学生，密切注意俞诒庆的一切行动，假使看见俞走入娼寮妓院时，就立即来告诉，自有对付俞的方法。

俞诒庆在指使军警拘押最后回城的十几名学生，又拒绝禹的保释请求，没有受到学界任何反响，并能取得庞对他的谅解以后，不禁志得意满，就在第二天晚上，打着学务处的灯笼，到樊西巷的一家妓院宿娼去了。俞进妓院后不久，就有三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伪装狎客模样(原来妓院习惯，在盛夏夜间，往往通宵不睡，狎客出入无阻)，闖进妓院，妓院照常招待，并未想到他们有什么举动。其中的一个学生，故意出外小便，在窗下听到有男女戏谑的声音，知是俞的腔调，他并且了解了妓院留宿狎客的房门是不上锁或落锁的，就推开房门，轻步走入房里，油灯还亮，揭开蚊帐，确是俞诒庆，

他大笑一声，其他两个学生也一同进来了。他们要俞和妓女仍然躺在床上，不得乱动。这一对惊惶失措、赤身露体的男女，特别是俞知道来势不妙，也只能唯命是从了。跟着，在外等候的大群学生，听到他们的招呼，静悄悄地鱼贯而入，挤满了两个通连的房间。他们关上大门，叮嘱妓院中人不许声张，保持镇定，故邻右无知之者。最初，他们打算待到天明开市，把这一对裸体男女抬在一起，游街示众。禹之谟的慎重考虑，认为这样做，未免有伤风化，乃改于黎明前，要俞和妓女从樊西巷一同步行到濂溪阁（街名忘记了），然后在俞的脸上，写着“人面兽心”四字。俞再三恳求穿一条裤子，乃准其穿着女人的裤子，赤膊跣足，蹲在妓女的胯下，拍成照片，立即冲印出来，预备分送各处报馆传播，同时派多人分道通知城内各学堂教职员，尽可能地传集学生，速来濂溪阁开会，听宣布俞皓庆的罪状。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得讯而来的学界中人，及闻风而至的附近群众，已达五、六百人。濂溪阁本不大，显然有容纳不下之势。幸而禹之谟早有安排，先派了十几个壮健学生，立在阁门外，纠察出入，不许闲杂人混进，把秩序维持得很好。禹宣告正式开会，让俞同妓女站在讲桌下面的右边，俞低头闭目，不敢仰视。首先，由禹之谟报告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以极严肃的态度，说明俞身为学务处总监督，应如何敦品笃行，整躬率属，为全城学界树立良好的模范，乃竟做出这种衣冠禽兽的行为来，这是湖南教育史上莫大的耻辱。他以极诚挚的言词，劝俞在群众面前作出透彻的检讨，表示真诚的悔悟，或能取得群众的原谅，给他一个今后改过的机会。相继发言的很多是学生，或对俞嘲笑，或对俞斥责，或对俞骂，都给俞以难堪。最后，大家要俞当众检讨。这当然是他宁死也不肯做的。他已经脸无人色。禹提议不必勉强他这样做，改

由羣众向他提出几个口号，他点头承认，就可以算数了。于是，羣众齐声喊出：“要俞誥庆保证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学生！”俞即点头首肯；“要俞誥庆保证以后不再有摧毁教育事业和压制学生爱国活动的行为！”俞又点头首肯；“要俞誥庆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伤风败俗的罪行！”俞也点头首肯；“要俞誥庆保证以后不得为这件事情企图进行任何的报复！”俞也不得不点头首肯。至此，禹之謨宣布散会，关照几个学生把从樊南巷妓院带出来的俞原来的衣服交还给俞，让他穿着，送他回家。实际上，俞家早已有人在门外等候。据说，因俞本人不愿在白天返家，就在濂溪閣的一个小房间里，歇息到晚，才悄悄然乘轿而归。

当时，禹之謨预计这件事情的发展，第一是，希望被拘押的十几个学生能够早日获得释放，以解除他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而引起学生被捕的责任；第二是，希望庞鸿书能因此而撤掉俞誥庆学务处总监督的职务，或者迫俞自动辞职，以打倒教育界的败类。但结果适得其反。前者虽然立即实现，但是，俞在释放学生时却对他们说：这次他们的被捕，完全出于军警当局为维持地方治安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本应于开除学籍之外，予以重惩，但念学生意志薄弱，受人煽惑，故独力担保一切，从宽开释，望学生从此改过自新，如再受人煽惑，重罹法网，定当重惩不贷。他这番话，显露出他借此讨好于学生，并要孤立禹之謨的阴谋。至于俞誥庆的撤职或辞职问题，由于反动统治集团的官官相卫，越是不得民心的僚属，越发为他的长官所信任，所以象这样廉耻丧尽的俞誥庆，尽管受到禹之謨等的辱骂，不但毫无悔悟，反而因此而取得了庞对他的爱怜与信任，甚至加剧了他策划杀禹的阴谋。这些，都是禹之謨所意想不到的。凡同禹有知交关系的人们，包括我在内，莫不为禹的前途十

分担心，并常劝他稍敛锋芒，注意防范。但是，禹之謨自恃他的一切爱国爱民族的行动，都能而且已经取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他深信凡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坚持为爱国爱民族而进行的一切斗争，绝对不能表现畏首畏尾的态度，和怀着贪生怕死的心情，而必须奋斗到底。因此，他对一切恶势力的斗志，始终没有丝毫的松懈。

一九〇六年夏季，湖南教育当局决定，省城各学堂一律提前放假，并限令外府州县的学生均须回家，并准备推迟秋季开学日期。据说，这都是出于俞诒庆一人的阴谋。禹之謨邀我一同步行回乡度暑假。我以为他是想借此假期到乡下去避避风险。同行的有他毛巾厂的艺徒、工艺传习所和唯一学堂的湘乡籍学生，共约二十人。禹之謨的弟弟和儿子在家乡听说禹之謨在长沙风险很大，赶到了长沙，这次和我们一同回湘乡。我们第一天从长沙乘小火轮到湘潭，第二天从湘潭走九十里到湘乡县城。那里的东皋、漣滨和东山三个学堂的教职员和学生，正在为反对盐捐浮收一事，发生风潮。第三天上午，我们分途访问了县城三个学堂的朋友。当天下午，禹率同我们一行，还加入了县城的学生，总共约六、七十人，到湘乡县衙门，投名片求见知县陶福曾。禹的名声是陶所熟知的，而且陶早已得到俞诒庆的函告，所以，陶立即在县署的桂花厅延见了我们。陶和禹分宾主地坐在大厅中央上首的炕床左右，我同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分坐在两旁的靠背椅上，其余的人，都立在大厅门外，静听禹、陶二人的谈话。气氛是始终保持平静的。禹向陶谈了几句客套话以后，就提出了我们的来意。

禹之謨说，我们昨天才从省城来到这里，听说这里最近发生反对盐捐浮收的事情。我们觉得，食盐加捐是在国课以外凭空添出

来的苛捐杂税，是加重全县老百姓的格外负担，已属事不应该，现在又在苛捐之上再加浮收，而且为数甚巨，广大的穷苦老百姓何堪负此重累！我们建议，最好是即刻停止浮收，把已收之款清算归还，充作教育经费，万一不能取消这种浮收，则请以此项收款，指拨为本县地方教育专款。

陶福曾回答说，征收盐捐，不归县衙门主管，是属于盐局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并且经过湖南盐务总局的核定，他只能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盐局酌情处理。我们顶好向省城盐务总局去请求，比较有效。他这段话，不仅为自己洗刷得很干净，而且也帮盐局推卸了责任。禹之谟感到，这件事我们在县里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还是赴县城教育界去应付这种局势，待我们回到省城时再作道理。于是我们又在翌晨离开了县城，同走了大半天的路，就分道各自回家。

我在前面叙过，禹之谟是不带家眷在身边的。这次回家，是由于他的妻子听到他在省城的风险很大，怕他遭人暗算，一连写了许多信，并捏造了一些家庭事故，定要他抽空回家一行，他才这样做的。他在省城的公私事务本极繁忙，怎么能使他在家里安心闲呆多时呢？不到一个星期，他又匆促地摆脱家庭生活，重返长沙。

禹之谟在这个时期中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到俞诤庆的密切注意。俞还经常伪造禹在某月某日、某地、同某些革命党人、某些学堂的教职员和学生、某些军队的官长士兵，开会计议起事的消息，向庞鸿书直接密报，以巩固庞对他的信任，并助长庞急于杀禹的恶念。这次禹的回家之行，更予俞以陷害禹的良好机会。在禹离开长沙的同时，俞即专人送了一封密函给陶福曾，假传庞的意旨，要陶严密监视禹的一切言行，随即直接密报庞抚台知道，将

有厚奖。陶明知俞的来信用意，是要假他的手来达到杀禹的目的，但是，禹在县城只有一天的停留，并无越轨的活动，禹到县署的态度，既是温文有礼貌，禹同他本人的接谈，也能近于情理，所以，陶仅能把这种实际情况复信给俞，说他看不出禹有什么异动。俞接信极感失望，认为此机一失，后更难逢，又立即回信给陶，说庞对他的来信，大为不满，禹既是率领群众，到县署向他“要挟”，就可以按照《大清律例》规定的“率众塞署”罪名处治。陶依样画葫芦的照俞的指示具报。庞看后心怀犹豫，既虑这个“率众塞署”的罪名太轻，没有其他谋反叛逆的实据，不足以置禹于死地，又虑禹在长沙商学两界的声誉太好，几乎是众望所归，假使不能把他处死，仅仅关在牢里，有随时酿成事变的可能。俞乘间进言于庞说，禹的党羽遍布，革命一触即发，既发就不可收拾，如再不当机立断，听其自由，必有后悔无及的一天。他深为庞危惧。庞在俞的危言聳听之影响下，立即召集布政使英瑞、按察使庄广良、提学使吴庆坻等人，在抚台衙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俞诘庆当然也被准其列席。会议上大多数认为，禹多生存一天，即长沙的治安多受到一天的“危害”，但又怕没有确实罪证的处治，反而会引起来变提前爆发。庞问俞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俞回答说，这是一个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的时机，如不趁各学堂放假期内，学生尚未回堂之前，把禹先行逮捕，就有失去时机之虞。至于罪名问题，现在的“率众塞署”已足判处他永远监禁而有余，将来转移其他离省城较远的州县执行，使他的党羽同他隔离，就可能不发生什么大影响了。这些凶恶的官僚听了俞的讲话，一致称“善”，就决定下令逮捕禹之谟。首先得到这个秘密消息的是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他立即把禹找到圣公会来，将上述的经过详情完全告诉禹，要禹暂在他那里躲避一下，然后徐

图脱出罗网。禹听了毫无难色，经过一番冷静考虑之后，对黄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向黄说明决不能这样做，理由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为革命而牺牲的人越多，革命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越快。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姚宏业等好朋友的杀身以成仁，对他起了很大的鼓舞，他出死入生，曾经历过好几次。现在，正是他得而死的时机，而且，他们拿“率众塞署”这样一个罪名强加在他的身上，又没有真正的事实，未必就能结束他的生命。他准备拼这条命，同他们奋斗到底，以尽他的天职。他死了，可以激动无数的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感谢黄的善良诚挚的盛意，请求黄帮助他达成他的任务，并把他的意志转告他的朋友们。他以坚强果决的姿态辞别了黄吉亭，急忙回厂料理一切应速安排的事务，包括销毁或藏匿有关革命证件，以及布置他被逮以后应做的各项工作。

为什么湖南撫台衙門緊急秘密會議的情況，會使黃吉亭首先知道呢？這充分證明，那時所有外國教會，特別是美國教會，它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偵察所在地政府的一切機密。有時，我們的革命黨人也利用它們，來了解清政府的機密。上述各情節，是事後我從黃吉亭口中所聽到的。

由於黃吉亭的事先告知，使禹之謨能有多餘的時間，不僅在事務方面作好適當的安排，而且在精神方面也有了充分的準備。所以，當長沙、善化兩縣的縣令，率同捕快巡警一百多人，以一部分包圍毛巾廠的四周，另一部分擁進廠內的時候，禹泰然處之，若无其事地問他們有什麼公干，兩縣令出示龐的命令，吩咐先就廠內各房間嚴加搜查，無所獲，然後將禹帶上手銬，押送按察使衙門的監獄，時為一九〇六年八月十日（農曆六月二十一日）。

禹之謨被逮入獄的消息傳出以後，湖南商學各界為他申辯營

救，向庞鴻书和庄廣良投遞的文电，每日有數十起。庄廣良不敢公开审訊，禁止禹与外面通信，不許任何人入監探視。禹的監牢生活和健康情况，外人无从得知，即黃吉亭也无法打听。传言禹进監時在手銬之外，又加上脚鐐，关在一間特設的不見天日的暗室內，与其他罪犯隔离，每天只能吃到兩頓粗糙恶劣的飯食，日夕同蒼蠅、蚊子、臭虫、跳蚤为侶，过着非人的生活。那时，长沙街談巷議，几乎都与禹案有关，莫不替禹担忧。当然更有特別表示憤慨者。庞鴻书、庄廣良对此感到棘手，深恐激成事变。而各学堂的学生，因开学期近回到学堂者，又日見其多。俞誥庆尤觉危惧。那时，我在家乡聞訊，也赶到了省城，亲見滿城风雨的景象。我首先跑到禹的毛巾厂去，只見极少数的职工生徒，靜悄悄地做清理事物和結束业务的工作。他們在告訴我上述各事情之外，还談到目前大家最关心的禹的監牢生活，正在策动黃吉亭借教会的力量，写信給庄廣良，要求到監獄里去看望禹。这件事，黃吉亭确实照样做了，使庄廣良感到应付維艰。禹的毛巾厂、工艺传习所和唯一学堂的大多数职工学生，都分途向各处传报或求援去了。

清朝統治集团深慮庞鴻书軟弱无能，不能应付湖南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局势，于一九〇六年九月特地簡派屠杀广西僮族的著名的大劊子手岑春煊胞弟岑春冀来接任湖南巡撫。庞处于五日京兆的地位，不能不勉力支持他的岌岌可危的殘局，而庄廣良、俞誥庆等人，又以新长官即将蒞任，为他們各自的前程打算，只有先把禹之謾調离长沙，以轉移輿論的目标，才能使省城保持暫时的安宁，才能使岑到此有布置防范的时间，才能使岑對他們有格外的好感。于是，他們在极秘密的動作中，就把禹移監于常德了。日期時間，无人知曉。隨即他們就把这个消息，在省城公开传播。很多人

怀疑他们已置禹于死地，故意以此为烟幕，来迷惑人心，并缓和愤怒的羣情。禹的亲信生徒数人，马上赶到常德探訪。常德当局对禹的管制，没有象他在长沙时那样的严密，所以他们很快就知道监禁禹的处所，并且买通獄吏禁卒，得与禹见面。禹尚未脱去镣铐，他的面貌更加黧黑消瘦，但精神还好。他们作过简短的谈话，禹嘱咐他们转告他的家庭和朋友们不必为他过分担心，他自有对付恶势力的办法。他们经常买些食物、药品、蚊香等托獄吏禁卒转交给他。獄吏禁卒也渐渐对禹表示同情，自动地关心禹的生活和健康。同时，禹还以他所得到的食物及用品分给同监獄的被难者，也取得了各监犯对他的友爱。这些消息，传到长沙，一方面使省城关心禹的情况的人们，得到一种安慰；另一方面，则使统治者，特别是庞鴻书、庄廣良、俞誥庆三人，感到了极度的惶恐。

九月初(农历七月中旬)，岑春煇来长沙就职，他首先注意禹之謫的案件，其次是与禹有连带关系的，浏阳、醴陵、萍乡三处会党正在积极准备而即将爆发的武装起义。岑这个人，文没有什么才学，武不懂什么韬略，完全凭借父兄的庇蔭，取得湖南巡撫的职位。他第一次同布政使英瑞、按察使庄廣良、提学使吳庆坻等人談論湖南政局，征求他们对于禹案的意见时，当然是庄的发言为最多。庄把禹的罪行尽量渲染，說：禹是华兴会和同盟会在湖南的党魁，又是湖南江西一带哥老会、洪江会和洪福会的总首領。又說：禹一人的死生，关系湖南全省的安危；他初被逮时，关在长沙，他的党羽不仅煽动长沙商学界来反对，而且引起外国教会的干涉，使省城不得安宁；現移监于常德，听說又使常德地方治安发生动摇。如果不把他的案件，从速处决，眼看浏、醴、萍三处的事变，便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但禹的罪名，并不能致他于死，是人人共知的事实，必须有精

干的人員，在严刑审讯中找出新的罪証来，方能处以死刑，不致受人攻訐。岑认为这是按察使应負的职責，即責成庄迅速妥善处理，不得稍有贖徇，致誤事机。庄廣良受到岑的支持，又在俞誥庆的协助下，先选定湖南著名的酷吏、当时任靖州知州金蓉鏡为承办此案的人員，即将禹之謨从常德移解到靖州，时在九月十六日。

禹之謨从八月十日在长沙被逮捕，經過常德再移解靖州的一个月○七天中，虽然受了很多酷吏所施行的許多刑訊，企图威逼他供出每次策划革命的經歷事实，特别是他所与同謀的革命党人姓名，但是他的回答，始終抱定了这一点：你們逮捕我的罪名是“率众塞署”，究竟我那天到湘乡县衙門去，率了多少民众，說了些什么“犯上作乱”的言語，有些什么“犯上作乱”的行动，陶福曾是我的原告，他没有举出任何事实，又不亲来同我对質，我是不能屈服的。至于我那天同一羣学界中人为县城发生的反对盐捐浮收一事，向陶知县去提供我們的意見，是一种建議和要求的性質，而且当时我們去的六、七十个学堂教职員和学生，多数递有名片，或者签列姓名，存在陶处，你們可向陶索閱，我不能負責。不管酷吏們对他使用何等的刑訊，他每次沒有变更过他的口供。

禹之謨被移解到靖州，在常德的那几个亲信学生，也暗地追踪到了靖州。他們也很快同靖州監獄的獄吏和禁卒取得了联系。在黑暗的社会里，只要有錢，就能通神。更重要的是禹之謨的那种艰苦不辭、威武不屈的高尚品德和奋斗精神，除狼心狗肺的酷吏而外，一切善良的人們，莫不对他表示由衷的敬重和热爱。尽管金蓉鏡在連續不断的审讯中，施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如以針刺入禹的指甲里，把禹倒悬起来用辣椒烟熏其口鼻，用烧紅的烙鉄燙其皮肉等等，仍不能使禹改变他原来的口供，反而每次都引起禹的一

頓痛罵，說他們這種做法，不是遏制少數人的革命，而是逼成全漢族的大革命，犧牲他一個人的性命，能促速全漢族的大革命，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罵金蓉鏡不僅是漢族的大罪人，也是不忠於滿族的壞官僚。金承辦此案的使命，是要他威逼禹供出進行革命的實據，和革命黨人的姓名行踪及事迹，以置禹於死地，而消滅革命黨人。當岑春煇未到長沙之前，莊廣良原擬處禹以永遠監禁的刑，沒有定讞，因岑不贊成，故命金嚴刑審訊，企圖取得禹的新罪証，致之於死。現金對禹已舉行刑訊十多次，案情毫無進展，反而常遭禹的辱罵，他更惱羞成怒，變本加厲地用所謂“雷公尖”的刑具，把禹的十個指頭次第全數壓斷。至此時，禹全身灼傷潰爛，惡臭不堪，十指疼痛，透心徹骨，經常昏厥不省人事。他的幾個親信學生以及監獄中的胥吏和罪犯，想盡了醫療的方法，不能減輕他的痛苦。他自知難於支持，曾向同獄的人口授了一首絕命詞，請求他們轉告他的學生（他這首絕命詞的字句，我已完全忘記了）。禹在奄奄一息的情況下，行動全靠獄卒扶持的時候，還受過金蓉鏡最後的一次刑訊。那時，湖、醴、萍的起義軍，由禹的學生魏宗銓積極策動，已經四處迸發，湖南全省戒嚴，岑春煇、莊廣良電令金把禹迅行處決。金的最後一次刑訊，就是在省方的電令下執行的。禹遍體疼痛，更增加了他對金的憤怒，他直呼：民賊金蓉鏡妄想從他的口中，取得便於殺害他的罪証，取得便於迫害多數革命黨人的資料，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他怕死，就不會讓他們逮捕。他早已拼着一死，死一個禹之謨，就有無數禹之謨來為他報仇，金某敢於殺他，就趕快殺啊！金頓然拍案大叫，“這還了得嗎？”命刑吏趕快把禹的舌頭割掉。禹之謨怒目而視，用滿口的血對金直噴，就昏倒在地。他的艱苦奮鬥的一生，就是這樣英勇地結束了！

凶狠毒辣的金蓉鏡，还不以此为滿足，立即命令刑吏把禹的尸体抬入獄中，补处絞刑，以显他的不怕死人的胆量，并且把这些事情的經過，加以渲染，即刻用电报分报岑春冀、庄廣良等人，以表他的“不辱使命”的“功劳”。

在此的同时，靖州監獄里的全体罪犯，对禹之謨遭受种种酷刑杀害的慘状，极抱不平，有摩拳擦掌大喊大叫的，也有号啕大哭或吞声飲泣的。

禹之謨于一九〇七年一月五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义。关于他在靖州獄中的情况以及他就义的情况，是我事后从由靖州料理禹的后事回到长沙的学生口中听取得来的。

記楊任常德遇難

凌 漢 秋

辛亥(一九一一年)九月初一長沙光復後，我在西園龍絨瑞家會見了楊任。楊字晉康，辰溪人，年未弱冠，自費東渡習體育，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辛亥春間到武漢，與焦達峯等聯絡，共圖起事，並曾獨返湘西，有所布置。先是，在武昌首義之前，兩湖黨人開過秘密會議，內定晉康在光復後擔任湖南西路招討使。長沙光復，焦達峯出任都督，即依原議發表晉康為西路招討使，駐節常德，劃定沅江以西常、辰各屬為招討使轄區。

晉康在龍宅和我見面時，龍絨瑞向他介紹我曾任巡防營及水師管帶、幫統等職，熟悉西路情況，並與當時駐常德的西路巡防營統領陳斌生相識。晉康聽了很高興，邀我同去常德。他呈准焦都督發表我為招討副使，並贈以東洋指揮刀一把。

九月初六(陽曆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們由長沙小西門正碼頭乘江天、祥龍兩小火輪出發，焦都督親自到河邊送行，說了一番勉勵的話。在出發之前，晉康由都督府領到湖南官錢局票子及銀元寶若干，除分給同去的人作盤纏外，其餘留作開辦費。我現在記得，當時隨晉康同去常德的同盟會會員，有餘昭常、鍾杰、劉漢庭、張錫先、張紹先、涂鑒衡、胡幻安、向忠勇、余冰如以及各方面謀事求職的人共計一百四、五十人。隨行人員中：餘昭常字華祿，瀏陽人，

据晉康对我說，也是担任招討副使的，我称他为“余副使”，但彼此接触不多。鍾杰系常德人，鍾泰昌綢緞店的少老板，到常德后派充軍需长。刘汉庭系衡阳人，曾在常德開設长春客栈；张錫先、张紹先系两兄弟，沅陵人，經營过木材生意；向忠勇系湖南陸軍小学学生，均派充招討員。余冰如系五十标标統余欽翼之族弟，常德人，派充庶务科长。余化龙是奉焦达峯之命，同船去辰州接收常胜水师的。

晉康未去常德之先，曾和焦达峯商量随带军队前往，但被立宪派所扼制，未获結果。于是决定到常德后成立新軍一师；带去的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准备成师后安插的。在船上时，我对晉康說：“陈斌生是黃忠浩的把兄弟，与革命党无渊源。我們这次去常德，等于赤手空拳，用招討使的名义，容易惹起人家不愉快，不如改称招撫使。”晉康不以为然地說：“这是都督的命令，不能改动的。”

九月初七，船过龙阳（今汉寿），知县但旭丹（江苏人）头戴水晶頂子，身穿官服，在河边迎接。晉康未上坡，由我代表上岸，同但入县衙門聚談片刻。但知县仍行清朝接官礼，我面囑他照旧供职，維持地方秩序，但現今是平等自由世界，不要再穿清朝的官服，用清朝的礼节。

在龙阳稍事周旋后，繼續开船。初八早上到常德。当地商民都悬白旗欢迎，并献酒肉，以示犒劳。我們一行上岸后，在常德府考棚內設立招討使办公处所，委派人員，开始办公，一时常德街上，挂白帶子的招討員觸目皆是。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过去为宋教仁、刘尧激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学生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很深；这时見晉康来到，全体要求参加工作。陈斌生也亲来拜訪，假装順从革命。而晉康被这些表面現象所蒙蔽，放松了警惕性，认为社会秩序已經安定，无須作什么防范了。实际上，当时陈斌生統兵五营，独

霸常德、辰州一帶，他是黃忠浩的舊部，結盟拜把，關係非常密切。我們到達常德後三、四天，陳斌生即提議要為黃忠浩開追悼會。晉康考慮到陳擁有重兵，如不虛與委蛇，他必然產生疑慮，後患堪虞。故同意開會追悼，指派鍾杰負責布置會場。並商定九月十三在常德西路師範學堂舉行。

九月十三早飯前，我正在考棚的大堂上散步，忽見武陵（今常德縣）知縣廖世英（號子材，四川人）由西轅門匆匆走進來。他邊打招呼，邊從統靴中抽出一份電報交給我。我打開一看，電報是由長沙都督府發出的，大意謂焦、陳二督於九月初十被亂軍所殺，公推譚延闓為都督，已接印視事，望各州、縣照常供職。電報已經拆封，是明碼譯出的。我問廖知縣是何處譯的，他說電報局送來時就譯好了的。廖走之後，我馬上把電報送給晉康看，並說兩督遇害，大勢不好，我們要注意防范。晉康看見電報，當即派出多人出門探聽消息，叫他們趕速回報。隨後匆忙吃過早飯，準備前往參加追悼會。就在馬已备好、剛要騎馬出發的時候，忽聽到外面人聲嘈雜，陳斌生的巡防兵已經進來了。晉康在紛亂中被陳部士兵從考棚捉到提台衙門（陳斌生駐此），在衙門前坪殺害，並被斷頭、敲牙、剖心，將血尸陳列堂前，以祭黃忠浩。其餘被亂兵捉到的人，則在考棚左邊雨廠坪被用馬刀砍死。我當時見敵兵竄來，連忙返身奔跑，由考棚後面高圍牆跳出去，手足均摔傷，在附近一家艾姓居民家和裴太厚南貨號樓上躲藏了幾天。等到外面風聲漸平靜，傷口漸好轉，才化裝逃到長沙，轉回鄉間家中休養。晉康被害的慘狀，是在場目擊者告訴我的。後來開追悼會時，我曾作一聯挽他。聯云：“斷頭台上斷頭來，取義成仁，萬古英靈昭日月；封神榜內封神去，銘碑勒石，千秋浩氣壯山河。”

我所知道的馬福益

張平子

馬福益為清末湖南會黨首領，辛亥革命前與革命黨人取得聯繫，從事反清鬥爭，終以身殉。關於他的生平事跡，文獻記載甚為簡略。我因劉揆一、劉道一兄弟及黃克強先生的關係（克強先生在經正學堂任教時，我為該校學生，由克強先生介紹加入過華興會；劉揆一、劉道一兄弟曾就讀先父申甫先生門下，居我家數年，與我同學，且極相得），曾和劉揆一代表克強先生一度與馬福益有所接洽，並加入其會黨組織；平日從劉氏兄弟首談中，獲知馬的事跡頗多，現在記述出來，以供各方面的參考。

馬福益大約生於一八六五年，原籍湘潭南鄉。其族為湘潭大姓，丁口約二萬餘，自馬家堰以上沿湘江至株亭數十里間，皆為其族眾聚居的地方，即所謂“姓地”。族中多富商、地主、豪紳，咸以勢力相結合。惟馬福益家世代佃農，族人多輕視之。福益之父大良，佃耕同族某之田，以事被退佃，致福益家在湘潭一时无屋可住，无田可耕，陷於異常艱窘的地步。時其戚醴陵劉某，介紹其租佃醴陵西鄉瓦子坪傅姓地主之田，租約百石，大良乃率其妻子遷至醴陵。傅姓尚善良，十餘年相安無事，從此福益一家遂改籍醴陵。

大良生子三人，號為福一、福二、福三，後福一改為福益。福益幼時曾讀書數年，能寫普通書信及作簡短文稿。及長，形甚魁梧，

且有胆略，擅口辯，性明決，遇鄰里有爭端及不平事，輒出而干預，處斷公平，眾畏而敬之。因此常有人至其家投告，福益應接不暇，以致荒廢農事。其弟皆怨，大良亦怒，乃分予數十金，使率其妻子離家，另居他處。福益遂遷至附近之潁口市。

潁口為醴陵之大市鎮，商務繁盛，居民逾萬人。每年舊曆正、五、八月，逢年過節，迎神賽會，尤為熱鬧。市中有賭窟數十家，豪商大賈多自遠處而來，聚賭于此，輸贏多至數萬金，時間長至三、四十日。當地商務賴以發達，而流氓、地痞、盜賊亦屬集市內，作案疊疊，致商民惴惴不安。各賭窟多為會黨首領所設。福益在鄉時即已加入會黨，且為首領。此時各首領知福益窮困，乃共議從賭窟頭錢中抽一部分接濟之。商民以市內治安為慮，因知福益之為人尚正直，且在會黨中地位甚高，乃由商會會長馬某以同族關係，約福益密商，請其協助維持。福益慨然允諾。某日，福益在市中最大酒館湘江閣宴請各會黨首領，即席發言，說：“賭博系潁口市商務發達的來源，政府不加禁止，我們也蒙其惠，但因賭博而招致不良分子，有偷盜的，更有拐騙的，甚至有搶劫的，使商旅及居民均感不安。此實為最大的危險，我們不能不想辦法挽救。”大家均表贊同，當即商訂共同遵守之秘密條規如下：一、賭博者不得做假及詐騙；二、不得行凶打架；三、遇有爭端，須由大家公平處理，不得徇私袒助；四、絕對禁止搶劫與拐騙，來市者給予旅費，令其他去；五、離市二十里內不准盜竊；一次盜竊後，不准再行留居。以上條規實行後，市面安然無事，福益的聲譽，因而蒸蒸日上。於是開堂放標，招收黨徒，潁口市民加入者頗多，勢力遍于醴陵、湘潭、瀏陽各縣，并及于江西、湖北等省，徒眾發展至萬人之多。

福益所參加的會黨屬於紅幫。紅幫在國內沒有總的指揮部，

由各首領自行開堂放標，招收黨徒。幫內有四大標志，即所謂：“山、堂、香、水”，由各首領自訂名稱。福益所開的山名為“崑崙山”，堂名為“忠義堂”，香名為“來如香”，水名為“去如水”。

湘潭的雷打石與袁口僅隔一江，相距不遠，其地產石灰石，設窯燒石灰者凡二十餘廠。其中以馬家河富戶黃姓所有窯數最多，約占十分之七、八。窯工共約千餘人，且多加入會黨；流氓、地痞、盜賊亦有混入者；以致良莠不齊，對地方不無騷擾。黃姓甚以為慮，乃與各廠主聚議，聘請福益為各廠總工頭。福益欣然允之，並與各廠主商定，每廠設一分工頭，其下設若干工頭，每一工頭統轄工若干人；窯工向廠主有所要求，必須經過工頭；廠主向窯工有所要求，亦如此辦理。福益到雷打石後，僅二、三月，即使礦山秩序井然，流氓盜賊絕迹，居民得以安居樂業，對福益甚為推崇。

福益從前所收黨徒都係農工分子及行商小販。至是，富人及士紳亦有加入者。成分雖較複雜，勢力則較前益厚。

一九〇四年二月，黃克強先生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決定聯絡會黨，策劃起義，因聞馬福益之名，意欲與之聯合。曾遣劉道一並找到馬之黨徒萬某（已忘其名，但知此人當時在南門古道巷口開設客棧，為會黨之站碼頭者）為嚮導，前往雷打石與馬作初次接洽。克強先生隨偕劉揆一至茶園鋪（在雷打石附近）與馬會面，共商起義大計，決定由馬擔任起義軍之組織工作，黃、劉負責從日本運入槍械，積極進行準備，預計年內發動（關於黃、劉至茶園鋪與馬會談情形，劉揆一所撰《黃興傳記》中記述甚詳）。

福益與黃、劉會談後不久，即在雷打石附近之五龍山某寺舉行正式開堂。在此次開堂後數日，黃克強先生由長沙致書福益，並贈以白馬一匹，酒、肉、布匹若干，派劉揆一騎馬先行，我和萬某雇一

小船，押运各項礼物前往雷打石。揆一先一日到达，我与万某次日才到。福益热烈欢迎，将礼物点收后，发现肉中夹有手枪两支，子弹数十顆，布箱中有长枪三支及子弹甚多，愈益喜悅。揆一乃教福益施放手枪，并传达克強先生意旨，大意是要他从速将会众編練成为作战部队，并尽可能使会党成員参加各正規軍隊，准备在时机成熟之时，候令发动起义。福益允諾照办。次日，福益买雄鸡两只、大鯉魚一条、鸡蛋数十个，亲自于石灰窰中做出盛饌，款待我們。席間福益向刘耳語，刘笑而点首，即轉而对我說：“馬大哥想老弟加入他的山堂，这是革命事业，老弟不可反对。”我当时未作表示，内心实不愿意。福益即以标布一方予刘，轉授予我。标布上书“恩兄刘揆一、盟兄常治（其时在长沙法政学校当教員，为辛亥革命时宪政派的活跃人物）、拜兄游得胜、証兄萧子金（游、萧二人系福益部下仁义大哥，福益极信任之，視如左右手）。”次日揆一与我乘船返省，万某則留住福益处。船至昭山附近，我取出标布，以石子裹之，投于江中。揆一說：“不必如此。”我略加疏說，乃罢。以后我尽量迴避与会党中人来往，但有知我与福益之关系者，輒来相邀，我亦不能坚拒，以致藕断絲連，迄解放后，关系始絕。

福益常騎馬巡視各窰厂，并往来浏阳、萍乡各处，行踪所至，不免惹人注目。当他在雷打石时，曾选择成員中身体強壯和有才干者，命其統率会众，夜半于山林中演习；福益与游、萧二人，則持手枪或长枪教会众練習使用。

有人以福益的行动密告于湖南巡撫，巡撫即令湘潭知县密拿福益严办。湘潭知县当即出拘票，差刘鵬（刘揆一之父）率捕快班五十人，携械往雷打石緝拿福益。时刘道一方居湘潭家中，見其父回家，自袋中出拘票观察，从旁窺視，得知一切，并悉其父翌日清晨

即得前往执行任务。乃设法窃拘票，私抄一分，乘夜奔赴雷打石告知福益，并出拘票相示，告以其父次晨即将至此。福益大惊，仓猝检行李数件，将会务交游得胜、萧子金代理，即雇一小舟，逃往长沙，与黄克强、刘揆一相见。黄、刘劝其远颺，福益乃赴湘西洪江，改名陈右衡，外间无有知者。福益至湘西后，仍时与克强先生秘通讯息，谋划起义。此一九〇四年冬季事也。

次年春，焦达峯、姜守旦、宋颺球等筹划在萍浏醴等处起义，克强先生函告福益，使发动雷打石会党及萍乡、安源煤矿矿工中之会党成员响应。福益乃函游、萧，命执行克强先生计划；自己则潜赴安源运动矿工。游、萧得福益信后，即着手布置雷打石方面的会党，并亲赴安源与福益会面。

游得胜平时养一八哥儿，训练纯熟，能飞至数里外设有红衣标志之处，复返原地。得胜携此鸟至富人家，诡称八哥儿为天上青鸟使，能上求天仙，赐人以福寿，但需先做佛事数日，需钱若干，使鸟飞上天去，得天书后，自己飞向笼内；如果不信，可以当面试验。富户闻言，欣然许之。得胜即设法做佛事。萧子金则于数里外之地方悬红衣以招鸟，俟鸟至，即以预先写好之“天书”缚于其足，使之飞还得胜处。游、萧以此骗得富人之钱甚多，以之接济福益，作组织革命军队之用。二人行至醴陵与萍乡交界处，将八哥儿挂于旅店房中，出外购买货物。旅店中方做午饭，柴湿烟浓，竟将八哥儿熏死。得胜回时，见之，大为懊丧，即往走告萧子金。当时萍、浏、醴起义正在酝酿中，谣言甚盛，地方士绅奉清政府命组织团防，检查来往行旅甚严，见得胜行动，不免怀疑，及检查其行李，发现福益书信多件，因捕萧、游；并知福益尚匿居在安源附近之江口市，即派兵围捕，获之，解至长沙，严刑审讯后，三人均梟首于浏阳门外。

福益死难时，年約四十上下。会众及革命党人聞福益遇难，无不悲憤填膺，对清政府益增敌愾同仇之心。次年，参加萍浏醴起义之会党成員中即有不少人系怀抱“为馬福益大哥复仇”的心情而投入战斗者。福益在羣众中之影响，可概見矣。

策动馬福益起义的經過

万 武

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余因唐才常所組織的“富有稟”一案被逮，幸得王必石年伯之力获免，遂往洪江避风头。一九〇四年，黄克強、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諸君在长江准备起义，公推余与刘道一往湘潭策动哥老会首領馬福益共图大业。我同刘道一由长沙小西門外搭了夜船到湘潭，找了一个姓苏的“圣賢”(哥老会里办文件的称圣賢二爷)引路，步行四十余里，才会見了大名鼎鼎的馬福益。他大概有三十多不到四十岁的年紀，身材魁伟，面带忠厚，那时他算是独一无二的正龙头大爷。他在永州、长沙、衡阳三府地区活动，官兵莫奈伊何。若說他的为人，刚愎自用是他的短处；賞罰严明，重义輕財，則是他的长处。他专与官兵为难，决不扰害地方，所以官厅总捉他不着。他又是“科班”出身(会中有以金錢开山自称大哥的，名之曰玩票或捐班，赤手空拳由老么升到大哥的叫科班)，所以能为一方宗仰。若是得到他的“柳叶子”(名片的別称)，在某些地区，可以得到会里人的供养。

我們見了馬福益之后，将克強的信交他看了。他当时頗輕視我們。也难怪他，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更不知道黄軫为何許人(克強原名軫，后改名兴)。那时，刘道一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打起行話的調子，开言道：“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除

了信上的話以外，我尙有几句言語，要在大哥台前領教，請你容許說完，如果不以為然，我們馬上就走。我今天要請教的是：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門遺訓，担起灭清复明的責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錢，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招撫，別开生面去做滿清的奴才呢？我們聞大哥之名久矣，知道大哥是个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所以，我們黃先生才特地派兄弟們來，同馬大哥談談。信上所不能說的，由兄弟口述。”

說到此處，馬福益就肅然起敬地道：“兩位先生，恕兄弟是个村野之夫，一切不懂，請多多原諒。因为先父在会中頗有地位，兄弟在童年，常常听先父說：清朝入关的时候，所杀死的汉人，已不下好几百万，光說揚州一处，关起城來杀了十天才封刀。我当时一想，既是要死，何不团結起來反抗呢？所以，我今天才干这營生，也是为了要团結一致，來做灭清复明的事。現在只能說有了一点点小基础，只是我常常感到我的部下讀書人太少了，虽然有几个办笔墨的，无非是似通未通的落魄江湖的子弟。所以，我每每有才難之叹。現今听了先生一番言語，令我茅塞頓开，古人有云：‘与君一席話，胜讀十年书。’我今天可以說是讀了十年书了，望繼續不客气地談下去。先生來意我大概曉得了一些，最好是告訴我將來要我如何進行的办法，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時候，无不唯命是听。”說罷抱拳一拱。

在刘道一侃侃而談的時候，我在旁替他捏着一把汗，誠恐将那“龙头大爷”弄翻了，我輩生命難保。不料馬福益反被刘道一的一席話所折服，真不愧是一个負一時盛名的草澤英雄。我兩人見他如此誠懇，也就向他道了歉。那時候正到了開夜飯的時候，馬福益

吩咐擺飯，劉道一又向馬福益說道：“先前冒昧得很，大哥不降罪已屬萬幸，更蒙推誠相待，足見名不虛傳。我輩革命的宗旨，第一是為圖強，請看我們今日之中國，還成國家嗎？，推其原故，都是滿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滿洲人的心中，認為我輩是他的家奴，情願將國家送給外國人，不願還給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話說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又非實行種族革命不可。至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債，也到了清算的時候了。因為馬大哥是當今的豪傑，所以黃先生派兄弟前來領教。若能得馬大哥的贊助，我們的革命事業，就有一大半把握了。”說完之後，就指着我向馬說：“這位萬先生，我們還要請他去柳州去見陸亞發大哥呢。”經此一談之後，主客之間遂成一家人了。我同劉道一在馬福益處住了約有十天左右，關於發動起義的事情，都由劉道一和馬商量辦理。我因另有使命，遂由馬福益派了一個心腹叫王桂林的拿了馬的名片，一路護送我到了柳州。

在我動身去柳州的前兩天，馬福益有一個結義兄弟叫馬龍標的，少年英俊，辦事能干，頗得馬福益的寵信。因他生得漂亮，會中一個弟兄的妻子和他勾搭上了。按照洪門規律，對於穿紅鞋（即指與會中弟兄的妻通姦）是殺無赦的。那件事給馬福益知道了，就將他交刑堂提訊。訊問明白，判了死刑。到了執行日期（就是我動身去柳州的前兩天），馬龍標當面託馬福益照顧他的母親，然後慨慷自赴刑場。我還記得那天夜晚是苦雨淒風，送他的人約有六、七個，我與道一也一同前往。馬福益依依不捨地對他說：“兄弟呀，你不該生得太體面了，所以送了你的性命！”說罷之後，就向刑場走去，龍標在前，馬福益第二，第三是我與道一並肩而行，一行七、八人，鴉雀無聲，氣象慘淡。正走時，忽聞馬龍標用極悲慘的聲調叫

了一声：“大哥，地下滑得很，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你留心点啊！”大家听了都不觉淚下。尤其是馬福益，忍不住淚流滿面，叫了一声：“兄弟，謝謝你。祝你十八年后再做一个頂天立地的好汉！”說話之間已經到了刑場。我留心看那刑場如何布置，原来一无所有，只見前无去路，对着我們的，是浩浩蕩蕩的大江。那时馬龙标高叫了一声：“各位兄弟們，一齐少陪！”說毕，只听得咚的一声，人已不見，但見水波蕩漾而已。馬福益默禱了半晌，才率領一行人回到家中。

岳 阳 十 日 記

宋 式 轟

湖南反正后，焦、陈二都督派任震为岳州鎮守府司令官。时岳州有几个軍事首腦，各不相下：（一）两湖司令部，为鄂督黎元洪所派，駐岳常澧兵备道署。（二）駐岳兵站司令部，亦为黎元洪所派，駐岳州府署。（三）援川义軍总司令部。（四）兴汉营运输司令。（五）甘兴典逃軍，駐岳阳樓。（六）岳州鎮总兵魯某。（七）任震鎮守府，駐考棚。駐岳兵站司令与鎮守府司令各出告示，互不承認，且与岳州劣紳勾結，霸占粮仓、电报局、城門卫等。

长沙当局以岳州为焦、陈余党所据，掌兵权者均不敢去。任震时已离职东去蕪湖，无人作主，乱象已成。我与唐麟既归长沙，羣謂焦达峯为浏阳焦溪人，唐麟与之同邑，又为庚子年富有票首腦唐才常之子，我与陈作新为兵目学堂同学，均劝譚延闓派唐麟与我往岳州，必有办法。譚以为然，征我同意，謂我欲为司令官，則唐为参謀长，我欲为参謀长，則唐为司令官。我說：唐在士官为第六期（当时所用姓名为周家干），我为第八期，当然以唐为司令官，我为参謀长。因我曾与克強先生有約，以別动队出桐柏关，若筹备就緒，即应率队北征。鎮守府司令官应坐鎮岳州，参謀长较为活动，可以出外游击，故决意担任参謀长。由长沙五师中抽調两連人，归我等指揮，以为卫队。既抵岳州，譚見我与唐麟均年少气盛，甚不放心，派

錢維祺監督就職。錢美髯，望之儼然。我與錢約，就職之日，將岳州各軍事首腦及各機關長官均約來，利用魯鎮台耳聾目瞶，要錢大聲介紹：“一為鎮守司令官唐某，一為參謀長宋某，統轄岳州水陸巡防軍民各事宜。”錢從之。至期照演，如唱戲然。凡清時岳州府及岳州水鎮所轄長江，上自荊州，下至陸溪一帶，均由我二人負責。蓋革命之初，尚在軍事時期，作事不能不包攬也。水鎮所轄巡防營有彭藍旗者，甚恭順。我亟假以詞色，借其綠營之兵，可以指揮如意。先令派一營兵來守衛，以壯觀瞻。

於是計劃取消各司令部，先從兩湖司令部下手。我一人往訪之，時司令官已赴武昌請餉未歸，其下有旅長、團長、營長等，亦均陸續赴鄂未返，司令部中負責者，僅一連長。我仍要求一見，他們以馬刀相架如巷，命我于刀下鉅入。我一笑揮之曰，汝一連長，乃如是迎客，若司令在此，我將肉袒膝行耶？始分開架刀請進。彼連長者，頭扎英雄結，青縐紗裹頭，身穿藍呢夾軍服，不古不今，甚可笑也。時湖北所發長沙電報，岳州系中間站，均有底紙。我携電報一束示之曰，湖北來電，要湖南出救兵，急如星火，此類電報如雪片飛來，君為鄂人，應急桑梓之難。我奉譚都督之命，特來勸駕。君既持兩湖招牌，則兩湖之地，無往而不可。現已交冬令，看貴軍尚無寒衣；且司令及旅長等請餉未歸，恐已無着。不如依靠湖南，則糧餉不成問題。我輩實事求是，點驗之後，照冊發給小口糧。先將隊伍開往羊樓司，遙為鄂省聲援，亦副湘省出兵援鄂之意，則我有詞為君請餉矣。”彼當即同意，并社出道署，以為鎮守府司令部。

次為取消駐岳兵站司令部，先將與兵站司令部有勾結之紳士以鎮守府顧問名義籠絡之。然後接管電報局、城門衛及糧倉等。其司令為鄂人，最後仍由我出示鄂省求援電報一束，勁以桑梓之情，

劝其移驻临湘之芸溪旧皇华古道之大姑，告以临湘为岳府属县，与驻岳名义亦相符。此军亦粮餉无着，仍由我点验，发给小口粮，并为之行文鄂省，俟有复音，再正式发餉，因亦顺利解决。

再次，对付岳阳楼之甘兴典逃军。我离长沙时，曾与军务司长向瑞琮(字厚甫)有密约：此人不处分，则无以肃军纪。抵岳州后，即有来密报者，谓甘已预备暗杀我与唐蟒。其人为洪帮龙头龔奇斋。洪来求见，唐蟒曰：“先父死难武汉时，悬首汉阳门，生蛆矣，无人过问。今见我为司令，又来逢迎。此等人最不可靠，可不理之。”我说：“你交给我，我有用之之处。”出见之，问何所欲？龔曰：“我欲派十六人来，以八人日夜轮班保护司令官，另以八人日夜轮班保护参谋长。”我说：“我辈作革命党者，于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毋庸保护。汝能派出十六人来，甚善，我别有用处。我与司令官此次奉都督命来镇守岳州，凡从前岳州府属以及岳州水镇所辖范围，水陆巡防军民各政，均归我镇守府负责管理。汝既有十六人，均可派为稽查，水路八人，陆路八人，作为眼线。凡此范围之内，不许有枪案发生，尤其是杀人放火之事。即派汝为稽查长，每月来司令部领薪餉。”龔感激应诺而去。于是我一人往岳阳楼访甘兴典，时正十二时矣。到即索食，并与长谈，首先说服他不要自外，且告以：“湘南湘西均空虚无兵；君部经汉阳一战，亟须补充训练，休养一时。”谈话至此，察其言色，已为我言所动。因约其到司令部见唐，商量返长事宜。甘部有刘耀武一团完整无缺，甘挟以自重。另一团则溃散不成军矣。我对刘团当然假以词色；并告以“甘谓汉阳之役，汝袖手旁观，以致大败，故汝团得以完整。”刘极气愤。后在司令部与甘互相诘诘，乃至拔刀相争，我又为之调解。刘玉堂旅长阵亡，其旅之陈策一团较为完整，另一团则打垮，团长周某(我之兵目同学，

澧县人,其名今则忘之矣)负伤,在医院。周团只剩一营较完备,营长单举,甚勇敢,但桀骜不驯。凡此皆由甘招集,以自丰其势力。我招单来部,告以:“汝旅力战汉阳,旅长阵亡,团长负伤,自为名誉之兵,不要编入甘旅。周团长系我同学,汝系周之部下,我应特别照顾。”因即与唐蟒言明,派单为镇守府司令部卫队营。并令单收集周团散兵归队。又召陈策来部,告以:“旅长阵亡,刘旅之兵,既有名誉,自有前途。现寒衣未到,汝兵军服单薄,可买棉花以实夹衣,暂以救急。”因袖四百两银票与之,并欲留其兵以守岳镇。陈甚悦。随即调该团驻城陵矶。甘原欲挟刘、陈、单以自重者,今见彼等均不为所用,已成孤立之势,乃听我劝,允回长沙。我为筹备火轮,带拖民船数十,俾率刘耀武一团回长。并以日期、船名密电军务司向瑞琮。向为日本士官第四期炮兵科毕业者,归湘充炮队营管带,至是即命其旧部炮兵夹湘江而阵。见甘船到,即发信号命其停轮,并命刘团士兵缴械上陆。甘上岸后,即有宪兵押赴军法处会审,一讯而服,当即正法。刘耀武团则派驻岳麓山整训。既送甘兴典离岳州后,乃命人打扫岳阳楼,仍开放为游览胜地。

四为取消援川义军总司令部。我由长沙赴岳州时,长沙有招贤馆,馆内所储人才,皆广西干部学生及武昌第三陆军中学生,约有八十人,我均率以赴岳。干部生则派往荆州偵测地形,以备掘藕池口堤灌城,为水淹荆州之計。后以全部材料交王正雅,为其取荆州张本。陆军中学生则皆任为司令部副官,月薪与我同为银五两。每夜我尚为之补军事学課。援川义军总部原有第三陆中学生在内服务,与我司令部任副官之陆中学生有同学之雅,我因得知其虚实,乃仍一人往訪之。其负责者为宁乡人胡梅生,乃我旧日在长沙蔡松坡先生所领导之少年进步党同志也。晤谈之下,大有“問姓惊

初見，稱名憶舊容”意味。因告以高長沙時，士官六期同學童錫梁（寧鄉人）曾告我，岳州有此軍，可收編之。既系兄之部下，毫無問題；官兵全部收編，司令部幹部則發旅費遣散。胡無異議。杯酒之間，釋其兵權矣。

五為取消興漢營運輸司令。先是長沙已派士官六期輔重兵科同學吳友松為岳州兵站長，與我同船來岳州。至是與之商議，以興漢營運輸兵站歸其指揮，並將該營運輸司令周鰲山（岳州人）委為鎮守府顧問。另有李筠（字蕓蓀），亦岳紳之有潛勢力者，時城時鄉，我三顧之，始獲羅致於鎮守府，亦聘為顧問。

至於任震，系前任鎮守府司令官，我們既到職，其僅存之參謀長蕭宏濟亦留用，魯鎮台系清朝官，其職掌及所部兵均經接管，魯亦為都督聘為顧問。至此，岳州七軍事首腦並立現象，均告結束矣。

先是都督府見我作事手面闊大，將招賢館人才均携往岳州，而岳州又若輩認為焦、陳余黨薈萃之地，甚不放心。乃派士官第五期同學新化人袁華選來岳觀察，當然有為會稽榻臥底之意。與袁華選同來者尚有六期士官同學寧鄉袁韻文。時我正計劃防守岳州之策，至少要一師兵力。決先成一旅，即以劉玉堂之旅為基礎。由鎮守府保薦袁韻文為團長，以我所收編之援川義軍（多寧鄉人）編成一團，交韻文統帶，與陳策團合成一旅，並保薦袁華選為旅長，駐城陵磯，修繕炮台，為巩固省防之計。當時外間謠傳，省城為憲政黨窩巢。殺焦、陳者，本憲政黨向瑞琮、梅馨主謀。而譚延闓就任都督後，又以向長軍務司。向昆弟三人，乃弟瑞琨號叔虞者，系梁啟超政聞社之健將；乃兄瑞彝號毅甫者，後為張嘉森民社黨之湖南負責人。憲政黨盤踞長沙之言，有由來矣。我與唐蟒，一系焦之同邑，一系陳之同學，而岳州又系焦、陳余黨所據之地，譚疑我二人有

在岳州独立之意，乃派邓某来岳，名为宣慰前敌归队之兵，实则侦察我輩之举动者。当时我正年少，意气用事。邓为清末官僚（湖北候补州县班），早已看他不起；巴结二程（程子楷，程潜），弄一高等顾问，愈觉其人可耻。此次来岳，唐麟以系汉阳旧侣，假以词色。彼乃大放厥词，责唐不应保荐二袁。谓旅长、团长皆高级军官，与司令官不相上下，应由都督委派，何得由司令官一手包办。我派副官进去，请其细声说话，司令官威严要紧。彼乃噤不敢言，而恨我切齿矣。饭后，我请他到岳阳楼去宣慰归兵，不意为甘兴典所软禁，曾有信求救于袁韵文。翌日，我即派袁接之出岳阳楼。邓既返长沙，乃大造谣言，谓唐麟、宋式矗在岳确有独立之意。时长沙有一日报名《黄汉湘报》，人言啧啧，谓为宪政党机关报，竟根据邓言，载匪首唐麟、宋式矗云云。唐与我均一笑置之。我与唐到岳后，取消各司令，扫除各障碍，为后来者铺平道路，使过去不敢来者均有胆子来；而谣言反起，都督府亦即调唐麟为军事参议院长，而派新化人曾继梧接任岳州镇守府司令官。我屈指计之，刚满十日。曾写一《岳州十日记》以记其事。现该稿已失，此不过记忆所及，志其大概而已。司令官既将交接，我要求前后司令同游君山，归即交卸。并将参谋日志交曾所带来彼之同邑人方鼎英。方系我同期同学炮兵者。曾在汉阳炮队困时，初无一兵，一日，往鸚鵡洲竹木班一行，归即带来百余人，均新化而曾姓者。我诚佩服其人。此次同来岳者，均士官同学之籍隶新化者，如五期杨柏森、八期邹序彬、方鼎英是也。都督府并未派人接我之事，我亦无与唐麟共进退之必要。不过我认曾之气度非豁达之流，必难与共事，故毅然去之。

譚心休“招撫”宝靖始末

李晴云遺稿

譚心休是我的老师，辛亥那年他从上海回到湖南，长沙响应武昌反正及焦达峯、陈作新被害后我和他见过几面，随后又跟他在宝靖招撫使署内住过几个月，现在就我同他接触时所聞所見的一些情况，記述于下：

长沙起义后第三天，我同唐伯龙去都督府見譚心休。他說：“这几昼夜，未曾合眼入睡，都是为了开会爭論选举都督的事。湖南都督一席，同盟会同志在八月三十夜举我担任。第二天（九月初一日），长江上下游各党派各帮紛紛来衙，对都督一职，力持异議。我与曾伯兴以同盟会章程和他們力辯，只是不依。結果，决定开会票举。我們同盟会人此时集湘者少，而他們竟以多数票举出焦达峯为湖南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譚心休出署的第二日（九月初五日），我到邵阳中学去看他，我問：“湖南既响应武昌反正，現在已有主体，你老可否留湘帮他們的忙？”譚說：“和他們合不上胃口，我想仍回轉上海中国公学去。”这时，刘长城（駐省部中的数学教員）与姚平阶（湖南省視学）到来，姚对譚說：“譚先生，这次我們湖南响应武昌反正后，在报上看到各省亦連日紛紛响应。在革命軍中，我們素来沒听到焦达峯这个名字。今日湖南革命，突然杀出个李逵来。我看此人从圈帮里

来，学識眼光是有限的，将来我們湖南不免要受到影响。你老在省可多住几日，看看有无变化。”譚說：“平阶，这些事暫且莫談，現在人家送来几瓶好酒，不妨多喝几盅吧！”

初十日，我与石子善(名襄均)同到駐省邵中会譚，他已外出。該校的教職員問我：“今天本省的新聞，你們听着沒有？”我与子善都不懂，轉向他們請問。他們說：“今天湘督焦达峯被刺杀了。一班軍政长官要求湘省最負盛名的參議院院长譚組安先生出来維持湘局，組安尚在犹豫中。譚心休先生和同盟会諸公同到譚延闓公館劝駕去了。”我驚訝道：“此事竟为平阶前日所料到。”我便轉回宿舍，心想：譚心休先生与譚延闓素来是相契的，所劝料无不听。譚延闓一登台，譚先生或許在湘留得住。那天晚餐后，我复到邵中譚心休处探問，当时邵中几个教職員及几个同乡也在座。譚說：“組安今天的意思似已活动，明日我陪他进都督府去。”我說：“現在都督既定，先生自己的行止怎样？”譚未有所表示。有位同乡說：“据我的鄙見，譚先生若不愿意留居都督府，也当帮着組安对湘省地方治安整理一下。近日来，本校同人接到家乡来信，很多說到宝庆四乡匪风大起。他們倡言，皇帝既已打倒，帝制可以人人自为。过去潜伏在高山頂上的几处大王，現已开府到平地来了；过去蟄伏在乡村偷牛盜馬的強盜，現在招集一班流氓，強夺強要。良民所喂的牲畜，攫取宰杀，不問誰是主人。似此扰乱秩序，将来怎样收拾？”又有个同乡說：“照你說的，还是我們县里一隅的土匪行为。我近日得着朋友的信說：‘湖南反正后，从安江、洪江到靖县的道路，簡直不通。听說处处寇苻潜伏，客商行旅囊橐都被截搶。’这样看来，湘中、湘南那块地方也糟糕得不堪了。”再有一位先生說：“对于无識的匪盜，我不怪他。昨日我接到县里的信說，宝庆五属联合中学新

化老教員邹介人先生，他听得湖南在九月初一反正，以为英雄割据时代复現于今日了，即督率全体学生离开学校，盘据宝庆府署，树立旗帜，自成一軍。軍器从三府局軍裝庫搬出些大刀、梭标、南洋叉、来复枪之类。他們的糗糲是打开义仓量谷吃，現尚未向地方派捐。最妙的是他部下这班学生的装束，打扮出戏台上那些武松、黄天霸模样，头包絲巾，并戴着英雄的头盔，在市上耀武揚威，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說得我們在座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譚心休道：“那么，明日我也向組安說說。他若留我在湖南，要他假我一个名义，我也想到宝庆去看看。”

九月十一日下午三时，譚心休从都督府回来，我們向他問消息。譚說：“組安已經就事。他不肯放我出湖南以外，現拟委我为湖南宝靖招撫使，准今晚有委札和公事下来。”果然，黄昏时，都督府的委札和公事下来了，要譚就湖南宝靖招撫使职。公事上大概說：“貴使可从省标拨兵一营随帶到宝。兵不敷調遣时，在宝随时招募一、二营听用。器械餉糈由省供应。使署各职司及軍营各弁目概由貴使支配，毋庸关白来省。貴使宜即日馳宝，以紓民困而安地方”等語。我們随即向譚道賀。这时，曾伯兴、唐伯龙二人亦到。曾对譚說：“招撫使可統兵五营，統領下可設一位标統。新化現有謝玉麟在省，是个老軍务。我和伯龙共荐他当个标統，必能胜任愉快。”譚当即同意。此外，譚还以駐省邵中的校长賀民范贊襄招撫使軍政事务；以李文成为使署書記股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当即辞脫；以姚崇举为使署财务股主任，并以邵中教員刘长城、朱薰南为副。譚还决定九月十四日向宝庆开发。

到宝庆后，署內的职司除由省帶來的人員外，新加入供职的有刘寿康(字安民)、唐燾(字渠严)、岳季吳及在东湖同学的王錫智、

陈律齐等人。

九月二十日，刘安民呈上推选营长名单，请谭使圈定。姚平阶对谭说：“你老现顶着宝靖招抚使一个头衔，关于湖南西南一带有什么风吹草动，需兵很多；省署既允你老招募一、二营，那么，再多招募几营也不要紧。一个招抚使统领五、六个营，不算多，军餉横竖出在省署。”谭说：“那也不必多募。我由省带来了王汉斌一营，宝庆原有的巡防营营长徐振岱现已晋省，我当电省，要这一营归我节制。现只准备三个营的营长，兵弁则由各营招募支配。”于是圈定石基、岳尧民、孙九初三人为营长。

过了一天，谭有个指令下来，分拨各营的驻队地点：第一营营长王汉斌驻使署，新编第二营营长石基驻府学宫，新编第三营营长岳尧民驻天符庙，新编第四营营长孙九初驻临津门李氏宗祠。原巡防营改为第五营，营长为徐振岱。当时宝庆由各方面回籍的丁壮甚夥，一闾城里招募新兵，均属集邵城。故新编二、三、四营，一、二日便招募成功。不过那时仓卒反正，人心未靖，各营所募的兵弁，流品亦极为复杂。加之，王营是四十九标分来的，徐营是久已盘据邵城的，新旧军营聚居一城，兵士彼此往还，难免不发生影响；而标统谢玉麟刚刚到任，对军纪也未加整顿，不到数日，就演出了九月二十九日晚兵变的一幕。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我由使署出来，仪门内外拥挤持枪的兵多人，我到太平巷李氏试馆内询问使署总稽查李兼卿，出了什么事情？他说：“李先生，你在署内还不知道吗？现在的三营连、排长及军佐等职，都由谢标统选用武备学堂的学生充任，第一营与巡防营的兵士不服，以为他们在军营积劳多年，未蒙选用一个当官，那些学生一出学堂门，便当起官来，这样，他们永世不能超陞了，还出

来吃什么粮？当什么兵？因此，老营便煽动新营，羣起反对謝玉麟，气势囂张的很呢！”

我回到使署，見門口持枪的兵越发拥挤。他們見我身上掛了出入証，也不加阻拦，任我挤进去。我直到譚使室內，見輝煌的烛光下，譚同署內職員有說有笑，团坐在一桌飲酒。我問：“你們知道外面的情况嗎？”姚平阶一把牵住我的手道：“晴云，你何必这样惊惶！坐着喝酒吧！”我見他們这样安詳，以为他們早有成竹在胸，便放下心。刚刚坐下，就听得炮子响了。譚和他們仍然坐着未动。漸漸地枪声越响越密，屋瓦噼噼作响。只听得千百声喊道：“我們保护譚都督，我們勿惊动譚都督。”有两个持枪的兵搶入室內說：“都督，你老快避到巡防营內去。”便另有两个徒手兵士来搀扶譚入巡防营驻地双桂軒，我們也随从而去。只听得隔屋的使署內，傾箱倒篋，軍需室內的光洋嘩嘩作响。譚倒在巡防营的床上，閉眼不作声。駐署的一营营长王汉斌始終未露面，也始終未見他出来彈压。約一小时后，枪声止了，光洋的声响也沉寂了，使署与巡防营两处都无动静。城內城外远处有枪声間作。这时，刘安民、唐渠严手提灯笼进来报告說：“頃据进署的人來說，第二营、第三营的兵士混乱得很。我們想請招撫使給一手示到該两营去安撫一下，何如？”譚即手书“宜各守营盘，不得乱动”的手示，盖上招撫使关防，交与唐、刘二人持去。我請示譚后，与他二人同出使署，見街道上巡查的士兵一队一队地走着。我們持有招撫使的手諭，无人盘問。

十月初一早，我进使署探問二十九夜大乱时城內人民有无伤亡？财产有无損失？署內財物損失多少？幸好，是晚只城里某井溺毙一岳姓厨師，想是被人仇杀。人民财产并无損失。署內軍需处被劫去几千元光洋，職員衣服損失約值几百元。标統謝玉麟和

他們撥用的几个連排长都在那夜逃走了。九月三十日使署已开了軍事會議，各营兵弁革去約十几名。軍需主任姚崇舉自請辭職，繼任的为王綿初，系招撫使的妹婿。署內庶务事归朱薰南一人負責。过了几日，我家听得城里兵变，父亲特来城促我回家。我报告譚后，即随父亲归家。

我家住邵阳南路下花桥，环村二、三十里远近，过去尙称安靜，这次，我住在家里，見邻近的村庄，多設有小小的匪巢。他們虽沒有公然出来杀人放火，但到处打鸡打狗、偷牛偷猪的行为，时常发现。我写了封信向譚报告一切。过了几天，我接到譚的复信云：“近日胡攀怀、左五云两先生来城。我已将徐振岱的匪兵遣散，将双桂軒的房子騰出，你与胡、左两先生同聚一处，也好談天喝酒。希早日来署为盼。”我馬上准备东西，进城去了。

一到使署，見譚所統轄的各营队伍也时常下乡“剿匪”。譚心休以“办匪”为名，杀人沒有虛日，或日杀数十人。仪門以外，清风閣以內，大路两旁經常累积人头十余顆。一天，我对譚說：“匪固当杀，但也有情罪的輕重。請你老以后办匪，注意审讯，有可以原宥的还請原宥。”他說：“晴云，你們书生习气全未脫掉。《书經》上不說过嗎，‘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古語又說：‘惟杀人斯能生人。’这些匪是害羣之馬，杀害馬才能保全众馬。以后杀匪，我还想要你們这班书生亲手动刀去試試，你还怜惜他們嗎？”

我这次来署，已是十一月的天气。双桂軒常烧着一盆炭火。我陪着胡攀怀、左五云两先生围炉談天。一天，我們听到使署将要审問欧阳协和一案。我便問胡：“欧阳协和在我們宝庆市上不过是一个湘乡籍的紙商。他在邵阳到底做了些什么坏事？为什么邵阳的紳商学界这样对他切齿？”胡說：“欧阳协和有几个臭錢，会放官

債。邵阳的官府到任，无不巴結；邵阳公私案件，无不包攬；公私財產，无不爭奪；倚着衙門包庇，橫行霸道，邵阳人對他无可奈何！譚使最恨這個刁徒，平常見面便罵，有時還想動手打他。他時時想尋機報復。會譚鬍子丙午年因公葬陳天華到岳麓山事，與清廷作對，清廷指譚為革黨領袖。他借着這個隙端，偵知譚先生那年臘底由上海回家，就告密到縣。幸譚脫走廣西。這歐陽協和是我們寶慶地方的巨蠹，是個神通廣大、萬惡滔天的賊子，若不除去，將來貽害無窮。”這時，廳上正在審訊此案，我約左五雲到廳上看看，見歐陽協和與其從惡曾卜生一千人犯站在案下。歐陽協和的年紀約在七十上下，鬚髮蒼勁，面雖瘦削，却帶一股勁氣。曾卜生是個胖子，年約四十上下，面露笑容，裝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公案上放着告他們的案卷，約有兩寸多高。問官問歐陽幾件案子的大概，他出言不遜。問官叫衙役打着他跪下，掌嘴幾十皮鞭，再問曾卜生“那幾件案子你可在場？”曾卜生老早跪下，說他與歐陽並無多大往來，歐陽作的事多不與他商量。問官大怒，罵道：“你是邵陽縣的敗類，仗着會說會寫，依靠歐陽協和混飯吃。關於邵陽地方的公款公產，件件你都拿着在他面前獻殷勤，作謀主，邵陽人那個不知你是歐陽協和家的狗腿子。今日你開口便說得這樣干淨。來人！給他暫且打兩點鐘的板子，再來問他。”只聽得一聲吆喝，拖倒在地，板子便響起來了。過了數日，聞听歐、曾兩名都判處上站籠處死。

從九月二十九晚使署兵變後，譚頗具戒心，署內募善技擊的衛兵一隊。一天，有前縣署警備隊長卿占魁解到一批人，說是“土匪”，譚心休叫出幾個人來問話，他們突然挺進，向譚撲去，當被衛隊擊斃兩人，余者被衛隊手搏拉倒。譚即將余匪數名，在署內階前斬決。并买到老水酒一大甕燒開，和衛兵及我們大碗暢飲。

这时，三、四两营分駐到洪江、会同两地。第二营石基率队在邵阳四乡“剿匪”，第一营王汉斌率队在四乡督促地方人士毁菴院，办学堂，并焚燬偶像，強迫男人剪掉辮子。

过了夏历年后，譚接到督署公函，大約說：“宝靖一带既承貴使招撫就緒，即仰督帶所有軍營來省交卸，兵餉由督署發給”等語。譚即飭各司擬辦交卸事務，并一面調回洪、會兩地軍營回省，打點返省之計。到正月底，留石基營在邵阳駐扎，余軍盡行開省。所有各員司隨軍到省，造具名冊報省署后，方得回籍。正月二十八日啟行，二月四日抵省，駐黃泥墩某公館趕辦交卸手續。一日，譚對我說：“我們同盟會有人發起訂某日在中東長街魯班殿集合會議，要另行改組為老同盟會。晴云，你去不去？”我說：“我在上海承你老介紹入同盟會時，原為的是革清朝的命，現清朝的命已革了，還存個同盟會名義何用？我意，憑它是個新的老的都不願預聞了。”譚付之一笑。

再過了幾天，所有使署交卸冊卷都已造好。譚返上海，我們使署的人送他走后才回邵阳。

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訪問录

張友仁

我們为了搜集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史料，曾进行了两次調查訪問，一次在惠阳县，一次在保安县。訪問的老人很多，他們所談的情况有些不同于过去的記載。現在把他們口述的笔录整理出来，我个人当时的見聞也附录在后面。茲先将訪問的老人的姓名、年齡和住址介紹如次：

廖毓秀：七十六岁，惠阳三洲新迁地方。

戴煥揚：七十七岁，深圳沙湾厦村。

袁仁昌：八十六岁，宝安县政协委员，住坪山圩。

罗国荣：惠州鎮隆老医生。

楊璿：七十五岁，惠阳县城。

楊文光：七十岁，惠阳上楊围人，移居惠州鎮。

叶承源：六十岁，清举人叶蓉焯姪，惠阳鎮，原住大山下。

张寿宜：七十七岁，惠阳平潭人民公社养老院。

魏来发：七十一岁，惠阳樟树潭敬老院。

邱火乾、曹老、黎水、何本：惠阳县多祝敬老院。

蔡心遐：七十二岁，多祝人，現在中学任教师。

楊衍秀：八十一岁，多祝人民公社。

楊純修：六十七岁，平山人民公社。

毛冬：七十九岁，平山人民公社医务所老医生，当过清归善县丞的卫兵。

梁鏡球：惠州中学毕业生，辛亥革命老人。

宋少梅：七十岁，新圩医生。

（一）三洲田发难，攻进沙湾、鎮隆

廖毓秀：庚子年起义之前，我就见到两个不識面的青年人来到大围开店仔，后来才知道一面庞方中带圓、双眉硬直的是郑士良，一个面黑而麻的是黄远香，花名叫做黄大福。他們借开店仔为名，搞革命是实。店仔里常有人来来往往，开秘密会。那时我十五岁，在私塾讀書，因为好奇，曾进店仔里去看过，他們也不阻挡。閏八月十三晚，大寨一时熱鬧非常，馬兰头的五間烂基地就是他們起义祭旗的地方，人来人往，十分紧张。那夜月明如昼，我看到岭岡頂上竖起大紅旗，刀光劍影，閃閃夺目。黄远香紅布包头，身上挂着大紅綉毡，威风凜凜，前后約有六、七百人簇拥着他。祭旗后，他們下山分两路进发，东边一路从金龟洞出禾岡，打新圩，直扑鎮隆；在那里和清軍接火，把清軍打得大败，死伤甚多，起义軍也死了两个人。西路从橫岡出沙湾攻兰花庙，清軍聞风便逃。深圳清軍曾来救援，但也被打得大败。

戴煥揚：兰花庙住有清軍四、五十人，是官仓蔡总、龙潭蔡茂青所帶領的。閏八月十四大清早，我在岡边放牛，忽然一声枪响，村背坳頂缺口的山路上涌出一队紅布纏头的人冲将下来。听得他們边跑边大声呼喊：“大家莫慌，我們是来捉四由哥的。”我們誰也不懂“四由哥”是什么人，橫直与自己无关，心里不害怕，就站开来看。紅头軍跑到半山，駐兰花庙的清軍慌成一团。这时庙正西又冲来

一队紅头軍，清軍前后受敌，来不及发枪，便落荒而逃。不料从落麻石板山又冲下来一队紅头軍，拦腰一截，清軍被三面包围，登时就給打死十多人。沙湾清軍接到兰花庙的消息，立时派兵馳援。紅头軍奋勇迎击，被打死了两个兄弟，遺尸一在田边，一在庙后。但紅头軍这时陸續赶到三百多人，奋勇冲击，杀得清軍泗河夺路而逃，向深圳方向窜去。他們在过河时，又被打死一个。紅头軍繳获得十多支快枪，就乘胜向橫岡进击。

袁仁昌：三洲田大寨所在是个很肥沃的盘地，往西北翻过打鼓岭，走山路落到平原，就是碧岭。碧岭和三洲田大寨都是姓廖人家，約有八十来戶，三、四百人，自从起义失敗之后，給清政府杀的杀，逃的逃，連大寨也給烧过几次。老围廖观秀、碧岭廖庆发都是被清政府杀害的。

罗国荣：庚子三洲田起义是閏中秋的前一夕。約在八月尾，林海山从香港来到三洲田，住了半个月，很是忙碌。到了祭旗之后，就分两路出发：一路攻沙湾兰花庙；一路打从金龟洞山路出新圩，这一路是林海山率領，有咸水枪三百多支，我就在这一队。当晚（閏八月十四）在新圩造飯，准备明天去摸鎮隆，把較次的枪械編为先行部队，好枪压后隨行。在新圩住了一夜，十五日早飯后出发。約行四、五里許，大队传来探报消息說敌人已派队前来，着我們趕速攀上山坳，擇要冲設伏，准备迎头痛击。我們按照命令布置停妥之后，天已断黑，清軍果然来到坳頂。我們就一声“杀呀”，把他們打得东逃西窜，打死十来个人，繳了他們的枪械，捕杀了他們一个連长（即哨弁花翎补用游击严宝泰）。我們旗开得胜，就在夜間占領了鎮隆。十六早，在鎮隆早飯后进到麻溪，沒有发现敌踪，又連夜行軍，天才放亮（十七日），到达了永湖。过了两天，我們又到距

永湖十里的上楊圍。當時上楊已經被我們兄弟占領了，很熱鬧，為首的是楊發。他們見到我們到了，就殺豬擺酒，開會歡迎。那裡的紳士縮頭縮腦，不敢過問。再過兩天，有人報道清軍莫善積帶兵前來，已給我們在菱子園打敗了，繳獲他們百多支槍。

叶承源：我的伯父叶蓉煌，光緒二十三年舉人。三洲田起義失敗後，他做惠州中學堂監督，思想有了轉變。他曾對我說過，當三洲田起義時，他做了一件最不應做的事。他說，那年約在閏八月中秋日早上，鎮隆有人來報告，新圩到了一幫造反的人，大約有几十个，槍支不好，看樣子快要到鎮隆來，要他快去飛報官府。他就據以飛報惠州陸路提督鄧萬林和惠州知府沈傳義及歸善知縣鄭業崇。鄧當即派哨官嚴某率領一哨百餘人到鎮隆。因時已入夜，清兵不敢立即紮上佛子凹險要的地方。他很焦急，認為佛子凹是個必爭之地，主張先行占據。哨官不相信他的話，不肯上凹。他就去找到牛子坑張姓大商人的兒子等人，請求他們做向导引官兵上凹。嚴哨官只好帶兵開進佛子凹。那知凹上樹林中已有許多人埋伏。一陣亂槍打來，當場打死官兵數十人，嚴哨官被捉殺死，頂好的槍彈都被繳去。當時我伯父大吃一驚，怕擔當不起這個責任，不料沈府倒保舉他水晶頂戴。

(二) 平潭、黃沙洋二次大捷和多祝失敗

張壽宣：庚子閏八月十六(友仁按：應是廿日)我在鴉鵲地家里，聽說七脚發到了良井。十六、十七(應是廿、廿一)住了兩夜就過白芒花，那時已有千多人，槍甚靚，歸楊發統帶。十八(應是廿二)我因事上平山，傳聞有紅頭來，鄉人紛紛拖男帶女逃避，我也躲進了一間當舖，但並沒有見到紅頭來平山。我立刻趕回家。次

日早晨，見紅頭由鶴地过河，冲向新圩，約有四十多支快槍。我在河边站立处距离新圩里把路，看得清楚。清軍莫善积部先到达新圩，等待紅頭來。那知道紅頭过河的人早已埋伏在芨子(番石榴)园的莽丛里了。于是就在芨子园打起仗來。从鶴地刚要过河的紅頭人多，看到芨子园已接火，就从东边沿江岸飞跑到鸡公石、樟树潭，穿过皮子寮渡江到平潭，包围清軍。莫善积知道紅頭兜他的屁股，就轉向平潭。适紅頭渡河赶到，莫不敢停留，拔队便跑。紅頭追上去，俘获了他的一个哨官，砍了三个人头。紅頭占领了新圩，沒有住宿，随即过梁化进多祝，沿途秩序很好，沒有騷扰人民。紅頭兄弟死了一个姓何的，是西山月人。

魏來发：新圩之役，我在樟树潭，村人树起紅旗欢迎紅頭，老老少少聚在村前观看。紅頭皆便衣，过渡的四十多人。到刚出太阳的时候，就在芨子园打起来。只見紅頭沿河向清兵追击，樟树潭这边又沿岸包抄上去，加上村里的人又搖着紅旗欢迎紅頭。清官軍人数虽較多，但隔江一望，看到紅頭比他們还要多，只得夺路撤退，被打死或淹死的有一百多人。

宋少梅：庚子那年，我住在新圩，閏八月廿二日那天是新圩的圩期。赶圩的人还未上集的时候，紛传“紅頭賊”來。我和家人一起随着大众走避。有人說三点会打从白芒花經鶴地來了。正在这时，忽然听得必必卜卜的槍声愈来愈密，原来清軍喜字营先已入了平潭，出到芨子园就遇着三点会过河冲杀而來。他們槍好人強，清軍不是敌手，抵挡不住，只得边战边走。又見到对岸还有千多人追击过来，清軍更着了慌，就沿河岸窜退，死伤很多。县丞杜左堂也被擒去做生公，听說后来給他当上了文书。三点会这边也死了一个当丫头的。三点会乘胜追到平潭煮朝食。后来清軍派了吳祥

达率领大队人马前来反攻。

蔡心選:庚子閏八月黃沙洋之役,起義軍是于二十六日早攻入的。那時清軍只有一哨兵守多祝(約幾十名),一聽說起義軍來,怕多祝難于抵擋,即退守黃沙洋。黃沙洋鄉居民有鄭、蕭、楊三姓,蕭、楊兩大姓素不和睦,清兵不得不聯蕭、楊兩姓和鄭姓來共同抵抗起義軍。蕭、楊兩姓耆紳也在表面上暫釋舊嫌,和官府合力防禦。可是楊姓一位廩保楊冠軍早與革命黨取得聯繫,約定內應。當起義軍進攻黃沙洋時,差不多整天相持不下,到深夜時楊冠軍叫他的族人開西邊的閘門迎接起義軍,圍內清軍腹背受敵。到天亮,鄉就被攻破了。守鄉的清軍全數就斃,蕭姓丁壯死了几十人,蕭族紳士蕭心如就是在這一役被打死的。清軍既敗,惠州震動,統領吳祥達就從海豐趕程赴援。二十七日,吳率隊反攻,在洋口正面派一哨繞黃沙洋迤下的沙洲尾堵截。這時候起義軍受到優勢清軍壓力,戰鬥達到高峯,終以彈盡勢蹙,向赤石方面退却。下午三時許,清軍奪得黃沙洋,佔據了多祝圩。起義軍退却時,有兩個日本人被清軍殺死,楊冠軍服鴉片烟膏殉難。

黃水發:庚子八月中秋後,紅頭軍由良井分路進軍:一路經白芒花,在鶴地渡河,到新圩茨子園;一路經樟樹潭,遍鶴湖。兩路都先到平山河河邊。抵鶴地的一部分紅頭軍迅速渡河,繞過新圩,埋伏在茨子園的蔗林中。紅頭軍大部分還未過河,而埋伏在蔗林的那一部分就已和清軍打起來了。一排排火力直打得清軍招架不住,打死很多人,尸骸滿地,還捉了兩個生公。清軍急忙撤退。紅頭軍還未渡過河的,就沿着河邊推進,繼續渡河,由鶴湖沿梁化之北,撲向仙洞,向平潭一綫作了一個大包圍。清軍不知紅頭軍有多少人,看見形勢不佳,就拼命向平潭方向逃竄。

楊衍秀:庚子閏八月紅头軍起义时,我在多祝圩。二十六日紅头軍攻入黃沙洋,有二千多人,百多支洋枪。十三約(地名)来参加的有百多人,其中有崩岡下寮山圩的謝德、大埔壘的周亞祥(綽号天子祥)、大和的卢百良(当大哥)、黃沙洋的楊新才(当时磨豆腐)等,声势浩大。駐多祝的清軍不过五十多人,一听说紅头軍来,就退入黃沙洋。紅头軍探知实情,就把黃沙洋包围起来。乡內清軍有百余人,紅头軍有了內应,一鼓便打了进去。攻下黃沙洋之后,就进入多祝。当时我見到天子祥头插雉鸡尾,胸挂綉毬,很象做戏的打扮。紅头軍都是头纏紅布,腰纏紅带,褲头插着一支紅旗子,褲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十分神气。他們进圩时,全圩安宁,并没有騷扰。次日(二十七日),清軍吳祥达騎着白馬,率大队来攻。紅头軍迎头痛击,在沙洲尾的坝上大战一場。清兵抵挡不住,吹号收兵。到了下午,吳祥达得到了增援,打了两个钟头,打得很惊人。紅头軍因彈少无援,打不下去,就一声“水急,松人”,向距两里路远的双金退去,黃沙洋又为清軍占領。事后举行清乡,楊姓多被勒索。楊賢輔的家被抄,他家里的白銀被用籬筐抬去。

曹老:紅头軍曾打入多祝,住了一夜。我見過楊亞发,他胸挂紅綉毬,騎着細細的馬在巡街。第二日,吳祥达带了大队人馬來反攻,在洋口接仗,打得很激烈。头一仗就打死清軍三十多人,伤的不少。当时我父亲曹老山給吳祥达叫去当救护,还把清軍的伤兵抬到我家里医治。我父亲見打得这样激烈,伤兵續有抬来,就把伤兵移到別处去上药。第三天,吳祥达来要伤兵,喝問:“我的兵哪里去了?”态度凶恶。我就給他說明去处,并斟茶接待,他才点头說我父亲做事妥当。

邱火乾:己亥年我在多祝圩卖生果,对面就是吳祥达的衙門,

那里的兵勇很有规矩，随意取食我的柑桔不给钱，我不敢抵抗。不久吴祥达叫我去当差，我就去了。但有一次他拿花红单叫我带路捉人，单上有猪肉店的卢百良，做小猪贩的陈龙标，三点会员陈亚发，造脚（意谓好劲的英俊人物）曾亚老和长江来的沈木桂等。我心想，和他们无仇无怨，带了路会被他们寻仇，就决计不给他带路。庚子閏八月間，吳祥达原带有两营人驻紮海丰。十八日下午在汕尾接到一封火烧三角的告急信，說惠州城池快失陷了，催即发兵援救。二十日，我跟吳祥达从海丰出发，日夜兼程行到埔心，二十一日三点钟到了多祝。吳命令即轉船下惠州，一路順水。二十三日过平山，下午到了馬安，当晚赶到惠州城，才知道城里并没有“賊”。于是又回到馬安，住了一夜。二十四日早，拔队上平潭，二十六日夜到了崩岡，赶程往多祝。二十七日早，天才发亮时分，在洋口就遭遇紅头軍黃远香部队三百多人拦途截击。吳立即散开部队迎战，却挡不住紅头軍以逸待劳的一击。这一仗，吳輸了，一营死了几十人，有的逃跑了，剩下只有十多人。可是吳祥达还不死心，再整顿他所有兵馬約一千多人，加强枪炮的力量，又来接战。吳率队才到江边，就被紅头軍枪手一枪射死了他的坐馬。他換过了馬，边战边走。这一仗打得十分剧烈，自早上战到下午未申刻，双方死伤不少。后来紅头軍势漸疲弱，收队由黃沙洋退向赤石去了。事后听说，当我们从多祝乘船直下惠州城那天（即二十二日），知县郑业崇曾带了百多兵在新圩进攻紅头，被紅头軍打败了。

毛冬：庚子年我当归善县左堂（即县丞）杜凤梧的护兵，那时我才十九岁。閏八月中秋节前后，传说三洲田造反的事。这个消息吓得惠州知府沈传义立刻下令閉城，一面在乡間招募新兵百多人編为一营，即靖字营勇。这些所謂营勇，身穿紅背心，头戴竹夹

帽，腰間插兩把爛鬼單刀，還馱着鴉片烟槍，都是肩骨頭高聳過耳的病夫。靖字營勇派由劉邦盛的義子杜左堂管帶，我當幫帶。二十一日早奉命出發，我穿幼藍衫褲，黑布包頭，背上插一把刀，拿着槍，騎上馬，領着三十多人先行，杜左堂騎黃色馬隨在后頭。從縣城南門出發，到平潭歇了一夜。次日（二十二日）向平山進發，離平潭很遠就到鶴湖村邊，經過一個茭子樹很多的園里，看見東南邊一片密麻麻的蔗林。不提防就从蔗林那里打來一陣亂槍，大家登時手忙腳亂，知道已陷入埋伏圈里，又不知“賊軍”有多少人，便急向后退。但后頭又有“賊軍”截擊，后来的營隊和我們又聯不起來，就給打成四截，紛紛亂竄。我們這一隊的許多人都被迫跳下河里，企圖泅過對岸。河水雖不深，但在驚慌之中，淹死的不少。當時我還拿着槍站在河邊，只見杜左堂在水里載浮載沉，我便急忙撇馬丟槍，一躍跳到江心，泅入水底，出死力用膊頭托着他，推到近岸，他才有氣無力地爬上岸邊。于是我又一個迴身，泅到一處人少的地方上岸。不料剛把頭浮出水面的一剎那，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辮子，把我拖上了岸，捆縛起來。我便渾身濕淋淋地做了俘虜，被拉去平潭。第二天到了梁化圩。第三天（即廿四日），起義軍在梁化圩拜斗開會。會場上有粉紅旗子，也有寫上青天白日的；白日實在是個大紅日，平時看到的“賊軍”是執紅旗的。開会后，天色已晚。入夜，我們一批俘虜被提到一處地方，听得有人大聲叫道：“夢的站到右邊去，醒的站左。”登即有人走動。我看看走向左邊的只有兩人，右邊的人就多了。我不解什麼是醒什麼是夢，就向人多的那邊站過去。那知道所謂“夢的”是不服從的意思，一概要殺頭的。正在這生死關頭，眼前忽閃出一個拿着大馬刀的彪形大漢站在面前。他揪着我的辮子往後一提。我退了几步，看見這人大眼濃眉，面長色赤，却没有凶

恶神气。他看了一会，抽起大馬刀猛地一砍，手起刀落，原来他砍的是縛住我的繩索。我双手松开了，站立起来。那人便說：“跟住来。”从此，我就給他背挑行李。在梁化，我見過黃福。他身材高大，手指如香蕉那么粗。他是个耕田老，那时当了大元帅。我也見過黃耀廷和郑士良。黃耀廷即黃远香，約二十八、九岁。郑士良直眉，方圓臉孔，身軀肥大，着官紗长衫。这些人都很温和。但在梁化一直沒有見過杜左堂。二十五日，我随队伍到了崩岡围，和同行的住在赵姓的书房。那个大汉叫我不挑行李，并給我一支枪，当他的护兵。这时我才知道他是鍾和，范和岡人，別字作梅，担任右先鋒。二十六日一早，向黃沙洋进攻，过午才攻进乡里，杀了很多敌人，乘胜进占多祝。二十七日凌晨，紧张的战斗就开始布置了，听說吳祥达就要到来。我謹慎地伺候着鍾和。不久，吳祥达的大兵果然涌来。我站在山岡边观看，沒有去交鋒。只看見一个人用枪向吳軍射击很出力，可是不久就被敌人打死了。那时我还跟着鍾和。后来吳祥达的增援队伍开到，大家就走散了。我不見鍾和，跟着一些退却的行了一夜。走到埔心附近的橫坑，忽遇到清軍用排枪打来。大家慌忙躲避，我被挤落坑底。入夜，我緩緩爬上大路，月黑无光，見路上边靜悄悄地睡着一排人，我也疲倦极了，怕惊醒他們，也就悄悄地挨近他們躺下，一會子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微明，才看見身旁睡的一排人都是沒有头的，共有十七个，我的身上也染了斑斑的血迹。我心慌意乱地向前瞎走，走到囊埔，又遇着鍾和等多人，就跟同他們走回大山径。走到一处地方，象是平政或黃埔，有民团杀鸡招待。我們一行帶的十多支枪都交給他們收管。隨即回到范和围，住在鍾和家中。鍾和的兄弟鍾合也住在家里。記得住了二十多天，有一天鍾和說要去香港，給了我十块白銀，叫我回家。

我就回到了惠州。

楊純修：我知道楊冠軍一些事。楊冠軍是個廩生，和林海山相好，早就有“造反”的思想。他聽到鄭士良到了梁化，即寫信約起義軍進攻黃沙洋。這封信落到被起義軍俘獲後在軍中充當文書的杜左堂手里。杜左堂就是劉邦盛的義子杜鳳梧。他和黃耀廷相讎，在新圩之役被生擒投降後，由耀堂委派他掌管筆墨。他收到冠軍的信時還給帶信的二十元。起義失敗後，杜鳳梧回到吳祥達部隊中，指証楊冠軍“通匪”。冠軍逃走不了，只好食鴉片烟膏自殺。我也認識鹽灶背的黃海，他是做“海賊”的，民國十九年我還見過他。黃沙洋之役，他和吳祥達對過壘。他很輕視吳祥達，常說他帶着十一支槍在洋口跟吳祥達對仗，就打得吳部七零八落，狼狽不堪。

再說黃沙洋一役，閏八月間，黃遠香率領農民起義軍由梁化進攻多祝。多祝所駐清軍一連，放棄多祝，退入黃沙洋鄉，與該鄉蕭、楊、鄭各大族固守待援。蕭姓族紳蕭慕顏說，蕭楊兩姓素來不睦，恐楊姓靠不住。清軍哨官遂召集三姓族長在本鄉關帝廟開會，敲鑼打鼓，起誓捐除舊怨，共保本鄉，並決定楊姓負責守鄉西，蕭鄭二姓守東南西三面。那知楊冠軍早與紅頭軍有聯絡，並為黃遠香作內應。他的密信由兩個人帶到梁化，黃遠香還着令杜鳳梧賞帶信的人各二十元。

閏八月二十六日進攻黃沙鄉，激戰一整天，到深夜楊冠軍果開西門引紅頭軍入境。清兵和蕭鄭二姓壯丁前後受敵，全部被歼，蕭慕顏之子蕭汝均陣亡，慕顏逃到平山。二十七日，清軍統領吳祥達再增援，與起義軍戰于多祝屬之洋口。起義軍彈盡援絕，被打敗了。林海山和黃遠香等繞道赤石至馬鬃港入海豐。楊冠軍自殺，後被清軍發棺梟首。

楊 璿:我于十五岁时因聞有“反賊乱”,就于閏八月由归善县城迁回老家上楊围居住。十三日(友仁按:应是十九日)晚,归国华侨楊发突然鳴鑼召集乡人开大会欢迎起义軍。大会在村旁沙岭頂小山上的平頂沙举行,到会的約有千余人,我也到場了。楊发穿长衫,胸前結着紅綉毬。当晚杀猪八头,各酒数十罇,大家痛飲一夜。次日,編成队伍,約五六百人,楊发当队长,出发白芒花、平潭。二十七日,黄沙洋大捷,后又失败,轉进三多祝,楊发战死。

楊文光:楊发很能跳远,一跳能过七块菜地,所以被叫做“七脚发”。他的兄弟銀鬼在起义軍管财政。楊发手下有数百人,枪百余支。他与起义軍已有联络,先由良井出白芒花,进平潭。他在上楊围一夜之間即召集到五、六百人,后来发展到二、三千人,大受各村的欢迎,声势浩大,威胁到惠州城。当时刘邦盛接到情报,即調兵勇前往截击,却不料被起义軍歼灭于茂子园。刘邦盛败退时,起义軍并不知惠州空虛的实况,如果乘胜奋勇一冲,惠城唾手可得,形势就不同了。

(三) 惠州、归善两城的情况

上边所录的都是在起义軍活动地区亲眼見到、亲耳聞到或亲自参加过的老者们所口述的极为可靠的資料。現在把当时惠州、归善两城的情况追述如下,其中一部分是辛亥革命老人梁鏡球的回忆,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回忆。

1. 梁鏡球:庚子年間,孙中山先生命郑士良在三洲田集合洪門弟兄組織武装起义,推翻清廷。郑以黄远香为統兵大元帅,何松副之。起义軍发动后立即向新圩(东莞屬)的佛子凹清駐軍进攻,仅遇小抵抗,一下子便扫清,获枪支十余杆。清哨官严宝泰當場被打

死,其所率全哨兵勇,除打死者外全被俘虏,辮发尽被剪去。不数日,起义軍人数增到千余,声势益大,惠城震动。广东全省陆路提督邓万林时駐惠州城,慌张失措,惠州知府沈传义、归善知县郑业崇尤为惊惶,下令将城門关闭,堆置沙包,加上板閘,并急电广州請兵。社会一般人奔走相告,呼起义軍为“反賊乱”。閏八月中旬某晚,明月当空,忽然全城鼎沸,閭里交呼,惊相传告說:“賊兵已抵城下来了。”保长則逐戶命令健壮男女担运石头堆置城墙上,以备投擲起义軍。这样扰攘了半夜。及至天明,遙望飞鵝岭天險毫无动静,人們亦漸散去。但城内有人一羣,乱播大鼓,不知何意。有人說昨夜系惊营,并非“賊”至云云。就在那夜間,惠州府召集两城紳商會議,強迫殷富居民捐軍糈,我家也被派定白銀二十两。又聞前一日擒获“賊首”,故情形稍为安定。当时謠言迭起,城門关闭,壮汉出入城内外則用巨繩作梯上下,謠言就是这些人从城外回城后传开的。又有人把义軍告示抄回传閱,我尚記得有“堂堂中国,岁岁来朝”,“逆我者死,順我者昌”这样几句话。两广总督德寿聞惠州危急,調水师提督何长清及防务統兵官莫善积率所部集中惠州,又特派前駐惠州陆路提督刘邦盛为統兵(友仁按:查刘当时已卸任提督,当上軍务会办),先在惠州招募新兵,实行会剿。約在二十日前,刘邦盛已在附城各乡募集新兵数千,匆匆率領由西江进发。聞那时起义軍在平山一带往来游弋,又距城三十里之良井乡已有綠林楊发等拜台,大集弟兄数百人加入活动。东江下游距城四十里之青塘乡則有梁慕光为首領,暗集附近洪門兄弟,杀猪宰牛,准备攻占隔江相距八、九里的博罗县城。二十二日平潭一役,起义軍大捷,事后傳說,孙中山曾密令郑士良、张慕光等各率队前往福建廈門接收軍械。因此,义軍就必須从多祝出海陆丰,經潮汕

挺进廈門。当义軍部队抵达平山圩时，据探报清兵水陆大队沿江而来。于是曾捷夫、林海山带同日本人山田良政等乘夜勘踏地形，看到平潭近河地面蔗林丛密，一望无际，估計清兵必由此經過，当即决定在蔗林設伏，以便一举而歼灭之。二十二日晚，清兵大队果然扰攘而过，其先头部队为莫善积所領的喜字营，跟着是刘邦盛的新兵，后队为何长清的水师。蔗林埋伏的义軍候喜字营官兵过尽，突然发枪猛射。那些新募的清兵还不知散开，一时爭相潰竄。但蔗田前临大河，无路可逃，潰兵紛紛弃械跃入河中，企图侥倖泅过对岸逃生，溺死很多。提督刘邦盛仓皇逃回惠城。归善县丞杜凤梧在潰退中为义軍所擄（杜籍浙江，夙嗜鴉片，佐杂班出身，俗称叩头虫）。义軍在这一役获得大捷后，軍威大振，人数益众，便向三多祝前进。义軍在多祝駐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閉戶，必須在門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复明”之意。正在这个时候，忽传到孙中山先生密令說，日人中六代购軍械，因故不能接应，虽到廈門亦无法得到补給，不若暫行分散潛伏。于是各洪門首領率部分散。适清兵吳祥达带大队围攻，就在多祝、洋口地面混战竟日。义軍已无斗志，分別撤退，日人山田良政于紛乱中牺牲。但吳祥达还不知道义軍准备退却，反以为自己兵力单薄，連忙收队到平山宿营，到了次日，才知道义軍已經分散。因此，吳祥达在清政府領了大功，以一个在街市卖武出身的劊子手竟升为陆路提督。当他回到惠城时，乘一匹黄鬃馬，头纏黑带，身穿紧身黑衫褲，腰悬大刀，足穿草履，一羣衣衫襤褸的兵勇前呼后拥地招搖过街，一班城神之流还在門前摆列香烛欢迎。

2. 我在惠城的見聞：閏中秋那天上午，城內风声不好，街头巷尾，尤其商店老板們都表露惊惶的神色，三五成羣地談論着“反賊

乱”的事。刚用过早饭，忽传陆路提督邓万林、知府沈传义、归善知县郑业崇下令把府县两城城門立即紧闭。一时城里扰扰攘攘，奔走相告说：“鎮隆一带反贼乱了，火速上城。”有的边叫边挨户催促丁壮出劲，有的打点东西，有的呼儿唤女，也有的拿起木棒或练武用的大关刀。真是一片城池鼎沸、大难临头的景象。这日下午，就从县署传出鎮隆佛子回兵败的消息。

閏八月十七大清早，有三栋乡民进城，据说三栋还没有“贼”到，只是十五那天，麻溪村父老们正在会议如何抵抗“贼兵”的时候，“贼队”就到了，约莫有二、三百人。村人慌慌张张，乱叫乱跑。又忽然听得村里发出一声土炮，“贼队”挥动旗子，立即四下散开。过了一会，“贼队”见村里并没有什么动静，就安然地入了村。他们入村之后，并没有发生伤害人畜和抢劫的事情，又向东北方向去了。事过之后，村人纷纷谈论，都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反贼乱”。后来有人传说，閏中秋那晚佛子回官兵被三点会打死百多人，夺去好多枪等等。然而，城里人还都在半信半疑，而“贼军”确也没有来攻城，人心也就渐渐归于平静。官府却遣兵调将，忙着布防，还在提督衙門口設下两門开花炮。刘邦盛在这时做军务会办，忙着招新兵，又命令守备、都司等加紧调齐那身兼商人的绿营练兵来集中训练，而一般青年则被迫随时上城防守。绅士们如梁藹人、任晓山、廖玉如等十多个人则都奉着官府的命令，在“大只梁”（协鎮梁义忠）、郑业崇的直接领导下，领到了些火绳枪、粉药、子弹等，在府城文昌宫里搞团练，又要民间练习备战。在这样的风声鹤唳之中又忙了一日夜。

城内兵单力薄，而军情探报又不灵通、不准确，因而虚惊自扰的情形，就日有几次。被闭在城内的老百姓，除了出城进城有些麻

煩之外，別的倒也沒有什麼兩樣。但是，當大家知道上楊圍等鄉村人都“從賊”的消息時，都感到十分驚異。

二十日早，劉邦盛就從城里的懶漢和失業的人們中招得百多人，編成了鄧萬林的立捷軍，同時，喜字營、哲字營、熊字營、靖字營等等共約有二千多人，都分發到附城直到馬安一帶駐紮。

到了二十一日早上，我跑到四牌樓十字街一望，見提督衙門沒有什麼動靜，回到家里，只見隔壁陳家祠集合有一部分新兵，連同担架伏役等，零零落落，約有百多人，在待命出發。詢知這些兵，就是這兩天知府沈傳義募集的土勇，編入靖字營的。他們有些穿着一種胸前背後各貼着一塊圓形白布，上書黑色“勇”字的布背心，頭帶竹夾帽，足穿快馬草鞋，腰間系着一把鏤刀和一杆烟槍，一副十足的鬼怪相。隊伍里面，有一個騎着黃馬、身穿京青緞袍的高大軍官，就是歸善縣左堂杜風梧。他是劉邦盛的義子，看樣子是個管帶。隨着他後頭的約三十多人，出大東門，過浮橋，望縣城一路而去。

隔了一天，街上传道官兵大敗，狼狽不堪，才知道他們在平潭吃了敗仗。

二十二日午後，就有幾個敗兵陸續回來。我便問一個記不起他的姓名而又很面熟的人。他說：“在平潭蔗林里面遇着賊兵，不知他們多少人。我們被打死的和跌入平潭江中的好多。杜風梧攢了圈子了（即投降的意思）。”

這時，街談巷議，紛紛傳說三合會黨人打新安城、打海豐城、打博羅城、打和平城的消息，滿城風雨，却沒有什麼很驚慌的景象。倒是官方震動，各衙門都亂烘烘的，忙着發電報。後來知道總督德壽奏保的莫善積正在得手之際，忽有四圍鄉人助匪，以致撤退。又听

說陶模奏報劉邦盛措置乖方，几誤大局。報紙的宣傳，則說在永湖大戰，正進圍惠州城。而香港報紙又稱起義軍在距城二十里的馬安誘殺清兵等等。真是傳說紛紛。其實，那時官方是心中無數的，“反賊”究竟多少不知道，到了哪里也不明了。平潭一帶助“賊”的却有許多人，而且平潭一帶打了仗以後，還是安然無事，一般人都感到非常奇怪。這時，團練局招牌還是掛着，可是那些紳士們似乎沒有什麼緊張的樣子，也沒有編練團丁。在一般人心目中，官府的威信似乎減少好多了。

到了二十四日，吳祥達帶了幾百人進城，不知是從何處開來的，到了晚上又突然開到城外馬安等地方去了。隔了兩天，就有捷報說打散了“會匪”了，四城貼有緊急布告多張。二十八日，吳祥達又帶兵回來，團練局就傳知水東街一帶商店大放爆竹，歡迎吳營，一時官方氣焰似乎又高了起來，不象日前那麼頹喪了。到底起義軍是如何失敗的，却得不到一些真實情況。聽說多祝有廩生楊冠軍參加，其人下落怎樣，也不知道。

過了些時，我還念念不忘於當時聽來的一種傳說：

當起義軍到上楊圍的時候，鄉中楊發領着全鄉的人開大會歡迎，大張宴會。當地紳士們不但不立即走報官府，連譏彈反對的表示也沒有。這却頗為奇怪。因為上楊圍是歸善縣所謂衣冠巨族，素有文化的一個鄉村，對於“造反”這樣大逆不道的事為什麼鄉人敢於開大會歡迎，連那些紳士也竟然表示默契呢？這可使我對這次所謂“反賊亂”，發生了很大的懷疑。後來才認識到，這是由於起義軍軍紀良好，而且三合會黨聲勢浩大，四處聯絡，和清軍對比，很容易分出優劣，使一般人相信腐敗的清朝是可以打倒的，起義軍是可以成功的。這也說明了這次起義雖然沒有成功，而對於启发人

們來對革命的認識，是起了絕大的作用的。

後來我還會和幾位在當時有過親身見聞的致公黨黨員談起過這件事。何存波（今年七十九歲，已死）說，他在庚子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於鄉間隨同三合會會員約十餘人，奉會中命令去參加起義，才到多祝，起義軍已撤走，因而各歸鄉里。不久，因怕人查究，就向南洋去了。他又說，起義軍和吳祥達部作戰，支持了大半日，後因沒有子彈，才撤走。起義軍走了幾小時之後，吳軍才知道，但還不敢進入村里，他才得安然回鄉。又據羅桐（七十五歲）說，當時他在白芒花圩，聽見“賊亂”，回到鄉中（思茅龍村），聞得起義軍在圩中關帝廟住過，在白芒花沒有打過仗。

因為我感到過去關於三洲田起義的記載多不實在，就約同何博、秦粵生兩人到各有關地方進行了調查訪問，得到了許多如上所舉的真實材料。這些材料，有助於了解和研究這次起義的真實情況。所有一切已見於前人記載的資料，皆未附入，並此注明。

庚戌新軍起义前后的回忆

張 麟 村

(一) 运动军队的工作

一九〇七年二月,以許雪秋为首的黃崗起义进行期間,我們正由广东陸軍速成学校退学出来。我应胡汉民之約,到香港相晤,加入了同盟会,并轉赴黃崗参加起义。不料我和姚雨平赶到汕头的時候,黃崗起义已告失败,只得折回香港。

为了对政治軍事中心的广州展开革命活动,我們在与同盟会南方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后,就遣返广州,首先在軍事学校方面进行工作。我們原是黃埔兩广陸軍中学学生,后該校与将弁学堂合并,改称广东陸軍速成学校。陸軍中学原有兩班学生,連同陸軍小学一、二期同学,共有二百余人,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潮;就中除小学同学分期毕业后还待升学外,陸軍中学兩班同学一百十余人,只需三、四个月時間就要毕业,派入各营服务了。我們就从这些陸軍中学和陸軍小学同学中进行串联,搞了几個月,爭取了百分之三、四以上的人参加了同盟会。我和姚雨平在广州进行工作期間,經常与朱执信取得密切联系,軍中各同志的加盟盟单都送到他家存轉香港,当时朱执信任法政学堂教职。其他与我們經常联系的还有李君佩、张伯乔、胡毅生等,他們当时或任教职,或任律师。

同年七、八月間，梅县温靖侯、謝逸桥、許良牧兄弟等人創辦体育会于梅县松口(他們是在东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聘請我們同学六、七人去当体育訓練教員。我和姚雨平因于八月間离开广州，到松口体育会去担任教練工作。当时参加教职的，有同学廖挺伦、张則通、陈自牧、廖益通和东京体育毕业生林修明等人。体育会招收的学生有一百余人，教職員和学生可以說全數是同盟会會員。它不过是以体育为名，而实則是革命党人进行軍事訓練、培养干部的場所。体育会同时还在各县如兴宁、平远等地有同盟会會員主持的小学校中附設体育分会夜校，并搞些农村联系工作，准备时机許可时，在潮、梅方面搞起来。体育会八个月結业后，学生分散在乡村任教員，或出外升学和往南洋工作(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殉难的七十二烈士中，有体育会教員林修明和学生饒輔臣以及兴宁大成小学体育分会夜学生张学齡；辛亥光复时，在揭阳殉难的丙村三烈士中的郭典三，也是体育会学生)。我和姚雨平于翌年四月間又回到广州，进行軍事方面的联络和策动工作。此时陆軍中学同学百余人已經在陆軍速成学校毕业，分別派在新軍營、宪兵学校和学兵营任职。同时，水师提督李准为了改革巡防营，又在虎門办了一所耕武堂，所招收的学生訓練毕业后，将派到巡防新軍营去担任教練。因此，我和姚雨平曾亲自到虎門，通过同乡关系对耕武堂学生进行联系。其他如測量学校、警察学校、法政学校等也是我們工作的对象。当时更主要的工作是在新軍方面。那时广州已成立新軍第一、二两标以及炮兵、工兵、輜重兵、学兵等营，分別在燕塘和北較場营房駐扎。因此，我們工作更加开展，已經或多或少地深入到目兵中去了。

(二) 起义的决定和准备

一九〇九年二月間，广东新軍除步兵已成立第一、第二两标外，还有炮兵第一、第二两个营，辎重兵、工程兵、学兵营各一营和巡防新軍七营。在上述各单位中，經過我們二、三年的努力爭取，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播下了革命种子，但还仅限于排級以下的干部。队級以上的軍官，不是由北洋調来的，就是早期日本士官毕业生，前者頑固落后，后者也比較保守，对他們进行爭取工作不但不容易，而且可能反因此招致危險。至于本省陸軍毕业生，能爬上队官一級的是絕无仅有的。因此，我們要搞一次大規模的革命起义，就有必要在軍隊中爭取一个較高級的人物，并在士兵方面展开广泛的联系工作。

第一标标統赵声，是一个富有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他通过陸軍小学国文教員胡毅生結識了朱执信。朱执信約我与姚雨平同去見他，并为掩人耳目起見，商定由执信約他去游白云山能仁寺，以便与我們会面。不料执信去时，才知道他已奉命免职，一、二天内即要离开部队，原因是总督袁树勛保荐他任广东新軍第一协协統，事为端方聞知，电告陸軍部长蔭昌，謂其才可用，其心不可測，因此，赵声不但未能升任协統，連标統也保不住了。赵声虽然失了軍权，但对我們的工作毫无損失，反而促成我們早日采取行动的決心。

同年六七月間，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指导和支持下，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藤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紀彭和黄俠毅等人，在一次小型會議上分配了工作任务。倪映典担任新軍各营联系工作，张藤村担任巡防新軍联系工作，胡毅生担任农村会黨联系工作，而

由赵声总其成。其他各人则分别担任筹款、筹械、调查、通信及各方面的联系工作。当时我曾向朱执信建议电邀姚雨平前来(姚此时正在汕头因党案与官府涉讼),朱则拟俟时机成熟时,再邀他来担负惠州方面之责。我们首先在天官里成立一个机关,以为营中官兵假日出来会面的场所。随后,又分别在官纸局后街、雅荷塘、清水濠、小东门和大东门外等处,以女会员或眷属为掩护,广布办事机关,以策进行(大东门外的机关,系以諮議局議員陈炯明的名义租来作为藏械之所的)。经过数月的鼓动联系工作,新军方面尤其是第一标和炮兵一营的士兵当中,加盟人数已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新军巡防营方面,则有哨官曾虎标和副哨官、见习官范秀山、温带雄、张桓杰、刘逸夫、陈辅臣、李济民等人先后加盟。巡防新军的士兵,因为不时调动,无一定的驻地,所以不便于争取。(管带李景濂加盟后临事变节,光复后被拿获处死。)

(三) 发难的计划

(一) 农历新年元旦后的二十天内,清朝官吏照例封印休假。因此,我们决定乘其不备,于庚戌年正月初三日发难。(二) 起义时由炮兵营开炮为号,各标营闻炮声一齐行动,预先暗集在河南方面的民军,立即向城郊集合听命。巡防新军在广州市内外者,闻炮即行响应,其他驻外地巡防新军则相机在原地行动。举赵声为临时总指挥,倪映典副之。(三) 由諮議局选举临时民政长官,并暂拟以諮議局副会长丘逢甲(丘虽保皇党人,但曾在台湾搞民主独立运动,同情三民主义,事前曾与赵声相见,甚为契合)、議員陈炯明分别任正副之职。(四) 广东全省底定后,即出师北伐,一路由江西出长江,直取南京,一路由湖南出武汉;并拟以赵声为总司令,倪映

典为副总司令。

(四) 倪映典发动起义及其失败经过

在我们准备发难过程中，军队工作普遍展开，加盟人数很多，而且士兵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加盟者在营中书写盟书甚不方便。因此，我们便在香港中国日报社将盟单印好，转送各营，加盟士兵只须签上姓名或印上指模即成。庚戌年正月间，有一张空白盟单不知因何遗落，为一排长所获，上缴到协本部。协统张哲培认为这是革命党人在军中进行煽动的确凿证据，转报督赫公所参议韩国钧，拟将营中械弹收缴城内，以防不测。韩谓风闻不足信，盟单又无姓名，不能据为理由，不如借口元旦将届，即将体操，而且营地潮湿，将所存子弹暂缴城内存放，俟开操后撤回。因此，离农历庚戌元旦约十天的时候，便闻悉所有发给士兵的和库存的子弹均已缴存城中。根据此种情况，我们便不能不考虑推迟起事日期。赵声和倪映典当即为此事赴香港，与胡汉民等商量对策，准备改期动手。不料除夕那天中午，二标某士兵因刊刻私人图章与承办人有所争执，警察横加干涉，互相毆斗，后被警兵拘禁禺山关帝庙警局。士兵数十人见此情形，拥至警局要求释放。警局当将士兵释出，并由宪兵劝导回营。协统张哲培闻知此事，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乃下令元旦不准放假，以防再生事端。虽然如此，但元旦中午时候，又有采购伙食的士兵十余人在双门底（今永汉路）与警察闹了起来。巡查宪兵见状，下马劝解。士兵乘马驰回二标报告，随即有大部士兵拥入城来，将禺山关帝庙警局包围。旋经大队宪兵开来，一面弹压，一面劝说回营，复归无事。广州将军某（忘其名）闻报，竟然下令闭城，并派满旗兵在大小东门至大小北门一带登陴扼守，如临大

敵。城內外交通斷絕，人心惶惶不安。在初二那天，學兵營營長黃士龍奉督練公所命赴北較場對燕塘新軍營里的士兵進行調解，並向士兵擔保無事，士兵方面亦已盡釋猜疑。不料黃士龍回至小北門外，守城旗兵見黃穿軍服，忽開槍射擊，致黃受傷墮馬。這一消息傳至營中時，士兵方面頓起不安，于是在協本部搜出子彈三數箱，徹夜派出步哨巡查，以防意外。

初三日早晨，倪映典從香港乘夜船抵大東門外，拿了兩支手槍和一袋餅干，偕馬永平徑赴燕塘炮兵第一營。倪到時見管帶齊汝漢正在向士兵講話，便開槍將他擊斃，隨即偕同排長羅熾揚等傳令各營在大操場集合，對官兵們慷慨陳詞，號召起義。官兵都以子彈缺乏為首，倪答以子彈已在大東門外，於是把隊伍稍加部署，擬分路向廣州進發，以便會同北較場我軍向東城猛撲，占領廣州。但倪事先沒有偵悉水師提督李准已由外地調回吳宗禹所部三營巡防新軍，在牛王廟、教會山附近布防扼守，並且派出幫統童常標、管帶李景濂、太永寬等出面詐稱調停，要求與倪等見面。倪認為可乘此機會說服巡防新軍，且知道管帶李景濂是同盟會員，幫統童常標則為安徽同鄉，故乃坦然不疑，與他們見面，並曉以大義，以共圖大業相勸。童、李等佯示贊同，但又說此事還須請示統領方能答复。童、李等返至防地，即下令開槍攻擊。倪正在騎馬巡視防綫，致被擊中墜馬，為清軍擒至陣前，砍頭而死。我軍部隊因彈盡亦紛紛潰退。當時比較露面的軍官如羅熾揚、張軍等也跟著部隊向增城方面逃去。此為當時參加起義軍官羅熾揚所口述的情況。

此次起義雖告失敗，但其聲威所及，使清朝反動統治者更為震懾；同時，大部分革命力量都幸得保全下來，更加積極活動。這樣，這次起義的失敗，又成為新的革命發動的起點。

追忆庚戌新軍起义和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姚雨平

軍隊策反工作和庚戌新軍起义

清朝末年，自經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八国联軍諸役以后，割地賠款，丧权辱国，日甚一日。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的命运，于是有在各省建立新軍之举，同时为了培养新軍干部，曾举办一些軍事学校。粵省于辛丑年（一九〇一年）即在黃埔开办武备学堂，以后又办陸軍小学、陸軍中学。在武备学堂毕业的，一部分派往新軍当軍官，一部分留在陸軍中、小学任教官，还有一部分送日本士官留学。黃慕松、鍾鼎基、楊志澄等十多人就是在武备毕业后选送日本留学的。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武备学堂停办，合併于陸軍中学，原武备生編为陸軍中学头一班，新招的陸軍中学生編为另一班。张我权、楊刚、黃旭南等就是原武备生轉到陸軍中学的。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上半年，我在汕头岭东同文学堂讀書，下半年考入陸軍中学。和我一起进陸軍中学的有李济深、张麟村以及李民欣、李民雨兄弟等人。丙午年（一九〇六年）下半年，清政府軍机处電兩广总督岑春煊将陸軍中学改为陸軍速成学校，并将广州将弁学堂与之合併。陸軍中学改速成后，校址由黃埔搬到广州东門外将弁学

堂原址，原將弁生仍分班上課。當合併改速成的消息傳出後，大眾譁然，咸主竭力反對。我却認為合併之議，清政府早已決定，勢在必行，我們如果表示反對，反足招致猜忌；且速成畢業，又可早日滲入軍隊，進行革命工作。眾以為然，反對之舉遂寢。

我們一些人在陸軍中學、陸軍速成學校肄業時，就曾因不斷傳播革命思想，做種種革命活動，引起了學校當局的嫉視。就在丙午那年（一九〇六年）年底舉行畢業大考後，校方突然掛牌將我和張醜村等十多人革退，理由是“學術無進步”。我被革退後，於次年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和張醜村、林震等正式加入同盟會（由謝良牧、張谷山介紹）。此後，我們就深入各軍事學校和軍隊中，特別是在新軍中，展開各種革命活動。

丁未夏秋間，許雪秋負責搞黃崗起義工作，他住在香港蘭桂坊，我和張醜村曾在他那裏住過。當時曾有派我去指揮此役之議，我以言語不通，不易號召羣眾，感到沒有把握，所以未去。是年下半年，我和張醜村到松口（梅縣屬）辦體育會，作為革命黨的外圍組織。體育會借用清大吏溫仲和的學堂為會址。當時溫已去世，溫的三個兒子——溫德基、溫靖侯、溫奮立都是革命黨人，他們均贊同以這學堂為會址。體育會入學規定半年畢業。至是年底，我復返廣州繼續搞新軍工作。

此後一直至庚戌年（一九一〇年）的幾年中，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大都在搞新軍和巡防營的工作。我們設有內代表和外代表，以便互通消息，互相聯繫。記得當時林震、蘇慎初、羅熾揚、姚右軍等都是新軍的軍官，他們是我們的內代表。姚右軍是司務長（管理軍隊給養），由於職務關係，外出機會較多，擔任內外聯繫，傳遞信件、消息等非常方便。除軍官外，在班長和士兵中我們也盡量做了工

作。有一个班长名叫陈德洪，是高要人，通过他串联活动的就不下数十人。至于外代表，记得是由黄嵩南、郭典三、郭冠雄、廖叔唐、温若依等担任。我们几年来一系列的活动，在广州新军中广泛地播下了革命种子，为以后革命发展打下一点基础。

除了军队工作外，我们在工人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个名叫刘纯山的，是兴宁人，为人忠义勇敢，在工商界方面有些地位。我们通过他，在广州织布业、藤器业（以上两业多数是兴宁人）和打石业（多数是五华人）方面的工人中进行了一些活动。

我们在清军中活动，对富有革命思想的军人，还定了一些奖励办法。对工作积极的，曾奖以手表，并对他们说：如果对革命有功，可以受到升级奖励，而且可以超级升上去；只要你能掌握一部分军队起义，这部分军队立即归你指挥，并即刻升你为这部分的官长。例如，一个班长若能号召一营人起义，立即可以由班长升为营长，这营人就归他指挥。这个以名利来诱导军人参加革命的办法当时对于迅速瓦解敌人的军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庚戌新军起义前不久，我奉命将一批同盟会员的盟单送到香港总部去。我把盟单用腰带捆好，绑在腰间，乘坐偻好的一顶轿子到码头搭船，不料轿夫竟把我一直抬进巡警局的中堂。我发觉后大吃一惊，立即对轿夫大声说：“我不是到这里，我是到西关去的。”轿夫赶紧掉头抬轿出门。守卫见我大模大样，大胆进出，也没有加以拦阻，才平安地到达码头，乘船到香港去，完成了送盟单到总部的任务。

广州新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革命党方面认为可以在新军中策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同时为了策应这次起义，决定在惠州方面也展开活动。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十二月间，我在新军起

又前奉命到惠州，在会党方面及在清政府駐惠州的陆路提督秦炳直部下进行活动，目的是使广州起义时惠州能即刻响应。庚戌新軍起义时，我仍在惠州。由于新軍起义不数日即失败，又由于惠州工作基础薄弱，以致没有什么动作。新軍起义失败后，我由淡水径返香港。

新軍起义时，我不在广州。其经过情形，根据参加此役的同志的口述，大致是这样：己酉年（一九〇九）十二月三十日（旧历除夕），广州新軍第二标三营后队兵士吳英元往双門底（即今永汉路）綉文斋取定印名片，与店东发生口角，巡警向前干涉，致互相毆斗，并将吳拘去。新軍中党人遂借端举事，于翌日——庚戌年（一九一〇年）正月初一由新軍第一标发动，攻击并拆毁警察局。起义历时三天，初则声势甚壮，所向皆捷，嗣因子弹告乏，而敌军又枪炮犀利，莫之能御，加以起义不久，倪映典即被击毙，指挥乏人，遂遭失败。

庚戌新軍起义犹如霹靂一声，震动了清廷，振奋了人心。清廷看到自己的武装部队竟会譁变起义，也知道它的统治已到了岌岌可危之势。在新軍起义前，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船坚炮利，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只凭民軍、会党、綠林的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軍起义后，观感为之一新，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华侨方面，影响更大，大部分华侨都愿輸財資助革命，基本上解决了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所需經費的問題。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庚戌新軍起义后，孙中山先生由三藩市取道檀香山、日本至庇能（檳榔嶼），旋即召开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准备在广州作更大規

模的起义。当派黄兴、赵声、胡汉民三人负主要责任，主持起义筹划工作。黄等即返香港，设统筹部作为指挥机构。统筹部设正、副部长，由黄兴、赵声分任之，下设八课，掌理有关工作。八课的人选，在庇能会议时已就党人所担任工作的性质及其能力作了初步选拔，统筹部成立时又经黄、赵、胡等最后确定。

统筹部是总的领导机构，为了便于具体指挥起义工作，另在广州设起义指挥部，由赵声任总指挥，黄兴任副总指挥。

为什么统筹部由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而指挥部却以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且事实上赵声在起义前尚未到广州，而由黄兴代行总指挥职务呢？据我所知，大概是由于黄兴在革命党中资历较深，威望较高，统筹部非由他领导莫属；而赵声曾任新军标统，在新旧军中有一定的威信，且谙军事学識，所以由他担任总指挥为宜。但因赵声为敌方的多数人所认识，当时清政府对革命党人防范严密，露面活动不妥，故事先他暂不能上广州策划，只能由黄兴代行总指挥职务。

统筹部为了更好地策划广州方面的起义，对新军和巡防营的活动亦特别重视，尤其是在庚戌新军起义之后，这部分工作更不能放松，因此有设调度课专门掌握之必要。我因为连年来主要是负责搞这方面的活动，所以调度课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在调度课成立之初，我曾保荐林震、苏慎初二人为调度课副课长。林震系我在同文学堂读书时的同学，以后在陆军中学、陆军速成时都在一起；他在速成毕业后派充新军见习官，后又当排长，最后调陆军小学任领队。苏慎初在陆军速成毕业后，也派在新军服务。他们二人在新军中都有一定的联系。我保荐林、苏二人本已得黄兴、赵声的同意；但不久之后，黄、赵又对我说，加派陈炯明兼调度课副课长，

协助我推动工作。我当时对赵表示，調度課任务艰巨，能得竞存（陈炯明字）帮助，极表欢迎。随后我即由香港上广州，陈炯明也仿佛同日由港到穗。我到广州后曾在嘉属会馆碰見陈炯明，陈見到我沒有談几句话，即厉声对我說：“你在調度課做了什么工作？如果再做不好，我要用手枪对付你！”我看見陈态度如此猖狂，不知其用意如何。那时我也血气方刚，脾气不好，立即答复他：“竞存，你开口就說用手枪对付我，你究竟有多少枪？”彼此爭执后，不欢而散。再过几天，我回到香港，向赵声报告工作。那时，他正在飲酒，一見到我，立即把酒杯一擲，拍桌罵我：“雨平，你責任重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你是怎么进行工作的？”他火气这么大，我还是很和气地对他说：“伯先弟，脾气不可以随便发。我和你不是今天才做朋友，是多年的老友，你刚才說的，有什么根据？你不妨去切实調查一下，我在新軍和防营中如何进行工作，調查清楚了再来責备我不迟。”他听了我这番話，便又立即对我作个揖，表示歉意。我問他为什么这样責备我，才知道是陈炯明来信挑拨离間。这时，統籌部的同志出来劝解，要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之間的爭执也就沒有扩大。

关于起义日期，起初决定是三月十五日。后来因为三月初十发生温生才炸孚琦案，清政府大为震惊，在广州戒备特别严密，增加了党人活动的困难，許多起义准备工作不能按照計劃进行。再則枪械尚未到齐（特别是由日本运来的一批枪支，在船上被丢下海，影响更大），选鋒队（即敢死队）武器不敷，如果急于发动，势必影响实力。因此决定改期为三月二十八日，后又改为三月二十九日，这是在黄兴二十五日到广州后才确定的。記得在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那天，我到黄兴处商議起义日期，他說有人主张改至三十

日，有人只主张改日期，但未指明改至何日（实际是等于取消起义）。当时我坚决反对改期，并表示无论如何要在二十九日发动。我和黄兴都一致认为此役关系重大，革命党人动员了广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可说是已“全力以赴”，改期就无异解散，将无以对群众；如果我们这次不干，连一声炮都不响，还有谁再会相信革命党？革命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冒险的，如果要等到处处工作做得很好，一点危险都没有再发动，是绝不可能的。同时我还指出，巡防营正是在这几天由顺德调来广州，我们在巡防营有工作基础，可以把它转变过来成为我们的力量，只要选锋能发动，它就可能起义；这样，发难日期就更不应该改期。经黄兴再三考虑，最后确定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发动。记得当时黄兴还表示：“你们不搞，我个人也要拼一拼！”二十九日，赵声、胡汉民尚未到广州，黄兴仍坚决照已定时间积极布置他那路的行动。当天晚上，赵、胡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只得次晨折返香港。

关于发难的具体计划，统筹部起初的部署，规模相当大。记得三月初十日曾召开准备会议，会上决定十路出动。后因感到这一计划规模过大，以当时的实力（无论人、枪）以及准备时间的仓卒，都不可能实现。因此，黄兴于二十五日到广州后，决定将十路改为四路：第一路由黄兴负责，攻两广总督署；第二路由姚雨平负责，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并迎起义新军进城；第三路由陈炯明负责，攻巡警教练所；第四路由胡毅生负责，守大南门。三月二十九日那天，我约定我所属人员事先到长堤嘉属会馆集合，听候调遣，因为嘉属会馆地方比较大，来往人也比较复杂，集合百数十人不致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当时我的部署是：郭典三、刘纯山负责攻小北门飞来庙，以一部分力量夺取飞来庙的军火库，以一部分力量攻占小北门，迎

新軍起義部隊入城；黃嵩南、溫若依、郭冠雄、廖叔唐、姚右軍負責策動新軍，必要時給新軍以槍彈，待選鋒發動後，即起義響應，從小北門入城；羅俊、丘錦芳負責聯繫巡防營，策動他們準備起義，待選鋒發難後，雙方即在督署和水師行台會師。屆時，約有數十人已到嘉屬會館集合，集合後唯一等待的就是槍支。選鋒需要槍支才能發動；就是新軍，在當時敵人收繳子彈、撞針、刺刀的情況下，亦需要發給槍彈，才能希望他們有所作為。因為“萬事俱備，只欠槍支”，我便是日上午派黃嵩南、郭典三持黃興的條子到始平書院（藏槍械處）領槍，不料該處人員對黃、郭說，剛才有巡警前來檢查，為避免露出破綻，現在不能發槍。黃、郭回到嘉屬會館向我報告槍未領到，我得訊又氣又急，心想時間如此迫促，如果槍支領不到，勢將貽誤大事，立即親自趕到小東營黃興處。黃問我準備得怎樣，我氣喘地對他說：“我的東西（槍支）還沒有領到”，並告以上午領槍不得要領的經過。他當即叫陳其尤陪我速去始平書院。這時我看見黃興已整裝待發，槍支武器亦已全部擺出，大有即刻出動之概。我和陳其尤、黃嵩南、郭典三再到始平書院，見到胡毅生。胡還說：趙聲、胡漢民還沒有到，發難將改期，仍不肯即發槍，說後他就走開。我急得拉他回來，嚴肅地對他說：“克強什麼都準備好了，他本人已全副戎裝，所有武器都已擺出來，看樣子立即就要發動了，事不宜遲，請你趕快發槍吧！”胡聽我說後，指着一個閣子上說：“槍放在那裏，你自己去取吧。”我立即脫下長衫，用一張桌子放上凳子，登上閣子，取到槍支。黃嵩南、郭典三拿一部分先行，我親自拿一部分後走。我離始平書院時僱得轎子，將用皮篋裝好的槍支放进轎底。轎夫一抬，就說：“這麼重，抬不動，我不去。”此時黃嵩南、郭典三已折返，說歸德門城門關閉了，出不去。我只好將槍支放回始平書院原

处，仅取一支自卫。我从始平书院出来去双門底，希望能接应所約巡防营进城。途中遇到邱飞五，邱見我仍从双門底向北行，急急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长兴里邱家祠。到邱家祠后，他对我說革命党人起义已失敗，清軍到处戒严搜查党人。第三天(初一)听說大南門已开，我便装上假辮，离开邱家祠，打算出大南門搭船到香港，不料經過文明門时就因查出假辮，致被扣押送大南門处理。我供認是学生，后由吳雨蒼用平远留学公所名义具保，始获释放。当时广州有不少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学生把辮子剪去，但他們不一定是革命党人。这里还可附帶說說，在革命党内部，对于是否剪辮曾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为革命党非剪去辮子不足以为革命的表率；我却認为在清朝殘暴統治下，剪辮适足以暴露自己的身分，倒不如留辮作为掩护，比較好些。但我的意見不为党内所采納，多数人把辮子剪去，所以我也剪了辮子。我被释放后，即乘哈德安輪赴香港，在船上遇見謝良牧。謝对我說：“胖子(黃兴綽号)也在这船上。”当时为了避人耳目，我没有去和黃兴会面。

二十九日那天，陈炯明也到过黃兴处，听說他待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和胡毅生都說，赵声、胡汉民未到，发劲要改期，他們两路可能就因此沒有动作。我这一路因为領不到枪，空急了一場，也不能出劲；及今思之，感到万分慚痛。这样，四路便变成了一路，造成了黃兴一路孤軍奋斗的局面。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革命党人的主要力量是选鋒队，一切部署和配备都以选鋒为主。上面所說的十路和改变之后的四路，都是指的选鋒队。除选鋒队外，就是新軍和巡防营了。这两部分本是敌人方面的力量，但是可以由选鋒发难，策动他們起义轉到革命方面来。清政府对新軍和防营的防范均极严密，特别是对新軍的防

范更严，子弹早已不发給新軍，有时甚至将新軍枪支的撞針拔去，刺刀收起。那时新軍不是有枪无弹，便是有枪无撞針，手中有枪也等于废物。至于說新軍曾于二十八日被帶到增城作徒手旅行，我当时无所聞。在防营中也由于敌人的加紧戒备，盘查严密，联系也就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新軍和防营主动发难是有困难的；即使选鋒先发难，如果不及时联系，要他們响应也不容易。当时水师提督李准已由順德調来三营防营拱卫广州。此三营防营于二十八日到广州，我曾派罗俊、邱锦芳去联系过。到二十九日那天，我因几乎整日奔走領枪，致疏于再与防营作更密切的联系。迨防营入城至双門底时，碰到黃兴由督署敗退到此的一路选鋒。因防营未曾臂纏白布，致发生誤会，先由选鋒中的方声洞扔炸弹击毙防营温帶雄（温就是革命党在防营中的負責人，入城部队即由他率領），防营隨即还击，以致方声洞殉难。不但預定計劃沒有实现，反而造成自相誤杀的结果。每念及此，殊感內疚。

黃兴本人負責攻两广总督署，水师提督署也就在督署后面。黃的机关設在小东营（在德宣东路），距督署近在咫尺，因此可以說，黃是做到了深入虎穴的。黃的确非常忠勇，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在当时敌人严密戒备的情况下，他身居敌人心脏地带，处敌人森严包围之中，只有前进才是光明大道，畏縮后退势必为敌人所乘；因此，他不顧其他各路准备如何，配合得好否，就一馬当先，带头发难，成败在所不計。在我看来，其个人忠勇固属可嘉，但运筹帷幄則有不足之处。不过当时时机如此紧迫，局势如此危殆，亦促成他不得不孤注一擲也。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在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來說，它的影响和意义是很大的；但从此役本身來說，无庸諱言，当时是失败的。

其失敗原因何在呢？

當統籌部成立之初，策劃廣州方面起義，是以選鋒為主的。在海外僑胞方面募集的巨款，主要是用來購買選鋒隊使用的槍械，其次是支付選拔選鋒的旅費和選鋒的生活費。新軍和防營方面，我們雖有工作基礎，但必須選鋒先行發難，才能促其響應起義。既然是以選鋒為主，就必須及早籌謀購運槍械。槍械運到後，還必須事先作一番訓練，才能持槍戰鬥，否則手中有槍而不會使用，豈不等同於廢物，甚至適足以資敵。當時購運槍械一再誤期，從日本購買的一批且因押運人畏懼香港檢查，竟在途中拋入海中，致遭重大損失。再則選鋒隊員多數是從農村選拔而來，他們忠勇可嘉，但多數沒有拿過槍，對新式槍的使用更是外行；革命黨方面就根本沒有給選鋒隊員練習使用槍支的機會，頃刻間就要發槍給他們去打敵人，豈非等同兒戲，嚴格說起來，實在幼稚得很（譚人鳳曾因使槍不慎而失火，就是明證）。當時就曾有選鋒表示，“敢死有餘，使槍不足”，結果只好單憑熱血奮鬥。槍械問題可以說是失敗原因之一。其次就是指揮問題。指揮部黃興只憑自己硬干，對全局的籌劃可說是胸無成竹，事先各路又無密切聯繫，因而各自為政，不能配合，甚至互相掣肘。再其次，趙聲、胡漢民遲遲來省，黃興單獨領導，協議乏人，兼顧不周就在所難免，因此造成孤軍失敗之結局。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後，黃興與胡漢民聯名給海外僑胞作了書面報告，其中對我有所指責（對陳炯明、胡毅生也都有指責）。我得悉後，隨即濶赴南洋，並發函至南洋各埠，向僑胞報告起義失敗經過。信中談到：此次大舉，僑胞踊躍解囊，捐款甚多，不幸失敗，自必為大家所關心。擬邀請旅居海外的革命黨負責人到新加坡開會，共同探討失敗原因，以便策勵今後工作。

以后，四川铁路风潮发生，武昌起义接踵而来，国内革命形势急转而下，于是我急忙返国投效。广东光复后，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发表我为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出师北伐。胡嗣后曾对我说：“我和黄克强在报告中对你的指责，主要是克强的意思。他在失败后十分伤感，同时又觉当时非对革命党人多加责备，不足以告慰侨胞。我完全照他的意见写成，请你不必有所芥蒂。”不过，我于此役没有完成任务，无论当时形势如何紧迫，亦不可能卸卸努力不足之责。这点，我一直感到惭痛万分！

庚戌之役倪映典遇害真相

陈 景 吕

一九一〇年庚戌之役，有关記載皆云倪映典中彈陣亡，惟據我所聞，倪并非陣亡，實被人誘殺。這是誘殺倪的李景廉親口說給我聽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李又為革命同志所誘殺，這也是我所知道的。茲將此事始末敘述出來，以備修史者採擇。

一九〇九年（己酉）我赴省城考拔貢，與丘兆琦、梁澤文等旅居書坊街。在虎門陸軍速成學校畢業的惠州同鄉李景廉與陸軍各同學常來晤談。其時陸軍同學畢業後，多居見習教練之職，惟景廉已升營長。我問他因何升遷如此之速？他說，因帶隊往容奇緝捕，深入匪巢，與匪搏鬥，一人槍殺四匪，水提李准大為嘉獎，因授彼為親軍營長。我因說：“現在革命潮流日漸高漲，草澤英雄類多參加革命，似不宜太過摧殘。”他說：“我們陸軍同學多數暗入同盟會，時機成熟自當聯合反正，但此等劫匪為害行旅，是不能不殺的。”

庚戌舊曆新年，我居惠州，聞得廣州新軍起義消息。那時我正準備赴京朝考，須往各鄉向同宗籌款，對於此次事變實情無暇探問。是年舊曆九月朝考已畢，我回到廣州，各戚友多來問訊。景廉那時已升為水陸捕緝處幫統，來訪時似有憂色。他對我說道：“我已違背初心，博得目前榮顯，但恐後禍將不旋踵呢！”我聞此語，頗為驚訝。他即說：“我本是傾向革命的，倪映典平日亦認我為同志。

新軍事變時，水提李准着我統兩營人防守東門外。我想交戰起來，勝負尙無把握，他們未必能成事，我如歸附革命，時機尙未成熟，且不忍有負李水提，自己又建功心急，於是商准李水提，謀誘殺倪映典。某日，我單人匹馬跑至燕塘面見倪映典，問他：‘你此次起事有何把握？’倪說：‘朱執信運動各方會黨都已成熟，我一起事，各方立即響應，省城將唾手可得。’我即說：‘我所部多欲附從，只恐不能成事。你既有把握，可否到我處演講，說明情況，我部必多數附從。’倪應允。舊曆正月初三早，雙方列隊相見。我方占領牛王廟教會山，利用鐵絲網掩護，陣地較優。我囑唐維炯、童常標兩營長（俱安徽人，與倪同鄉）請倪打話。倪出到陣前，我即與唐、童二人請其入營磋商條件。條件當然不能談妥，倪便退出。我方即用亂槍將倪擊斃，並進攻新軍。新軍大敗，繳械解散。對外宣傳所說在陣上殺倪，是為了防革命黨對我施行報復的。現已鑄成大錯了。”言畢愀然。此後，我與景廉即未再謀面。

辛亥秋惠州反正後，留守惠州第二旅旅長陳月橋邀我主辦軍中文書及計劃訓練民軍事宜。次年春，廣東都督陳炯明要解散民軍，我勸月橋將所部自動解散。月橋因須為部下請領撫卹費和遣散費，邀我同往省城見陳炯明磋商，遂同赴省城。抵省後，景廉之兄景戴忽來旅館見我，說道：“我弟景廉性命危在旦夕了。”我問何事？他說：“景廉在新軍事變時曾誘殺倪映典，此事諒你也知道。辛亥反正後，他逃往香港，初不敢回來。後以在港生活難以維持，又接了許多軍中舊友來信，說朱執信任廣陽綏靖處督辦，正欲召集軍界舊人，舉辦清鄉，對他已允不究既往，如回來，當有位置。景廉遂貿然回來。我見了大驚對他說：‘你曾誘殺倪某，安知此次不是誘你回來，為倪報仇？’我當勸其趕速赴港，以免危險。景廉正欲今

晚赴港，不料今午已被广阳綏靖处捕去了。此事要求陈月桥先生往見陈都督請貸其一死，着在軍前效力，以图将功贖罪。”月桥夤夜往見陈炯明，炯明亦以景廉罪在不赦，但認为此案应提來都督府处办，当即亲笔作函致朱执信。聞朱亦慮到陈炯明将为景廉說情，即先将景廉枪毙，然后方始拆閱陈炯明來函。

当时軍界多知此事原委，但外界或有不明真相者，故緬述当日实情，以供修史者参考。

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 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

趙連城

辛亥革命之前，大約是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間，我隨姐姐由香山（後改中山）縣大赤坎原籍來澳門居住。那時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抵澳不久，便以趙璧如名字入培基小學讀書。由於受到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入校不久我便和一批培基同學參加反清宣傳活動，以後又參加了同盟會，初在濠鏡閱書報社工作，後轉到香港實踐女校，並參加石龍光復和廣州會師之役。因為我過去在澳門居留活動的時間較長，知道的較多，在香港則為期較暫，且接觸面不廣，了解較少，故本文關於港澳同盟會活動的回忆敘述，仍以澳門方面為主。同時，由於自己身為婦女，對當時廣東同盟會女同志的活動和各種遭遇也比較了解，因此也着重在這一方面加以憶述。惟事隔五十年，憑個人記憶，挂一漏萬，諒所不免。據了解，本文所提及的一些當年同盟會同志，目前健在海內或海外的還有鄭彼岸、馮秋雪、馮印雪、何國材、梁國體等，希望有機會能由他們或其他了解情況的人士加以指正或補充，使這一段史料能更詳確、更完整地保存下來，這是個人在文前提出的一點願望。以下，先從澳門方面辛亥革命前的情況說起。

保皇会与同盟会在澳門势力的消长

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孙中山先生毕业于香港的雅丽医学院,旋即到澳門行医(当时系用孙逸仙名字),先后在高尾街、草堆街開設中西医药局,但为时不过半年,便离澳轉到广州开业。以后,中山先生創立兴中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他的名字逐渐受到海內外的注意。由于中山先生是香山县的翠亨乡人,那地方离澳門很近,兴中会組織初期,很多主要人物(如楊衢云、楊鶴齡等)都是中山先生的香山同乡,經常来往于香山与港澳之間,在澳門也有很多社会关系,加上中山先生又曾在澳門开业行医,因此,那时澳門各界人士对中山先生提倡的反清革命运动是有一定的印象和同情的。但在兴中会活动时期,中山先生在澳門并没有进行过什么組織活动,直至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香港很快就成为同盟会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之一,而同盟会有組織的活动在澳門还是发展得很慢。

可以那么說,在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到同盟会成立这六、七年間,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对澳門社会的影响,比較中山先生的革命派的影响还大。康有为在戊戌前就曾到澳門活动,在宜安公司(当时澳門一些大商人所組織的俱乐部)出入。康的“学者”外衣和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当时頗受到澳門資产阶级和上层小資产阶级人物的欢迎。戊戌政变失敗后,康、梁的保皇会即在澳門先后出版了《知新报》和《鏡海丛报》等,和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互相呼应,对澳門工商界和知識界都起过一定的思想影响。在澳門教育界方面,保皇会的势力也很突出,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入室弟子之一陈子褒(原名榮袞)办的子褒学塾(后改为

灌根学校)当时在澳門享有很高的声誉,学生人数达百余人。陈子褒还編印了一些称为《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的国文課本,来代替旧的《三字經》等,有意識地向学生介紹康、梁的維新思想和保皇观点。例如《三字书》中就有“戊戌年,朝政变,康有为,一出現”和什么“光緒皇,好皇帝”、“愿我皇,万万岁”的句子。《四字书》、《五字书》的内容都是根据康、梁的学說和游記来介紹西方的科学和外国风土民情。这些課本当时曾被港澳甚至广州一些学校采用(其时清政府已解除所謂戊戌党禁),各地还有翻版,可見康、梁思想在教育界方面影响是不小的。清末,小学是九年制,九年內要讀完四书五經才准毕业,学生年龄一般都較大,高年級生由十六、七岁到二十多岁的也不少。当时澳門的主要的、規模較好的学校除上述子褒学塾外,还有一个培基两等小学堂,該校也拥有学生一百多人。培基学堂是港澳两地唯一曾获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学校。主持人潘才华曾留学日本,聞他在东京曾参加了同盟会,但回国后却忙于經商,不仅沒有負責搞同盟会的活动,甚至連校务也不大过問,把实际責任付託給总理容冲池。容的思想見解是和陈子褒一鼻孔出气的,校中教师多半也服膺康、梁学說。其时,学校每逢星期六下午都举行演說会,开始是一些学术性質的演說辯論,由性善性惡之爭发展到尊孔与反对尊孔之爭。那时,我参加这些辯論会很积极,还和馮秋雪(原名宗樾,后来在澳門任佩文中学校长、澳門教育会会长)、古桂芬(民国后长期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馮印雪(后任越南河內华侨公立中华中学校长,現任澳門书画研究会副主席)、周树芬等四人組織了一个“非偶会”,先后参加的同学还有何国材、梁雪君(女)、赵仕琛、李文海、李文借、陈霞裳(女)、陈詠裳(女)、李伯陶(女)、陈秀姬(女)、何玉卿(女)、何妙仙(女)、叶崇志、

蔡惠楨、周璧华(女)等共十九人，与另一派主张尊孔的同学文瑞昌、区韶凤、黎延禧等经常展开论战。以后这种反对尊孔、反对封建礼教的辩论，又逐步和国内反清革命运动合流，学生们把演说会的政治性逐步加强，甚至公开谈论革命了。记得当时曾有一个著名的广州粤剧戏班，由著名的小武周瑜利和武生公爷创领銜到澳门演出《说岳传》的《金兀术入寇中原》和《岳飞报国仇》两折戏。由于演员演技的成功，在澳门社会曾掀起一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潮。我们学校里的同学都废寝忘食地前往看戏，回到学校谈论起来，不少人热泪纵横，把岳飞的抗金和当前的反清运动很自然地联系起来。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间，香港同盟会的活动加强，宣传方面除原有机关报《中国日报》之外，还先后出版了《世界公益报》和《有所谓报》(小型报)，行销澳门数量日增。这些刊物具体阐扬了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同时也不断和康、梁保皇会所办报刊进行笔战，展开斗争。在戊戌政变后，社会上很多人不仅受了康、梁学说的迷惑，对君主立宪存有幻想，而且康、梁等也常常在海外宣扬自己是“借名保皇，实则革命”，俨然以革命党自居，企图鱼目混珠，模糊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思想界线。经过同盟会报刊的宣传，群众便逐渐认识救中国必须推翻腐朽透顶、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要立宪也不是康、梁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而是根据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思想的民主立宪。改良和革命的界线逐步划清了，同盟会的革命宣传对澳门的影响，也开始逐步扩大，树立了优势。

同盟会的革命宣传和在澳門掀起的反清活动

清宣統年間，来往香港澳門航綫的有“瑞安”、“瑞泰”、“泉州”各輪船，船上經常有人隨船宣传推銷成藥或食品，同盟会的反清革命宣传逐步和船上的賣藥宣传結合在一起。当时各船的賣藥宣传員中有刘卓凡(后为广州著名的灵芝藥房的老板)、陈峯海、李醒魂、区大球、王岐生等都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宣传革命的积极分子。他們以推銷成藥为掩护，鼓吹民族革命，反对保皇思想，提倡男女平权和婚姻自由，反迷信，反纏足，很受旅客羣众的欢迎。清政府为了对抗革命宣传，也暗中收买了一些賣藥者在船上大講忠君孝亲的封建道德，但不能引起羣众的兴趣。由于同盟会宣传人員的出色的通俗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就在港澳各阶层中一天天地深入人心了。

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庚戌)春，培基学堂的演說会开始邀請区大球、王岐生、陈峯海、李醒魂、刘卓凡等到校演說。这个演說会很快就成为一个同盟会的革命讲坛，香港同盟会的主盟人謝英伯(字抱香，梅县人，后为广东司法界名人)也經常参加演說会。由于演說会不断宣传革命，培基学堂当局就开始干涉学生的行动，演說会遂被迫停止举行。但傾向革命的学生都采取郊游会等形式跟同盟会的人員經常联系，談論革命。就是这样，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学生們終于走出課室，掀起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

辛亥年的春节期間，一羣培基学堂学生到营地大街宝衡銀号抗議悬挂清朝的龙旗，和店方面的主事人发生爭執，并向龙旗扔擲石块。該銀号請葡警彈压，澳門的華探目刘康善帶警探来到現場，見到所謂肇事的学生很多是当地紳商的子弟，就一面劝导学生守

秩序，一面劝告該銀鋪把龙旗取下。学生在这一次抗議中取得了胜利。

培基学生接受革命宣传后，把辮子看成为亡国奴才的标志，先后剪掉辮发的为数不少。那时(武昌起义前)港澳方面剪辮的风气还未普遍，社会上剪掉辮子的人，除了到过外洋回来的之外，只有一些在港澳政府机关的华籍文員。至于大多数人，則由于誤認剪辮就非穿洋服不可，因此，不愿穿或穿不起洋服的人对剪辮都还有顧慮(当然，剪辮与反清有关系，大家也有政治上的顧慮)。謝英伯等针对羣众的上述顧慮，开始提倡“华服剪发”宣传，除了发动培基学生参加宣传之外，还爭取了一些当地各界上层人士的支持。那时同盟会已开始在澳門发展組織，当地已故著名富商卢九的第三子卢怡若(又名新仔)、工程师刘公裕、牙医刘大同、国民兴书局司理邓繼明等都已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在这些社会上层人士的号召下，“澳門华服剪辮会”在当时最大的戏院——清平大戏院举行了一次羣众性大会，到会人数約达千人。已剪去辮发的人都穿着华服到会作为示范，会上演說的都是同盟会會員，羣众当场剪去辮子的有一百多人。这一次大会无异是对清政府公开示威，使当地的羣众也受了一次反清革命的政治教育。从此剪辮子的人一天天地多起来，一些过去同情保皇会的人也受到当时内地革命形势的推动，逐步把同情轉向于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保皇会的影响相对地縮小，連子囊学塾的学生也逐步脱离康、梁的影响，有些人先后还积极参加了同盟会的辛亥革命活动。

濠鏡閱书报社——澳門同盟会革命活动机关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对澳門社会影响很大，清政

府对革命党人的种种誣蔑丑詆在羣众中已不很能起作用。各阶层社会人士对为革命英勇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一致讚叹。曾参加是役起义的同盟会人物如謝英伯、高釗父(广东同盟会主盟人,以創立“岭南画派”著名的国画家)等也常到澳門联系活动,受到各方面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不久,在謝英伯策划下,同盟会在澳門开始发展組織,在南环四十一号秘密設立了同盟会支部的机关,同时还参照当时同盟会在海外工作所采用的“书报社”形式(香港設有“民生书报社”),在白馬行街釣魚台的一座三层大楼成立了“濠鏡閱书报社”(澳門旧称“濠鏡”)。該社由卢怡若以“紳商”資格取得澳門葡政府批准立案,并向各界发动募款捐书,以供羣众借閱。

閱书报社成立后即公开征求社員,又在社員中发展同盟会會員。那时同盟会也很重視青年工作,在过去积极参加反清宣传活动的培基学校学生中有六人(古桂芬、馮秋雪、馮印雪、区韶凤、何国材和我)首先被接受加盟。由于我是唯一的女會員,当时很受同盟会领导上的重視。記得当濠鏡閱书报社筹备举行成立大会的时候,澳門同盟会主盟人謝英伯认为很需要对妇女做些宣传工作,要我准备在成立大会上演說,鼓吹女权。記得成立大会那天,参加人数約有二、三百人,其中也有一些女学生和家庭妇女。在几个同盟会主事人和来宾演說过后,我登台发言,从反清的革命大道理說到提倡女权,照准备好的稿子講了一遍,引起了全場听众的注意。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我把清朝統治二百六十多年錯說为“六百二十多年”。当我講完返回座位的时候,座后有人笑說:“这位女士把亡国時間拖长几百年了。”我的演說对羣众起了一定的影响,開幕典礼过后,女子演說鼓吹反清居然成为一項社会新聞,还說这是澳門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我們六个培基同学参加同盟会以后，还在会內成立了一个小組織——“鋤异社”，取“誅鋤异族”的意义。我們用这个小組織的名义，向亲友筹集款項，用以支持閱书报社的經費。

閱书报社經常吸引一些女学生或家庭妇女到那里閱讀书报，但同盟会要向妇女发展組織并不容易。有些人初时对談政治、讲自由很有兴趣，但听到加盟后就要絕對服从組織命令，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便多观望不前了。有一次，同盟会为了筹集基金，香港同盟会方面先后派女同志鍾廷芬（入民国后，她与曾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鍾榮光結婚，冲破了封建社会同姓不婚的禁律，曾轰动一时）、张竹君（女医生）到澳門活动。我充任鍾的向导，分头拜訪一些富室大戶，向太太小姐們募款。工作完毕，鍾廷芬便回香港去。张竹君留澳門住在南环四十一号同盟会机关內，不久到上海当某医院的院长，又兼上海紅十字会会长。辛亥武昌起义时，她还帶領紅十字会的救伤队在武汉前方工作，成为当时妇女界很活跃的人物。

澳門同盟会支部的工作当时是接受香港方面領導的，澳門的主盟人初由謝英伯兼任，謝一度奉派去檀香山，乃改由“香軍”參謀林君复繼任主盟人。当时支部的主要負責人还有刘公裕、卢怡若、陈峰海、刘卓凡、陈卓平（财务）、林了依、梁倚神、刘大同等。新會員加盟要經過举手宣誓仪式，当时加盟一般称为“举手”。“举手”地点初在南环四十一号，后来改在閱书报社。那时閱书报社实际上已成为同盟会的一个半公开的机关。同盟会組織内部初期为了保密，有各种特定隱語和暗号，會員之間相見，都常用隱語对答。如問訊籍貫，要回答“中国人”；問訊职业，回答“办中国事”，等等；握手亦規定特殊的曲指形式。同盟会除筹集革命活动費外，还募

集救济穷困会员的经费。当时由于革命形势的推动，筹款工作一般是进行顺利的，会员中有财力的人都按月认捐。有一个水上居民梁镜清参加同盟会后，初时便经常用自己的渔船秘密为党人运送弹械，接济内地民军，还介绍了一个香山县的著名绿林头目梁义参加同盟会，利用他所部绿林的力量配合“番军”活动（梁义为人很豪侠，他在澳门的寓所是白鸽巢由义巷十一号，当时也成为澳门同盟会人士开会和通讯的地点）。后来梁镜清听说支部经费有困难，就变卖了自己的一艘渔船，将价款全部捐送给支部，以后又将家人的另外两艘渔船也全部变卖捐献。他自己对人说：“我们水上人受尽了屈气，非革命不可。”那时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革命的成功，变卖了三条渔船以后，一家生活虽日趋穷困，他也毫无怨言。主盟人谢英伯对梁镜清的热心革命，慷慨输将，常公开加以讚扬，称梁不愧为“置家之王”（过去广东水上居民被称为“置家”）。在辛亥革命时期，以一个水上居民能够这样地毁家纾难，确实不可多得。（辛亥革命后，梁生活相当穷困，当时的政府曾给他一个差事，在某地一个小庙当司祝。到了抗战时期，日寇犯粤，梁流落香港，终至饿死。）

同盟会澳门支部曾对清政府的海军作过策动反正工作。当时我有一个姐姐住在广州，我常常回省探望她。由于有这个关系可掩护行动，组织就常派我跑广州秘密传递书信。有一次，我在省澳轮船上偶然认识广福兵舰的管带（舰长）盛怀瑜（字麦秋），他的兵舰驻泊长堤一景楼前河面，经常因公差往来香山县前山一带，他本人也常到澳门。我把情况报告谢英伯等，他们指示我继续与盛来往，策动他率兵舰反正。我对他做了一些工作，还利用兵舰掩护了一些交通活动。到辛亥广州光复时，广福兵舰在省河易帜反正。

自濠鏡閱書報社成立后，逐步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并曾被个别清方密探混入了組織。我們发觉后，即由高劍父、梁倚神、陸蘆坐等（他們都是同盟会暗杀机关的負責人）將該密探計誘到三角亭菩提巷梁倚神的住宅加以处决。据梁倚神事后說，尸体就埋在住宅的地下。这是澳門同盟会所作的一次暗杀行动。

大約是辛亥閏六月間，我奉派到香港工作，名义上是香港实践女学校的教員，实际上是負責港澳之間的交通，經常回澳門。那时培基学校女同学梁雪君的养母貪圖金錢，和媒人勾結，拟騙梁去星加坡嫁人作妾。培基校董兼义务英文教員吳节徽（中山先生在澳門設医局时，吳曾为中山先生作揭借款項的保人；他是澳門一个社会名流，同情反清，却不參加同盟会，在澳門活到九十多岁，一九五九年病故）获悉此事，便和学校里的同盟会师生商量，劝梁不应上当。林君复（澳門同盟会主盟人）主张她到香港暫避，要我回香港和謝英伯商量。謝同意让她到香港实践女校讀書。梁在大家帮助之下，便决心离家參加同盟会，在离澳赴港的前一天，到南环四十一号“举手”，成为同盟会在澳門发展的第二个女同志。

辛亥革命前夕，一些原在澳門子囊学塾讀書的女学生也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她們是許劍魂、梁国体、陈乘卿、严淑姬等。此外，还有一个梁荃芳，她是澳門退休华籍探目梁金福的孙女，也因家庭压迫而毅然参加了同盟会。她們五人和梁雪君以后都参加了广东女子北伐队。

濠鏡閱書報社成立以后，除了在羣众中做了不少反清革命宣传工作之外，还負有一項秘密的任务——为光复香山作准备。通过书報社各种活动，刘思复、林警魂等的“香軍”在人力物力方面获得过不少支持。我們几个培基同学，年紀虽輕，但也十分热情，积

极参加各方面的工作。馮秋雪被組織指派担任与前山、灣仔(都是离澳門很近的香山县地区)方面的“香軍”的交通聯絡工作,几次受到清政府兵勇的盘問,仍能机智地逃过,完成了任务。区韶凤奉派回自己的原籍(新会潮連)发动乡人組織民軍,自己还当了队长。古桂芬年紀最小,大家沒有让他去內地。他把家里藏的一杆手枪也偷偷地拿来献給組織。书报社的工作持續了半年多,后来广东光复,主要負責人都先后回內地,社的組織便无形中陷于涣散。澳門的同盟会主盟人林君复回內地后郁郁不得志,不久便削发为僧,从此脱离政治。其余的會員干部,在听到中山先生託大总统給袁世凱以后,大家对国事都很消极。所謂“革命軍兴,革命党消”,澳門情况也是如此。

香港实践女学校——同盟会女同志活动的中心

同盟会在香港的机关一般是以商行、住宅或文化机关为掩护。实践女学校当时是同盟会在港主要机关之一,地址在中环結志街二十五号。邹魯、陈景华、徐維揚、謝英伯、高剑父、馮自由、莫紀彭、邓慕韓、陈哲梅、曾伯諤、郑彼岸、李思轅等都經常在学校出入;除邹魯、陈景华外,他們都曾在学校兼任教員。女同志梁綺川出名向港政府注册,并挂名为校长。梁是一放脚的妇女,从外表上很难看出她是一个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教学方面由男同志陈自觉(陈景华之弟)主持。女教員有徐慕兰(又名宗汉,后与黃兴結婚)、宋銘黃(后与高剑父結婚)、周紫明(后与林直勉結婚)、庄汉翹等。由于工作关系,学校教职員的流动性很大,一些挂名教員往往临时缺課;我除了跑交通之外,有时也得代課。

宣統年間,来往香港和惠州、东莞、宝安各乡的輪渡,一般是深

夜来往的。那时，同盟会会员来来往往，乘輪渡深夜抵港后，便到学校度宿。“实践”是女学校，很自然地成为女同志活动的中心，也是当时逃避封建压迫的妇女的一个收容和教育的场所。当时同盟会的宣传，除了侧重于“驅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也涉及反封建的社会改革问题，如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提倡女权，反对作妾，反对纏足之类，这对当时青年妇女来说，都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加上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光复会女志士秋瑾的英勇牺牲，对省（广东，下同）、港、澳妇女知识界也有影响。一些觉悟的妇女相率投身到辛亥革命的行列。她们一般出身于封建家庭或资产阶级家庭，其中包括有女学生、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有些还是富商的寡妇或妾侍（姨太太），也有一些是逃避盲婚的少女。例如女教职员中的梁綺川、徐慕兰、宋銘黄、庄汉翘等，都是富室的寡妇。她们每人都是背着辛酸包袱而走出家庭的。在学生中有些也和梁雪君一样，为了反抗封建家庭压迫，走投无路，找到同盟会关系，便被送到实践女校来“出家革命”的。因此，实践女校当局有时还得应付一些顽固家长的上門吵鬧。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黄扶庸（后改名秋心），她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的家庭，原在广州洁芳女校读书。她的生母是妾侍，家里大权操在嫂子手上，父亲听嫂子唆弄，硬要她嫁一个富室子弟。她为了反抗盲婚，便通过宋銘黄（当时任洁芳女校刺绣教员）的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被送到实践女校读书和工作。另一女生梁国体（后改名定慧，与邹鲁结婚）是香山县唐家湾人，由父母作主，被迫与同乡富室子弟唐铁生成婚，但双方没有感情。梁终于出走逃到她姐姐梁綺川那里，在梁綺川帮助下参加了同盟会，入实践女校读书。她的丈夫唐铁生跟踪到港，力劝梁随他回家。梁坚决拒绝，最后提出要

唐参加同盟会作为维持夫妇关系的条件。结果唐同意加盟。不久，夫妇二人被派往惠州工作，唐在行动中牺牲。此外，还有女生余琼玉是香港某富商的寡媳；郭玉生是西环生生金铺老板的宠妾；麦兴华是陈李济药商的寡媳；麦兴连是麦兴华的金兰姊妹，也是寡妇。她们都是为了追求解放而“出家革命”的。

同盟会通过实践女校也发展了一些女会员，其中有黎金庭和郑妙卿，都是富室的寡妇，她们加盟后便踊跃捐献军餉。记得黎金庭加盟时，实践学校负责人陈自觉要我作她加盟的介绍人。陈说：“黎是宝安县某富室的寡妇，手上财产很多，捐献给同盟会不少，大家同意她加盟。”我虽然过去不认识黎，也就签名作黎的介绍人。以后民国成立，黎金庭、郑妙卿和梁綺川、庄汉翘一道被推为广东省议员，听说黎还一度被推为宝安县的女县长。

实践女校的一个女工友唐玉兰是同盟会会员，她是梁綺川的表姐，也是一个寡妇，虽然四十多岁，对反清活动却很热情，对来往的同盟会会员照料得很好。

在实践女校的同盟会发展组织活动，比较突出的是发展一批香港大酒店的男职工。计有吴铁眉、阮季洪等三十多人，都是秘密到学校举手加盟的。

此外，实践女校在湾仔鹅颈桥附近设有一个秘密机关，表面上是一个住宅，梁雪君有一时期被派到那边居住。同住的还有两个妇女，她们是同盟会会员梁倚神的母亲和妻子，大家叫她们为三婆、三嫂。她们都很机智，和大家工作上配合得很好。

参加光复石龙之役的见闻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成功，全国震动。九月初，广州将军

凤山为李沛基炸毙。跟着，同盟会的陈炯明、王和顺率民军起义于东江（那时称为“惠军”，我们在港时则称它为“东军”），由淡水圩分四路向惠州、博罗进攻，与清陆军提督秦炳直所部鏖战甚烈。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所属各机关均奉命组织队伍配合“东军”行动。实践女校亦组队分两路出发惠州和石龙。惠州一路由陈自觉、陈逸川等率领，女同志参加的有余琼玉、郭玉生、程文华和陈志德等。石龙一路由谢英伯、高剑父等率领，女同志有韩玉贞（广州夏葛医院女医生）、梁雪君和我三人。

在出发之前，大家都心情兴奋，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一些没有被派出发的女同志也纷纷捐献金饰或现款，为大家添置行装。我所参加的石龙一路，人数共约百余人，队伍中有商界、学界、新闻界。香港大酒店三十多个职工也参加了，他们的决心很大，接到出发通知后，为了避免外界察觉，静悄悄地连夜不辞而行，甚至随身衣物也不带走一件。他们走后第二天，酒店主事人才发觉。因为他们走了，酒店里没有人开工，事情就在香港社会哄传开来。

领队谢英伯、高剑父被大家戏称为“大都督”、“二都督”。队里的主要人物还有刘兆槐（有“三都督”之称）、李杞堂、刘一伟、朱述堂、陈哲梅、梁倚神等。全队于夜间分批在湾仔海边下小电船向宝安海岸偷渡，登陆后即取道黄冈、黎村、棠下等地翻山越岭向石龙进发。队里曾雇了三乘山轿，说要照顾我们三个女同志，但我们拒绝乘坐，把轿子让给谢英伯、刘一伟（队里的两个大胖子）和高剑父三人。行军过程是紧张的，但是出乎原来意料之外，并没有和清军遭遇。沿途所过乡镇，人民群众夹道欢迎。乡绅们穿着蓝布长衫，用红丝绳结着辮子，出面殷勤招待。各地爆竹喧天，悬旗结采。沿

途乡民都热情地为民军引路，还协助把我们的同志预先在山边田头埋藏的武器弹药掘出，交回民军使用。由于我们队伍有妇女参加，老乡们见了很觉稀罕，我们常在休息时被他们包围观看。有人还摇头叹息说：“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

由于清军自动撤退，光复石龙没有经过战斗。队伍到达时，镇上商戶照常营业，到处飘扬着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帜，墙上张贴“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军万岁”的欢迎标语。那时王和顺的民军已先期到达。他们队里也有一些女同志，其中有刘守初（王和顺的妻子）和凌云两人是我们认识的。实践女校出发惠州的一路队伍也到达了。那时惠州、博罗已光复，东江各方面民军都先后向石龙集中，为数达三、四千人。一时镇上熙来攘往，尽是民军，好些队伍都有三、五个女同志参加，其中我认识的有广州光华医院的女医生刘佩华和徐惠颐（她们在民国成立后转到澳门开业，当产科医师），此外还遇见刘师复（“香军”——香山县民军领导人之一）的妻子丁湘田（刘师复后来成为著名无政府主义分子，他在香山县秘密制炸弹，左手手指俱被炸断，丁湘田经常与刘一起秘密工作）。

石龙光复后，镇上人民纷纷剪掉辫子；原来民军中不少人也是拖着辫子的，此时也纷纷剪掉。女同志一般都成为临时的剪发师。

留石龙期间，民军曾得探报说，广州有火车开来。我们以为是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派来反攻的军队，大家立刻紧张起来，搬运大量木石堵塞广九铁路。事实上火车并没有载来清兵，下车的是一批广州各界“绅商”代表和几个天主教的神父（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告诉民军说，张鸣岐逃走了，本省已宣告“和平独立”，请民军不必前进，以免影响省城的秩序。那些天主教神父们还拍出帝国主义来威胁民军，口口声声要求民军注意保护外侨和教民的

生命财产，以免引起列强干涉。民军方面坚决表示要向广州会师之后，他们才改口欢迎民军到省。民军由于人数众多，分批乘火车或民船向省城进发。

民军来自四面八方，成分复杂，组织松懈。同盟会对政治工作也没有抓紧，加上光复的胜利又是那么出乎意外地轻易取得的，因而大家都滋长了骄气。一些同盟会的领导干部也飘飘然起来，脱离群众，甚至威风十足。最突出的事是出发前强追封用民船，见船就拉，一共封了十多艘，但又嫌民船太慢，便四处找小汽船作拖带。我们队中被称为“三都督”的刘兆槐，乘着几分酒意，带领武装民军沿河面追封过往的小汽船，遇到不接受任务的小汽船，就鸣枪射击。一时河面呼救之声不绝，汽船上的一些人害怕得跪在甲板上向民军哀求饶命。结果一批小汽船被迫充当了民船的拖带。这一幕粗暴横霸的封船插曲，在群众中留下很坏的印象。

广东女子北伐队

广州光复后，胡汉民在广州就任了广东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同盟会算是从清廷手中和平接收了广东省的政权。我们一班由香港回来的女同志都兴高采烈，对“革命成功”存有各种各样的美好梦想：有些人希望出国留学，有些人希望在社会上获得适当的工作，有些过去受过家庭委屈的人，也存有自己已身为“女志士”（那时社会上都称同盟会的人为志士），回家可以扬眉吐气的想法。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同盟会的领导人物各忙各的，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我们一批女同志被安置在河南一所大房子里，连吃饭也得各自到亲友家或上馆子。大家有时候也过河到南关太平沙的孔家花园（同盟会省机关所在地）打听消息，希望能分配到一些

具体工作。但事情老是拖着，負責人的回答也不着边际。在孔家花园每人交了毫洋两元，总算領到一张同盟会証书和一枚黃銅質的証章(圓形，三条凸綫边围着一个篆体的“民”字，比現时的五分輔币略小)，但始終沒有得到适当的工作安排。

不久，广东軍政府組織了“广东北伐軍”，跟着社会上又出現“学生北伐队”、“华侨敢死队”等民众組織。大約是辛亥年旧历十月間，邹魯、高剑父等也发起組織“广东女子北伐队”(上海也有一个“女子北伐队”，但听說那是与江亢虎的社会党有关，不属于同盟会的組織)。从港、澳回到广州的女同志，由于工作迟迟沒有安排，情緒已十分疲躑，有些人失望之余已自动回家，剩下来的人听說北伐，又振奋起来。初时报名参加的有三、四十人，以后因为筹备出发期間发生波折，一时說出发，一时又說不出发，時間拖了差不多两个月，一些人的情緒又逐渐冷了下来，到了出发时全队只有二十余人。我和余琼玉、郭玉生、麦兴华、麦兴連等原来已报了名，那时也因事或因病沒有成行。队伍全体名单是：徐慕兰、宋銘黃(以上两人年紀較长，又都是早加盟的女同志，因此被选为領队)、邓慕芬、黃扶庸、許剑魂、陈秉卿、譚錦蓉、梁英顏、黎兴汉、賴軍华、陈振权、梁国体、严淑姬、梁雪君、刘伟明、陈汉兴、梁基芳、湯蓮、陈志德等。这名单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实践女校的教職員或学生，其他也有好些人是在港、澳加盟，参加广东光复的。出发前，全队經過短期集訓，每天到东較場练习兵操、騎术和射击，个个戎装赳赳，被羣众称为“今之木兰从軍”。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她們都是出身于資产階級家庭或封建家庭，参加同盟会后又沒有得到較多的教育与帮助，政治觉悟不高，卫生医护常識也不够，真正上前綫也是作用不大的。但就政治意义上說来，数千年来在封建

制度和重男輕女思想习俗压迫下的中国妇女,通过辛亥革命,第一次組成了女子队伍,打起反封建、反男尊女卑的旗帜,用行动向古老中国社会示威抗議;她們不失为在曲折的历史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一羣先驅者。

一九一二年(民元)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女子北伐队由广州出发南京,以后又由南京出发徐州前綫,为期大約一个月左右;四月間全队奉調返回广州,不久便宣告結束。一些同志回来見面时慨叹說:出发时抱“馬革裹尸”的决心,誰知到前方竟是“春郊賦馬”。事实上,在女子北伐队出发前后一段期間,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已和封建势力妥协,中途放弃了革命。孙中山于二月十三日已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軍閥头子袁世凱,辛亥革命已被以袁世凱为代表的反动派所篡夺,广东北伐軍也被迫要班师南回,“解甲归田”了。在这种形势下,女子北伐队到前方无事可为,請纒无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时候,一羣满怀热望要为国家、为人民、为妇女解放、为个人寻出路而投身北伐队的青年妇女,又重新陷入徬徨苦悶的深渊,她們美好的理想幻灭了。

女子北伐队中和我感情最好的黃扶庸,在出发前知我不参加該队,曾写信严詞責备我說:“姊曾云北上,今怯而不来耶?聞姊婚期将邇,諒姊必以为乐事。嗚呼!胡虜未获歼尽,而世俗紛紛結妾,国破家亡在邇,亦置脑后。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辛亥年十一月初五日函)。当她从南京回来广州以后,她又来信(一九一二年五月二日)給我說:“此行北上,一事无成,羞为故人陈也。果如姊潛居向学,余晷課授生徒,其乐胜妹等徒劳跋涉,思之能不悲乎?”前一封信何等悲歌慷慨,后一封信却充滿了失望悲哀,女子北伐队同志們当时一般心情大体上就是如此。那时所謂“革命軍兴,

革命党消”的形势越来越明显了。同盟会的组织也日趋涣散，广东政权虽先后由胡汉民、陈炯明等出面撑持，但封建军阀官僚的潜势力仍然很大。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物很多也郁郁不得志，女同志当然不用说了。女子北伐队结束以后，一些人徬徨之余便和一些要员结婚（如徐慕兰与黄克强，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陈乘卿与馮祝万等），算是解决了个人的“出路”问题。此外，绝大多数的女同志（包括未参加北伐队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军政府的适当照顾。一些人原来是逃避封建家庭压迫而“出家革命”的，回家却更加受到封建家长们的奚落，被压迫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比如黄扶庸原来是反抗盲婚而投身加盟的，回家后顽固的家长们仍不断胁迫她盲目出嫁，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家逃避。她本来想远赴日本留学，但那时负责选派留学生的邹鲁因过去追求她不遂，怀恨在心，把她的护照扣留不发，使她无法成行。以后陈景华创办广东女子教育院，徐慕兰任院长，她才被安置在该院工作。另一女子北伐队队员邓慕芬（后改名秋零），原是徐慕兰家中的女佣，跟徐出来一道加盟。她是顺德人，独身不嫁，家中有七旬老父，生活困苦，光复后，觉得身为“女志士”，当然不甘愿再作人家女佣。她和黄扶庸本来同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的，但到了一九一三年秋九月讨袁军事失败，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员，她们两人避祸走港澳，从此失业。两人平时感情很好，此时无家可归，彼此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结果便相约到肇庆鼎湖山上，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那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间的事。这一幕悲剧当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震动，港澳各报均有消息报道，刊出不少哀挽她们的诗文。到鼎湖游览的人士，多到她俩葬在狮山的墓前凭吊。事隔两年以后，一九一七年春，潘达微（以收殓七十二烈士忠骸著名的

同盟会人士，与黄、邓两人曾在广东女子教育院共事）主編的《天荒》杂志第一期发表了她们自杀的经过，刊出她们的照片和遗书以及各方面的悼念诗文。潘达微以“影庐”的笔名写了一篇《寒潭隕玉記》，文章的末尾写道：“影庐曰：二女死得所矣，尘尘孽識，有生便是煩惱，求大能脫，唯真是归，……死为安乐，灭度涅槃，二人同心，一朝如梦。屈骚云：世与我而相违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余念此，又不仅为二女爽然失矣。”潘达微在辛亥革命后是郁郁不得志的，他在女子教育院时就常对黄、邓两人大讲庄子和佛学，助长了两人对人生的消极悲观思想。他这一段大谈佛学的文章固然是借酒浇愁，但读来却成为对死者说风凉话，恰恰暴露了旧社会“人間何世”的殘酷本质。

辛亥革命以革命始，以妥协終，根本没有触动过旧封建的专制統治基础，这就当然不可能給妇女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黄、邓两人初时轰轰烈烈投身加盟，参加北伐，結果却以悲慘的自杀下場，这就清楚说明了这一問題。她们两人到鼎湖自杀前，曾到澳門住在我家盘桓了一个多月。有一次，黄扶庸买回一些紅色的內衣褲，半严肃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穿紅的死了可以成为厉鬼，报复一切。”今天回忆起来，她们对辛亥革命后原封不动的黑暗社会制度确是怀着深仇大恨的。黄扶庸从南京回来后便来借慨叹說：“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鋒！”（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函）袁世凱上台后，她又有函大发政治牢騷：“嗟夫，已死志士，昔之革命希望共和者，其結果今竟留与他人乐帝王矣，可胜慨哉！”（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函）这些未經发表的死者遺书，充分說明她们之自杀正是针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一个悲憤的抗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象她们这样有觉悟、有勇气的青年妇女，企图借助革

命,为自己解除封建枷鎖,但結果还是无法掙脫,大失所望,其他广大妇女更无論矣。由此可見,悲剧本身固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但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辛亥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是对当时的所謂“革命成功”的辛辣諷刺。

除了黃、邓两人以自杀悲剧为結局外,还有一些女子北伐队员的結局也很悲惨。例如許劍魂在与邹魯結婚数年后,忽然在港被人謀杀。梁荃芬北伐回来沒有工作,流浪香港,淪为妓女。

黃花崗起義前後雜憶

應 德 明

清宣統二年春，清廷命蔣百器為廣東陸軍第二十五混成協協統，訓練新軍，約我同行。我與百器奉孫中山先生密令，乘訓練新軍之時機，策動革命。百器調我充任廣東炮兵第二十五標第二營管帶，密謀起義。宣統三年二月，趙伯先到廣州，和我密商革命起義之程序，我以待機二字答之，即在廣州租賃裕隆米號三樓之客房為密議室。我營食米每月一百三、四十担，皆由裕隆米號包送，所以萬穩。我們的營盤在東門外燕塘，離省城十八里，裕隆米號開設城內東大街，所以消息很靈通。混成協司令部和炮兵標本部，同在燕塘大營之內。三月初九日，燕塘大操場試驗新飛機飛行，駐粵八旗將軍要來燕塘視察飛機試飛。消息傳來，我即飛報伯先即刻布置。伯先隨派溫生才預伏東門外諮議局門前。是日下午五時將軍孚琦回城，經過諮議局門首，被刺身死。伯先興高彩烈，於是起義之心愈急，積極準備。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失敗，實基於三月初九刺孚琦之太易也。

伯先調兵遣將，步、炮、輜重各營，每一隊有代表三人，同志九人，發給子彈手槍，準備三月二十九日起義矣。我當時以為新軍部駐紮城外，雖有槍炮而無子彈；軍械局又在城內，龍濟光的軍隊戒備嚴密，又有旗兵巡邏，城守營監察森嚴，若不統籌兼顧，輕舉妄動，

危险性太大。伯先謂我顧慮太深，無事可成。我說：“兄如果欲急進，我軍之出勁，必待你占領軍械局之後，始能前進；不然，雖有馬槍大炮而無子彈，終歸無濟於事。”

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後，清軍戒備森嚴，下令閉城三日，搜查革命黨人。凡屬沒有辮子的、穿黃軍衣的以及來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制台衙門前，伏尸纍纍，被殺的人約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謂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據可查的同志，其餘殉難的人無可稽考，約在三倍以上。三天之後，城門半開，一邊進，一邊出，中間隔以鐵繩，檢查極嚴。在各商店避難的同志不得出城，經我以軍服符號救出者有叶仰高等七人。其時我們新軍亦受到嚴密監視。三星期之後，督練公所有公文到炮兵標本部，索提革命黨人，謂每營伏有代表二十七人，着由各營管帶詳細查明，彙送龍統制司令部辦理等語。炮兵統帶官陳覺即命一、二、三營管帶限五天之內，分送各營革命黨代表到鎮司令部听候處理。我即對陳標統說：“我二營之中，並無革命黨人。”他說：“公文之中，明明指出每營伏有革命黨代表二十七人，何得云無？”我說：“我和本營士兵親如弟兄，同甘共苦，事無鉅細，天天都有值日官兵報告，若有革命黨混在我營，何得不知。統帶說每營有代表二十七人，我不知道各營代表竟是何人所派？統帶不是革命黨，何以如此清楚？”他被我說得面紅耳赤。他又說：“你敢保嗎？”我說：“我以身家性命担保。”我即回到自己營部，集合官兵訓話，宣布本管帶担保士兵平安之重任，命他們各各遵守營規，安心學習操練，並密囑左中右三隊官查明每隊三名代表姓名，命彼等即速請假返里，又諭衛隊值日官即刻放行。事後陳覺問我：“你担保沒有革命黨？”我說：“當然担保。”他說：“既沒有革命黨，何以有馮德輝等九人請假？”我說：“我只担保

他們不革命，不是担保他們不請假。”陈觉乃哑口无言。于是本营士兵終能徼倖免祸。

新軍中其他各营解送到龙济光处之士兵多少不一，均死于非命，慘不忍言，被杀之人數約等于黄花岗之烈士數。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釘，对准头脑，一釘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慘酷形状，令人酸鼻。龙济光又从我营运去过山炮六門，并調我营右队队官陶印卿去当他的教官。陶临行时，我特囑其千万勿将撞針、引擎、底火秘密公开指点。龙济光接待陶印卿如上宾，天天陪他吃飯。直至九月二十九日广东宣布独立之前三日，两广总督张鳴岐与龙济光在观音山會議，欲一試大炮实彈射击之火力以卜进退，并即刻到軍械局取来子母彈、开花彈各五箱試放。詎知連开九箱，一再施放，皆不出彈。他們皆以为天意如此，遂决意独立。实則此皆陶同志未洩引擎底火秘密之功也。

九月二十九日广东宣布独立，人民騰欢，万家庆祝，以諮議局为軍政府之办公处。我与姚雨平、林震、李济深諸同志組織北伐軍。广东光复后之第二日下午四时，大汉奸炮兵标統統帶官陈觉由軍政府回燕塘时，被預伏路旁之革命同志抓下馬來，用大石头先打烂他的半边面孔，然后剖肚挖出心肝五脏，挂于树上，再将头割下，置其腹內，用木牌写着“屠杀革命同志之大汉奸陈觉”，插在死尸前面。大仇已复，人心称快，革命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吐气揚眉。于是参加北伐报名者，絡繹不絕，异常踊跃。乃公举姚雨平为广东北伐軍总司令，张文为总部参謀长，林震为前部支队总司令，李济深为前部支队总参謀长。我即統領广东北伐軍炮兵团出发，会师南京，轉战于临淮关、固鎮、南宿州一带。辛亥年十二月卅日下午五时大除夕，我与陈佑卿率領數十騎，占領徐州城。清廷震劾，遣

使求和。宣統退位，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第一任大总统，定都南京。革命任务至此初步完成。

一九五九年九月录于江苏镇江金山寺西院之南窗，时年七十有七。

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門見聞录

王 迈 常

宣統三年辛亥春間，乡前輩沈公霖叟由广东提学使調任云南提法使，将子三月初一之夜乘宝璧兵親赴香港，邀余在夜間十二时左右登宝璧艦話別。余之寓屋在老城內旗營之權甲里，距宝璧碇泊之天字碼頭，路隔數里，城隔兩重，临时出城，或恐迟誤，以宝璧肩碇出口，須趁子夜潮水之漲也。余乃于是日午后二时出城，并約汪友蕙坪同行。預計先至某酒樓晚餐，候时詣宝璧与沈公話別，方免誤事。余借蕙坪俱不乘輜，且談且走。行至光塔街，忽听見天空有枪声传来，接連二、三响。向东北角一望，則黑色浓烟，冲天而起，以为偶然失火，但不解何以有枪声耳。亟向站在路旁之警察探問究竟，亦无从答复。不得已，兩人仍向前行，至归德門，往来行人拥挤不堪，挨延良久，始得出城門。出城門向东行，經過熱鬧街市登洋桥之中段时，忽見有人力車數輛自东向西，飞奔过桥，倏已望尘莫及矣。余与蕙坪均疑其車行太速，似車后有人追躡而来者。但过桥后向东一望，不特无人追躡，抑且人蹤寥寥，且都向西走，神色又似有不安之状，步伐急促，更使人疑。路旁高大市肆，鱗次櫛比，平日熙来攘往，此时寂靜如墟墓，門窗紧閉，无法問詢。再向东走，碇泊天字碼頭之宝璧兵親已赫然在望；有一尊鋼炮，炮衣已經卸去，徐徐向桅頂上升，此开火之准备也。天字碼頭东去百十步，广

东水师提督之衙門在焉。东西轅門各架鋼炮一尊，有全副武装之武弁一人，率領水兵多人护卫此炮，且禁止行人通过。余等只得不前，于是知城中必有大事发生。赶紧折回，入新城之某門（已忘其名），路旁倒有身着警察制服之尸体一具。正审視間，城門内冲出担架二副，两人抬一架，各有受伤者臥其上。少頃，又有七、八人衣冠不齐，急步南奔而去。余等走入新城，遇一人出城，与蕙坪有一面之緣。急問城内情状，据称总督衙門已被焚，伤人不少，余亦无知。余等走入老城，最近之街署为广东盐运使署，至則大門紧闭，守卫森严。告以来由，始得入。其时盐运使蔣公因与各司道公饒沈公，在广雅书局，犹未归。盐运使署在老城内，广雅书局在老城新城之間，其时电话阻滯，故无法探問消息。蔣之大郎出延客，为余語如此。署后花园有亭踞土山之上，余等登高四望，东北方制台衙門所在尚有黑烟上升，枪声陆續不已。时近黄昏，蔣郎請余等在署膳宿。原是熟友，自无须客气。十二时以后，电话通矣，知广雅书局高宴未毕，諸公无恙。余亦与家中通电，一切平安，余乃就枕。一宿已过，黎明即起。老城内路可通之处，行人漸多，但滿城仍不許往来。余乃往学使署一覘究竟。人心惶惶，大勢如何，不得而知，仅晓得水师提督李軍門已单衙出示安民，城内仍旧不許随便往来；持有李軍門印給之通行許可証，方可出入无阻。所謂印給者，上盖硃色大印之謂也。余与蕙坪延至中午，始有旗营老兵护送回家。此老兵余之邻居，适送公文至学使署，余乃得安然返寓。以上瑣瑣，皆余个人經過之情况。此下将叙张鳴岐制台遇险經過之情状矣。

次日清晨，李軍門入城矣。其时城内自布政使以下大小各官，平安无恙，惟张制台行踪不明，羣情惶惑。李軍門馳抵总督衙門，

詢問署內諸人，知張制台眷屬無恙，總督印信等均無恙。搜徧署內大小各室，絕無張制台遺留之一鞋一帽，揣知張必不死；既不死，亦應露面，何以深藏密迹如此。李軍門乃親自搜之衙門之外。久之，始于衙門后面某當舖之樓上得之。得之樓上堆積多年之什物中，蓬首垢面，不成樣子，曳之而出，尙瑟縮不遑也。蓋諸烈士攻入督署縱火之際，張情急智生，恃其年富力強，從後邊逃出，竄入當舖之後樓。當舖中人得悉督署失火，并聞槍聲，自顧不暇，又值下午交易繁盛之時，有人逃入後樓，亦未之見。于是張制台以當舖為安樂窩矣。以上所述，是追隨李軍門搜尋張制台的水師武弁程君告余者。程君廣東人，余寓清水濠時之緊鄰也。

又遲數日，余以欲得七十二烈士進攻廣東制台衙門之真相，乃親往衙門左近相機探訪。衙門之東不數十步，有北方開設之小肆，出售包子饅頭之類，可以在雅座坐食。余入肆小坐，密詢之肆中人。據稱是日午後一時左右，忽有着西裝者、短衣者百數十人，聚集東西轅門，倏而排隊成行，各人袖出手槍或手榴彈，直向衙門進攻。因連日謠言甚多，衙門內早已布滿許多全副武裝衛隊。雙方互相攻擊，約數十分鐘，雙方似各有死傷。來者退出，作点名狀，再排隊，再進攻。又數十分鐘，又退出，又排隊，其人數似較第一次退出時更少矣。至第三次進攻，攻入矣，衙內起火矣。但不久見西裝者、短衣者寥寥無幾，又自衙內奔出矣，且四散而去，不復成隊矣。蓋第三次進攻時，把衛隊長金姓打死，乃得沖入後堂縱火。不意房屋深邃，路徑複雜，伏于隱僻處持槍猛擊者，又大有人在。且經過三次鏖戰，大半死傷，存者寥寥，只好退出制台衙門，別作他圖也。以其時考之，余在城門邊遇着兩個担架匆匆向江邊奔走，大約即是殘余之攻擊制台衙門者。事後檢點遺骸，得七十二具，乃具棺

安葬于广州城外之黄花岡，至今受人景仰。嗚呼烈矣哉，吾中華民族之七十二个革命先达也。

溫生才刺孚琦案与广州起义見聞紀实

刘乃勳

(一)

宣統三年二月，鎮粵將軍孚琦至燕塘試炮閱兵，溫生才于东郊广东諮議局前，伺其回时，出怀中曲尺手枪連發三彈，中其头部殞命。溫旋为便衣警察郑家森擒獲，总督張鳴岐約同鎮粵右副都統、广东高等檢察厅长、广东高等審判厅长在督署大堂審訊，預設一椅于帷幕后，情余旁听。張鳴岐訊溫生才：“何故刺殺將軍？”供云：“太平天国虽不足称，惟翼王石达开檄文有云：‘忍令上国衣冠，淪于夷虜；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讀之令人憤慨。堂上各大人除隶滿洲籍外，应有排滿千鈞職責，今各淡忘。犯人蚊馱一粒，聊尽心。”張飭供同党姓名，据供：“犯人去冬在日本橫濱，亲听孫文演說革命，深聽其言，特未晤語，隨即回粵单独行事。須知犯人只持一半度曲尺，子弹只有三顆，其无同党接济可想。若必逼供，惟有混指。”案无遁飾，当即据供定斬立決。某統制力爭，泣云：“將軍何等尊貴，平空受凶犯三槍，凶犯罪不容誅，乃仅一刀了事，太过不平，同僚尽心之謂何？請將凶犯奏請凌遲梟示，逝存均感。”張鳴岐被纏不过，同至余齋。某統制仍持前說，余出現行法律示之，并言張督身任兼圻，豈可抹煞新章，顛預入告，乃已。

(二)

自温生才枪杀鎮粵將軍孚琦后，省城风鶴頻惊。三月中，革命党黄兴、赵声等运入軍械甚多，图謀起事。两广总督张鳴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皆有所聞，檄調胡令宜、吳宗禹所部各营回省防卫。赵声知事机已洩，意欲中止。黄兴憤激，力主冒险从事，遂于二十九日下午五时集合同志近二百人，臂纏白布，由小东营街整队出发，扑攻督署。督署东西轅門駐有兵士一連，时值晚餐，突被袭击，管带金振邦及各兵士措手不及，弃箸紛逃。其持枪值守排长一名、士兵八名，皆为革党手榴弹炸毙。有张巡捕(忘其名)在内聞变，立将宅門关闭。宅門居大堂、二堂之交，两扇大門木制，外包薄洋錫，漆黑色，象鉄，实則并不坚实。革党枪攻宅門，洞百十孔，未破，遂向大堂暖閣縱火，并持重物撞开宅門，一拥而入，内无一兵应敌。革党直入二堂、三堂上房，遍覓张鳴岐不获。乃父张步堂及其一妻一妾悉縮房隅。革党謂之曰：“不干汝等之事，不必害怕。”旋至他处分头搜索，署中員役均无伤害。当张巡捕关闭宅門之后，覓見张督，引至图籍所，囑两籍校生导之登楼，轉上瓦面，落厚祥街民居，送至天平街水师公所李水提处。张巡捕即与图籍所长分持电话机通知李水提及鎮統龙济光、协統蔣尊簋派兵赴援。李水提所派胡令宜、吳宗禹两軍先到，将机关枪架設东西两轅門。革党突围冲出，中枪倒毙者二三十人，余众退回，升屋跳遁，登时被捕获十余人，翌日又被捕获七、八十人。张鳴岐因革党对其老父及妻若妾暨各員役均不加害，拟从寬办。緣李水提意見參商，概行发交广东緝捕总局，檄飭胡道銘繫帮同訊供，列摺稟报。所捕革党經胡、吳两軍訊有初供者，多所平反。剪发学生冤被捕拿者，悉皆保释。綜計

革党攻入，用手榴弹伤毙排长兵士共有九人；革党退出，被机关枪击毙者二、三十人，并无剧战。管带金振邦失蹤，或言战死，或言畏罪潛逃，后亦竟无下落。窃維黄兴此举，糾合革党不滿二百人，別无援应，是为硬干，事安有济？其意殆学曹沫，期得张鳴岐而劫持之。惟李水提、龙鎮統、蔣协統各握重兵，此外尚有四营将官。张鳴岐虽兼署鎮粵將軍，但有左右都統所轄八旗官兵。传言：“丧君有君”，断不因张鳴岐身被劫持，遂至蛇无头而不行，及各存投鼠之忌，則事又安有济？第失敗为成功之母，东隅虽逝，后来人当为补于桑榆。曾不数月，义旗起于武昌，鄂督署一度围攻，而瑞澂遠遁，广东亦光复。此次革党勇于冒险，一往无前，固足令人惊服；其不嗜杀人，尤足令人佩服也。

論曰：黄兴焚攻督署一事，諸家記載，言人人殊，要多不實不盡。余矫其失，耗數日心力，作得此篇，悉取材于年紀；年紀所不及載，則悉心追忆以足之。然张巡捕犹失其名。于此以知左传、史記之长篇大論，未盡可凭，昔賢早窺其际矣。篇中除黄兴主张急进，兼欲效曹沫所为，系据革党口供外，余俱亲見亲聞，与道听途說者迥殊也。

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

鄧 警 亞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后，同盟会設在香港之南方統籌部，以革命时机业經成熟，急遣各同志潛赴广东各属迅速发难响应。在广州主办《平民日报》之同盟会會員潘达微、邓慕韓、邓警亞默察局势，决定用和平策略，使广东唾手而得，免再蹈前两次复轍（指新軍之役和黃花崗之役）。时张鳴岐任两广总督，与在籍翰林江孔殷友誼密切，且奏保江为广属清乡督办，故江拥有一部分兵权。乃决定先运动江向张氏进言，謂革命党非武力所能屈服，不若改用怀柔政策，以緩和其进攻，便可保境安民，不致陷入漩渦。江聞說动容，急問怀柔办法。乃請其劝张立电清廷特赦汪精卫（时汪拘禁在北京法部監獄）、陈景华（两广总督岑春煊西征时，陈任桂平县知县，因怒杀岑派遣赴桂偵探軍情委員陆显，被岑奏請革职，飭由新任看管，候上諭到后正法，嗣由其胞兄自覺設法运动逃往暹羅，加入同盟会，充蕭佛成主办之华暹报总編輯。香港富太古洋行买办莫藻泉乃陈之連襟，函召其返港，保他为惠記洋行买办）二人，調粵差遣；汪、陈若肯返省，党人必暫緩进攻，便可相安一时（当日潘、邓等尚不敢显露其身分，故說其赦汪、陈，俾得为张与香港党部沟通关系）。江甚贊成，张亦首肯，即电奏清廷，并汇三千元与民政部轉給汪氏作川資。此着既收效，知鳴岐易与，且畏党人与其为难。

十一月上旬，乘召集全省各界紳商团体在文瀾书院（系广州西关紳士集团組織，地址在第十甫）會議时，預約錦綸行工人（机房工人廖冠英、李芳流系同盟會員，創立宏仁演說社从事宣传，故錦綸工人亦有許多入盟，商团中則有盟員譚民三从中策划）及商团中同志数百人，即席要挾邓华熙（邓系致仕在籍安徽巡撫，順德人，是日邓为正主席，番禺前湖北布政使梁鼎芬为副）宣布广东独立，与北京脱离关系，羣情激昂，无法阻遏。旋有人袖出白旗一面，书就“广东独立”四字，工人温車在院内取竹杆挑起，高举招展，攘臂大呼“广东独立万岁”，和者声震瓦壁，众紳士狼狽遁去。温車将旗負諸肩上，先行出院，羣众尾随其后，以为拥护，从西关起巡行城内至督署前，沿途商店民居，咸拍掌欢呼，燃放串炮，深夜始息。当民众到达督署时，已聚集至二万余人，要求张鳴岐立即宣布独立，与清廷脱离关系。张匿不敢面，后由广府及南番两县令赶至，卑詞下礼，揖請民众回家休息，当据情轉达大帅，然后实行宣布，众始陸續散去。

隔数天，清軍在汉口大智門告捷消息至粵，张惊魂稍定，星夜張貼告示，制止民众暴动，声言如敢反抗，格杀勿論等語，以威胁粵人，使勿附和革党。水师提督見文瀾书院集議毫无結果，且发生反响，而党人发动消息又极紧张，恐自己的势位亦难保持，遂以金錢为餌，托东莞諮議局議員莫伯伊（字任衡，拔貢生，羊城报總經理，因为与李同伙开仁寿葯房，由其弟莫天一任总理，获利甚丰，因是二人往来甚密，故莫甘为李出力）运动粵商自治会（在华林寺内）領袖陈惠甫召集各行业值理开会議决，发布传单，劝告粵人切勿附从革党，糜烂地方，刊印传单共十万份，分散各属。該传单系南海廩生譚汝俭手笔（譚字荔垣，系羊城报总編輯，受莫任衡所使），原文

已遺忘，只回忆得“珠江逝水，常聞嗚咽之聲；梅嶺新秋，不盡蕭條之感”二句而已。時統籌部策動之南海、順德、三水各縣綠林如陸蘭清、張炳、周康、麥錫、陸領、黎義、任江、任夢等，已聚集于順屬樂從圩起義，數日間眾至數千人，擬挺進佛山，直取羊城。鳴岐聞報，即檄令江孔殷統率廣州、順德兩協綠營營勇及所部保安隊進攻樂從。但江已為潘、鄧等說服，不與革命黨作對，故甫經接仗，便揮眾撤退佛山，單獨返省見粵督，告以黨人聲勢浩大，必難取勝，宜早為計，免蹈鳳山覆轍。張默然無語，神色極為驚惶。江辭出，立以電話約達微、慕韓至劍廬（系商人俱樂部）面談，詳述情況，并商對策。慕韓獻議由江商諸諮議局，召開各界大會，共同決議實行獨立，使張不能再行反議。江深以為然，立電丘仙根（諮議局副議長）協商，因正議長易學清（字蘭池，鶴山人，曾官員外郎）自參加文瀾書院會議後，囿于民眾聲威，便閉門匿迹，連諮議局亦不敢到，推托有病，故江電丘商量，而不謀及蘭池也。丘首肯。十一月八日，由局發出通知，潘、鄧返平民報，刊就廣東大都督印一顆，屆期先由鄧警亞將印信及革命方略一本送至諮議局備用。適陳景華從香港乘日船抵省，先往訪江孔殷，遂偕同抵局，介紹其與各議員及社團領袖會晤。開會後，首由景華發言，謂目前本省各屬均已有革黨潛伏，一觸即發，便不可收拾，欲免廣東地方糜爛，非趁此時機宣布獨立不可，大家欲保存身家財產，宜立下決心，方能挽救。語畢，掌聲雷動，咸呼贊成，于是全場一致通過。鄧警亞遂起立發言，謂案經決定獨立，應先行部署人事，即取出革命方略（孫中山總理手訂），將革命軍編制條文朗誦，請大家推選一人為廣東都督。江提議推舉張鳴岐，眾無異言，作為通過。即席舉江及陳景華、黃謙為各界代表往請張就任，由江、陳二人將印信送去，并暫時休會，候代表返報消息。未

几,江、陈匆匆返会,登台宣告,謂张已离职赴港。潘达微提議,张已遁去,不如举胡汉民充任,在胡未抵省前,由新軍協統蔣尊簋代理(蔣系同盟會員),并推陈景华为警察厅长。督練公所參議魏邦平起言:“如以蔣为代督,我即通知其立調新軍入城保卫地方,治安責任,由我們新軍負担。”全体通过。魏电蔣氏来局就职,在諮議局取出一批黃紙(系該局准备謄写上諭縮短立宪年期用的)发貼安民布告。由江孔殷取出青天白日旗(系江在乐从清乡时拾得),使人树于屋頂。时水师提督李准遣人送来通告全省水陆部队一律改树白旗不得与革命軍抵抗电文一分(盖有水师提督大印),江交与邓警亚往电局拍发。于是广东全省遂兵不血刃而告独立矣。

香山起义回忆

郑彼岸

香山起义，是在辛亥年九月十六日，主持者是邑人郑彼岸、林君复、林警魂、萧楚碧、萧叔鸾、郑仲超、刘卓棠和东莞的莫纪彭、何振（仲达）、湖南人任鹤年等。今将起义情形分述如下：

事前的活动

先是，郑彼岸、林君复等响中山先生命，负责策划在本邑起义。早在武昌起义之前，郑等就在澳门南环四十一号设立总机关，召集各地党人，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当时议定由林君复、林警魂两人在澳主持总机关；林君复和莫纪彭、何振、郑仲超等担任运动驻前山的新军；郑彼岸担任运动石岐城的防营、游击队及联络石岐的绅士，并在石岐正薰街（今民生北路）萧聘一宅设立机关，为党人会议和秘密藏军火之用。所需一切费用，由林警魂担任筹措。部署计划既定，遂分头进行。澳门距前山最近，当时省方派有新军约三千人驻扎。这一支新军是广东督练公所新训练的劲旅，自标统以下至小队长均属陆军学堂毕业的青年，装备齐整，纪律严明。军官中多有富于爱国思想者，尤以在新军中的营长湖南人任鹤年最为进步。邑人郑仲超和东莞何振二人系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和前山的新军下级官长多是同学或相识。于是郑、何二人及林君复、莫纪彭等，首

先就与任鹤年联络，进行非常顺利。但石岐方面一向驻副将一员（俗称协台）和防勇数百名。清末的绿营防勇本毫无战斗能力，但副将马德新是个湖南人，头脑顽固，部下的防勇也多是湖南人，号称善战。马德新派防勇把守城廂内外，甚为严密，对革命活动颇有障碍。除了防营之外，尚有县团练局，主持人是邑人郑雨初；带领团练的游击队长是武解元黄龙彰，队兵约八十人，驻扎在石岐龙王庙；还有邑人王作标带有县署亲兵约三十人，驻扎香山县署。郑彼岸就分头说服郑雨初、黄龙彰、王作标等，他们均宣誓加入了同盟会。至于石岐对海的长州乡，族大人多，地形上更为重要。再过去便是隆都地方（即今十二区），村乡最密，华侨甚多，富有民族思想，谿角刘姓、安堂林姓、南文萧姓，均是聚族而居、人口逾万的巨族。因此，又遣人分头向各族姓的志士团勇联络。小榄方面，地方辽阔，绿林最多，亦于事前派人联络其中的李就成、伍顺添二人约期举事。除此而外，未经运动的只有县知事覃寿堃和副将马德新二人。起义所需军火皆由澳门、香港运入石岐。安香兵轮管带某早已同情革命，林君复等商得其同意，时将大帮军火托他运入，并有几名少女如林寿华（林君复妹）、黄文千（黄文鐸妹）、萧世冰十六姑（何振未婚妻）、刘振翠（萧叔鸾妻）、黄芙蓉等担任押运。她们能利用巧妙的伪装，避过洋关的检查。抵岸后，各人均乘肩舆，将军火舁入萧宅或大涌林家密藏。

安堂乡的林警魂，与林君复为从兄弟，在澳门总机关担任筹餉。他与港澳商人、海外华侨及各省的革命党人，相識甚多。他向各地商人华侨捐得不少款項，源源接济，革命得以顺利进行。当时担任联络各方面的人，尚有前清举人高拱元和他的儿子高西平，长州黄尧軒、黄普明，谿角刘卓堂、刘蔚池、刘日三，龙聚环刘汉毕，象角

彭雄佳,豪吐高胜瑚,申明亭乡楊藻云,港头乡胡孔初,安堂乡林少愉、林耀南、林仲达,及南文乡萧某等。此外,前山方面尚有刘希明、苏默斋(苏曼殊之兄)、陈自觉(陈景华之弟)和陈永安等几十人。

小欖起义情形

九月十二日,小欖的綠林豪客李就成、伍順添等,在附近沙面首先起义。馬德新聞报,不知虛实,立即撤調黃龙彰所部游击队八十人,配合协署防营百余人,开赴小欖围捕。不料游击队到达小欖后,便与李、伍合流,反攻防营,伤毙不下十余人。馬德新知事不妙,且战且走,回岐后翌日即帶同几位亲信人員,出省去請救兵了。

前山起义情形

前山起义是在九月十五日。当时駐扎前山的新軍已运动成熟。前山恭都小学堂(后改风山小学)开办未久,即有党人苏默斋、刘希明、陈自觉、鮑某等由日本回来,投入学堂当学生,暗中做地下工作,說者謂新軍普遍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他們出力最多。又澳門富商陈芳之孙陈永安,亦加入同盟会,和党人联络紧密。永安家資富有,做事肯出錢,当时頗受人推重。十五日这天准备起义的新軍官佐,均齐到黃茅斜陈永安的祖居石宝內开秘密會議。到了傍晚,前山各处一声暗号,遍豎白旗。新軍的高級官长某,見勢不佳,立即由前山城牆跳下,拼命向澳門方面逃去。新軍隨即推举任鶴年做全軍司令,何振为副司令,准备向石岐进发,光复石岐城。

石岐起义情形

十五日新軍在前山起义后,石岐方面尚未接到消息。林君复

以事机迫切，遂即日兼程返岐，在正薰街萧宅召集党人开紧急会议，决定即日起义。下午，隆都方面的各乡团勇，纷纷集合，浩浩荡荡向西河路进发，直趋石岐。其中谿角乡的民军，由华侨刘卓棠统率，约有数百人；龙聚环乡的民军，由刘汉华统率；象角乡的民军由彭雄佳统率；豪吐乡由高胜瑚统率；坎下乡由梁守统率；港头乡由胡孔初统率；安堂乡由林秀统率；申亭乡由杨藻云统率；南文乡由萧某统率；共不下二、三千人。这些队伍虽是临时集合，并未经过训练，但革命热情很高。带领各乡团勇的人，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绿林豪客。各队伍到达石岐后，先后在龙王庙集合，分作两队。一队由梁守带领，由南门入城；一队由郑彼岸带领，由西门入城。当时因马德新已离开石岐，一时军中无主，守城的防勇不敢抵抗。县知事覃寿堃，原是湖北孝感县进士，曾留学过日本，本有新思想，到任仅仅一月，见大势已去，亦不敢抵抗。因此，两队人马遂安然前进，除在南门及县署击毙两防勇外，双方未发生冲突。由西门进入的队伍，首先就占领县署。王作标所统带的游击队便即投入革命队伍。县知事覃寿堃听到外面人声嘈杂，知革命军已到，即时匿避邑绅洪式之家内，旋被革命军侦悉，带回县署。他亦表示降服，翌日将县署的印信一颗缴出。今录他的申缴文如下：

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知县覃为申缴事：窃知县怀抱民族主义，十年于兹，以事势禁格之故，延误至今，未有所展。乃者天假之缘，当知事奉檄出宰之日，值民国军政府蒞邑之时。知县为中国计，为前途计，为地方治安计，为同胞生命财产计，均有应尽之义务。现已担任军政府事件，所有前索县印乙颗，应即备文缴销，以为与清政府断绝关系之证据。为此备文具申，

伏乞照驗施行。

革命軍接收了县印后，十七日便在水关街协鎮衙門設立机关部，专理軍政，公推黃龙彰、启明梁鳴洗、郑雨初等主持；又在城里深巷的高氏大宗祠設立民政部临时办事处，公推郑彼岸（当时名岸父）、高拱元和附城一带士紳担任，仍以覃寿莖为临时县长，負責維持，复一面召集石岐紳商各界組織籌餉局裕籌餉糶，为前方支援。一切部署既定，秩序很快恢复了。西門大街的振兴商店店主热心革命，早就把青天白日旗帜預先制就了一大批，因此在起义之日，革命軍旗帜就高豎在城樓和通衢大道，随风招展了。

石岐光复后，广州方面尚未起义，总督張鳴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尙欲厉兵秣馬，和党人为敌。他們得到石岐起义消息后，就檄令江孔殷乘着江大兵艦，于十八日开赴石岐，相机收复。不料江大到达石岐海面，見得民軍声势浩大，不敢登陸。民軍亦在石岐海面沿岸設防扼守。相持至下午，前山方面的新軍已兼程进抵石岐市郊，全城人心由是大定，江大旋亦退去。即晚接得电訊，广州亦已于十八日光复。前山新軍到达石岐后，十九日改編为香軍，仍以任鶴年为司令长，何振为副司令，莫紀彭为參謀长，即日由郑彼岸、林君复等領队出发，支援广州，驻扎广州西关一带，严密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广州市民，热烈欢迎。未几，又改編为北伐軍，随姚雨平北伐，至南北議和后，始告解散。

惠州光复見聞

苗致信

惠州光复情况

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党人陈炯明、邓鏗等約有十余人,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于九月初間陸續到惠州筹备武装起义。邓鏗等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自愿来参加起义的約有百余人,次日在淡水圩圍繳警察枪三十余枝,子弹千余发;参加起义的愈来愈众,两日間便成了一大队,共約五百余人。次由严德明在水口各乡发动,来参加起义的有六百余人,由陈經(白芒花人)在白芒花各乡发动的約四百余人,由丘耀西(蔴庄人)在蔴庄各乡发动的約有三百余人。此外,陈焯廷、謝子瑜、黄德修三人分道到其他地方发动而来的有三队,每队約有三四百人。統計起义民兵共約三千人,枪枝約有千余杆,还有戈矛、鉄棍、鋤头、扁担等不計其数。民兵編成七大队,陈炯明为革命軍司令,严德明、邓鏗、陈經、丘耀西、陈焯廷、謝子瑜、黄德修七人为革命軍大队长,邓鏗仍兼司令部參謀长。九月八日(即阳曆十月三十日),各队民軍到平潭白泥塘一带集中,布置障地,准备进攻惠城。

起义民軍在淡水圩收繳警枪后,次日陆路提督秦秉直聞报,即令惠州知府徐书祥筹备团練局,委梁靄人为局长,廖雨生、李望山、

秦序东、张紹緒等十余人为局紳，就地招募練兵三十余名，粮餉由局自筹，枪弹由提督署发給，未及两天，即告成立。同时，他又調各地的巡防营兵到惠城候令。九月八日，秦派洪兆麟統帶巡防营兵（多系湖南人）一营和炮兵一队，駐守飞鵝岭及其附近山区村落，許德普統帶巡防营兵一营和炮兵一队駐守惠州府城，另有巡防营一营駐守归善县（今之惠阳县）城，还有巡防营兵約三百人駐守环城一带。两城城門也都有兵巡守，除府城大东門和县城西門留为交通孔道，仍旧开放外，其他城門一律关闭。

九月九日（即阳曆十月三十一日）拂晓，革命軍約千余人由白泥塘出发，准备攻城，而清兵巡防营約有六百余人已在鰲头岭集合，随即进至馬鞍，与民軍相遇。两軍交战約五小时，各有进退，互有伤亡。清軍以民軍英勇，不敢恋战，退守原防。次日，战况大致如前，未分勝負。第三日（即九月十一日），两軍激战于馬鞍，民軍終于冲破清兵陣地，占据了险要的地区二圣宮。革命軍大队长陈經英勇过人，身先士卒，不幸于冲入敌陣时被擄而牺牲了。自战争开始三天內，由远地源源而来参加民軍者約有千人，兵力更加雄厚。九月十二日，清軍出战，被民軍分路包围猛击，清軍敗退回防固守。秦秉直因战事失利，密电两广总督张鳴岐請求派兵来惠援助。

十三日，清軍停战。紳商各界传说紛紜。有人說，秦秉直愿意“独立”或“投降”以消弭战祸。最后传说，秦秉直与何师爷（忘其名，清举人，秦的幕友）两人約定誓不投降，决心与城俱亡，并命守城的許德普在两城通衢地下暗埋火药地雷，准备民軍入城时燃放爆炸。惠人得此消息，无不惊心动魄，憤恨填胸。大家认为除了运动巡防营兵起义以外，别无解救良謀。我因与洪兆麟有友誼关系

(洪十六岁时随吳祥达来惠当馬弁,我曾与他相交数載,且邻居数年,其妻黃阿湘又是我同坊世叔黃篤生之女,但我留学广州后,甚少与洪往来),遂写密信託人面交与他,劝其自动起义,免致全城涂炭。在此时前后,还有何人劝洪起义的,則不得而知。秦秉直因怀疑紳商各界和留省学生或多或少与陈炯明、邓鏗等有联系,故放謠言,扰乱軍心,企图为陈、邓内应,遂于十五日派出巡查队到城中各处偵緝,并派巡防营兵围繳团練局枪械。局紳們惊惶失措,各自逃避。将近黄昏时候,府城大东門和县城西門半开半掩,来往行人要受逐个检查,方得出入。大东門城楼上又装置了大炮,如临大敌,但炮口則对着商場最繁盛的水东街和县城西門一带。

十六日,秦秉直接到洪兆麟起义的信息,立即商于何师爷。何說,“大事去了”,遂入臥房服鴉片自杀,实践前約。秦秉直的老母妻子劝其保全生命,靜候調解。秦犹疑未定。后由惠州知府徐书祥特来相劝,并提出“非投降式的獻城”意見,秦乃首肯。于是徐令归善县知事严梦菊为惠城官方临时代表,往革命軍司令部协商獻城办法,不久就得到圓滿解决,其内容最主要的是:(1)駐在惠州的巡防营兵先集中于府城,听候革命軍收編;(2)軍事交接完毕后,由司令部派員兵保送秦秉直及其家屬回乡。

十七日上午,駐县城的巡防营全部移駐于府城,听候收編;午后革命軍进驻县城維持秩序,同时暫設革命軍司令部于学宮。当晚民軍愈来愈众,軍需孔亟,司令部派人到惠州商会借款,后由紳商界林主敬等担任向商店捐助軍餉。十八日早,駐府城的巡防营兵約有一千人,荷起双枝新式枪枝,鵠立于提督衙門前面街道上,并无軍官督队,但秩序井然,如象听候收編的样子。不久,有黃塘乡人陈子干自称为民軍十三营統領,有随从三人,帶同巡防营兵到城

隍庙去編队。

十九日是惠州光复之日，也是秦提督献城之时。是日上午八时左右，邓鏗、洪兆麟等統率所部由县城出发，經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沿途商店都燃放爆竹欢迎。各队士兵部署已定，洪兆麟帶隨員数人徑到城隍庙，把陈子干所收編的士兵全部帶走，到学院衙集合編队，归洪統率。同日，革命軍司令部移設于提督衙署，因秦乘直尚未离惠，留出該署西花厅一角为秦家屬暫居，如何保送他們回乡，系由洪兆麟負責办理。次日，司令部将原有民軍大队加以补充，收編为旅，并委定严德明、洪兆麟、陈月桥、丘耀西、陈焯廷、謝子瑜、黄德修等为旅长。当时两广总督张鳴岐犹未宣布独立，因此陈炯明派洪兆麟、严德明等向广州方面推进，以光复广州。

惠州光复經過，約如上述。

惠州同盟会解散情况

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改組为国民党。但是广东方面的同盟会并未有改組，而且各县遍設分会。例如惠州于一九一三年一月設立惠阳同盟会分会于馮家祠，黄炼百为会长，我曾被选为評議長（我是辛亥年六月参加同盟会的）。其他各县分会何时設立，尙待查考。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以后，江西都督李烈鈞首先通电討袁，广东都督陈炯明繼起响应，宣布独立，旋于七月間誓师北伐。惟是袁世凱对于广东軍事老早具有阴谋，一面密令龙济光举兵伐陈炯明，另一面密令为陈炯明一手提拔的第一軍长鍾鼎基为广东都督，又派黄士龙到广州运动第一軍排长以上的軍官倒陈。因此，誓师以后，軍心涣散，鍾鼎基先逃往香港。当晚，第一軍官兵内

乱,龙济光得乘机攻入广州,自为广东都督。其后,龙济光为袁奕力,遂即通令解散同盟会,并查封惠州党人在陈都督府任职的林主敬、周醒南等的住宅,拘押第一军营长廖伯伟入狱,逮捕惠阳同盟会会长黄炼百,并判十年有期徒刑。当年广东各县同盟会会员,除逃亡外,其被龙济光迫害者为数不少,革命的同盟会到此结束。

惠州府中学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

王 映 楼

一九〇七年八月，孙中山先生遣同盟会郭公楫来惠，託人引荐，入惠州府中学堂（堂址即今惠阳师范）为理化体操教员。郭潮州人，字守毅，日本留学生，年约三十余，才气发揚，在日本时与中山先生极相得，中山先生深倚重之，故派其来惠活动。时惠州府中学堂系惠州知府徐书祥兼任提調，学生约百人，分甲、乙、丙三班。郭任教員后，极得学生爱戴，时引学生出外野操，乘机宣传革命，学生多受感动。一九〇八年，学生經郭介绍入同盟会者约八十余人，規定每逢星期日在府城塘尾街三江书院（現榨油厂附近）集合开会。香港同盟会派来同志严得明、丘耀西、饒輔廷、陈普仁等联系。一九一〇年，郭公楫以运动学生事已成熟，辞职赴檀香山向中山先生报告，不幸在馬路上被汽車輾死。中山先生复遣会員严确廷在水东街（今水东路）開設寿康西葯房（惠州有西葯房之始）接待革命党人，并暗藏炸弹，中学堂已入同盟会之学生多来往其間，商討进止。是年甲班学生十三人已全数毕业，仅赵宗禧一人升学优級师范，余多留校，名为补习，实则暗做革命工作。

一九一一年春，中山先生派黄兴、赵声等筹划在广州起义（即黄花崗之役），預于香港設統籌部指揮一切，黄兴为正部长，赵声为副。旧历二月，中学堂学生接到統籌部通知，于是甲班毕业生梁通

澄(字鏡球)偕同学二十人往港,与于五百选鋒之列。其余入会学生約六十人,会同統籌部派来同志丘耀西等,与姚雨平、张槐青等開設之集賢旅館联络,运动保安警察,俟广州起义得手,即在惠州响应,严德明負全責。三月初間,德明与陈普仁由港运枪械一批回惠,在澳头起陆,被清軍查获,德明、普仁俱被逮。消息传来,乙班学生楊璿(字光甫)偕严确廷逃赴澳头,欲設法营救。抵澳头时,德明已脱逃,而普仁解省。楊、严乃趁船赴港,統籌部授以响应机宜及各种行动暗号,居七日返。确廷系德明之胞弟,此次赴澳头已为清官府偵知,所開設之寿康西葯房因受絕大嫌疑。广东全省陆路提督秦秉直遣人以求医为名,数覓确廷。适确廷回水口,同学多劝之逃,不听。三月十六日,确廷返葯房,才及門突被捕去,毒刑敲訊,手足拶断,終不供出一同志。提署將其解省,落船时已奄奄一息,以两人舁之行,二十九日午,与陈普仁同就义于总督署門口,后并葬黄花崗,与于七十二烈士之列。确廷被捕时,楊璿方在校,风声渐息,同学劝之逃。楊曰:“提署偵騎四布,本校正在被注意中,倘我忽然逃匿,則嫌疑愈大,机关定被搜查,同学定被牵累,是为一人安全而使革命受損失也,我准备个人牺牲矣。”兀然不动。顧秦秉直已认为全校俱属革命党,二十日突架开花大炮于府城大西門炮台上,欲将中学堂裏燬。知府徐书祥聞訊,徒步往止之,愿以全家担保,事始寢。

中学堂已入同盟会之学生慮被搜查,夜燒文件及平日所閱之禁书,火光熊熊。监学練选亭惊醒,問何故,学生对曰:“清明节屆,不得回家祭扫,念亡故之先人,为燒紙錢也。”明日,暗迁三江书院集中,統籌部派来之同志丘耀西已先抵院协助。二十六日,黃兴已决定二十九日起事,部署略定,派人通知三江书院准备一切。二十

八日，同学皆配定工作，待机而动，手枪炸弹暂埋沟渠中。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广州事起，梁迺澄所借二十个同学，转战城中，三人受微伤，事败俱逸出。而惠州方面，至三十日不获广州音讯，咸相猜度，而手枪炸弹已起出待用。提署查拿革命党，气势汹汹，诸同学血气方刚，有欲卤莽一拼者。傍晚始接广州电，得“黄兄病重”四字（此电系胡汉民于三十日抵广州发来）。盖事先相约，以“陈”、“李”、“黄”三字为暗号，胜利则言陈，相持则言李，失败则言黄。接电知事败，乃各自分散。

是年旧历九月，广东继武汉起义。惠州方面，陈炯明、邓铿负责西江，严德明负责东江。中学堂同学各因其乡里关系分在两方面活动。十七日，乙班同学陈径率白芒花民军百余并合陈、邓所部民军，进攻惠城，清提督秦乘直出重兵拒战，相持于馒头岭数小时。民军死伤十余人，渐不支。陈径仍锐进不已，回顾后队已无人，乃急匿民家草堆中。清军进入民家，掠鸡鸭粮米，取草作午炊，陈径遂被发现，为所俘，同被俘者三人，并解府城提署，秦乘直令杀之于万石坊口（即今十字路口）。陈径等皆从容就义，不屈不挠。十八日，东西江民军会师大进，东江严德明所部约万人，中学堂乙班同学严廷辉（字耀燊）、鍾宜刚等指挥其间，猛勇攻入县城。秦乘直紧闭府城作死守计，登大东门城楼远眺，见县城内外，人如潮涌，旗帜蔽野，令炮手陈植开炮轰击。陈植固好炮手也，发炮向极准确，惟内心已同情革命，于是连发三炮，俱落于水塘中，未伤一人。秦怒斥之。秦甥许德普拔刀欲杀陈植，陈跳城外，匿民家得免，事后入元妙观为道士以终。十九日，秦驻飞鹅岭之精锐部队，由营官洪兆麟率领，下岭投降革命军，其他各营队亦咸无斗志。秦知大事已去，不能固守，始派城绅廖玉如等为代表与革命军议和，愿以城降，

只以保全身家为請。下午开府城迎革命軍入城，陈炯明为軍政府总司令，拨款安送秦秉直及知府徐书祥回籍。是役，丙班同学陈树人伤腿部，幸不致命。同时博罗方面，由丘耀西、李勉周、梁迺澄、楊璜等率民軍龔质彬、方金带等部，围攻县城，鏖战半天，城遂克复，知县蔡国英投降，生擒防营統領何鏡廷。甲班同学欧阳俊、李树声等亦率民軍收复河源，二十一日咸来会师。于是惠、博、河俱定，而陈径等之生死尙未明。疑其战敗匿民家，出示招寻，越数日，始知其已殉难。

陈径字孝述，惠阳白芒花人，短小精悍，发浓黑而蜷曲，双目炯炯有光，初讀于归善高等小学堂(即今第二小学)，一年后升入惠州中学堂，性和藹，好唱其本乡民歌，頗长于文学，殉难时才二十三岁，无后。一九一二年，諸同学捐款于西湖点翠洲建留丹亭为之紀念，并紀念其同殉之三人及饅头岭战死之民軍十人。亭建于点翠洲者，以陈径讀于中学堂时好遊是洲，每流連不忍去。名留丹者，取文天祥詩句“人生自古誰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今改称烈士亭。

紫金光复前后

甘 善 齋

(一) 辛亥革命前后紫金县的几次农民起义

辛亥革命前陈亚湘领导的湯坑山起义

庚子年惠阳三洲田起义失败后，参加这次起义的紫金县好义乡的陈亚湘避赴香港。戊申年他在港衝命回乡活动，先行邀集了张陀发起洪門会的組織，以“劫富救貧”、“反清复明”为号召。当时由于封建势力还极为雄厚，他們不敢公开活动，乃选择湯坑山上洞为拜会地点。他們利用白扇教的神功来发动羣众，并且宣传說：如对敌作战，只須用白扇一搖，說一声“矛的”二字，枪弹就打不进，刀斧就斬不入。数月之間，发展极为迅速，为数已逾万人。在好义、藍塘、古竹、义容、凤安一大片地区，除了土豪劣紳地主官僚之外，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每人均有一件武器，夜聚日散。經常集中在湯坑山的，配备有毛瑟枪、九响枪、云伞士、土粉枪及戈矛刀剑等，計有三百多人。其余来往流动的就数不胜数了。所以清軍管帶夏文熙在清剿农民革命軍时曾說过：“在藍塘、古竹、好义一带，我們不用看人，隨便背手抓去，都是参加洪門的人，总不会抓錯的。”可見那时参加洪門組織的人是很普遍的。陈亚湘领导农民豎起四方紅旗，在旗面上写着“忠元帅”三个大字，极得当地羣众

的拥护,声势颇为浩大。

当时因发展迅速,人数日聚日众,所需粮食和经费亦日多。他们一般采用下降单或吊参的方式,或向一些对他们略表同情的中小地主用商借的办法筹粮筹款;抗拒不交的,则以武力攻打,没收其财产。如戊申年冬攻打赖广昌号赖达大地主的家,经过一千多人三天三夜的攻坚战斗,卒把赖达的五角大楼攻破,没收其所藏大宗白银和粮食。他们分配白银系用尖顶竹甲帽来量,凡参加过组织、能表示出暗号者都给他一捧白银。

同年十二月间,陈亚湘和张陀率领主力及各乡村的农民革命军约七百多人攻打古竹乡团。激战二小时之后,他们把敌人击溃,缴获枪械二十余支及其他胜利品甚多,安全返回原基地。

己酉年正月初二日,因有叛徒李某洩露汤坑山军事秘密,驻防蓝塘的哨官陈德光率领六十余名清兵进攻汤坑山。陈亚湘的部队一时未及防备,和清兵稍接触后即退入山林,未受多大损失。陈亚湘发觉那个叛徒后,当即将其当众处死。至正月初八日,清兵联合乡团计三千余人,分三路围攻汤坑山,一路由古竹、义容进犯,约一千余人;一路由夏文熙率领,从蓝塘进军,约一千余人;一路由刘鸿彬率领,从好义进军,也有八、九百人。陈亚湘的起义军分守各山头,和清兵激战三、四天,起初用白扇教神功迎战,偶尔也打了一、二次胜仗。后来因有叛徒做内应,同时神功又不灵验,而且好枪仅有二三百支,大部分武器都是土粉枪、土粉炮及一些戈矛刀剑等,以致终于失败。陈亚湘、张陀率领起义军向山区古田退却,和惠阳钟子廷、钟观树的部队在古田一带活动。这次失败的结果,农民起义军和羣众被俘虏的二十余人,被杀的数人,被烧的房子三十余间,被抢去的牛猪和家具等等不计其数。有一个被俘的人年仅十四

岁,花名叫做“亚赤仔”,十分勇敢。当清兵进到山上时,他还拿着火索去点燃土炮,因来不及逃走,遂被清兵捉去。他被押回蓝塘时,神态镇定,面无半点惧色。管带夏文熙本拟将他绑赴刑场杀掉,幸遇打汤坑山有功的陈德光出来说话,说他年龄还小,没有上下,乃免于死。清兵把在汤坑山杀死的革命战士二人的首级拿回蓝塘高悬圩门示众。

陈亚湘起义军和古田钟子廷、钟观树、温凤等部会合后,于己酉年六月初三日早晨,又率领农民革命军二百余人,全是新式武器,假装清兵模样,借口捕获一名贼匪押送公局,浩浩荡荡开进蓝塘圩。进入公局横冲直撞,大杀一场,并放火焚烧公局。哨官刘鸿彬因出差未在公局,侥幸得免一死。

攻下公局后,起义军向群众大声宣传说:“我们是来复仇的,大家不要怕,可以安心做生意。”他们向好义回师,行至小古牛栏岗时,碰到刘鸿彬带领清兵数十人回蓝塘。两军交战不到半点钟,双方均未受损伤。起义军旋向吉安开去。

起义军临开走之前曾高呼:“我炮向上天,你炮指下地,我们不是争田夺地。”

陈亚湘退到古田后,配合钟子廷等部,经常在惠阳、西江、多祝、淡水一带活动。某一次陈亚湘拟往香港,行至淡水圩,被叛徒出卖,为清兵捕获,加以杀害。他死后,其部队分别为惠阳钟子廷、钟观树、紫金曾国华、张国初等率领;至辛亥年,由钟子廷、钟观树率领一部参加光复惠州,由曾国华、张国初率领一部光复紫金。光复后,一般起义军都改编为正规军,其中也有些战士自愿解甲还乡务农的。

辛亥革命后李荣泰领导的红花埔起义

紫金光复后，局面焕然一新，但是好景不常，革命胜利果实又被軍閥官僚和地主恶霸夺去，人民羣众仍然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壬子年冬，九和市盐警向盐民苛抽盐捐，盐民李火解一时无錢繳納，盐警就动手毆打。李荣泰在旁看見，憤恨非常，隨即号召农民向盐警斗争，夺获盐警枪三支，在圩内示威遊行，高呼“打倒貪官污吏”口号之后，率領农民到山区烏禽嶂，組織队伍从事活动。

李荣泰率領农民羣众退到烏禽嶂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聚集起有三千多人。那时因袁世凱窃国称帝，李荣泰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于甲寅年八月在九和红花埔起义，組織討袁軍。李荣泰被推为討袁大元帅，邀集邻县五华、陆丰、惠阳、博罗、河源等地的兄弟队伍联合攻打当地反动政府。县长黃其楨派駐县城营长鍾成带了一营军队来到瓦溪圩。李荣泰即派出队伍向瓦溪圩进攻。激战数小时后，鍾成即敗，退到飯罗塘。李荣泰军队圍攻飯罗塘，打了三昼夜。鍾成派人到县城請求援兵，黃其楨除調集本县的藍塘、古竹、龙窝駐軍外，还向河源县請援。河源县派了团长林干材率一团军队增援，四路进攻红花埔，激战五昼夜。起义軍虽有三千多人，但好的枪支不过一百多支，同敵軍的武器比較起来优劣悬殊，終于战敗。在激战中双方都有死伤，計反动军队死伤有二十余人，起义軍也死伤十多人。反动军队放火焚毀红花埔附近的房屋四十余間，还不分皂白，乱捕农民加以杀害。

李荣泰失敗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黃南福率領，退到天子嶂；一路由李荣泰自己率領，退到烏禽嶂，后又轉到双罗水尾，以兴竹庵做营盘，图謀再举。紫金县长朱书威迫大田李姓交出李荣泰，李姓

的封建头子李蔭田、李蓉軒等几次去劝誘李榮泰投誠无效，就出錢收买李水源等三人混入李榮泰队伍内部刺探情况。甲寅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李榮泰的队伍大部分外出，仅有李榮泰夫妇和少数部队守营。县政府据李水源等报告，即派军队連夜围攻，并有李水源等作內应，李榮泰夫妇因此被捕，押解到紫金县城从容就义。他的队伍由黃南福、翁亚培繼續率領，后来由于反动县长朱书屢派林建畴军队多次围攻，卒被击散。

李榮泰在领导农民起义时随身佩带的一口指揮剑，解放后已由其胞弟李耀南献与紫金县博物館陈列。

(二) 紫金光复經過

一九〇七年，紫金县开始筹办学堂，并开办了一个初級完全师范速成班（一年毕业）。一九〇八年，又开办了一个紫金县立高等小学堂（四年毕业），教理化、体育教員甘暉如是从广州聘請来的。他是同盟会員，經常接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吸收学生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紫金后，学生首先起来响应，組織学生軍，并向各处活动。广州的革命党人賴少璧委派周錄为粵省革命軍第九軍司令，負責光复紫金县。事先賴少璧专人函知中心坝农民領袖温子良、张筱华，九和李榮泰，藍塘张国初，义容曾国华等先集中兵力到附城的烏石巷子或九和、藍塘、义容、古竹等地等候。周錄于九月十八日到县城，先与学生軍联系好了，再到烏石巷子去和温子良、张筱华接洽，所有全县革命队伍都归周錄指揮。清知县王宾、哨官陈家裕召集本城紳士會議，决定派紳士苏和侶、杜梦蓮、叶昂云、刘望溪、陈詩樵、彭作堂六人做代表和周錄商談。苏和侶等

到烏石巷子后，他們的辮子被革命軍剪掉了，回县城向王宾哭訴，并說，革命軍要王宾、陈家裕好好交代，并繳械投降，如果稍有頑抗，即將他們擒拿枪决等語。王宾、陈家裕乃于九月十八日晚上帶着二百余人潛开北門逃跑。当晚城内非常混乱，由学生軍維持秩序。周鋒于九月十九日中午率領革命軍一千余人进城，出布告安民，打开監獄，释放所有犯人，并召集县衙門職員开会，叫他們暂时各回原职办事，不得离开。因所有庫中銀錢都被王宾帶走一空，周鋒拟举办殷富捐，暫以維持經費开支并作訓練北伐軍的費用。全县的殷商富戶由于鍾荣山(綽号通城虎)的鼓动，表示抗拒。直到十月末，革命軍击败了鍾荣山暗中組織的軍隊，以及他勾結的康乐地方土匪头子邹东山率領的四、五百土匪。十二月初，鍾荣山被处极刑。全县各地殷商富戶才不敢再事抵抗，紛紛捐獻銀錢。王宾、陈家裕逃出县城后，在藍塘地方被起义軍領袖张国和繳了械，赶出紫金县，逃到广州去了。駐紮藍塘的防軍哨官张成渠也被迫繳械，投降了革命軍，其他龙窝、古竹各地駐防軍也先后繳械投降，清軍完全肃清，全县光复。

紫金光复后，选出了曾担任督学的杜林芳做临时县长。周鋒即將县署一切行政事务交給杜林芳，他专負責組織北伐軍。后来他帶了二百多人往广州参加北伐队伍，路經上义时，被上义张、鍾两姓的地富土豪截击，队伍星散，到广州时只有少許士兵了。

临时县长杜林芳做了两个多月后，广东省政府派了游克楨来做紫金光复后第一任县长。游县长为人純朴肯干，在任內兴办学校、革除积弊等等，做了一些好事。

潮汕光复回忆

張 蘇 村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广州中心地区的防卫，总督张鸣岐调广西陆路提督龙济光率济军来粤与广东新军合并成镇，委龙济光为镇统，又委江孔殷为广州区的清乡督办。革命党人遂决定暂时将革命运动转移到西江的高要，南路的高州，韩江的潮汕以及北江、香山、顺德方面去，同时并在广州采取了镇压手段对付反动头子。接着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形势遂愈益发展，全省各地区都纷纷起来响应，宣布光复独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革命党人愿意接受清吏反正方式的和平独立，因而使地方封建势力和立宪改良派得以互相勾结，暗中进行各种活动。我在光复潮汕前后所经历的事实，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后，我筹得一些钱，在香港威灵顿街开了一间编织藤器的商店，以备容纳一些参加过起义的选锋人员，并进行藤业工人的组织工作。同时我并亲赴韩江上游和潮汕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以汕头正始小学为中心机关（因为当时该校教职员如张则通、蔡鹤田、黄××等，均为同盟会会员，而且张则通早在松口体育会时已是革命同志）。武昌起义后，我曾返香港联系，因得到印尼吧城书报社党人吴伟康带回的华侨捐款港币二万元的接济，当即决定拨八千元交熊越山负责策动梅县起义工作，其余一万二

千元由我負責在港購買駁壳、左輪手槍。我把這些槍支藏在沙發床、沙發椅內秘密運入汕頭，準備起義之用。我返汕頭後，為統一領導起見，當即召集黨人開會，成立統籌部，我被舉為統籌部部長兼起義軍臨時司令，孫丹崖為副司令，陳勵吾為軍務處長。當時在汕頭黨人屬孫丹崖一派的，有許無畏、蕭公溥、王翼黃、林賢紹、方宏藻、方次后、何子因、黃虞石、吳子壽、盧青海等（俱潮州人，他們或是士紳的子弟，或是士大夫階級，不一定是同盟會員）。另外，還有梁金鰲（洋行職員，廣州人）一派，以及葉楚傖、林伯渠、饒小田、陳迪予、謝逸橋等人（俱大風報的董事、編輯或記者），但主要力量在我和孫丹崖方面。會後我並將所帶款項分發負責的黨人作為行動的費用，並通知各黨人隨時準備，一俟時機成熟，命令下達後即投入起義行列，和清知府陳兆棠、鎮台趙國賢進行武裝鬥爭。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下午，我和孫丹崖、陳勵吾等分別率領所部圍繳駐汕頭巡防營和警察局的槍械，占領電局、銀行、鹽運使署、道署和交通運輸機關，主要是控制潮汕鐵路。當繳獲槍械五百六十支，並即以道台衙門為司令部，隨即準備進攻潮州（今潮安縣）。但是時廣州宣布和平獨立，李准反正，張鳴岐潛逃，胡漢民任都督，陳炯明任副都督，黃士龍任參都督等消息，接連傳到潮州，同時廣西巡撫沈秉堃、臬台王芝祥、鎮台陸榮廷，於十一月七日宣布反正的消息也已傳到。此時知府陳兆棠亦勾結潮州士紳巨賈，妄圖以反正方式來保持其反動統治。陳並取得了鎮台趙國賢（滿人）所轄巡防營的兵權，於十一月十日在潮州宣布反正，趙國賢在兵權交出後離署赴汕，因潮汕火車不通，折返署內自縊而死。陳宣布反正後，以電報歡迎革命軍部隊進駐潮州，聲稱交代，實則企圖篡奪。

我得电后不为所惑，仍照預定計劃，于十一月十一日又与副司令孙丹崖率部赴潮。但孙却麻痺大意，以为陈已反正，赵又自縊，不但可免武装冲突，而且可以径行接管，因而对率部进军之举表示躊躇，似不愿与我同行。我告以此举大家已經决定，不应再有分歧，孙始无异議，一同率部赴潮。不料他到潮后，又分道揚鑣，在鎮台衙門駐定后，翌晨即亟亟派員与陈兆棠接洽，迫其交代。但陈以我未派人前来为詞，加以拒絕，同时派兵两哨进驻鎮台衙門后面高地，以示威胁。我聞訊，函派秘书謝魯倩和陈兆棠交涉。他仍借詞延宕，迟迟不愿将兵权交出。孙丹崖見陈如此囂張，乃急来求助于我，并建議將我所部移駐鎮台衙門，以便联系和指揮。我見孙已醒悟，便欣然应允，即日率部由道台衙移駐鎮台衙与孙共处，以备应付随时变化的軍事局面。

十一月十四日，接到我部党人郭典三在揭阳牺牲的消息（郭系在揭阳起义軍迫令駐揭阳的巡防营繳械时，被清軍反扑而牺牲的），这个消息說明起义的形势是严重的，应当提高警惕。我当即再派秘书謝魯倩促陈兆棠即日交出兵权。他不但不答允，反来信質問揭阳繳械事，提出“既已反正，何又繳械？”且有“此种行动，形同土匪”之語，态度殊为頑強。同时，他又纵部杀害学生軍数人。至此，我見陈心怀叵測，已不能再事容忍，立即部署兵力，并下令于当天夜間一时发动軍事进攻，具体步驟是：

- (1) 围繳鎮台衙門附近敵軍共一个营；
- (2) 进攻知府衙和潮阳县衙(即今潮安县)；
- (3) 監視和相机围繳駐城內各地巡防哨兵。

战斗开始后，鎮署附近敵軍一經接触，即紛紛投降，并自动剪辮和繳械，我部仅牺牲軍士一人。围攻知府衙一路，清軍抵抗稍为

頑強。道鎮台衙一路解決后，轉移向知府衙增援，這才迫使他們全部投降。我們入衙搜索，知陳兆棠已越后墻逃走，只見炊熟米飯數大鍋，煮熟雞鴨蛋二、三十只和一些雞鴨，顯然本有準備飯后大舉反扑的跡象。幸我方已先行一著，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是役，所有巡防清軍除駐城外一營通過與我和孫丹崖聯系，准其反正外，其餘全部被繳械，戰鬥至中午十二時結束。略事休息后，即派兵扼守各城門，嚴密檢查行人，并懸賞五千元購緝陳兆棠。是日下午六、七時左右，海陽縣衙內起火，有人報告陳兆棠現匿某處，即派蕭公溥率兵前往查拿，回報已不見人。旋又來報，陳已遷移某處，迨蕭率部到達時又已不見。蕭率兵經東門返，見守門士兵正在檢查一伙行人，其中有一剪辮穿漂亮西服者即陳兆棠。蕭公與陳兆棠相識，當即將陳逮解司令部，羈押數日，羣眾紛紛要求鎮壓，隨即將陳槍決。消息傳出，大快人心。

潮汕光復后，集中汕頭方面的民軍有梁金鯨、許雪秋、陳云生、陳涌波、劉任臣等部，每部二、三百人不等，而且人多槍少。我雖奉都督胡漢民任命為潮汕區第四軍司令，并負維持地方之責，但對這些民軍也一時無法加以控制。許雪秋、陳云生、陳涌波等人，都曾領導或參加黃崗起義，和農村會黨頗為接近，士紳巨賈等上層人物對他們心存戒備，畏之如虎。這些上層人物，已先通過代理都督陳炯明，先委舊軍官日本士官畢業生陳宏萼（潮州人）為宣慰使，并調我軍參加北伐，委我為獨立第五旅旅長。此時，這些上層人物見我已調省，陳宏萼又未到達，乃由商會等機關推出澄海的大商（買辦出身）高繩之為民政長官，來暫時擔任維持地方之責。高接任民政長官后，即以“秩序紊亂，無法維持”為詞危言聳聽，向陳炯明陳訴。在此複雜環境中，我既不能使許、陳等部民軍事事就范，

又不愿以武力加諸許、陈等部,迫不得已,奉命离开潮汕,并将所部調省改編。陈宏萼到潮汕后,因惠州民軍司令林激真擅自行动,率部由惠州开赴潮州,引起土客軍冲突,使陈宏萼不安于位。而士紳巨賈亦以地方秩序日趋混乱为名,向各方奔走活动。陈炯明徇其請,决定解散民軍。当即委已反正的吳祥达为潮汕綏靖主任,率部两营开赴潮汕,責令吳將許雪秋、陈云生、梁金鯨等部民軍包围繳械,并将許雪秋、陈云生、陈涌波三人就地枪决。陈炯明在广州亦采取同样措施解散民軍,枪毙民軍首領。所以当日有“革命成功,革命党人死亡”的歌謠出現。

可以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封建势力始終不能一刀两断,总还有千絲万縷的关系,因为他們本身的革命动机就是不純,他們是为我,而不是为人民,所以敌我不分,而且为了爭权夺利,不惜殘杀。例如陈兆棠在惠州和潮州知府任内,办理所謂清乡,曾殘杀无数羣众,滿手血腥。但陈被拿获后,邹魯即首先来电請求将其释放。即此一例,可概其余。

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

梁 若 塵

辛亥革命那年我刚满八周岁，住在广东省东北部铜鼓嶺下的一个山村，名叫河姑潭，又称河清潭，属丰順县。山村离广州約一千里，离潮州約二百里。村中有小圩鎮，通航小木船联接韓江。大城市新聞传到山村还是多而快的。温生才在广州炸死清將軍孚琦事件发生不久，村中就有人繪影繪声，說温不愿自己的革命行动牵累別人，行刺得手后，独个坐在城樓上拉胡琴等待归案。象辛亥革命这样的大风暴传到山村，自然更不在話下。

山村有抗拒官府的传统。远在明末清初，农民曾有过长期抗击清兵的斗争，留下的事迹和传说很多。邻近有叫“官厅”、“教打坪”、“尾营”、“上营”、“中营”、“下营”、“旗头营”、“旗墩炭”、“兵吊頸”等村或山地，就是因当年清兵进攻农民武装时会驻过軍而得名的。当年农民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抗清复明的秘密結社一直没有中断。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及甲午战后日本占领台湾时，我乡都有过农民起义。我邻居的李亚昌（别字双日，人們叫他“双日大伯头”），就是秘密結社的一个头目。每年春节过后他便悄悄离家，連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总要一个月左右才回来。有人說他是到山中与党人“拜会”的。

辛亥光复风暴吹到了这个山村，年轻男子很多把辮子剪掉，算

是赶上革命潮流。我的哥哥是其中一个，他还說通母亲把我的小辮子也剪掉了，那我倒是很欢迎的，因为每次梳理辮发都要挨一次疼痛和責罵。我的爸爸却是迟迟才剪的。記得有一天上午，家中供奉的“財帛星君”、“观世音”、“天神爷”座前都点烛烧香，那是爸爸剪辮子的日子。辮子刚剪下，就有人燃放长串鞭炮，是祝福还是驅邪呢？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午餐还有肉吃，理发师还受到爸爸的敬酒。

爸爸剪辮子是事出有因的。就在他剪辮子后的几天，来了一队光复軍，扛着各种各样的旗子：有的三角白色鑲紅边，有的四方白色鑲黃边，有的长方黄色鑲黑边，多是神庙中取来的。武器有烏枪、牛臂枪（这两种是火药銃），还有更多的梭标、鈎镰、耙头、大刀、藤牌等等。服装是各式各样的便装，有的腰間还束上一条紅带。为首的是刘亚春，平日我們叫他亚春哥，是与我家素有往来的烧炭工人。他成了光复軍的头人，很出我意外。光复軍进圩后，最引起人注意的是要人家剪辮子。又軍中有手执剪子的，要赶集的男人剪辮子，有不愿意的就采用强迫手段。因而有哭訴的，有哀求的，也有逃跑的。但手起剪落，不少人终于失掉了辮子，那“头”便赶上革命了。

刘亚春率領的光复軍，集結在譚姓谷仓前的晒谷場（据說距辛亥五十年前响应太平軍起义的古声揚曾开仓济貧，在这里駐扎过），旗帜分插在谷場西、南、北三面，武器摆在东面。村里圩里的紳士財主們包括我爸爸在內，都到場去接待这帮突然到来的“兄弟”（当时称起义者为兄弟）。这时刘亚春不再是財主們眼底的“沒出息的烧炭哥”，而被当作保护他們生命财产的英雄人物。我混在人羣里，看見刘亚春接茶，接酒，接封包（慰劳金），样子不很自然，但很有气概。他不断地拍着胸脯說：“光复軍除暴安良，保护乡土，

不許坏人來胡鬧，誰敢來胡鬧，光復軍就叫他們有腳來無腳去。”

跟着，山村不象過去那樣寧靜了。某地有搶劫，某戶被打單（勒索），新聞一個接一個地傳播開來。我家也從此不能象往日那樣白天做買賣、夜來睡香覺了。爸爸愁眉苦臉，皇皇不可終日。他一反過去不理睬李亞昌的傲慢態度，親自上門去打交道，還叫我們見到李稱呼“雙日伯”。

有一天劉亞春偕一位壯漢來到我家。以往他每次來時，都是自己動手做飯，吃後取了挑炭腳力錢便走，這次卻不同了。中午他在我家作客，爸爸給他勸酒社菜，飯後也不走，和哥哥在房內咬耳朵，不知他們商量什麼，只見哥哥臉上時張時弛，顯然談的不是尋常話。晚飯劉仍然作客，飯後媽媽在廚房里忙這忙那，爸爸在門外打掃擺桌子，通常這是爸媽“理神”的套頭。第二天早上，門外有迎送神的紙灰和點殘的蠟燭。媽媽在廚房里自言自語，好象是咒罵人，又好象是嘆息說：“瘟神，拖尸的，老不死。”原來昨夜爸爸拜劉亞春為大哥，他參加“三點會”了。參加會叫“拜會”，新信徒要跪地對神發誓：“洩漏秘密，甘受雷打電燒”，“出賣弟兄，落得斷祖絕宗”。媽媽聽了這些話十分惱火，曾當場鬧過一場。自此以後，好久不見劉亞春再來，但哥哥卻背着人在抄寫什麼，有符咒，有圖畫，有歌訣。圖畫中有三個銅錢，其中一個寫上“興漢滅滿”，一個寫上“反清復明”，其餘一個寫上什麼記不起了。記得還有那麼一句話：“三個金錢定吉凶”。從那次拜會後，爸爸比較生活得自在些，不再愁眉苦臉了。

經過些日子，紳士們和財主們便不象光復軍進圩時那樣誠惶誠恐，低首下氣，而是恢復昔日的那種昂頭大步的神氣，重執村政了。他們組織了一個“崇德會”，把反對革命的舊勢力重新集結起

来，勾結丰順县安民局(清政府統治崩潰后的县政过渡机关)，指光复軍为“匪”，捕杀了几个人，其中有卢日清是头人之一，被杀头示众，罪名是“匪首”。到此，三点会又被迫重新轉入地下。“崇德会”的头子李輔臣(秀才出身，是地主兼高利貸者)夺得乡村統治权，儼然以革命新人物自居。刘亚春好多时不見踪迹。李亚昌也不再东奔西走，只每日持釣竿在山溪中釣魚。有时他带我一齐去，蹲在溪边，低唱山歌，表面看来很自在自得的样子，过着他原来的生活。

辛亥革命风暴在山村刮过后，村里的人，男的少了一条辮子，女的少穿鑲边花裙，改穿长褲子。此外，就是洋布、洋伞、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貨，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在他們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农民和燒炭工人的生活則更苦了。紳士办团防(地主反劫武装)，經費由土产、田亩上打主意，捐稅附加、厘金等等，名目繁多，一层一层地往貧苦的人民头上压上去。

宣統元年，村里开办了一間洋学堂叫“自助学堂”，校长是秀才出身、曾受过广东方言学堂訓練的李介丞，学生是从附近各乡村招来的，大半是地主和商人的儿子，其中也有少数是侨屬的儿子。我村老實生梁百泉是李介丞的老师，他是反对废科举办学堂的，当然更加反对革命。光复以后，梁百泉仍旧反对教新书，但已不敢公开反对办学堂了。光复軍起义之前，他教唆我們一般无知的小孩子，見到“自助学堂”的学生便連罵带唱地嚷：“学堂生人辱，辱死人”。后来他又不許我們照样罵和唱，同时在他主持的学塾里，除照旧要高年級的同学讀《四书》、《五經》、《千家詩》之外，增加了一种《启蒙讀本》作輔作課本，一套四册，第一册第一頁是：“早起身，下床去”，我們就叫这讀本做“早起身”。我們这一羣小孩子是不解什么“国朝”或“民国”的，脑瓜上虽然不再拖小辮子，却仍要我們念

“洗完面，梳条辮”的修身学，教我們“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王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們才改用一套八册的什么小学課本；第一册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始的。同时仍要讀古文，代替四书、五經，学塾既被时勢所迫，改名为“启明学校”，梁百泉本人也当起校长来了。

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 革命軍在长汀的失敗

蕭 文遺稿

在辛亥革命时期,我曾参与閩粵边区的一些革命活动,現在把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和在长汀失敗的經過,根据亲身經歷的事实,写出回忆录提供参考。就整个韓江流域來說,潮州地处韓江下游,潮州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上述地区影响很大,为了能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形势,这个回忆录打算从潮州情况說起。

(一) 潮州革命党人的活动

清朝末年,潮州几乎无官不貪,无吏不污,卖官鬻爵,賄路公行。土豪劣紳依靠官厅势力,横行乡曲,无恶不作。豪紳家中竟設有司爷,設有听候問話的座位,甚至公开設置专为受賄接脏用的庫房和儲藏室,儼然一个小朝廷,其罪恶不亚于官吏。

当时潮州鼠疫流行,清政府任其蔓延,死鼠滿街,无人清除。每日清晨,棺材堆滿城內各門,等候开城門出城埋葬。由于疫尸未能迅速掩埋,疫势蔓延更烈。

由于农村破产,商业衰退,人民失业日众,紛紛出走南洋謀生。赤貧者更被迫当“猪仔”出卖,任人宰割。

在天災人禍交迫之下,人心日益傾向革命。如当时《岭东日报》曾登出梅县两首山歌:1.“犯法唔(不)怕犯上天,皇帝妹子(女儿)崖(我)敢連(恋);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恰似廖(游)花园”。2.“入山見个藤纏树,出山見个树纏藤;藤死树生纏到死,树死藤生死也纏。”这两首山歌,多少反映了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气概,很受当时羣众的欢迎,几乎人人能传誦。

当时在潮州的客家籍同盟会員和革命人士(非同盟会員)以潮州府武庙——金山中学宿舍为中心,主要分子是同盟会員丘羣英(号达报)、楊炳楠(号杞材)、蕭文賞(号懋之,即作者原名)。他們的活動对象是惠(州)、潮(州)、嘉(应州)、韓山师范、茶阳小学、农林試驗場等学生界,新街头和开元后巷的打銅、打錫工人,府前街的裁縫工人,鎮台衙前的理发工人(三点会員),鎮台衙内官兵和門房(三点会員),以及瀛州日报社长錢学羣(号热儲)、編輯丘启明(号澄生)等。

自黃花崗起义失敗后,客籍同盟会員罗仙儻、罗笋儻、张蔚然等(俱大埔人)均在香港积极筹划潮汕和大埔的革命活动。在潮州的丘羣英、楊炳楠、蕭文賞等和他們发生联系,希望通过他們获得香港同盟会总机构供給手枪、炸彈各項武器,以充实革命力量。丘、楊、蕭等曾計劃以金山中学为主,乘每逢湖望各級官員聚集武庙行香的机会將他們一网打尽,实行起义。当时青年学生革命斗志极为旺盛,喜欢看杀头,說看杀头可以学习杀人技术和志士延頸就义的英勇气概,借以鍛炼各人的胆識。故每逢鎮台衙和府台衙处决“囚犯”的时候,他們宁可枵腹、曠課,也要跑去看杀头。

庚戌新軍起义和黃花崗之役爆发后,革命形势日益发展。辛亥年中秋,革命党人曾集合金山中学、韓山师范党人、同乡、同学等

四、五十人举行宴会，并有瀛州日报編輯丘启明和广州归客温少奇等参加，名为赏月，实则商讨起义计划。讨论结果，决定采取与三点会（包括潮州城和大埔虎市明火打劫的“土匪”）合作共举大事的方针，并即席推举萧文赏与潮州城内三点会联系，共商起义办法。

萧文赏奉派后，即和潮州城内三点会联系，得到的答复是，他们不能作主，要去蔡家围（潮州对岸）向他们的上级请示；后又转介绍萧到隘隍去联系，并有金山中学李秉权（丰顺人）写的介绍信，后又层转介绍到潭口、高坡，福建峯市，最后到上杭的丰稔市。联系会商结果，三点会不同意各地三点会组织自己单独起义，只同意各地组织就地响应同盟会的起义，也不同意越境响应别处的起义。萧文赏认为满意，回潮州复命。迨九月二十二三日返抵大埔时，得悉广州、汕头、潮州都已先后光复，萧奉命停留大埔，就地在在大埔发动起义，宣布光复，成为闽粤边区光复的开始。

（二）大埔县光复经过

光复前的基本情况

大埔是山多田少的贫瘠山区，但教育事业相当发达，很少文盲。清末，经济衰颓，失业现象相当普遍，其能勉强温饱度日的，只有依靠侨汇收入和教师工薪所得的少数人而已；其不能维持生活的青壮年就只有“过番”（即到南洋去）一条出路，甚至有不少是自甘当“猪仔”出卖，以偿出洋旅费者。因此，当时教育界和华侨的人物往往举足轻重，他们的政治态度对革命有很大的影响。兹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分述于下：

(1) 教育界方面：頑固派多是八股出身。他們盤踞教席，擁有相當多的門生弟子。他們罵保皇黨、維新派為“離經叛道”，罵革命黨、同盟會為“亂臣賊子”，罵三點會為“土匪強盜”。如大埔官學的經學教員丘輔臣就是當時頑固派的典型人物。維新派多數是科舉策論出身，擁護康、梁維新，不敢革命，看不起同盟會的革命黨人，其代表人物有樂羣中學監督張雲龍（號陸師，舉人）等人。革命派多數是學堂生，他們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但愛國熱情很高，革命性強，接近維新派，反對頑回派，在反對頑固派的鬥爭及帶動剪辮發高潮中常得到維新派的同情和支持。

(2) 華僑方面：頑固派以“大清帝國欽差南洋商務大臣”、大資本家張弼士為首。他們反對新學，反對革命，專門破壞教育和公益事業。維新派以華僑大資本家戴欣然為首，他們熱愛祖國，熱心教育和新興的公共事業。戴本人曾獨資創辦大埔官立高等小學堂（當時簡稱“官學”），負擔全部經費達几十年之久。其餘各種學校和公共事業，他亦大力協助。自私派以大資本家楊齋為首，他們對國內一切事業置若罔聞，只知購置他們自己的產業，擴大他們自己的企業，不問其他。他們不反對任何人，亦不協助任何人。革命派多數是華僑中的勞動人民、水客和學生，受過革命宣傳，受過帝國主義凌辱，有愛國思想，希望祖國強盛，爭取進步，人數相當多。他們把興中會、同盟會的書報不斷帶回大埔，宣傳革命。他們的宣傳活動，給予當時大埔青年學生以極大的啟發和鼓舞，同時對國內外革命黨人的行動也起了橋樑作用。當時專門從事革命活動的人物有張蔚然、郭守毅等，他們負責奔走於南洋與內地之間發展組織；饒少夫、江振華等則在縣城設立書報社，作為宣傳革命的機構。

(3) 三點會方面：大埔三點會在辛亥革命前若干年就會不斷

宣传該会的“拜会、祭旗、起事”的内容和仪式及其一系列的活动，一般人民羣众对該会已逐渐了解，逐渐由駭怕至不駭怕，以至对它发生了感情，从而加入該会組織也就不乏其人，并不断传说某貴人、某大紳、某大富都加入了三点会，三点会的威信也就逐渐提高。由于它反清主张的影响，人民羣众对清政府的仇恨也就愈来愈深。清政府对該会也非常注意，不断派出徽服查訪的外省人到乡間去暗查。大埔三点会的领导人在他們内部的权力是相当高的，但由于领导人温阿拱过分隐蔽，不肯露头，亦不同同盟会合作，以致大埔三点会在辛亥革命事业中，只有个人表现而无集体表现。至一九一二年广东都督陈炯明派萧冠英(菊魂)带兵袭捕温阿拱，当场梟首以后，大埔三点会就默默无闻了。

(4) 天主教方面：当时閩粵边区的天主教徒同广州石室的天主教徒一样，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化政策影响下，对同盟会革命是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大埔的华侨天主教徒李汉良等就是在 大埔、上杭之間一面宣传宗教一面宣传革命的天主教徒。他們与三点会有密切联系。他們利用宗教掩护，在每次宣传革命之前，先举行宗教仪式，借以遮掩清政府的耳目。即使清政府明知，亦不敢將他們逮捕。萧文赏到峯市联络三点会时，李汉良曾自动协助萧去上杭工作，并募得現金五百元資助革命費用，他本人并随萧回到大埔参加革命。

光 复 經 过

萧文赏和李汉良由上杭返潮州复命，于九月二十二日路过大埔县城，聞悉潮州、汕头、广州俱已次第光复。当时大埔羣众革命情緒亦极高漲，遂一致留萧就地起义。萧文赏到大埔时，住大公当

(何寿祺的当舖),当晚会见何寿祺(号季武,他的父亲何如璋是清朝翰林,历任駐日本欽差大臣、福建船政大臣),商議起义事。次晨,张蔚然(大埔革命领导人之一,时在香港、汕头活动)派遣的张子蕃(华侨)和参加庚戌新軍起义的两位同志(忘其名,似乎是毛庆祥和李祥)帶領一批人由香港回到大埔,对萧文赏說,张蔚然已回到汕头,有事与郭典三碰头后即回大埔,囑萧不必回潮州,可即在大埔参加起义。于是萧文赏遂即与当地羣众拥进县衙,对清知事胡良銓和县府人員宣布立即剪辮,交大印,交錢粮,如交代清楚,可以保証安全出境,并将胡良銓自卫駁壳繳获。县衙內并未遭遇任何抵抗,当时县城內亦并无清軍駐扎,仅有一小部警察,也未发生任何冲突,不久也把警察十多支枪繳获。就是这样,革命党人順利地光复了大埔。我記得当时的行动好象看熱鬧一样,并无什么严密組織,也无完整的計劃,一窝蜂似的就把这个清朝地方政府打垮了。

革命党人进入县衙后,当即邀集了县商会、教育会、乐羣中学、大埔官学和一些名流巨賈参加会议,即席提出三条提案:(1)护送知县官胡良銓和他的眷屬安全出境,不許留难;(2)推举张云龙(何寿祺的岳父)为民政部长,张秩卿(大埔商会会长,南洋商务大臣张弼士的儿子)为财政部长,饒熙(清朝举人,乐羣中学教員,何寿祺老师)为教育部长,李宗尧为軍政部长;(3)推举萧文赏为司令,負責光复永定、上杭。并由何寿祺拨炸弹二箱(共五十枚)和手枪一支装备出发部队,說是香港来的。

光复后的一些情况

大埔光复后,除推举出几个头面人物当部长之外,饒少夫、江

振华、李汉良、张子蕃等和其他一些革命同志完全被排除在革命政权之外，都没有安排工作，任其闲散。

光复后被选为大埔军政部长的李宗尧于光复后二天（四月二十四日）突然集合部队和羣众，宣布一位新军同志（似系毛庆祥）收缴县官胡良銓的驳壳枪是犯罪行为，并迫令另一位同来的新军同志和李汉良把那位新军同志梟首示众。他们动手砍了百数十刀，才把那位同志的头割下。在场革命同志和羣众莫不相顾失色，不知所措。

何寿祺和李宗尧又曾派饒仲仪（请假回乡的清朝哨官）率领一队人马去攻打福建省武平县，遭到武平军民迎头痛击，失败而回。

大约十月初，张蔚然由汕头回到大埔县城，成立革命军司令部于何家祠，筹备北伐，拟经梅县出赣南，与宁都革命党人鄺极三、鄺友竹等会师北上。此时，适萧文赏于光复永定、上杭之后，受李宗尧派遣由上杭经永定回抵大埔，萧遂参加张蔚然司令部工作，协助张蔚然筹备北伐。

张蔚然组成司令部后，曾与大埔财政部长张秩卿发生摩擦。张秩卿系大埔富商张弼士的儿子，在光复前张弼士看见革命就要爆发，为了保持家财，曾派张秩卿（当时任大埔商会会长）向张蔚然表示，革命起义时，请保护他的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他愿捐献军餉五万元以为报答。张蔚然慨然允诺，不虞其他。光复后，张秩卿先当财政部长，张蔚然后当司令，张蔚然回大埔后促张秩卿履行诺言，张秩卿忽然变卦，食言自肥，对自愿捐献五万元一事竟一毛不拔。张蔚然据理力争，双方几至发生武装冲突。先是，张弼士又曾在香港通过胡清瑞（胡汉民的胞弟）向胡汉民（当时已任广东都督）

行賄港幣二萬元，並揚言自費購買步槍二百支作自衛。胡漢民聆悉張蔚然與張秩卿將發生衝突，為了支持張弼士、張秩卿打擊張蔚然，特派廣東紅十字會會長熊長卿為潮梅清鄉督辦。熊長卿又派林萼庵（大埔人）率兵一連先回大埔，制止張蔚然與張秩卿武裝衝突，並勸張蔚然離大埔參加北伐，使蔚然的革命威信掃地無餘。此時胡漢民並傳令限制廣東革命軍去福建活動。張蔚然曾接到胡漢民以都督名義的來電一封，大意說：福建現已光復，他已與福建都督孫道仁商定，嗣後閩粵兩省各自籌備北伐，軍民人等不准越界互相侵擾，仰張司令約束所部，遵守紀律，不准滋生事端。這一來，粵閩邊區劃了一道鴻溝，長汀失敗（經過見下）犧牲的同志冤沉海底，大埔革命士氣窒息無餘，福建便成為北洋軍閥內戰時期的軍事基地了。

張蔚然受到重重打擊後，不得已於十二月上旬率領蕭文賞、劉銜予（改名劉統，在保定軍校第三期畢業）、葉掃夷（號醉生，改名葉青，在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肄業）以及志願北伐的青年共約二百人，由大埔出發，經汕頭、上海抵達南京，參加北伐。張蔚然和蕭文賞編入廣東北伐軍經理局任職，其餘人員全部編入廣東北伐軍總司令姚雨平部衛隊營作衛隊。

張蔚然、蕭文賞等北伐後，胡漢民派羅鎮藩（舊官僚，福建連城人）為大埔縣長，派薛光華（曲江人）率兵一營駐紮大埔。此時革命同志饒少夫親自指揮隊伍，從崇聖祠經明倫堂通道，企圖迂迴縣署側背，向縣署進攻。饒被薛營阻擊，在崇聖祠前通道陣亡，大埔革命黨人從此便銷聲匿迹了。據一般判斷，羅縣長和薛營長都是外地人，剛來本縣不久，與饒少夫當然無私人仇恨；饒之武裝進攻，可能是出於政治憤懣，圖以革命手段打倒官僚政治。但這種判斷因

无事实根据,是否符合实际,难以断言。

(三) 永定县光复经过

光复前的基本情况

永定与大埔虽然分属閩粵两省,但关系非常密切。光緒末年,永定中坑地方有一时期曾出現过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村中商店有百数十家,在午飯晚飯時間,全街店主与店員一律回家用膳,店門敞開,变为无人商店,任由顧客自动取貨付款,无欺无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貴的气象。据說这是由于中坑有一华侨領袖胡子春急公好义,投資兴学(創辦一間犹兴中学),造成一种新风尚所使然。其实这不过是一方面的因素,除此而外,究竟还有何种因素,仍有待研究。笔者对此事印象甚深,特录出,借供参考。

永定民情强悍,好斗輕生,一方面好結客,一方面又好械斗。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华侨、三点会、同盟会之間,彼此关系良好,矛盾尚少。

光 复 經 过

九月二十三日,萧文賞被推为大、永、杭联軍司令,負責光复永定、上杭后,即席报名参加的,有賴仁基等二、三十人。出发前举行會議,作出几項决定:(1)成立大永杭联軍司令部,安排組織内部人事。(2)出发時間定当日下午。(3)目的地第一步是永定县城,行軍路綫是經過中坑,沿着大埔和永定的县道前进。(4)通过“革命軍紀律”:不杀已降;不公报私仇;不强买强卖;不准奸淫擄掠;不准焚烧

民房；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外人生命财产。(5)通过“安民布告”，大意是：我們是为光复汉族、除暴安良，严守纪律、保卫地方，各界軍民人等不得造謠惑众，不得自相惊扰，不得通敌报信，不得陷害善良；参加革命立功，捐助軍餉者賞，违抗命令者杀，扰乱治安者杀。(6)具体行动是：每到一处地方，立即展开口头宣传，除宣布“革命軍纪律”和“安民布告”外，要求軍民人等立即悬挂白旗，上书“光复汉族，还我山河”、“驅除鞑虏，建立民国”等字样；燃放爆竹表示欢迎，剪掉辮发参加革命。到达县城后，要求衙門官厅立即繳出印信、錢粮，軍警繳出軍械、弹药、馬匹；剪掉辮发，悬挂白旗，不究已往。

革命軍出发后，于当日傍晚到达中坑。萧文賞等即前往拜訪犹兴中学負責人和乡中紳士，同时展开广泛的街头宣传。全村立即悬挂白旗，燃放爆竹，对革命軍表示热烈欢迎。各戶自动备酒菜犒劳革命軍官兵。全村男子剪掉辮发、报名参加革命的有吳喜波（华侨，广东陸軍小学生）等数十人，自动献出各种武器（十三响馬枪、五輪和六輪手枪、伞柄单响枪、手杖枪）数十支。有的紳士昼夜写信并派人通知县城及沿途亲友响应革命軍。

次日由中坑出发，沿途所經過的市集村鎮的商店、学校、机关和大戶人家門前和屋頂均已挂滿白旗，悬好爆竹，等候革命軍到达时立即燃放，表示热烈欢迎。有的青年且背着包袱，携带刀枪武器，报名参军，带头出发。就这样，在沿途又发展了几十人。

二十四日傍晚到达永定县城，城内热烈欢迎的情况和沿途所見一样，而且表現得更加整齐热烈，他們并准备好革命軍全部的宿营、办公、膳食等地点和其他一切設備，只待次晨开会宣布光复而已。县城参加革命軍的有賴凉血、賴实岩等数十人，多数是中学

生。

二十五日晨在县署开会，举行光复仪式，当即成立军政府，推选军政府各部长，原任县长被选为民政部长，商会会长被选为财政部长，教育会长被选为教育部长。于是永定即告和平光复，惟政权机构仍然掌握在官僚、豪绅、大贾手里。革命青年同志被排除在外，他们只在革命军司令部工作。

光复后的一些情况

九月二十七日夜間，永定县城忽然发生一場虛惊。当时传说有自大埔来的革命军数百人，要来光复永定。远看他们，打着火把，秩序很好，浩蕩前进。革命军馬上关闭城門，登城警戒。旋探悉該部系制造炸弹的大埔人邓亚匡所率领，因当时大埔革命党人还没有统一的組織行动，邓不知萧的行动，乃自发地集合数百乡民前来光复永定。萧文赏即在城樓向邓打話，說永定已經光复，請邓回去大埔，邓即回去。一場虛惊，立告結束。

九月二十九日，李宗尧突然亲自押解駐扎峯市的清軍降將殷哨官来到永定交萧文赏收押，沒有說明原因，亦不加訊問，后又由李亲自提出加以毒打，打了三天，最后把他杀掉。李杀殷后，即秘密离开永定，不知去向。永定軍民皆滿腹怀疑，莫明其妙。

(四) 上杭县光复經過

革命前的形勢

上杭素称天險，城防坚固，城内駐有两个协台、一个管带，集結兵力約一营以上。相传上杭自有史以来从未被攻破过。太平天国

楊秀清攻打上杭三年，沒有攻破，只留下一塊石碑說：“東無去路，西無戰場；南有河道，北有池塘；教子教孫，莫打上杭。”革命軍雖無攻城利器，但鄉間三點會已滿地紅，並已同意響應同盟會革命起義。又該縣東路之丰稔市、藍家渡、泰坂一帶，文化發達，知識分子甚多，亦皆熱烈參加革命。故光復前，上杭的革命高潮不亞於其他地方，革命勢力也相當雄厚。

革命軍光復上杭的策略和部署

當時革命軍估計，清軍兵力強大，踞險固守，難於攻取，革命軍只有發揮革命犧牲精神，利用炸彈威力，越險進城，與敵人肉搏，作孤注一擲；同時加強宣傳，造成聲勢浩大、四面楚歌的氣氛，以瓦解敵人。蕭文賞決心親率精銳四十人編為先鋒隊，把宣傳、組織、戰鬥三重任務都集中在先鋒隊身上。具體部署是：派出千藤同志攜帶簡明的宣傳大綱，超越先鋒隊前頭數十里，作宣傳和組織工作，並發動鄉民立刻向前面鄉村接力宣傳，使革命軍到達上杭縣城以前，城內即發生震動，迫使清軍投降。另派出會操縱渡船及善游泳的同志先行出發，到上杭城偵察渡河船隻，暗中加以監視和控制；若在夜間，必須把全部渡船控制在河之南岸。

光 復 經 過

十月初三日，蕭文賞率領革命軍先鋒隊由永定向上杭進發，沿途加入革命隊伍的同志愈來愈多，力量發展異常迅速，到東門渡河時，新參加的同志有三點會蘇延壽（永定人，光復後長期擔任福建第二師師長）等數百人。

革命軍先鋒隊於十月初五日傍晚到達上杭南岸，乘夜渡河，直

抵东门。見城門緊閉，城上有兵把守，即令开城投降，不得阻碍革命軍行动。城内表示，已准备明晨开会欢迎，不加抵抗，現推上杭中学監督某和中学教員涂演凡(原名葆瑩)出城代达城内真意。萧文薰与涂演凡原是老友，即同意城内代表出城相見。萧接見城内代表后，託中学監督先回城准备欢迎，并要求全体中学生参加欢迎大会，协助革命軍工作。当晚留涂演凡在部暢談，并防有变。

十月初六日，革命軍入城，直抵县署。清县知事、清軍管带等在大堂迎接。旋据中学生报称：清軍樊协、易协已逃，清軍藏匿弹药很多。萧文薰即令知县繳出印信錢粮，令管带繳出武器弹药，不准隱匿。要求中学生协助革命軍做好一切工作，并接受中学生意見，在阳明公祠設司令部，全面搜查清軍軍火，并即将繳获的毛瑟枪一营多装备革命軍。当时城内公务人員、学生、医生、商人紛紛投軍，工作十分活跃。

初七日举行光复大会仪式，成立軍政府，推涂演凡为軍政部长，原上杭知县龔时富(浙江籍，举人)为民政部长，商会会长为財政部长，教育会长为教育部长。

光复上杭后，对清軍作出了一些措施：(1)宣传革命軍紀律，飭令他們繳械投降，解释殷哨官在永定被杀原因；(2)征求他們各人意見，去留由他們自由选择；留則要同甘共苦，不怕牺牲；去則准他們带齐家小財物，每人发給十元，資遣回籍。

温开元事件

十月初七日，苏延寿忽被当地三点会領袖温开元拘捕，萧文薰派人向温劝說，温才把苏延寿送回阳明公祠，并燃鞭炮道歉。但苏延寿郁郁不乐，对温怀恨在心。

初八日，溫開元在城外集合三點會武裝會員，號稱三千人，要求進城駐紮。革命軍方面據城內居民意見，認為現在城內秩序良好，太平無事，無須許多隊伍擠在一起，予以拒絕。但溫部不採納革命軍方面意見，仍陸續進城，設司令部於縣署。大約到初十日，又忽報李宗堯帶大隊人馬來到南岸，革命軍警戒部隊不讓他們渡河，接着蕭文贊親去觀察，旋歡迎李部入城，同駐陽明公祠司令部內。

至十月十一日晚，李宗堯宣稱，據報溫開元部人員強取商店的紅綢、紅緞、紅布，不給價錢，並企圖進攻革命軍，命蕭文贊、蘇延壽、黃舉才（大埔人）三人去誘捕溫開元的參謀長楊百震（大埔三河人，大埔官學學生）在聯軍司令部訊問。正在訊問之際，李宗堯抽出戒刀把楊百震殺死，並命令蕭文贊和蘇延壽指揮部隊向溫開元進攻。蘇延壽一馬當先，把溫開元擊斃，當晚傷斃及俘虜溫部三百餘人，把溫部全部擊潰。這就是李宗堯製造事件剪除異己的一種做法。

（五）革命軍在長汀的失敗

光復長汀的策劃及其變化

革命軍光復上杭後，即開始策劃光復長汀工作。長汀是閩西的府城，清軍兵力也較大。故決定動員先鋒隊同志及上杭各界領袖人物派人帶信去長汀進行宣傳，要求長汀各界和大埔、永定、上杭一樣，響應革命軍做好歡迎工作。正在考慮出發長汀日期的時候，李宗堯忽令蕭文贊回永定、大埔做支援前方的工作，所有部隊由李率領去光復長汀。蕭即率領志願回永定、大埔的先鋒隊員三

十多人回大埔。不久，李宗尧把上杭所有武装部队和他自己由大埔带来的武装部队由他率领出发长汀，赖凉血随李出发，苏延寿则留在上杭。

李宗尧的阴谋和革命军的失败

李宗尧自率队从上杭出发之日起，直至到达长汀目的地，他的反动面目就愈益暴露。他所作所为与大、永、杭革命军永定、上杭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且无人敢揭露其反革命的阴谋，任其发展，以致造成革命军在长汀全军覆没的惨败。

李宗尧率队向长汀进军的时候，沿途不出安民布告，不宣布革命军纪律，不作革命宣传，蔑视欢迎群众，引起群众极大反感。到达长汀后，他拒绝各界的欢迎革命军大会，不接见前来拜访的代表和居民，不派员和任何方面联系，引起长汀各界的惊讶。他只知道接受商会每餐送来的膳食供应，并不向商会道谢，也不与商会洽商供应计划，解决部队给养问题。他既不举行光复仪式，建立军政府，也不令清政府缴出印信、钱粮、档案，对地方上政权机关、人事安排、地方秩序，都一概不问。他既不令清军投降缴械，与清军洽商编遣、驻防、地方治安等问题，自己也毫无作战准备，亦无警戒部署，又不与官兵谈论军事问题，只知独断专行。

革命军到长汀后第二天，革命军同各界仍然是不相往来。群众感到不解，相率前往革命军司令部围观，一时人潮十分拥挤，李宗尧驱之不散，而且愈来愈多。李宗尧遂亲自向群众队伍中投掷炸弹，炸伤了商会会长的儿子和许多老百姓。于是全城人心大乱，纷纷认为大祸临头。李宗尧忽派赖凉血到镇台衙前广场演讲革命，并给赖泥制的假炸弹，作为赖的自卫武器。赖照大、永、杭革命军

所作宣传綱領、革命軍紀律以及具体措施演說一番，引起羣众很大兴趣，把鎮台衙前挤得水洩不通。当时清軍想驅散羣众，叫賴涼血停止演說，賴坚决拒絕。清軍揚言开枪屠杀，并向天空連放排枪示威，羣众被吓散去。賴不知炸彈是泥制的，向清軍擲去，因而當場被捕，隨即在衙前被杀头示众。由此，显然可以看出此舉系李宗尧故意向清軍挑衅，借刀杀害革命同志的阴謀行徑。

不久，全城响起了枪声，清軍包围了革命軍，向革命軍开火了。在这紧急关头，李宗尧不下命令，不作决定，不攻，不防，不冲，不退，不降，不和，任由各人作无組織的消极抵抗。当时革命軍本身无顆粒粮食，每餐全靠商会送飯，自开火以后，商会停止送飯，革命軍遂断絕飲食，忍飢挨餓。清軍和居民了解这种情况，知道革命軍已无抵抗能力，即于当晚停止攻击，大开城門，点亮灯火，号召革命軍退出长汀，保証生命安全。李宗尧至此仍不表示态度，而革命軍一向慑于李的殘暴淫威，亦无人敢退，无人敢降。相持到第三天，李宗尧見全軍疲憊不堪，已失去抵抗能力，遂乘隙脫去外衣（藍縷紗的絲棉长袍），只身潛逃。

长汀失敗时，維新派也遭受到一些牺牲。刘藹士（长汀中学教員）被人認为勾結李宗尧，當場被捕杀。郭震珊（跟李宗尧由大埔出发到长汀的）見李已逃，把李宗尧遺下的絲棉长袍穿着，沿城跟向城外退却，被清兵誤認為李宗尧，集中火力射击，因而牺牲。至黃荆石和陈秋初二人則僥倖逃回大埔。

长汀之役，革命軍方面在李宗尧阴謀策划下，遭到慘敗。除少数只身逃出外，几乎全軍复沒，无一倖免。

李宗尧当时三十岁左右，自称是山东回民，因革命失敗，逃难而来到广东。他不知通过何种关系，取得大埔青溪育德小学校长

涂省斋(維新派)的信任,被聘为該校体操教員。平时生活神秘,从来不与人談話,不看书报,不与人共飲食同居住。每天住宿无定所,居必居樓,樓不設梯,一跃而上,并帶戒刀自卫。有人來訪,輒不着边际就跑到操場去翻杠子,耍武术,使人摸不着头脑。一般人疑心他是因习性与人不同或为保持革命秘密,因而不深究他的底細。維新派为他的神秘所迷惑,推荐他为軍政部长。他相貌凶恶,膂力过人,其破坏革命,都在不动声色中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如:在大埔光复的第二天,突然杀害广东新軍同志;永定光复后几天,突然把清軍降将殷哨官解到永定杀害;上杭光复后几天,突然杀害三点会首領温开元和他的參謀长楊百震,消灭其武装,并令革命軍司令蕭文賞回永定、大埔而夺取联軍武装部队。在上述事件发生时,皆疑其性情粗暴、不学无术,不虞其是政治奸細。及涂演凡和蕭文賞先后参加广东北伐軍經理局工作,涂在南京才从报刊和軍事情报上确知李宗尧是袁世凱北洋軍队現任騎兵第四团团长,始知李宗尧是袁世凱派遣的軍事間諜,通过維新派的关系,打进革命队伍来从內部破坏革命的。他的一切罪惡行为都是有計劃有意識的政治阴谋,不是偶然的。

梅州光复回忆

温 翀 远

梅州(即今梅县)光复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所发动和完成的。它与饒平和黃崗起义有着历史的联系,所以本文从饒平、黃崗起义写起。当时同盟会的核心在松口体育会,革命人才的培育锻炼,也是在体育会这个名义下进行的。后来梅县光复,体育会的人就起着一定的作用。各地起义乃至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体育会的学生也都有人参加,其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为了说明历史的因果联系,本文对体育会的叙述给予了较重要的分量。

饒平、黃崗起义失败原因

一九〇五年冬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首先派回岭东地区从事革命联络运动兼主盟的,当以謝逸桥为第一人。謝逸桥嘉应州(即今梅县)松口人,家为华侨巨富。一九〇六年一月,謝逸桥回到家乡,行装甫卸,即与温靖侯(松口人)同赴长乐(即今五华)联络张谷山、李济民,兴宁萧惠暢,平远林魯传、姚希尧,鎮平(即今蕉岭)丘仙根,大埔郭志陆,上杭丘学尧以及州属比较开明、在地方上较有声望的人士吳登初、卢耕甫、江栢坚、謝魯传等。时值松口师范学校开学,謝逸桥、张谷山、温靖侯均在校担任职务,至秋该校毕业时,选择学生中较有革命意识的丘映美(即丘哲)、

陈笑桥、温狮远三人加入同盟会，还有梁龙也在这个时候入盟。以前到各县联系的人除张谷山加盟外，其余都是口头赞助，未曾加盟。是年冬，张谷山到广州（住旧仓巷凌霄里）与当时新办的学校学生联系，已取得相当成就。同盟会认为凭这些力量，可以作起义尝试。

一九〇七年一月，东京同盟会派陈芸生发动饒平起义，党人张喻人、郭公楫、梁鸣九、李思唐四人参加，并通知谢逸桥，由谢派丘映芙、陈笑桥、温狮远到潮州府城共谋起事。当时陈芸生的主要力量，系以洪门会为基础，由于缺乏组织和纪律，在饒平凤凰山指定地点集合时，尚未集合完毕，已纷纷散去，此役就此告终。

饒平起义失败后，张喻人、郭公楫、李思唐、梁鸣九和丘映芙、陈笑桥、温狮远回到松口，张、郭、丘、温四人旋即前往松源、上杭等处从事宣传工作，并在上杭师范学校内发动一些学生参加。同年四月，许雪秋又由同盟会派回汕头，在饒平属之黄岗起义，又派熊越山、乔仲生协助，郭公楫、温狮远、李次温亦参与其事。此次起义，比较成熟，支持了五天。到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了一营水师到汕头后，因估计不能一战，又各自散去。黄岗起义也就这样失败了。

松口体育会设立的由来及其对革命所发生的影响

饒平、黄岗两役失败以后，谢逸桥发觉进行起义，如果没有训练士兵和指挥军事的人才，就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于是商同温靖侯起而组织松口体育会，作为集中党人初步训练的学校，即以温靖侯父亲新建而未迁入之广厦及新建之温氏精庐为校舍。恰好其时广东陆军中学有一批已经加盟的学生姚雨平、张藤村、张则通、张

莘田、廖一通、廖挺伦、陈次牧等退学回家，在日本留学的林修明、温奋立等人也回乡，与谢逸桥等会商之后，均集中到松口体育会当教师。学校就这样办了起来。根据学校设立目的和当时革命要求，校中设了专修、普通、简易三科。党人及准备联系的志士编入专修科，文字较有根柢而愿从事教育事业的编入普通科；各路洪门会的青年准备参加革命工作的编入简易科。专修科教以战术、筑城、行军、攻击、战斗等军事知识和技术；普通科教以一般体育动作；简易科教以持枪、射击各项技术动作。自从有了这间学校，并将学生训练出来之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就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学校还没有固定经费，但学校采取了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从事革命运动的方式，克服了困难，收到了效果。等到结业之后，梁鸣九、张藤村、姚雨平、谢良牧就分别到广州、香港等地与各方联系，作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同时与州属党人互通声气。在此前后，李少枚在香港组设了梅州商学公所，作为接待回国华侨党人的机关（招待处所设在他开设的公同信字号内，温生才、陈敬岳、林冠慈经香港时均曾在此受到招待）。在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以前，曾伯谔在广州高第街设了梅州瓷器公司，作为党人联络的处所。他们与谢逸桥等互有联系，对于梅州以及其他各地的革命运动都起到支援作用。所以后来河口之役、新军之役、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直至武昌起义，都莫不有体育会的人参加。其中如林修明、周增因参加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而牺牲，郭典三、李济民也为革命斗争献出自己的生命。其他如廖叔唐、黄嵩南、叶菊生、古公愚、张作新、梁树谦、梁伯仰、林一声、丘映芙、温翀远，以及大埔林露凡、郭志陆，上杭丘仰飞等人，都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骨干。

梅州光復的情況

松口體育會結束後，梁鳴九得到南洋親友接濟一些款項，在松口鎮設了一間米舖，作為來往黨人接待及內外通訊機關，主持人為丘映芙。

當時革命力量除聯絡青年、擴大隊伍外，主要還是與洪門相結合。其時在梅東擁有勢力的洪門如許亞能、黎亞常、曾國歐，以及鎮平曾吉夫，長樂張玉堂均受到革命影響，願為革命效力。

武昌起義以後，形勢急轉直下，黨人李思唐、溫翀遠、廖叔唐接得香港黨人指示後，就加緊在本屬籌劃光復工作。約一個月左右，籌劃初步就緒。廖叔唐在州城得到擁有商團武裝的鄧華甫的贊同，準備及時舉事。溫翀遠、李思唐就在松口調動原洪門會的人馬約三百人，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由松口晝夜馳赴梅州準備以武力摧毀清朝統治。恰巧鍾勁、曾涌甫兩人於十一日晚回到州城，說服了巡防營管帶熊佐臣（本縣泮坑村人）同意放棄抵抗。等到十二日正午溫翀遠與李思唐率隊到達州城時，城頭已經掛起了青天白日旗，宣告和平光復了。曾涌甫任總指揮，鍾勁任秘書長，鄧碩甫任軍事，鄧華甫仍統率商團。溫翀遠、李思唐所率之松軍隊伍，則駐在城隍廟一帶。此為梅州光復初期情況。

越二日，即十一月十四日，熊越山率其舊日在汕頭聯絡的志士二十餘人由興寧返抵州城，發現光復後的州城毫無革命氣象。他曾在松軍辦事處憤激地說：“辟生（鍾勁別字）一個書生，沒有革命氣魄；曾涌甫少不經事，那能領導革命！”言罷，即向松軍取去手槍五支，率其同來志士直趨舊游府衙門，把壓迫人民多年的游府白如鏡槍決了，並沒收其所藏的銀器兩箱，抬到明倫堂交由總指揮部接

收。接着熊越山就清算知州陈寿璃所掌管的庫存，清算出白銀五万余两，隨取得存放商号刘振大所出之提单一紙收執。临行之日，熊越山就将这些提单完整地交給温紳远。越山在州城時間极为短暫，但其行动却如飄风疾雨，扫过梅州，使人震动。

十五日，松軍看見曾涌甫、鍾勁等人沒有安排松軍打算，温紳远就亲到北門“冷圃”見鍾勁，說明松軍來城目的是为了光复州城，現在州城已經光复，目的已达，队伍應該回到松口，并将清算出庫存五万余两情形告知。商量之后，鍾勁同意在庫存五万余两內提出一万五千元，作为松軍暂时給养以及清償松軍筹备光复时所借債務之用，其余庫存交由鍾勁作为維持州城費用，同时并发給了毛瑟槍四十支（十支交西洋，十支交丙村，二十支交松口，作为維持地方治安之用）。十七日，温紳远、李思唐便率松軍回到松口。

梅州光复以后，在曾涌甫、鍾勁行使职权时期，由梅屬三十六堡各选派代表二人組成州議會，并由州議會选举卢耕甫为州长。梅州光复，至此本可告一結束，但却意外地发生了一場风波。

二月八、九日左右，曾涌甫、鍾勁与邓碩甫失和，急于离梅，打电报給温紳远、李思唐回城主持。温、李二人如約到城时，邓碩甫已被扣留，而曾、鍾則已离去。此后一段時間，县城秩序由温、李負責維持，邓碩甫問題交由州議會和平解决。

温、李在城时，曾制止洪門会张星伯部下向商家打单勒索的騷扰行为，消除了廖叔唐率領巡防营維持社会秩序时与惠軍所发生的誤会。秩序已定，这一临时任务就交由州长卢耕甫及州議會組織人員接替。廖叔唐、温紳远隨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庆祝孙中山先生就任总統职之翌日回到松口。

卢耕甫是当时梅州的上层人物，不是革命党人，他的当选显示

出同盟会組織力量的薄弱和党人对于革命意义認識的肤浅。他們以为推翻了清朝統治,便算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万事大吉了,所以政权就落到卢耕甫手里。曾經使人惊心动魄的革命浪潮,轉瞬之間竟消失殆尽了。至于后来陈炯明派钟景棠来梅县当督办接替卢耕甫职务,那就連一点革命气象都沒有了。

梅州光复后党人的动向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組織就很涣散,一切革命活动可以說全凭党人意气相号召,而无紀律約束,其参加与否,大都依其本人自行决定。結果,使領導人很难确实估計和掌握自己的力量,約定行动往往及期改变,出現步骤凌乱的現象。全国光复以后,由于同盟会对于党人沒有怎样关怀,于是他們就各自寻求出路去了。有的人出洋謀生,有的人回到教育崗位;另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如廖叔唐、陈偶修、黃嵩南、温神远、郑任良、温泰华、謝嵩生、謝达夫、丘健軍、李果、林根、廖叔夫、张英士、吳雨蒼(倚滄)、謝适羣、梁龙、饒士彝等二十人,則由广东省公費遣送到日本、欧美留学去了(当时遣送去日本的四十八人,遣送去欧美的二十一人,嘉属地区被派遣人数几占总人数百分之三十,可見当时这一地区参加革命人士不少)。同盟会原来就組織涣散,到了这个时候,党人各自为謀,与同盟会联系无形脫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怀念的几位死友

謝逸桥——辛亥革命时期,曾出錢出力,事成之日,不自矜伐,不求仕进,讀書作画,以終其生(謝之墨兰,造詣頗高)。一九一八年粵軍将入閩时,中山先生巡視到大埔县屬之三河坝,事毕,探知

該地距松口不过数十华里，而謝逸桥、謝良牧兄弟又适在家，因即挈胡汉民专船赴松口造訪，駐节在謝之受春楼上，盘桓数日，曾集中松口中小學生讲述革命立身大道，并为該楼作一联，文曰：“博爱从吾志，宜春有此家”，且为之亲书以贈。孙中山先生对謝氏兄弟眷念前劳，不遺隱逸，其情感之深厚如此！

熊越山——家非富有，对財物取予极严。梅州光复时亲手清算出庫存五万余两，分文不取，連自己旅費也不动用公款。后于二次革命时在汉口牺牲。

温靖侯——为办理松口体育会，不惜冒巨大危險，将自己父亲的藏书精庐及新建广廈作为校舍，使革命人才得以培育，革命思想得以传播。

上述諸人，其所具有的高尚革命品德，昭昭在人耳目，故乐书数言于此，以志不忘。

欽县三那反抗糖捐斗争与欽防之役

罗 綬 章

三那反抗糖捐斗争

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欽廉道王秉恩欲兴办欽廉法政学校,除原有苛捐杂稅外,特設局开征糖捐,規定当地出产蔗糖須先繳納稅款,方准出售。欽县东部的那丽、那彭、那思合称三那,土地肥沃,农民多以种蔗榨糖为业。政府开征糖捐后,加重农民負担,激起公憤,羣集反抗,那彭人刘思裕素有革命大志,热心公益,向为乡人敬仰;他极力支持反抗糖捐斗争,乡民便推选他为抗捐領袖。他曾在那彭圩边的鸡儿坪集合农民数万,痛陈清朝官吏魚肉农民,致令农民无以为生,并当场率众歃血为盟,立誓不繳糖捐,抗拒到底,声威日盛,大有燎原之势。时黄兴在越南,偵知这事,得欽县人兴中会会员梁紹廷、梁建葵等为向导,間关潛入三那与刘思裕接洽,共商进行計策。还有女党员数人同时潛入,其中有庄汉翘住在刘思裕家中,与刘妹結拜为姊妹,共同策划革命工作。革命党人特由越南秘密运入駁壳手枪,以充实斗争实力。由于有了革命党人的策划协助,三那反抗糖捐的斗争,声势日益壮大,直接参加斗争的民众約达二万人。欽县西部傍城乡人士郑六奇、邱逢周、秀才陈紹仪,以及县城附近水鴨塘乡秀才赵知章也都起而响

应,到处宣传,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捐斗争。附城平山乡团总陈鴻畿、黃家通等亦暗中策划,鼓励羣众参加,羣众便公推陈鴻畿为抗捐副領袖,在平山乡雷庙后边的大草坪聚众歃血为盟,誓与三那羣众一致行动,坚持斗争到底。当时該地参加抗捐运动的羣众发展到二万人。

三那反抗糖捐运动日益扩大,收捐的稅吏有被羣众杀死的。翌年(光緒三十三年),清政府派地方紳士前往劝諭无效,粵督周馥为緩和民憤,特下令免收糖捐。但三那民众洞悉清政府这些措施是虛伪的欺騙手段,不肯罢休,仍繼續反抗到底。清政府在运用欺騙手段失敗之后,便采取強硬的鎮压办法,派統带宋安枢率領配备有开花火炮的队伍向三那进攻。黃兴和刘思裕等为了引敌深入,聚而歼之,于接战之初,便布置队伍佯装敗績,敌军进入險地,即以駁壳枪队集中火力反攻。宋安枢大敗,潰不成軍,狼狽退回县城。粵督又派何长清率队前来鎮压,长清畏惧,不敢出战。粵督另派郭人漳带兵千余人携带开花火炮,由海道至北海登陸,由廉州进攻三那,并調广西一营协助。郭人漳乘三那障地尙未巩固的时候,用机枪猛攻,并用开花火炮击中当鋪炮樓三那队伍的指揮部,刘思裕當場成仁。

欽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帝誕,全城大小官員都齐集圣庙里面致祭,附城抗捐副領袖陈鴻畿曾密約东部三那、西部傍城于这日围攻关帝庙,将大小官員一网打尽。不料消息洩漏,是日官員不到关帝庙致祭。陈鴻畿、黃家通等不知事机洩漏,又不等待东部三那和西部傍城的队伍到齐,便先树旗率領队伍进攻县城(当时郭人漳正在围攻三那,所以三那队伍不能如約来攻县城)。事前刘永福曾答应陈鴻畿等,起事时可以枪枝子弹相助。可是陈鴻畿等已举

事后,刘永福鉴于东西两路的队伍未到,附城队伍孤单,难以成功,便不允借出枪弹。附城队伍人数不多,枪械又少,仅有单响毛瑟旧枪及大刀、长矛、锄头等,攻城不下,城内官兵又闭城不出。郭人漳打败三那起义队伍之后,即兼程前来解救欽城之围。城内清兵见援兵到,便开城冲出。攻城队伍受到内外夹攻,陈鴻畿、黄家通等奋勇苦战,壮烈牺牲。西路郑六奇、邱逢周等率队伍到达时,攻城队伍已被打败,孤军作战,亦被清军击散,秀才赵知章、陈紹仪被捕后大罵奸贼,从容就义。赵知章就义时还吟诗一首,中有句云:“为国牺牲非白死,人心奋起定亡清”。

欽 防 之 役

郭人漳镇压三那反抗糖捐斗争后,得到清政府的奖励,升任欽防边防督办。清光緒三十四年,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革命党人认为争取欽防地方为革命根据地,已有必要和可能。黄兴与郭人漳有同乡之誼,又平素相稔,便由越南冒险到欽城訪郭,晓以大义、劝他投身革命,共同推倒清政府。郭人漳表面上似大为感动,并立誓革命軍一到,即行响应。黄兴以为郭人漳真诚投靠革命,即回越南帶領党人,由芒街渡北崙河过东兴,分駐竹山、江平、企沙一带,乘夜直扑防城。县兵略作抵抗,不支而退。党人攻占县署将县知事宋漸元及其家人杀死。党人略事部署,即由防城分为大直、金鸡塘两路进军,会合于欽县西部傍城乡,直扑欽县县城西部,滿以为郭人漳必居中响应,唾手可占据欽防地方为革命根据地;加上郭人漳所部千余兵力,揮軍北上占据灵山、横县、貴县,掌握西江的上游,再順流东下,則革命前途大有可为。可是当黄兴率領队伍由防城进军至欽县城西一带的时候,郭人漳在城中毫无举动,便屯兵于老虎

山,以观动静。

郭人漳对黄兴的誓言,实非出自本心,不过为一时权宜之计,并不是真诚投靠革命。当革命军进驻老虎山后,郭人漳即派人往见黄兴,劝阻革命军进城,以免发生冲突,并献计进攻灵山。黄兴不知是计,便挥军北上进攻灵山。正当革命军围困灵山县城,即将攻陷的时候,郭人漳得悉革命军兵力单薄,且孤军深入,便背信弃义,由欽县调兵会同灵山清军夹攻革命军。革命军内外受敌,终于惨败,只得退入十万大山,间关走回越南。

化州光复前后十年見聞录

彭中英

本文叙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公元一九〇二——一九二〇年)化州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化州起义經過等情况。事过境迁,挂漏自所难免。我仅就回忆所及記錄下来,借供参考而已。

(一) 辛亥革命前的化州面貌

政治概况

化州又称化县,清朝属高州府,县长叫做县知事,保卫县知事的警卫队設有百长、十长,直属县知事领导。保卫地方的有駐防营,直属高州鎮台领导,当时駐防化州的是第十三营。

县知事深居簡出;如外出,沿途的人民都要肃静迴避。人民不是訴訟或受审,就永远不能进入衙門見到县知事。人民見到县知事就要远远地跪下去,不能仰視。农历每月初一日早上,县知事要到孔庙去礼拜,此外只有被地主豪紳請往勘驗案件或其他公务,县知事才离开衙門。县知事之下,掌握地方政权的有公局长和各乡正。公局有局兵,称为局勇;乡有乡兵,叫做乡勇;成立有团練的,叫做練勇。所有局勇、乡勇、練勇,都是由公局长、乡正指定,有事时召集应差,无事就务农。光緒年間化州局勇、乡勇、練勇所使用

的是噫粉洋枪或土打粉枪。到了宣統年間，才购买了一批九响洋枪，由練款购来的为团練所有；地主私人购来的属私人所有，遇有事时由練勇使用，无事时由地主保管。公局长不仅操纵了一县人民的生杀权力，而且垄断了一县公产的經濟命脉。化州有宾兴义仓，每年收几万石租的公产，完全由公局长掌握，年中收入任意归己，不用公布收支数目。如陈錫九、陈敬堂本来是穷秀才，做了公局长后就购置了几千石租的田地，在各市鎮開設了几十間當舖。公局长贪污枉法，如有人过問控告，反会受罪入獄。曾有一姓洪的拔貢(花名劲貢)因告陈錫九，不但功名被革，而且入獄致死。李屢正是族大有勢的举人，因告陈敬堂而入獄，直至辛亥年化州起义后才得释放。由此可見当时化州公局长的权威及其神通之广大。乡正执掌一乡的行政治安、“攻匪保良”、排难解紛等职权。乡民如发生紛爭，首先投訴乡正，双手奉板榔，双膝下跪，还要办备酒席，請求排解；如排解不了，要备好訴状，僱轎請乡正帶去县城拜見公局长，同样双手奉板榔，双膝下跪，乞求解决。如公局长答允，糾紛即可解决；否則，被告为盜匪的就要入獄，糾紛案就要到县衙門告状，迁延时日，往往因而家破人亡。公局长、乡正、地主三位一体，为虐人民。

化州姓族众多，最大的是陈、李、彭、黃、张五大族，都具有丰富的祖尝，用祖尝来奖励买功名捐品級，以功名多、功名大，品級多、品級大为姓族的光荣。科举时，地主子弟便买通关节，取得秀才举人等功名。化州的秀才、举人，多属于这类。捐品級方面，捐二、三品候补府道的較少，只有陈寿庚、陈家丰等几家大地主；捐大夫、候补知事的也不多；捐貢生、监生、买考举人的比較多。大地主陈星榆、陈希甫等举人就是买考得来的。一般地主、富农捐监生、捐九品的很多。捐了监生或九品就称为老爷相公，見官不用跪拜，又得

收祖崇花紅，有利可圖。中農也有捐九品的，有的連幼兒也捐九品，我本人就是個例子。我父親原是中農，他不但自己捐了九品，我年方三歲時也捐了九品。捐九品出錢七千，收回祖崇花紅津貼共有一、二千，春秋二祭又到祠堂領取胙肉，真是名利雙收。捐了九品見官不用下跪，同時又可以駛牛挑糞；如被人陷害或被誣告匪案，審判官、公局長和鄉正都要慎重處理。一般中農多不願捐監生，因為捐了監生就不許勞動，不得駛牛挑糞。

光緒宣統年間，除上繳朝廷的正稅外，地方征收的苛雜稅很多，如屋梁稅、人頭稅、牛只稅等等，名目繁多，甚至担東西上市都要納稅。如捐稅繳稅不清，就要判罪入獄。人民為生活所迫，既不愿坐待餓死，只好挺而走險，投入綠林，因此盜賊蜂起，投入洪門會、三合會的越來越多，搶劫之風也越來越盛。洪門會和三合會性質大致相同，都是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參加的多是被壓迫農民，也有少數知識分子及土匪流氓參加。入會要經過歃血為盟、過劍門等儀式，每人繳二百文會費，叫“兩條草”。入會後發給一本小冊子，內有會中秘密的暗語，不准洩漏。會中制度很嚴，違者要受嚴厲處分，甚至喪命。會黨盛時有些地主紳士也被迫參加。在光緒三十年前後，洪門會、三合會所用武器大多是雙刀戈矛，到了宣統年間，他們從地主豪紳手中奪取一些隱粉洋槍來武裝自己。後來地主豪紳所購置的九響洋槍和十三響洋槍也有不少落在他們手中，因此聲勢日張。地主豪紳見形勢不好，便築起礮堡，建起堅固的房屋以自保。這樣一來，要打劫地主豪紳就不容易了，只得搶劫農民的耕牛牽到廣州灣赤坎出賣，再將所得款項買回駁殼槍及各種手槍。每年十月以後，夜間常聽到被劫者求救的呼聲，使人心驚膽寒。盜賊蜂起，劫案很多，公局長和鄉正等也多了一條發財大道。有錢賄

賂,虽匪可保;无錢賂賂,好人也要受罪。

記得我五、六岁的时候,听到一个地主婆花大奶对一个老佃农廖家达說:“曾國藩打败了洪秀全,我們松一口气了。搶劫虽多,天下总不会大乱了。”那位老佃农却說:“大奶呀,我怕更乱得凶呢!天下乱不是乱在洪秀全,而是乱在肚子餓呀!”过了几个月,就听說癩渣尾(造反的首領的花名)造反,从化州北部广西边界直下茂名、吳川、电白等地劫富济貧。高州六县,人心惶惶,奔走逃避。后来听說这支队伍是太平天国失敗后遺留在两广边境的殘余部队,不久被清兵打败,便散在高州各属地方,結合当地綠林,并由广州灣购买不少駁壳手枪,此后搶劫队伍和武器就越来越強,投入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光緒年間,打家劫舍都是夜間进行,日散夜聚;到了宣統年間搶劫之风益熾,公开向地主豪紳富商打单勒索,擄人贖票。过去洪門会、三合会采取秘密形式活动,这时候已公开发展了。

化州邻近广州灣,化州人到广州灣謀生的很多。自从法帝国主义侵占广州灣后,利用它作为侵略我国的基地,对我国内地走私漏稅,进行經濟侵略;收容土匪流氓地痞,販卖軍火,助长我国内乱;開設烟館、賭場、妓院,麻醉我国人民。化州人有的为生活所迫,到广州灣去做咕哩(搬运工人);有的为了貪图暴利,去販卖鴉片或販运私貨;有的到那里去嫖賭飲吹,过腐化墮落的生活;还有些年青女子被誘拐去卖给妓院当娼妓。广州灣成为盜賊的大本营,出售贓物,购买枪械,使化州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有了逃避的地方,因此助长了化州社会的动盪混乱。因为这样,当地人民对法帝深为不滿。法帝侵占广州灣时,附近农民曾起来进行斗争,后来因为清廷向法帝妥协,鎮压了农民的反清斗争。因此,化州人民的反帝斗争便与反清斗争联結起来,成为促成化州起义的有力因素。

經濟和文化教育

化州除农业和商业两种基本經濟外，还有家庭妇女的手工业和农闲时农民打铁及木匠等一些手工业經濟。农业生产就田地来划分，可分为鑑江沿岸和山区坑埗两部分。全部田地中，有几百石谷租的田地属于兴义仓的公产，其余属于大中小地主和富农所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佃农只依靠向地主和祖尝(死地主)批耕田地过活。鑑江两岸和山区的田地更連年遭受风、虫、旱等自然災害，很少得到丰收，占有田地的收租人不管自然災害如何严重，都要依照租約收足租谷。年成較好时，佃农終年辛苦所得除納租外，所余无几；如遇失收，便要借貸納租。在災荒的年月里，地主还放高利貸，提高谷价，乘机加重剝削农民；气力強壯的农民还可以代地主做长工或短工，或上山砍柴，或外出担貨、推車、抬轎，勉强維持生活；体衰力弱的只得挨飢抵餓，求乞过日。光緒宣統年間，我亲眼見到十多个村庄的农民餓死或逃荒，居住着一百多人的村庄，十年間变成树林，很多耕地被丢荒了。

化州县城是全县的商业中心，有苏杭业(布匹雜貨)的商店两間，中葯材鋪四、五間，紙料兼海味商店三、四間，山貨木器商店四、五間，四間大當舖，还有一些魚肉攤販以及从广州灣走私漏稅来的洋雜攤販。苏杭业商店除出售本国手工业生产的貨品外，还有些从广州灣走私进来的一些洋雜工业品。城中較大的商店大都是大地主經營的，小商店是中小地主經營的，沒有純粹經商的店主。全城各行业中以當舖获利最大，月息固定二分。每逢双日为集市日期，各乡村农民担农产品来市集交易，其中以食米为大宗。农民出售的食米，是向地主买谷来加工的。此外，还有芒柴、鸡、鵝、鴨、猪

及手工业产品等。农民出卖了自己的东西之后，不是买米回家，便是到当铺去贖回往日所当的衣物。每逢市集日期，当铺生意特别兴旺。

当年交易以文钱为单位，一千文铜钱等于银元一元。十年间稻谷每石(十斗)由一千文涨至三千文铜钱，猪肉每两由七文涨至十文铜钱。贫苦农民代地主、富农做一天工，得铜钱二、三十文，仅能买得个人的一碗米粮，而且很难找得工作。农民出售的柴、鸡、鹅、鸭等价钱既低廉，又不易脱手。因此一般贫苦农民很难维持生计。

根据清朝官方统计，化州有四十万人口，百分之八十是文盲，仅地主富农和一部分中农的子弟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化州县城只有一间龙文书院，是全县地主豪族子弟求学的最高学府。此外，在乡村有地主富农设立的私塾。私塾有两类：一类是比较高级的临时私塾，地主富农有子弟读书时才设立；另一类是普通私塾，所读的书本是四书五经之类。能入私塾读书的只有地主富农及一些上中农的子弟，一般农民子弟因生活困难，大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地主富农送子弟读书，为的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回祠堂领取猪肉，考不得秀才也是斯文相公，不被人欺，且可欺人。

光緒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化州龙文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招收甲乙两班学生，四年毕业。到了光緒三十四年，高等小学堂继续招收丙丁两班学生，我考入丁班。甲乙两班学生毕业时好象考中秀才一样，穿着秀才袍，戴着秀才帽，簪花挂红游泮池，拜客送扇领花红。李佩卿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化州，便在祠堂门前竖起两支旗竿，演戏宴客收礼金，好象考得举人一样威风。

法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传教，在化州各地建立

基督教及天主教等教堂，引誘一些思想落后、为非作歹的人入教，麻醉国人思想，并利用教徒进行間諜活动。光緒年間，化州入教的人还不多，到了宣統年間才逐年增加，一般官僚地主豪紳及坏分子爭先投入教会，利用教徒的名义来为非作歹。教徒虽犯了大罪，也可借教会的撑腰而免受刑罰，因此入教的人数增多。化州教徒作恶多端，一般农民有冤无处訴。因为教会引誘和包庇坏人入会，欺压人民，所以人民反教会的斗争經常发生。如西冲村就曾因教徒強奸妇女和霸占地产，引起人民对教会的反抗和斗争。教会遇到被人民攻击时，常向清政府求救。清政府以保护教会和外人生命财产为詞，也常帮助教会压迫人民。所以人民与教会斗争，多告失败，教徒的气焰反而更高。如陆田村大地主柯子兰因打死农民鬧官司，官府乘机要封他的财产。他向教会求救，办了入教手續，教会替他出来说話，官府便无可奈何。

(二) 辛亥革命化州起义的情况

清朝光緒末年和宣統年間，化州人民在封建勢力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和剝削下，飢寒交迫，无以为生，迫切要求革命；可是由于沒有正确的领导，他們便自然地盲目地参加洪門会、三合会等組織。这些会党在光緒年間仅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到了宣統年間又增加了“驅逐老番”(帝国主义)的口号。貧雇农和瀕于破产的小有产者参加会党的越来越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这充分說明当时化州人民对革命的热烈要求。

宣統元年，化州高等小学堂聘請教师，同盟会便設法派留学日本的惠州人王伯羣来充任，借以进行革命活动。王伯羣来化州时已剪去了辮子，思想进步，言論超羣。清朝規矩，每月初一县知事

必須到孔廟禮拜，學堂全體教職員均須陪伴禮拜，王伯羣也參加。但在行跪拜禮時，眾人跪而王不跪，眾人拜而王不拜。學堂有位教師李次奇得了拔貢功名，照例送扇給王伯羣，王只看作互相餽贈，僅回送他一把扇，沒有封扇金。這兩件事在當時是很突出的。王伯羣對學生十分愛護，全堂學生都喜欢和他接近，他便乘機向學生進行革命宣傳。在同盟會“驅除鞑虜、建立民國”的宣傳下，化州高等小學堂的學生們思想上有了進步。王伯羣便同彭瑞海、董水洲、陳冠民、李春華、賴友甫、彭中英、馬祿仙等人組織拜蘭團。在拜蘭團的革命組織宣傳影響下，全堂學生們愛讀新書報和王伯羣帶來的一些宣傳革命的書刊，這些書刊主要內容是揭露清朝虐政，列強的侵略，以及人民的悲慘生活，主張維新改良或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發憤圖強，收復失地，挽回主權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由此提高了學生們的思想認識，推動了革命工作。王伯羣的言論行動，當然為當局所疾視，因而不久便被撤銷教職。同年八月，王伯羣離開化州回廣州後，同盟會就派徐昌來化州與拜蘭團聯繫，並以拜蘭團作為核心，在學堂內秘密組織同盟會，吸收了全學堂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學生入會。在同盟會的組織領導下，會員利用各人的親屬和戚友關係，打入駐防化州的十三營做策反工作，並與百長、十長取得聯繫，還派人打入內部去當兵，從中宣傳反清復明思想。此外，還利用各種關係打入各地方的洪門會、三合會和綠林組織中去，進行宣傳活動。到了宣統三年下半年，革命起義的准备工作已經就緒。

武昌起義，全國響應，革命大火已成燎原之勢。化州同盟會（拜蘭團）以彭瑞海為首，於農曆九月初三夜發動了駐防化州的十三營武裝起義，並通知各會黨同時從外邊進攻縣城，里應外合，首先很順利占領了縣衙門，繳了縣知事的警衛武裝，逮捕了縣知事，

杀死了承审員(旗下人),释放了县監獄的犯人。各会党的队伍入坡的約二、三千人,商民放鞭炮欢迎。当即組織了临时政府,以李屢正为临时县长(李因控告公局长陈敬堂而入獄,化州起义后释放出来)。县知事被捕后解送高州瓜棚处理,后被释放了。人民最痛恨的公局长及土豪劣紳都聞風潛逃。化州組織了临时政府后,就发生了严重的粮餉問題。当时参加起义的駐軍十三营和綠林队伍云集县城,于起义后两天都要求发給粮餉,临时政府无法应付。商量結果,只得由领导起义的同盟会(拜兰团)人員分头帶領十三营官兵到各村庄向地主商請支援。可是地主利用宗族关系,組織力量与十三营对抗,故向地主要款时都被地主們閉門拒絕。李春华帶領的一队,在官桥乡那洛村因被地主閉門拒絕,更引起武装冲突,結果李春华被打死,十三营官兵便把地主彭胜的祠堂烧掉。此事件发生后,全县人心惶惶,县城商店关门停业,乡村居民不敢进城。綠林队伍便乘机到各乡村去勒索粮餉,弄得地方一时大乱。此事传到高州瓜棚起义征兵营后,征兵营便派苏汝森帶領起义征兵一营到化州来,繳了十三营的武装,解散了十三营。綠林队伍聞風逃散,各回原地,照旧搶劫。解散了十三营之后,苏汝森接管县政,重新組織临时政府,請高州起义临时政府委派陈元青来化州任县长。前任临时政府人員和拜兰团起义人員,除彭瑞海、董水洲、陈冠民、馬祿仙等几人到广州去找王伯羣外,其他人員各自分散回家。在苏汝森的主持下,公局长、乡正又重执地方政权,封建势力死灰复燃。他們还购置了一批枪械,組織民团,并在县城开办四队学生軍,經過一个月的軍事訓練,派去各地去清剿綠林,平息搶劫之风。經過一年的時間,地方稍为安宁,便解散学生軍,令各学生繼續求学。化州起义至此便告一段落了。

辛亥革命前后琼崖革命党人的活动

梁 秉 樞

海南島在同盟会未成立前，已有一些秘密組織如勵志社和三合会(即俗称三点会)等，进行反清活动。勵志社由一班青年学生和进步商人組成，地点在琼山之演丰市，表面以研究学术、互助互勵为宗旨，实质是号召“倒清兴汉”，聚集力量，准备起事。三合会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力量較大，但成員复杂，其中有些是流氓地痞。由于反清目标一致，彼此亦有联络。

一九〇九年，陈子臣、林格兰先后返琼組織同盟会支部于海口。当时参加同盟会的成員，以青年学生居多。我是以勵志社成員的身份由馮千里同志介紹加入的。

广东省垣光复后，署理琼崖道范云梯亦随大势宣布独立。后来胡汉民为广东都督，派赵仕槐返琼主政。范云梯拒絕移交，赵仕槐只得在海口将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学生組成学生軍，配以九响毛瑟和单迫枪数十支，想以武力威胁范交出政权。学生軍进攻府城时，分二路前进，一路进攻北門，一路則进攻东門。范云梯关闭城門，上城抵抗，居高临下，火力殊猛。学生軍既未受过严格軍事訓練，武器又不足，死伤惨重，結果失敗，退回海口。范云梯亦未敢出城追击。后来，林格兰亦被捕牺牲。嗣胡汉民改派古勳勤为琼崖鎮守使，范云梯聞訊逃跑，赵仕槐亦奉調离琼，学生軍始自动解

散。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爆发。时胡汉民已去职，由龙济光主粵政。胡密派陈俠农(国会議員)为琼崖討袁軍总司令，返琼暗中策划討袁运动。文昌白延市、树德头也設立倒袁机关，派我和徐成章、吳佩三、熊受天、张孟麟等在琼山的白石溪，以經營种植畜牧事业做招牌，暗中从事討袁活动。当时琼崖各市鎮均設有警察机构，耳目甚多，活动不易，討袁人員白天化装为农民、小商販和算命堪輿先生等，到各地宣传，晚間才返白石溪休息。文昌白延、树德头至海口一带討袁人員，皆以白石溪为联络中心，經常前来联系，陈俠农也經常在白石溪布置工作。

是年某月，我們接到香港討袁机关的同志来信說：周紹昌奉龙济光命令，不日返琼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运入数千两烟膏作反革命活动經費，必須注意他的行踪，予以消灭。我們派人到海口探悉周某从香港到达海口，即將返文昌原籍。我們立刻派一部分同志化装到文昌之九林鋪飯店(高三江市約二十余里)一带埋伏，分为四路，每路四人，每人暗带駁壳和左輪手枪，約定時間到九林鋪飯店，等候周紹昌到来，以便袭击。屆时仅有两路同志到达該地，而周紹昌和六名护送士兵已經到来，正在吃飯。各路同志虽尚未到齐，但時間迫促，机会不可放过。我們迫不及待，只得先下手向他們袭击，把周紹昌和四名士兵當場击毙。剩下二名士兵，以大树掩护，开枪抵抗，互战約一小时之久，始被我們击退。我們亦有一人被打死，陈司令、徐成章受了輕伤，另一位莫同志受重伤(他是定安人，系当时琼崖中学生)。我們將繳得的长枪二支及子弹数百发藏于番茨园里，繳得的烟膏四大羅則用火焚烧，并迅速将莫同志抬到离九林鋪約五里的地方。因眼看敌人快要追到，我們便将他抬到杂草丛

里安置，准备晚上再来抬去医治。这时已发现敌人的影子，我们只得分途退走。敌人四处搜索，结果将莫同志找到，抬回三江市警察局，用刑迫供。莫同志矢口否认，结果遭敌人枪决，壮烈牺牲。

一九一四年二月，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便开始军事行动，拟占踞万宁、陵水、崖县为根据地，再向府城海口推进。于是决定抽调琼山、文昌两县枪支在文昌白延市附近集中，率队入万宁兴隆市，策动黎族首领钟奇曾、钟孟君兄弟和我们共同行动。钟奇曾有四千多武装黎民，其装备虽大多数都是土制药枪，然而力量并不小。钟奇曾便率领所属黎民一同向万宁县城进攻。该城有反动军队杨锦龙部一連兵驻守，力量薄弱，结果被我们攻破，县知事逃跑。即派钟奇曾充任万宁县长，万宁战事结束。我们又继续攻克陵水县城，以另一黎族首领刘某（忘其名）为陵水县长。接着又攻下了新村港，遂乘势再向崖县三亚进发。该地亦驻有杨锦龙另一連部队及盐警队三十人，連长是陈司令的同乡，颇有革命思想，所以陈司令亲身先到榆林，派代表到三亚策动该连连长起义，同时也叫我和徐成章、梁国一等三人到三亚、榆林帮助工作。詎知该連长因事请假，由营附代理，派去的代表被该营附扣留，因而策动工作遭到挫折。陈司令只得离开榆林。我们三人到榆林时陈已离去。在归途中，我们遇到了该連离了职的排长姜飞。他知道我们去榆林的意图，便主动找我们商谈。他告诉我们说，他部下岑峯和梁某两个班长都倾向革命，也能听他的话。于是，他即写信介绍我们往晤岑、梁二人。我们到三亚将这封信交与岑、梁，他们果然同意起义。三亚的驻军原分三处防守，盐警队驻在盐知事衙门（设在三亚对面一个小岛上），驻军则一个排驻在河边炮楼，两个排和連部驻在另一处，力量分散。我们约定凌晨四时开始行动，从榆林乘渔船化装

偷渡三亚。登岸时敌人毫不知觉，我军用炸弹猛攻敌人炮楼，岑峯等听到枪声，也跟着起义。炮楼里的敌人纷纷投降，盐警队亦早已逃之夭夭，三亚的战事迅速解决。我们便将起义的军队改编为黎崖讨袁军第一支队，以姜飞为支队长，岑峯副之，兼第一队长，梁班长为第二队长，另一班长为第三队长。盐警队逃跑后，根据群众报告，在盐知事署内地下挖出子弹数箱，并由群众引导，将躲藏在其同乡家中的盐知事、秘书、科长三人逮捕。该盐知事自到任后，横征暴敛，增加盐税十余倍，人民恨之入骨。所以我军攻克三亚后，马上出安民布告，并取消各项苛征。民众欢欣鼓舞，并纵火将盐知事衙门焚烧。

三亚战事胜利后，崖县县知事闻讯，即弃职逃跑，但因平日无恶不作，民愤甚大，经群众四处搜索，结果被黎民兄弟逮捕，活活用水浸死。崖县县知事被群众处死后，群众派代表来三亚请求讨袁军派人去维持治安。我军顺从民意，开入崖城，群众夹道欢迎，情绪热烈。随即委派该地前清举人郑某(忘其名)为该县县长，公布取消苛捐杂税。这时又接到万宁县长钟奇曾报告：谓万宁县城为敌人集中兵力反攻，已被攻陷，我军已退回兴隆市。我们就回兴隆计议收复万宁县城，进攻加积市，向府城海口推进。乃指派钟奇曾率部攻万宁县城，我们则率队进攻加积。当我军开到加积附近约十余华里之椰子寨那天，正值五月端午节，便在那里劳军休息。适值万宁敌军被收复万宁县城的钟奇曾击败，退到椰子寨，和我军遭遇，双方展开战斗。约激战六小时，敌我伤亡颇多，我方一秘书阵亡。敌军卒不支，退回加积集结，准备反攻。我军只得改变计划，绕道攻克琼东县城。但敌人又由文昌、定安、加积增兵反攻。我们为保持实力，只得自动撤退，返定安之榆林市一带驻扎。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其餘孽廣東督軍龍濟光來瓊崖，任瓊崖礦務督辦，瓊崖討袁軍亦奉令取消，軍隊調回萬寧、興隆一帶听候改編，黎族民兵亦回原籍。不久，陳繼禹遂有討龍軍的組織。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民軍概况

李朗如 陆 滿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以前，广东各地的民軍便已非常活跃。到了武昌起义，他們紛紛在各地响应，对广东的光复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就记忆所及，将广东各地民軍的組織成分、领导人物和起义情况以及最后被遣散的經過分述如下：

(一) 广东民軍的来源

广东各地民軍的成分，据我們了解，絕大多数是农民，尤其是以貧雇农占多数。也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工人或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工人，因为生活困苦而参加了民軍的。总之，参加民軍的人可說絕大部分是劳苦大众。此外，还有一些是从清軍中起义轉变过来的，如：洪兆麟是清季的巡防营管带，在惠州三多祝起义轉过来的；任鶴年也是清季的巡防营管带，在香山县屬起义轉过来的。

在清末时期，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在封建統治下，为生活所迫，挺而走险，变为綠林豪杰的比比皆是。他們起初行动十分秘密，昼伏夜出，但为时稍久，就难免被土劣偵悉，向清廷告密，致被悬紅緝拿，迫得他們不得已作公开行动，扯出“劫富济貧”的旗帜，和統治阶级作殊死斗争。一些胆小的土豪，便由攻“匪”轉变而为庇“匪”。亦有一些土劣在勒索不遂时，将善良的农民亦作为“匪”

而向他們“進剿”。例如南海縣上淇鄉秀才陸信義乘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順德樂從圩起義失敗後大部分領導人都逃避到香港、澳門的機會，肆無忌憚地霸佔了族內的財產，更分頭向參加起義的各家按家產多少進行勒索，稍有不遂，即報告駐扎的巡防營或縣衙派兵捉拿，弄得全族兄弟生命朝不保夕。被迫離鄉背井，遠走他方者甚眾，其中因年老體弱，無力逃避，被指為亂黨而加以捕殺的亦復不少，總計不下百餘人。至同年陰曆八月間，陸領等奉命回鄉準備起義，陸信義自知不能立足，晝夜潛逃至南海市陸氏合族祠里暫避，候搭輪渡轉往廣州。但陸領已於此時分派兄弟四處搜捕並分別扼守各交通路綫截緝，結果將他在陸氏合族祠內捕獲，經各兄弟指証確凿，遂當眾宣布罪狀，並將他活埋。陸信義處決後，不僅陸氏合族兄弟為之大快，即鄰近鄉村農民亦大大增加了革命鬥志。到了辛亥革命時，上淇鄉陸氏兄弟就紛紛起來參加。

在綠林豪傑中有不少曾被清政府懸紅購緝。例如：陸蘭清被懸紅一萬元緝拿，李福林三千元，陸欽六千元，其餘被出重賞緝拿的，在海南番禺各屬尚有數十人。但這筆花紅獎金並不是由清政府支出，而是責令被購緝者的族人按親疏關係分派負擔，如仍不足，則由全族兄弟籌足，預先繳交清政府的，實際上這是另一種名目的勒索。各族中如有人被清政府購緝時，往往牽累到全族的人賣田地，拆房屋，賣磚瓦舊料，以償分攤的款項，不但祖業弄光，連清明祭掃的胙肉也停止分派。清政府這種橫暴措施，更加引起農民的憤恨。在這種情況下，廣東各地的綠林和農民便打成一片，組成民軍，於辛亥革命時在各地紛紛起義，對光復廣東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 各地民軍起义和广东光复后进駐广州的情况

广东光复前，各地民軍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并陸續在各地起义，如：陆領、陆常、何江、何夢等，在順德乐从圩起义；陆兰清、陆兰福、郭某(已忘其名)、潘錦、黎炳球、黎义(又名志榮)等，在南海县属西樵乡和三水县交界的地方起义；李福林、李湛、李雍等在番禺属的禺南、禺东、大塘乡一带起义；周康、馮扶汉等在順德县属陈村鎮一带起义；譚义在新会县属天河乡和猪头山一带起义；张炳、邓江、王会等在順德县属龙江、龙山一带起义；林义順、刘世杰、任鶴年、李就等在香山(后改名中山)县属各地起义；陈炯明、王和順、廖竹彬、林海山、关仁甫、石錦全、洪兆麟等在东江惠州、海丰、河源等县起义；黃明堂在欽州、防城一带起义。潮州府嘉应州各属也有很多民軍起义，但他們的领导人姓名，就不大了解了。

广东光复后，各地民軍紛紛开进广州，茲将其情况分述如下：

1. 陈炯明所部之民軍称为循軍，陈任总司令，钟鼎基、苏慎初、王肇基、莫肇宇、张我权、洪兆麟等分任司令或統領，官兵共約万余人。

2. 王和順、廖竹彬、林海山称为惠軍，王和順为司令，官兵約共三千余人。

3. 黃明堂称为明字順軍司令，約有官兵二千余人。

4. 关仁甫称仁字营統領，約有官兵數千人。

5. 陆兰清称兰字营鎮統，所部两协，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連，每連三排，每排四列(即班)。以陆兰福、郭某(已忘其名)为协統，陆兰培、潘錦、譚世昭、黃晚为标統，共有官兵三千

余人。

6. 陆領称領字营协統,以陆常、陆养为标統,共有官兵二千余人。

7. 李福林称福字营統領,以李福、李雍分任标統,約有官兵二千余人。

8. 张炳称炳字营标統,約有官兵九百余人。

9. 黎炳球称黎字营标統,約有官兵一千人。

10. 何江称江字营統領,約有官兵七百余。

11. 何梦称梦字营統領,約有官兵六百余人。

12. 邓江称邓字营統領,約有官兵五百余人。

13. 黎义称荣字营統領,約有官兵四百余人。

14. 林义順、任鶴年、刘世杰称香字順軍,以林义順为司令,任鶴年、刘世杰、何振分任标統,約有官兵三千余人。

15. 譚义称譚字营統領,約有官兵千余人。

16. 李就称就字营統領,約有官兵六百余人。

17. 周康称康字营协統,以馮扶汉、张其(忘其名)分任标統,約有官兵二千余人。

18. 石錦全称石字营統領,約有官兵千余人。

以上所述,只凭记忆,錯漏难免。

各地民軍,由于平日缺乏訓練,装备又很差,当他們开到广州各自覓地驻扎后,許久也沒有領到軍服,一部分民軍只得印发布質符号給各官兵佩帶,以資識別。然大多数之民軍,連这种布質符号也沒有佩帶。他們的武器更为复杂,七九、毛瑟、十三响、駁壳、左輪、曲尺,各种各样,无所不有。有的連枪支也沒有,仅佩几个自制的炸彈或腰刀、长剑之类。他們穿着便衣,携带武器,四处游蕩,歹

徒乘机混迹其中，因而更形成兵匪难分的现象。民军的领导人物一到广东光复之后，由绿林豪杰一变而为民军领导人物，于是大多数都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官兵管教无人负责，因而各营号民军一般都是毫无纪律，行动自由，营伍都不成样子，好象散兵游勇。到了一九一二年一月间，各民军营号机关部都派驻军事人员负责训练，而且领到服装，从此以后，军风纪就比初入城时稍为好了一点。但各部的军官，虽在整队行进中仍旧穿着便服，一望而知不是正式陆军队伍。

(三) 胡汉民、陈炯明遣散民军的经过

广东各地民军开进广州后，呈现了一片混乱状态。都督府就对民军分别进行整顿和编练，以维持军风纪，统一军令。石字营统领石锦全和他的参谋长（统领部编制没有参谋长，这是他自封的），某日手携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气势汹汹，要求立刻发给餉项，当被卫队官兵捆起，当日下午执行枪毙，石字营撤销，所属队伍分别编遣。兰字营统领陆兰清有浮报军额、骗领军餉、尅扣伙食种种侵吞行为，被部下报告都督府。胡汉民接到报告后，即派员前往秘密调查属实，查出陆兰清骗领军餉和尅扣军餉的数目甚巨。陆兰清自知证据确凿，罪不容诛，遂秘密潜逃到广西，投靠陆荣廷。胡汉民只得将陆兰清的镇统职务撤去，并将兰字营所属部队分批遣散，把没有参加舞弊的军官分别安置。

陈炯明率领所部循字军约万余人开进省城后，就一意排除异己，扩大势力，以谋夺取广东大都督的职位。一九一二年春间，他暗调循军开往王和顺所部惠军所驻的馮东烏涌和广州东堤各地，将他们分别包围，勒令缴械遣散。惠军顽强抵抗，但结果失

敗。这次战斗中，东堤自广舞台起和以西一带的壮丽楼宇都烧燬殆尽。

孙大总统退位后，陈炯明勾结袁世凯，得任广东大都督。陈就职后，立即将所部循军改编为正规军，以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王肇基、莫肇宇、洪兆麟各人分任师、旅、团长。其他各字营的民军，除李福林、谭义等极少数部分没有遣散外，其余的都一律遣散回籍。被遣散的民军，各携自备武器回到家乡后，因地少人多，无从耕作，生活困难，大多数又被迫变为土匪。因此，各属遍地皆匪，治安都无法维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更为猖獗。这是陈炯明排除异己、遣散民军所造成的恶果。

陈炯明自取得广东大都督的职权后，就立即报告袁世凯说胡汉民已去，但余孽尚存，请即拨款来粤，以便将他们派遣出国。袁世凯接电，即汇给陈炯明光洋四十万元。陈将款分派李朗如折实港币一万七千元，朱执信、林云陔各五千元，黄梦熊等则每人三千元，以作出国留学费用。各人领到款项后，各自离粤出国。孙中山先生派李朗如赴日本将黎仲实经手秘密取得的日本制造迫击炮的图型抄了回来以便仿制，供给革命军使用。李朗如到日本后，很快就被日本政府发觉，只得逃回上海。一九一三年，中山先生领导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向中山先生报告吴淞炮台和肇和军舰已经运动成功，但需大笔款项应用，他们才能够起义。中山先生以一时难以筹出巨款，焦灼万分。李朗如便将港币一万七千元取出送给中山先生，解决了吴淞炮台和肇和军舰起义的需款问题。其后朱执信、古应芬也各将陈炯明发给的留学费用五千元送给中山先生充作革命经费。

一九一三年夏间，陈炯明的部下师长钟鼎基、苏慎初、张我权

等在袁世凱所派黃士龙的策动下，叛变了陈炯明，陈炯明仓卒逃亡。同年八月袁世凱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率軍入粵，将陈炯明所部繳械遣散，并将不少官兵吊打杀害。

記广东瀛字敢死軍

胡 漢 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后，譚瀛(惠州人)等組織了瀛字敢死軍。同时，我也組織了昭字營革命軍。我的基本队伍是广九路筑路工人，駐扎在新安、崗头等地的义勇軍(即护路軍)和駐防东莞、石龙与四邑中路巡防營的防軍。譚瀛的队伍則包括部分居留港九、惠州等地的工人和一些樟木头、增城等地的被压迫的农民。队伍秘密組成后，大都就地潜伏待命。

武昌起义后，阴历九月初旬接到机关总动员令，要求各地迅即組成革命队伍，并限于五日內趕赴省城郊外秘密集中，以便待命攻城。我当即先率路工三百余人，携带早已領到的旗帜、长短枪、炸弹和弹药先行起程，又飭令郑昭杰等率領南头护路軍百余人(配带新式九响毛瑟枪)于九月初十日到达广州小北郊外龙眼洞各乡潜伏。譚瀛和李毅夫等也按时率队抵达长滢、元崗各乡。会合后，約有千余人左右，同时，石錦泉也率所部进驻。我和譚瀛先混入省内，向城內的革命指揮机关报到，和同盟会會員黃世仲取得联系。为了統一指揮，我和譚瀛协商后，同意將昭字營革命軍和瀛字敢死軍合并，并决定以瀛字敢死軍担任攻城敢死先鋒队，而昭字營革命軍后来也采用瀛字敢死軍旗号。

粵督張鳴岐于九月十八日夜逃遁后，我革命軍乃于十九日长

驅入城，全市商民熱烈歡迎。

入城後，瀛字敢死軍分駐於大佛寺、小北濠賢路等地，擔任維持秩序。各路民軍，也紛紛進駐省城。胡漢民自香港率領同盟會南方支部總機關和一些領導成員抵穗就任都督職務後，本擬委任黃士龍負責軍事方面事宜，黃不就，於是委鄧鏗為陸軍司長，以黃世仲為民團總局局長。陳炯明則發起組織軍團協會，希圖借以擴大軍團力量，來威脅胡漢民。石錦泉特軍團協會為後盾，不服從胡漢民的命令，索械索餉，後為胡漢民所槍決，他所統率的石字營解散。瀛字敢死軍則奉命收編了其中的一些優秀兵士。稍後，瀛字敢死軍擴編為瀛字北伐軍混成旅，譚瀛被委為協統，李毅夫和我被委為標統。正在組軍準備北伐之際，南北和議告成，事遂中止。

當時，廣東民軍約有十四萬以上。陳炯明在胡漢民調任南京總統府秘書長後，代理都督職務。他首先解散軍團協會，接著又不與民軍領袖會商而進行宣布解散民軍。而在不久後召集的裁軍會議上，又大肆排除異己，裁撤別人的部隊，擴充自己的實力。各軍首腦各有戒心。民軍領袖如王和順、黃明堂乃以裁軍不公平為理由，反對陳炯明的裁軍計劃，並將部隊退駐廣州東關一帶。陳炯明剛愎自用，竟與王和順火併，閉城數日，炮聲隆隆，東關戲院和東園附近房屋毀壞不少，居民生命財產遭到損失。後由大總統從南京飭令改善裁軍計劃，雙方才各釋爭端。

陳炯明所擬定的裁軍計劃也遭到黃世仲的反對。黃世仲主張裁弱留強，合理編遣，不得裁滅他人部隊，擴充自己實力。陳炯明竟然妄加罪名，把黃世仲槍決。黃世仲為老同盟會會員，曾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工作，又為南方支部充當聯絡員，光復前夕便在廣州設立

机关,运动民军起义。因此,陈炯明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反对,部分革命党人主张声罪致讨,为黄世仲伸冤。只是因为大局未定,恐内部纷争将给帝制余孽造成可乘之机,所以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

后来,南京总统府决定,广东民军自愿裁撤者,发给遣送费六个月,遣散回乡。其余部队则裁弱留强,将省内陆军、防营等编为两师和一个混成旅。钟鼎基为第一师师长,苏慎初为第二师师长,张我权为混成旅长。瀛字军自愿呈请遣散,我也于一九一二年冬被派往加拿大联系华侨,并自谋生活。

王和順惠軍与陈炯明循軍冲突内幕

李 衡 皋

辛亥年九月广东独立后，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他以为民軍多系綠林出身，缺乏訓練，烏合之众，无作战能力，时思加以淘汰。而省会各民軍以王和順惠軍势力最为雄厚，又頗有紀律，为时所称，陈炯明視為眼中釘。我当时为该軍書記，于是向王献策，大意謂：“公为桂人，統孤軍在粵，又为当道所忌，将来結局不堪設想，不如将全軍挑选精銳，統帶北上，剩少数步队留省，以释其疑，庶可保存令譽。但我軍先要整軍容，勤操練；整飭軍容必須购买軍械，可派人往港定购，限期到貨。其次要預筹的款，或挪或垫，以免临时棘手，貽誤时机。”此議得王采納，旋派我赴港。我因过去与德商謙信洋行、魯麟洋行有过交易，到港后即分向該两行訂购毛瑟枪一千支及背囊、行軍床等共值港币二十三万余元，限期两月到貨。定妥后，返广州呈繳定单，并将应办事項切实办理。屆期接到洋行出貨单，遂依期由沙面渣打銀行汇款到港，亦由我一手經理，交款出貨付貨毕，乃返省銷差。陈炯明知悉惠軍购了大帮軍火，愈滋妒忌，随派參謀到惠軍大营(当时設在南关)見王和順，要求将这批軍械社与政府，俾得装备陸軍，先赴南京，听候北伐；并稱：“你們可照原定单再定，不过差两个月時間，便有貨付到，当可通融”等語。王和順系一介武夫，当即慨然答允，將該批軍实出社，再派我去香港办

理第二次訂購手續。迨第二次再定之貨到后，王和順派人赴都督府領款出貨，詎料陳炯明却總以財政暫時支絀為詞，拖延不發。消息傳播，全軍鼓噪，勢將激成事變。乃由我向全軍官兵反復說明利害，略謂：我之利器已操彼手，彼更挾勢以臨我，賊難與爭；不能不暫時忍肚，無使蚌自我開，然后将彼之劣迹揭發于全國，同時并宣布此事之經過于各軍，則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彼斷難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不幸數日后，某夜陸軍過界，被惠軍守衛阻止，發生衝突，遂至開火。我即勸王和順先出避沙面我們預設的機關順利洋行，并告以事情難料，最好去港，以后一切事情由我代為料理。他即同意離開司令部。雙方開火達三晝夜尚未停止。陳炯明派李福林出面調和，提出先要我們停火，他可以保證編遣。我極不願糜爛地方，乃同意停火，并即召集部眾，說明願編歸福軍者編歸福軍，不願編者給證明回鄉。這一場戰事便告結束。外間不察，謂系王和順與陳炯明爭都督，實與事實相反。此事激結，實系陳炯明爭奪這二十多萬元軍火之故也。

五個月后，警廳忽將我傳去（當時警察廳長為陳景華），即被扣留。我以對惠軍一切均已交代清楚，實摸不著頭腦。后来他們威脅我，要我誘王和順上省，否則于我不利。我聞此語，即憤然曰：“突友求榮，李某怎肯干這卑鄙無恥之事，好男兒死便死耳，何懼為。”卒以結交匪徒、居心叵測為罪名，判我十年監禁，發回三水原籍執行。經過年余，龍濟光入粵，陳炯明失敗，我始恢復自由。

朱执信革命事迹述略

朱 秩 如

先兄执信，为人峭直严正，一生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义之所在，虽死不辞。他这种性格，受先父的影响颇深。先父名启连，号稼垞，赋性耿介拔俗，矜矜自守，虽作幕僚数十年，依然读书人本色。执信在给我们弟兄的一封信中曾说：“先人初无他胎，惟此耿介之性，实赋诸我，儻视颜苟活，岂不有忝于祖。”先母为名儒汪毅庵先生之女，常为儿女讲述文天祥、史可法、陈子壮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先舅父汪莘伯（名兆銓）也每于酒余饭后，向我等弟兄各述明季亡国痛史和清朝压迫汉人的种种暴政。执信的民族意识和排满革命思想的形成，得之于家庭教育的启发甚大。

执信在十八、九岁时，即与古勤勤（曾参与一九〇〇年史坚如炸德寿的谋划）、胡汉民、从舅父汪精卫等交游，成立羣智社，共同集资购阅新学书报，对于达尔文、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著作钻研甚精。吴稚晖于清末曾在巴黎创办了一份用真笔版印刷的刊物，宣传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文字流畅，颇有煽动力，执信也受了它的一定影响。

执信二十岁时，应粤省留日考试及格，东渡学习法政，得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他留日学成归国，回到广州后，即在广东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任教；嗣因宣传革命，为高等学堂所罢

退，复兼任方言学堂教席。他在法政和方言两校吸收了不少革命同志。当时他经常在课后到设在旗下街的革命党机关参与各项秘密策划，往往到四、五更才回家。他与新军中的党人赵声、倪映典联系甚密。赵、倪常到我家与执信聚议。庚戌年（一九一〇年）新军起义之前数日，倪映典曾在我家留宿数宵，并与执信商定，由执信赴顺德联络陆领所部民军，于新军起义时来省响应。倪于除夕夜即由我家逕入新军营中发动起事。新军起义后，为水师提督李准所部清军击败，倪受重伤被执。时我舅父在水师提督衙门任文案，据他说，倪被执不屈，拒绝招供，被清军在阵前斩决。起义既失败，执信联络民军响应之预定计划亦因而未能实现。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执信于当日（或先一日，已不能确记）离家不知何往。二十九日，忽有人持一字条来覓执信，谓胡毅生已率队到省，问执信应扎何处。家人闻之，惊愕无已。当晚举事后，多日未见执信回家，阖家更为忧惧。一、两星期后，方言学堂学生高州人林云岐来报信说，执信已脱险落乡，家人始稍放心。

执信参加此役经过，民国元年曾亲为我谈及。当日起义时，他与黄兴率领党人进攻总督衙门。因起事前一、两日有党人机关被破获，清军防备甚严，为便于进入督署，乃决定由四个通晓日语之人乘轿假充日本人来謁总督，并与作内应的督署辕门卫兵约定，下轿后即挥白布为信号。届时黄兴乘第一轿，执信乘第三轿，既至督署，不料辕门卫兵变计，开枪射击。党人击破督署卫队抵抗后，直入署内，遍寻总督张鸣岐不获（张已事先穿后墙逃走）。督署已因党人投掷炸弹起火，道路又为坍塌阻断，当即向左冲出东辕门。甫出辕门，即遇候补道台李象宸乘四人轿而来。党人闻轿夫连声吆喝

“李大人来”，誤以为是水师提督李准，齐举枪向之射击，李象宸即時中弹殞命。此时李准所部已經开到，四面合围。党人众寡悬殊，相繼战死。执信身亦受伤，且又弹尽，乃弃枪折入橫巷，輾轉逃至双門底附近流水井街方言学堂学生林云陔家的宗族书塾匿居数夜；待大南門、太平門开放后，即出城避往香港，寄寓胡汉民家。有的史料謂执信在此役担当守大南門任务；或謂于三月二十九日之次日，乘夜深人靜，由暫避处外出，經潼关（或称銅关）廢渠道出至东門外城濠，雇得在濠内兜攬乘客的小艇載往珠江搭船赴香港。此两說皆不确。不久，他写信回家說，他已决意牺牲，望家人視為已死，将其妻女暫寄外家，弟妹暫寄舅父家。又說：他愿作江子一^①，但不愿諸弟作江子四、江子五等語。

武昌起义后，广东也在旧曆九月二十九日独立，举胡汉民为粵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执信任总参議，并負責統率李福林、陆領、黎义、张炳等部民軍。当时因政局变动，各地不良分子乘机活动，地方秩序頗受影响。胡汉民乃下令將粵省所有各部民軍都归陈炯明統轄。民軍首領王和順、楊万夫不受陈炯明号令，据省城及虎門抵抗，广州附近各民軍也跃跃欲动。执信不避危險，亲赴各軍疏通制止，并亲自指揮何江、张炳、黎义等民軍，收复长洲、魚珠各要塞，王、楊之变得以迅速平定。乱事既定，陈炯明以民軍不易控制，乃設广阳軍务处（后改称广阳綏靖处），任执信为督办，統率民軍，綏靖地方。执信就任后，調遣民軍分段駐防，积极恢复各地秩序，疏通河道，整頓各地交通。其时香順屬东海十六沙匪风甚熾，他曾亲自督率队伍前往勦平之。

^① 梁侯景之乱，江子一与弟子四、子五同殉节，事見《梁书》卷四十三。

各地秩序逐渐恢复之后，执信就向胡汉民、陈炯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件是裁减军队。他建议将广东省军队裁去三分之二，他自己并以身作则，将所辖民军裁了很多，连广阳靖绥处也裁撤了。因此，他这个建议获得了很大效果。第二件是振兴教育。他本拟兴办大学一所，因人才缺乏，未能办成。这年广东派了许多人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留学，也是出之于执信的建议。第三件是整顿金融。他打算把当时在市场上八折使用的纸币收回，为袁世凯所阻挠，未能实现。

广阳绥靖处裁撤后，执信任广东核计院长。他为了使收支平衡，对于各机关、部队浮冒的开支，极力加以裁抑，虽对拥兵最多、势力最大的陈炯明，也无所顾忌。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向各国借得巨款后，就大肆收买各地军队，粤军也在其列。执信曾对胡汉民、陈炯明说过：“我们以前跑进不相干的军队里运动革命，他们便能诚心诚意同我们一齐革命。现在军队是我们自己统辖着的，却反而要去提防他们被别人用金钱收买，这不是怪事么？不是怪事，是因为我们灌输主义的勇气衰退了。你们若把这事交给我，由我天天到军队里宣传革命道理，将主义来与袁世凯的金钱恶战，保管广东无事。”不久，胡汉民被袁世凯撤职，胡于卸职前，即批准执信辞核计院长职，并给资赴日本留学。执信见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显露，乃督促陈炯明独立，起兵讨伐，炯明不从。他又向陈建议用重兵扼守西江方面，以防龙济光东下。陈恃暗中与袁妥协，亦不肯听。他见粤事已无可为，乃离粤赴沪。适值讨袁兵起，鈕永建在吴淞举义，他就罄其所领得的留学金，捐作守护吴淞炮台之用。后吴淞既不能守，广东也被龙济光攻据，于是他又得胡汉民资助，离沪赴日。

执信到日本后，一九一四年秋間曾向孙中山先生献議回粵驅逐龙济光，取得粵省作討袁的根据地。孙先生同意，即派他返粵主持此事，并指定邓仲元、李海云二人协助进行。于是他先赴香港，設机关于馬里氏山夹道，不久又迁到澳門。邓仲元专门負責东江方面，設机关于港坚道。执信以台山屬李海云，以南番順三县屬陆領，以中山屬林景云、梁德，以新会屬梁成，至于高雷阳方面，也分派該屬同志李奇、梁树熊、林树巍等分別負責，又分派同志潛入广州投擲炸弹，瓦解龙部軍心。龙济光見情势紧张，將駐防各地的軍隊調返广州近郊。各路民軍紛紛乘机进攻。梁成克三埠，复江門；陆領部李雄克容奇，复陈村，攻大良；林景云、梁德复前山，李奇克阳江；林树巍部邹武等克石城。但因各路民軍械弹无法获得接济，不能持久，且举义時間又不一致，終于被龙济光各个击破。此次失敗后，执信赴南洋各埠，发动同志筹款，以图再举；事毕赴日本东京謁孙中山先生，报告粵事失敗經過，并由中山先生主盟，加入中華革命党。旋又奉中山先生命，返澳門进行联络各方的工作。在此期間，他努力延攬人才，吸收了不少有为之士参加革命。

粵省举义虽已失敗，但党人暗中活动仍甚活跃，省城屢有暗擲炸弹等事发生。龙济光乃电請袁世凱派肇和、应瑞两艘南下鎮壓，泊在黃埔。执信与戴季陶由沪派来的邵元冲、楊虎、孙祥夫等合謀袭击肇和舰。其計劃是用一艘輪船載同志前往，与潛伏在舰內的党人里应外合，攻占該舰。惜因南来同志事先未查明珠江潮水涨落情况，当輪船駛至肇和舰停泊的江面时，正值潮退水急，无法接近該舰，輪內同志不能过舰袭击，且为舰上哨兵所觉，鳴号告警，以致功敗垂成。

一九一六年护国之役，执信奉孙中山先生命，在东莞、阳江、雷

州等处起义。有肇軍統領李耀汉者，原是清末水師提督李准所招撫的綠林。当龙济光于一九一三年由桂攻粵时，他曾开肇庆城門納龙軍，自此即与龙济光相勾結。这时他一面受到广西陆榮廷的攻击，一面又受粵省义師威胁，徬徨无措。执信乘机派人前往說服，使其弃邪归正，得李应允。因此，龙济光迫于形势，終于不得不宣布独立。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先生率領海軍南下，在广州河南土敏土厂成立大元帥府，执信在府內担任軍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时桂系莫榮新为广东督軍，不受孙中山先生节制，且視广东为其私人地盘，开賭开烟，无所不为，广东人咸深痛恨。孙中山先生憤其专橫，拟一面亲自督率同安艦长温樹德炮击督軍署，一面命执信联络李福林部福軍及李耀汉部肇軍，令肇軍屆时聞炮声即出劲围攻督署，繳桂軍械，执信則率福軍渡江策应。当孙先生作此决定时，重要同志都表示反对，并以利害劝阻执信。但执信不顧，答道：“孙先生愿为党死，我是党员，愿随党魁死，其他利害在所不計。”当孙中山先生亲自督率同安艦向督軍署发炮后，执信即率領福軍出劲。正在渡江間，接到探报，知道肇軍并没有动静，李福林恐孤軍难支，請求中止待机，执信不得已乃止。莫榮新自知理屈，不久就亲进土敏土厂大元帥府，向孙先生謝罪。事后，重要同志都劝执信离粵，以免危险。他不以为意，仍然奉孙先生命联络各方。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为总统，嗣因张勳复辟之变，被迫退位。粵省长朱庆瀾本为黎所任命，每有所为，皆受桂系掣肘。黎退位后，朱自知难保省长之位，乃謀培养武力为将来之計。朱打算任命陈炯明为省府亲軍統領，陈因曾做过都督兼省长，不愿就此职。执信鉴于护法之失败，是由于沒有基本部队，于是献計于孙中

山先生，令陈接受此职，借作基础，徐图扩充。陈始允就任。但桂军势盛，陈部在粤不易发展。执信再献策于孙先生，派胡汉民西上见陆荣廷，要求陈炯明部编配后，予以援闽名义，以便在闽发展，得陆同意。同时并由朱庆澜暗中与闽督军李厚基商妥，借漳、泉两州为陈部驻地。

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离粤赴沪。执信奉中山先生命，赴福建漳州襄助陈炯明，不久亦由漳赴沪。他到沪后，协助孙中山先生作了不少宣传工作。中山先生撰写《孙文学说》、《建国方略》等著作时，他都参加过工作。他还和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等主办《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发表文章，阐发革命理论，抨击军阀统治。此时苏联十月革命已经成功，执信曾著文赞颂，并学习俄文，以便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

在沪期间，执信还协助孙中山先生办理海外侨胞捐款事宜，并担任与福军及陈炯明军的联络。他于一九一九年秋至一九二〇年夏间，曾屡次啣中山先生命，赴漳州与陈炯明商议驱逐桂军阀莫荣新的计划，同时又与在粤的魏邦平、李福林相联络。

一九二〇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先生决定回粤驱莫，任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长，率部由东路返粤；任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长，由北路返粤；执信则负责联络广州魏、李等部，以为声援。回粤后，为时仅半月，就底定潮汕，进逼惠州城下。可是粤军人数比起桂军来，还不及三分之一，莫荣新大军一到，就被阻不能前进，魏邦平、李福林又不能如期起事。正在这时，有人来告执信，谓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要背桂系独立，请他前往主持。他因同志劝其慎重行事，本不拟去，后来鉴于战事紧迫，不能坐视，遂于九月六日冒险进入虎门，招降守军，占领要塞。至九月二十一日，伪降的炮台军

突来攻袭,他被执不屈,频呼“要救广东呀”而遇害。

执信遇难后,中山先生在沪闻耗,伤痛万状。及至由香港运柩返穗举行会葬的时候,中山先生悲痛地说:“今桂贼虽已除去而执信已经牺牲,损失何能相偿?”自后,中山先生常常举执信为榜样来激励同志,并设立执信纪念学校来纪念他。

鎮南关起义見聞

郑惠琪等口述

据政协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按：一九〇七年的鎮南关（現改称陸南关）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亲临指揮的一次起义。可惜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参加鎮南关起义的老人了，但是目睹鎮南关起义的老人还不少。我們分別在凭祥市和靖西县訪問了郑惠琪、潘岐記、梁振昇、陆有堂、黃廷章、鄂永輝、黃美敷、卓錦湖八位老人，請他們追述当日目睹的情况，現將記錄材料加以整理，名为“鎮南关起义見聞”。这八位老人簡介如下：

郑惠琪：八十二岁，住凭祥市南街，現业医师，鎮南关起义时是一个普通知識分子。

潘岐記：九十二岁，住凭祥市，現退休在家，起义时是凭祥的棉布商人。

梁振昇：七十二岁，住凭祥市弄尧村，貧农，起义时是鎮南关炮台退休炮手的儿子。

陆有堂：八十三岁，住凭祥市弄尧村，現退休在家，起义时在当地当塾师。

黃廷章：七十六岁，住凭祥市卡凤村，現退休在家，起义时在当地当塾师。

鄂永輝：八十一岁，住凭祥市濠渠村，中农，現退休在家，起义时是当地的农民。

黃美敷：八十岁，凭祥县隘口街人，原是小商販，現退休在家，起义时是小商販。

卓錦湖：八十三岁，靖西县人，現任政协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員，起义时任清軍榮軍帮帶。

(一) 鎮南关起义前革命党的活动

郑惠琪：鎮南关起义的首領，出名的是黃明堂(又叫黃八)、李祐卿(又叫李官)、何伍(又叫何老槍)三人。黃明堂和何伍都是广东欽州人。何伍是武术教头，拳脚很好，在中国和越南交界的一带地方，很有名声，徒弟也很多。他所带的革命党人，多是他的徒弟。他又是参加三点会的，平时兼做点小生意，因之熟識的人很多。李祐卿原是凭祥的土官，为人驕傲自大，官僚作风十足，所以人們都叫他李官，地方出名的紳士黃济猷、黃子峯等都和他合不来，联合一班不滿他的人去控告他，他的世袭土官就被革除了。李祐卿被革官后，无事可做，生活困难，只得出外謀生，后来他招集了一班人同去云南参加筑铁路。他在外面知道孙中山搞革命，就找机会和革命党人接近，并参加了革命党。

鎮南关将起义时，革命党派人来凭祥活动，邀集青年前去参加，說每人每月有餉銀二十元，集合地点在凭祥附近，愿意参加的人就在簿上签名。听說签了名的有一百多人，但大多数沒有得到餉銀，所以去的人就不多。那时候有一个常在市上收买鴨毛的人对我說：“你很有办法，如果想搞革命，我可以使你当上一个連长。”我当时对革命沒有認識，勇气不够，并且心里想：一个收鴨毛的人怎么会有力量給我当連长呢？因而怀疑不信。过了沒多久，鎮南关就起义了，这个收鴨毛的人也不見了。

从广西去越南，来往出入，都要身稅紙。当时領一张身稅紙收銀幣二角，每年到十二月換領一次。有了身稅紙，就可以通过国境經商貿易。因此，参加革命的人就借口經商，来来往往，或去开会，或通消息。照規定，有身稅紙的人虽可随时出入国境，但不得在越

南过夜，惟执行不大认真，革命党人到越南活动还是相当方便的。只是在镇南关起义后有一个短时期，法方不许持有身税纸的人进入越南；过了这个时期之后，法方仍恢复了原来的办法。

潘岐记：镇南关起义前几个月，孙中山派一个叫邓睿臣的人来凭祥搞宣传联络工作。他以行医作掩护，有机会就进行宣传。他胆子很大，常在衙门口大街当众演讲清廷的腐败，丧权辱国，必须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听讲的人非常感动，同时又钦佩他大胆，并且担心他会受到清朝官吏的迫害。但他很机警，睁眼一望就分清那些人是老百姓，那些人是清朝的爪牙走狗；他看到清朝爪牙走狗一来，就掉转谈锋，不露痕迹，使得狗腿们无法抓到他的把柄。将近镇南关起义的时候，革命党又派一个叫何凯荣的人来凭祥工作，借住在我的苏杭店里。何凯荣行踪秘密，日间一早就出外工作，到深夜才回店住宿。我明白他是搞革命的，他也知道我会为他守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

那时听说孙中山在河内，曾经一度来文渊，住在权记客栈里。孙中山在河内曾出资开设日新茶楼，作为革命同志会面联络的场所。我曾经到过河内，本来有机会见到孙中山的，但事情忙，没有时间等候，终于没有见到。

梁振昇：镇南关起义大概是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旧历十月二十几的事。带队来占领炮台的是黄明堂、何伍几个首领。未起义之前，他们老早在越南的同登、那浪、那模一带（都靠近中国国境）活动了。黄八叔（黄明堂）就在边界大沟村的石山上住了半年多。何伍是参加三点会的，曾替老番（法国人）做过工，更常在那边来往活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越南活动，法方是知道的，但他们开只眼闭只眼，不加干涉，无非是想造成中国纷乱，好从中渔利，得

到好处。后来鎮南关起义失败，法方对革命党人就大加迫害。

卓錦湖：一九〇七年春間清吏在广南欽州、防城一带加重征收糖稅，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关仁甫、刘梅卿到那里去宣传鼓动，掀起了抗捐运动的反对清朝統治的革命斗争。七月間，革命軍攻打防城县衙門，因清軍哨官刘輝廷、李輝堂等反正，順利地占領了县城。两广总督张人駿得报，即令广西提督兼太平思順兵各道龙济光，派遣光軍分統陆荣廷統率所部督帶譚浩明、管帶林俊廷、曾少輝等三營，前往防城鎮压。我那时在曾少輝营当帮帶，也随部队到达防城。革命軍以清軍已至，众寡悬殊过甚，就退入上思屬的十万大山。陆荣廷所部未經战斗，就进驻了防城县城，不久，奉調回龙州駐防。

欽、防起义失败之后，同年秋間孙中山派黄兴、黄明堂、关仁甫、梁兰泉等规划鎮南关起义。黄明堂、关仁甫原系游勇首領，以后参加同盟会，成为革命党的骨干。梁兰泉原系苏元春部毅新营督帶，苏元春被充軍新疆后，梁不安于位，帶領亲信数人走入越南，参加同盟会。这时，清朝榮軍督帶陈炳焜所部有两个哨（每哨約有百人）驻扎在鎮南关右輔山的两个炮台，一哨駐南台，一哨駐北台，两哨的官兵向来和梁兰泉相識，两个哨官都和梁兰泉相好。因此，梁到鎮南关附近的村落活动，向两哨官兵宣传清朝专制的恶毒和汉人亡国的痛苦，官兵听了就很相信和感动，均慷慨激昂地表示愿意参加革命起义。黄明堂、关仁甫两人則到那模村向早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祐卿商量进攻鎮南关的計劃。这是革命党在鎮南关起义前活动的大致情况。

(二) 革命軍攻占鎮南关炮台和起义时的情况

陆有堂:革命軍是由黃明堂、何伍、李祐卿三人率領,从越南同登、那模各处帶队前来,进占了鎮南关炮台,队伍約有三、四百人。他們来到炮台附近,就有内应接他們上去,沒有經過什么开火打仗。革命軍經過我們弄尧村边时,高声叫喊:“你們不要走,不要怕!”革命軍的紀律很好,沒有半点騷扰。他們講什么話的人都有,土話、白話、客話……,以講客話的最多。大概是攻占炮台的第二天,孙中山也来了。孙中山在炮台沒有住多久,听說只住一、两天就回去了。

黃廷章:一九〇七年旧历十月二十七日,革命党黃明堂、何伍、李祐卿等帶領二、三百人由越南的溪卜、經国境弄怀和弄尧的小路进攻鎮南关右边石山頂鎮北炮台。守炮台的是李哨官的兵,李哨官和士兵都老早和革命党有联络,愿做革命軍的内应,所以革命軍一到,他們就反正,欢迎革命軍进占炮台。离鎮北炮台不远的鎮中炮台和鎮南炮台也是李哨官的兵駐守,革命軍跟着分兵前去占領。这样,鎮南关的三个炮台就完全落在革命軍手上了。

三个炮台的位置在石山頂三个最高的峯巒上。炮台东面的山腰是鎮南关。当时駐守鎮南关本营的是管帶黃福廷,他本来和革命党事前联络好了的,約定革命軍一到他就豎旗反正。革命軍占領炮台后,派一个軍官帶十多名士兵拿一幅革命旗帜送交黃福廷在鎮南关升起,作为革命軍占領了鎮南关的标志。誰知黃福廷当时見革命軍人数不多,以为革命軍力量薄弱,未必能成大事,自己背叛清朝,只有坏处,沒有好处,于是就临时改变主意。当送旗的革命軍将要到关时,他便开城將軍官击毙,并打死士兵两、三人,豎

守鎮南关本营，等待援軍。

革命軍占領炮台不久，孙中山和黄兴就赶到了。孙中山在河內各处演講宣传清朝腐敗，压迫汉人；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听讲的华侨非常感动，捐助革命軍費非常踊跃。孙中山买了駁壳枪数十支，分配給黃明堂、何伍的部队使用，另外建立手枪兵一小队，由黃明堂率領。孙中山对反政的李哨官和士兵极为嘉奖，一次奖給李哨官三百元，士兵們都得到奖金。

梁振昇：占領炮台的革命軍約有四、五百人，他們行軍的路綫是由越南的那模、那浪入国境的弄怀、弄尧而上炮台。駐守炮台的是清朝哨官李福南和他的一哨士兵，革命党早就和他們联络好了，約定革命軍一到，他們就反正立功。炮台的官兵时常到那模那边玩耍，每个士兵事前已領了革命党发給的三个月餉金的奖賞。这样，革命軍不費一枪一彈，就占領了天險要塞的炮台。

革命軍占領炮台后一、两天，孙中山和黄兴就来到炮台指揮。孙中山到炮台的第二天，从山上落到我們弄尧屯，坐在我家对面的木棚下面。我們屯里的人多数不在家，只有我和少数人和一些小孩子在家。小孩子見孙中山服装整齐，以为是外国人，就大声叫：“老番来咯，老番来咯！”孙中山馬上說：“我是中国人，不要怕，不要怕！”和孙中山同来的还有一个人，后来我同他們上炮台，才知这人就是黃兴。孙中山在我們屯里休息一、二十分钟，态度非常和藹可亲他問我屯里的人哪里去了，我照实答复了他。孙中山又說：“炮台現在是我們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玩，我們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滿清，那时大家就可以自由自由，不受压迫欺負了。”在場的人和小孩子們也和孙中山談了几句，后来我們就欢欢喜喜地跟他上炮台去。

我的父亲原是炮台的炮手，在这不久之前因年老退休回家。炮台上的官兵我都認識，平日常常上炮台去和官兵玩耍。我跟孙中山上了炮台，看見黃明堂及其他軍官正在中台、南台、北台来往巡視。忽然鎮南关方面打来一个炮弹，伤了一个士兵。孙中山立即叫人負去好好医治，又問哪一个开炮还击。有一个姓龙的炮手走过来上弹还炮，孙中山很高兴，立即賞他四个光洋，后来又賞他一床洋毡。

孙中山对士兵說：“滿清太腐敗，太可恶，我們一定要将它推翻，我們的革命一定成功，大家努力吧！”士兵們听了他的話，都非常感动。

革命軍的武器很复杂，各种枪支都有，还有一小部分人用馬刀。孙中山发給革命軍的武器，听說有駁壳四十支，每支配子弹六百发，这是革命軍中最好的武器，黃明堂分得較多。黃明堂和何伍都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言語相通，我和他們很談得来。

革命軍紀律严明，对羣众态度和气，买卖公平，羣众非常欢迎他們。

孙中山来炮台的路綫和革命軍来炮台的路綫一样，都是由那橫經国境的弄怀、弄尧而到炮台。孙中山在炮台大約住了两天，又由原路回越南去了。

(三) 清軍的反攻和革命軍的撤退

陆有堂：革命軍占領炮台后，清朝派陆亚宋（即陆榮廷）等帶大兵向炮台包围，先围东、北两面，以后逐漸包围到南面。鎮南关、卡凤、渠灘各村庄山头，都是清朝的兵。我們老百姓有些怕打仗危險的就向远处躲避，胆大的仍旧做他的生理。双方相持了六、七天，

清朝的兵逐渐迫近炮台。革命軍怕清兵截断往越南的通路，粮餉軍械无法接济，就自动退出炮台，由靠近鎮南关的那条小路安全退回越南那边。

鄂永輝：炮台被革命軍攻占的第二天，各处清軍源源向鎮南关开去，准备反攻。各处开来的部队地形不熟，責成保董黃广礼找人带路。黃广礼适在摩沙見我回家，馬上要我去带路，我就把由大連城开来的兵帶到我本村渠瀝扎营。这支兵大約有四、五百人，是曾紹輝管帶率領的，他們除了驻扎渠瀝外，还派一部分人驻扎卡凤、摩沙等处。

旧历十月廿五、六前后，曾管帶的兵开始和革命軍交战，但还是前哨小接触，到了廿八、九就轉入剧战。黃福廷管帶督队打前陣，陈炳焜打后關門，陆荣廷亲到前綫督战。黃福廷在陣上負伤，并且死了不少士兵，还是攻不上去。后来由曾紹輝帶队包抄炮台后路，攻占了革命軍据守的弄尧屯，逐渐迫近炮台，但仍未能将炮台攻下。双方一直繼續作战到十一月初四，清軍越来越多，革命軍以众寡悬殊，才由鎮南台的小路退入越南文淵。这时清軍才进入炮台。革命軍退入文淵时，法国的“三划”（是法国官阶的一种标志）把他們送到諒山轉送河內释放。

黃廷暉：清軍黃福廷管帶的部队駐鎮南关，陈炳焜的营务处駐隘口，陆荣廷的統領部駐凭祥，龙济光当道台，駐龙州。这几部分軍隊都向鎮南关一带集中，包围三个炮台，又在凤尾山、大青山、小青山、帶驢山各处架大炮向炮台轰击。听说当时調到鎮南关一带的清兵有八个营之多。

清朝限期要龙济光、陆荣廷夺回炮台，过限就严厉办罪。黃福廷因部下反正，致炮台失守，罪責更大。龙济光、陆荣廷責成黃福廷

打先鋒，將功折罪。黃福廷攻打炮台時腿部受重傷，連攻數日還是攻不下。後來革命軍見清軍越來越多，自己的武器彈藥接濟不上，日少一日，並且知道從越南運來接濟的槍支、糧餉被法國鬼阻撓，不得通過，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作無謂犧牲，就自動放棄三個炮台，從小路退入越南。

卓錫湖：革命軍占領炮台的次日，鎮守鎮南關的陳炳焜在南關口和革命軍交戰。革命軍和兩哨反正的官兵約三百餘人，使用炮台的大炮和小炮頻頻向陳炳焜部襲擊，擊破了左輔山的炮台一角。二十九日炮火尤為猛烈。當時傳說孫中山和黃興都在炮台上督戰。陳炳焜不敢冒險進攻，只好固守陣地待援。

十一月初三、四日，清軍龍濟光和陸榮廷的大隊人馬已經趕到前線。龍濟光率領所部濟軍三營，陸榮廷率領所部榮軍三營，會同陳炳焜、曾少輝等部進行反攻。龍濟光由青山炮台南關關，陸榮廷由摩沙，陳炳焜由南關口左輔山、曾少輝由四方嶺及尖山，分頭包圍進攻。雙方都利用炮火射擊，激戰兩晝夜。初五日絕早，革命軍忽然退去。事後了解，革命軍因炮彈用盡，步槍彈藥也告缺乏，更嚴重的是飲水和糧食不繼，不得不放棄三個炮台。撤退時由南台拆毀一個缺口，從小路退入越南文淵，集中於越境的燕子大山。反正是兩哨官兵也隨同革命軍撤退，以後又隨同王和順等參加河口的革命起義。

這次戰役雙方均有死亡。清軍哨弁黃瑞興、馬朝輔、古景邦均受傷，士兵傷亡十餘人。事後，龍濟光、陸榮廷、龍觀光、陳炳焜、黃瑞興等都因鎮壓革命有功，得到清廷的獎賞，並且升了官。

黃美敷：清朝限陸榮廷一個星期內搶回炮台，如果過限，就要革職解北京辦罪。陸榮廷那時十分恐懼，到我們隘口伏波廟起福，

求神保佑。他攻了两天沒有攻下，就找保董凌美南招帶路人三十名，引导清軍从小路进攻。凌美南轉託莫启生代招，每人发奖金三十元。莫启生招足了三十人，清軍在七天之內夺回了石山頂的炮台，帶路人都領到奖金，但莫启生却一个錢也沒有得到。莫启生去报告陆荣廷，陆荣廷以凌美南中飽了奖金，就把凌美南处死。

陆荣廷围攻炮台的兵很多，革命軍守了几天，外面的接济沒有来到，就由小路退入越南去了。革命軍失敗后，法国鬼在那模各处清乡，被捉去屠杀的人不少，那模村的人都逃到別处去了。隘口附近参加起义或替革命党通訊的人，怕被清軍捉去屠杀，也逃到別处，或者迁入越南落业，現在一个都沒有了。

潘岐記：鎮南关起义时，陆荣廷曾經有意归附孙中山，后来見清朝势大，革命軍势弱，害怕反清站不住脚，就不敢反了。陆荣廷攻打石山頂炮台，战事并不劇烈，这是陆荣廷留有余地，准备将来有需要参加革命党时，得到革命党的諒解。

陆荣廷帶兵赴前綫經過凭祥时，我在街上見到他。他叫我去看打仗，我說我刚从別处回来，沒有空。这时陆荣廷还是分統，打下炮台后，不久就升統領了。

附記：关于鎮南关起义的日期，上面几位老人所述，各有出入。我們参考其他文獻，当年亲隨孙中山参加鎮南关起义的日本人池亨吉所著的《中国革命实地見聞录》（中文譯本，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七年出版）記載，是一九〇七年阳历十二月一日，即阴历十月廿六日。邹魯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記載，亦是阴历十月廿六日。馮自由写的《南軍都督王和順》一文（見《革命逸史》），則說是十月廿七日。究竟哪一天为确，还有待进一步考証，因此对各老人所述，一律不加更改，以备参考。

（李靜生、岑建英記錄 李微整理）

我参加同盟会和回广西进行 革命活动的情况

刘 崛

我留学日本和参加同盟会的经过

戊戌政变后，风气渐开，有进步思想的爱国的青年，都争取进学校读书，希冀将来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我的姊夫黄宏宪号用溥，很关心国事，对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极表不满。当时桂林设有广西体用学堂，是一所新式的学堂，讲授英语、数学、格致等课程。黄宏宪在该学堂肄业，他知道我是想进步想革命的，也邀我去。这样，我就和他一起在体用学堂求学了。

光绪末年，容县陈协五（清朝举人）在梧州国民学堂当校长，他与胡汉民很要好，向往革命，请黄宏宪在他学校里担任教务。宏宪当时职务多，忙不过来，就荐我在教务处帮他搞工作，并兼任教课。

陈协五、黄宏宪和我都是好谈革命、醉心革命的，我们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因此，有一部分接近我们的学生，受了我们的影响，思想也有进步。

这个时候，胡汉民亦来梧州中学教书。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相同，所以非常投契。我们对革命理论进行探讨，相互间得到了不

少的启发和帮助,还做了不少宣传革命的工作。

那时,庄蘊寬当梧州道台,适遇地方上有一个案件,道台衙門翻得了一笔大款。庄蘊寬是提倡新学的,就利用这笔款在梧州道各州府选拔优秀人才五人派送去日本留学。因为我好谈进步,活动力又較強,庄找我去面談,很賞識我,就把我列名保送。这样我就获得公費留学日本。

我去日本是在光緒年間,比陈协五还要早些,初入东京的法政大学,后轉早稻田大学。我到东京不久,就参加了同盟会,介紹人是邓家彦和胡汉民。入会后,我参加革命宣传和組織工作,写的宣传文件及办的刊物相当多,《粵西杂志》是經我筹办的,組織工作也有发展,会员由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八十余人,这些同志后来被称作“老同盟会员”。

我在南洋各地的活动

孙中山先生对我相当信任,几次派我去南洋各处联络华侨,募捐款項,协助宣传工作,办革命刊物,写宣传文章。为着向华侨捐款,我到过朝鲜、越南、暹罗、緬甸、印尼、新加坡及南洋各大埠,每处住三、两个月不等。广西籍华侨捐助不多,捐助最多的是广东籍华侨,捐上万元至数万元的人为数不少,其中尤以邓某及徐某两位侨胞最为热心踊跃,捐得的款項,亦委託他們代收保管。我前后在南洋各处工作,历时数年之久。

我两次回广西的革命活动和被捕的經過

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广西,是宣統年間,因为搞革命,到处被人注意,行动很不便,不久就离开广西。我第二次回广西,是在三月

廿九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停留的时间也不很长，因容县党狱案被悬赏通缉，又逃到香港。我回来的目的，不外想加强联络宣传，相机进行起义。曾与苍梧长洲黎东平联系，他思想颇进步，但不是同盟会会员，因他家离梧州不远，联络工作得他帮助，方便不少。但梧州知府李开侁早就清楚我是同盟会会员，因此对我的行动十分注意，我不能在梧州长住，就是为此。

三月廿九日的广州起义，我和刘古香本是负责组织广西籍的武装参加攻广东督署的。刘古香住在旧仓巷，与李德山秘密组织武装。起义时，李德山率领十多个同志进攻督署。因起义时间提前了一些，我住在城外，未及带人进城，已经发难，清兵关了城门，我们无法入城增援。进攻督署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清方搜捕党人十分严厉紧急，我在广州已不可能再住下去，考虑去香港不如回广西对革命有利，于是就连夜搭船上梧州，再作打算。

我到梧州后，原想住下来，徐图开展工作。但梧州地方官吏对党人提防十分严密，我知道在梧州已难立足，就改变计划搭船赴潯州，决定在潯州进行工作。当时潯州知府是彭言孝，他不知道我是从广州上来的，潯州同盟会的同志报请他派我为潯州中学堂教员，说我是老早就在潯州居住的，于是我在潯州得以安定地工作下去。

潯州中学学监陈同志、教员朱同志及欧同志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对革命很热心，在社会活动方面亦很活跃，对我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武装帮助很大。

为了组织实力，准备起义，我曾经积极联络大瑤山一带的绿林，介绍我和他们认识的，是藤县温良才的儿子。温良才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其子因平时听父亲谈洪秀全革命故事，十分同情革

命,非常欽佩孙中山,知道我是孙中山的同志,亦就和我很亲切融洽。他和大瑤山一带的綠林領袖有很长久的渊源和密切的关系,就向那些綠林領袖疏通,欢迎我去。实力最大、枪支最多的綠林領袖是郭伯牧,又名郭三;其次是陈某,綽号亚槓六。郭有枪二、三百支,陈有枪百多支,其他那些头目都是几十支不等。我去大瑤山,要經過象州的东平村,那里有个同盟会会员,我在他家里住宿。东平村附近的东平圩,駐有一个綠营管带,名字叫白有祿。郭三的綠林武装,有时亦来东平圩活动,白有祿聞风,即大肆搜索,将形迹可疑或来历不明的人和远路客商,一律加以逮捕审問。我是远路来的人,因此被捕,并解到象州。白有祿认为我嫌疑重大,定要把我杀害。恰巧柳江道台李某来到那里,知道我是一个留学生,不同意不明不白地将我处死,即打电給其在柳州中学讀书的儿子,調查我是否革命党或是坏人。他的儿子又向校长(柳中校长)鍾明甫了解我。鍾明甫是同盟会会员,答复說我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好人。李道台的儿子信以为实,电复他的父亲。李道台接到复电,即将我释放,并諸多慰勉,又派兵送我至安全地带,囑我好好回溥教学,我始获脱离虎口;回复自由。可是,我回到江口,就得到密报,說容县的党獄案已經发生,我被通緝在案,而且是个要犯。于是我就漏夜兼程赶到广东都城搭船出香港。

武昌起义时我在梧州的活动和梧州独立情况

武昌起义前,我曾三次回到南宁和雷鵬池、王金波、譚昌等商談革命工作。武昌起义时,我正在香港和其他同志策动在广东起义的工作。当时进行革命的主要步驟和計劃,决定分作三个地区——武汉、上海、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我是广西人,参加广州地区

的策动,条件较为方便有利,所以被派在香港工作。我是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这个职务是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时委派的),因此,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我又赶回广西。

同盟会广西分会的办公地址,起初设在梧州沈公祠一个地方;后来工作人员增多,而我负责的梧(州)、平(南)、潯(州)民军征集所也在那里办公,地方不够用,遂又把药王庙一起都作为我们的办公地址。同盟会广西分会的工作同志,两广、湖南、贵州、四川人都有,人数相当多,主任秘书是容县长崎的徐志翔。

梧州独立前后这段期间,保皇党非常活跃,重要角色是陈太龙、林绎及梁廷栋。梁廷栋对我有意见,但不敢公然攻击我。

梧州九月初十独立,比桂林独立早了好几天,这是遵照同盟会上级的指示而行动的。梧州独立,各方面各党派各团体都有人参加。但由于保皇党的地方封建势力大、人数多,后来在用人行政方面,我们不能不有一些迁就让步。那时我已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离开梧州,对广西的问题我亦不大注意和过问了。

在梧州独立时,军事的最高指挥由我负责,刘炳宇、刘达庆、刘仙岑(这三个人非同盟会会员)、刘玉山、陆受堂(这两人是同盟会会员)等人协助。那几个非同盟会会员都握有武装实力,而那两个同盟会会员则组织有一部分革命武装,都由我委给临时名目。我在梧州附近及大河一带招集绿林,大概有二千人之多,江口以下直至梧州的大小帮口,都接受我的指挥,每帮的枪支都是几十支,没有什么大帮的。我能够和他们联络得很好,都由于翁亚秀从中出力。翁是容县人,住在梧州,家里很有钱,慷慨疏财,好结交江湖豪侠。大河上下游的绿林领袖,都和他感情很好或与他有直接间接关系,听从他的话。他因和地方官吏作对,被通缉逃到南洋。他很敬仰

孙中山，我回梧州，他也回来帮我做联络绿林的工作，所以大河上下游的绿林，都联络得很好，服从我的指挥。这些绿林队伍的伙食，暂由捐款支付。

继梧州独立之后，广西全省宣布独立，陆荣廷要经过梧州到桂林就任都督。他由南宁下到桂平江口时，大河下游两岸的绿林，即在江边两岸山头守卡，不让他通过。陆无奈，派亲信两人带现款数千元来梧向我说情。我原想不给他通过的，后接到孙中山电报，大意说：我们目前最紧要的是摆倒清廷，广西的军政可暂由陆来维持。我不能不服从孙中山的命令，这样，才同意陆荣廷到梧州。陆到了梧州，请我到他所坐的大船叙谈。大船上会客厅是前后两间，我到了前厅，陆即出来相见。还没有谈到几句话，李开侁从后厅出来。因为他过去曾通缉过我，一见面我不禁怒火中烧，即拔枪想和他算账。陆见这种情况，急起将我拦阻，李开侁即向后厅避去。陆和我只说了些客套话就互相离开了，并没有谈过什么具体问题。陆去桂林时，李开侁做他的临时秘书长，林竹筠做他的秘书，一起去桂林。

有人说陆荣廷的都督印，是我刻好送交他的。这是旁人捕风捉影之谈。陆到梧州，他和我连话都没有谈多几句，根本没有这回事。

陆荣廷对于绿林武装很不满意，对我们同志组织的革命武装亦不高兴。同盟会会员拥护他的，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反对他的，就难免遭到他的迫害。我去南京后，那些绿林武装大都先后被他消灭，同志们组织的革命武装亦先后被他解散，翁亚秀后来竟被他杀害。

梧州独立没有好久，我就去南京当临时政府参议院的参议员，

这是广西执政当局怕我在广西摆老资格，使他們不好任意办事，用这个方法把我推出去的。

附帶談几个問題

有人說王和順想做广西都督，这事我当时沒有听到。我想即使王和順想做，亦不可能实现，因为他是綠林出身，又不孚众望，是很难办得到的。以我所知，黄明堂当时可能还有一些希望。

陆荣廷是不是同盟会会员的問題，很多人不清楚。陆荣廷是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介绍人是曾彦和龙州方面一位姓宋的同志。当时有人主张不許陆荣廷参加，孙中山說：“允許他吧！”后来要发入会証的时候，我又向孙中山請示可否照发，孙中山說：“照发吧！”他参加同盟会的經過，是比较复杂特殊的。

罗佩珩为什么把綠林解散？为什么做怀集县长？为什么又被陆荣廷杀害？这是因为：罗当时如不把綠林解散，怎样維持得下去呢？他的怀集县长还是代理的；他的被杀是因为貪做官，不懂陆的脾气，又不善自处，就难免杀身之祸了。他进攻桂平时，基本部队不多，始終在江口附近，打不到桂平。

容县的党狱案，是梧州知府李开侁和容县的豪紳黄玉雄、苏紹章等勾結起来搞的。起因是我們同志通信时曾将国家的国字只写外边一个大“口”字，不写里面那个“或”字，他們就认为这是革命党的暗号，罗織罪名，將我們通緝，想借此来升官发财。当时被通緝的，有陆荣廷、庞定宗、陆涉川和我几个人，被即时逮捕的有黄宝宪（号秉泉，黄宝宪之弟）。幸而我們消息灵通，未被捉到。他們以为我藏在容县活动，料不到我在江口就知道了消息，立即逃到广东都城搭船去香港了。

光緒、宣統年間在東京出版《粵西雜誌》，是我與陸涉川負責籌辦的，總編輯由卜世偉負責，編輯有六、七人。這個刊物只發行了七期。此外還有兩個進步刊物，則是別人負責辦的。

同盟會廣西分會主任秘書徐志翔，為人很正直，做事很負責，民國初年他看到當局措施失當，氣憤成疾死了。

陸榮廷到了桂林後，不論同盟會、保皇黨、共和黨、進步黨、立憲派，大多數人都擁護他了。這完全說明了當時大多數人都是為了名利、為了做官，諮議局的諸議員大都如此，連一向比較堅定的鍾明甫也是如此。能夠堅持革命，不受利祿引誘的人是很少的。

（李靜生記述）

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

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

李任仁

广西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广西的会党、游勇的反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山先生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初期就很注意这个地方了。早在一八九八年李立廷在玉林起义时，兴中会就派邓蔭南从香港进入广西联系，可惜行抵藤县，李立廷的起义已经失败，只好废然而返。

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同盟会会员就继续不断地在广西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在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广西的知识分子，到东京、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求学，参加了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广西工作，同时进行革命活动；一类是外省籍人士，通过种种关系得到广西官方的聘请来广西工作，他们或在来广西前参加了同盟会，或在来广西后参加了同盟会，借工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前者的活动据点大多在政法、文教部门，如諮議局、法政学堂、中学、师范学堂等等；后者的据点大多在军事或军事教育部门，如兵备处、新军、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等等。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同盟会在广西扩大了组织，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和各界人士参加，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和准备武装起义的

工作，成为当时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

广西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经过一段转变过程的。远在戊戌政变前，康有为曾来到桂林办学，办了广仁学堂和《广仁报》。唐景崧在台湾抗日失败后回到桂林，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创办体用学堂，聘请唐氏负责。唐和康有为见解相同，往来很密，在体用学堂里大肆灌输其变法维新的主张。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湖南善化人汪貽书做广西学台，他是翰林出身，赞成康、梁的主张，来广西后很提倡看《清议报》、《新民丛报》、《饮菽室文集》、玉船山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天演论》、《羣己权界论》一类书报；并且在考试的时候，谁的文章有变法维新的思想便予取录，给优贡、拔贡等头衔。他又在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把考试录取的学生和由体用学堂改办的广西大学堂学生大批送去日本留学。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影响下，广西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多是康、梁的信徒，变法维新的热中者。后来他们看了《民报》、《黄帝魂》等革命书报，和同盟会的人们发生接触，以及观察时局的发展，看到清廷顽固腐朽的不可救药，列强瓜分之祸日益迫近眉睫，他们就觉悟到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是不可能挽救祖国的危亡的。于是他们就逐渐和改良主义决裂，进一步踏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同盟会。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广西籍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六十多人。马君武、曾汝璜、何少川等人的转变，就是几个典型的例子。马君武是体用学堂的学生，受过变法维新思想的熏陶，原是康、梁的信徒，曾经用“马恂”的笔名在《广仁报》上写过稿。后来他先去广州求学，和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派人士来往接触，继后又去东京，问学于章太炎先生，大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终于和康、梁分途而踏上革命的道路。他在

东京先和章太炎先生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六十周年紀念会”，及后中山先生到日本筹组同盟会，他是最初参加者和主要人物。曾汝璜是广西靖西县人，曾肄业于体用学堂，由于极力鼓吹变法维新，很得到学台汪貽书的賞識，曾写信奖励他，称他为“边地先觉”。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由馬君武介紹見中山先生，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参加了同盟会，常常寄革命书报回广西給青年朋友看，又穆愿和帮助靖西县的青年凌发彬、陈魯、张丙朝、邓鴻韶、邓鴻緒等东渡求学。他毕业后回广西，极得当时在龙州督办广西边防的庄蘊寬的高許，聘为边防法政学堂监督，在龙州一带宣传革命，进行活动。鎮南关起义时，他曾秘密策动陆榮廷响应，不幸为龙济光所阻，沒有成功，他就因这事为龙济光所忌而弃职逃回故里。何少川是桂林人，曾入康有为所办的广仁学堂讀書，嗣入体用学堂肄业，受維新派的影响很深，当时他就以为科举制度阻碍文化的进展，不去参加科举考試。一九〇五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和革命党人来往，受革命思想影响，终于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工作。毕业后回桂林，适广西練新軍，他接受督蔭公所的聘請，担任建筑混成协、学兵营的营房工程，繼主办工业学堂，一面教育青年，一面宣传革命，和桂林的同盟会同志时常密商革命工作。辛亥革命广西宣布独立时，他几乎遭到巡防营叛兵的杀害。这几个人的道路就是当时知識分子所走的道路。我原先也是康、梁的崇拜者，受过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后来看到《民报》、《南风报》等革命书报，和同盟会人士来往接触而转变参加革命和入同盟会。这点，下面还要詳細說到。

外省籍革命人士来到广西工作，大体通过两种关系，一是李經羲、郭人漳的关系，一是庄蘊寬、鍾永建的关系。李經羲于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从貴州巡撫調广西巡撫。他是淮軍統帥李鴻章

的侄子，調任广西巡撫后恰巧清廷要办新軍，他很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势力。时淮軍將領郭松林的儿子郭人漳在江西当常备中軍統領，李、郭原是相識，李就咨調郭来广西練新軍。郭人漳練新軍当然需人协助，就先后請調在江西岳凤梧軍任哨官的广西人林虎，在湖南井自學堂服务的湖南人蔡錫、雷騰等来广西工作。黄克強和郭人漳、蔡錫等原是相識，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黄克強就秘密来桂林，住郭人漳軍中。經黄克強在桂林吸收的同盟会會員，主要有郭人漳、蔡錫、赵声、林虎、雷騰、胡毅生等人，从而在广西軍中种下革命种子。庄蘊寬是江苏人，江阴南菁书院学生，又是江苏省的优貢，先在桂平任潯江书院山长，后調桂平县知县，繼調梧州府知府，最后調龙州任太平思順兵备道，督办广西边防。在当时來說，庄蘊寬的思想算进步的，他在梧州时創辦了梧州中學校，这是广西創辦最早的一間中學。胡汉民未去日本留学前就曾在梧州中學任教。李济深也是这間中學的学生。庄蘊寬到龙州后也要办新軍和講武堂，請他的江苏同乡又是南菁书院的同学鈕永建来主持其事。鈕永建是同盟会會員，来广西之前已經参加了同盟会。庄蘊寬又办边防法政學堂，曾汝環为監督。鎮南关起义时，庄蘊寬已經調桂林兵备道，在龙州的职务由龙济光接替。兵备处是主办全省新軍的，需要更多的新軍人才，庄蘊寬通过鈕永建的关系先聘請王孝縝（勇公）、李书城、孙孟毅于一九〇八年来到桂林工作。这几人都是日本士官毕业生，而且都是同盟会會員。王孝縝是福建人，出身于封建大官僚家庭，祖父王庆云做过工部尚書，叔父王仁堪是状元，父亲王仁东做过四川粮道。因为这个关系，他特别得到信任，不仅庄蘊寬信任他，巡撫也信任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世家子弟是不会搞革命的。他们就托王到北京等地約請更多的新

軍人才到广西工作。于是就先后約請了日本士官毕业生和保定軍官速成学堂毕业生耿毅、何遜、冷遜、陈之驥、赵恆惕、尹昌衡、孔庚、呂公望、刘建藩、楊风樓、楊明远、雷海榮、孙岳、刘洪基、田遇东等五、六十人來广西，分別在陸軍小学、陸軍干部学堂、学兵营、混成协等处工作。他們都是同盟会會員，經過他們的努力，宣传革命主張，傳播革命种子，大批青年加入了同盟会，參加了革命。

我是臨桂县会仙乡人。我的父亲是开中药店兼行医的。药店開設在会仙圩上，行医就是步行四乡。我因小时父亲打算要我学习中医中药，已經在父亲所开的药店当了三年学徒，学习制药。会仙是屬臨桂县南乡。当时南乡的惡霸是团总黃守日和举人文軫。文軫曾当过四川金堂县知县，因貪污被撤职回家閑住。那时彭晋孝当臨桂知县，黃守日和文軫勾結向彭晋孝請求包南乡的酒捐。向例，农民熬酒出卖的才抽稅，自熬自飲的就不抽稅。但黃守日、文軫串通了臨桂县衙門，強迫农民自熬自飲的酒也要繳納捐稅。农民非常憤慨，到处議論紛紛。說拿來熬酒自飲也要抽稅，岂不是拿米糞粥自食也要抽稅？我父亲下乡替农民医病，听到农民的議論，也看到农民的憤慨。会仙圩上另有一个医生名李会桃，是秀才出身，也在圩上開設药店，經常步行四乡替农民医病，同样碰到这样的情况。李会桃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二人很怕农民因此而暴动，就商量把几个有代表性的农民找来，替他們做了張狀紙，告到臨桂县衙門，請求自熬自飲的酒免稅。誰知臨桂县衙門和黃守日、文軫是串通好了的，狀紙一进衙門，黃守日、文軫就知道了。他們想农民是不会写狀紙的，一定有人替农民出注意，写狀紙。他們查出是我父亲和李会桃二人干的，又串通臨桂县衙門加我父亲和李会桃聚众抗捐的罪名，要传到县里受审。那天，恰巧李会桃下村看病不在

圩上，而我父亲正好在店里，就被差人传到县里扣押；扣押后也不给见知县，也不审讯。那时是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的十一月下旬，我才十多岁。父亲被传到县里，我也跟着去。父亲被扣押在县衙門廂房，廂房有一姓廖的小职员是認識我們的，对我们說，这件事知县不知道，不过是黄守日、文彬串通县衙門里的师爷干出来的。因此，递禀告状就达不到知县，一定給师爷所攔阻；除非是托輿告状，才能将禀达到知县。于是他就替我做了一个禀，我向知县彭言孝乘輿回衙門时就托輿呈递。彭言孝收了我的禀，对我說：“你回来听候批示好了。”我在桂林住了几天就回到会仙去，沿途农民都憤憤不平对我說：“你父亲为我们請免酒捐而橫被扣押，倘再不释放，我們大夥同去县里坐牢吧。”农民这样憤激，县里当然是知道的，他們怕事情鬧大了，又怕告到撫台去，于是在十二月廿七、八就把我父亲释放了。我父亲和族中父老受了这件事的刺激，都认为没有一个人讀書，没有一点功名是吃亏的，于是就不要再学习医药，而要我讀書求功名了。过了春节，我父亲就到桂林为我找寻讀書的地方。他在桂林找到一位廩生张筱竺在盐法道关帝庙开大館，就回乡叫我和大岩底村的李耀卿一起上桂林讀書。过了元宵，我就和李耀卿一同步行上桂林。我还記得那天下着雨，僱一挑工挑行李，行抵桂林就住在盐法道的关帝庙里。这时是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了，已經废八股，做策論，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大学堂学生廖延素是哥哥的朋友，我和他常有往来。我看见他常看《清議报》、《新民丛报》、《飲冰室文集》这类书报。这时间在桂林讀書的相識朋友有本乡上庄的张长卿、张敏卿兄弟，大岡埠的唐銘筌，他們和体用学堂学生张仁普交好，张仁普教他們看这类书报，并且向我介紹，說这类书报好看，我才向他們借来看。体用学堂是

己亥年(光緒二十五年)开办的,办了三年,到壬寅年改为广西大学堂,大学堂的学生都爱看这类书报,成为一种风气。这时汪貽书当学台,考試是做策論,他很喜欢維新变法、救国图强的論調。我在张筱兰的大館讀了一年多,到甲辰年(光緒三十年)也跟着一般朋友去应考,但没有考取。相識朋友张敏卿、唐銘三、李天佐、石孟涵、蔣繼尹都考取了。李、石、蔣三人还得到汪貽书的表揚,說策論做得好,接着送去日本留学。这时广西的知識青年到外边求学的很多,馬君武早到了日本,他和章太炎先生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國二百六十年紀念会”的消息传到桂林,知識青年和爱国人士都非常激动,对清廷漸漸从反感而至仇視。同时上海南洋公学学生鬧風潮,退学出来成立愛国学社,他們的宣传文字在《苏报》刊发出来,我們看了非常同情。爱国人士在上海张园演說革命、广西人龙积之(译厚)在上海奕富有票等消息陸續传到桂林,都在知識青年中发生深刻的影响,广西巡撫王之春为此还特別派偵探到上海刺探张园演說革命和龙积之奕富有票的情况。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王之春調走,柯逢时繼任广西巡撫,要办新政,首先办警察,街道上派警察站崗,每天要打扫街道,不許随地小便吐痰,很遭桂林人的反对,好事者写了一付对子和橫額深夜貼在巡撫衙門門上。对子是:“逢君之惡,罪不容于死;时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橫額是:“扶柯以伐柯”,把柯逢时的名字嵌上大加咒罵。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我又去应科考,这次考取了,算是入了学,当了秀才,得到附生的头衔。这年我已經不讀张筱兰的大館,而是和同乡馬展猷、白海門等在文昌門內的白家祠堂自学。

一九〇五年我进了学,就在那年冬天回到会仙圩去办小学。那时乡間有两种势力;一是办团的,代表封建势力;一是办学的,代表

并明进步力量，两者常常是尖锐冲突的。我回乡办学就得和封建势力斗争。会仙的团总是举人黄佐臣。黄佐臣和桂林秀峯书院山长翰林曹馴是通家（黄家祖上某人过继给曹家），他凭借曹驯的势力当上会仙十八团的团总。会仙原来是沒有小学的，我之回乡办学就是受变法维新的思想的影响，希望启迪民智，发奋图强。我恐怕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还约了一些同乡朋友同去。我们准备办会仙小学，推同乡朋友吕璜当校长，我当校董兼教员。办学首先要解决校址和经费的问题。校址我们打算设在会仙圩上的文昌庙，但文昌庙早已为团局占用，我们要拿文昌庙办小学，必须团局全部迁出或迁出绝大部分房舍。经费我们打算用地方公款，但这笔款项一向给团局霸着支配，我们要动用，不管从老虎口中挖出一块肥肉。因此就和黄佐臣发生直接冲突。黄佐臣鼓动十八团的人控告我们，说我们不尊重文昌帝君。我们也不怕他，告他阻挠兴学。官司就打到桂林去了。桂林团务总局是袒护他们的，而劝学所和提学使司则支持我们。这时提学使汪貽书已经去职，由李翰葵继任。提学使司里有一位文案总办林传甲曾在北京大学堂当过教授，后来分发广西提学使司工作。李翰葵和林传甲都是维新派人物，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官司是我们赢了，校址和经费都要团局交出。但黄佐臣还是抗拒不交。我们查知黄佐臣和他的儿子（是一位廩生）包赌，又把他父子的劣迹告到桂林，这样才把他的势力推翻，校址和经费问题才得到解决。但黄佐臣还不甘心，暗中不断破坏我们，诬毁我们办学是兴洋教，使得农民不敢送子弟入学。我们对付的办法是逐家劝说，登门招生。总算招到了吕演新、吕竟存、白崇禧及其弟尙同等五、六十个学生，学校才办成了。

办学初期，我还是满脑子的维新思想，很钦佩意大利维新三杰

瑪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常常把意大利三杰的故事对学生讲，介绍学生看维新派的书报，并且常常带学生到各处捣毁神象，破除迷信。文昌帝君的神象也给我们捣毁了。这两年中我们学校不断遭受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也不断和封建势力发生冲突，展开斗争。如我们学校经费不够，请求把会仙圩上的秤猪捐拨给我们，封建势力又发动十八团的人控告我们，结果又打了一场官司。当时我就这样想：这些封建势力不除，国家怎能富强进步？于是就对迁就妥协维持现状的改良主义维新派思想发生怀疑。这时同盟会已经在桂林展开活动了。陆军干部学堂的庶务朱汉典曾来我们学校参观，并且赠送我们学校一些革命书报。朱汉典是同盟会会员，除了在陆军干部学堂任职外，还在桂林市上开设翰芳斋文具杂货店，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秘密贩卖革命书报。朱汉典来参观后还常常和我们联系，不断鼓励我们。我们学校有一位教员名黄焱，是我们会仙圩人，桂林速成师范的毕业生。这间速成师范是私立的，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春天成立，借用桂林院前街双忠祠一部分做校址。校长曾广式，教员雷颺、邹代藩、梅蔚南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尤其是邹鬃子（即代藩）讲得更激烈。校中公开宣传革命。学生原是一年毕业，因为宣传革命太激烈给官方注意，就提前八月毕业。毕业生一部分为蔡锷保送到保定军校；一部分考入优级师范预科（又称简易科）升学，一部分去当教员。黄焱来到我们学校任职前，就常来坐谈。他常常对学生演讲革命的道理，谈及邹鬃子的情况，又介绍看革命书报，《民报》、《黄帝魂》、《天讨》、《革命军》等书报也都是我们常看的。因此，我的思想就渐渐脱离维新，而倾向于革命派，并且想继续升学，找寻革命关系，进行革命活动。一九〇七年（庚未年）秋季，我又上桂林考入优级师范预科肄业，读了一年毕业，升

入本科；本科讀了兩年，到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秋天畢業。

這時候桂林的革命活動是很蓬勃的，同盟會會員非常活躍。我當時雖然還沒有參加同盟會，但和他們很接近，常有來往。這時期同盟會在桂林的活動，我現在約略記得的有下面這些事情：同盟會支部設在李家村，桂林城里的秘密機關設在福棠街魏宅（現在桂林市政協副主席魏繼昌的房子），前進租給同盟會，後進魏家自住。同盟會的組織有廣西支部，耿毅為支部長，何遜為總參議，趙正平為秘書長，梁史為陸軍小學分部長，楊明遠為陸軍幹部學堂分部長，劉建藩為學兵營分部長，蒙經為諮議局分部長。宣傳鼓動刊物先是辦《南報》，由於不能立案，後來改辦《南風報》，在鼓樓下右邊那截街上設發行處（即現在陽橋附近）。我是經常到那里去訂報、取報的。販賣革命書報的機構除了上面提到的翰芳齋外，還有石渠書局。翰芳齋和石渠書局表面上是賣普通書籍文具，革命書籍是秘密賣的，必須是熟識的人或由熟識的人介紹，晚間去買才買得到。《民報》、《黃帝魂》、《革命軍》、《天討》、《揚州十日記》等書報都有，我是去買過的。翰芳齋由朱漢典主持，常有革命黨人去接头聯繫，如上面提到的何少川，就常去翰芳齋和朱漢典聯繫。我在會仙辦小學時已和朱漢典認識，這時也常去翰芳齋找他。當時革命空氣最濃厚的是陸軍小學和陸軍幹部學堂，法政講習所（後改稱法政學堂）也不壞。諮議局里有許多同盟會會員，可說是掌握在革命黨人手里。陸軍小學和陸軍幹部學堂有耿毅、李书城、何遜、劉建藩、陳之騏、王孝楨、冷適、尹昌衡、趙恆惕、孫孟載、呂公望等許多同盟會會員在那裏，所以革命鬧得最凶。法政講習所是官辦的，那時廣西巡撫已經換上林紹年，由林紹年兼任所長，內設官、紳兩班。官班由劉人熙負責。劉人熙是湖南人，官銜是侯補道，思想接近康、梁，是維新派

人物，后来当广西布政使的王芝祥就是他的内弟。王芝祥从读书到做官都得到刘人熙的提携培植，对刘人熙的话是很信从的，所以后来广西宣布独立时王芝祥态度转变，同意独立，刘人熙起了很大的作用。紳班由王熙甫负责。王熙甫是同盟会会员，做事勇敢，说话大胆。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法政讲习所开会庆祝皇太后寿誕和预备九年立宪，巡撫林紹年也到来参加，王熙甫在会上演说，说立宪是假的，清廷不去，中国就无希望。林紹年听了大不满意，不久就将他辞退。他到上海办阳春社从事戏剧工作，其后在天津被反动政府所逮捕，死在天津，很是可惜。諮議局有同盟会会员董經、黃宏宪、蒋敦世一班人在那里，对諮議局的动向能起决定作用。

我在优級师范这三年，正是同盟会在桂林进行革命活动很活跃的时期。我入校的时候已经倾向革命派，就自动把辮子剪去，表示决心。陆军小学的学生也在这个时候鬪剪辮子。我入校时的作文有这样的句子：“于时黄白激战，形见势絀，非彻底改革，则不能图存”，很得到学校当局的赞赏，选为全班作文第二名貼堂。入校时作文第一、二名的都由学校指定当班长，于是我就当了班长。我在預科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林紹年已经調走，巡撫换上张鳴岐。张鳴岐到任后就召开全省运动会，陆军小学、法政学堂、优級师范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会虽然没有出什么事故，但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都聚集在一起，起了联系感情、促进团结的作用。另一件是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传到桂林，学校当局遵照官方指示，要我們哭灵戴孝一百天。每人发给白布五尺細腰志哀，我們都不愿意，把白布当褲带用了，校学却奈何不得。其他学校学生都同样不愿哭灵戴孝，把白布乱丢乱扔。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秋季，我升入正科。正科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史地系；第二类是理化系；第三类是数学系；第四类是生物系。我在理化系当班长。我升入正科的时候已是宣統元年，陆军小学和陆军干部学堂的学生都在鬧風潮，革命党人想鼓动学生把風潮鬧得更大些，就利用《南风报》发一則消息，說法国的軍队已經侵入鎮南关。同时外間还傳說法国不仅侵入鎮南关，而且还向清廷提出要求駐兵南宁。早在几个月前我們就听到日本在海牙會議提出瓜分中国，把两广、云、貴划为法国势力范围的消息。联系起来看，我們就相信法国侵入鎮南关和要求駐兵南宁的消息是真的。全桂林的学生都很憤慨，紛紛議論，有的說要作准备，有的說要去抵抗。我們优級师范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几个系的班长集合商議。我們的兼任法制教員蒙經是同盟会會員，又是諮議局議員和同盟会分部长，我們想他的消息一定很灵通，几个班长一致同意請他来給我們演講。我們的体操教員刘屹也是同盟会會員，我們为着避开学校监督的耳目，就請刘屹吹哨子集合，把我們帶往操場，不上体操而听蒙經演講。蒙經說，列强瓜分和法国侵入鎮南关及要求駐兵南宁，确有其事，同时还訴了一番大道理，說清廷是“宁贈友邦、勿与家奴”的，不能期望清廷有什么办法应付，只有我們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在緊急关头起来揭抗，才能救国。我們听了蒙經的演講，就各班回教室討論。我先在理化系提出主张，說国家这样危急，我們何必学这些无用的东西，不如請求把学校改为軍事訓練机关，发枪支子弹給我們練習打靶，必要时上戰場保卫国家。我的主张先得到理化系的同意，及后又得到全校的同意。这时优級师范有两班，第一班是正科，二百多人；第二班是預科，也是二百多人。我們又认为一間学校改为軍事訓練机构作用不大，必須全桂林以至全广西的学校都改为軍事訓練机构，力量才大。于是就决定

每班推举代表二人，去和桂林的中等和高等学校联系一齐行动。理化系的代表是我和罗云章，数学系的代表是王乃昌，其他代表的姓名现在记不起了。第二天，我们首先去法政学堂联系。法政学堂的举动比较迟一步，我们去联系时，他们还没有集合全校学生讨论这事，对我们说，待今晚集合全校学生讨论后，才把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回校几天还没有接到法政学堂的通知，而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优级师范的监督是广东嘉应州人廖道传，另有四位兼任生物教员吴鼎昌，广东开平人，在提学使司任职，并且住在在提学使李翰棠家里。这二人都是康、梁一派人物。吴鼎昌见我们行动起来，就向廖道传建议说，学校出了这样大事，你要主动向巡抚张鸣岐和提学使李翰棠报告才好。廖道传就照他的话去报告了。这时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的事件发生未久，官府特别警惕防止学生闹事。张鸣岐得了廖道传的报告，就下令要学校严查革命党闹风潮，并且要严追当代表的学生。张鸣岐又把廖道传传到巡抚衙门，要他交出学生的代表的名单，立即开除学籍，严行查办。经过廖道传的恳求，张鸣岐才答应各记大过两次，留堂察看。王乃昌当夜得到捉人查办的息消，他是临桂西乡人，那一晚通宵没睡，第二天清早就跑回乡躲避了。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事情这样严重的。和王乃昌同房的同学告诉我，“王乃昌已经跑了，你还不跑吗？”我真是听其自然，不跑也不躲。吃过早饭后学校挂牌，学生人人各记大过二次，留堂察看，我就是其中一人。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七月，我在优级师范正科毕业后，先在王乃昌等创办的一间私立中学担任修身课，其后又到东乡大圩海洋圩附近的熊村小学教书，但时间都不久，到十二月我就回到会仙去。恰巧有一个候补知县萧鸿爵来会仙催粮，和会仙的团总伍耀

卿勾結搞錢，在馬頭塘村包賭，得了錢后又捉賭，无非是借捉賭為名，再得一次錢。我們會仙小學的學生呂演新、李兆時、呂士杰是馬頭塘村人，吃過晚飯回家去，碰上他們捉賭，就一併給他們捉去。學生家屬見子弟被捉，趕忙集人去搶，总算把學生搶回了。那知當天晚上伍冠卿派防勇把我傳到團局，蕭鴻爵硬說賭仔被搶走，是我派人干的，要我交人，并說事情不搞清楚，不許我出團局。我晚上八時進團局，到十時還不讓我出來。我和他們爭辯，最后我說我要回校趕看學生畢業試卷，試卷看不完，學生畢業不成，鬧出事情要他們負責。他們沒法，才讓我出來。回到學校，果然同事和同學們見我去團局久不回來，以為必定出了事，正在鬧起來了。我和大家商量，提防他們再來搞。大家推我連夜由陂頭走路上桂林，校長呂璜回馬頭塘关照一下家人，也跟著上桂林，把事情經過報告教育會。教育會得了報告就哄起來，說他們破壞教育。教育會會長唐葆厚去找臨桂知縣龔子厚，請求立即把蕭鴻爵調回來，傳人的防勇煽動示眾，否則學生就要鬧風潮。提學使司林傳甲也為這事去找龔子厚講話。龔子厚怕事情擴大，只得把蕭鴻爵調回縣里。三個傳我的防勇煽動示眾，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提學使司派我到平樂當高等小學校長。平樂位於撫河中游，上接桂林，下聯梧州，是梧州和桂林的交通中站，形勢非常重要。當時平樂縣城只有這麼一間高等小學，全校高小學生四十餘人，初小學生三十餘人。我過了正月元霄才從桂林動身，平水船快，不兩天就到了。二月，我又兼任平樂府養業講習所理化教員。這個講習所是平樂府所屬八縣聯辦的，只招收這八縣的學生。校址設在平樂縣城對河莫王廟，所長是恭城勢江人張繼光。他是廣東高等養業學校畢業生，到過南洋各埠考察，并任華僑

学校教员，与白萃州创办《华舜报》，旋在南洋参加同盟会。平乐办蚕业讲习所，才从南洋把他请回来当所长。张继光还约请昭平马江人陈雨时一同回平乐当蚕业教员。陈雨时也是同盟会会员，和我感情很好，无话不谈。有一天，他向我提出要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并且说恭城会党很多，而且离平乐很近。张所长、周毅夫、莫洞庭（都是同盟会会员）都说平乐虽然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如桂林，经济上的重要性不如梧州，但它处于桂林、梧州之间，倘若平乐的工作做好了，在广西的影响也不小了。我知道他是奉张继光之命吸收我的，我就同意了。于是我就在这一年参加了同盟会，介绍人是陈雨时、张继光。我们高等小学的学生有达二十岁的，蚕业讲习所的学生年龄更大，有达三、四十岁的。我参加同盟会后的活动着重在宣传，常常和蚕业讲习所学生到离校十里的桑树林中，秘密开会谈革命情况，谈革命的道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前夕，常有同盟会的同志由广东方面经过平乐而上桂林。我们常拿倪映典庚戌起义、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和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等事和学生谈话，再将孙中山、黄克强的革命活动，特别是镇南关起义的情况向学生介绍。高等小学这边我就约一些年龄较大、成绩较好的学生到野外秘密开会，谈的也是那些内容。离平乐县十多里有个地方叫迷山渡（又叫半边渡），那里也有个小学，是陆军小学学生李寿益办的，我的同乡黄焱也在那里当教员。这两人都热心革命事业，常常到县城和我联系，迷山渡那边的宣传活动，由他们二人负责。我们宣传革命越来越凶，常常带几十个学生到街头演剧，宣传倪映典庚戌起义、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行刺摄政王等事件，因为行动公开，说话激烈，就给官府注意。当时平乐知府是湖南人廖某，平乐知县是广东人王某。王某曾当过优级师范的庶务，和我是相

職已久的。有一天，他請我去縣衙門吃飯，飯後對我說，同盟會在
廣西活動很厲害，經過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事件後，省里命令各地要
嚴密防范革命黨的活動，特別注意學生界，廖知府已經接到撫台的
命令，不久就要捉拿革命黨人了，叫我小心謹慎，不可常常出外宣
傳。我離開縣衙門就馬上去和張繼光、陳雨時他們商量。大家認
為风声很緊，須得避一避。於是还未到暑假，我就先回桂林，接着
張繼光離平樂去香港，陳雨時回昭平馬江。辛亥革命成功後，張繼
光曾回到廣西，因賓縣兵民衝突，陸榮廷派他去調解，被當地叛兵
軍官孟希孔殺死，死屍被拋入河中。我回到桂林時，平樂王知縣的內弟梁述德在廣東旅桂學堂當
校長（校址在桂林鼓樓底）。我和梁述德本相識，便被他請去當教
員。王乃昌、馬懷瑜也在那里當教員。這時已是辛亥年。不久武昌
起義的消息傳到桂林。先是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後，在桂林
的革命黨人都縮光養晦，以待時機。如陸軍小學、陸軍幹部學堂、
學兵營里的同盟會同志都常常到景福戲院看戲，找花旦榮蘭聊天，
借以掩蔽。及至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桂林後，耿毅、何遜、冷繼、趙
恆惕等人就借游玩山水為名，在野外商議如何響應，參加的人一次
多達一次，有一次達到成百人。武昌起義後，最先響應宣布獨立的
是湖南，接着九江、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上海、貴州、江蘇、
浙江各處也相繼響應，宣布獨立。這時廣西巡撫是沈秉堃，藩司是
王芝祥，諮議局的正議長是甘德蕃，副議長黃宏憲。王芝祥還兼中
路軍統領，統率巡防營二十二大隊。武昌起義是辛亥年舊曆八月
十九日，廣西宣布獨立是九月十七日，相距幾達一個月。在這個月
中，諮議局議長黃宏憲（當時議長甘德蕃已因故離開桂林）、議員蒙
經等多次和沈秉堃、王芝祥協商，請宣布廣西獨立。當時兵權握在

王芝祥手里，沈秉堃的态度随王芝祥为转移。最初王芝祥还想蛮干一下。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后，陆军小学的学生和新军想发难袭击省垣，曾从所在地李家村进军桂林城，行抵将军桥因大雨水涨，不能过渡，乃中途折回。但自后风声更紧，人心更浮动。王芝祥亟调巡防营来桂林守城，但巡防营的力量无论在武装方面和质量方面，都比新军的力量差得多，同时尽管桂林不动，广西其他各处都动了。九月十日梧州宣布独立，民军攻打潯州，南宁、柳州也在酝酿行动。同盟会会员沈汉熙在各地联系会党，刘古香在柳州联络会党数千人，刘福在梧州一带联络的会党和民军约万人。民军和会党准备起事攻城的风传不绝于耳。桂林商界怕发生战事使地方糜烂，自己利益受损失，也动了起来。因此，桂林商会开会请求宣布独立。諮議局多次对沈秉堃、王芝祥分析形势，指出利害：其一，是广西向来是协餉省分，财政入不敷出，全靠湖南、广东等省协餉补助，现湖南已经宣布独立，倘广西不宣布独立，则湖南、广东的协餉定不会来，财政方面恐难支持；二是梧州已经独立，省内各处都在酝酿行动，桂林将成一座孤城，如何能守；其三是新军、民军、会党都准备起事，万一发生战事必致地方糜烂，怎对得起地方父老和各界人士？有一次諮議局的議長議員和各机关学校及商会代表百余人同去见沈秉堃、王芝祥。先由黄宏宪发言分析大局情况后，各代表纷纷发言，有的说汉人做满人奴隶是不值得的；有的说别省无协餉补助广西，纵想替满人出力也不可能维持下去；有的说民心思变，反对满清政府到处皆是，各处都在举动，倘不宣布独立，糜烂即在眼前。这些话说得沈秉堃、王芝祥无言以对。王芝祥的姊夫刘人熙也从申劝说，做了不少工作；同盟会会员刘洪基、薛家驊当时为王芝祥所重用，在王芝祥衙门办事，也对王做了工作。同时外属

風傳革命軍結集在湘、桂交界的章鎮和黔、桂交界的獨馬，有數千人之多。并且各處不穩的消息不斷傳來，如：懷遠知縣屠殺示威羣衆，民軍蜂起；玉林兵變；雲縣罷市；潯州、梧州、懷集都有起義軍出現；駐紮柳州的陳朝政部六營見清廷大勢已去，和革命黨聯絡改為國民軍，等等。沈秉堃、王芝祥權衡利害，最後才同意廣西宣布獨立。當決定九月十七日開大會宣布獨立，九月十九日舉行慶祝。推舉沈秉堃為都督，王芝祥、陸榮廷為副都督。

廣西宣布獨立時，我仍在桂林廣東旅桂學堂當教員。九月十七日清早，我走到街上就見滿街插滿“廣西獨立萬歲”、“民國萬歲”、“同盟會萬歲”、“歡迎沈都督王陸副都督”的旗子。我走到優級師範，才知道這些旗子是在王芝祥藩台衙門里寫的。我是優級師範第一班學生，這時第二班學生還未畢業，我和他們是熟識的。那天我到優級師範去玩，第二班的同學就告訴我，這些旗子是第二班同學劉瑞融、劉瑞濤昨晚在藩台衙門連夜動員多人趕寫的。我問他們怎的知道，他們說劉瑞融、瑞濤兄弟是劉人熙的兒子，王芝祥的外甥，一向住在藩台衙門里，但今早絕早跑到學堂來，一到學堂就倒頭睡在同學床上。同學問他怎的，他說昨晚趕夜寫獨立旗子，一夜沒睡，現在要借同學的床休息。

廣西宣布獨立後，人心很歡騰振奮，準備十九日晚上舉行盛大慶祝，提燈遊行。我在鼓樓底廣東旅桂學堂里，那晚正要和同學馬杯瑜一同出去參加慶祝，那知剛想開門出校，校丁吳裕急急跑來說，外邊槍响，人聲嘈雜，不知出了什麼事。旅桂學堂有幾進深，後進靠近杉湖吊樓。我們走到後進探聽，聽見邊隅巷一帶有女子和小孩的哭聲，槍聲傳來很密。及後又聽到傳說，凡是剪了辮子的人，在街上都被捉去槍斃。我進優級師範那年就剪掉辮子，平日出

入常戴假髮，这时怕出去碰到麻煩，当晚就不出去了。二十日清早，我借校丁吳裕的便服，化装从杉湖边走出文昌門外磨豆腐的同乡李炳生家里暫住，路上行人稀少，冷落得很。后来才知道十九晚的事变，是巡防营里一部分湖广兵搞的。营长下令剪辮子，他們不服从，武装叛变，一面搶东西，一面碰到无辮子的人就开枪打。那晚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的学生入城参加提灯游行，由田遇东带队，刚走到文昌門入八达巷、五岳观、通泉巷一带，恰巧碰上叛軍，叛軍即开一排枪把田遇东打死。当晚王芝祥就把城外的兵調来，連同自己的亲兵，把叛乱平息了。叛軍打死一些人，搶了一些商店民房。諮議局和图书馆前都有死尸。叛軍还想搶藩庫，因有守庫兵保卫，打不进去。搶得东西的叛兵连夜从屏門跑过夹山，逃离桂林了。未走的叛兵，王芝祥发給两个月的餉解散回籍。諮議局的議長、議員得到軍队叛变的消息，连夜出走东华門外警察教練所躲避(当时所长蔣教世是同盟会會員)。巡撫沈秉堃那晚也从撫台衙門后墙打洞逃走。我的三弟廷义在新軍工作，事后对我說，那晚出来参加提灯庆祝的只是少数人，倘若全部出来，就立即把叛軍歼灭了。他又說，开会宣布独立那天，新軍有两连人出来參加，看見撫台、藩台还是穿清朝的袍褂，认为是假独立，很不滿意，当时就想鬧事，但被官长制止，才沒有行动，不过他們始終认为广西独立是假的。

广西宣布独立不久，新軍混成协出发援鄂，学生軍也組織成立，参加援鄂。桂林各界开大会欢迎援鄂軍，参加的有各机关、学校、商会及士紳共千余人，場面很热烈。那天我也参加，我还記得那天冷通代表援鄂軍讲了話。这时沈秉堃、王芝祥以援鄂为名，先后离开广西，陆荣廷繼任都督。广西宣布独立就是这样过去了。

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和广西独立前后*

雷沛鴻

(一) 同盟会南宁支部的组织和活动

我到广州求学后，凡是看过的革命书报，都寄回南宁给我的亲戚朋友看，其中受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堂兄雷鯤池。

鯤池出身于书香家庭。祖父中过清朝的举人和进士，做过知县，在南宁算得是一个大绅士。父亲也是一个秀才，但不幸四十九岁就去世了。鯤池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只得弃学就贾，以便负担一部分家庭生活。他最初在我父亲开设于南宁良庆圩的油糖豆米杂货店当店员，七八年间就成为我父亲的得力助手，不但良庆圩的杂货店少不了他，并且开设于离良庆三十里的那蓬圩分店也不时要他去料理。这时他和我朝夕相见，亲密如同胞兄弟。他熟悉商情，懂得许多商业技术，并且十分了解民间疾苦。他在良庆这段时间，既勤奋工作，又好学不倦。他虽然只读过《故事琼林》、《龙文鞭影》、《聊斋志异》几本书，但他能写作，又善书札。我还记得他那时搜集许多南宁平话的民歌山歌，誊写在小本子上。由于他爱好民歌，所以他后来就长于诗赋，遗有《钝剑诗集》一册。

* 本篇是作者所撰《辛亥革命的回忆》一稿中的后一部分，标题是编者加的。——编者

一八九七年我十岁的时候，鯤池已成为一名商場的健将了。我父亲就把他調到我家在南宁木行街開設的經紀行“同盛号”做司理，独当一面。他到南宁后，与外界接触較多，思想就傾向革命。从此之后，他就把愛讀《聊齋志異》的興趣轉移到新書報刊上去了，每得一张報紙、一本新書，都要廢寢忘食地看來看去，不忍釋手。

我到廣州之后，形式上和鯤池是各處一方，不能再常見面了；但由于我們書信往來不斷，思想上實際是更為接近了。我看过什麼書報都要介紹或郵寄給他看。由于我們同看革命書報，都傾向革命，久而久之，對於孫中山先生當時所號召的推翻清朝、實行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都發生了信仰。我參加同盟會是秘密的，我回南宁度假期間，進一步和鯤池密談之后，却告訴了他。他在我的影響和鼓勵之下，也表示要參加同盟會。我當時非常歡喜，便向香港同盟會南方總支部反映介紹，同盟會南方總支部經過審查，同意吸收，並且後來派他為南宁同盟會支部的部長，負責在南宁建立同盟會組織，發展會員，進行革命工作。自此，南宁就有了同盟會的組織，南宁的革命活動也進入了一个新的階段。這是一九〇七年的事。

說到南宁的革命活動，還得提一提周仲岐、周君實、潘賦西幾位南宁商界的傑出人物。南宁雖然地處邊陲，文化和經濟都顯得落后，但是在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的洶湧澎湃的全國的反帝高潮中，南宁也和全國各地一樣，展開了劇烈的反帝運動。這個成績和周仲岐、周君實、潘賦西幾個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幾人都是來南宁經商的廣東籍商人。周仲岐和周君實是兄弟，在南宁木行街開設“興記銀錢店”，潘賦西在南宁倉西街開設“威建西藥房”。他們除了經營自己的業務外，還擔任不少的社会職務。如周君實，

他是南宁粤东会馆的董事和南宁总商会的理事及会长。通过这些社团关系，他们在南宁商界以至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号召力。一九〇五年美国禁止华工入口和虐待华工，全国特别是两广展开反美运动，抵制美货。南宁对这次反帝行动，做得有声有色。接着有收回路权运动。广西一向被视为法国势力范围，广西的铁路依照条约规定由法国投资建筑。这样，南宁又展开反法运动，并且成立“邕北铁路督办”，扩大宣传，招股集资，准备自己修筑南宁、北海间的铁路，以对抗法帝国主义。这些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周仲岐、周君实、潘赋西，再加上雷胤池，都是领导骨干。

胤池和他们几位都是熟识的。南宁通过几次反帝运动，群众觉悟有了一定基础，又有领导核心人物，所以胤池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组织在南宁建立之后，南宁的革命活动就迅速地展开。这时，胤池已经离开我父亲所开设的“同盛号”，转到仓西门码头“恒益经记行”任司理。“恒益行”是离南宁八十里的杨美圩的一些有产者集资开设的，南宁上游特别是杨美一带乡人来往出入很多，因此胤池的接触面更广，他就以“恒益行”做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周仲岐、周君实、潘赋西都参加了同盟会，共同工作。我那时虽在广州求学，但寒暑假还是回来南宁，所以有许多工作我也参加的。现在就回忆所及，当时南宁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有如下几方面：

1. 扩大组织，吸收会员。通过当时的社会关系，不但吸收了許多工商界人士参加，并且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参加，前后约有几十人，现在记起姓名的是：张文灿（沙街“瑞祥号苏杭店”司理）、班耀超（杨美人，知识分子）、杜英南、杜铁汉（杨美人，是杨美圩的行商）、杜少廷（杨美人，“恒益行”的股东）、莫隰仁（字继甫，南宁尧头村人，秀才，艺师）等人。

2. 加強宣傳。在南宁銀獅巷府城隍廟區北鐵路籌各處區局內設立閱報社，陳列各種革命書報供人閱讀。《民報》、《中國日報》、仰光《光華日報》和海外各地華僑報紙都有。閱讀的人很多，特別是學生界。這個閱報社對宣傳革命起了不少作用，在南宁學界發生的影響很大。

3. 聯絡民軍和新軍。廣泛聯絡各地民軍，重點是放在南宁附近的王和順、滕正宜的舊部，由班香國、莫繼甫、杜英南負責。後來葛定章從廣州回來，譚昌（柳州人）、王金波（永淳人，日本成城學校畢業）從日本回來，他們都是同盟會會員，而且都在新軍工作，便又由他們負責聯絡新軍。

4. 提倡社會改革。首先是提倡男女平等，發展女子教育，使女子和男子同樣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家率先實行，請了一位梁老先生來教全家婦女讀書。讀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當時新編的課本，有國文、歷史、地理、數學等等。梁老先生不能教數學，女班的數學和珠算，便由我們這些男同學擔任。後來我家的年青婦女都入學校了。這件事給社會影響不小，後來就有許多青年婦女入學校讀書了。我們又提倡剪辮子，在當時這不是件小事，而是不惜冒生命危險和清朝徹底決裂的表示。我在廣州就已經剪了辮子，鯤池繼之，由此帶動我家子弟如沛漢、沛濤、榮甲、榮朴、榮珂等爭相仿效，這也給社會上很大的影響。

5. 興辦實業。當時我們都有富國強兵思想。關於強兵，我們着重民軍工作，這點下面還要詳細談到。關於富國，我們着重興辦實業。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兩件工作，一是創辦“崇實種植公司”，一是開辦“西江航業公司”。“崇實種植公司”開墾南宁的青山、鳳凰嶺、佛子嶺一帶荒地，種植的樹木有松樹、桐樹、茶樹、竹林等，又有

紅薯、木薯、花生之类的作物。我們大力发动津头、浪边、麻村、凌铁、那坝三村、新大岭一带农村的居民参加，每股股金一元，无钱的以工代股。那时，平均地权是很新颖的政治纲领，一般人是不容易了解和接受的。我們只得从《礼记》的《曲礼》中找出它的理论根据。《曲礼》说：“名山大泽，先王不以封诸侯。”我們將这句话加以发挥，认为隐寓平均地权、杜绝土地私有的意义。经过我们的努力，入股参加开垦的人很多，办理很有成绩。辛亥革命广西独立时征集出来的民军，有一部分不为陆荣廷所收容，我們就安置到“崇实种植公司”去参加生产。这个公司本来由鯤池和我负责，辛亥革命后鯤池去鎮安府当府长，我又出国到欧美留学，就交给我的广东高等工业学堂同学黄俊负责。经过他和许多人的惨淡经营，已经很有成绩。无奈这种于人民大众有利的好事，却引起反动政府和地主恶霸们的仇视。到了一九一七年，他们竟在一个黑夜里偷偷摸摸派人把黄俊杀害，并抢去公司的资金，以致公司无人主持，工人星散，种植业务陷于停顿。可是已种下去的树木还是长得很好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占了南宁，为了害怕游击队的攻击，把这些树木滥伐一通。后来南宁虽然光复，树木无人看管，地主恶霸唆使探分子砍伐偷盗，以致公司产业丧失殆尽。

我們这种兴办实业的思想和做法，辛亥革命后鯤池当鎮安府长时还带到鎮安(现德保县)去。他在那里组集股份，大事种植八角，安置许多未为陆荣廷收编的民军去参加劳动生产。我們兄弟也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曾将先人遗下的坐落南宁水关門附近的一所大房屋变卖，得銀四千多两，全数投资。最初，经营很有成绩，但后来随着鯤池的去职，土地为王豪霸占，八角树被砍伐，事业又遭受失败。

为了挽回国家利益,广东商船工会因英国干预西江缉捕权,特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提出抗議。跟着梧州商人因英国船只游弋西江,所以集議倡設西江航业公司,以資对抗。鯤池和同盟会南宁支部的一些同志,竭力鼓动工商界投資于該公司,后来居然建造航輪八艘,来往于广州、梧州和南宁之間,对文化經濟的沟通,商务的发达,都有重大的意义。自此以后,由南宁到梧州乃至到广州,再不象我們初出門时那样令人有行路难之叹了。

6. 发动羣众展开反帝爱国运动。那时帝国主义在我国盜窃筑路权,清廷又和帝国主义勾結,下令將全国铁路收归国有,想暗中出賣給外国主子,全国人民反对很剧烈。广东人民号召招股筹款,向帝国主义贖回粵汉铁路,收归民办。南宁人民在南宁同盟会支部的鼓动下,积极响应参加。我的父亲就是热心参加的一个。他带头要我們整个大家庭的每一个人都認股,不論老少至少認一股,沒有錢就由他墊支。广西受了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各省民办铁路事业的影响,有識之士在桂林召开全省筹办铁路大会,集議筹办广西的铁路。南宁方面推周君实和雷伯吟(雷鍾清的父亲,岁翼生,泰盛經紀行的股东兼司理)做代表去桂林参加。当时有三派意見,一派主张先筑桂全铁路(桂林至全州);一派主张先修筑梧三铁路(梧州至广东三水);一派主张先修筑邕北铁路(南宁至广东北海)和邕龙铁路(南宁至龙州)。南宁方面主张修筑邕北铁路,并且立刻行动起来,成立邕北铁路邕局筹备处,大力宣传 and 分头招股。参与其事的人多是同盟会会员,邕北铁路邕局筹备处并且成为南宁同盟会的秘密机关。

南宁同盟会支部为什么搞革命却搞到开垦种植,和做起生意来?这正是南宁同盟会支部的特点。拿同盟会南宁支部来看,它

的主持人、骨干分子如雷震池、周仲岐、周君美、潘賦西、莫維甫、張文燭、梁恆訪、杜少廷等，不是資產階級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本階級利益有關的事情，他們是非常熱心積極的，如收回路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鐵路國有，籌備採辦鐵路，興辦實業等等。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的武裝，以反對革命敵人，又同農民合作，聯絡民軍，這在當時也是必要的。

由於南寧同盟會支部的積極工作，南寧的愛國運動就蓬勃發展起來，革命事業蒸蒸日上，革命起義的條件就日漸成熟了。

(二) 廣西獨立前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後的二十多天，即十一月七日，廣西也宣佈獨立。我那時已離開“南風報社”，在潯州、桂平兩中學教書。武昌起義後，我就和桂平中學監督李應元一齊回到南寧。那時南寧還沒有宣佈獨立。當時在南寧的清朝文武官員，有提督陸榮廷、舊軍巡防營統領譚浩明、新軍營龍標統領龍覲光、左江道趙吉紀、堪謹。權力最大是陸榮廷，因為新舊軍都歸他節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南寧之後，人民羣眾都很興奮，同盟會南寧支部同志的振奮自不必說了。而清廷的大小官吏却是人心惶惶，無所適從。南寧支部當時的做法，經大家縝密研究結果，一致同意爭取陸榮廷，請陸榮廷宣佈獨立，響應武昌起義。這樣做的作用很大。首先是因為陸榮廷是清朝大員，他宣佈獨立就不但使清朝陷於眾叛親離的孤立境地，同時給武昌的起義軍以至廣西的人民羣眾以很大鼓舞。其次是陸榮廷手上握有幾萬軍隊，宣佈獨立之後，可促請他派兵北上援鄂。這時省內各地的同盟會會員都先後到南寧來，甚至有一兩位

是从海外归来的，这样便形成了同盟会会员在南宁的大会师。会师于南宁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我和李应元来自桂林外，罗佩珩、苏无涯、刘耀来自梧州；陆燮棠来自容县；曾庸丞回自南洋。我们和南宁的同盟会会员雷颢池、莫耀甫、杜少廷、张文灿、班香圃、王金波、譚昌、葛定章等频频会议，会议地点有时租集满艇并到河中，有时在津头村我的家里。大家对争取陆荣廷宣布独立的办法，一致同意。具体行动是直接找陆荣廷谈判，促使陆荣廷赶快宣布独立。那时我们和陆荣廷还很陌生，和陆荣廷的会见和谈判，都是通过苏希濤、姜煥章二人的居间介绍。这二人都是桂林法政学堂的学生，苏是陆荣廷的大女婿，姜是苏的好友，当时都在陆荣廷左右，担任陆荣廷的秘书工作。我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逃到桂林，曾和他们二人结识，因此谈判的进行，很得到他们二人的帮助。去与陆荣廷谈判的同盟会代表是苏无涯、李应元、曾庸丞、雷颢池、何治方和我。初见面时，陆荣廷好像对我们还存有戒心，使譚浩明手执大刀立在身旁。经我们分析局势，辨明是非，晓以利害，他最后同意宣布独立。旧历九月十九日在北较场开大会宣布广西独立，那天南宁的文武官员、各界人士、青年学生都参加了，到会数千人，情况很热烈。但是很多文武官员还没有剪辮子，还穿着清朝袍褂。特别是左江道纪堪謹，拖着辮子，戴着顶子，非常刺目，人们觉得这些人的宣布独立，脱离清廷，不像是真的。散会时雷颢池从袋里摸出剪刀，一手牵着纪堪謹的辮子，一面说：“宣布独立了，纪道台你还留这辮子做什么？”一面用剪子把纪的辮子剪去。大家都感到痛快，而纪堪謹则痛哭失声。这也算是南宁宣布独立的一个插曲。

当陆荣廷未宣布独立前，在新军工作的同志如譚昌等本有武装起义的打算，但因新军标统龙觀光防备很严，迄未能实现。宣布

獨立那天，新軍的同志看見大會那種情況，非常憤慨，認為這是假獨立，當晚又想發難，不幸又為龍觀光偵知，向陸榮廷報告。陸榮廷派兵把新軍駐地包圍，又在望仙坡之六公祠架大炮指向新軍，下令逮捕譚昌，強迫新軍繳械。當時形勢很緊張，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新軍力量薄弱，又被包圍，打起來可能全軍覆沒。幸得雷鳳池從中奔走，新軍暫時繳械，譚昌則予以釋放，緊張的形勢才和緩下來。

南寧宣布獨立之後，陸榮廷就在南寧設立軍政府。我們仍繼續和陸榮廷談判，提出好些條件和建議。這些條件和建議現在約略記得的有：1. 厚集兵力從速北伐，協助武漢的革命軍解決袁世凱的反動武力；2. 發還所繳的新軍槍械；3. 在軍政府內設交通部，以聯絡和收編民軍，部內分聯絡、調查兩課，工作人員均由同盟會會員擔任；4. 將省會遷來南寧，以擺脫舊政治勢力的影響；5. 成立學生軍，吸收革命青年，施以短期軍事訓練，使之北伐。

在這些條件和建議中，我們特別著重民軍的聯絡和收編。辛亥革命時期廣西的民軍都是“一八〇三年前廣西人民大起義的起義軍後身，柳州方面有陸阿發、黃留芝等部，玉林方面有李立廷、封祿階等部，南寧方面有王和順、黃五肥、滕正宜等部，當時稱他們做會黨游勇。清廷以兩廣總督岑春煊為統帥，調集廣西、廣東、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安徽七省幾十萬大軍，才勉強把他們“鎮壓”下去。但大量的民軍還散在各地，清廷無法把他們消滅。孫中山先生很重視這些民軍的力量，如上思、防城起義及鎮南關起義主要是運用民軍的力量。我們對民軍的評價很高，希望也大。而保皇黨分子則輕蔑民軍為“爛仔”、“土匪”、“革匪”等等。

陸榮廷對我們的要求和建議，口頭上都表同意，在具体行動上

也有一些表現。如在軍政府內成立了交通部，請同盟會會員雷鯤池、李應元、柯漢賚、蘇無涯、莫繼甫和我等十余人參加工作，並且通電各府縣，于我們到達工作時加以保護和給以工作上的方便，以便我們深入調查聯絡民軍。後來在寧南標營舊址設民軍征集總所，梧州、柳州、寧南各設民軍征集分所。各處民軍征集分所的負責人，梧州是劉嘯，柳州是劉古香，寧南是任經。寧南民軍征集分所址設在安塞門城樓。

當時我們對陸榮廷過於相信，以為他答應過的事總會兌現的。我們派人四出和民軍聯絡，招出了不少民軍。如寧南民軍征集分所曾派莫繼甫到四塘、五塘一帶，說服不少王和順的舊部率隊出來。那知陸榮廷別有用心，攜帶槍械出來的民軍，他就收編，以擴充他自己的實力；不帶槍械出來的民軍，他竟不予安置，以致他們流離失所。民軍的警惕性就比我們高，他們很多人對陸榮廷並不是那麼相信的，大多是人先出來看看，槍械則收藏鄉間，不攜帶出來。很多征集出來的民軍，因陸榮廷不予安置，迫得我們只好把他們安插到上面說過的“崇實種植公司”參加勞動生產，及後雷鯤池去鎮安府當府長又帶去一部分，在那里弄墨種為角。

陸榮廷是一個封建軍閥，他心目中只有擴充地盤，發展實力，提高地位，是無所謂革命思想和民族大義的。他的宣布獨立，客觀效果是好的，而他的主觀動機不過是迫于時勢，乘機時會，作一次政治投機而已。當廣西宣布獨立之後，廣西都督沈秉堃、副都督王芝祥在桂林相繼率隊離開廣西，留在廣西的人物只有他力量最大。他以到桂林接任廣西都督為名，道經梧州，和當地保皇黨的勢力勾結，到了桂林，取得統治廣西的合法地位。他的反革命本質就逐漸暴露出來。首先，他把民軍征集所的經費扣不發，以致民軍征集

工作无法展开。在南宁成立的学生軍，本来由葛定章担任总教練，訓練期間虽短，成績却很有可觀，要他們率队北上参加革命战斗本是可以的，而陆荣廷却把它解散了。潯、梧一带起义的民軍都被陆荣廷派大兵鎮压下去了。及后，他的反动凶恶面貌更进一步暴露，如枪杀同盟会會員罗佩珩、李应元，和袁世凱通款；鎮压柳州二次革命，枪杀柳州革命领导人刘古香，使得广西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打击。这样，广西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斗争的果实，就完全为陆荣廷所窃取了。

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 和广西北伐軍

黃 紹 竑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的春天,我到桂林讀書。那时广西的統治者是巡撫張鳴岐、藩司魏景桐、臬司王芝祥、學司李翰棻、巡警道胡銘榮、勸業道王秉必。張鳴岐喜談新政,他在广西巡撫任內奉承清政府的意旨,也辦了一些新政。所謂“新政”到底是些什麼呢?有多少呢?

一、興辦學堂:广西僻處邊隅,文化教育比其他各省落后。我到桂林的時候,桂林僅有一所優級師範學堂(以前叫體用學堂,是光緒二十五年巡撫黃槐森創办的,是广西最早的學堂之一;“體用”二字可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思)、一所桂林府中學(每府都有一所)和三所不完全的高等小學(我入過省立的那一所,只有一班,兩個教員)。張鳴岐以前做過兩廣學務督辦,他升了广西巡撫之後,首先把體用學堂改為广西優級師範,以培養師資。又創辦法政學堂,聘四川狀元駱承驥任總辦,把全省候補官兒作為學員班,並招收普通學生作為普通班。另創辦巡警學堂以培養巡官,辦巡警教練所以訓練警士,還創辦典獄學堂,並建造所謂模範監獄。對於農業,他似乎相當注重,創办了農林學堂,學生待遇與陸軍小

學差不多，并聘請外国教師，置备仪器和种畜种籽。除陸軍小學之外，农林学堂是比較突出的。后来又办模范小学、初級师范，新建校舍都有相当規模，各府县学堂也先后开办。

二、成立諮議局：君主立宪是清朝皇帝欺騙人民的把戏。广西諮議局于宣統二年成立，地址在皇城（桂林的内城）的中央，建筑在那时看来也頗为宏伟，由每县推举議員一人組成。推举出来的議員，都是各县的地主豪紳，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甘尙賢、黃宏宪（用溥）、蒙經（民伟），都富有民族革命思想或有些學問。（《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載耿毅先生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一文里，說甘尙賢是議長。但我記得当时議長是岑溪县太史公陳樹勳（竹銘），甘没有什么功名，可能是副議長。）那时諮議局討論的問題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把省会迁到南宁的問題。这是由容县議員黃宏宪、藤县議員蒙經等提出的，梧州府、潯州府、玉林州、南宁府、太平府、鎮安府、思恩府、泗城府各县的議員一致附和；而桂林府、平乐府各县議員則坚决反对，柳州府、庆远府各县的議員，有的守中立，有的附和，也有反对的。主张迁移省会的理由是：桂林偏于广西的东北角，交通不便，不能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南宁地点适中，交通便利（那时已通小汽船）；而且广西西南与法国殖民地安南（即現在的越南）交界，那时正有謠传法国要进兵鎮南关（即現在的睦南关），迁省南宁，便于加強国防。实际上，这是同盟会的人从中策动的（黃宏宪、蒙經都是同盟会會員），因为他们认为迁省南宁于革命有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鎮南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同盟会中人认为起义地点仍以接近国界为宜，一方面易于与海外联络和取得接济，一方面可以減弱清政府的控制力量。这个主张尽管举出了不少理由，并得到很多人尤其是新軍方面的支持，但清政府方面

的看法恰恰相反，因为在他们看来，桂林接近中原，比较易于控制，而且桂林是一个坚城（城墙全部用坚石砌成），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就没有被攻下过。这个争论后来扩大到议坛之外，桂林方面甚至有带兵的桂林人出头来反对（驻桂林旧军统领秦步衢反对最力）。这个议案也就成了悬案。辛亥革命后，沈秉堃、王芝祥都已离开广西，陆荣廷带兵到桂林，当了广西都督。陆是广西南宁府武鸣县人（僮族），他不愿意驻在桂林，就把省会搬到南宁去了。

三、创办新军：广西是边防要地，清政府计划在广西成立新军一镇（即一师）和一个混成协（即混成旅）。当时建军的主管机构在中央是军谘府，在各省是督练公所，督练公所的督办是由巡抚兼的，以下分兵备处（管军政）、参谋处（管军令）、训练处（管训练）。广西先成立兵备处，以道台庄思敏（蘊宽）为总办，钮永建为帮办，庄蘊宽原是广西的候补官，他做过州县官，很有能名，后来升了道台（即兵备道）。钮永建与蔡锷、蒋尊簋到广西较早。蔡锷任南宁讲武堂总办（是光緒三十一年开办的，各省也有，但名目与时间先后各有不同）；蒋尊簋任陆军小学总办，后来因学生闹风潮去职。庄、钮二氏见广西没有陆军人材，就派王勇公到各处招致了一批新军人材：属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孙孟戟、陈之骥、赵恆惕、覃肇鑫、田稼轩、李书城、雷颺、楊增蔚、唐之道、孔庚、尹昌衡等；属于国内各种陆军学校毕业的，有吕公望、冷禦秋、刘建藩、耿毅、何遂、錢謨、林之渊、楊明远等，共数十人。庄蘊宽不久离开了广西，调到东北，据说是因为与张鳴岐意见不合而离开的。钮永建则继蒋尊簋之后任陆军小学总办。庄、钮二氏离职后，继任的是王芝祥兼兵备处总办，楊增蔚为帮办。

陆军小学在光緒三十一年就开办了，总办是蒋尊簋，监督是李

书城。据说（我那时尚未入陆小），蒋因用一些学兵出身的浙江人当学长，对学生很粗暴，学生又不懂浙江话，因而大闹风潮，把他撵走了。李书城是站在学生方面的，深得学生爱戴，但后来也去职了。继任的总办是鈕永建，监督是雷颺（时若），提调是冷禦秋。赵正平是陆小的格致（浅近的物理、化学）教员，他当时在陆小鼓吹革命最力，最为学生爱戴。兵备处的风波（见下文）之后，鈕永建、雷时若、冷禦秋都去职，而代以蒋尊簋的同乡董紹箕（号吉生，士官学生）任监督，斯烈（内地学生）为提调，陆小从此似乎就没有总办的名目，革命空气一时也较为沉寂。尹昌衡曾做过第四期的招生考官，当时剪去辮子的人尚少，他在投考的学生中见到剪去辮子的人都录取了，我也是这样被取的（照我当时的程度，是考不取的）。尹昌衡是一个狂人，好饮酒赋诗谈革命，他的诗句“有志须填海，无权欲陷天”，颇为当时所传诵。

广西混成协干部学堂（简称干部学堂），宣统元年开办，是专门为培养混成协的干部而办的短期学堂，一年毕业，办了两期（一共两百多人）。头一个监督是陈之驥，他言论激烈，深为当时陆军学生所景仰。另外还有一些激烈分子在那里当教官和队长，如何遂带领学生跳天桥以表示革命的决心，不幸跳坏了学生的腿，事情被洩露了。这事成为兵备处发生风波的原因之一，结果把陈之驥调走，换了蔡鐸。蔡鐸是湖南人，因举行学生甄別考试，甄別掉的广西学生太多了（广西学生的程度要比湖南学生差一些），以致引起赶蔡鐸的风潮。广西人对湖南人本就存有地域之见，那时自巡撫沈秉堃以下，湖南人在广西做官的人很多，赶蔡鐸风潮遂扩大为广西人排斥湖南人的风潮，蔡鐸不久就被云貴总督李經羲调走了。

广西陆军测量学校是哪一年开办的，记不清楚了（大约是在庄

蘊寬手里办的)。这是当时为了要测绘军用地图而办的技术性学堂。它给广西培养了一些测绘人材，对于完成广西的军用地图等绘制工作也有一些成绩。

此外，还办了学兵营，是专门训练混成协军士的，所招收的学兵都是当年一些颇有知识的青年，是当时酝酿革命的地点之一，孙孟戟、方声涛、蔡锷先后曾当过营长。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所谓“新政”的一部分。

再说这个在广西办“新政”的张鸣岐，他曾做过幕僚，为人狡猾，想借着办新政、用新人来沽名钓誉，的确也因此而得了一些虚名。但是那些新人物之中有好些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之来广西，目的是想在广西宣传革命和发动起义。

《指南月刊》是同盟会在广西的宣传机关，也是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同时桂林还有一个《白话日报》，是地方进步人士办的，与他们有无联络我不清楚。《指南月刊》是尹昌衡、覃肇鑫、吕公望、赵正平主办的，赵是主笔，吕是经理。我记得最初赵正平写了一篇文章叫《想定敌国论》，文章里以法国为想定的敌国，因为那时正盛传法军要进兵镇南关。甲申中法之战在广西人民的脑子里记忆犹新，这个消息传开，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桂林各学堂都实行兵式体操，法政学堂的那些候补官儿也都在骆承驥的率领下学立正开步走，陆军小学生当了他们的教官。那年春节，桂林的统治者斂钱大闹龙灯，赵正平写了一首诗登在《指南日报》上，以示讽刺：“神龙不舞舞纱龙，湖海旌旗色色空，×××××××（原句已忘），吾来独自哭南风”。这首诗颇为当局所不满。《指南日报》出了若干期，因言论激烈被迫停版，改为《南风报》。《南风报》亦只出了一期，因为刊载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诗：“揭

鞭慷慨蒞中原，不为讐仇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憤憤，但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攪轡悲羸馬，万众栖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編者按：此詩据罗尔綱《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中《石达开假詩考》一文考証，断为伪作）。尹昌衡还在封面上画了一簇竹子，竹叶构成“民族主义”四个字；旁边又画了一只雄鸡引頸长鳴，題了“雄鸡一声天下白”七个大字，比以前更加露骨，更加激烈了。《南风报》因此又被迫停版，改为《南报》，言論仍然是很激烈的。巡警道胡銘榮（浙江嘉兴人）見他們这样的倔强，乃以浙江同乡之誼，邀呂公望（呂是浙江永康人）晤談，并餉以盛筵，劝他們自动停版，不必用脑袋相拼。經呂再三要求，乃以先送审查然后付印为条件，准許繼續出版。广西宣布独立后，赵、呂等都离开广西，此报不复出版。

张鳴岐不时宴請那班新軍人物，以示亲近。其中那些激烈分子往往在酒酣耳热之余，大談其革命主义。某次宴会时，张鳴岐說：“革命并不是一件奇怪和可怕的事情，本人立志刷新广西的政治和軍事，即是革命，也就是广西的革命領袖。”說毕，又出示他新置的手枪，让大家观看，說这是革命的武器。尹昌衡可能是吃醉了酒，接枪在手，連放三枪，将客厅的玻璃窗都打碎了。张氏很不以尹昌衡的举动为然，对他說：“广西地方太小，不足以容公，将来四川有事，可以多多借重”，也即是表示要尹离开广西的意思。尹大笑說：“世事难定，将来不知是誰借重誰啦！”张氏微笑不言，散席后还送每人安南刀一把，以示联欢之意。一班年青人感情本易冲动，看到张这样厚待他們，还以为他张氏真能贊成他們革命呢，情緒就愈加激昂。但是由于上述那些原因——报刊問題、何遂問題、尹昌衡問題，张氏对这班人实际上很害怕，暗地里正布置阴謀，想把他們除

去。他把办南宁讲武堂的蔡錫和以前被陆军小学风潮闹走的总办蒋尊簋秘密电召到桂林，派蔡錫为干部学堂监督兼学兵营长，以去陈之驥、孙孟戟，派蒋尊簋为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并派董紹箕为陆军小学监督，斯烈为提调，以去雷寿荣和冷御秋（董、斯两人是接近蒋尊簋的）。同时他把陆军小学监督雷飏和兵备处科长孔庚拘押起来。一班新军人物始知上了张鸣岐的大当，甚为愤激。王勇公当时任干部学堂教员，因这班人都是他请来的，乃到督练公所与蒋尊簋力争。蒋去巡抚衙门向张鸣岐请示，不得要领。张氏并扬言，明日要开军法审判。此讯传出，大家更加震动。吕公望漏夜去见蒋尊簋，长跪两小时，力求转圜。蒋说：“大帅已分咐下来，明日要砍几个脑袋给大家看看，恐怕不易挽回。”吕涕泣说：“我们在浙江时，闻秋瑾女士说，总办是革命同志，所以才竭诚拥护总办。现在同志们有杀身之祸，无论如何，要请总办援救。”蒋沉思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你可去求求王芝祥（那时王已升藩台），他的资格比我老，或者可以说话。”吕约同王勇公、孙孟戟、陈之驥三人连夜谒见王芝祥，苦求设法。王先有难色，后来见他们情词恳切，心为之动，即毅然说：“难得你们这样的义气，好！好！拼我的老面子不要，替你们去碰一碰看。”王去见张鸣岐，张仍旧坚持严办。王说：“杀他们必须上奏，如果皇上追问这些人怎样来的呢？大帅恐怕也脱不了关系。”这几句话把张鸣岐说住了，乃以少年浮躁四个字把一些人撤职，并且限定某些人于两月内离开桂林，特别指定杨增新、陈之驥、王勇公、孙孟戟四人要在三天内先行离开桂林。王芝祥转达了这个决定，并劝他们服从，一场大风波才得平息下来。王芝祥在这件事上很受好评，广西独立时他能被推举为副都督，也是因此。张鸣岐觉得以后仍会有问题，心里害怕，想离开广西。适

值两广总督出缺，他凭借在广西博得的一些虚名，加上大量銀子的賄賂（据說是用了二百万），因而于宣統二年九月得以升任两广总督，繼任的广西巡撫是沈秉堃（湖南人）。

经过上述那些人的鼓吹和組織，革命思想已深入广西青年人的腦中；尤以干部学堂、陸軍小学和学兵营，是当时革命活动的重点。尽管受了张鳴岐的欺騙和阻撓，他們的革命活动表面上虽然平靜了許多，而暗中进行却更努力。宣統三年，首先是温生才炸死了广州將軍凤山。繼之又有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的成仁就义，益发激动了每一个青年人。这时在桂林，大有“山雨欲来风滿楼”之势。

陸軍小学教員赵正平是在陆小进行反清活动的鼓吹者和組織者。他肯与学生接近，我們在当时都是他的亲近学生。他是《南风报》的主笔，我們也时常到《南风报》館去玩，也愛讀《南风报》。同学中由于平日言論和志向接近，进而結合成为团体。由同学胡馳騏（四川人，在我們中年紀較长）发起，約我和夏威、黄远鎮、黄克綏、馮振邦、陈受祺、粟振国（有三期的，有四期的）在南門街的一个叫近松园的小酒館，作一次歃血痛飲，仪式是把一只活公鷄斬头斬脚，把血瀝在酒內，大家呷飲。这是帮会的旧仪式，以此宣誓实行革命。我們还在城北的荒園內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經常集会的处所，每礼拜日都要到那里集合一次。其实我們除了一些排滿言論之外，也沒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这个小組織是赵正平的外围組織，只有胡馳騏是与赵正平发生直接关系的，其余都是間接的，更談不上是同盟会會員。这个組織之外，在陸軍小学和其他学堂有沒有类似的組織，我不清楚；可能有而我們不知道，因这种秘密組織只有竄的发展而沒有橫的联系。

那年暑假，胡馳騁要我同夏威到广州湾（即現在的湛江，那时尚为法帝国主义者所占据）去走走，走熟那条路，意思是以后好与国外革命党联络，好运军火。我与夏威都是广西容县人，容县接近广州湾，由我家乡到广州湾仅有三天多路程。我回家对父亲支支吾吾說要到广州湾。父亲看出了我的动机，他說：“小孩子懂得什么革命，不要把自己的命先革掉了。”我的三哥刚由日本回来，他說：“革命党的势力很大，听说凡是留学日本的士官学生都加入了，将来一定要革命的。”父亲便不再說什么，但是我到广州湾之行却无形中被制止了。我只得仍然同夏威回桂林上学。

中秋后，武昌起义了，首义的是陆军第八镇的士兵，陆军第三中学也有部分学生参加。这个消息传来，自然震动了整个桂林。以前社会上本来就把新军及陆军学生一概认为是革命者，而新军和陆军学生亦以此自命，因此新军和陆军学生更为社会各方所注意。不久，武昌方面派第一期同学任道芳、第二期同学李作礪秘密回到桂林，报告武昌起义经过，人心军心更为激动，跃跃欲试。于是由桂林同盟会的领导者（现在才知道是耿毅先生）与王芝祥商量，要巡撫沈秉堃和平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以免流血。沈、王見大勢已去，乃于九月十七日（旧历）与省諮議局議長宣布广西独立，与清政府决絕。并由諮議局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駐南宁提督）为副都督，定期举行庆祝大会。

广西的宣布独立，新军和陆军学生自然是主要的力量，因之旧军里有些人就认为以后都是新军的世界了，旧军沒有前途了。旧军有些是湘军改过来的，他们不知道革命的道理，仍然效忠清朝，新军旧军之間本来就有界限，到了这时界限就更深了。

庆祝大会于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的早晨在皇城諮議局前面举

行。那天天还未亮，陸軍小學學生武裝整隊，提着燈籠向文昌門入城。行到文昌門外的石橋時，文昌門內的舊軍守兵向我們開槍了。我們雖有槍，但是沒有子彈，不能還擊。一時隊伍大亂，有的同學哭了起來（我們都才十七、八歲），有的同學把帽子、槍支都扔了，一哄而逃。回到學堂（陸小距文昌門不過兩華里）。我同一些同學和學長（類似排長）把扔下來的帽子、槍支收拾完了，才回到學堂。舊軍僅在城門里放了幾槍，並未出擊，但我們學堂恐怕他們攻擊，我們又沒有子彈，難以抵抗，于是就全部撤退到李家村（距城二十多里的新軍標營），與新軍靠在一起，把前哨布在將軍橋（離城十里），與城內舊軍對峙了兩天。舊軍兵變，是由于在開慶祝會之前要他們剪辮子。我們同學有的早已剪了辮子，有的是宣布獨立后才剪的。舊軍從來就沒有剪辮子的人，一下子要他們都剪掉，自然有一些人要反對。但這是舊軍兵變的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新舊軍間彼此的界限和仇恨和舊軍的反對獨立。這些舊軍是王芝祥調來的，由他出來平息了變亂，殺了幾十個人，有些逃上山當土匪去了。

舊軍兵變平息後，是否參加北伐問題在陸軍小學也有爭論。一派主張一律參加北伐，一派主張仍然上課讀書。結果各行其是，主張北伐的決定組織廣西學生軍北伐敢死隊。我們便分頭到桂林中學、初級師範、法政學堂、農林學堂和其他學堂活動，報名要參加的有好幾百人。據說因為槍械的關係，結果只成立了一隊，一百二十六人（分九班，一班十四人），陸小學生參加的約有三、四十人，其餘都是普通學生。用志願推舉與任命相結合的辦法，確定了梁史學長做了廣西學生軍北伐敢死隊的隊長，因他平時與我們接近，好談革命；學長馬英武、馬子駿、助教封高英做了排長；班長、副班長都是陸小學生（我做副班長）。學生軍組織成立後，在陸軍小學集

中訓練一星期就出发了。陸小在相当时期后改为陸軍速成學堂。

广西北伐軍是由广西陸軍混成協和广西學生軍北伐敢死隊組成的，由協統趙恆惕率領出師北伐。

广西陸軍混成協是宣統三年初由學兵營擴充的，那時成立了一標的步兵兩營，第一營營長耿毅，第二營營長陶柏清；騎兵營營長劉建藩；炮兵營營長鄧鼎丰；加上工兵營、輜重兵營、機關槍隊，總共兩千多人。最初的協統是胡景伊，胡并兼標統，後來才換了趙恆惕。

這兩部分隊伍最先出發，由桂林經全州、永州，步行到衡州（衡陽），由衡州坐帆船下長沙。那時漢口、漢陽已失，武昌情況十分緊急。帆船到了潒口，就改用小火輪拖到長沙，在長沙耽擱了一日。那時湖南都督焦達峯被殺了，由譚延闓繼任都督。由長沙仍然是用小火輪拖帶，向武昌前進。由湘江駛進了洞庭湖，一望無邊，我們這些在山國的人頓覺開闊了眼界。過了岳陽，轉入長江，到了武昌上游六十里長江南岸的金口鎮登陸，在那里住了幾天。那時革命軍總司令是黃興，總參謀長是李书城。趙恆惕到武昌去開會，計劃如何反攻陽（漢陽）、夏（漢口）。桂軍和湘軍的一部（大約一千多人，據說是一標）統歸趙恆惕指揮，成為反攻陽、夏的左翼軍。就在金口鎮渡過長江，經過一些湖泊，第一日到了漢陽縣境的長新鎮，在那里停了几日，才進駐蔡甸。蔡甸是漢水上游、漢陽側後的一個市鎮，我們在那里與漢口的敵人隔江相峙。在蔡甸對峙了几日，漢口敵人撤退了，乃渡過漢水，沿着漢水右岸前進到新溝。那時漢口、漢陽正面的敵人逐步撤退，左邊在孝感河的毛神渡之敵，與我軍隔江對峙，隨後也撤退。左翼軍占領毛神渡之後，又繼續向孝感縣前進，占領了孝感縣，敵人又退到廣水、武勝關去了。

南北和議期間，我軍就不再前進了。和議成功，清帝退位，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我們就在孝威的營地舉行慶祝。不久，我們和混成協一起調回漢口，乘民船用小火輪拖帶到南京。

廣西第一批北伐軍出發之後，不久副都督陸榮廷帶兵到了桂林，顯然是想用武力奪取廣西的軍政大權。沈秉堃和王芝祥雖然他以前的上司，但是清朝皇帝沒有了，清制關於本省人不能做本省官（指文官）的限制也沒有了。沈秉堃、王芝祥以巡撫、藩台的地位宣布獨立，并被舉為都督，可是他們到底是外省人，而且是不久前的反動統治者，是為一般廣西人所不滿的。因此，陸榮廷的舉動得到了廣西若干人的支持。沈、王二人見風色不好，王芝祥先帶巡防營六個大隊（一大隊約一營）出發，沈秉堃與湖南組織了湘桂聯軍總司令部（程潛任參謀長），沈任總司令，也隨後出發，到中途，南北和議已成功了。這是由桂林出發的後一批北伐軍。王芝祥率領部隊到了南京，兵變後下台。沈秉堃被袁世凱任命為內政部長，未到任就死了。

廣西另外一批北伐軍是由陳裕時率領的邕標（駐南寧）和龍標（駐龍州，人數都不足）。這兩標是莊蘊寬做兵備道的時候由巡防營改的（營長各為陳裕時和程子楷），比混成協成立早一些。這批北伐軍乘船到廣州，再由海道到上海，與浙軍朱瑞一同進攻南京，在天寶城之戰中打得很出色。王芝祥的六大隊在南京因搶掠譁變被繳械，人員與其他兩部廣西部隊編為陸軍第八師，陳之驥任師長，趙恆惕、陳裕時任旅長。民國二年南京討袁之役，這師人是死守南京最得力的部隊。那時陳之驥、趙恆惕、陳裕時都已去職，部隊由劉建藩率領。

广西自北伐军出发，沈秉堃、王芝祥离去后，军政大权都落在陆荣廷的手里。他出身绿林豪杰，一变而成为旧军的首领（南宁提督），广西在他的统治下成了旧军的世界。民国二年南京独立失败后，有些陆军第八师残存的广西下级军官和士兵回到广西，他把一部分的巡防营（大部仍旧）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师（陈炳焜任师长，继任者为陆荣廷子陆裕光）和第二师（师长谭浩明为陆的妻舅，这师后来分散在广东，仍恢复旧军编制）。其余的旧军，名目繁多，编制不一，有正司令、副司令、統領、帮統等軍銜，带兵多少也无定制，都是由陆荣廷自己定的。他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外人是容易知道的，据我的估计，在民国八、九年全盛时代也不过十万人。

袁世凯对于陆荣廷既是多方籠絡，也是多方掣肘的。民国元年到民国四年的广西省长或巡按使，都是由北京任命的北方人，第一个是张鳴岐。张是陆的旧上司，陆对张还存有一些敬畏，张的任期也較久。以后是王祖同、田承斌，陆对他们就等閑視之了。袁世凯死后，省长或巡按使都是陆的私人，都是广西人，从而形成了旧桂系把持广西的局面。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报刊

蒙起鵬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康有为到桂林讲学,一八九七年,创办了《广仁报》。报社设在司門前彭公祠(即现在依仁路工商联合会),主笔由康有为的門徒况仕应、龙应中、龙朝輔(以上均桂林人)、曹碩武(南海人)、赵廷敷(武陵人)等充任。内容主要是宣传康有为的学说和当时维新主张。每月出版两册,木刻版线装,为广西首创的报纸。回忆所及,该报曾发表过《筹桂刍言》、《为德兵燬即墨孔庙圣象布告士林文》以及康有为当时提出的“保国”、“保教”、“保种”的“三保”救国主张。由于自甲午失败后,俄占旅大,德占胶州湾,法占广州湾(现湛江市),英占威海卫、九龙,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各划出势力范围,大有瓜分中国之势,故康有为提出“三保”,作为他当时的政治主张。至戊戌政变,该报停刊。

一九〇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行《民报》,鼓吹革命,各省留日学生亦纷纷出版小册子。广西留日学生馬君武、蒙經、卢汝翼、万武等在桂林发刊《漓江潮》、《独秀峯》两种报纸,不过寿命很短,《漓江潮》只出了两期,而《独秀峯》仅出一期就停刊了。

一九〇八年,桂林軍界人士出版过《武学报》。一九〇九年,同盟会广西支部出版《南报》,一九一〇年改为《南风报》,宣传

排清，鼓吹革命，經費由軍、政、學界捐集，每期出二千冊，報社設在桂林福棠街二號。總主筆為趙正平，經理為梁史。報冊第一期插圖畫有墨竹，其枝葉內隱藏有“民族主義”四字，要細看才能發現。封面則畫有一只雄雞，題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七字。這幅封面圖畫是由一個署名“介士”的人畫的，他還寫了一首歌來說明這幅畫的意義，這首歌是：“南人志欲扶昆侖，臨風高喚健兒魂。健兒奮起環銀鎧，闔斧齊揮掃荆榛。我憶黃帝馳逐來西北，而今神霄臺衍殖中國。朝朝仰首睨橋陵，赫赫威靈足表式。奈何眾庶猶酣眠，忍令山河久變色。天涯介士思無極，徬徨漆室終宵泣。長恨中原猿鶴啼，重嘆大陸龍蛇蟄。吁嗟乎！漫漫长夜幾時明？忽來喔喔雄雞聲，雞聲喔喔自南夏，探首東窗方見曙光晶。”報冊的內容有社論、紀事、譯述、文藝、傳記等項，都是選擇宣傳革命、激發人心的題材。如尹昌衡的《對南作戰論》（指對越南法軍作戰），洋洋數千言，指陳形勢兵略，慷慨激昂。還有《汪兆銘刺攝政王》、《倪映典廣州起義》等紀事，以及瞿式耜、張同儉的《浩氣吟》。諸凡這類文章，都是當時廣西羣眾所樂於閱讀的。這個報刊直到廣西獨立後，才停止刊行。

在梧州方面，甘德蕃、蒙經、陳太龍等於一九〇八年創辦《廣西新報》，宣傳君主立憲。隨後甘紹相、區笠翁等又發刊《廣西日報》、《梧江日報》，鼓吹革命。後因大勢所趨，三報論調趨於一致，共同宣傳革命。

南寧方面，一九一二年由縣自治會撥款發刊《西江報》。報社設於銀絲巷縣城隍廟（今興寧路南二里市民政局），總主筆為當時南寧府中學校長雷沛鴻，主筆為該校教員馬冠麒（即馬駒晉）、蒙起鵬等。每期出千份，規模極小，純屬地方報紙性質，亦為南寧首

創的報紙。它对当时袁世凱大借款、庫伦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歸獨立、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达賴第十三世叛國投英及政黨竞选怪現象等，均有評論。一九一三年四月，雷沛鴻出國留學，遂停刊。

一九一二年下半年，中國革命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舊立憲黨派合組進步黨，兩大黨對立。國民黨廣西支部長蒙經、盧汝翼等在南寧辦《民風報》，報社設在馬草街城守營（今中山路市文化館）。進步黨則辦《指南報》，報社設在下石牌坊街左營廟（今共和路市人民法院）。一九一三年下半年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解散國民黨，《民風報》隨之停辦。

一九一六年護國討袁時期，周錫樞、黃宏憲等辦《嶺表報》于邕南旅館之右廂（今民生路人民劇院）。護國之後繼以護法，至一九二〇年止，周錫樞編有《護國大事記》、《護法大事記》十餘卷。

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

梁 烈 亞

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第二年，即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人到了越南河内，准备在越、粤、桂边区进行革命起义。这时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順因反清失败，避居越南西貢，就去謁見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且和中山先生同居于河内碧台街，一同活动。中山令王和順負責欽州、南宁一带的革命工作。王和順派南宁窰头村人莫繼甫（塾师）、大塘人黄亚貴在南宁进行秘密工作。他們就利用法帝国主义在南宁開設的法中文书院和天主教堂（在南宁中府街，現称明德街）做通訊处，着手运动往日“反水”（背叛的意思）的清兵。这时法帝国主义以永安教案^①为借口，向清政府強求由南宁到北海的铁路建筑权。两粵人民聞

①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二月間，广西永安州（即今蒙山县）古排塘七、八两段乡民集議不准信奉天主教，并在該处文聚村旁联兴商店門外牆壁上張貼禁止乡民信奉天主教的文告。三月二十七日有法国教士、牧师三人由县城赴新圩（距州三十里），道經該处，看見該項文告，认为是侮辱天主教，遂強迫該鋪主李元芳由該鋪烧爆竹送至新圩，以示悔罪。此事引起当地羣众的憤怒，于是集众数千赶到該处哥羅桥地方把李元芳搶回。該教士、牧师意图逃返州城請求州官处理。羣众恐其歪曲事实，追至西馬村前水坝垌口地方。該教士、牧师三人伏入垌口用手枪向羣众射击。羣情愈憤，遂用竹杆、錘子將此三人毆斃。

此消息，羣起反对，紛紛发起自行招股建筑，以挽国权。

南宁方面，莫繼甫和雷在汉(两人均参加同盟会)乘机联络当地紳商和广东在南宁的商人孔德記、孔怡記等，成立邕北鐵路邕局办事处于城內銀絲巷府城隍庙內，并派人到各县乡鎮以宣传筑路招收股本为名，暗中进行联络会党的活动。此外又以开通人民知識为理由，設立南宁閱报社于邕北鐵路邕局办事处內，購訂上海《神州日报》、《时报》、新加坡《中兴日报》、香港《中国日报》、《商报》以及当时各种进步杂志刊物，供各界人士閱覽，作为反清反帝的宣传。

是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东宣布粵汉鐵路收回官办，广东人民也羣起反对，酿成粵路风潮。繼之又有广东欽州三那人民的抗捐运动。人民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一九〇七年，中山令黃兴、黃明堂、王和順等在欽、廉活动，联合清軍軍官郭人漳、赵声部举行起义，进袭南宁，于是有防城、欽州的起义。不幸郭、赵两部不能及时响应，南宁方面虽有同盟会會員活动，但只和会党联络，而没有同盟会的組織力量，亦不能及时响应欽、廉方面的軍事行动，所以进袭南宁的計劃遂告落空。及后中山亲自领导鎮南关起义，亦以后援不繼而告失败。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时候，广西籍的留日学生馬君武、邓家滲等就已参加同盟会。及后广西籍人士参加同盟会的还有：在东京参加的刘焜、刘玉山、卢汝翼、苏无涯、黃石琴、黎契侯、蒙經等；在广东参加的刘古香、施正甫、梁史、雷沛鴻等；在上海参加的曾鏞、王天縱等；在南洋参加的曾庸丞、白萍洲等。这时南宁同盟会會員的活动是以邕北鐵路邕局和南宁閱报社为据点。先是同盟会已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由黃兴、馮自由等負責。广西的桂林、柳州两地

也成立了同盟会支部，而南宁方面则由馮自由和施正甫联络，并通过王和順的介绍，于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春已經布置以南宁閱报社为一般往来的机关，中府街“法中文书院”为秘密通訊地点。但当时邕北鐵路鐵路局的人員很复杂，而且分为城廂、城外兩派（城廂派是紳士李祖若、黃居離、古濟勳等，是傾向康、梁的君主立宪派的；城外派是莫繼甫、雷在汉、梁衡舫、杜少廷，都是同盟会會員，反清态度很坚决），因此同盟会不能再以邕北鐵路鐵路局和南宁閱报社做秘密机关，就改以蒼西門外碼頭（現名民生碼頭）的恆益商行做秘密活动的机关，因为雷在汉是該商行管理文书賬目的师爷，行动比較方便。这时参加同盟会的人有雷在汉、莫繼甫、周君实、杜右臣、林百中、杜少廷、梁衡舫、杜迺賢、黃簡初（罗阳土司官）、廖胜、葛霞川、杜奴程等。会务由雷在汉主持。會員名册及机要文书由杜右臣保管。莫繼甫、林百中負責运动南宁附近的会党。杜迺賢、黃簡初負責运动左江和右江一带的会党。杜少廷、梁衡舫負責联络一般知識分子。施正甫从广州来南宁走了一轉，南宁的同盟会組織就通过施正甫和广州、香港、柳州等地的同盟会組織取得联系。

南宁的同盟会組織建立之后，在南宁講武堂任教官的會員譚昌、宋新洲（日本东斌学校毕业生）也一起参加活动，并在講武堂发展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罗經、梁德多等人为會員，准备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桂林方面的組織曾派胡敬廷（江苏鎮江人）到来联系。恆益商行因时常有外江佬往来，就为当地軍警所注意。而店內又藏有《民报》、《黄帝魂》、《革命軍》、《警世鐘》等革命书报，倘一疏忽，就会出事。南宁商人常有在邕江水上租艇設宴招待远来客商的风习，于是就由黎契侯出資租賃邕江水上的紫洞艇，借名

开厅避暑，遇有要事就聚集艇中讨论；如遇人数过多，则以游玩为名，分乘小艇到南宁下游青山塔下商谈，时间过晚则住在津头雷在汉的家里。这样就容易掩人耳目。

那时决定在南宁武装起义，主要是运动城外耕武堂的学生和城内青云街测量所的队员，以这两部分为主力，内外结合。计划是：城外先占领望仙坡六公祠（现在人民公园），以便攻入北门；城内的测量队员则占据钟鼓楼，进攻镇台衙门。那时驻紮南宁的清军，主要是龙觀光所部，官兵多是他在云南当土司时的家丁家将，与久住南宁的其他清军——巡防营（如水上巡防营，官兵多是湖南籍）时有不和。何久安则担任运动水上巡防营（护船队）和府衙门、道衙门、县衙门的兵勇。会党的战斗任务如下：附近城区的会党要会合城廂内外的起义军进攻县城；离城较远的水上会党在三江口堵截龙州、百色来的清方援军；陆上会党则在昆仑关、高峯隘等地断绝清军的驰援。这是南宁方面同盟会组织建立后准备武装起义的大体计划。但那时广西全省的革命起义却没有全盘的计划。虽有胡敬廷和桂林方面联系，譚昌和柳州方面联系，刘培真和潯州方面联系，譚剑英和梧州方面联系，黎契侯和龙州方面联系，而这几方面并没有和南宁一致行动、同时举事的打算。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也没有作出领导广西全省革命起义、统一行动的整个规划，只是决定那一方面运动成熟便可首先起义。

一九一一年二月，譚昌、胡敬廷、何久安都先后接到广州、香港、桂林方面的来信，说广州将在四月一日起义，并且说桂林、柳州、梧州、潯州各处的同志已纷纷集中广州。于是宋新洲、譚昌也准备东下。后来大家商谈结果，认为南宁一定要和桂林一起响应广州起义，而南宁的主力是新军，正需要军事指挥人才，倘宋、譚一

去，指揮無人，就削弱了軍事力量；並且新軍方面的活動一向是由宋、譚二人主持，他們不在，屆時新軍的起義也恐會發生枝節。於是譚、宋二人和其他自告奮勇要去廣州起義的同志便留在南寧未去，和大家一起準備南寧的響應起義的工作。在南門外的七星橋、西門外的五堆嶺分別開了茶食粉菜店，又在城內牛角灣、北門街等處租賃民房，以備起義時作為聚集分散之所。誰料到了陰曆四月初一日接到梧州來電說，廣州已于三月二十九日提前起義，且告失敗，傷亡很大，並傳說黃興、劉古香等已經成仁。大家看了電信非常悲傷痛憤。南寧響應起義之舉，乃暫告中止。

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南寧的清朝官吏軍警，大約是接到兩廣總督張鳴岐的訓示，戒備很嚴；特別是對講武堂的師生更為注意，如野操只准帶空槍不給子彈，後經日籍教官提意見，也只准發給子彈兩顆，野操回校未經用去的即時繳還。龍觀光又曾在北門城上加築炮樓，衛護鎮台衙門的後方，並且在東門觀音閣、南門城樓等處增兵防守。凡是已經剪發的人都被注意。雷在漢、杜右臣以及師範、中學師生已剪發的，都受到道台紀堪謹的監視。恆益商行更為軍警密查的對象。這時同盟會會員的行動沒有過去那樣自由了，同盟會的活動也沒有那麼方便了。

是年九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南寧方面就準備響應，只等待桂林方面的消息就行動起來。等了四、五天，才知桂林已于九月十七日（陽曆十一月七日）在諮議局主持下宣布獨立，舉出廣西巡撫沈秉堃、藩台王芝祥和駐在南寧的提督陸榮廷為正副都督，並由沈秉堃發出通電給南寧、梧州、柳州、龍州等地官紳，宣布廣西已經獨立。同盟會同志譚昌、雷在漢、杜少廷等得到廣西宣布獨立的消息後，就到提督衙門問陸榮廷的意思。陸當即將桂林來的電報給

各人传观，并说明他本人完全赞成独立。于是南宁就在阴历九月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九日）宣布独立。当时官绅商民均不知中华民国的旗帜是怎样的，只是用白布写“独立”、“光复”等字而已，只有恆益、公益两商行竖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照样仿制，悬挂起来。而提督衙门仅在照壁上贴出一张红纸布告，并没有升起革命的旗帜。

南宁虽是宣布独立了，但政权却握在副都督陆荣廷手里。陆荣廷原是降清的游勇会党的“反骨仔”（叛徒），是反对革命的。镇南关起义时，他就是镇压革命最力的一个人。南宁独立后的第三天，同盟会会员雷在汉、莫继甫、杜少廷、杜右臣等十余人去见陆荣廷，建议召集各处民军编为北伐军，北上援鄂。当他们到达都督署时，麒麟门未开，杜少廷一时气愤，一脚将麒麟门踢开，昂扬而入。陆荣廷虽当面责备招待者的疏忽，但内心则甚为怨恨。对于召集民军编为北伐军的建议，他初则以餉源缺少，现在的军队给养尚无着落，势难再招新军为借口加以推托。经过十多次的交涉，他才同意在南宁设立一个民军征集所，所址设在讲武堂内，派同盟会同志任经为所长，雷沛鸿等十余人作为征集员。当时规定民军人员能招出十人者为十长，五十人者为小队长，四小队以上者为中队长，五中队以上者为大队长。第一批招到的约一百七十余人，大都是会党的同志。他们都不大相信陆荣廷。这一百七十多人中，带枪出来的只四、五十人，其余都是徒手。而征集所的费用除开办费外，才陆续领到六百多元，招来人员的伙食还难维持，是以征集所形同虚设，无法展开工作，成立北伐军的希望就无法实现。

广西独立不久，沈秉堃、王芝祥相继率兵离桂，要陆荣廷率部到桂林接任都督职务。同盟会的同志这时有人主张提请广西参議

院选举刘古香为都督，也有主张选刘为副都督的。由于意见参差不一，而刘古香的实力也不充实，此议终未能实现。但刘古香却因此为陆荣廷所忌，后来刘为陆所杀，这也一个原因。

陆荣廷到桂林就任都督之后，广西参议会会长、副议长等商谈，蒙经、卢汝翼等主张将省会迁至南宁。陆荣廷同意这一主张，经过一番纠纷波折后，省会终于迁至南宁。各处的同盟会同志和青年革命军人都云集南宁，如周毅夫、周行、廖祖受、曾翔天、黄宏宪、蒙经、卢汝翼及参加武昌起义的湖北陆军中学广西籍学生黄云等都来到南宁。但陆荣廷对革命人士始终轻视和心怀仇恨，因之对这些人很冷淡，倒是和康、梁的君主立宪派比较接近。因之城内的绅士李祖尧、黄居隹等一些君主立宪派的人，就很得势。陆荣廷又重用一批旧官僚，如以清朝的劝业道胡铭桢做他的军师，代他策划一切阴谋。这时我已经参加了同盟会。我和雷在汉、周毅夫、黄石琴、杜少臣、梁衡舫、杜右臣等同志看见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旧日的官僚军阀所夺取，刘古香在柳州的武力基础也不巩固，革命势力在广西是薄弱的，前途是危险的。因之我们主张大家去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和开抵南京编为第八师的广西北伐军同志商量办法。又以王和顺在广东惠州起义，编有部队六千余人，称惠军统制，驻防广州，正与海丰人陈炯明互争广东都督位置。我们可以便中邀请王和顺回来担任广西都督，和刘古香联合一起，而以刘古香、陆荣廷担任副都督，以便将广西的军政大权拿回，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下。这个意见得到外县的同盟会的同志蒙经、卢汝翼、何久成等赞同，于是我们就一起东下，先到广州，见过王和顺（他的司令部在湖南会馆）、关仁甫（他带兵驻广州河南）、杨万夫等人。他们招待我们住在长堤兴汉云台（民军首领招待各方革命同志的地

方),并且聘請我們担任一些名譽职位。我們和他們会晤之后,才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正要举行南北議和。我們乘机邀請王和順回桂与刘古香合作。王和順則主張繼續北伐,反对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議和的主張。他說已經組織了北伐的男女敢死队,并說太平天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为沒有直搗黄龙,这次再不能蹈前車之复轍了。我們看見广西革命独立不彻底,希望革命就要革得深透些,因之就同意王和順的意見,并且怀疑在南京的同志一定是留恋江南风物,有了官做,就将革命的雄心抛掉了。这样,我們就打消了請王和順回广西之議,而径去南京。王和順、关仁甫并托我們到南京向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要求停止南北和議,繼續北伐,并报告广东、广西两省民軍正在枕戈待旦,准备痛飲黄龙。于是我們除了留杜少臣、梁衡舫在王和順軍中工作以資联系外,各人就离开广州,赶到南京。我們到上海时,南北和議已公开举行。到南京后,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和第八师的广西同志梁史、邓鼎封、罗經、梁德昭等联络之后,便离开南京。

这时王和順在广州与陈炯明互爭都督位置,大动干戈,为陈所敗,离开广州。我們想到,陆荣廷偵知我們曾有邀請王和順回桂任都督之举,一定怀恨在心,会对我們不利的。我們为着貯备力量,准备将来再来一次革命,各自安排出处。于是黃石琴留在上海担任沪軍的教練官;反陆的曾庸丞也来上海与王天冲、白萃洲、王和順等合作;雷沛鴻、麦煥章則繼續求学。雷在汉自南京回到南宁后,陆荣廷一方面怀恨他,一方面也敷衍他,派他到右江山区的鎮安府做府长。南宁准备起义时,曾召集来左右江的会党同志不少,独立后并没有很好安排。雷在汉到鎮安府任职后,就和班香圃、梁植堂等成立一个种植公司,在城外五十余里的山区种植茵树、桐树

五十余万株,安插了许多同志和附近的贫苦农民在那里生产劳动。他又借口保护农场,编组了有枪支的武装护林队。他企图以此为据点,以备再进行一次革命之用。可惜广西二次革命时没有通盘计划,各地也没有联系,这个护林队就没有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辛亥革命在柳州

關轡安等口述

据政协广西僑族自治区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按：这篇資料是柳州市關轡安、楊又、蘇达、覃子权、龙伟生、馮直斋、宋淮、關繩武八位老先生座談提供各人亲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的資料，其后又补充了瞿念劬、龙月卿兩先生的意見，加以綜合整理。这十位老先生簡介如下：

關轡安：七十七岁，柳州市人，当时地方紳士。

龙月卿：六十七岁，柳州市人，当时是中學生，現任广西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协柳州市委員會副主席。

瞿念劬：七十岁，柳州市人，当时是學生，現任政协广西僑族自治区委員會常委、政协柳州市委員會副主席、广西僑族自治区人民委員會參事。

楊又：六十六岁，柳州市人，当时是广西陸軍小学學生，現任广西僑族自治区人民委員會參事、政协柳州市委員會常委。

蘇达：七十三岁，柳州市人，当时在革命总机关工作，后充新兵營排長。

覃子权：七十岁，柳州市人，当时参加援鄂軍，現任政协柳州市委員會委員。

龙伟生：六十二岁，柳州市人，当时是學生。

馮直斋：七十二岁，柳州市人，柳州独立后，在革命总机关調查部負責检查邮电工作。

宋淮：六十二岁，柳州市人，宋新洲之妹，当时是學生，現任政协广西僑族自治区委員會委員、政协柳州市委員會委員。

關繩武：六十一岁，柳州市人，当时是學生。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旧历五月十一日陸亞发舉事于柳

州,十五日退出,轉踞永宁、雒容、柳城等州县交界地区的四十八峯及柳城、罗城、融县一带地区,拥众万余人,声势浩大,清廷震惊。他们在清政府調集九省大軍的会攻下虽然失败了,但这一反清斗争,影响极大。革命党人乘此时机,先后派党人在柳州进行革命活动。是年张鉄臣(江西省人,同盟会会员)、卢燾(广西宜北人,同盟会会员)、陈晓峯(四川人,同盟会会员)、黄岱(湖南永州人,同盟会会员)等先后在柳州設立机关进行活动。张鉄臣、卢燾在柳州对河十字街蔣家門樓設樟腦局及在罗城县設樟腦公司;黄岱在雒容高岭塘(今属鹿寨县)設垦殖公司;陈晓峯在柳州四碼頭(今宣道会地址)開設富貴陞客栈,分別作为掩护革命活动的各种場所。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联络会党、綠林,組織民軍,积极作武装起义的准备。

张鉄臣原是济字营龔捷三督带的文案,他所办的樟腦局后改为硝磺局,借办硝磺为名,秘密制造軍火。

黄岱原是駐柳忠字营的軍官,他主办的高岭塘垦殖公司是忠字营的軍垦机构;由于内部工作人員如黎文柏等都是革命党人,因此,这个公司就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机构。各种重要的秘密会议都在这个地方举行,外地重要的革命党人的来往也都在此居留,如柯汉賚、李德山等由香港、广州回到柳州活动就常住在这里。这虽是个軍垦公司,由忠字营輪流派士兵前来垦殖,但也招收一些长工,从中吸收革命志士。

陈晓峯主办的富貴陞客栈,后改名为华熙客栈,为革命的通訊机关,招待革命同志,各地通訊和联络的人員来往都在此出入。

为了进行与清軍官兵的联系,革命党人王冠三(又名植槐)、宋洪(字新洲)、陈晓峯等又于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在蓮花桥(今皇蕩巷二十五号)組織“一乐也”俱乐部,为革命活动的机关,借

賭博娱乐为名，以拉攏軍人。

革命党人除設立上述各机关进行革命活动外，又利用李香廷、韦昌順等開設的烟叶行及某些娱乐场所作为革命党人与外界人士来往聚会的場所。

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香港同盟会总机关于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加派刘古香回柳州工作。刘古香原名起今，柳州人，清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后考入广东虎門将弁学堂肄业，受孙中山革命运动影响，去香港加入同盟会。他回到柳州，借办学以掩护其革命活动。首先和邓承緒創設“龙城求是学会”（会址在二圣庙，即今解放北路东一巷公安局幼儿园），进行革命宣传。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次第开办柳郡中学堂（柳州府八属中学）、柳郡师范、馬邑两等小学堂（馬平县立）和蒙养小学堂，并在成立馬平劝学所时兼任劝学所总董，負責管理教育行政业务。他在办理教育事业中頗著成績，社会风气日开，因而声望日隆。他在进行革命工作中，对各地士紳的联系极为重視，如办团的团总和地方自治会的人士楊秀芝、楊森、楊友兰、吳芳園等和教育知識界的朱奇元、何佩三、翟凤文、梁潤生等都很接近。在这些士紳受到影响，逐渐傾向革命后，他便与同盟会的同志邓宝书（号仙舫，柳城大埔人）等从中发展革命組織，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同盟会。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有柯汉資、梁潤生、郭干臣、李德山、李子廷、楊秀芝、王干廷、楊瑞池、莫显成和熊少臣等多人。

一九〇八年，刘古香与許子林、董轄然、刘福卿、刘靜三、刘瑞麟等在拉堡葛婆庙开秘密會議，事为警察局长张玉齡偵悉，密报知府楊道霖，楊欲逮捕他。这时候，“一乐也”俱乐部由于許仲山言語失慎，事机洩露；华熙客栈的秘密亦为清吏所識破。而集中四十八

岸的会党、民军准备与桂林方面新军约期举事的计划，又不幸为右江镇台李国治所侦悉，以大兵力进攻，陷于失败。陈晓峯痛革命之失败，愤而自杀。革命党人纷纷离柳，刘古香和李德山、李子亭等逃往广州、香港。柳州方面工作则由王冠三负责主持，继续活动。

在几个革命机关被破坏、许多革命同志离开柳州后，柳州的革命工作一时虽然遭到困难，但在王冠三、吕士宾、莫显成、主干廷等积极努力下，工作又逐渐地开展起来。莫显成、吕士宾两同志私人筹资开设莫权利鞋店（今中山路七十三号），作为革命活动的机关。城内已建立了机关，有了革命基地，城区的工作也便于进行了。另外，高岭塘垦殖公司设在郊外，对于联络绿林和民军的工作又是很有利的。因此，柳州的革命工作，仍是进行得很顺利。

一九一〇年，刘震寰奉派回柳州工作。刘震寰是柳州基隆村人，幼年在刘古香办的马邑两等小学堂读书，受到刘古香的影响，树立了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一九〇九年考入广西第二师范预科肄业，在桂林就学一年，便离开了学堂前往广东就学；刘古香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后，即回柳州进行革命工作。是时，王冠三等正大力进行运动绿林、组织民军、建立革命武力的工作。刘震寰回柳后，拿出自己的家财，向来宾、迁江、象州、柳城、雒容、忻城各州县绿林活动，在同盟会同志的帮助下，颇具成绩。刘的小名叫做“八三”，各地民军都称他为“八三哥”；他的年纪很轻，这时不过二十岁左右，但民军中人物，对他极为爱戴尊敬。其中在来宾、象州、马平三县活动的曾超廷（曾四）势力最大，约有枪七十支，人一、二百左右；在忻城一带活动的蓝八、廖六各有枪二十支左右，人百余；在迁江、贵县边界活动的陶二、宋五各有枪三十支左右，人百余。由于刘震

震常来往各地綠林中活动，名震一时，清官兵曾到他的家乡基隆村围捕他，房屋半遭官兵焚毁，家财耗损大半。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刘古香逃往香港，与胡汉民主持广东、广西联络民军起义，刘古香在广西进行民军运动，主要是靠刘震寰的活动。

柳州同盟会除刘震寰积极进行民军活动外，还有莫显成联系沈鴻英，王冠三也直接与沈鴻英取联系。沈鴻英原名沈亚英，在雒容、修仁、荔蒲一带为匪，他同情革命后，并积极联系韓彩凤、李天民(大頸四)等。他们共有枪百余支(仅李天民一部就有枪六、七十支)，人数合计数百。刘震寰亦曾向沈鴻英联系，但沈见他年轻人小，有轻视之心。

一九一一年，会党在柳州一带很活动，各地人民集会拜台的极为普遍，当时称为满地紅。八月間，在大潭的鸡窝岸和谷埠街西開巷蛋家社集会拜台，三天后，照例“做三朝”，被清政府偵悉，乃于九月初二日派兵在谷埠街周永安堂(药材舖)等处捉去一百多人，其中有永安堂的儿子周亚生和謝德标、馮五、董老汉、董老送等。会党的文案师爷蒙云山和陈功甫逃走了。清政府逮捕这一大批人后，沈道台就請谷埠街的团总周麟生去，对他說，这百多人全部要杀。周听了大惊，就对沈說：“自古只有杀为首的，不究胁从；若全部杀掉，恐怕影响太大。”柳州知府高墨霖亦同意周的意见。沈道台遂改变了原来全部杀光的决定，于九月中旬在柳州沙街中元碼頭将周亚生、謝德标、馮五、董老汉、董老送等九人(还有四人忘其姓名)杀害，并把他們的头顱悬挂在谷埠街蛋家社的大树上示众，羣情大憤。

是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后，广西于九月十七日宣布独立。广

东民軍革命势力相当强大,各路汇逼广州,广东也宣布了独立。胡汉民即入广州就任广东都督;刘古香为都督府秘书长。当时广西潯、梧一带,有同盟会罗佩珩、苏天涯等率领民軍占领平南、藤县等地,向桂平进攻;梧州也早經宣布独立。柳州方面,各地民軍声势浩大,在同盟会号召下,集中柳州附近各处活动的計有曾超廷、蓝八、陶二、宋五、廖六、沈鴻英、李天民、楊榮廷、曾福英、馮有信、刘麻六、刘成甫、周彝卿、刘福卿、张三嫂等部,約共一千多人,誓要攻占柳州。同时在柳州的同盟会会员王冠三、胡岱銘、宋新洲、柯汉資、邓仙舫、梁潤生、霍凤文、王千廷、郭千臣、刘震寰等数十人集議决定:一面领导民軍在外压迫;一面通过亲友关系向清朝官兵进行說服。如宋新洲通过朱子垣之妻陈文說服了防营分統陈朝政(号宗棠);蔡劲柏通过刘月卿說服了防营統刘炳宇(号統丞)。陈朝政、刘炳宇同情革命后,右江鎮台兼防营統領陈鴻初(字仲实)徒拥虛名,实力已为陈朝政、刘炳宇等所掌握。革命党人并通过刘炳宇向陈仲实說利害关系。王冠三、宋新洲、郭千臣、王千廷等则手执武器进入右江道台衙門、柳州知府衙門、馬平县衙門威胁,逼清官交出政权。于是柳庆总鎮陈仲实、右江道台沈炳炎、柳州知府高墨霖、馬平知县万荣齡等,无不心存畏惧,皆愿听从独立,只求脫身而去。至此,柳州事权已移在陈朝政之手。陈朝政表示拥护革命,并与党人約定,民軍集中馬厂,不要輕易入城,免生誤会。于是同盟会乃在柳郡中学組織右江国民軍总机关,通称为革命总机关。推举王冠三为司令,掌握全局,周煥章为秘书长,内分參謀部,邓仙舫、郭千成負責;軍需部,韦伯榮、銀永亭負責;軍械部,楊瑞池、王千廷負責;軍法部,刘紹周、刘名世、韦榮負責;執法部,柯汉資負責;秘书部,梁潤生、霍凤文負責;邮电部,何觉負責;外勤部,

賴少臣負責。集中馬厂的民軍，編为两个支队，每支队轄三团。第一支队司令刘震寰，第二支队司令朱新洲，胡岱銘等分任团长，刘月卿为水师統領。巡防营分統陈朝政、帮統刘炳宇等仍暫任原职。高岭塘黎文柏自領其部众，共維治安。編配分派既定，即于旧九月十九日在柳郡中学堂召集柳州地方士紳、各界民众、清朝官吏大会，宣布柳州独立，年号改用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所有軍民财政概由右江国民軍总机关主持。柳庆总鎮陈仲寅将他的十一队人马交其分統陈朝政、帮統刘炳宇管轄，并与右江道台沈炳炎、柳州知府高墨霖、馬平知县万荣龄等弃职携印赴桂林省会繳銷。陈仲寅前往搭輪离柳时，放声大哭，沈炳炎、高墨霖、万荣龄等亦极为狼狽。

柳州独立后，革命政府的重要措施为：

一、发出独立通电，并电刘古香回柳主持。

二、派胡岱銘到馬厂整頓民軍紀律。有张三嫂、文师爷等不服，聚众鬧事，胡岱銘在混乱中被击毙。并有人纵火烧毀馬厂房一部。国民軍总机关派員彻查，文师爷被捕，张三嫂逃走，后在河南谷埠为陈朝政部捕获，皆送执法部审讯，处以极刑。这两人被处死刑后，民軍紀律始为好轉。

三、派蔡劲柏前往庆远(宜山)向防营督帶莫荣新劝說，庆远亦宣布独立。

四、整編部队，补充装备，准备出师北伐。

广西独立后在桂林成立軍政府，陆荣廷以副都督駐在南宁，故于南宁設立軍政副府。不久都督沈秉堃、副都督王芝祥均借口北伐先后离开广西。广西省参議会开会，推举副都督陆荣廷为都督。陆荣廷于十月初八日发出庚电就职，并指定柳州、梧州、南宁等处各

設立軍政分府。柳州軍政分府称为“廣西省右江軍政分府”。分府總長一職，众推刘古香担任，在刘未回柳前，由陈朝政以副總長代行總長職務。刘古香于十一月十三日回到柳州，就任右江軍政分府總長職。陈朝政交卸后，即率所部开赴庆远駐防。刘古香就取后，随將右江國民軍總机关裁撤，任王輝灵为分府參謀長，梁潤生为秘書長，朱奇元、刘海如、鍾尧助等分任民政、財政、司法等職務（后鍾尧助調任柳州警察局長）。派邓拔为北伐大隊司令，严兆丰为總教練。北伐大隊系以炸彈隊为基础，并招收各县知識青年学生扩充而成，約共五百余人，准备培养成为北伐軍的骨干。又派刘震寰整編民軍，將各路民軍整編为八个隊。曾超廷为督帶，所部編为二隊；蓝八、陶二皆为管帶，各將所部編为一隊；沈鴻英初为管帶，李天民为幫帶，所部共編为二隊。后以該部槍支多屬李天民的，乃升李天民为管帶，自編为一隊。适馮五阴谋叛乱，命沈捕杀之，將馮部归沈率領，与沈部合編为二隊，升沈为督帶。任命刘震寰为幫統，各隊皆归刘震寰統率。派王冠三为新兵營營長，在馬厂訓練新兵，为将来整編部队打下基础。

刘古香为了筹划北伐餉糈，乃着手整頓各县粮稅，在总机关各部的負責人中，选派了一批县长：朱奇元任迁江县长，黄坤任罗城县长，邓宝书任融县县长，邓士瞻任三江县长，王宏猷任馬平县长，鍾尧助任柳州警察局長。

一九一二年二月，陆榮廷到达桂林，就任廣西都督職，这时南北正在上海談判和議。陆榮廷借統一廣西軍政为名，于是月二十六日发出通電，將南宁軍政副府和柳州、梧州、龙州軍政分府于三月一日起一律裁撤，各軍政分府總長一律改为統領，为各該轄軍队司令，专管軍事。刘古香被任为廣西陸軍第五統領，刘炳宇、刘震寰

为帮统(后刘炳宇调任潯防統領),王卿灵为柳州府长,刘月卿仍为水师統領,各民軍帮会首領如曾祖尧、馮有信、宋五、廖六、刘麻六、刘成甫、周彝卿、楊荣廷、刘福卿等各任帮带、哨官等职。所有駐柳州的巡防营(刘炳宇所部共四队)、水师、新兵营和由民軍編成的部队,概归第五統領部統轄。

在庆远的陈朝政被任为广西第六統領兼庆远府长,莫荣新为帮统。所有駐庆远的部队,概归第六統領部統轄。

(刘立道、陈显揚记录 刘立道綜合整理)

平南起义和会攻潯州

潘乃德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的前夕，同盟会号召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回国活动。各省的留日学生纷纷回到广州、香港。广西籍的留日学生回省者，有贵县罗佩珩、藤县苏无涯、武宣刘玉山、柳州谭昌等。他们由在日本的同盟会总部介绍到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后，得到南方支部的指示，原籍属那一府的人回到那一府进行革命工作，并且要联系南洋方面的同盟会会员共同活动，因为革命需要钱用，南洋方面筹款容易。我那时已经参加同盟会，刚在广东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罗佩珩回到香港后，曾来广州找我，和我商量潯州方面的革命工作。我们认为必须联系当地的同盟会会员和由日本回国的以及原在广州、香港的潯州籍同盟会会员共同活动，才能集中力量，扩大队伍。于是就函约贵县的陈志軒、桂平的徐启祥、平南的卢殿林、武宣的廖和卿到香港密商。我和罗佩珩一同到了香港不久，陈志軒他们也到了香港。我们就一起到南方总支部联系。那时刘古香也到了香港，正和胡汉民、苏无涯、刘玉山等在南方总支部等候我们会商。会商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广西各地即准备武装起义，以响应广州的武装起义。大家又认为，各地的活动总得有一个负责人。于是大家向南方总支部提議，推举冷遁负责桂林方面，刘古香负责柳州方面，雷鑑池、周君实负责南宁方

面，譚昌、王金波負責南寧和龍州方面（譚、王二人均係龍標的軍官），周毅夫負責平樂方面，劉樞負責梧州方面，羅佩珩和我負責潯州方面。這一提議得到南方總支部的同意批准。會商決定之後，大家都分頭回到廣西進行活動，所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除了劉古香外，其他的人都沒有參加。那時羅佩珩已上了梧州，我則來往香港、廣州購買槍械。

羅佩珩原是潯州中學的學生，一九〇四年在潯州中學畢業就去日本留學，一九〇五年在東京參加同盟會，一九〇七年畢業於東京博文學校。畢業後，他曾向東京同盟會總部請求回國進行革命活動，得到同盟會總部的同意，於一九〇八年回到潯州府城，會同盧雲川等秘密組織革命機關。即與熊祥、曹啟先、袁恩榮等密謀革命起義，各人分別到桂平、武宣、平南、貴縣、藤縣各處聯絡當地的進步人士和散在各地的會黨、綠林，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義，相機組織革命力量。羅佩珩特別向他的同學——潯州中學學生灌輸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鼓勵他們參加革命。他到了一九一〇年才復到日本，向東京同盟會總部彙報工作。

當時在潯州一帶宣傳革命主義和聯絡會黨、綠林及進步人士的，當然不只是羅佩珩一人，不過他做得更多一些。那時我們這些在日本和廣東求學的学生，凡是參加同盟會或者傾向革命的，每逢寒暑假回鄉都秘密帶《民報》等革命書刊回去給親戚朋友們看，借以宣傳革命。有些人還和會黨及綠林人物有了聯繫。所以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我們在潯州一帶做了許多工作。

我們在香港會商後不久，廣州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就爆發了，我們來不及在廣西發動響應。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給潯州的革命同志的鼓舞很大。大家認為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來，無不磨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場。潯州的同志函促罗佩珩从梧州赶快回潯主持。准备武装起义最重要的工作，一是組織队伍，一是筹款和购买武器。我和罗佩珩早就分了工：他負責回潯州組織队伍；我負責在香港购买武器。至于筹款，大家都有責任。筹款的情况大致如下：一是向南洋华侨筹款，刘古香介紹从南洋回国的华侨殷商捐助了一万多元；一是向內地筹款，通过各人的亲戚朋友关系，罗殿林在平南筹到万多元，陈志軒在貴县大圩筹到一万八千元，卢云川在桂平罗播李筹到一万二千元，楊夢松在貴县桥圩筹到七、八千元，我在貴县木梓、木格一带筹到二万元，总共筹到八万多元。至于购买武器，原定計劃是打算在香港秘密购买驳壳手枪二千支，用重資运动港、梧輪船的外国买办秘密运到梧州。洋鬼子貪錢，得了我們的錢就肯替我們秘密运输，但因购买困难，每次能运入的数量也不多，到广西独立时才运入了一百支，子弹倒运入不少。我們运动各地的綠林，就以补充他們的子弹为条件，因为他們子弹少，很需要补充。联络到的綠林不下数千人，远在柳州的沈鴻英也有过联系。

一九一一年九月，罗佩珩、陈志軒、徐启祥、卢殿林、廖和卿等由香港起程經梧州回潯州，先到平南和袁思榮、駱乔翔等联系，得到当地进步人士的协助，就在平南設立办事处，布置一切。并派員到貴县、桂平、武宣、藤县各处联络进步人士、团練、会党、綠林和已組織好的民軍，約期旧历九月起义。当时的规划是：先取平南为根据地，取得平南后即刻西上会攻潯州；潯州得手即进攻武宣（已先派刘玉山、廖和卿在武宣組織民軍），再进军柳州和刘古香汇合进攻桂林，并約在平乐的周毅夫率所組織的起义軍会师桂林。规划既定，大家公推罗佩珩为总司令，曹启光为总指揮，袁思榮为副总指揮，黃熊祥、徐启祥为前敌指揮，周毅夫为參謀长，駱乔翔为副參謀

长。部署既定，即开始行动。周毅夫本是负责平乐方面的，因罗佩珩、曹启光等不谙军事，而周毅夫则是军事人才，所以临时把他调来。

第一个目标是平南，由卢殿林负责进行。革命党人事前在平南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同志中的徐启祥是桂平竹社乡塌心村的有名富户，拥有三十多万租的田地，寄居平南大乌，开设恆丰米店，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平南进行革命活动。他就以“恆丰米店”为秘密机关，大量变卖田产充作革命活动经费，前后共变卖了二十几万租之多。他和各方面联络都已成熟：绿林、会党方面，联络了桂山、八洞、鹏化一带的帮口千余人，有枪二、三百支。团练方面除了卢殿林所领导的安怀乡谷塘村的数百人和枪支二百余外，还有甘健斋领导的六陈一带的数百人和枪百余支。县城方面，有县警长方星桥所掌握的两个队，一是张奕南（鹏化人）率领的北河八里游击队，驻思旺；另一是馮云軒（土村人）所统率的游击队，驻平南县藤州书院，两队共有人枪数百。此外还有县武装巡警六十名，完全是中学生和知识青年，经过南宁统一训练毕业后分发至平南县成立巡警队的，他们的爱国意识和革命思想都很浓厚，到县不久就互相串连，全部参加了同盟会。由于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周到，平南的革命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一九一一年阳历十一月五日发动武装起义，进军平南县城，并未遭到抵抗，即将县城收复。清朝的县官蹇仙桃（贵州人）弃职潜逃。平南光复后，成立平南军政府和县议会，由卢殿林摄理县政。

平南得手后，即将卢殿林统率的平南起义军和苏无涯组织的藤县起义军迅速集中平南县城整编，不到三天就整编完毕，由罗佩珩、周毅夫两人率领，分北河、南河、水路三路向潯州进发。经过大

滯江口、石咀等地時，民軍參加者不少。這時陳志軒、潘法卿在貴縣組織的民軍和劉玉山、廖和卿在武宣組織的民軍，都分頭向潯州集中。這次會攻潯州的武裝不下一萬餘人，動員相當廣泛。桂平的江口、蒙圩、白沙、大宜、石咀等地團練，以及貴縣、大圩、石龍、東津、橋圩、木梓、木格、武宣的東鄉等地團練都參加進來，綠林參加的有梁國純、梁亞忠四、李亞美等部。團練最多，約一萬人；綠林約一、二千人。

平南光復之時，武昌已經舉義二十多天。接着陽曆十一月七日桂林方面也宣布廣西獨立。當時有人以為廣西省內不需要流血革命了，應趕快組織力量北伐。同盟會內部也有這樣的意見。羅佩珩趕到梧州和同盟會同志秘密開會，他分析廣西的形勢說，廣西的獨立是靠不住的，政權仍然掌握在陸榮廷反動派手中，主張革命必須徹底，仍應依照原定計劃進行，攻取潯州。大家贊成他的意見，他又馳回潯州前線。

在潯州府城原來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潯州府城的工作原由黃熊祥負責，他運動潯州府署和桂平縣署的警察已經成熟，桂平的士紳潘桂岩、程端門、溫懿標等也聯繫妥當，他們都同情革命。起義軍以為既有內應，大可和平入城，順手而得，沒有準備攻城的武器和器材。誰知潯州知府賀源清頑固到底，將廣西獨立的通電置不發表，準備抵抗；而保皇黨的紳士程大璋又大肆活動，既禁止府縣警兵開城迎接起義軍進入，復勾結舊軍官馬統帶率兵入城防守，同時又與府官賀源清聯名電陸榮廷派兵來援。革命軍開抵潯州城垣時，見城門緊閉，戒備森嚴，知事情已發生變化，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下總攻擊令，占領府城外圍，向城內猛攻。因潯州城牆堅固，革命軍既缺乏攻堅的重火器，又未準備攀緣城牆的器材，遂致

围攻七天，未能得手。陆荣廷素来仇视革命党，得到贺源清、程大璋等请兵解围的电后，急电驻横州、贵县一带的龙覲光派兵驰援。龙覲光率部顺流而下，包围革命军。城内清军知援军到达，复开城出击。革命军因内外夹攻，腹背受敌，而粮食运输又发生困难，不得不下令退却，突围而走，因退却迅速，损失不大。

陆荣廷在革命军退却后，复施用怀柔手段，派人和罗佩珩谈判，劝罗佩珩解散队伍，以重用罗佩珩为交换条件。旅居广州的广西籍同盟会会员知道这个消息后，连夜派苏无涯西上见罗佩珩，力说陆荣廷之不可靠，劝罗佩珩重整旗鼓，再接再厉，继续作战。无如罗佩珩受了陆荣廷的利诱，作官心切，竟不听同盟会同志的劝告，和陆荣廷妥协，把革命军全部遣散。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斗争，就这样烟消云散了。罗佩珩和陆荣廷妥协，遣散革命军后，陆委罗为怀集县长，到任不久，就被陆借故杀害了。

(李徽记录)

广西独立时融县的斗争

胡佩生

广西宣布独立后,全省各县的清吏,有誓死反对独立的,也有响应民军独立的。融县(即今大苗山自治县)知县张礼干(浙江绍兴人)是一个最效忠清廷、反对独立的人。他接到广西宣布独立的消息后,在县城地区虽不敢公然反对,但实际上已造成一个恐怖状态。他经常派警检查来往行人,实行宵禁,刺探地方人士的首言行动,对青年学生及平日比较进步、好谈时事的人,更加特别注意暗中监视。检查邮件及来往船只,尤为严密。这些做法,引起了地方上人心的极度慌乱,不晓得张礼干将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地方人民。于是,地方上的绅耆龙运生、胡学轩、王鳌峯、陆介如、周子廉、胡用宾等,为着安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起见,先后到县署以謁见为名,向张谈到广西宣布独立的情况,想探明他的真实态度。那时省局未定,清布政使王芝祥虽接受广西军政府副都督的职位,实际上仍然效忠清廷。他拥有省防军朱尚杰等部队几千人,暗中与各县的清朝官吏互相联络,共谋反抗。张礼干与王芝祥的来往甚为密切。因此,当地方上绅耆往县署謁张时,张对宣布独立的事始终不明白表示态度。于是地方人士不知他怀着什么鬼胎。而张手下的警备大队长焦盛贵(湖南人,土匪出身)日間经常带同警兵偵探出外,收买大量火药和棕绳等物,这样更加使得地方人民怀疑惶惧。在那

种情形之下,适广西右江軍政分府总长刘古香派部下何景琦、何子豪等到融县,与地方人士会晤,說明广西独立經過,并調查张礼干的态度。地方人士遂将张礼干对独立的曖昧态度和他的行动情况会报。何景琦等认为张确有反抗独立的企图。他們就密报刘古香請求立即派队来融,准备应付张礼干的反抗。右江軍政分府接信后,即陸續派民軍队伍到达融县。同时地方各乡的团練,亦經地方人士及何景琦等进行聯絡,定期举义,推翻张礼干,并約定与民軍連成一气,共同作战。議定后,暗中組織一个“融县民軍办事处”,为聯絡各方民軍和推动革命进行的机构。那时,县衙門的差役、警兵受张礼干之命,四出暗探民軍的举动。同时县警兵队也日夜配备武装,如临大敌。其时謠言四起,紛传王芝祥已派省防軍由桂林出发,經過古化(今永福县百寿鎮)到长安、融县,扑灭民軍。謠言引起了地方上的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民軍和地方人民及各乡团練,亦恐张先发制人,不及措手,于是进攻县署、打倒张礼干的行动,就随之爆发。

到辛亥阴历十月初十那一天,形势更急迫了。据地方上平日与县警备队长焦盛貴、陈标来往最密的刘崑成、邓老庆、曾筱潤等傳出的消息說:张礼干和警备队长焦盛貴率領全部警兵,将于十月初十日夜間冲出具署,进攻民軍,并已准备好火药包,同时放火,焚烧房屋。在这危机間不容发的时候,地方人民与各处来的民軍、团練,遂决定在十月初十日黄昏时先发制人,进攻县署,将张礼干、焦盛貴及全部警兵包围起来,消灭他們。并以何子豪、朱載之、涂海平負責指揮民軍及各乡团練。在进攻之前,由地方人士公电广西都督府,报告张礼干、焦盛貴已經准备率領警队扑攻民軍、纵火焚屋等企图。正在发出电报的时候,张、焦二人果然集合警队向民軍

直扑。民軍和地方团練亦同时向县署包围进攻。战斗由初十日黄昏起,相持到午夜,尙未攻入县署。那时民軍和地方团練枪彈將近用尽,而张、焦警队仍瘋狂猛扑。在这种情况下,民軍迫得用洋油焚烧县署的偏舍。火起后,柳州方面新派来的民軍一队亦适时开到,加入战斗。张、焦見火势已起,民軍的火力又已加強,將近拂晓时,焦盛貴随同张礼干和全部县警突围出走。中途焦盛貴将张礼干抛弃不顧,带同警队及輜重財物逃走。张礼干孤身一人,走投无路。至十月十三日早晨,发现张的尸体在下廓村附近的南景河边,遂将其捞起,由民軍办事处将其埋葬。其后张之亲属来融县訪查,始将张的骸骨运回浙江原籍。焦盛貴帶領县警弃张逃跑之后,听說他带同这些县警窜到湘黔边境,流为匪帮。結果如何,未有所聞。

当战事发作之前,县警各队副队长陈标奉张礼干派遣,帶領一部分警队护送张的眷属到桂林。张礼干死后,陈标仍留在桂林未回。地方上热心革命人士邓祖送、邓老庆、曾筱潤、刘岷成、艾九寿五人,平日因与陈标有交誼,遂向民軍办事处表示,愿往桂林劝陈标帶領警队轉回融县,将警枪归还地方公用,并請安排陈标工作。民軍办事处答应了他們的請求。于是邓祖送等就前往桂林找到陈标,力劝其带队回融,保証安排他的职务。在他們双方商洽中,事为王芝祥部下偵悉,遂密报王芝祥,王竟将邓祖送等五人围捕,同遭杀害。其后,据平日与陈标有来往的人說,陈在桂林不久,即将警枪卖掉,将枪款寄回家中經營商业。

张礼干死后,民軍办事处为維持地方治安起見,联同地方人士公推典史卜作楨权署融县县长,以安定人心。卜作楨做了县长之后,最主要的是将搶劫拉擄的劫匪处决了一批。另外,那时清政府

的法律已廢，民国的法律尚未頒布，当时对地方民刑訴訟案件的审理，由卜以县长的名义，邀請地方上有名望的公正人士共同协商、衡情处理。不久，广西都督府正式委任柳城人邓先仿署理融县县长。邓到任后，与地方人士較能开誠相見，县政尚能得到地方的同情。

二次革命柳州起义亲历記

覃子权

广西独立后,我在柳州第五統領部刘震寰帮統部的模范队(即刘震寰的卫队)任教練,二次革命柳州起义我是亲身参加的,現将其經過写在下面。

柳州独立后,成立右江軍政分府,刘古香任軍政分府总长。后来軍政分府取消,刘古香改任第五統領。第五統領的部队,主要是靠刘震寰的力量运动出来的。辛亥革命之前,刘震寰即从事民軍的运动,他所联系的民軍首領有曾超廷(曾四)、蓝八、陶二、宋五等。柳州独立时,刘震寰即带同这些民軍队伍到柳州編入軍政分府部队;同盟会又招来沈鴻英、李天民(大頸四)等部民軍。刘古香为第五統領后,將軍政分府所属部队改編,以刘震寰任帮統,沈鴻英和曾超廷任督带,刘月卿为水师統領,总計約一千人左右。第五統領所属十二个管带中有六个姓刘的,軍队名册好象刘姓族譜一样。陆荣廷原是忌妒革命党人的,今見刘古香的势力日益壮大,柳州分府属各县政权又为刘古香所掌握,因此,对刘古香很不放心,就調刘古香为百色鎮台,想把他調离柳州。刘古香虽曾进过将弁学堂,但他还没有脫文人的本色,本想去做文官,接到这个命令后,即召集他的刘氏部属开会商量。他的部属大多数都不同意离开柳州,尤其是他的馬氏夫人反对最为激烈。刘古香遂把这个調职的

命令置之不理。陆荣廷对刘更为猜疑，派了许多密探到柳州，打听刘的行动。本城馮耀堂和蒙莖，就是陆荣廷在柳州的暗探。

一九一三年八月初，刘古香接到广东都督陈炯明的电报，相约起义討袁，并运来很多軍用票和文件等。刘古香当即召开軍事會議，所有管带、哨官都参加。因为内部意見不一致，有主张和广东共同起义的，也有反对的，會議沒有結果。不久，李烈鈞在江西失败了，革命形势已經逆轉，刘古香見形势不好，内部意見不統一，因而对陈炯明約期起义事遂犹豫不决；但他並沒有对部下解释，把这事攔起就算了。可是他的部下不知道时局已經轉变，还說統領做了官，发了財，怕死不敢起义，因而对刘頗为不滿。九月初旬，刘古香的卫队长刘麻六、刘震寰的模范队小队长徐得常等在福建会馆里面大肆賭博，大吃大喝，并秘密开会，决定約期起事。当时模范队有一部分駐在大南門城樓，是徐得常带的，起事那天晚上十一点鐘左右，我巡查到那里时，在路口放哨的哨兵慌忙跑上去报告。我直上城樓，見他們分两边奔跑。我只疑他們聚賭，不疑其他。我回队对模范队队长刘成甫訴起这回事，成甫叫我直接去报告“老帮”（指刘震寰）。誰知刘震寰不但不听，反而責备我象女人訴小話。我扫兴出来，成甫也不高兴，并說：“他不管，我們更不管，随他去！”不久，就听到枪声大作，成甫即着人找徐得常来追問，徐才訴出要起义的事，并說如何用白布为暗号等等，我們才剪去几条白門帘做暗号。事后想起来，当时刘震寰对这件事一定是知道的；不然，为什么他对我的报告毫不考虑呢？尤其是当枪声大作时，为什么他还是处之泰然呢？

刘麻六、徐得常等原意是想逼刘古香起义討袁，但是事前沒有計劃好，沒有对部下訴清楚。起事那天（九月十一日）天还未亮，他

們首先在統領衙門門口放槍。槍一响，刘麻六的部队就蜂然而起，刘震寰的卫队刘成甫部也有参加的。自己的卫队起事，哪里还有人抵抗。这些人只想发洋财，由打統領衙門进而打柳州府衙門、县衙門，搶軍械庫，放犯人，乱搶东西，搞得滿城风雨。統領衙門秘書长梁潤森、刘古香之妻馬电和媳楊滢均被乱枪击毙。刘古香无力制止，只得向衙門后面逃跑。那班人本沒有杀害統領之意，只願搶东西，找寻統領不着也就算了。天大亮后，各人見事情鬧大了，不可收拾，遂相約到刘震寰幫統部，請刘出来維持，領導起义討袁，并要挾地說：“幫統如不出来維持，我們就放火烧房子，杀人，搶东西，拉队上山。”当时有很多散兵将在統領部搶得的軍用票拿到市上強迫商民使用，全城秩序异常混乱。刘震寰見事情已經鬧到这个地步，不得不出來維持，即派模范队巡查街道，取締散兵的胡作非为，布告安民。不久，市面秩序恢复如常。

次早，刘震寰派人到处去找刘古香，結果发现他躲藏在衙門后面的字紙炉內，把他帶回到幫統部时，已是十点钟了。他穿一件云紗唐装，拖一双鞋子，足部受伤，滿面愁容，一言不发，走进刘震寰的臥室休息(是个套房，前房办公，后房的臥室)。接着大家紛紛議論起义討袁等問題，刘古香全不参加意見。刘震寰招呼他在幫統部住下。

第二天，刘震寰召集地方各界人士在中学开大会，本城關善安、王干廷、郭干臣、莫显成、呂士宾、吳挺生等均参加。會議中众皆同意成立討袁軍，并选举刘震寰为討袁軍总司令。即日宣布独立，通电討袁，并連夜赶写委任状，委派各級官佐，編組討袁軍。事变后，刘麻六即力爭要当管帶，最后照委他为管帶，并拨了一批新兵給他。我写委任状和給各部队向南宁进攻的命令，一直写到天

亮。

沈鴻英部駐扎在東門街一帶，事變後沈即往見劉震寰，表面對劉表示服從，但實際上他對劉震寰此次舉動不和他商量。頗為不滿。沈見劉震寰後，又進見劉古香，一見面即下跪，並流下淚來說道：“統領這次受驚，我做部下的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真是罪過。”這番花言巧語使劉古香認為沈鴻英對自己忠實，遂相對長吁短嘆起來。第二天（九月十二日）沈又向劉震寰說：“統領住在這裡，妨礙我們辦公，諸多不便，我那裡有地方，由我接統領到我那邊去住吧。”劉震寰不知道沈鴻英的用意，允其所請，就搬到沈部居住（地點即是後來東門街陳炳焜的公館）。沈鴻英又一面向劉震寰獻議，從速派遣新編的部隊出發，想借此減少劉震寰在城里的兵力；一面暗中聯絡藍八、陶二等管帶，邀請他們秘密開會。他對各管帶說：“這次柳州兵變已經鬧大了，北京大總統已經知道了，有電給陸都督派大兵來柳討伐，日內可到。這事是他劉家鬧出來的，將要連累我們，我們不想法子應付，將來大兵到來，我們有翅難飛，不是白白受害么？”這幾個管帶听了這番話，大家驚惶起來，便任由沈鴻英擺布。沈鴻英知道曾超廷督帶對劉震寰很忠實，得大家同意後，才邀請曾超廷來參加。曾來時，見幾個管帶都在座，知道已中計，正要回頭走，沈鴻英極力挽留他，對他說：“這事不用你操心，我已和藍、陶幾位管帶商量好了，由我們去干，免得你得罪老幫（指劉震寰）。”曾知道事已如此，不可挽救，就說：“請讓我做個順水人情，寫封信給劉震寰叫他即刻離城。”曾超廷寫的信送去不到半個鐘頭，槍聲就響起來了，四處同時發動，驅逐劉部，但只聞槍聲，不見傷人。劉震寰接得曾信後，知事已不可為，倉卒帶着幾個隨從由西門逃出柳州城，過河逃回基隆村（劉的家鄉），這是九月十五日的事。由於劉

震寰平日和他們相處很好，就是藍八、陶二等也不同意沈鴻英傷害劉震寰，因此，劉震寰才得安全離開柳州城。

出發進攻南寧的部隊，多屬新編的新兵，到達四方塘時，得到沈鴻英等在柳州叛變的消息，即回師柳州。到達基隆村，這批新升官的管帶、哨官等會見了劉震寰，主張立即反攻柳州城。這些新編的隊伍，初出城時不下五、六百人，由四方塘回軍途中逃跑的很多，到達基隆村，天已大亮，查點人數，已不見了一半有多。劉震寰看到大勢已去，不能挽回，但表面上還和這班軍官敷衍，和他們商議反攻柳州的計劃。到夜間，劉即改裝潛逃。劉震寰走后，羣龍無首，各自星散，我也躲回到我的鄉下。聽說沈鴻英當日（九月十七日）即派兵到基隆村搜索摧殘了一番。

沈鴻英于劉震寰離開柳州后，即分電陸榮廷和陸炳焜報告，大意謂劉古香、劉震寰率眾在柳州叛變，叛軍已被肅清，生擒劉古香，听候處理等語。陸榮廷接電后，于十月九日到達柳州，駐在粵東會館。沈鴻英即將劉古香當作戰俘送交陸榮廷處理。陸榮廷將案情電報袁世凱，袁復電將劉古香就地槍決。劉古香臨刑前，陸榮廷設宴款待，席間將袁電令給劉古香看，劉無語。十月十四日（舊曆九月十五日）劉古香就義于柳州東門外鷓鴣堆（今柳州市幹部子女保育院臨河地方）。

沈鴻英邀功獻媚，得到陸、陳的賞識，升了幫統，后又把曾超廷、藍八、陶二、宋五等部改編，歸為己屬，繼又升任統領。曾超廷等不服，幾乎譁變。陸榮廷回南寧時，將曾超廷全部帶回南寧，后来開赴龍州邊防。

李立廷在玉林五屬的反清斗争*

李 繼 源

李立廷字仕朝，广西省陆川县平乐圩大村人，生于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农历五月初四日，死于一九三四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父李秀南，务农（中农成分），清咸丰年間曾于陆川县大竹根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后被捕，拘禁于陆川县监狱五年（由清咸丰八年至同治元年）之久才获释放。立廷于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年少时在家中随他的二兄李仕英（又名产卿，清秀才）讀过几年蒙館，平时喜听父兄长輩讲述太平天国革命事迹，故从小就奠定了反清思想的萌芽。

立廷体格魁梧，嗜武术，嫻拳棍，性豪爽，有义气，在陆川县平乐圩以开“宝鋪”（即賭館）为名，广結会党及农民羣众。每逢圩日，到宝鋪吃喝的人极多，因此組成“三点会”，公推立廷为会首。是时清朝政府对会党防范特严，故每次拜会必須到偏僻荒山去秘密举行。到光緒二十三、四年的时候，李立廷的三点会組織已发展到玉林五屬和容县、貴县一带了。李立廷是这个地区三点会的首領，副首領

* 根据政协广西僑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注：“李繼源先生系李立廷的儿子，他写这篇史料，相当具体。編者为了使这篇資料更为完整，曾参考了楊家箴先生在区政协召集的辛亥革命史料座談会上的发言，和陈雄先生的‘封祿阶容县起义’一文，增补了一些資料进去。”

是廖十八(陆川县人)、陈泰初(陆川县馬坡圩人)、秦仕立(博白县人)、甘木(容县人)、陈建廷(北流县波里人)。李立廷負責领导玉林五属的三点会,各副首領則分別在各县指揮当地的会党羣众。此外,还用广东省茂名县的毛星樓为軍师。毛足智多謀,他是当时主张在戊戌年农历八月起义的一个。

李姓与陶姓都是陆川县平乐乡的大族,两姓积不相能,时起爭端。当天旱的年分,石狗寨陶家經常堵截公有的灌溉水渠,使渠水尽流入陶姓田中,致李家和廖家的田地缺水灌溉。陶家有武举人陶瑞芝,常与陆川县和玉林州的清朝官吏来往,橫行乡里,欺凌別族。光緒二十四年农历四月間李立廷之母利氏去世,附近乡村的会党羣众及农民数百人都到李家祭奠吃斋飯。入晚,与祭者紛紛散去,各自回家,大园村遍山遍野都是灯笼火把。陶瑞芝便硬說是李立廷立意造反,于夜晚聚众拜会反清。在李母出殯的前一晚,陶瑞芝就邀同陆川县知事史以煥在邻近的高山上瞭望。史以煥已先听了陶瑞芝中伤的謬言,复亲自看到灯笼火把絡繹不絕的情况,更信以为真,遂迫令李仕英将其弟李立廷交出。李仕英不答应,史以煥即将李仕英捉去,囚禁于陆川县監獄中。

李立廷等原拟于八月起义,嗣因李仕英被捕后,其妻钟氏多次催促李立廷从速救兄出獄。立廷救兄心切,即聚众开会商議,决定于农历五月初四日(李立廷出生的日子)在陆川、北流、博白、兴业、容县同时发难,并决定:攻取陆川、北流、博白由李立廷亲自指揮;兴业县城由謝三妹(兴业人)、李平龙(貴县人)联合攻取;容县县城由容县会党首領封祿阶等攻取;各县攻城得手后,即会师玉林,围攻玉林州城。

五月初四日,李立廷由平乐圩率領会党羣众及农民先行攻破

石狗寨，杀了祸首武举陶瑞芝及陶家男女一百三十余人。接着，李立廷亲率陈建廷、廖十八、陈泰初部攻克陆川县城，初八日攻北流县城，又破之。博白县城因有清廷在籍侍卫秦永年内应，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谢三妹、李平龙也如期攻克了兴业县城。容县方面，封祿阶、封梦琴父子则于五月初十日才发难，当日也攻下了县城。

容县迟至初十日才发难的原因是：容县方面会党的老首领甘木自从出卖大成国的范亚音、投降清朝之后，已成了一个革命叛徒，失去了会党领袖的地位，但由于他挂着二品武职的头衔，拥有相当的武力（他家里经常养着二、三百人）。他对会党，尤其是容县方面的会党，明通暗结，也掌握着一部分势力。李立廷明知他反复无常，但为了化阻力为助力，亦征求他对攻取容县县城的意见。甘木说：义军攻取容县城他无意见，只是攻城日期要推迟到五月初十日子时左右；又说，义军占领县城，三日之内他担保无事。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是因为五月初十是容县祭宾兴的日子，全县的士绅均将于初九晚到城参与翌日的祭祀。县里的绅士素来都鄙视甘木的为人，羞与为伍，而甘木则一向自翊自己是二品大员，以容县第一人自居，对县里的绅士们恨之刺骨，想要借此机会假手义军将他们一网打尽；待到城破之后，再运用一贯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阴险手段来收复县城，献媚清廷，期邀上赏。甘木为了配合他的破坏革命、效忠异族的阴谋，他就于初九日把容县县知事王永贞请到他的家里去会宴，以保护王永贞的安全，并且作为以后通过王永贞邀赏清廷之张本。结果，这个叛徒果然尽食前言，当封祿阶所率义军攻破容县县城还不满三天的时候，他即由楊叶村率领党徒突袭县城。义军猝不及防，县城遂为其攻陷。

陆、北、博、兴四县克复后，会师玉林，围攻玉林州城的义军达

十余万人，声势浩大，人心振奋。玉林城周围百数十里的村庄，到处高悬红旗，大书“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和“吊民伐罪”等标语。人人臂缠红布，谓之“缠红”；途中相遇，互称“契弟”，统称李立廷为“大哥”。玉林本境的义军共有十六头领，拥众十数万，均称为李玉廷的“马子”（马子即部属之意）。其中高山李树督所部号称“北马”，器械精利（噙枪较多），为义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马坡黄良笋所部号称“南马”，实力也强。其余各部则多为大刀、长矛、木棍和锄头等简陋的武器。

玉林州城位于一个盆地中心，城墙坚固，近城又无可以瞰视城防的制高点；附郭的村庄如州珮、十甲、吴屋寨等，都是砖石围墙，中多地主豪绅的封建堡垒，也是州城的卫星群。因此，攻取州城，就必须先拿下这些村庄。五月十五日夜間，义军以最精锐的北马进攻州珮，经一昼夜的激战，于十六日晚攻破。十八日又攻占十甲、吴屋寨。至是，环城一带的村庄都宣告解放。接着，李立廷进驻州珮村，攻城之战才进入正式阶段。玉林知州黄桂丹见义军势大，张皇失措，遂请求住在城内的封建头子欧德芳（清朝翰林）、文德馨（进士）、牟芝农（举人）三人合力对付义军，并以欧德芳为首坐镇宾兴，连知州的官印也交与欧德芳，任其便宜行事。于是，他们就乘义军扫荡附城村寨的间隙，竭力增厚城防工事。玉林城墙基高，厚达一丈，以长方大青石为基脚，以长方大熟砖砌到顶端，面上敷以三合土，可以跑马晒谷，梁子林立，炮楼高耸，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池。欧德芳等复压迫各商店民户轮班派人不分日夜，上城把守。各种防守武器如生铁大炮等均极齐全，又将考棚中的大石条搬置于城上，以加强城防。欧德芳等复日夜在城内派人巡查，严刑峻法，残酷无比。不论城防守卒或者居民，只要身上带有一块红

布,就拉到宾兴去严訊,死者极多。有时甚至連話都不問,只是举手作刀砍状,就把捉来的人拉出去斬首。城围解后,清理出来的尸首竟如山积。

玉林城有利的防御条件和恶霸破德芳等运用高压手段切断城内外联系的做法,使义軍屯兵于坚城之下,曠日持久,由主动轉为被动。待到清軍援兵四至,地方豪霸附之,强弱异势,义軍遂一蹶不可复振。当屢攻不下时,义軍曾将州瓊村咸丰年間所鑄重三千多斤的一尊生鐵大炮,扛来架在蔣家楼上,对准北門城墙轰了一响。登陣守城的人逃散一空,惜义軍未能事先作好爬城准备,乘隙攀登,致敌人得重新布置,堵塞崩裂。在施放第二炮时,因翼将城墙一举轰崩,致装药过量,弹飞炮炸,牺牲了不少自己人。

义軍主力既已胶着于攻坚,而北流方面,由于容县城复陷于敌,不得不增加东面的警戒,因而不能增援玉林围城之师。兴业方面,亦由于梁亚庚八的叛变,打掠沙塘謝三妹的根据地,使李平龙、謝三妹不得不回师救援,从而玉林围城之师又减少了一支劲旅,且增加了北顧之忧。时值連日大雨,西方与善桥江洪暴发,义軍势力只能及于白庙各村庄,不能越过善桥攻略福棉。福棉距城三十里,为玉林西面重鎮,該地大姓萧愷周鏡多枪多,武断乡曲,樟木、城軍一带均惟其馬首是瞻。此时萧未轉紅,各处均在观望,确为义軍的重大障碍。且福棉与船埠一葦可航,南通博白,为从北海入广西的孔道。福棉不能拿下,則围城部队即不能解除西顧之忧。义軍屯兵坚城之下,久攻未克,枪械、弹药和粮食补充不繼,清軍援兵又复四集,堵截邀击,亦使义軍备多力分。正在义軍攻势頓挫之际,駐广东北海的清軍綏远軍两营于六月初旬突从博白經船埠直入福棉。萧愷周为該軍两管带献計,并为之雇用向导,且以重金賄

路两管带，表示俟击退围城义军之后当以白银数千两犒军，本人也随军行进。于是清军遂分三路向玉林义军袭击：中路由玄帝堂、吴屋寨前进；右翼由竹尾上南桥；左翼直扑十甲、州城。那天细雨蒙蒙，义军与敌军接触时，因火煤受湿，枪炮火门发不出火，军心已生畏怯；迨闻敌阵发出“噫穷”之声（火隐枪击发之声），战士更加恐慌，一部分惊慌溃散，终于牵动了全线。李立廷见大势已去，遂命令各部分别向山区转进，保存元气，以待时机。李立廷本人则和他的堂弟李和廷、堂姪李树松等出走。途中曾几次遇到敌人尾追，他们将随身所带白银抛弃地上，诱使追兵抢拾，方得脱险。同时李立廷对于“如意油”刺激皮肤特别敏感，遂将如意油遍擦面部，使面部浮肿，难以辨识，从而得以瞒过了沿途严密的卡守检查，安全脱险。他们出走的路线是由陆川县平乐圩经过北流、容县、岑溪转广东省的罗定县而到达香港的。时清廷悬了数万两银的重赏，务欲获得李立廷而甘心，但李立廷已“鸿飞冥冥”，无从弋获。因此，驻防龙州的广西省边防督办苏元春就找出一个替身，在龙州正法，虚报清廷说已捕获李立廷正法。

李立廷、李和廷两人在香港是以“卖猪仔”（卖身出南洋作苦工）到达新加坡的。计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二年这十五年间，李立廷曾先后到过新加坡、马来联邦、缅甸、暹罗、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为了避免清朝政府的缉捕，他曾先后改名为李桂山和黄桂。各地的橡胶、锡矿等华侨工人在李立廷的鼓动下，加入会党者日益众多，李立廷亦深得华侨工人的拥护和爱戴。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时李立廷居留在印度尼西亚（当时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由于华侨工人参加会党组织和活动的很多，会党声势很大，当地的荷兰政府深恐李立廷又在他们的属地里倡乱，遂将他拘

禁了一个多月。隨即将他連同七十多个中国“犯人”押往香港，准备交清政府处理。李立廷在船上結交了一个看管他們的华籍炊事員，經常晓以愛祖国、愛同胞的大义，并給了他数十元，鼓动他放走他們。当輪船到达香港海面检查时，李立廷就将自己的行李款項交給一个名叫李奎的归侨，叫此人冒名頂替自己，他則悄悄僱一小艇高輪，搭船到澳門。以后他在港、澳之間逗留了数个月，随又再返新加坡。

頂替李立廷的李奎被解到广州审訊后，証实确系归侨，并非李立廷，不久就释放了。

清光緒末年，孙中山曾先后亲笔写过两封信到新加坡給李立廷(这两封信都失落了)，要他向华侨筹款为革命之用；李亦不久就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十年間，孙中山曾在广州接見李立廷，对他說：“你就是戊戌年领导玉林五屬农民起义的李立廷嗎？你回广西后要對广西人說，現在不要反了，应好好归順我們革命政府！”

辛亥革命胜利后，李立廷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到达香港时，香港的华商总会会长叶兰泉和当地同胞曾开会欢迎他；回到广州时，广州商会也送了他一块題有“名揚两粵”的橫匾。李旋在广州领导一部分民軍，与王和順、黃明堂、李福林、陆兰清等部民軍同駐广州，并曾率部出发阳江剿乱。时广西境内河道不靖，土匪到处横行，有人对广西都督陆荣廷說：李立廷对桂南一带的綠林人物有号召統馭的能力，应该叫他回广西工作。陆荣廷然其說，李立廷便于民国元年一月由广州回到广西，并被任为广西省水师第二师統領，駐防于藤县濠江圩，以貴县至梧州沿河一带为其管轄范围。民国三年至四年調到南宁，任都督府軍事顧問官。民国五年至八年，再調任梧州水上警察厅厅长，桂林至梧州沿河一带为其管轄范围。

当他任水师統領和警察厅长期間，柳、玉、潯、桂四江交通暢通无阻，来往船只，只要插上一支“李”字旗子，沿河綠林人物均不敢向船舶行商搶劫。

李立廷回广西后，想返回陆川原籍，重整十五年前被毀的家园。乃派他所属的左营管带廖德兴(当年会党首領廖十八的后人)于民国元年先回陆川，与陶家清算十五年前的旧賬。当时陶家用巨款向陆荣廷的亲信蔣乃勤行賄，致李家被陶家霸占的田產沒有夺回。同时，陶姓又运动陆荣廷叫他制止李立廷回乡，因此李立廷就决定在梧州落业。民国九年，李就在梧州維新街家里閑居，不再从政，中間曾去过香港、越南和新加坡三地，居留了两年多時間便回梧州終老。

李立廷于民国二十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时年七十三岁。民国二十四年，他的家屬曾具文呈請国民党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請求撫卹，但結果所得的只“所請暫从緩議”六个字而已。

李立廷的戊戌起义失敗后，清吏就在有关各县办理“清乡善后”，所有首义人物的家族均遭到慘祸和株連。李、廖、陶、蔣、世等家无一倖免，最慘的是李家。李仕英最先被捕，拘禁于陆川县監獄遇害。李生甫在起义失敗后，本已逃到石山里躲避，但因其爱犬向追捕者狂吠，清軍搜山，致被捕遇害。李立廷之妻卢氏逃到亚計岭姐夫家自杀而死，連她的姐夫也受害。李立廷的次妻梁氏，嫻武术，起义时騎馬参战，亦被捕囚于陆川县監獄，不屈而死。当时李家生还的和逃跑外出的男女不过二十余人，其余不分男女老幼，均被杀害，亲戚也受到株連。所有房屋尽被燒毀，夷为平地；李姓祖宗的坟墓也被挖掘出来。清朝反动政府鎮压人民起义，其所用手段之殘酷，于此可以概見。

覃老发、陆亞发在四十八寨的反清斗争*

黄孟侖 卓 通 陶志方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七年)冬間,广西永宁州(今永福县)的背塘村发生了一个命案。事因南沙村有一姓黄的买了背塘村陶世茂两口小猪,欠錢屢索不还。是年除夕,陶世茂想要回这笔錢来过年,但又怕黄某凶恶蛮横,乃就商于覃六五、覃老发(小名六八)兄弟等。覃六五、覃老发兄弟仗义和陶世茂同去南沙村,向黄某索还猪錢。黄某不但不还,反而口出恶言。他們乃憤将黄某的猪抬走一只。黄某糾众追出来搶猪,以致打起架来,結果黄某竟被打死,鬧出了命案。黄姓乃以土匪劫家杀人案向永宁州衙門誣告。当时的州官李鴻宾是个有名的酷吏,他不管办什么案件,不管有理无理,都要动輒打屁股,打了再說,每打都以五百板起碼,因而有“李五百”的綽号。他受理黄姓的誣告案后,屢次派兵到背塘村追捕覃

* 据政协广西僑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注:“黄孟侖先生現年七十一岁,中渡县(今鹿寨县英山鎮)人,当时任小学教师,現为中医。中渡离背塘村十二华里,是四十八寨的总口子,清政府的军队每次进攻四十八寨和企图誘降义軍的指揮部都設在那里,因此,黄先生对于覃老发、陆亞发起义斗争的經過知之較詳。卓通先生現年八十一岁,陶志方先生現年七十一岁,都是背塘村农民,是和覃老发同一个村子、同一个时候的人,所以他們对于覃老发的事情知道得特別真切。这篇資料是根据三位老先生的口述記錄与整理而成的。”

六五、覃老发、陶世茂等，并抄掠他们的家产。覃老发等三人逃亡在外，经常和会党人士来往，结识了不少豪杰，其中蓝举廷、于七（广东高州人）等是他们比较知心的朋友。他们都拜了会，并回到中渡附近开台拜会，一时农民拜会的很多。近岭村郭十二、茶担村秦仕儒；九地村黄三六（又名长盛）、桥头村赵小戊、西眉村钟鸡狼、难村黄宗圭、边塘村覃荣风、大仑村覃老三、拉敢村陆老椎、铜钱岭罗奎子经、背塘村覃荣华（覃老发之弟）等，都参加拜会。这班人除黄宗圭是个秀才外，其余都是贫雇农，后来他们都成了覃老发的骨干。

覃老发等有了群众，有了组织，也就有了反抗封建地主的力量。中渡、马岭一带韦姓、潘姓大地主都拥有千石以上的地租，当地十之八九的农民皆受到他们残酷的剥削，这时候他们的租谷都收不成了。特别是永宁州寨上的大恶霸地主韦麟阁，平常仗恃他的大儿子在山东曲阜县当知县，不但对佃户尽情剥削，并且任意役使佃户为他造楼房，筑围墙，过路的人也往往被他强拉去供驱使。但是这时候，他的租谷也收不起来了，他的佃户也不听他奴役了。在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二日，这个大恶霸勾结永宁州官李鸿宾率领大队兵马来背塘村割村，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农民的财物牲畜搜掠一空，纵火焚烧民房。这一百多户的大村庄，差不多整个化成瓦砾，一片荒凉。正是“官逼民反”，全村数百农民，在覃六五、覃老发兄弟的号召下，高举义旗，以油麻岭为根据地，展开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同时，秦仕儒、郭十二、赵小戊、黄三六、钟鸡狼、黄宗圭、覃荣风、覃老三、陆老椎、罗奎子经、覃荣华等十余人，也各皆组织武装部队，跟着起义。最初众推覃六五为首领，后以覃六五私心大，经济不公开，不孚众望，乃另推覃老发为首领。覃老发为人豪侠，有胆有识，膂力过人，武艺好，能举百八十斤的石磴置腿上，还能开强弓射箭。覃老发当首领后，部众越聚越多，最盛时

达五、六千人，四十八寨皆归他控制，声势很大。寨中有一个虎胆山，大家就尊覃老发为虎胆山振威王。

是年冬，永宁州差役下乡，到鸦路村借端勒索不遂，即以村人造反向州官李鸿宾捏报。李竟不問青紅皂白，立即亲率兵勇围村，大肆擄掠，放火烧毁民房。村人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投靠义军。李鸿宾在鸦路村擄杀放火后，率部驻屯偶，企图进攻义军。覃老发探悉，即率其精锐乘夜袭击，毙敌数十人，州兵大败，李鸿宾仓皇逃回永宁州。

一九〇三年二月間，永宁州糾合柳城、雒容两县官府武装围攻四十八寨，分三路进攻：第一路是統領王凤岐由雒容县进兵中渡；第二路是管带王冠英由永宁州出三隍；第三路是統領刘誠桂由柳城出太平。原約定二月二十一日各路同时开始进攻，但中渡一路王凤岐部管带周天长（貴州人）将会师进攻的时间誤听为“二十日”。于是周天长就在十九日准备好干粮，于二十日五鼓出发，向油麻寨进扑。周部內有会党人員，早向油麻寨报信。覃老发得报，即派精锐二百人于穿岩、夏末一带要隘埋伏，候周部深入后，以一部截断其归路，另以一部迎头截击，并插起香火作疑兵。这一战，当场击毙周军二百余人，落入洛江淹死者不少，缴获快枪弹药甚多。周天长率领残部七、八十人逃去。这一路大败后，其他两路就仓皇撤走了。

是年冬，柳州知府祖純武統領率大軍至中渡，陆亚发部（陆亚发受編为紹字先鋒营）同来。祖純武声言先撫后剿，但覃老发并不畏惧，也不理会。祖純武乃派陆亚发和覃老发的亲友同入油麻寨，多方引誘，并責成陆亚发負責担保。覃老发乃派赵小戊出来和祖純武接洽，約定于十二月初在响水、大庙、江洞一带集合，听候点驗。这时桂林方面又派董統領前来协助办理。祖、董两人密議捕

杀覃老发，他们认为只要把覃老发这个大首领杀掉，其余部众就没有问题。这一阴谋，陆亚发并不知情。当覃老发如约命令所有部众集中响水一带听候点验时，祖統領借商議点验办法为名，誑覃老发出中渡。覃老发不疑其詐，亲自带卫队共十七人到中渡見祖統領。祖备了酒席，在請覃老发及其卫队吃酒的时候，突然把他们逮捕起来，即时杀害，只有唐世恩一人跑脱出来报信。各小首領对清政府非常痛恨，但一时羣龙无首，也无可奈何，只得仍各退守原防，再作計議。陆亚发以政府不顧信义，使自己失信于友，也非常不满，但处于严威之下，不敢出声。事毕，祖、董两統領各率部回防。

一九〇四年，两广总督命調陆亚发部下广东，說是要換好枪給他們。陆部鉴于黄飞凤、梁果周、覃老发等部被徽械屠杀之慘，决意反正。陆部在柳州反正后，据柳州数日（五月十一日举事，十五日退出），附近“土馬”（指本地会党）均来归，一时集合到柳州的部队很多，声势浩大。覃老发原来的部众到柳州来欢迎陆亚发去四十八嶽。陆遂率部从北門出，到长塘后分为两路：一路由白毛七、硤四、褚大等率領上柳城，据小长安、融县、罗城之間的五十二洞；一路由陆亚发亲自率領，走东泉前赴四十八嶽。

陆亚发到达四十八嶽之后，原覃老发的部众都拥护陆为首領，四十八嶽的声势复大振。油麻嶽的大胆口成了大圩場，一时頗为熱鬧。

清政府聞得陆亚发占了柳州，据有四十八嶽和五十二洞这样广闊的地区，桂、柳、庆几府都受到威胁，頗为惊慌，乃檄調两广总督岑春煊来桂負責办理进攻陆亚发的軍事，并調动了湖南、湖北、安徽、云南、貴州、广东、广西七省的大軍入桂会攻。

陆亚发在柳州起义的时候，广西省会桂林原很空虛。陆亚发进据四十八嶽后，即整頓部队，向永宁州进攻，原拟直搗桂林省垣，

攻破三隘圩，向永宁挺进至路尾、桥板等圩。知州吕鉴熙率兵据山寨死守，清军统领宋尙杰等又以重兵直压三隘。岑春煊撤调各省的大军又已陆续到来增援，从柳城、中渡等地蹙起义军之后。陆亚发不得已，退还四十八寨。清军数万人层层包围，陆亚发据险坚守。

中渡德隆商店老板张振德，是个收千多担租的大地主，并在中渡开铁厂，又在柳州开有白糖铺。当陆亚发在柳州起义时，没收了他的白糖铺，他怀恨在心。迨岑春煊派右江道王芝祥坐镇中渡办理军务时，张振德大献殷勤，经王芝祥派他办团务，准他招募一个保安营，约五百人，并委他为管带。七省大军包围四十八寨时，张振德的保安营任先锋在前作向导。寨上的大恶霸韦麟阁也带兵会同向油麻寨包围攻击。打了七天七夜，反动军团虽然死伤不少，但覃六五和覃柴华的部队损失也很大，当他们退回甘棠寨时，覃六五负重伤，不幸牺牲了。

在这样的大军压境、四面围攻的威胁下，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后，陆亚发在柳州带来的“土马”（陆亚发在柳州起义时临时参加的本地部队）四散了，“广马”（陆亚发原来率领的欽州、南宁一带的基本部队）和陆亚发本人退出四十八寨，不知去向。张振德遂献议“剿抚兼施”，并亲进四十八寨与各小首领接头投降。王芝祥也表示不究既往。于是各小首领及其部众都被骗投降。

岑春煊命令王芝祥要投降的小首领把陆亚发擒获，王芝祥责成张振德负责办理。张振德乃招集各小首领到来，用种种手段威逼利诱，要他们找出陆亚发来。投降人中有个覃老三，他的老婆是古板饭洞（属五十二洞）人，曾见陆亚发的三个小婆在古板饭洞，因此张振德猜想陆亚发也在那里。投降人中的郭十二、赵小戊都有熟人在古板饭洞，张振德即派郭、赵二人到那里去打听陆亚发的下落。经查得陆亚发确在那里后，张振德即带其保安营和熙字营

一同去围捕陆亚发。陆亚发身边当时仅有七人，所以就毫不费力地把陆亚发擒获了，缴得枪五支，并俘士兵四人，陆眷三人和他的师爷夏某也被执，一并解至中渡。时为一九〇五年农历正月。岑春煊电令王芝祥将陆亚发星夜解送桂林，就地枪决，其家眷无人具领者亦枪决。王芝祥曾电柳查询陆的家属，但陆眷皆愿随陆同死，乃皆绞死。夏师爷被凌迟处死，士兵则均被枪毙。陆亚发解至桂林后，岑春煊集合众文武官员亲临刑场，将陆亚发凌迟处死，挖出心脏。岑即亲手从陆的心脏内取血一杯，和酒饮之，并持与各官员同饮，在场的北方籍官员无不摇头退避。

岑春煊杀了陆亚发后，又密电王芝祥将各小首领一网打尽。王令张振德负责办理，时约在正月二十日左右。张振德奉命后，以庆功请宴为名，在他的家里——德隆店设下酒宴，被请的各小首领是：郭十二、秦仕儒、黄三六、覃荣风、陆老椎、赵小戊、唐世恩、韦老三八人。到时来了五人，赵小戊、唐世恩、韦老三未到。张振德即将五人捕拿，交王芝祥杀害，唐世恩也在半路上被捕杀。第二天又去捕韦老三、赵小戊二人，赵逃脱，韦被捕，亦遭杀害。张振德因为擒陆亚发有功，得署潯州府兼水师统领。

秀才黄宗圭也是覃老发的小首领之一，他于覃老发被捕杀后即出来投降，被关在牢狱里病死了。

覃老发、陆亚发等义军在清政府调集的七省大军压迫下虽然失败了，但各地义军四散潜伏，会党反清的活动并未停止。清政府鉴于四十八峯、五十二洞等地方重山叠岭，形势险要，易为革命势力所利用，乃将原属雒容县的中渡圩（现为鹿寨县英山公社）设中渡厅，以桂林府同知驻守，并割柳城、雒容、永宁三县之地归厅管辖；永宁州系以白芷之乾江一水为界，割地最广。中渡厅于民国成立后改为中渡县，解放后并入鹿寨县。（刘立道记录）